

世界通史
(当代卷)

第一章 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

第一节 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雅尔塔体系”的确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雅尔塔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三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和维持战后的合作。在西方，它通过关于分区占领德国及德国赔偿的原则协定、关于波兰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以及“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等，划分了美英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在东方，它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雅尔塔会议上，由于丘吉尔的坚持，英国（当然也包括法、荷）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被保留下来。德意日殖民地则由联合国托管，殖民地独立被纳入大国保护的轨道。战后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确定了“大国一致”的原则，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保证了在这个最重要的世界组织中大国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美英苏三大国首脑为战后世界秩序所作安排的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制定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美国凭借其在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实力优势，早就谋划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霸权地位的战后世界秩序。罗斯福认为必须把美英苏的战时联盟关系发展为战后大国合作的关系，才能实现美国所希望的战后世界蓝图，由美国充当世界盟主。斯大林之所以积极响应三国首脑会议的倡议，是希望扩大和巩固苏联在战争中取得的成果，谋求美英战后不干预东欧并共同占领德国，在远东则要求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苏联还希望创造一个安全、有利的战后国际环境，以恢复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

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达到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各自追求的目标，因为会议期间正值苏联军事地位和政治威望处于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顶峰。战争打出了一个唯一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苏联，并使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连成一片，这一前景到雅尔塔会议之时已是十分明显了。美国设计它的战后世界蓝图，欲挟其经济、军事的优势称霸世界，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严酷的现实。因此，罗斯福把美苏继续合作视为落实其战后世界安排的关键，愿意作出某些让步，换取苏联的合作。苏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也同意合作，认为雅尔塔会议“制定了一个以民主的方式安排战后世界的纲领”。

雅尔塔体系是美英和苏联互相妥协的产物，在当时三国都是能够接受的。它具有大国强权政治的性质，但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的一些世界现实，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雅尔塔体制对缓和与制约美苏之间与东西方之间的矛盾，维系战后和平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并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因此雅尔塔体制是终将要解体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卷入大战的国家达六十多个，人口超过二十亿，战火遍及欧、亚、非和大洋洲四大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大洋。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的浩劫和损失难以作出确切的统计。据估计军

民伤亡约一亿人以上，军费开支约一万多亿美元，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美元，成为一场几乎毁灭人类全部文明的大破坏。然而，二战以人类的巨大苦难为代价，借助于熊熊的战争烈火，摧毁了旧的世界结构，各种新的力量在经过战火洗礼的大地上滋生发展，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它们的成长崛起开辟了道路。二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战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打破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从而促使世界历史从一个欧洲列强主宰全球的旧时代逐步过渡到一个多元结构的新时代，国际上出现了新的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使旧欧洲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战争炮火的破坏和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已是体无完肤。德意因战败而退出争霸的舞台，英法虽然取胜却被严重削弱，用戴高乐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在这场赌博中抓到一张大国的王牌”。它们不仅未能像第一次大战那样掠取到新的殖民地，而且连旧的殖民统治也岌岌可危。整个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经过这场战争，旧的欧洲衰落了，欧洲列强主宰世界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欧洲的中心地位为基础的旧世界结构已尽毁于二战的炮火中，战后的欧洲不得不分别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庇护之下。

随着欧洲中心地位的丧失和欧洲殖民主义的衰落，美苏逐渐主宰了世界，形成了美苏在欧洲以至全球对峙的局面。

美国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反而受到战争的刺激，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膨胀。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黄金储备的3/4，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国拥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其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并垄断着原子弹，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二战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跨过两洋，进入欧亚，成为控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

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最残酷的战争考验，为打败法西斯作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苏联在战争中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其军事、政治势力越出国界，扩及东欧大部，到达中欧，在远东也有很大的影响。苏联作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的出现和它的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以及二战结束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诞生，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相继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美苏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而结成的战时同盟，随着德日法西斯的败亡而迅速破裂，双方争夺世界的矛盾激化起来。加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美苏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扩展，形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一些国家的分裂，如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朝鲜和韩国，许多国际争端，都是世界两极对立的具体体现。

欧洲旧殖民主义的衰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另一意义深远的影响。亚非拉许多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贡献，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它们利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有利条件，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民族力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准备了精神和物质基础。战后初期，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纷纷获得新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有如东方巨龙的觉醒，震动了世界。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促使刚刚摆脱殖民枷锁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联合形成一支第三世界力量。第三世界不仅人口占世界的绝大多数，而且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美苏为避免正面冲突和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加强了对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敏感的“热点”，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当它们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时，对整个世界局势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南南合作”的加强，“南北对话”的出现，都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和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膨胀起来的美苏两强的矛盾与斗争，逐渐形成了战后的两极对立。美国为了从东西方遏制苏联而大力加强对日本和西欧的扶植，帮助其复兴。战后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为整个工业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开辟了途径。随着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战后出现了一个比历史上工业革命更为广泛深刻的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日本和西欧依靠同美国结盟，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得以集中全力利用新技术发展经济。旧欧洲的衰败和分裂，促使战后的西欧走上联合的道路。发展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的日本和西欧经济共同体日渐成了东西两股重要的独立力量，敢于与美苏抗衡。中国日益成为影响巨大的大国，它和日本、西欧与美、苏一起，同被认为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这种新格局越来越冲击着战后的两极体制，世界从两极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趋向是更加明晰可见了。

第二节 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建立

盟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筹划与联合国的正式成立 雅尔塔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联合国组织。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签署了共同反对法西斯的《联合国宣言》，提出联合国的目标不仅是打败共同的敌人，而且要建立一个拥有“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罗斯福政府对筹建新的国际组织表现得最为主动，最为积极。罗斯福认为，凭着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应居“领导地位”，但要取得苏联的合作。赫尔国务卿强调：“把俄国拉进来共同去建立战后国际组织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在这点上达成协议，解决其他问题就会容易得多。”苏联对此问题也早有考虑。1941年12月发表的《苏波友好互助宣言》中就曾指出：“在战争胜利并对希特勒战犯们给予适当惩罚后，盟国的任务将是保证一个持久和正义的和平。只有通过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个持久同盟的基础上，这个任务才能完成。”1943年10月，在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普遍安全宣言》草案，美英苏中四大国代表随即正式签字。“宣言”明确宣布“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年8~10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具体讨论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把未来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提出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会员国的资格、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等主要机构和职能，以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关于国际经济与社会合作的各种安排。随后，美英中三国代表举行会议，接受了上述建议。这样，联合国宪章已具雏型。1945年2月雅尔塔首脑会议进一步解决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遗留下来的关于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表决程序两个问题，确定“五大国一致同意”的原则，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至此，建立联合国的一切重大障碍都已扫除。雅尔塔会议决定于1945年春召开联合国会议，讨论拟议中的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举行。有50个国家282名代表出席会议。美、苏、英、中的首席代表是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艾登和宋子文。旧金山会议历时两个月。从4月25日到5月2日，大会进行了一般性辩论，同时研讨了会议的组织工作，确定英、俄、法、中和西班牙语为大会的正式工作语言。从5月3日到6月20日，会议专门讨论了宪章问题。澳大利亚等四十多个中小国家要求修改大国否决权。但是，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敦巴顿和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确认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6月21日起，会议对宪章的条文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撰和审查。6月25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6月26日，代表们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馆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第一个签字，接着是苏联、英国、法国的代表，然后是各国代表按其国家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的顺序签字。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参加签字的有50个国家的代表，后来波兰代表也在宪章上签了字。这51国被称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6月26日被定为“宪章日”。10月24日，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和其他多数签字国递交批准书后，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日”。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召开。

联合国的组织机构 联合国是战后以来最大、最有影响的世界性国际组

织。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构成一个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等。为了实现上述宗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等等。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常遭到大国的曲解和践踏。联合国内一直存在着遵守或破坏宪章的斗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须声明接受宪章，经安理会推荐，由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即被接纳为会员国。到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共有会员国185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已超过100个。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六个：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日内瓦设有欧洲办事处。

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定期举行一届常会。应半数以上会员国或安理会的请求，还可于15天内召开特别会议或24小时内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并向会员国和安理会提出建议。据宪章规定，每一会员国均有一票表决权。重要问题的决议，需有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

大会常会的全体会议由主席或副主席主持。大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21人。主席、副主席按地区分配原则选举产生。每届常会设七个主要委员会，负责讨论大会分给它的有关议题，提出建议，交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大会决议。会员国向联合国总部派常驻代表团，负责处理有关联合国的经常事务。

安全理事会由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增为十个）组成。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

安理会是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它有权调查和调解任何国际争端；有权判断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动，并采取经济、外交或军事等制裁行动；有权拟定军备控制制度，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新会员和秘书长等等。安理会每年举行两次定期会议。但如果安理会主席认为必要，或经大会、秘书长或任何理事国的请求，可随时召集会议。安理会主席由各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按月轮流担任。安理会除程序问题外的一切决议，都必须由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九个理事国投赞成票才能通过，即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实质问题上有否决权。因此，安理会的行动是以“五大国一致”为基础的。但是，若有七个非常任理事国反对而得不到九票多数时，该项议案也不能通过，这被称为非常任理事国的“集体否决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联合国大会选出理事国组成。从1973年起共有54个理事国。理事国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可连选连任。

经社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研究国际经济、社会、文化、人权、教育、卫生等问题，向大会、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提出建议，其决议提交联大通过后生效。经社理事会下设：亚洲及远东、西亚、非洲、拉美、欧洲等五个

“区域经济委员会”，社会、人口、统计、人权、妇女地位等专业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机构同经社理事会保持着各不相同的工作联系，如国际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等。

托管理事会是联合国负责实施国际托管制度的机构，由管理托管地区的会员国和不管理托管地区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每年开会一次。按宪章规定，适用于国际托管制度的地区是大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地区和二战后割自敌国的地区。战后这些地区先后获得独立，最后只剩下一个托管地区：美国管理下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即密克罗尼西亚。1994年，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群岛获得独立，联合国托管制度结束。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关，设在荷兰海牙。它由大会和安理会选举出来的15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法官不代表任何国家，不得接受本国的指示，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五名，可连选连任。按惯例，美、苏、英、法、中五国应有人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法院对受理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国双方均应遵守。

秘书处负责处理联合国的行政秘书事务，执行各机构交付的任务。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由安理会推荐经大会任命，任期五年。秘书长在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的一切会议中行使其职权，向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和必要的补充报告，以及有权把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等官员经各会员国向秘书长推荐，由秘书长委派。宪章规定，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只对联合国负责，不得接受任何会员国政府的指示。

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创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实力空前增强，它的黄金储备占到资本主义世界储备的74.5%（1948年），出口贸易占32.4%（1947年），它还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国依靠它的经济绝对优势地位，积极筹建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

早在二战后期，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建立“联合国外汇稳定基金”的方案，规定各国必须缴纳资金以建立这一基金，各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取决于缴纳份额的多少。基金组织发行“尤尼他”，作为计算单位，各国货币和“尤尼他”保持固定比价。基金组织的任务主要是稳定汇率，向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怀特还提出要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会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帮助各国的经济复兴发展。怀特方案显然有利于美国操纵基金，控制国际金融市场。

英国势力在二战中大为削弱，但英镑区仍然存在。40%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仍沿用英镑结算，英镑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英国不满美国的方案。英国财政部顾问、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自己的方案，主张建立“国际清算联盟”。联盟采取透支的方式提供信贷。它发行不兑换的计算单位“班柯”，通过它清算各国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各国在清算联盟中所承担的份额，以二战前三年平均贸易额计算，不需缴纳现金。这个方案避开了英国缺乏现金的弱点。英国企图利用联盟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权。美英双方长期就这两个方案进行讨价还价，最后英国让步，基本同意美国计划。

1944年7月初，美英苏中等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最后协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194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同时成立。

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确认美国在 1934 年规定的每盎司黄金为 35 美元的官价，并把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美国则承担义务，保证各国中央银行可随时用美元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协定还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建立固定的汇率。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这两个挂钩，确定了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美元等同黄金，许多国家用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和主要国际支付手段。美国不仅把美元散发到世界各地，而且通过美元的发行，通过信用的扩张和收缩，操纵国际金融活动。

1947 年 4 月至 10 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关税和贸易会议，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48 年在联合国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协调成员国的贸易争端。关贸总协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是战后主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这三大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出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它对固定汇率、相对稳定各国币值、扩大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起了某种积极作用。美国则极力通过这三个组织操纵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投资和贸易，向外经济扩张。

苏联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后来没有批准会议的协定。它拒绝参加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冷战的加剧，苏联大力加强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于 1949 年 1 月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以抗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此后不久，美英法等国于 1950 年 1 月组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控制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出口。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总部设在巴黎，一般称它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它把军用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定为受控制的物资，先后规定了一千多种禁运物品。1951 年，美国取消苏联的最惠国待遇，并宣布对向苏联提供禁运物品的国家停止一切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宣布不向非成员国提供贷款，从而停止对苏联的贷款。与此同时，苏联也不允许美国的许多商品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经济被人为割裂，出现了两个平行市场。

第三节 对战败国的处置

对意、罗、匈、保、芬五国和约的缔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德国的欧洲仆从国先后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些停战协定已经规定了对战败国的处置原则，具有和约的初步性质。盟国首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已就战败国的处置和缔结和约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负责对意、罗、保、匈、芬的和约准备工作。

但是，由于美苏等大国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各有打算，在讨论五国和约时争吵激烈。美英企图通过订约与苏联争夺东欧，防止苏联在地中海取得立足点。苏联希望通过订约尽量巩固和扩大它在东欧的地位。在讨论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处置问题时，英国只提出意大利应该放弃这些殖民地，但不提其归属，实际上是由英国占领当局控制；美国主张由联合国托管十年，反对英国独占；苏联则要求将的黎波里塔尼亚交它托管。关于意、南边界问题，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的的主权属意大利，行政上由“国际共管”；苏联主张主权归南斯拉夫。结果把的里雅斯特划为自由区。1954年，西方国家单方面决定由意大利合并该自由区的城区，郊区部分归入南斯拉夫。在对罗、匈、保和约的讨论中，美英打出贯彻雅尔塔会议的旗号，坚持要求在这些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和改组政府后，才能同它们缔结和约。苏联则指责美国破坏和约缔结程序，谴责英美干涉希腊内政。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开始和约的讨论。经过长期争论，先后开了三次外长会议，才达成一定协议。1946年7~10月召开有21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外长会议，通过了对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1947年2月10日，各有关国家分别在五个和约上签了字。和约主要规定了五国的领土边界变更、政治民主化、限制军备和经济赔偿等问题。

五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美英苏妥协的结果。和约的缔结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对实现欧洲和平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德国的形成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东区由苏联占领，西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大柏林也由四国分区占领，并由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根据波茨坦协议规定，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是：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总司令分别在各占领区内执行，并共同处置有关全德国之一般事件；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消灭纳粹党及其一切附属机构；消灭德国的垄断组织；准备缔结一项符合波茨坦协定原则的和约。但是，四大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只按照本国政府的政策行事，对本国政府负责。而各国分歧甚多，斗争激烈，都想把战败国德国的处置纳入自己欧洲战略的轨道。盟国管制委员会只有四国完全一致才能作出决定，很难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因而形同虚设。各占领区实际上成了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波茨坦协议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实行。

美国强调德国的统一必须先实行经济统一。1946年7月20日，美国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得到英国的支持，签订了美英占领区经济合并协议。1947年1月1日，成立双占区。同年，苏占区和美英双占区分别成立各自的政治机构。在德国的土地上，形成两个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政治实体，一切

想实现全德统一的努力均告失败。美英决意率先单独行事。1948年2~6月，举行了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伦敦会议，决定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参加“马歇尔计划”；国际共管鲁尔。

针对美国的行动，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第一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威廉·皮克（1876~1960年）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1948年2月，改组了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使其具有准政府的职能。3月，苏联抗议美英法片面召开伦敦会议，宣布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单独实行货币改革。6月22日，苏占区也开始实行货币改革。6月24日，苏联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结果爆发了“柏林危机”。美英法派出大量飞机向西柏林空运粮食、煤炭和各种日用品一百四十多万吨，以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苏联没有对这一空运活动进行干扰。美英法也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11月，苏占区建立了柏林的市政机构。12月，西占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大柏林市正式分裂为各自有其市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经过长达11个月的斗争，双方于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取消一切封锁，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形势所引起的诸问题。“柏林危机”暂趋缓和。

美国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正式成立。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 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整个日本，由太平洋美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最高统帅。1945年9月22日，美国发表了《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宣布对日占领的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建立“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的负责政府”；并宣称“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政策应居主导地位”。这表明美国一心要单独占领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称霸亚太地区的工具。

苏联强烈反对美国独占日本的政策，9月24日，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要求成立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遭美国拒绝。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美、苏、中、英、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菲等11国组成。它在名义上是盟国制定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其决议要通过美国政府传达给占领军总部去执行。另外在东京设立由美、苏、中、英、澳、新、印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它只不过是咨询机构。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并没有改变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的性质和美国对日本的支配地位。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美国亚洲政策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美国加速扶植日本，积极策划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9月4~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被邀请，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会议签订的片面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西沙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不提这些岛屿的归属。和约还规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

岛等交美国“托管”。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要求。苏联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方案，美国拒绝讨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对日和约签订的同一天，美日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取得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无限制地驻军及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国可以出动驻军“平定”日本的“内乱”。美国还指使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和约”，日蒋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确定下来，日本完全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道。

第四节 美苏冷战对峙与两极世界的形成

美苏从战时合作走向冷战 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后，美英苏共同反对法西斯的战斗使命胜利结束，结成战时联盟的军事基础已不复存在。然而，罗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认为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可是，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的政治裂痕日益扩大，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最终导致联盟的公开破裂。

美苏关系的焦点是东欧问题，特别是双方在波兰、德国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导致战时联盟的破裂。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患脑溢血突然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于4月20日和23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对苏采取“强硬”政策。4月23日，杜鲁门接见前来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的莫洛托夫时，一再指责苏联违背雅尔塔协定，要求改组波兰政府，并威胁说，不这样做将严重动摇美苏合作的决心。苏联在东欧问题上拒绝让步，美国打起贯彻“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的旗号，坚持要求东欧国家实行“自由选举”。8月18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发表声明，抗议苏联操纵保加利亚选举，并公然恫吓说，若不容纳“一切重要的民主分子”参加政府，美国将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也不与它缔结和约。

美国当时正处于实力的顶峰。杜鲁门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可是，经过战争考验而强大起来的苏联，在战后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坚持不对美国让步。斯大林在1946年2月发表演说，指出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攻击这篇讲话，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美国统治集团认为，苏联是其实现霸权的唯一障碍，必须组织对抗力量对苏联加以“遏制”。正在杜鲁门政府酝酿对苏强硬政策之时，1946年2月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电报，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凯南认为，苏联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有一种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美苏之间无法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把苏联看成是政治上的“敌手”，而不是“伙伴”。凯南指出，苏联的政策目标是力求分裂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削弱其影响，并在一切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凯南提出对策说，“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美国若拥有足够的武力并准备使用它，那就用不着真正动武，便可遏制住苏联，迫使它退却。他声称必须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凯南的电报为美国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1946年3月5日，杜鲁门亲自陪同丘吉尔到密苏里州的富尔敦，让他发表反苏演说。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大肆攻击苏联奉行扩张政策，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鼓吹英语民族“联合起来”，英美“建立特殊关系”，共同对付苏联。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富尔敦演说之后，美国于1946年春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支持伊、土与苏对抗。5月，美国宣布不再从德国的美占区拆除工业设备作为对苏的赔偿；7月，宣布美占区和英占区合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

国会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同时，杜鲁门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图的征服活动”。“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即美国要在世界一切地方同苏联对抗。“杜鲁门主义”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三个月，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认为欧洲遭到巨大破坏，“必须考虑给以额外的、大量的和无偿的援助，不然的话就会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解体的危险”。他提出“复兴欧洲”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在其敦促国会迅速通过这一计划的咨文中说：“苏联及其代理人破坏了一系列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独立和民主，正是这个残酷的行动方针以及把它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明显企图，给今天的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局面。”他强调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稳定欧洲局势有“极大迫切性”，它将增强西欧同美国联合共同遏制苏联的力量。

苏联曾应邀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巴黎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但在拟订欧洲统一经济计划问题上同英法发生重大分歧，退出了会议。1947年7月12日，巴黎经济会议开幕，有16个欧洲国家出席，苏联和东欧国家拒绝参加。巴黎会议于9月提出一项报告，要求美国在四年内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欧洲复兴。12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国会于1948年4月通过援外法案，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1947年7~8月间，苏联连续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或友好互助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些协定或条约被西方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为后来经互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经济上笼络西欧的同时，还力图从军事上加强对西欧的控制，以便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美国于1948年3月22日开始在华盛顿与英、加会谈，通过美国草拟的“五角大楼文件”，开始了签订北大西洋防务条约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比、荷、卢、丹、挪、冰、葡、意12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决定联合一切力量，进行集体防御及维持和平与安全”；“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之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协助被攻击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8月24日，各缔约国完成批准手续，公约正式生效。

苏联强烈谴责北约的建立是为新战争作准备，建议美、英、中、法、苏五国共同努力，缔结加强和平的公约。西方三国不理睬苏联的一再抗议，不断加强北约的军事组织和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力图把联邦德国拉入北约组织。苏联又多次建议举行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但遭到美英法的拒绝。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批准生效，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11~14日，苏、波、捷、匈、保、罗、阿和民主德国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

条约，简称《华沙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准备参加“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任何一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援助。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使缔约各国之间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至此，欧洲正式形成了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美苏冷战加剧，它们在全球范围的全面冷战对峙，使战后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世界愈加明显了。

第二章 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与战后初期的西欧日本

第一节 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

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到美国的手中。194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39年增加了132%。这一时期美国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40%，整个工业生产增加了118%。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生产缩减，美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2月，比战时最高峰的1944年2月缩减了35.6%。但是，美国较快地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由于战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战时积累下来的对消费品的大量需求、生产尚未恢复的西欧等国家仰赖美国的供应和高额的军费开支等刺激因素，美国经济日趋回升，出现了战后时期第一次工业高涨。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占53.9%，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美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亦有很大的提高。1945年，实现电气化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9%，1950年上升到82.2%。同一时期，拖拉机数由235.4万台增至339.4万台，联合收割机和载重汽车增加了近一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30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10个人，1950年增至15个人。农业人口大为减少。1940年，全国农业人口为3054万人，1955年降至1907万人。

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由1937年的127.9亿美元上升到1949年的245.6亿美元，从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50.5%，猛增至74.3%。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起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把美元和黄金等同起来，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和美元维持固定的比价。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对外经济扩张。

对外援助是战后美国推行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输出或商品输出，迫使受援国承担一定的经济或政治义务。仅是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物资一项，到1946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负债即达460亿美元。战后初期，美国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救济品和对西欧的贷款，大都是战时剩余物资和滞销的农产品。美国国务院承认，全部援助的75%以上是用美国商品支付的。1946年至1952年，美国先后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3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欧洲286亿美元，占74%。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援重点转向亚洲。受援国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起大批美国的海、空军基地，扩大和加强了美帝国主义的阵地。

战前，美国的对外投资只及英国的一半。战后，美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1943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是142亿美元，1948年增至294亿美元。从1946年至1949年，对外投资增加了近50%。到1970年资本输出总额达1555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左右。

战后初期，美国出口贸易急剧增长，1947年几乎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出口额的1/3，而战前的1937年仅占14.2%。1946年至1949年，外贸顺差平均每年达61.1亿美元。在出口猛增的同时，美国进口贸易1947年却仅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2.9%，因而造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元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采购国外战略原料，进口大增，外贸顺差下降。

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大为膨胀。1939年，美国武装部队总数只

有 33.5 万人，军费开支仅为 12 亿美元。到 1945 年，武装部队总数达 1200 多万人，军费开支达 90 多亿美元。美国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数百个军事基地分布在全球各地。它垄断着原子弹，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战后，大大膨胀起来的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势力，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进入欧亚大陆，影响遍及全球。昔日的欧亚帝国主义列强，其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全得依赖美国的援助和保护。这就是战后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基础。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和麦卡锡主义 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病逝，副总统杜鲁门（1884～1972 年）继任美国总统。战后初期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和自由权利，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开展了持续的罢工斗争。从 1945 年至 1955 年，每年罢工次数浮动于 3000～5000 次之间。1946 年达 4985 次，参加罢工人数达 460 万人，损失工作日达 1.16 亿个，超过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 1919 年罢工运动的规模。

杜鲁门与极端右翼分子不同，基本上是个新政的继承者，标榜要维持和发扬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和支持新的民权立法等方面，努力巩固和扩大新政的成果。1945 年 9 月 6 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战后第一个关于内政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主要是继续冻结物价和房租，继续实行战时的经济管制；增加最低工资，公平雇用工人，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制定充分就业法：实行国民健康保险，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公共住宅计划等等。这些国内政策通称为“公平施政”。杜鲁门后来写道：正是在这个咨文里，“我第一次提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详细纲领，这将是我的政府的施政基础”。但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常常受到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保守派联盟控制的国会的阻挠。特别是在关于福利和民权立法、修订联邦劳工政策以及经济管制等问题的斗争中，总统屡遭失败。

1946 年的整个春天，就延长物价管制问题在国会内外展开激烈的斗争。制造商、农场主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联合起来，要求结束一切管制。他们极力游说议员：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上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等则高举拥护物价管制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游行，要求将物价管制延长一年，被称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杜鲁门不断地请求国会延长管制物价的法律，并呼吁每一个工商业家、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遵守现行管制规定。6 月 29 日，杜鲁门否决了众议院关于修正物价管制法的决议案。但是，由于国会没有重新恢复物价管制法，物价扶摇直上。7 月上半月物价指数上升了 25%，除矽钢片、铜、锡、橡胶、粗麻布和糖等几种由政府规定价格的商品没有波动外，28 种商品的物价指数上升了 35%。不出一个月，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 75%，酿成了自 1942 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7 月 25 日，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通过物价和房租管制延长一年的新法案。但它还缺少必要的办法来保证物价的稳定，已如脱缰之马的物价，要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 月以后，杜鲁门政府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取消，物价管制局亦结束工作。杜鲁门在物价管制问题上所采取的软弱无力、含糊不清的对策交恶多方，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迅速下降。共和党在 1946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了自 1928 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胜利。

战后“充分就业”是 1944 年民主党竞选许下的诺言之一，杜鲁门把它看作是“二十一点”中最迫切希望解决的一项。因为战时生产一旦削减，复员

工作一旦加快，这个问题便一定会随之产生。在杜鲁门的催促下，1946年2月20日，国会通过“就业法”。根据这个法案，联邦政府必须负责协调和利用自己的一切计划、职权和资源，来为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密切政府和国会的合作，改进制定政策和执行法案的工作；授权总统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协助总统制定政策，促使全国经济顺利发展和繁荣，保证充分就业，并拟订经济报告，向国会提出。就业法把促进最大限度就业、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购买力的责任置于联邦政府的肩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因而是一项重要的立法。

共和党取得国会多数党的地位后，总统和国会任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国内政策上意见分歧，党派斗争色彩浓厚。1946年共和党人提出一项大幅度降低联邦所得税的法案，杜鲁门以减税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对富人有利为由，加以否决。下一年共和党同样的努力再遭总统否决。1948年初国会第三次通过减税法案。杜鲁门认为该法案将使不到5%的纳税人享受到近40%减税之利，是不平等的，再次驳回。国会最后越过总统的否决，使减税法生效。共和党人还提出把农产品价格的补贴从补助平价的90%的统一标准改为补助平价的65%~90%的滑动标准。政府为保障农场主有稳定的收入，免受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极力阻挠共和党提案的通过。1949年10月，争取国会通过农业法，规定继续实行90%的统一标准直至1950年底。杜鲁门为劳工、农场主、黑人、消费者以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纳税人所作的努力，使他重振声威。而共和党占支配地位的第八十届国会却在国内问题上态度僵硬和无所作为，帮了杜鲁门的忙，使他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统。

杜鲁门在其竞选纲领和当选总统后提出的咨文中，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计划，遭到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的联合反对。然而，民主党占多数的第八十一届国会还是通过了许多有关“公平施政”的法案。1949年通过“全国住房法”，规定在六年内为低收入家庭建造81万套住房，为清除贫民窟和建造农村住房提供贷款与补助金，对黑人聚居区进行翻修整新。住房法承认拥有像样的住房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年，修订“公平劳动标准法”，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75美分。1950年，扩大了《社会保险法》，增加了1000万新的受益人，退休工人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杜鲁门为西部水利发电、治水和灌溉计划，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和农家信贷管理局争得了大量拨款。杜鲁门反对石油财团倡议的把近海油田的所有权划归各州的立法，坚持这些地区和其他联邦辖地一样，是全国的财产而不仅仅是沿海各州的财产。杜鲁门在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改革，颇得国会的赞许。尽管“公平施政”没有提出什么创新的国内措施，但它维护和发展了新政的社会立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共和党和保守的民主党人的联盟控制国会多数时，特别狂热地向新政时期工人阶级所争得的权利进攻。1946年国会讨论了90项反劳工法案，1947年提出此类法案多达100项，这些法案多数没有通过。1947年6月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即塔夫特—哈特莱法规定：取消“非本工会会员不得在此就业”的“封闭工厂”制度，禁止从工人的工资单中直接扣留工会会费；各工会须向政府报告其组织和财政情况，禁止工会向各政党捐献；工会领导人必须具结，声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允许雇主控告工会破坏合同，工会要对因取消合同而引起的损害负法律责任；罢工前要有60天“冷却期”，禁止同情罢工，

罢工危及国家安全时，总统可以颁布禁令。这一法案修改了1935年华格纳法所赋予工会的权利，扩大了雇主的权利。广大工人集会游行，反对这一法案，称它为“奴隶劳工法”。杜鲁门正准备1948年大选，需要笼络人心，对此法案加以否决。但国会两院通过决议驳回，使该法案生效。

美国国会通过塔夫特—哈特莱法，正是适应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狂潮。战争一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提出所谓“国内安全问题”，即“国内共产主义威胁”问题。随着对苏冷战的发展，这一问题就成了它们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中心问题。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令”，开始对所有联邦雇员进行全面调查。根据这项法令，文官委员会甄别了300多万名联邦雇员，联邦调查局对大约14,000宗嫌疑案进行了全面调查。有2000多名雇员辞职，212人因其忠诚值得怀疑而被解雇。在忠诚调查期间，军队、地方政府、职工会、社会各界及私人企业也都开展了忠诚调查和忠诚宣誓。全国有1350万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受到各种形式的忠诚或安全调查。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从1948年起开展了一系列“间谍案”的调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希斯案件”。希斯当时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他1947年以前一直是国务院高级官员，曾参加美国代表团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此时被控为苏联间谍。对希斯的审讯成为政府里确有共产党人的重要证据，加重了人们对“国内安全问题”的担心。1950年1月希斯被正式判罪，“许多美国人认为对他们过去几年的灾乱已有解释了。这个国家已被像希斯这样的人叛卖给它的敌人之手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推进反共反民主的迫害狂潮，麦卡锡主义便应运而生。

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希斯被判罪后不到20天，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手里挥舞着一张纸片，扬言他掌握了205名渗入国务院的共产党人名单，从而开始了他的诽谤活动。麦卡锡指控远东问题专家、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是国务院间谍活动的首领。尽管联邦调查局认为他的多次指控毫无证据，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给予拉铁摩尔一份无罪证书，但麦卡锡却发觉撒谎可使自己在报纸上扬名，仍继续进行攻击。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国内的“赤色恐惧”和反共情绪，政客们都害怕背上“赤色”或“亲共”的黑锅而不愿与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正面交锋。共和党出于攻击民主党内外政策的需要，极力支持麦卡锡妖言惑众。杜鲁门政府搞的忠诚调查和国会通过迫害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也为麦卡锡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1950~1954年间，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黑人解放战士杜波依斯、黑人歌手罗伯逊、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等都遭到政治迫害。麦卡锡大肆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称民主党执政的20年是“叛卖的20年”。他指控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同共产党有联系，直接负责对华政策的艾奇逊是“时髦的红色教长”，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人帮助俄国夺取世界霸权。这使杜鲁门政府十分被动。

1953年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后，麦卡锡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和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政府和军方内部事务，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内外政策的推行。他的活动践踏宪法，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威胁到共和党内部的统一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连任总统。因此，艾森

豪威尔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派与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结成反对麦卡锡的同盟，促使参议院于 1954 年 12 月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麦卡锡主义从此完全衰落。

第二节 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英国工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遭到很大的削弱。英国战时军费开支达 250 亿英镑，国债由 1939 年的 72 亿英镑增加到 1945 年的 214 亿英镑，仅欠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务就达 90 亿美元。战争期间为了支付军需供应，出卖了大部分海外投资，黄金储备几乎枯竭。1946 年英国工业产量只等于 1937 年的 90%，出口贸易总值从 1938 年的 4.71 亿英镑下降到 1944 年的 2.66 亿英镑，战时国际收支逆差高达 40 多亿英镑。英国甚至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债务国。由于自治领和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垄断资本向其大力渗透，英国与各个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大为削弱。战后，在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旧的殖民体系日趋瓦解。英国的殖民地相继独立，走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丘吉尔在 1947 年无可奈何地说：“我万分沉痛地看到大英帝国威望丧失和国运衰落。”

1945 年 7 月英国举行普选，工党赢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组成了以克利门特·艾德礼（1883~1967 年）为首的工党政府。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执政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稳定和恢复经济。战后英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之一是国际收支发生危机。1945 年 8 月美国宣布停止“租借法”援助，这意味着此后英国向美国购买商品必须支付现款。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更加严重了，英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1945 年 12 月签订了《英美财政协定》，英国实际获得 37.5 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实行英镑对美元的自由兑换和降低英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税率，50 年内还清。英国政府满以为这笔贷款可以在五年内帮助其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到那时可以完成经济的重新调整，收支接近平衡。但是，1946 年夏美国取消物价管制，英国购买的美国商品价格猛涨，使贷款的实际价值降低了 28%。贷款一年就花光了。到 1947 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英国仍需乞求美援来渡过国际收支的危机。

英国积极参加了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从 1948 年至 1950 年，英国获得援助总额是 23.51 亿美元的物资供应和 3.37 亿美元的贷款。马歇尔计划帮助了英国的经济恢复，出口有所增加，但贸易逆差依然存在。英国政府为了制止黄金外汇流失，改善其商品的出口条件，于 1949 年 9 月宣布英镑贬值 30.5%，一英镑价值从 4.03 美元降为 2.8 美元。英镑贬值使其购买力下降、国内物价上升和实际工资降低，但却有利于出口；大量美元涌入英国市场，暂时缓和了美元不足的状况。朝鲜战争的爆发，帮助英国大大增加美元储备，1950 年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显著增加。

英国的出口贸易在战后头几年处于有利地位：战前的竞争对手德、日暂时无力参加竞争；英国的自治领大量购进战时买不到的英国工业品；许多国家，特别是英镑区国家都闹美元荒，愿意尽量多买英国货；美国对某些英国商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加。英国利用这些条件大力发展出口贸易。1951 年英国出口额达 25.8 亿英镑，而 1937 年只有 5.22 亿英镑。1951 年英国出口额比 1938 年增加 79%。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从 1945 年的 7.41%，上升到 1951 年的 9.58%。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英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早在 1948 年，英国工业总产量达到并超过战前的水平。英国工业生产指数以 1937 年为 100，1951 年达到 131。

工党在竞选期间，提出一项“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工党政府上台后

即宣布进行新的实验，开始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从1945年12月起，工党政府先后将英格兰银行、电报和无线电事业、电力和煤气工业以及部分钢铁工业收归国有。政府没有无偿没收，而是给了国有化企业前业主和股票持有人以优厚的补偿。如英国煤炭工业设备陈旧，长期亏损，收归国有后矿主获得4亿英镑的补偿，超过了矿井原有价值。英格兰银行原资本总额为1450万英镑，国有化后该行股东得到的国家赎买证券高出市场价10%。国有化工业部门的企业行政管理权，实际上仍然保持在资本家手里。原最大的煤业托拉斯“鲍威尔·杜弗林”的经理、煤矿主协会的首脑海恩德利勋爵被任命为煤矿管理局局长。1949年委任国有化工业部门全国管理委员时，在87名委员中有43名是大资本家，9名是政府官员，4名是高级军官，9名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到1951年工党政府下台时，国有化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20%左右。煤炭、电力、运输等工业在国有化后都有所改善。到1947年煤炭工业已不需要政府津贴，还上缴大量利润。铁路运输以前每年亏损达1600多万英镑，国有化四年后，扭亏为盈，并且上缴了9290万英镑的利润。

工党政府除对一系列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外，还推行了一系列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要实现“福利国家”。1946年8月通过的《国民保险法》规定发给新生婴儿、儿童教育补助金，失业、退休、工伤、疾病、怀孕、丧葬补助金，寡妇和老年人养老金，“从襁褓到坟墓”都受到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由投保者本人和企业主定期缴纳的保险费和公共预算拨款构成。1949~1950年社会保险基金共5.24亿英镑，其中工人缴纳的保险费占35.3%，企业主缴纳的保险费占33.4%，公共预算拨款占26%，其他来源占5.3%。

1946年11月，通过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规定给予每个英国人免费享受医疗、药品、住院和护理等福利。实施这些措施的费用由国家预算支出。国家保健制度大大改善了国民的医疗条件，很受群众的欢迎。工党政府还发给食品津贴，以抑制食品价格上涨。1950~1951年此项津贴为4亿英镑。政府在住宅建设和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英国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扩大了国家收入，对改善人民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财政开支增大，一些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等问题。工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建立及其经济的恢复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经济损失达14,000多亿法郎，相当于战前三年法国全部生产的总值。1944年秋法国解放时，工业生产只及战前1938年的20%，农业只及50%，法郎价值仅及战前的1/6。战后的法国经常处于财政、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法国为了重新控制其前殖民地，又卷入连续不断的海外殖民战争。法兰西帝国的日趋衰落，对殖民政策的意见分歧，更加深了这一时期法国政局的动荡不稳。

1944年8月24日，戴高乐率领法军进入解放了的巴黎。9月，他改组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吸收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参加内阁。戴高乐还颁布了整编内地军的命令，并宣布解散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兵”。爱国民兵和共产党内部意见分歧。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年)在莫斯科向国内广播，号召“全国团结”和“统一行动”，表示拥护戴高乐的领导。多列士随即返回巴黎，协助执行解散爱国民兵的命令。1944年12

月，戴高乐访问苏联，签订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约。

1945年10月，法国公民投票，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接着举行立宪会议选举，法共获得500多万张选票，占有152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获得142席，皮杜尔的人民共和党获得138席。11月，法共在临时政府改组中要求获得外交、国防和内政三个重要部中任何一个部长的职位，遭到戴高乐的拒绝。在新政府中，多列士任国务部长，另外四名法共党员担任国民经济、工业生产、劳工和军备部长职务。临时政府审判和惩办了法奸。维希政府首脑贝当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赖伐尔等20余人被处死，还有14,000名维希官员受到惩办。

新议会推选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但在制宪中，他反对多党制政治，主张法国建立超党派的总统制共和国。因此，在国家制度问题上，戴高乐同各政党的分歧日益严重。1946年1月，戴高乐提出增加军费的提案，但议会一致通过社会党人提出的削减军事预算20%的提案，戴高乐愤然辞职。他在国会中说：“我们的分歧在于对政府以及政府与国民代表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总看法不同……究竟要一个治理国家的政府呢，还是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议会？……我个人认为这第二个方案丝毫不符合我们所在的国家需要，也不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1月20日，社会党人古安出任政府总理，多列士任副总理。4月19日，立宪会议通过新宪法草案，规定建立一院制议会。5月5日，公民投票否决了这一草案。

1946年6月2日，举行第二届立宪会议选举，人民共和党成了议会第一大党，皮杜尔出任政府总理。新的立宪会议制定出基本符合人民共和党要求的宪法草案。10月13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这一宪法草案。第四共和国宪法与第三共和国宪法区别不大，仍然采用两院制的议会制度。总统由两院（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合选出，任期七年，不掌握实权。法国实行多党制，政府必须严格对议会多数派负责。11月10日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法共获得185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但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拒绝共产党组阁。1947年1月，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组成包括五名共产党部长的联合政府。4月，法国最大的雷诺汽车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罢工，法共支持工人的要求。拉马迪埃政府则对工人进行镇压，并以政策分歧为由，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此后，法国政局动荡，政府频繁更迭。从1947年11月到1954年6月的七年多时间内，政府更换了13届。1954年6月，激进党孟戴斯-弗朗斯就任总理。他解决了同越南的冲突问题，缓和了同突尼斯、摩洛哥的矛盾。1956年3月社会党摩勒政府进一步承认了突尼斯、摩洛哥的独立，但他无法平息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而连年的殖民战争又使法国财政枯竭，经济状况恶化。第四共和国陷入重重困境。

法国解放后，法国政府立即将战时与法西斯合作的企业收归国有。雷诺汽车公司、法国染料公司、电影工业和国营报业公司以及四大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均收归国有，信贷掌握在国家手中。从1945年12月起，法兰西银行成为国家银行。1946年5月，正式颁布大规模“国有化”法令，对煤炭、电力和运输等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其中包括法国煤矿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大西洋航空公司等。到1946年底，国家占有股权在50%以上的公司已达到130家。政府给予国有化企业原资本家大量补偿金。国有化企业管理权实际上仍然操纵在资本家手中。国家对国有化企业大量投资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6 年成立计划总署，莫内负责制定了第一个七年计划（1947 ~ 1953 年），重点发展煤炭、电力、钢铁、水泥、运输和农业机械等六种重要工业。国家对这些基础工业部门实行计划调节，以新技术装备并使之现代化。1947 年起，法国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惠国，共获得 30 亿美元的援助。法国政府实行了国有化和莫内计划两大措施，并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战后初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到 1948 年，整个法国工业的产量达到战前 1938 年的水平。

第三节 意大利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 1945年4月，英美盟军进入意大利北部，在米兰成立了军政府，下令自由义勇军归盟军指挥，地方政权交军政府管理。1947年2月，对意和约在巴黎签订。3月，军政府结束工作。年底，英美军队全部撤出意大利。

1946年6月意大利为成立立宪会议进行全民投票，结果有54.3%的人赞成废除君主制。在此之前，国王维克多·伊曼努埃尔三世退位，其子翁贝尔托二世继任国王。此时他见大势已去，决定离开意大利，避居葡萄牙。6月18日，意大利共和国宣告成立。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在560个议席中，天主教民主党占207席，社会党占115席，共产党占120席。由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加斯佩里组织政府，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参加了内阁。1947年初，美国答应给意大利1亿美元贷款，但它不愿意援助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5月，加斯佩里借改组政府之机，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逐出政府。

1947年12月，立宪会议通过新的共和国宪法。宪法宣布“意大利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法律承认并保障私人财产”，规定妇女平等权、劳动权，实行土地改革和部分工业国有化等。宪法规定议会为两院制，众议院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五年；参议院由各区按人口选出，任期六年；总统由两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七年。

1948年4月举行意大利第一届共和国议会选举。天民党获得48.7%的选票和众议院53.5%的席位。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获得31%的选票。天民党的加斯佩里再度组织政府。战后，天民党长期执政，但它在议会中没有绝对多数，同时，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因此政府更迭频繁。从1945年到1960年的15年中，就有16届内阁。天民党政府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天主教会的利益，与梵蒂冈关系密切，奉行亲美政策。1948年，意大利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接受马歇尔计划，1949年加入北约组织。

意大利受到严重的战争破坏，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1946年10月的工业品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70%，对外贸易完全中断。意大利丧失了全部殖民地。战后，意大利得到美国的援助，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迅速。战后十年美国对意经济援助共达54亿美元，其中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为13.17亿美元。意大利政府采取国家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形式，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50年，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政府收买地主土地有偿地分配给农民。同年实行一项15年经济发展规划（1950~1965年），国家以大量资金来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缩小南北的传统差距。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意大利工业生产到1949年已达到战前水平，1954年超过1939年的30%~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及其经济的恢复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1945年，美英在各自占区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1947年1月，美英双占区成立，随后建立了联合州议会和行政委员会，为建立西德国家准备条件。1948年6月，美英法三占区合并。6月20日，西占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发行西德马克。9月1日，西占区议会委员会（立宪会议）在波恩开会，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等六个政党的65名代表参加。1949年5月，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法》。经西占区三分之二的州议会和西方三国军事长官批准后，于5月23日生效。在此之前，西方三国还

公布了占领法，规定占领当局同未来的联邦德国政府的相互关系。

波恩的根本法规定：西德为联邦制国家，总统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和人数相等的各州议会代表选出，任期五年。内政、警察、司法、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事务归各州主管。总统是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行政权力由总理和内阁掌握。总理由总统提名，经联邦议院选举产生。议会由两院组成。联邦议院由普选产生，每四年改选一次，西柏林有 22 名列席议员。参议院由各州间接选举产生，西柏林有四名列席代表。1949 年 8 月 14 日举行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 139 席，社会民主党获得 131 席，自由民主党获得 52 席，德意志党获得 17 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组成联合政府，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康德拉·阿登纳(1876~1967 年)为第一任总理，他一直任总理到 1963 年 10 月。自由民主党人特奥尔多·豪斯博士当选总统。1949 年 9 月 21 日，代替军政府的盟国高级委员会成立。1955 年，联邦德国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的巴黎协定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结束被占领状态，成为主权国家，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联邦德国的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大约有 30%~40% 的工厂已不能生产。战争除带来人员伤亡，财富损失，住房、食品和必需品匮乏之外，还带来战败国的屈辱，国家被分裂，一些工厂设备被拆除、物资被运走以充赔偿，人民心灰意冷。阿登纳政府面临着经济恢复的严重问题。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定法律和采取措施保护竞争，使竞争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适当的范围；同时国家又用税收、投资、财政、信贷、收入分配等政策干预企业活动，实行“经济人道主义”。1948 年 6 月 20 日实行币制改革之时，当时担任西占区经济局长的艾哈德就坚决主张取消配给制和对物价、工资的控制。两种措施结合起来恢复了市场的正常职能，新马克把囤积的物资调动出来，使它回到商店的货架上；取消配给制和物价控制使正常的供求法则发挥作用，销售者可以根据货物的价值和稀缺程度调整售价。结果，商人接受了用新货币支付货款，西德马克的信誉建立起来了。艾哈德用物质刺激的措施推动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恢复和重建工作，个人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来出卖劳动力或产品。但取消配给制和物价控制后，食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1948 年 11 月 12 日，鲁尔区举行一天罢工，抗议生活费用上涨和工人失业增加。艾哈德决定降低关税，大量进口西方邻国的食品和消费品。他还发动人人参加各种廉价服装、鞋子和其他短缺生活必需品的突击生产。到 1949 年春，物价开始下跌，西德马克在外汇比价中变得坚挺起来。

艾哈德实行税收改革以促进生产建设投资。政府规定，工商企业的利润不用作分红而是进行再投资，就免于征税。企业家对此种免税刺激报以极大的热情。1953 年和 1954 年，他们为重建鲁尔的大型钢铁厂集资 20 亿西德马克，其中 13 亿来自免税利润。免税刺激也推动了造船和住房建筑等工业。波恩政府大力鼓励私人建房。房建全部投资的 55% 以上来自免税的私人储蓄和投资，其他来自政府拨款及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随着房建的增加，家具、家用电器、管道、玻璃、建材等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战后初期，美国大力扶助联邦德国。到 1951 年，美国提供的援助即达 36.5 亿美元。艾哈德把马歇尔计划援助称为联邦德国“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盟国逐步取消了对联邦德国工业的管制。原先规定钢铁产量不得超过 1110 万吨，禁止制造远洋轮船，限制生产铝、合

成燃料、合成橡胶、滚珠轴承、电子设备以及某些化工产品等战略性产品。到 1952 年底，联邦德国工业生产的各种限制都取消了。朝鲜战争刺激了联邦德国机器、机床、轮船等重工业的发展，为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50 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即恢复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2%。1951 年中，联邦德国的国际收支额稳步而扎实地变成了盈余。此后，联邦德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 50 年代，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 9.2%，高于美、英、法、意，仅次于日本。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1 倍，商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二位。

第四节 日本的民主改革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的民主改革 战争期间盟国通过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确定了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其中以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最为明确和具体。这就是铲除军国主义，解除日本武装，审判日本战犯，清除阻碍日本人民民主的一切障碍，日本的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发展和平工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底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进驻日本，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依据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成立的盟国远东委员会，作为对日占领的决策机构，在形式上居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上，但它作出的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部去执行。而设在东京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也是徒有虚名，不过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咨询机关。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高于一切。因此盟国对日占领实际上是美国单独对日占领。

美国于1945年9月23日以“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的名义公布了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它规定：一、美国占领日本的最后目标是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或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二、强调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的最高统帅地位，盟国间如发生分歧，应执行美国的政策；三、采取间接统治，最高统帅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行使自己的权力；四、实现日本的民主化、非军国主义化，惩罚战犯，提倡并鼓励个人自由及民主主义，恢复和平的经济活动。这个文件表明美国要独自控制日本，使其从属于自己，变为它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工具。同时，文件又强调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实现民主化与非军国主义化，这一点符合全世界民主势力的要求，具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进步性。

依据上述方针，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命令日本政府“解除对政治、居民、宗教等方面自由的限制”。11日又发出迅速实行五大改革的指令，即给妇女以参政权，鼓励工人建立工会，教育民主化，废除专制政治，促进经济民主化。1946年1月发布整肃指令，宣布解除所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和社团组织领导人以及军队职业军官的公职。有21万人受到整肃。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主要战犯。1948年11月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荒木贞夫等16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2人有期徒刑。

日本战败后，民主运动和工农运动获得合法地位。工人罢工和农民反夺佃斗争蓬勃开展，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组织政党。1945年11月，自由党和进步党（后改为民主党）以及社会党相继成立。日本共产党也开始公开活动，并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六个议席。同年5月22日，继币原内阁之后，自由党领袖吉田茂上台执政。

在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中，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三次改革。

1946年2月，盟军总部着手修改宪法。同年10月新宪法经日本国会通过，并于1947年5月3日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而只将其作为日本国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保障人民享有的基本公民自由；永远不以战争为国策，不得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新宪法的实施表明，明治维

新以后建立起来的具有浓厚专制主义色彩的近代天皇制已变成象征天皇制即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日本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从而保证了战后日本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前的日本财阀以家族为中心，具有封建性与封闭性。财阀家族持有总公司及各公司的大量股权，分派家族成员到各公司担任要职，并派至亲和心腹到各公司控制重要部门，由此形成了以总公司为顶端，包括众多的直系与旁系以及子公司、孙公司的“金字塔型”的家族统治。为此，美国占领当局“解散财阀”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指定三井总公司和三菱总公司等 83 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 56 人为财阀家族以及与这些财阀有关的 625 家公司为“限制公司”，规定上述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公开出售。然后解散持股公司，并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第二步是制定《禁止私人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防止被解散的财阀复活。

解散财阀进行一年多，其间被解散的主要财阀业已解体，他们交出的七十五亿多日元的股票也转售处理，财阀家族成员均被开除公职。但是，解散财阀很不彻底，例如，被指定的 83 家持股公司只解散了 28 家。原来被指定改组的 325 家财阀公司实际上只有 11 家被改组。尽管如此，通过解散财阀总公司，排除了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使封建的“金字塔型”的经营体制瓦解，财阀的封建性与封闭性随之消除。摆脱了财阀家族总公司控制的各公司在企业经营上取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与灵活性，能迅速地适应战后技术革新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且一批有实践经验、富有创造力的中上层管理人员代替财阀家族成员走上企业的领导岗位，从而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改善与加强。总之，通过这次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改组，有力地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经营的现代化，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准备了条件。

农地改革自 1947 年开始。主要内容是，凡地主出租土地超过一町步的部分由政府强制征购，并通过市町村“农地委员会”（由地主二人、自耕农二人、佃农五人组成）出售给无地农民；残存的出租地的地租率，水田不超过 25%，旱田不超过 15%。改革到 1949 年基本结束。其间征购土地 193 万町步（占改革前全部出租地的 8%），买到土地的农户有 474 万余户（约占农户总数的 80%）。结果农村中 90%的耕地变成自耕地，近 90%的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租佃关系基本瓦解，寄生地主制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农地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基本未触及山林原野的地主制等。但是，通过改革，改变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与寄生地主制下的落后的农业并存的畸形状态，变革了特殊结构，即封建因素极为浓厚的日本资本主义。农地改革后，摆脱了寄生地主制束缚的广大农民提高了生产主动性，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开辟商品市场，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农业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样，不仅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因此，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变革重要一环的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先决条件。

总之，修改宪法、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等各项民主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它铲除了明治维新以后残存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封建因素，解决了明治维新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革命留下的一些课题。可以说，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是明治维新的最终归宿，它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就是说，民主改革使日本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搬掉了阻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改革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成长的起点。

旧金山和会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 从 1948 年起，随着美国对日占领目的的实现，即日美从属关系的确立，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开始从中国转向日本。于是，美国对日政策随之改变，由削弱日本转变为扶植日本，也就是重建日本经济，使其成为“远东兵工厂”，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基地。

1948 年以后，美国占领当局极力扶植保守势力，镇压工农运动，迫害共产党人。1948 年 7 月，以芦田均为首的民主党联合内阁按照麦克阿瑟的指令颁布《二 一号政令》，剥夺了国家机关企业职工的罢工权和集体交涉权。1949 年 4 月吉田内阁又秉承盟军总部旨意公布《团体等规正令》，规定镇压“助长和赞成暴力主义方法”的团体和个人。1950 年 5 月麦克阿瑟宣布日共非法，7 月对日共“整肃”，清除广播、新闻界的日共党员。与此同时，盟军总部却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至 1951 年 8 月，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几乎全部恢复了公民权。

美国为使日本经济早日自立，于 1948 年 12 月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力图实行以总预算平衡、加强征税和冻结工资为主的通货收缩政策。为此，于 1949 年 2 月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以公使身份来日，负责稳定日本经济，编制 1949 年度政府预算。不久，又派肖普来日，改革日本的税制。这些措施尽管带来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失业激增等消极后果，但却也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的日本财政预算从 1949 年度起变为黑字，恶性通货膨胀基本上被制止。从此，日本经济逐渐走上了稳定和复苏的轨道。

美国为了使业已确立的日美从属关系合法化，于 1951 年 9 月在旧金山召开了有 52 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三国被排除在外，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会议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三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日本和美国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后，为实施这一条约，双方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安全保障条约与行政协定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留，驻日美军可以用来“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日本应无限制地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驻日美军及其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等。1952 年 4 月 28 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美国对日本的公开占领宣告结束，从此开始了对日本的半占领时期。这种半独立、半占领的体制就是所谓的“旧金山体制”。

第三章 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苏联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苏联经历反法西斯战争严重考验后，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的军队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之一，拥有 1136 万成员和上万架飞机、上万辆坦克，驻扎在西起德国柏林东至朝鲜的广大地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威慑力量。同时，苏联也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政治大国。它的态度影响着各项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苏联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强国。

战争结束后，苏联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战争期间，苏联约有六千万军民丧失了生命。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人力损失的百倍。物质财富方面的损失更是惊人。一千七百多座城市和七万多个村镇被洗劫，三万多个工厂和九万多个农庄被破坏，总损失达 6790 亿卢布，等于整个国民财产的四分之一。战争结束后，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食品和衣服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一些资产阶级人士认为，苏联没有西方援助难以恢复国民经济。

苏联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经济恢复工作，早在 1943 年就着手安排这方面的事务。战争胜利后，国际形势出现新情况，苏美同盟破裂。苏联不仅得不到西方的经济援助，而且要分出精力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特别强调新战争的威胁，决定继续采用高度集中的办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仍然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在首位。

1946 年 3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第四个五年计划（1945~1950 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重建苏联受害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在五年计划的指引下，苏联人民辛勤劳动，重建家园，同时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到 1950 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了 6200 个大企业，工业总产值比 1940 年增加 73%。国防工业获得重大突破。1946 年建成了原子能反应堆。1949 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轻工业的增长比重工业缓慢得多。1950 年的生产资料产值比战前增加一倍多，而轻工业产值只增加了 22%，其中食品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在农村，苏联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以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1946 年 9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机关和个人归还侵占农庄的土地和财产。1947 年 2 月，批判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1950 年决定把小农庄合并为大农庄。在乌克兰，33,000 个农庄被合并成 19,000 个大农庄。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50 年，农业总产值只及 1940 年的 99%，其中，子棉、甜菜和肉的产量超过了战前。但是，粮食的产量仅为 8120 万吨，比 1940 年的 9560 万吨少了 1440 万吨，比计划的 1.27 亿吨少了 4580 万吨。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三次降低日用品的零售价格。国家在城市和工人村修建了一亿多平方米的住宅。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教育文化事业也有较大发展。高等学校的在校人数由 1940 年的 81 万增至 1950 年的 124 万。

个人崇拜的盛行 大战结束后，苏联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1946 年 2 月举行了全苏最高苏维埃的选举。3 月，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1949～1950年发生“列宁格勒案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被秘密逮捕，无辜处死。战时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诬陷为通敌，成员几乎全部被逮捕，党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等人被处决。1953年，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著名医生被逮捕。他们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企图用医疗手段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先后把500万少数民族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撤销了他们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于1946～1947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在全国开展了思想批判运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话剧剧目及其改进办法》两个决议，批评杂志刊登丑化社会主义和唯美主义、颓废主义作品，批评剧院上演一些下流低级的外国剧本。1948年，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被指责为“大搞形式主义，反民主”的头子。不久，批判运动扩展到语言学界、政治经济学界以及生物学界。运动中，对一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论，把许多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同时禁演了一批电影剧目，封闭了一批杂志，解除了上千人的职务，还逮捕处死了一些人。

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也受到破坏。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有十几年没举行。党中央委员会应每四个月召开一次，可是在1947年3月到1952年8月间一次也没举行。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斯大林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1952年10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党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作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另一位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批准了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指示，并决定把联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大会揭露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任人唯亲等问题，但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现象没有提及。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改革

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人民奋起打击德意占领军和本国反动派，民主力量不断壮大。1944~1945年，苏联红军追击法西斯，开进东欧。在苏联的帮助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八个国家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相似。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唯一领导力量。1941年4月，德国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和政府流亡国外。铁托（1892~1980年）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起义，武装抗击入侵者。在斗争中，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和游击区不断扩大。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在亚伊策召开，宣布成立临时政府。铁托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44年10月，南斯拉夫人民军队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随后，苏军北进匈牙利，全部离开了南斯拉夫国土。南斯拉夫人民军继续在国内作战，于1945年发展成为拥有80万成员的武装力量。5月15日，解放全部国土。根据苏美英雅尔塔协议，南斯拉夫在1945年3月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有三名流亡政府的代表参加。11月11日，全国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得到90.48%的选票。1945年11月29日，新的国民议会召开，宣告废除君主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铁托任部长会议主席。

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国王索古逃亡国外。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宣告成立，它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反意武装斗争。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盟国后，德军开进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民同新入侵者展开更为激烈的斗争。1944年5月，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在佩尔梅特召开，组建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10月，改称临时民主政府。1944年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发展到70,000人，于11月17日解放了首都地拉那，29日解放了全部国土。1945年12月，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得93.13%的选票。1946年1月，立宪会议宣布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霍查（1908~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共产党人是在苏联的直接支持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波兰在1939年9月被德国占领后，资产阶级政府流亡伦敦，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流亡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部分在西线同英美盟军共同作战，另一部分是在国内的国家军。共产党人于1942年1月在华沙秘密建立波兰工人党。他们组织人民军，打击德国入侵者。积极倡导建立反法西斯民族阵线。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的波兰侨民组成波兰第一师，同红军并肩作战。此外，波兰农民党还拥有自己的农民营。这样，波兰人民在不同政党领导下组建了多支反法西斯武装力量，总人数多达200万。1944年夏，苏联军队攻入波兰。7月22日，在解放了的卢布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年底，改组为临时政府，立即得到苏联承认。苏美英就卢布林政府和流亡政府间关系问题进行商谈。最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波兰于1945年6月28日组成以卢布林政府为基础的新政府。21名新政府成员中，原卢布林政府成员占14人，其他是伦敦流亡政府的成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新政府的总理是社会党人莫拉夫斯基，副总理是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1905~1982年）和流亡政府成员米科拉伊契克。

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被德国吞并。前总统贝奈斯在伦敦组织临时政府。苏德战争爆发后，临时政府得到苏联的承认。1943年，捷共在国内建立第一支游击队。1944年秋，斯洛伐克爆发全民起义，遭到镇压。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贝奈斯政府同捷共达成协议，于1945年4月4日在科希策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政府。1945年5月5日，首都布拉格爆发起义。9日，苏军坦克部队开进布拉格，消灭了德军。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获得解放。1946年5月，全国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获得38%的选票，成为全国的第一大政党。贝奈斯任总统。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1896~1953年）组建新政府。26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9人，社会民主党3人，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4人，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由无党派人士担任。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在战时都是德国的附庸国，三国人民对此十分不满。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等组成反法西斯的爱国阵线。1944年8月23日，在苏军进入罗马尼亚的大好形势下，各爱国力量和军队发动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八二三”起义后，政权先后落在沙那德斯库和拉德斯库将军手里，人民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1945年2月，苏联向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改组政府。国王接受通牒。3月6日，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成新政府，民主力量占了上风。1947年12月30日，国王退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农民联盟、环节联盟组成反法西斯的祖国阵线。1944年9月初，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国境。9月9日，祖国阵线发动全国起义，推翻反动政权。环节联盟领导人格奥尔基耶夫组建祖国阵线政府。1946年9月，君主政体被废除，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任部长会议主席。

匈牙利于1944年3月被德军占领。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停止活动后曾一度解散。1944年9月重建，力量比较薄弱。1944年12月，匈牙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小农党等组成民族独立阵线，并在苏军解放的德布勒森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组成临时政府。1945年4月，苏军解放匈牙利全境。11月，举行议会选举，小农党获57%的选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得17%的选票。1946年2月，国会正式宣布废除帝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小农党领导人纳吉·费伦茨任政府总理。

德国于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后，被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实行军事管制。虽然四国设有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协调政策统一行动，但实际上各战胜国都自行其是。苏联当局在其占领区内积极整肃法西斯分子，打击容克地主和反动资本家。同时，大力扶持民主势力，允许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同盟、自由民主党公开活动。1945年6月25日，苏占区建立五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事务。8月，又建立第一批中央机关——工业交通、燃料动力、农业、商业等总管理署。在美英建立双占区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后，苏联于1948年2月把各总管理署合并为经济委员会。委员会的书记处实际起着德国苏占区中央政府的作用。苏联坚决反对按西方设想的模式统一德国，于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了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西方占区只有共产党派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德国人民委员会，并授权这个委员会为整个德国起草一部宪法。1949年3月19日，德国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决定在全德进行普选，召开新一届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美英法反对这一决定，禁止在西方占区进行选举。1949年5月15~16日，

苏占区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5月29日，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柏林开幕。大会批准了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草案，呼吁在德国实现统一与正义的和平。美英法对德国人民的统一愿望置之不顾，积极扶植西方占区成立独立国家。1949年9月20日，联邦德国政府宣告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委员会于1949年10月7日举行会议，宣布自身为人民议院，行使最高立法机关的职权。同时宣告5月30日通过的宪法生效，决定当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当选为总统，格罗提渥组成多党联合政府。10月10日，苏联宣布将苏联军政府的行政职权移交给民主德国政府，并建立苏联管制委员会代替军政府。

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在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基础上实现的，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成果。但它也同苏联的支持帮助分不开。苏联军队的胜利进军彻底摧毁了东欧各国的法西斯势力。苏军驻扎在东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反动分子的手脚。苏联在国际会议上的据理力争抵制了西方对东欧的干扰破坏。苏联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在某些国家甚至是关键性作用。

东欧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 东欧各国多是农业国家，农村中的封建残余严重存在。各国在1945~1948年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做法大体相似。政府首先无偿没收外国和本国法西斯分子的土地，然后规定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土地由国家低价收购。各国的限额标准不一，南、阿、保为10~30公顷，捷、波、罗、匈、民主德国为50~100公顷。国家把没收来的土地大部分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少部分用来建立国营农场或充作公用林场牧场。农民分到的土地大都不超过5公顷，他们要付少量地金，一般规定在10~15年内交清。各国兴起农业集体化运动后，交付地金之事便停止了。在没收土地的同时，政府还全部或部分地没收了地主的农具、种子、牲畜和农用建筑，把小型农具分给农民，大型农具和建筑则由国家支配。土地改革是在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取得了积极效果。通过土地改革，匈牙利共没收地主土地300多万公顷，南斯拉夫没收157万公顷耕地，罗马尼亚147万公顷，阿尔巴尼亚17万公顷。波兰把600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捷克把175万公顷土地、保加利亚把23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东欧国家还广泛实行了银行和工业国有化。各国首先把外国和卖国贼的银行、企业没收。1946~1952年，又颁布多项法令将本国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在进行经济改造的同时，各国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各国经济破坏十分严重。波兰丧失了600万人口，70%的工厂和1/3的耕地被毁，华沙成为一片瓦砾。南斯拉夫有170万军民献出生命，工农业损失过半。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在苏联帮助下，经过几年辛勤劳动，到50年代初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接着，各国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南斯拉夫首先制定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8~1952年），规定五年后的工业产值比1939年增长五倍。波兰从1950年起开始执行六年计划（1950~1955年），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到1953年，生产资料的生产达到1949年的236%，而食品和肉类的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5%，谷物产量仅比1949年增加5%。捷

克斯洛伐克改变过去同西方密切往来的情况，大力发展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结束时，工业生产比战前最高水平的1929年增加一倍，但农业生产基本停留在战前水平上。保加利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期间，新建了七百多个工厂企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55.9%。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通过各自的1951～1955年的五年计划，工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罗马尼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石油、煤炭、钢铁和电力等重工业定为首要任务。政府特别重视电力工业的发展。十年电气化计划（1951～1960年）规定要新建37个火力和水力发电站。匈牙利政府提出要把匈牙利建设成为一个“钢铁国家”。为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4年）期间，政府不断扩大投资总额，原定投资额为280亿福林，1951年决定增为850亿福林，并把其中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这种做法使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成倍增长，而居民生活水准下降。1952年的职工平均工资比1949年下降20%。

在农村，党和政府积极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加利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得最迅速。到1952年，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2747个，其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2.37%，加上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共占全部耕地的75%。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匈牙利政府大力开展合作化运动，1949年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的2.7%，1953年就达到32.5%。罗马尼亚从1949年起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将近一半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波兰的合作化运动进展较慢，到1953年全国只有8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的9%。

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的巩固 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政权大多是多党制的民主联合政府。各政党对民主改革和内外政策的意见不一。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各国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前途十分关切，利用自己军队驻扎在多数国家的有利条件，积极帮助各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都存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这些政党在大战期间参加了各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一起并肩战斗。战后，各国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人们热切要求克服工人阶级政党的分裂状态。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由于极力反对实现工人政党的统一，被清除出党。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的共同努力下，普遍进行了工人政党的合并。1946年2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同格罗提渥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德国统一社会党，皮克任党的主席，乌布利希任副主席。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改称为共产党），乔治乌·德治任总书记。1948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费林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哥特瓦尔德任党的主席。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同马罗山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拉科西任党的总书记。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同西伦凯维兹为首的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贝鲁特任党的主席。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保加利亚共产党，科拉洛夫任党的总书记。1950年1月，科拉洛夫逝世。契尔文科夫继任党的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东欧国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对实现这些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但也给某些党带来消极影响。

战后初期，东欧国家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在波兰，政府副总理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米科拉伊契克及农民党的右翼分子极力破坏土地改革，反对战后波兰的新边界。1946年6月30日，政府就全国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居民支持政府的民主政策，反对设置参议院，支持土地改革，赞同西部边界的划分。反动势力遭受失败。1947年1月19日，举行议会选举。米科拉伊契克的农民党在444个议席中只获得44席。米科拉伊契克陷于孤立困境，于1947年10月逃离波兰。新议会制定了波兰宪法，选举贝鲁特为总统，西伦凯维兹任总理，哥穆尔卡任副总理。

在匈牙利，小农党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它的右翼公然反对土地改革，阻挠民主改革的进行。1946年3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工会委员会等组成“左翼联盟”，要求彻底进行民主改革，清洗政府机关中的反动职员。1946年3月7日，首都布达佩斯40万居民集会游行，要求政府全面实施左翼联盟的纲领。在群众的压力下，纳吉·费伦茨政府宣布，土地的“新主人”是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对土改政策的任何修改都是绝对不许的。小农党领导被迫把21名声名狼藉的右派议员开除出党。1946年12月，共产党掌管的保安机关破获一起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案件，涉及到小农党的领导人。1947年2月，苏军事当局逮捕了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小农党领袖、政府总理纳吉·费伦茨和议会议长瓦尔加·贝拉则逃亡国外。3月，驻匈牙利盟国监督委员会下面的美国使团曾试图干预这起阴谋案的侦察工作，遭到苏联的坚决拒绝。6月，美国决定停止向匈牙利提供贷款。但是，美国的干涉未能阻止匈牙利民主力量的前进。1947年8月，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共产党获得100个席位，小农党获68席，社会民主党获67席。小农党的迪涅什担任政府总理。不久，小农党内部开展斗争，清洗了党内反共分子。1948年2月，迪涅什被迫辞职。小农党左翼领袖道比·伊斯特万继任总理，拉科西任副总理。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总统推行平衡政策。政府的26名阁员中，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各占12名，另外两名是无党派人士。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这项政策愈来愈难于继续推行。1948年2月20日，12名资产阶级部长以内务部擅自用共产党人代替布拉格八名警官为借口，集体向总统辞职，造成政府危机。捷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深夜发出告人民书，强烈谴责资产阶级部长的行为，号召人民团结在以捷共为中心的民族阵线周围。21日，布拉格10万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总理报告了政府危机的原因和经过。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总统接受资产阶级部长的辞呈。2月24日，全国250万工人罢工一小时，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内务部公布了国家社会党人阴谋叛乱的罪证，逮捕了准备叛乱的军官。在群众的压力下，贝奈斯总统于2月25日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并同意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新政府名单。新政府中，共产党12人，社会民主党4人，国家社会党和人民党各2人，斯洛伐克民主党1人。国防和外交部长仍由无党派人士担任。1948年5月，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获得巨大胜利。6月，贝奈斯辞职，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总统。共产党人萨波托茨基继任总理。二月事件以无产阶级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

1947年6月，保加利亚政府逮捕了农民党首领彼得科夫，9月以叛国罪将其处死。同年7月，罗马尼亚政府以叛国间谍罪逮捕农民党领袖马尼乌，

判处他终身监禁，同时宣布解散农民党。1948年12月，匈牙利政府逮捕了红衣主教明曾蒂，并以叛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在这前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审判了一些天主教的主教。

经过1947~1948年的斗争，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最终确立起来了。

第三节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苏南冲突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国际于 1943 年宣告解散。这表明世界统一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没有必要重建这种机构了。

1945 年，铁托向斯大林建议，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一个协商性质的国际会议组织。斯大林表示赞赏这个建议。1947 年，美苏冷战全面开始。夏天，联共（布）中央写信给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请波党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哥穆尔卡不愿意召开这种会议，但波兰工人党中央讨论后，决定接受这一要求。

1947 年 9 月 22~27 日，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南共的卡德尔，波工人党的哥穆尔卡，罗共的乔治乌·德治，保工人党的契尔文科夫，匈共的法尔卡施，捷共的斯兰斯基，法共的杜克洛，意共的隆哥等人。

会上，日丹诺夫作了《论国际形势》的报告，各国党谈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彼此间交换了意见。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由九国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联共（布）代表提出设立常务委员会，以便定期交换意见。波、匈代表反对，苏联的建议未被采纳。这样，情报局的任务便仅限于交流经验，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党的活动。1947 年 11 月，情报局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情报局成立后不久，苏南两党发生冲突。情报局背离自己的成立宗旨，两次开会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粗暴干涉南共的内部事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不良影响。1956 年 4 月，情报局宣布结束活动。

苏南冲突 苏南两国共产党早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一些意见分歧。南共对苏联未同它商议就在雅尔塔会议达成关于南斯拉夫政权问题的决议感到不快。战后，南共认为苏有大国主义，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平等。而联共（布）认为，南共领导对苏不够友好，有时不遵从苏联的意旨。

1948 年 3 月 18 日，苏联突然撤走它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第二天，又撤走全部文职专家。南共中央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要求解释原因。1948 年 3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回信，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信件指责南共领导人有反苏情绪，说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受到敌意包围，他们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情报遭到南共领导的多方阻挠。信件还点名说南共的一些领导人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南共党内没有民主气氛。4 月 12 日，南共中央开会，讨论苏联的来信。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委员都拒绝苏联的指责，认为苏南争论的实质是两国应建立什么样关系的问题。4 月 13 日，南共中央复函联共（布）中央，对其信件的“语调和内容感到惊讶”，要求苏联派代表团来南实地调查真情。5 月 4 日，苏联回复第二封信，坚持认为苏专家有权向任何南斯拉夫公民收集情报，并说间谍内奸“充斥于南斯拉夫的党政机器内”，“美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行为俨然是南斯拉夫的主人”。苏联建议把南斯拉夫问题提交情报局讨论。5 月 9 日，南共中央开会，拒绝苏联的建议，并决定把赞同苏联观点的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开除出党中央。不久，他们就被逮捕入狱。

1948 年 6 月 20~28 日，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情

报局会议。会议在南共代表未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决议，批评南共“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忽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认为国内基本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并说南共已“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1948年7月，南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会充分肯定了党中央的路线，认为情报局的决议“不正确，不公允”，同时表示要努力改善同联共（布）的关系。但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府却于1949年6~7月，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1949年11月，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会议，进一步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错误地指责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苏南公开冲突不仅给南斯拉夫造成极大的困难，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良后果。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后，东欧各国党纷纷开展了反对“铁托分子”运动，使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蒙受不白之冤。1949年3月，阿尔巴尼亚副总理科奇·佐治被控为南斯拉夫间谍，于6月被处死。同年6月，匈牙利外交部长、匈牙利国内反法西斯斗争领导人拉伊克被逮捕，1950年以叛国间谍罪被处死。1951年，匈牙利副总理、内务部长卡达尔被捕入狱。1950年底，保加利亚工人党创始人、副总理科斯托夫被逮捕处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因多次强调波兰要走自己的路，于1948年被谴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同年，被解除总书记职务，1951年又被捕入狱。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于1952年12月以叛国间谍罪被处死。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党先后承认对南共的指责和反“铁托分子”运动是错误的。各国党先后为40年代末50年代初遭批判处死的“铁托分子”平反昭雪。

第四节 亚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抗美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美苏两国商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南、北方，接受侵朝日军投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对朝鲜历时36年的殖民统治结束，这一天成为朝鲜的民族解放日。8月末至9月上旬，苏、美军队先后进抵三八线以北、以南地区。

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国家都曾承诺帮助朝鲜独立。日本投降后，朝鲜各党派和爱国人士在汉城成立“建国准备委员会”。1945年9月，在汉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宣告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各地人民起来接管日本殖民政权，建立人民委员会。

在北方，以朝鲜共产党人为核心，联合各民主党派，迅速建立各地方人民委员会。1945年10月，以金日成 为书记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委员会成立。1946年2月8日，在平壤召开了北朝鲜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的协议会，通过了在北朝鲜建立中央政权机关的决议，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1946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在党和临时人民委员会领导下，1946年3月，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没收了日本殖民者、民族叛徒以及占地超过5町步 的朝鲜地主的土地共105万町步，将其中98万余町步无偿地分配给72万多户农民。8月，又颁布实施产业、铁道、邮电、银行等国有化的法令，同时实行司法、教育等部门的民主改革。1947年2月，在各地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了北朝鲜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建立了北朝鲜人民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正式成立了以金日成 为委员长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美军占领南朝鲜后，宣布成立军政府，接管一切权力，解散了南方各地的人民委员会，1946年2月，建立了以李承晚 为首的“民主议院”作为咨询机构。

为实现盟国战时关于朝鲜问题的协议，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由美苏的军事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与朝鲜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协商，组成临时民主政府，逐步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但是，联合委员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47年9月，美国片面决定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11月，第二届联大决定组成“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代表有权监督朝鲜普选，建立全朝鲜政府。这个决议遭到苏联的抵制和朝鲜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反对。

1948年5月10日，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南朝鲜单独举行选举。8月15日，建立大韩民国，李承晚任总统。

金日成（1912~1994年），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今平壤市万景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移居中国东北。中学时参加抗日运动。1931年加入共产党。翌年4月创建抗日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4年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1936年5月成立祖国光复会，任会长。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和政府首相、国家主席直至逝世。

1町步约等于1公顷。

李承晚（1875~1965年），生于朝鲜黄海道平山郡。参加反日独立运动，1919年当选为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总统后长期寓居美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国。

在这种形势下，北朝鲜劳动党联合南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决定建立民主政权。1948年8月，在全朝鲜举行普选。9月2日，在平壤举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了宪法，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内阁。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朝鲜形成南北分裂局面，但双方均宣布对整个朝鲜拥有主权。同年12月，驻朝苏军撤回回国。1949年9月，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建立朝鲜劳动党，并加强北方政权和人民军的建设。

韩国政权成立后，美国军政府结束。1949年6月，美国宣布从韩国撤军，但保留了一个500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1950年1月，美韩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加强了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同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抵汉城，19日在韩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准备给予正在如此英勇地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南朝鲜以一切必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朝鲜半岛形势紧张，三八线上冲突频繁。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当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在苏联代表缺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剥夺的情况下，通过了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进攻韩国的决议。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战争，并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时指示加强对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的军事援助。

7月7日，美国又一次利用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同时英、法等15个国家先后派出军队，投入侵朝战争。在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发动凌厉攻势，不到两个月，控制了南方90%以上的地区与92%以上的人口，把美国 and 韩国的军队压缩在大邱、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海岸一隅之地。

9月15日，美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前线，后方空虚之际，出动三百多艘军舰、五百多架飞机，掩护四万多军队在仁川登陆。30日占领了汉城，并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被迫作战略撤退。10月19日，平壤被占领。随后，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在关系朝中两国安危的严峻时刻，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1950年10月25日~1953年6月10日，朝中人民军队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五次战役，击退了进犯到中朝边境的美韩军队，扭转了战局，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并迫使美国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10月8日起移至板门店）开始。从此，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阶段。美国拒绝朝中方面提出的立即停火、以三八线为界的合理主张，自恃拥有空军优势，企图以军事压力多占土地。1951年它先后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朝中军队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开展了“坑道战”，挡住了美军的进攻。1952年10月，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光辉胜利。1953年5~7月，朝中军队发动夏季反击战役，歼灭敌军十多万，向南扩展阵地二百二十多平方公里。在这种情况下，7月27日，美国政府终于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朝鲜停战协定》确定以北纬38度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一非军事区；禁止从朝鲜境外进入

这15个国家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邦、希腊、荷兰、哥伦比亚、比利时、卢森堡、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埃塞俄比亚。

增援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装备与弹药；协定生效 60 天内，双方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其余战俘则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保证协定实施，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朝鲜战争是一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约一百零九万人，自己损失六十多万人。美国动用了它的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二分之一，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拥有优势的技术装备，但仍以失败告终。朝中人民抗美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民主朝鲜和新中国的安全，鼓舞和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抗法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和越南独立同盟总部决定立即发动总起义。1945 年 8 月 16 日，越南独立同盟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争取独立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十大政策，选出了以胡志明 为主席的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军开进国内之前从日军手中夺取全国的政权。

八月革命爆发。河静、广义两省人民首先发动。8 月 16 日，越南解放军攻克太原。17~19 日，河内人民起义，夺得政权。接着 23 日顺化起义、25 日西贡起义相继胜利。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总起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胜利。9 月 2 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根据战时盟国协议，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北纬 16 度线以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英军则进入越南南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拒绝承认越南独立，企图重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1945 年 9 月 23 日，在英国支持下，法国殖民军占领西贡，并立即着手恢复殖民政权。越南南部人民抗法战争开始。

1945 年 11 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出“抗战建国”的指示，提出了“巩固政权，反对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消除内患，改善人民生活”的紧急任务。1946 年 1 月，越南全国举行普选 3 月召开国民大会，正式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接着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同时，共和国政府接管了殖民者的企业，实行了“二五减租”，颁布了保护工人权利的劳动法令，并建立了“卫国军”。

为了争取时间，发展抗法力量，1946 年 3 月 6 日，越南与法国签订《越法初步协定》。协定规定，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但属于法兰西联邦和印度支那联邦；越南则同意 15,000 名法军派驻越南北部，期限为五年。中国国民党军队撤走后，同年 3 月 7 日至 18 日，法军进入海防、河内。1946 年 9 月 14 日，越法之间又签订临时协定，规定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保证对方侨民享有与本国

胡志明（1890~1969 年），原名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取名阮爱国，并曾用李瑞、胡光等化名，40 年代初取名胡志明。1920 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后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活动，1924 年底到达中国广州开展革命活动。1925 年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 年 2 月 3 日将越南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统一组成越南共产党（同年 10 月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41 年发起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当选为主席，领导了越南抗日反法斗争。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国家主席。1951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后一直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

公民平等的经济文化权益。但是，法国殖民者没有履行协议，它不仅在越南扶植亲法政权，并不断扩大侵占的地盘。

1946年12月19日，法国殖民者撕毁全部协定，在河内发动总攻击。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始。战争初期，法国侵略军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发动全面进攻。越南军队进行了河内等城市的保卫战后，撤出城市，以山区、农村为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10月，法军集中两万多兵力，向越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妄图歼灭越军主力，摧毁抗战政府的基地。越南军队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方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粉碎了法军的冬季攻势。越北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法国殖民者“速战速决”的战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在艰苦的相持阶段中，越南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从1948~1949年，取得一系列反扫荡战役的胜利。1949年10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越南抗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初，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同越南建交。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加紧干涉越南战争。1950年2月，美国正式承认保大为首的西贡政权。5月，法美签订《军事财政援助协定》。

但是，美国的援助挽救不了法军的颓势。1950年9月，在中国支援下，越南人民军开展北部“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拔除了从高平到谅山的法军据点，巩固和扩大了越北解放区。与此同时，老挝与柬埔寨人民的抗法战争广泛开展。1950年在老挝建立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总理的寮国抗战政府。柬埔寨也成立了“高棉自由战线”，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

1951年2月，在准备总反攻的形势下，印度支那共产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确定了党在抗战中的基本政策，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越南劳动党，并选出了以胡志明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此后，在解放区普遍实行了民主改革，开展了支援前线的生产运动。1953年12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在解放区逐步展开土地改革。土改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抗战。

朝鲜停战后，美国加紧援助法国，以延长和扩大印支战争。从1953~1954年美国负担了法国侵略军费的四分之三以上。1953年秋，在美国的干预下，法军司令部制订了“纳瓦尔计划”，妄图在18个月内消灭越南抗战力量。1953年11月，法军集中一部分机动兵力空降到越南西北的军事要地——奠边府，并将这里建成为法军的进攻基地。1954年3月13日~5月7日，越南人民军进行了“奠边府战役”。经过55天的激烈战斗，攻克了号称为“坚不可摧”的奠边府堡垒群，全歼法军精锐部队一万六千多人，俘虏了法驻奠边府军队的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这一胜利粉碎了“纳瓦尔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者。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国际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和老挝。会议首先讨论了朝鲜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法国主战派拉尼埃政府的代表在会上采取顽固态度，奠边府战役的结果使法国主战派受到沉重打击。6月18日，主张停战的孟戴斯-弗朗斯取代拉尼埃上台执政。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终于冲破重重障碍达成了协议，发表了会议的最后宣言。

协定的主要内容是：结束在印度支那三国的敌对行动；与会各国保证尊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在

北纬 17 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越南军队在军事分界线以北集结，法军在该线以南集结；停战后印度支那三国不得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并禁止任何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设立由双方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与停战有关的争端，并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代表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协定的实施；三国将分别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以实现各国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其中规定越南在 1956 年 7 月举行自由选举）。

美国代表没有在最后宣言上签字，但是美国代表发表了一个单独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1954 年 8 月 31 日，印度支那停战，印度支那地区和平恢复。在抗法战争期间，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援和老挝、柬埔寨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歼灭法军十四万多人，解放了越南北方，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原属中国的一部分。1911 年，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宣布脱离清朝管辖，实行自治。1917 年复归中国统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于 1918 年底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21 年 3 月 1 日在苏俄的恰克图成立蒙古人民党（1925 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民革命。在苏俄红军援助下，7 月 8 日解放库伦，11 日宣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有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参加，同时保留了博格多格根的王位。1922 年人民革命政府颁布法律，废除农牧奴制，取消封建主的特权。反动的大封建主叛乱，并于 1923 年 2 月下毒害死了苏赫巴托尔。乔巴山领导人民同封建反动势力斗争。1924 年 5 月，博格多格根病逝。6 月 13 日，宣布废除君主政体。11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26 日，通过第一部宪法，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外蒙古革命前，经济相当落后，原始的游牧业是其经济基础，广大牧民（阿拉特）受着封建神权君主制的压迫。1921~1924 年，实行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神权制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政教分立，确立了民主共和政治体制。1924 年 8 月举行的蒙古人民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从 30 年代起，在苏联的援助下，大力发展畜牧业，同时加强工业、商业、交通邮电事业。到 1940 年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有自己的工矿业部门，公路铁路也开始修建，并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拥有自己的现代工人和技术人员、知识分子队伍。1940 年工人数目达 13,000 人以上。

蒙古人民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争。1939 年 8 月在苏军支援下，击溃了入侵哈拉欣河地区的日军。1945 年 8 月 10 日正式向日本宣战，配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为击败日本关东军作出了贡献。

1924 年 5 月签署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在 1945 年 2 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首脑在关于日本的协定中，却秘密规定将“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条件。在苏美两大国压力下，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其独立愿望”。1945 年 10 月，外蒙古举行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1946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二次大战后，蒙苏关系进一步加强。1946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条约》，两国结成了更为紧密的特殊关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日，中蒙两国正式建交。

战后，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48年至1957年，实施两个五年计划，1958~1960年实施三年计划。到1985年为止，共执行了七个五年计划。1960年前，蒙古实行“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大力增加牲畜头数。1961年后，把经济发展重点转为发展重工业，并提出建设“农牧业—工业国”的口号，“四五计划”又提出“工业—农牧业国”口号，但未能达到目标。但在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经济有一定发展。包括那来哈煤矿在内的一批大工矿企业兴建起来。1959年蒙古政府宣布全国完成农牧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对外关系方面，蒙古除与苏联建立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科技合作的紧密关系外，战后又与欧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邦交。1961年10月加入联合国。1962年6月，加入经互会，其对外贸易主要是同苏联、东欧等经互会国家进行。冷战结束后，蒙古政局发生变化。1990年，蒙古实行多党制和党政分开。蒙古人民革命党修改党纲，规定党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南亚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

第一节 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

战后，亚洲首先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一系列东南亚国家摆脱了西方殖民国家的统治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使亚洲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几乎都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保护国。泰国在政治上虽然保持独立，但在经济上被英、法控制。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号下，建立军事法西斯的统治。东南亚各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斗争高潮。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席卷了东南亚广阔地区。在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的民主人士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武装，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东南亚国家的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条件。

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和英、法、荷等西欧殖民国家的削弱，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1945年8月，在日本法西斯投降之际，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掀起了八月革命，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菲律宾、缅甸、马来亚等国人民也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

菲律宾独立 菲律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占领。1942年1月，日本在菲建立“行政委员会”傀儡政权。1943年10月又导演一场假独立的闹剧，宣布建立“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在日本占领时期，菲律宾共产党和民主组织领导了抗日武装斗争。以菲共为主的人民抗日军到1945年发展为一支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吕宋岛的大片地区。在解放区建立了民主政权，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1944年10月后，人民抗日军和地方游击队配合美军向日军发动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2月，美国恢复了对菲律宾的统治后，宣布菲律宾人民抗日军非法，并下令解除其武装，同时搜捕人民抗日军的领导人。这引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反抗。同年9月23日，60,000多菲律宾工人和农民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独立、民主和土地。同年12月23日，马尼拉召开了有65,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反对美国企图修改《泰丁斯—麦克杜菲法》，延缓宣布菲独立的阴谋。在菲共领导下，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不断发生。许多人民抗日军战士重新拿起武器开展反抗美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得不按照《泰丁斯—麦克杜菲法》的规定如期宣布菲律宾独立。1946年7月4日，在马尼拉举行了菲律宾独立和成立菲律宾共和国的典礼。美国宣布将菲律宾主权移交给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美驻菲高级专员公署改为驻菲大使馆。菲律宾自由党的首领罗哈斯就任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菲律宾的独立是菲律宾人民长期斗争的一个成果，它使菲律宾民族解放事业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不过，美国在菲律宾独立后仍然没有放松对它的控制。美通过签订《美菲总关系条约》以及《贸易协定》《军事基地协定》

《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是美国在1934年3月24日颁布的，规定在美驻菲最高专员监督下成立菲律宾自治政府，十年之后让菲律宾独立。

和《共同防御条约》等，继续保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经济特权，并继续驻扎军队和设置军事基地。1954年，美国还把菲律宾拉入“东南亚集体防务组织”。

缅甸联邦的建立 二次大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缅甸的渗透，企图以缅甸为基地，打开通向印度的大门。日本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支持缅甸独立为名，帮助缅甸民族主义领袖昂山（1915~1947年）于1941年在泰国组织了“缅甸独立军”，插手缅甸独立运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泰国入侵缅甸。独立军也随日军回国。1942年5月，日本占领了缅甸。在日本军事法西斯的统治下，缅甸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武装斗争遍及西部阿拉干山区、中部曼德勒、南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及丹那沙林一带。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战争形势日益不利的情况下，日本法西斯于1943年8月虚伪地宣布缅甸“独立”，建立“民族政府”，并将缅甸“国防军”（由独立军改编组成）改名为“国民军”。但是缅甸依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殖民地。昂山等缅甸民族主义者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面目后，加入了抗日阵营。1944年8月，缅共秘密联合缅甸人民革命党（缅甸社会党前身）、昂山领导的国民军以及一部分少数民族和群众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昂山担任自由同盟主席，缅共领袖德钦丹东（1911~1968年）任总书记。自由同盟配合盟军反攻，于1945年3月27日，发动了全国抗日武装起义。昂山率领的缅甸国民军和各地游击队向日军发动进攻。5月解放了首都仰光，收复了大片国土，将日寇赶出了缅甸。

当日本法西斯被逐出缅甸的时候，英国军队却以“盟军”的身份回到缅甸，企图重建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工党政府于1945年5月发表了对缅政策的白皮书，宣布重新建立在缅甸的总督统治，三年之后恢复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举行制宪机构的选举；最后经过英国议会批准，缅甸才可取得自治领地位；掸邦等少数民族地区规定为特区，仍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这是一个以“自治”为名，实为分裂缅甸的计划。英国还利用自由同盟领导人企图通过和平妥协的道路取得独立的幻想，与他们进行谈判。1945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与自由同盟主席昂山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康提签订了《抗日军问题协定》（又称《康提协定》）。协定规定将缅甸抗日军改编为英国控制下的政府军，名额由原来20,000多人缩减为5000人，并让人民交出武器。10月，战时逃亡印度的英国总督史密斯回到缅甸。英国军政府将权力移交给总督控制下的缅甸“行政委员会”。史密斯拒绝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提出的成立临时政府的要求，并将自由同盟的代表排除在总督行政委员会之外。

1946年1月，自由同盟在仰光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抨击了英国奴役缅甸的计划，通过了争取缅甸完全独立的决议，并要求废除殖民“行政机关”，建立代表全缅一切民主力量的临时政府。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 and 经济政策的决议。同年2~3月，缅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在德钦丹东领导下批判了和平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放下武器。1946年初，缅甸农民斗争兴起。同年9月，爆发了全国性总罢工。除工厂、铁路、码头工人外，公务人员和警察也参加了罢工。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要求完全独立”、“撤退英国占领军”等口号。9月23日各地农民也举行支援总罢工的示威游行。这是战后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的“九月高潮”，是缅甸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次大示威。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几乎使缅甸的行政管

理和经济生活陷入瘫痪。英国扶植的行政委员会被迫解散。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殖民者一方面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围剿由前抗日武装改组的人民志愿军，派出军警袭击进步社团和报社，逮捕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自由同盟的手段。1946年9月底，英国新任总督兰斯组成新的行政委员会，邀请昂山担任副主席兼国防和外交部长。自由同盟领导下令停止总罢工，并于10月将共产党开除出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分裂削弱了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缅共领导的工会和农会组织退出自由同盟。

1947年1月，昂山等赴英谈判。1月27日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这个协定虽规定缅甸可以“在英联邦内或联邦外尽快取得独立”，但没有规定独立的日期。在过渡期内，缅甸仍由英国管理，总督和行政委员会的权力不能变更。英国虽同意1947年4月选举制宪议会，制定宪法，但宪法须经英国国会批准。缅甸的边区仍由英国总督管辖。根据《昂山—艾德礼协定》，缅甸行政委员会成了过渡政府。同年4月，英国和缅甸行政委员会签订了《英缅经济协定》。它规定独立后的缅甸继续承认英国公司原来享有的特权，未经达成协议和作出赔偿，不得对英国公司实行国有化；缅甸独立后留在英镑区，缅甸纸币由英国印刷发行；缅甸政府应给在缅供职的英国官员发放养老金，并承担殖民时期缅甸行政机构的债务。

缅共和缅甸人民反对妥协性的上述协定，要求完全独立。1947年初，罢工斗争重新高涨。阿拉干山区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武装斗争发展起来。

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昂山提出了一年内实现独立、建立全权民族政府的主张，并邀请缅共等左翼组织派代表参加制宪会议。1947年4月，举行了制宪会议的选举，成立了以昂山为总理的临时政府。6月10日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脱离英联邦、宣布缅甸为独立自主共和国的《缅甸联邦宪法草案》。会后派遣制宪会议议长吴努赴英谈判移交政权问题，但无结果。昂山在制宪会议后多次发表讲话，表达了争取完全独立的决心。他说：“我们愿意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独立，当这种方式不能奏效时，该打就打。”

英国殖民者对昂山态度的转变和他与缅共的重新接近十分不满，竟然采取卑鄙的谋杀手段。1947年7月19日，昂山及六位部长在行政会议秘书厅开会时，被英国指使的“爱国党”首领吴素组织的一群执枪暴徒杀害了。昂山将军遇难时仅32岁。他遇难后被追认为民族英雄。缅甸独立后，在仰光修建了昂山等七烈士陵园，并把7月19日这一天定为烈士节。

昂山等人的遇害，激起了缅甸人民的愤慨。7月20日，昂山等的葬礼变成10万群众参加的政治示威。缅共和其他爱国政党、社团参加了葬礼，号召加强民族团结，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新的决战。全缅工会大会和农民组织准备发动新的全国性运动。

在缅甸人民反英斗争新高潮即将到来时，英国被迫与缅甸进行移交政权的谈判。1947年8月2日，组成了以吴努为首的临时政府。8月到10月，英缅双方在仰光进行了谈判。9月24日，缅甸制宪会议通过了《缅甸联邦宪法》，规定缅甸是英联邦以外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10月17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和缅甸临时政府总理吴努在伦敦签订了《英缅条约》。条约规定英国承认缅甸联邦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保留了英国在缅甸享有的一些军事和经济特权。1948年1月4日，缅甸联邦正式宣告成立。50年代初，缅

甸独立斗争深入发展。1953年1月,缅甸联邦政府宣布废除《英缅防御协定》,10月又取消了英国商品享有的关税特惠权。缅甸的独立日益巩固。

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19世纪末,英国逐步侵占马来半岛各邦。1896年成立“马来联邦”,控制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1909年后,又先后控制了吉兰丹、吉打、玻璃市、丁加奴以及柔佛诸邦,并于1914年组成“马来属邦”,置于英国顾问官控制之下。从此,马来亚全部沦为英国殖民地。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击败英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在日占时期,马来亚共产党(1930年成立)组织人民抗日军奋起抗战。在三年多的时间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作战340多次,歼敌5500多名。1945年初,人民抗日军已发展为7000人的武装力量。到日本投降时,马共已成为国内强大的政治力量,领导了一支拥有15,000人的武装和有50万成员的群众组织,并在许多城镇建立了人民委员会。

大战结束后,英军以“受降”为名,于1945年9月5日在新加坡登陆,并重新占领了马来亚。12月1日,英国军事当局解除了人民抗日军的武装,解散了人民委员会。

为恢复和加强在马来亚的殖民制度,1946年1月,英国内阁发表《白皮书》,决定成立“马来亚联邦”。4月1日,英国与各邦素丹签约,正式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并将政权移交给文职政府。马来亚联邦包括原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九个邦以及前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与马六甲,而新加坡则为皇家直辖殖民地。联邦由英王委任的总督为首脑,各邦素丹政府隶属总督为首的联邦政府。联邦立法会议握有立法权,其决定无须征得各素丹的同意。这样,马来亚联邦的一切大权均控制在英国手中。因而,这次“改制改革”遭到马来亚各政党和各族人民的反对。此外,《白皮书》规定给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生的人,以及所有在1942年2月15日之前的15年中,居住满10年的移民以公民权,这使许多马来人不满。为抗议《白皮书》的公布,各地举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1946年马来亚发生了约2000次罢工。各邦素丹也接受群众的要求,拒不出席英国人的就职典礼。

由于没有得到各邦素丹的支持,并遭到最大的马来人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1946年5月成立,简称“巫统”)和其他马来人的反对,英国政府同意修改马来亚联邦宪法,并成立一个由英国代表、各邦素丹、巫统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来起草新宪法。1947年7月24日,公布了将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宪法,同年12月经英国国会通过。翌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给予各素丹较多的权力,联合邦政府以各邦素丹和英王的名义共同主持,高级专员取代了总督;成立素丹会议,有权听取和批准联合邦政府的重要政策;立法机构中增加了马来人的席位。但英王仍拥有最高权力,高级专员有权任命立法议会成员,并有否决立法议会议案的特权,新加坡仍为英王直辖殖民地。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前后,马来亚的反殖民统治的斗争高涨。槟榔屿甚至一度展开脱离联合邦的运动,1947年10月20日,爆发了为期一周的总罢工,有数十万人参加,各地工商业和交通陷入瘫痪状态。

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当局颁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令,宣布马

当地华文文献以“巫人”称呼马来人,故“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

共及其他左翼组织为“非法”，发动大逮捕，进而发动全面的武装镇压。12月，马共中央召开会议，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纲领。共产党转入地下，开始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巫统等政党参加了议会活动。1951年4月，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建立国会，高级专员任立法议会议长。巫统主席达图·奥恩被任命为内政部长。8月，东古·拉赫曼（1903~）任巫统主席。之后，实行与最大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合作的方针，成立“马华联盟”。1954年10月，马来亚印度人国民大会（1946年8月成立）也加入联盟，称为“马华印联盟”。它们联合起来，参加议会选举，开展合法斗争。

1955年4月亚非会议的召开，推动了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举行大选，马华印联盟在52个议席中赢得51席。联盟主席拉赫曼出任联邦政府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马华印联盟成为执政党。同年8月，拉赫曼向英国递交备忘录，要求在今后四年内联合邦在英联邦范围内独立，取消英高级专员的否决权，将财政和防务大权交给民选的联合邦政府。1956年1月18日至2月18日，拉赫曼率代表团赴伦敦谈判。英国此时已无力继续维持在马来亚的直接统治，被迫同意马来亚于1957年8月独立。

1957年7月2日，在吉隆坡公布了联合邦独立的新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设立联合邦最高元首，由统治者会议（相当于素丹会议）从九个州（邦）的素丹中选举产生；设立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内阁向两院议会负责，最高元首应按内阁意见行事；各州设州政府和州议会，州首脑是素丹，槟榔屿与马六甲首脑称州长；扩大非马来人的公民权，所有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在马来亚联合邦出生的人，都自动成为联合邦的公民。宪法还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十年内英语仍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为国教，同时保障其他宗教自由。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9月2日，森美兰的素丹端古·拉赫曼被选为第一任最高元首。随后，东古·拉赫曼为总理的第一届内阁政府组成。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标志着英国在马来亚长达171年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马来亚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即马来亚华人公会，1949年2月27日成立，成员均系马来亚华人。初为华人福利团体，1952年，会长陈祯禄改变公会性质，使之成为政治组织，与巫统合作，主张通过谈判以争取马来亚的独立。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诞生

印尼八月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建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8月15日，共产党人和青年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在雅加达秘密集会，作出了立即宣布独立的决定，并派代表与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哈达协商，要求他们出面宣布独立。8月17日，苏加诺、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独立宣言发表后，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一旦独立，永远独立！”革命民兵夺取日军武器，占领工厂、电台。各地开始建立共和国政权机构。

8月18日，印尼各政党、各社团领袖举行“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通过共和国宪法，选举苏加诺、哈达分别担任正、副总统。随后组成了以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为总理的国会制内阁。

共和国成立不久，9月29日，英军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在印尼登陆，占领了雅加达、万隆、三宝瓏等城市。被日军拘留在集中营的荷印殖民军被英军释放后组成“荷印联军”，逃亡到澳大利亚的荷印殖民官员也卷土重来，他们与从欧洲开来的荷军结合在一起，企图恢复殖民统治。

英军的入侵遭到印尼人民的坚决抵抗。11月10日，入侵泗水（苏腊巴亚）的英军出动飞机、坦克和军舰，发动大规模进攻。泗水军民包括当地华侨英勇抗击英军，浴血战斗21昼夜。泗水保卫战显示了印尼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英雄气概，这一天被定为英雄节。在印尼人民的抗击下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者。

印尼人民的抗荷战争 荷兰不承认印尼独立，企图重建殖民统治。它一面加紧准备殖民战争，一面与印尼谈判。1946年11月15日，沙里尔政府与荷兰签订了《林芽椰蒂协定》。协定规定，荷兰承认印尼共和国在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行使事实上的主权”，但印尼共和国必须同荷兰扶植的联邦区联合组成印尼联邦，并参加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尼联邦；经济上要恢复和赔偿外国资本的财产和权益。这是一个妥协投降的协定。由于人民的反对，1947年6月，沙里尔下台，7月组成了以共产党人沙利弗丁为首的联合政府。

荷兰殖民者为迫使印尼政府屈服，7月20日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即殖民战争。在英美支持下，荷兰出动了12万军队，在中爪哇和东爪哇登陆，发动大规模进攻。沙利弗丁政府组织了抗荷卫国政府。但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内部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战术上单纯进行阵地防御战，抗战局面仅维持两个月。

1947年10月，联合国决定成立由美、比、澳三国组成的“斡旋委员会”，进行调停。翌年1月12日，在美国等的“斡旋”下，印尼政府作了错误的原则让步，同荷兰在美舰“伦维尔”号上签订了《伦维尔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以莫克线为分界线，就地停火；二、在爪哇、苏门答腊、马都拉的荷占区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这些地区回归印尼共和国，或加入印度尼西亚联邦；三、在联邦成立之前，荷兰继续行使主权。这个协定比《林芽椰蒂协

林芽椰蒂为爪哇井里汶市附近的一个村子。

“莫克线”是1947年8月29日由荷兰片面宣布的，它把荷兰军队在印尼领土上的一些最前哨的据点连结起来，将这条线荷军一侧的土地均作为荷军已占领的土地。

定》对印尼更为不利。它使印尼的爪哇岛的三分之二、马都拉的全部和苏门答腊的一部分被荷兰占领，并承认荷兰的宗主权。沙利弗丁政府自动辞职后，哈达和玛斯友美党人上台执政。

哈达政府执行亲美政策，对外表示完全遵守《伦敦协定》，对内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并走上镇压工农和共产党的道路。哈达的政策遭到人民的反对。1948年5月，印尼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组成人民民主阵线，制订《民族纲领》，要求改组哈达内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印尼共和国。

美、荷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1948年7月21日，美国代表霍金斯、柯契兰同印尼代表哈达等人在沙冷岸（茉莉芬）召开会议，密商“消灭红色分子”的计划。美国允诺提供武器和6500万美元的经费。

在印尼革命危急的关头，1948年8月在国外活动的印尼共产党领袖慕梭回国。8月13~14日，在日惹召开的印尼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慕梭作了题为《印尼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报告。在慕梭领导下，印尼共中央总结了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了新的路线和政策：坚决为取消《林芽椰蒂协定》和《伦敦协定》而斗争；将三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劳工党和左翼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印尼共产党；建立由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加强在军队中的工作。8月26~27日，印尼共中央选举慕梭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通过了《印尼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会后慕梭到各地访问，宣讲党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哈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借口共产党人要“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派遣大批军队，于1948年9月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阵线成员被迫武装自卫。在这一事件中，慕梭、沙利弗丁等党的领导人牺牲，约有三万六千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一万人惨遭杀害。

哈达政府镇压了印尼共产党后，印尼共和国防御力量削弱，荷兰殖民者乘机于1948年12月19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被迫固守大城市，到1949年2月底，仅能控制东爪哇的三分之一和西爪哇的近一半地区。荷兰的侵略遭到亚洲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荷军伤亡日增，军费开支浩大。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双方停火，并释放苏加诺等人。美国还通过“斡旋委员会”（1949年1月改名“联合国印尼委员会”）出面调处。1949年5月7日，荷兰和印尼在雅加达签订停战协定。

1949年8~11月，在海牙举行了有印尼共和国政府、荷兰、印尼各傀儡邦以及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和15个傀儡邦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参加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尼联盟；印尼在外交、国防、财经和文化等方面和荷兰实行“永久合作”；西伊里安继续由荷兰占领，其归属问题待以后双方“协商”解决；印尼还需偿付殖民政府的400亿荷盾的

玛斯友美党全称“印度尼西亚穆斯林联合会”，1945年11月成立，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

债务。

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与收复西伊里安 《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荷军从印尼撤走。1949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仍担任总统，哈达任总理。12月27日，荷兰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联邦共和国。从此，长达三百四十多年的荷兰直接统治终结。但是，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依然存在，占印尼领土20%的西伊里安还被荷兰占领，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各傀儡邦区仍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状态没有被触动。美国势力乘机渗入印尼。美、荷帝国主义还通过代理人组织“伊斯兰教运动”、“印尼伊斯兰教军”等反动教派组织，进行分裂、颠覆活动。因此，印尼人民仍面临着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和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1950年，印尼全国开展了取消傀儡邦区、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运动。各傀儡邦被迫纷纷解散。同年8月15日，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

在统一的共和国成立初期，右翼集团在政府和军队中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忠实履行《圆桌会议协定》，并同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参加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同时颁布禁止工人罢工法令，压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但在这一时期，印尼共产党和各民主组织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初，印尼共建立了以艾地（1923~1967年）为首的新的中央，工会和农会组织也重新建立，工农运动发展起来。

右翼集团进行反扑。1951年8月，苏基曼内阁发动“八月大逮捕”，把三千多名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印尼共与各民主组织组成反苏基曼内阁的统一战线，发动群众，迫使苏基曼内阁辞职。以民族党人为主的韦洛坡内阁执政后，释放了被捕者。1952年10月，共产党人和民主力量配合，又击破了右翼社会党人策动的军事政变，右翼势力日益孤立。共产党、民族党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组成统一战线，影响日益扩大。

1953年7月，民族党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03~1975年）组阁。这届内阁执行反帝反殖、维护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经过谈判斗争，1954年8月，阿里内阁与荷兰达成了取消“荷兰—印尼联盟”的协议，废除与荷兰的有关外交、军事、文化合作的协定条款。1955年，印尼成为万隆会议的东道国，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在会议期间，印尼政府和中国代表团于4月22日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印尼华侨在历史上形成的双重国籍问题获得解决。

1956年3月，印尼第一届普选产生的国会成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再度组阁。同年4月21日，阿里内阁宣布单方面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对荷兰的“债务”。这样，印尼的独立地位得到保障。

在万隆会议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6~1958年，印尼政府粉碎了美、荷支持的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南摩鹿加群岛等地的军事叛乱。1960年苏加诺总统下令解散参与策划叛乱的反动政党。1961年12月，印尼政府发出总动员令，组织志愿人员，准备解放西伊里安。翌年，掀起了解放西伊里安的高潮。一批志愿人员在西伊里安的两个岛登陆。印尼政府宣布没收荷兰在印尼的企业和种植园。在这种形势下，荷兰被迫于1963年5月1日将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尼。印尼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得到实现。

第三节 战后印度人民反英斗争高涨。印巴分立

战后印度人民反英斗争高涨。孟买水兵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年9月3日，英印总督宣布印度为参战国。英国殖民当局颁布《印度国防条例》，宣布印度处于战时状态，限制印度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向美、英宣战。英国在东南亚节节败退。1942年3月，日军占领英属缅甸，战火烧到印度大门口。美国为了换取印度积极参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竭力主张英国允许印度独立。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势力迅速渗入印度，并向印度派驻十几万军队。美国在印度的影响扩大。

为了取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并抵制美国对印度事务的插手，1942年3月，英国派遣了下院领袖克里浦斯赴印。他带着一份印度改革方案（又称克里浦斯方案）与印度各党派会商。方案声称在战后建立一个新的印度联邦，将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但战时英国仍“保持控制和指导”，并拒绝国大党要求立即建立印度国民政府的要求。

克里浦斯方案遭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反对。1942年8月，国大党通过决议，要求立即独立和成立临时政府，并授权甘地领导不合作运动。殖民当局采取镇压手段，迅即逮捕了甘地等国大党领袖。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3月提出在次大陆的西北部和东部伊斯兰教徒聚居地区建立“巴基斯坦”国家的要求，认为克里浦斯方案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也加以拒绝。

大战期间，英国将印度作为在远东的基地，军事订货剧增，印度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但战争结束后，军事订货停止，生产陡然下降，印度经济陷于困境。大批工人失业，农村发生饥荒。由于英国殖民者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派遣英印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和印度尼西亚，支持法国、荷兰恢复殖民政权，这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战后，亚洲人民反帝斗争高涨，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兴起，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空前发展。1945年10月，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保卫东南亚日”的活动，要求英国立即从印尼等国撤军，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反殖斗争。从11月下旬开始，又爆发了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审讯“印度国民军”军官的群众运动。加尔各答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1946年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罢工斗争由1945年的848次增加到1946年的1629次，参加人数由75万增加到196万余。农民运动遍及孟加拉、旁遮普以及克什米尔、海德拉巴土邦的特伦甘纳地区。

在战后反英斗争高潮中，孟买水兵起义占有重要的地位。1946年2月18日，孟买训练营的印度水兵为反对英国军官的种族歧视举行起义。孟买港内20艘军舰和市内陆上部队20,000名士兵参加。起义士兵扯下英国国旗，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起义水兵组织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释放全部政治犯、把印度军队撤出印尼等要求。起义迅速扩展到马德拉斯、卡拉奇等港口的水兵中。21日，全部印度海军人员加入斗争。孟买20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声援水兵起义。

印度国民军是国大党领袖之一苏巴斯·鲍斯（1897~1945年）于1943年召集在缅甸的印度籍战俘和东南亚日占区的印度侨民组成的，1944年曾协同日军在印缅边境与英军作战，企图在日军帮助下赶走英国殖民者。1945年5月缅甸日军战败，印度国民军全部被俘，仅鲍斯等少数人逃脱。印度人民同情印度国民军军官的反英斗争精神，反对审讯他们。

声势浩大的水兵起义使英国殖民当局十分震惊，他们出动坦克、装甲车，调派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开始后，水兵起义领导人曾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机构联系，但是掌握印度民族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指责起义。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认为起义是“越轨的”行动；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也要求士兵放下武器，采取“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印共中央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也没有给起义水兵以有力支持。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劝说下，缺乏坚强领导的起义水兵放下了武器。23日，水兵中央罢工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停止斗争。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起义领袖。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空前高涨，尤其是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印度士兵的武装反抗，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基础。

英国对印政策的变化和印度各大政党的主张 战后印度和亚洲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空前规模的印度反英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改变其统治政策。1946年2月19日，即水兵起义的第二天，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匆忙宣布派遣内阁特使团赴印商讨赋予印度某种形式的自治问题。3月15日，艾德礼在英国议院承认，印度的独立运动具有全民性。英国“不能采取旧的方式对待现代的局势。1946年的温度已经不是1920、1930甚至1942年的温度了”。英国统治集团认识到用老办法统治不下去了，必须对印度作出重大让步，才能保住自己对印度的殖民权益。

3月24日，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特使团到达印度，与英印总督魏菲尔一起同印度政党领袖和土邦王公开始谈判。当时，印度两大政党之间的对立更为尖锐，各自提出关于未来印度的方案。国大党要求建立一个由它领导的统一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则坚持分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大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成立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穆斯林联盟则提出英国人“分治后离开”。在英国内阁特使团召集的两大党代表的西姆拉会谈（5月5~12日）中，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946年5月16日，内阁特使团公布了英国关于未来印度的方案，提出：一、建立一个由各行省和土邦组成的联邦，享有自治领权利；二、各省和土邦有广泛的自治权；三、按宗教原则分别成立两个穆斯林多数区、一个印度教区的省集团；四、成立制宪机构，制定新宪法，并由总督在改组原行政会议的基础上，建立受各主要党派拥护的印度临时政府。内阁特使团的活动加剧了印度两大党和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6月底，英国内阁特使团回国后，印度局势更趋紧张。

1946年7月，印度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国大党获209席，穆斯林联盟获75席，其他党派14席。同时，魏菲尔总督公布临时政府的席位时，给国大党六席，穆斯林联盟五席，其他方面三席。穆斯林联盟对此提出抗议，并决定把8月16日作为实现建立巴基斯坦的“直接行动日”。这一天，在加尔各答举行了穆斯林的抗议示威活动，酿成了两个教派之间的大仇杀，死伤甚多。教派流血冲突还波及比哈尔、孟买等地。9月2日，按英印总督的安排，组成由总督兼总理、尼赫鲁任副总理的印度临时政府，穆斯林联盟直到10月26日才加入政府，但真纳本人拒绝入阁。穆斯林联盟还拒绝出席12月9日举行的制宪议会。这时印度国内各党派、教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甚至演变到

了内战的边缘。

蒙巴顿方案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立 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印度反英斗争进一步高涨。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和土邦人民反对封建王公的起义风起云涌。1947年1月，坎普尔10万工人和学生为抗议英国殖民者枪杀工人而举行的总罢工和罢课，发展为“总抵制”运动。2月，加尔各答有40万工人、大学生参加“总抵制”运动。在孟加拉的农村，500万农民参加了“三一分租”运动，要求将地租由二分之一减为三分之一，并迫使孟加拉政府颁布新的租佃法。1947年初，海德拉巴士邦特伦甘纳地区的农民起义空前高涨。在印共地方组织和民族组织“安德拉大会”的领导下，起义农民组织了游击队，建立人民政权，并没收地主王公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当时，英国驻印总督的参谋长伊斯迈说：“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了火的船。”

为了避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完全崩溃，并防止印度人民革命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对策。1947年2月20日，艾德礼在英国下议院发表对印政策声明，惊呼印度局势可能引起危险，不能再无限制地继续下去。他提出，英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步骤，至迟在1948年6月以前把政权转让到负责的印度人手里”。1947年3月，蒙巴顿接替魏菲尔担任印度总督，他同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及各方面人士举行了会谈，以贯彻艾德礼政府的对印政策。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公布了“印度独立方案”，即所谓“蒙巴顿方案”。这个方案依据宗教原则决定把印度划分为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印度斯坦包括阿萨姆、孟加拉西部、旁遮普东部、比哈尔、联合省、孟买、马德拉斯等地区；巴基斯坦包括西巴基斯坦（旁遮普西部、信德省、俾路支省、西北边省）和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东部和阿萨姆的西尔赫特区）。各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分别谈判决定加入哪一个自治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虽各有疑虑，但还是同蒙巴顿达成协议，接受了方案。印共反对这一分裂印度的方案，但无力左右局势。

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同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15日印度宣布独立。两国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从此，英国在印度长达190年之久的直接统治结束。这是印度人民经过各种形式的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印巴分别获得独立，加速了英帝国的衰落和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

印巴独立后，在印度组成了以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为总理的联邦政府，巴基斯坦组成了以穆斯林联盟书记列雅格特·阿里汗为首的政府。根据独立法案，两国分别成立了制宪议会，同时每一个自治领仍设有一个英王任命的总督。1947年8月，蒙巴顿留任印度总督，1948年，由印度人拉贾戈巴拉查理接任。真纳则担任巴基斯坦总督。

英国策划的印巴分治，给两个新的独立国家带来一系列恶果。印巴分治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进行大迁徙。到1948年，流落在印巴各地的难民达800万人以上。教派的纠纷和仇杀造成许多人死亡。1947年8月，旁遮普的双方大屠杀死亡50万人。甘地谴责教派仇杀，呼吁教派团结，1948年1月30日，在德里被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死。由于印巴分治，使统一的经济一时被分割。黄麻工业在印度斯坦，而大部分黄麻产地却在巴基斯坦；棉纺织业工厂几乎全部集中在印度，而长纤维棉花

的产地却在西巴基斯坦。土邦归属问题，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国长期纷争的重要问题。

克什米尔土邦（又称查谟—克什米尔土邦），面积 22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其中穆斯林占 77%，印度教徒占 22%。它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与中国和阿富汗相邻，北距苏联边境仅 14.5 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按照蒙巴顿方案，克什米尔土邦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者保持独立。分治后信仰印度教的王公掌握的土邦议会，宣布克什米尔加入印度联邦。1947 年 10 月，印巴在克什米尔发生武装冲突。翌年 8 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通过克什米尔停火、非军事化和举行公民投票的决议，当时印巴双方都表示接受。1949 年初，双方停火。7 月划定了停火线。印度占有面积五分之三、人口约 400 万的地区，巴基斯坦控制了面积五分之一、人口约 100 万的地区。印巴两国曾多次就克什米尔问题举行谈判。从 1953 年以来，巴基斯坦一直主张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印度政府则加以拒绝。克什米尔问题长期未获解决。1965 年 9 月印巴之间爆发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战争进行了 17 天。1966 年 1 月双方签署《塔什干宣言》，同意停火撤军，并同意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它们的争端。

第五章 战后初期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第一节 战后初期西亚的形势。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

战后初期西亚的形势 西亚包括东起阿富汗、伊朗，西至土耳其，北起里海南岸，南至阿拉伯半岛的广阔地区。除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塞浦路斯外，大多数为阿拉伯国家。西亚和北非一起被西方国家称为“中近东”或“中东”地区。由于它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衔接地带，扼东西方交通的咽喉，在战略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西亚地区资源丰富，特别是石油资源居世界首位。战后，由于石油资源不断发现，产量飞跃上升，西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亚主要是英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尤其是英国，在这里拥有巨大的殖民权益，并控制了大部分石油产地。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随着英法的削弱，美国的势力日益渗入这个地区。大战结束后，英国在西亚仍据有优势地位。它先后提出“大叙利亚”计划和“肥沃的新月”计划，企图通过联邦形式将一些阿拉伯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用以抵制美国的扩张和维持自己在西亚的殖民统治。但由于自己力量不足和西亚阿拉伯人民的反对，这些计划均未实现。战后初期，美国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咄咄逼人地向西亚扩张，排斥并取代英法的传统势力。美国的西亚政策一是企图控制中东的资源，特别是石油；二是将西亚变为遏制苏联势力向外发展的前沿阵地。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咨文中要求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杜鲁门主义”宣布后，美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军事协定，派遣军事顾问团和经济顾问团进入土耳其，并将土耳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了美国的军事基地。1949年1月，杜鲁门又提出“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通过缔结财政、技术援助协定，向亚非国家渗透。伊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西亚国家都先后与美国签订了这种协定。

为了遏制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国联合英法企图在这一地区建立军事集团。1951年10月美英法和土耳其联合向埃及提出设立“中东司令部”的建议，随后向阿拉伯各国建议，组织一个受它们控制的“联合司令部”，要求各国将武装部队隶属于这个司令部，并允许美英的武装部队驻扎在各国领土上。这个计划遭到大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反对，1951年底宣告破产。1952年10月英美又拟订了一个“中东防务组织”的计划，但还未正式出笼，就立即遭到中东国家舆论的抨击，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表示支持。随后，美英采取迂回策略，让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出面组织，美英政府在幕后操纵，采用双边军事协定的方式，于1955年11月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美国参加了军事、

“大叙利亚”计划是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合组为一个联邦；“肥沃的新月”计划是将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组成一个联邦。

这是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侵略扩张计划中的第四点，故又称“第四点计划”。

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签订“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同年4月、9月和10月，英国、巴基斯坦、伊朗先后加入。1955年11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正式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退出该组织。1959年该组织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迁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1979年3月后，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相继宣布退出；4月，美、英、土、巴四国代表开会，决定该组织于

经济和反颠覆三个委员会，在该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战后，美国垄断组织进一步渗入西亚，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50年代中期，美国石油财团取代了英国的优势地位。1956年，美国资本控制了中东已知石油储量的59.4%、石油开采的58.7%。美国的商品也向中东地区倾销。大战时期和战后初期，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西亚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扩大，人数倍增，一些在战前几乎没有工人阶级的地区，战后也出现了工人阶级。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群岛和卡塔尔有数万石油工人和运输工人。战后初期，西亚各国农业依然落后，粮食依赖进口，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盛行。地主、寺院、王室拥有大片土地，而广大农民极端缺乏土地。在叙利亚，全国550万公顷的可耕地中，地主占有85%，而农民仅有15%。在50万农户中，有三分之二丧失了土地，其余只有极少量的土地。分成制仍然是西亚最流行的租佃形式。工役制、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并存。农民生活贫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洲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鼓舞和推动了西亚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战后初期西亚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外国军事占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石油等资源的主权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斗争中，阿拉伯国家不断注意加强联合，1945年3月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日益扩大。1950年签订了《阿拉伯联盟国家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立场，拒绝参加军事集团。

在大战期间，英法军队开进叙利亚、黎巴嫩。戴高乐派领导的法国国民议会于1941年9月曾宣布承认叙、黎两国为独立国。两国的议会和政府成立后，又迫使法国于1943年12月撤销了委任统治权。1945年2月，叙、黎两国对德宣战，并作为创始国加入联合国。但是直到大战结束后，英法军队拒不撤走。法国还增派军队，镇压两国人民要求独立的斗争。两国人民组织游击队，开展反对外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秋，两国政府正式要求英法占领军撤退。1946年2月又向联合国安理会上诉。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外国军队从速撤离叙、黎。同时，两国掀起抗议示威和抵制法国军事和民政机构的运动。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加上英法和美国之间的矛盾，1946年4月英法军队撤出叙利亚，1947年1月撤出黎巴嫩。

大战结束后，伊拉克人民投入了要求废除《英伊同盟条约》的斗争。1930年签订的这一条约给予英国在伊拉克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等特权。尽管1932年国际联盟宣布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结束，伊拉克获得一定的独立，但在英伊条约的束缚下，仍处于对英依附的状态。1948年1月，伊拉克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新的为期20年的《朴次茅斯条约》。这个条约仍规定英国有权把自己的军队派进伊拉克，并享有一系列军事特权。条约签订后，伊拉克各地掀起抗议示威和罢工浪潮。巴格达和一些城市发生了示威群众和军警的流血冲突。在群众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负责签订条约的首相贾布尔不得不下台出国。

1979年9月28日结束。

阿拉伯国家联盟是由埃及倡议，于1944年9月阿拉伯国家外长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开会决定成立的。1945年3月阿拉伯各国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又称《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拥有成员国22个，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

约旦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1920年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1923年外约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一个埃米尔国。1928年英国迫使外约旦签订为期20年的英约协定，使英国对外约旦的控制合法化。战后外约旦人民反对委任统治的斗争高涨。1946年3月22日，英约签订伦敦条约，废除委任统治，承认外约旦独立。5月25日，阿卜杜拉登基为王，改国名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1948年3月15日，英约又签订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英国保留在外约旦驻军和使用基地的权利。1952年侯赛因即位。他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拒绝参加任何军事集团。1957年3月废除《英约同盟条约》，7月英军被迫撤出。约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 位于苏联南面、波斯湾北岸的伊朗是一个战略地位重要且盛产石油的国家。1954年，它的石油蕴藏量达19.95亿吨，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石油总蕴藏量的十分之一。但伊朗的石油资源被英国控制。1909年成立的英伊石油公司掌握了伊朗的石油开采权。1933年签订的《英伊石油协定》规定该公司租借伊朗南部26万平方公里的油区，期限至1993年，伊朗政府仅能获得公司石油利润的20%。英伊石油公司的租借地在伊朗形成“国中之国”。它由英国军警管辖，伊朗法律在此不能应用。伊朗工人备受剥削，却无罢工权利。

二次大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但国王礼萨·汗·巴列维与德国法西斯暗中勾结。1941年后，英、苏、美三国军队先后进驻伊朗。礼萨·汗·巴列维被放逐到非洲，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大战结束后，于1946年5月前，美、英、苏军队先后从伊朗撤出。但是，英国在伊朗仍享有巨大的权益，美国势力也大力向伊朗渗透，企图取代英国。这使伊朗成为帝国主义在西亚争夺霸权和石油产地的重要场所。

战后伊朗人民维护国家主权、要求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日益高涨。1947年底，伊朗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修改1933年石油协定的要求。1949年7月，英伊签订了一个对1933年英伊协定的补充协定。但是，这个协定仅仅增加一些租让权的税金，却几乎保留了英伊石油公司原已取得的所有权利。伊朗人民开展了强大的群众运动，反对这个补充协定，要求废除1933年的条约，并立即实现石油国有化。1949年10月，以众议员摩萨台（1880~1967年）为首的资产阶级人士组成“民族阵线”，发表声明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反对独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推动下，1951年1月11日，伊朗议会否决了补充协定，3月15日通过了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的决议。

当伊朗议会通过上述决议的消息传出后，英国政府立即发出照会，拒不承认，并派遣军舰驶入波斯湾进行军事恫吓。英伊石油公司还作出停发伊朗石油工人三成补贴的决定。这激起了伊朗工人阶级的反抗。1951年3月底，英伊石油公司工人举行大罢工，全国展开了声援石油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

1951年4月29日，“民族阵线”领袖摩萨台就任首相。他的政纲主要是实施议会通过的石油国有化决议。5月，关于国有化的决议和包括九点方案的石油法获国王的签署成为法律。法案受到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和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1980年），1941年9月继承王位，1967年10月26日加冕。1979年1月26日在霍梅尼发动的反国王群众运动的冲击下，被迫出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1980年7月27日病故于开罗。

拥护。6月，摩萨台政府接管英伊石油公司，并宣布改名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伊朗石油国有化切断了英国垄断资本掠夺伊朗石油资源、榨取高额利润的重要途径。英国决不肯罢休。在其抗议照会被伊朗政府拒绝后，5月26日，英国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所谓“申诉”，要求对伊朗的“不法行为”进行“审处”和“仲裁”。10月又将这一问题交安理会处理，企图利用联合国迫使伊朗让步。

英国要求美国给予支持，美国则将插手解决伊朗石油问题作为排挤并取代英国的大好机会。在伊朗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初期，美国曾以支持伊朗为幌子，赞同伊朗议会否决英国提出的石油补充协定。美国石油财团企图打入伊朗，将伊朗石油企业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当伊朗决心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并且它的斗争还带动了中东各产油国人民斗争的时候，美国害怕这一运动危及它在中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便转而支持英国，共同对付伊朗。1951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函摩萨台，要求重开英伊谈判；7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到达德黑兰，他以调停人自居，并以“经援”为诱饵，企图使伊朗就范。

当哈里曼抵达伊朗时，德黑兰10万群众举行示威，反对美国干涉。8月，摩萨台政府拒绝了美英所提出的放弃石油国有化的要求。10月间，伊朗采取了实施石油国有化的有关措施，300名英国技术人员只得撤离伊朗。这时，英美勾结起来，对伊朗实行了经济封锁，并采取禁运伊朗石油产品、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的存款等手段。英国还积极策划颠覆阴谋，利用反对党进行反摩萨台政府的活动。1952年7月，摩萨台一度被迫辞职。亲美的卡旺·萨尔塔奈继任首相，这引起全国性抗议示威高潮。7月21日，德黑兰发生罢工、罢课，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萨尔塔奈不得不下台。摩萨台重新执政。10月22日，伊朗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

英美在摩萨台政府屡次拒绝它们的要求之后，便加紧策划政变。摩萨台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不但不发动人民，反而压制群众的反帝运动。1953年8月19日，伊朗发生了一场美英支持的军事政变，摩萨台政府被颠覆，扎赫迪上台。美国立即承认它，并提供了援助。同年12月，扎赫迪政府宣布与英国复交。1954年8月，它又与国际石油财团达成协议，将伊朗石油资源交给了英、美、法、荷石油公司。其中美国五大石油公司获得40%的股份，英伊石油公司也得到40%的股份。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受挫。但是，伊朗人民的斗争没有停止。1973年，伊朗重新开展了石油国有化的斗争，废除了上述与国际石油财团签订的协定，收回了租让地的石油生产权、行政管理权和设备所有权。

第二节 巴勒斯坦问题和第一次中东战争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靠近苏伊士运河，扼亚欧非三洲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历来是大国角逐的地区。这个地区最早的居民是迦南人。公元前 12~前 11 世纪，犹太人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国家。此后，巴勒斯坦屡遭周围大国侵占，几经变迁。犹太王国灭亡后，公元 1 世纪前后，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公元 7 世纪后，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绝大部分居民为阿拉伯人。16 世纪后，巴勒斯坦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它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19 世纪末欧洲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鼓动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这一运动受到英国等的支持。在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期间（1922~1948 年），大批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美竞争日益激烈。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推行利用阿犹矛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排挤英国的政策，进一步卷入巴勒斯坦和中东事务。杜鲁门政府以“关心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命运”为名，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准许 10 万犹太难民立即移入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利用美国提供的金钱和武器，组织武装恐怖组织，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并且不顾英国的限制，组织移民，为建立犹太国家作准备。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处境日益恶化，被迫让美国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46 年 1 月组成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同年 4 月，该委员会提出一份“建议”，主张巴勒斯坦由联合国托管，并要求 1946 年内批准 10 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这个方案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犹太人也不满足。7 月，英美专家又炮制了一个把巴勒斯坦划分为四个省的“分省自治计划”。这个计划遭到阿犹双方的反对。犹太人希望分治后建立犹太国，阿拉伯人则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英国又提出贝文计划，因阿犹双方反对未能实现。

英国感到继续维持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已很困难，便于 1947 年 2 月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 年 9 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议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1 月 29 日，大会对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进行表决。最后，以美、苏等国 33 票赞成，阿拉伯等国 13 票反对，英国等 10 票弃权通过了这个分治方案，即《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 181 二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于 1948 年 8 月 1 日结束，此后两个月内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约 1.1 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带以及雅法市的阿拉伯区；犹太国面积 15,850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55%；

由亨利·格雷迪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和以赫伯特·莫里森为首的英国代表团拟订的计划，亦称“莫里森—格雷迪计划”。它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自治省（占面积 17%）、阿拉伯自治省（占面积 42%）、两个直辖省（耶路撒冷和内格夫）组成联邦制国家，由英国派高级专员管辖。

英国外相贝文在 1947 年 2 月 7 日向参加伦敦会议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建议，把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延长五年，逐步向成立单独国家过渡。贝文计划遭到阿犹双方拒绝。

两国在经济上实行一些联合；耶路撒冷及其近郊区（计 158 平方公里）是一个“在特殊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权国家，并由联合国管理”。这个方案明显地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分治决议通过后，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强烈反对。耶路撒冷城和一些阿犹混居的村镇爆发了阿犹双方的武装冲突。1947 年 12 月，阿拉伯联盟七国发表声明，宣布“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英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企图维护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权益。

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美国的支持，加紧筹划建立国家。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当时大卫·本-古里安就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国”。美国立即予以承认，接着苏联也表示承认。

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国建立的第二天，便与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爆发了战争，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初期，在阿拉伯五国军队联合进攻下，以军节节败退。埃及一支部队逼近特拉维夫，另一支部队越过内格夫，直插耶路撒冷南部。伊拉克军队渡过约旦河，前进到离地中海仅 10 英里的图勒卡姆。约旦的阿拉伯军团猛攻中路，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区，5 月 28 日，迫使当地以色列军投降。

以色列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几次急电联合国代表请求安排停火，并派遣梅厄夫人赴美求援。美国为了挽救以色列，给予它 7500 万美元的援助，用于购买武器，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安排了为期四周的停火，使以色列获得了喘息时间。

在停火期间（6 月 11 日~7 月 7 日），以色列从美法等国获得大批先进武器，军队由 30,000 人猛增到 60,000 人。阿拉伯国家却因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停供武器，不得不到欧洲市场上购买陈旧低劣的武器。加上各国统治集团之间陷入内部纠纷之中，没有对未来的战争进行认真准备。停火期间，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停火期满后，以色列发动进攻，转败为胜，十天内占领巴勒斯坦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7 月 15 日，安理会通过“无限期停火”决议。第二次停火期间，以色列又获得欧美国家的大量军援。一些国家还派遣“志愿兵”到以色列参战。以色列军队扩充到七万九千多人。10 月 15 日，以色列再次发动进攻。阿拉伯国家失利。12 月下旬，以军一度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

1946 年 2~7 月，在美国人本奇的调停下，以色列先后同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签订“停火协定”，分别设立混合停战委员会。历时 15 个月的巴勒斯坦战争结束。

以色列通过战争控制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土地，约两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定的要多 6770 平方公里。此外，约旦管辖了约旦河西岸 4800 平方公里土地，埃及管辖了加沙地带 258 平方公里土地。圣城耶路撒冷的新城区被以色列占领，旧城区由约旦控制。联合国分治计划中的阿拉伯国未能成立，七十多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失去家园，沦为难民。到 1950 年难民增至一百多万人。此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争端愈

这七个国家是：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

大卫·本-古里安（1886~1973 年），曾名戴维·格伦，1910 年始改名。生于波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早年参加劳工运动。1935 年当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负责人。以色列国成立后任政府总理。

演愈烈，中东局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第三节 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埃及共和国的建立

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社会发生新的变化，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宗主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在非洲一些地区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采矿业；为了满足战时对工业品和食品的需求，在非洲也发展了加工工业部门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因此，以矿业、加工工业和种植园为主的非洲经济获得较快的增长。非洲各国的雇佣劳动者、经济作物种植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人数也有增长。北非的工人人数从战前的约三百万人增加到战后的五百万人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人数，在同一时期从五百万人左右增加到八百余万人。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了各种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提出了政治和经济要求。在战前发展起来的“泛非主义运动”，启发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人才，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德意日法西斯的溃败，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英法这两个统治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国家的削弱，有利于战后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给了非洲独立运动以巨大的鼓舞和推动。

二次大战前，非洲仅有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其土地面积仅占非洲面积的7.8%。这三个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广大非洲地区仍然处在英、法、比、葡、西、意等殖民国家的统治下。战后初期，在非洲社会内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和 international 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民族独立运动在非洲大陆，首先是北部非洲兴起。

北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较早。大战结束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苏丹等国普遍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要求。

利比亚是战后非洲首先取得独立的国家。大战前利比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战时利比亚成为英法与德国法西斯交战的战场。1943年1月，英法分别占领了利比亚的一部分土地，建立军政府。美国军队也进入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1947年2月，根据同盟国对意和约，意大利不再享有对利比亚的统治权。战后利比亚各民族主义组织提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要求。1949年5月，英意秘密签订《贝文—斯福扎协定》，企图以大国托管为名瓜分利比亚。其内容为：英国托管昔兰尼加，意大利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则托管费赞；利比亚在十年后经联合国大会同意方可获得独立。这激起了利比亚人民的强烈反对。11月，的黎波里塔尼亚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同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利比亚的决议，规定利比亚在1952年元旦前独立。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亚联合王国。

苏丹是战后非洲第二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苏丹原为英国殖民地，1899年后英国殖民者以英埃共管的名义进一步加强对苏丹的统治和掠夺。1922年埃及的独立鼓舞了苏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苏丹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毕业

1969年9月1日，在卡扎菲领导下，发动了推翻利比亚的伊德里斯王朝的军事政变，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生大会”在二次大战期间提出了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战后苏丹各政党组织代表团到达开罗，向英埃谈判的参加者提出了结束英埃共管苏丹、成立苏丹民主政府等要求。1951年10月，埃及宣布废除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英国拒不承认。苏丹人民掀起了反英示威浪潮。英国玩弄“宪政改革”手段，一方面规定给予苏丹完全自治，另一方面将权力依然控制在英国总督手中。1952年埃及发生“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翌年1月，埃及新政府同苏丹各政党签订了承认苏丹享有自决权利的决定。英国被迫改变政策，1953年2月与埃及政府签订了英埃关于苏丹的新协定，规定为期三年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建立议会和民族政府。1954年1月，苏丹民族联合党组成民族政府。1955年12月苏丹议会通过了宣布苏丹为拥有主权的共和国的决议。1956年元旦，苏丹正式宣布独立，结束了英国殖民者在苏丹的长期统治。

战后，突尼斯、摩洛哥的反帝群众运动空前高涨。50年代中期，两国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终于迫使法国殖民者于1956年3月承认两国独立。

突尼斯是法国的保护国，战后法国对突尼斯的统治方式有一些改变。1945~1947年，法国殖民当局进行某些改革，增加了突尼斯人在咨询议会中的席位，并设立有突尼斯人任部长的部长会议。但法国总督仍为部长会议主席，部长会议秘书长由法国人担任，总揽政府的一切事务。“改革”是极其微小的让步。1950年底，突尼斯工人举行抗议总罢工；翌年12月，爆发反法武装起义。法国殖民者逮捕了突尼斯新宪政党、共产党和工会的领袖，查封了报刊。这引起了1952年的全面罢工。从这年初开始，突尼斯出现了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1954年春，在新宪政党总书记萨拉·本·优素福的领导下，突尼斯建立了民族解放军，开展了抗法游击战争。同年7月，法国政府声称准备承认突尼斯“内部自治权”。9月法国与突尼斯举行谈判。1955年6月签订给予突尼斯内政自治的法突协定，但规定20年后才允许突尼斯独立。

以优素福为首的一派新宪政党人反对法突“内政自治”协定，在北部边境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活动，并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人民反法武装力量配合作战。以布尔吉巴为首的另一派新宪政党人虽赞同关于“内政自治”的协定，但也认为，突尼斯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完全的独立，而达到独立的途径是采用和平的方式。1956年1月，新宪政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争取独立的决议。布尔吉巴与法国开始谈判。法国殖民者在突尼斯人民坚持斗争和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被迫于3月20日签订法突联合议定书，承认突尼斯独立。

大战结束时，摩洛哥仍处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它是法、西瓜分的“保护国”或“保护地”。摩洛哥苏丹及其下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然保留下来，但不过是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根据1912年的《巴黎公约》，北部丹吉尔划为国际共管区。战时美国势力渗入，战后摩洛哥境内又设立了许多美国军事基地。为了维护殖民保护制度，1946年3月，法国新任总督艾利克·拉朋在摩洛哥推行“改革计划”，他许诺改善摩洛哥人的地位，并对政府的司法制度进行某些改良。拉朋上任仅仅两个月便被许温将军取代。许温执行强硬的殖民政策，宣称法对摩的“保护”关系不可动摇，摩洛哥在任何

布尔吉巴（1903~）生于突尼斯莫纳斯提尔城，1921年加入突尼斯自由宪政党，从事独立运动。1934年另组新宪政党，任总书记。1956年突尼斯独立后，任首相。翌年突尼斯成立共和国，任总统，直到1988年。

时候都不会取得独立。摩洛哥人民在大战期间就为废除 1912 年的保护条约和争取独立而斗争。摩洛哥独立党于 1943 年 12 月成立，它提出废除保护条约、建立君主立宪的独立国家的斗争纲领。战后初期，摩洛哥人民要求独立的浪潮汹涌澎湃，以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本·优素福为首的封建上层人士也卷入这场斗争。1948 年初和 1950 年 10 月摩洛哥素丹两次致函法国总统，要求修改保护条约，代之以新的法摩协定，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1951~1952 年，法国殖民当局实行恐怖镇压手段，逮捕摩洛哥独立党和共产党人，将几十万人投入监狱和集中营。1953 年 8 月，又将支持独立运动的素丹优素福废黜，并流放到科西嘉岛，后放逐至马达加斯加岛。这激起摩洛哥人民反帝斗争新高涨。从 1954 年初开始，摩洛哥爆发武装反抗活动，1955 年初，组织了一支解放军。同年秋武装斗争席卷全国，特别是里夫和中部阿特拉斯山区。迫于形势，法国于 1955 年 11 月同意让优素福回国复位，并于 1956 年 3 月达成承认摩洛哥独立的协议，宣布废除 1912 年的保护条约。4 月，西班牙也承认摩洛哥独立和领土完整。独立后，1957 年摩洛哥定国名为摩洛哥王国。次年，收回西班牙占领的南部伊夫尼“保护地”。1960 年，收复了对丹吉尔的主权。

阿尔及利亚是法属北非的重要殖民地 and 战略基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量移民，掠夺土地，实行同化政策，将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突尼斯、摩洛哥独立后，法国力图保住这块殖民领地。大战结束时，阿尔及利亚也掀起要求独立的浪潮。1945 年 5 月 8 日阿尔及利亚各城市居民和退伍军人举行庆祝胜利和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遭到法国当局的血腥镇压。1947 年，阿尔及利亚再次爆发要求独立的群众运动，有 10 万人参加。在独立斗争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组织诞生，其中有 1946 年 4 月成立的“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和 11 月成立的“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反帝群众运动持续发展，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强大。1954 年 8 月，“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中的比较激进的青年党员组成了“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起了反法武装斗争的旗帜。

1954 年 11 月 1 日，数千名阿尔及利亚爱国青年在二十多个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接着，他们以奥雷斯和卡比利亚等山区为基地，把武装斗争推向全国。从此阿尔及利亚的反帝运动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抗击着几十万法国殖民军的围剿、扫荡。1958 年解放军发展到 13 万人，武装斗争波及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同年 9 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

战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反帝反殖斗争也逐步发展起来。1947 年 3 月，法属马达加斯加岛爆发了民族起义，占全岛人口 70% 的 100 多万居民投入斗争。法国军队利用飞机、坦克屠杀了 90,000 多起义者，逮捕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监禁了 20,000 人，到 1948 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952 年，英属东非殖民地肯尼亚掀起了反对白人殖民统治、要求土地和自由的武装斗争，又称为“茅茅运动”。这个运动早就在当地吉库犹族农民中秘密开展，口号是“把白人抢去的土地夺回来”。宣誓参加斗争的农民和

“茅茅”之意，其说不一。一说为当地人举行反英秘密宣誓时，在门外放哨儿童发现敌情时常发出“茅—茅”（Mau-Mau）的呼喊声，以作警告，由此得名。

城市下层群众超过 100 万人。起义部队以阿伯德雷山和肯尼亚山为中心，最多时达 15,000 人。1952 年 10 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肯尼亚全境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乔莫·肯雅塔等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领导人，对参加“茅茅运动”的农民进行大规模镇压。1956 年，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司令基马提被俘，翌年被处死。英国殖民者虽然将肯尼亚人民的反抗斗争淹没在血泊中，但阻止不了英属东非和整个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七月革命和埃及共和国的建立 埃及地跨亚非两洲，苏伊士运河位于其境内，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埃及不仅有古老的文明，而且从近代以来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高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它历来是帝国主义激烈角逐的场所，又是西亚北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2 年，英国虽承认埃及为独立国家，但保留了四项殖民特权。即英军驻守苏伊士运河地区，保留保护埃及国防和国防线的权利，保护埃及境内外侨及其财产的权利，保持英国对苏丹的管理权。1936 年英国迫使埃及签订为期 20 年的《英埃同盟条约》，把上述四项特权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使英国对埃及的军事控制合法化，加深了埃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

二次大战期间，英国依据 1936 年条约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埃及。埃及虽迟至 1945 年才向轴心国宣战，但埃及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战场。英国利用埃及作为军事基地，征用埃及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使埃及的农业受到影响，造成粮食减产，连年歉收。由于战时商品输入锐减，英美军队进驻和军事订货增加，使埃及国内市场需求量扩大，这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战后初期，埃及工商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达到 150 万人，其中产业工人 57.8 万人。

大战结束后，英国军队拒不撤出埃及，腐败的法鲁克王朝又利用英国的支持实行专制统治，因此战后初期埃及人民斗争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废除 1936 年英埃条约，要求英军撤走，争取完全独立和自由。

1945 年 12 月，埃及政府向英国提出修改 1936 年条约的要求，但遭拒绝。这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英浪潮。1946 年 2 月 9 日，数千名开罗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在阿巴斯大桥遭到英军的血腥镇压，死伤很多人，酿成“阿巴斯大桥惨案”。埃及工人和学生联合组成“工人学生全国委员会”，统一领导反英斗争，并宣布 2 月 21 日为“英军滚出埃及斗争日”。这一天，全国爆发了总罢工和总罢课，10 万开罗群众上街游行，高呼“英军滚出埃及”和“打倒法鲁克”的口号。游行群众在解放广场遭到英军的残酷屠杀。3 月 4 日，又一次爆发了反英大示威。在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冲击下，英国军队被迫撤出开罗和亚历山大，退入运河区。

在 1948 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打败。战争充分暴露了法鲁克王室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普遍的不满。1950 年 1 月经过选举上台的华夫脱党政府又继续执行软弱的谈判政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与英国政府进行的外交谈判毫无成效，更引起群众的愤懑。由于谈判的失败和人民斗争的压力，1951 年 10 月，华夫脱党政府才不得不通过埃及议会宣布废除与英国签订的 1936 年条约和 1899 年共管苏丹协定。

英国立即宣布不承认埃及议会的决议，同时派遣军队，增兵运河区，并占领埃及的一些城市和战略据点，这激起更大的反英风暴。运河区的数万埃及工人宣布总罢工，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开展抵制英货运

动。成千上万的爱国者参加游击队，开展反对英国占领者的武装斗争。

1952年1月26日，开罗50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英埃矛盾空前激化。这时，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制造了开罗纵火暴乱事件，焚毁了许多建筑物，包括一些外国企业及其办事机构，其目的在于迫使主张废除英埃条约的华夫脱党政府下台，并借口保障外侨生命财产，坚持长期占领埃及。1月27日，法鲁克国王解散了华夫脱党政府，任命前宫廷大臣、亲美分子马赫尔为首相。马赫尔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全国戒严，设立军事法庭，逮捕大批爱国人士。1952年上半年，埃及政局不稳，五个月内内阁更迭了五次。法鲁克王朝已无法再继续统治下去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埃及“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是由“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这个组织成立于二次大战时期，它的成员大多为青年军官。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该组织成立之初，主要是在军队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并秘密建立基层组织。1946年纳赛尔向该组织发布指令，要求在军队中扩大政治影响。但当时还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其目标限于帮助国王驱逐外国势力。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期间，国王及卖国集团竟然把大批破旧武器运往前线，使埃及军队遭到惨败。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终于丢掉了对国王的幻想，宣布他们“最大的战场，还是在埃及！”此后，自由军官组织为推翻王室政权进行了准备。1950年，自由军官组织选出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纳赛尔任主席。到1952年初，该组织成员达数百人，遍布各军兵种。

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政变，扣押了高级军官，控制了开罗，接着占领了国王行宫所在地——亚历山大港，包围了王宫。26日，法鲁克国王宣布退位，逃往意大利。统治埃及16年的法鲁克王朝寿终正寝。

七月革命后，自由军官组织执委会改组为“革命指导委员会”。8月4日，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纳吉布将军参加了革命指导委员会并担任主席，纳赛尔为副主席。9月组成新政府。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理。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政权后，颁布了将革命引向深入的施政纲领。新政府没收了封建王室的土地，取消了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1923年宪法，清洗了腐败的国家机构，禁止一切政党的活动，建立解放组织作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

1952年9月，颁布第一个《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本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200费丹，超过部分由政府征购卖给农民。贫雇农有优先购买权，每户可买2~5费丹。此外，还规定地租为收成的50%。佃约不少于三年。这个土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改善了一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

1953年2月10日，公布了过渡时期的临时宪法。6月18日，正式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共和国。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为副总理。翌年4月18日，纳赛尔取代纳吉布任总理，并重新担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1956年6月23日，制定新宪法，纳赛尔正式当选为埃及共和国总统。至此，埃及七月革命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获得巩固。

第四节 战后初期拉丁美洲的形势。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建立

战后初期拉美的经济政治状况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拉美许多国家向法西斯轴心国宣战。拉丁美洲国家向同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原料和物资，墨西哥和巴西派遣军队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丁美洲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相反，大战在客观上有利于拉美各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出口贸易的发展。通过没收轴心国的企业，赎买外资企业，新建本国工矿企业，拉美各国民族经济增长，民族资本的力量增强。1939~1945年，整个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加30%~35%，黄金和外汇储备从1939年的七亿多美元增加到1946年的三十多亿美元。战时，西欧国家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急剧削弱，德意法西斯几乎丧失了了在拉美的所有阵地，英法对拉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也大为缩减。美国利用这个时机，以“泛美合作”为旗号，排挤欧洲列强，大力向拉美扩张，进一步增强了在拉美的势力和影响。1945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会议上，通过《查普德庇克公约》，规定美洲国家军事互助的原则，实行“西半球联防”，加强了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军事控制，为美国在战后向拉美大举扩张准备了条件。

大战后期，美国就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筹备方面向拉美渗透。美国制订了“克莱顿计划”，提出美国同拉美国家实行所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的原则，使美国商品可以自由倾销，其资本可畅行无阻，从而为美国垄断资本向拉美的扩展铺平了道路。战后，1947年美国与拉美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缔结《泛美互助条约》，以“共同防御”为名，将拉美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之内。1948年，在波哥大召开的第九次泛美会议上，又将“美洲共和国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以加强对拉美国家的政治军事控制。1949年1月，杜鲁门提出“援助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用经济援助作为手段，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为口号，进一步向拉美扩张势力。从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军事政变、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方式，在拉美一系列国家扶植亲美军人独裁政权。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建立了四百多个军事基地，其军事顾问团驻扎在许多拉美国家。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在联合国内，一些拉美国家成为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上的“重要部件”。

战后拉美国家农村依然保存着封建大地产权制，这是帝国主义掠夺拉美人民的支柱。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支持拉美各国的大庄园主，而且直接掠夺、霸占拉美各国大量的土地，这使拉美各国土地集中状况比战前更为严重。在中美洲，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就霸占了588,965英亩的种植地，它拥有自己的武装、行政组织、警察、法庭和通信系统，并在公司领地内修建了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铁路，控制了许多海轮，对中美洲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并利用其政治经济势力，干涉中美洲各国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当地人民称它为“绿色魔鬼”。土地的集中和封建奴役的加深，阻碍了拉美农业的发展，加

即《美洲经济宪章》，1945年2~3月间，由美国操纵的美洲国家第四次外长协商会议通过。

联合果品公司于1898年成立，逐步发展为掠夺拉美农产品的大垄断公司，由波士顿财团控制。1970年7月与美国机器公司合并，改称“联合商标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

剧了农村的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政权的斗争。战后初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拉美各国工人阶级人数增加。采矿和交通运输业工人由1940年的640万增加到1955年的1160万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提高，成为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农民和农业工人的觉悟也有了普遍提高，不少国家建立了农会组织。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发展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长，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在此基础上，拉美各国反对美国控制与奴役、反对反动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运动日益发展起来。

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和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建立 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和扩张主义，美国垄断财团的奴役和掠夺，以及一些国家亲美独裁政权的统治，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反对美国的控制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成为战后初期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

为了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掀起了国有化运动的浪潮。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等十多个国家将部分外资企业，如铁路、电话、煤气、城市运输、矿山等收归国有。这个运动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府发动，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壓力。有的国家还实行土地改革。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将联合果品公司霸占的部分土地及一些企业没收。为了维护领海权和保护本国海洋资源，拉美国家首先兴起维护海洋权的斗争。1945年10月，墨西哥总统发表关于大陆架问题的声明，要求享有单方面采取措施保护公海区生物资源的权利。翌年，阿根廷、巴拿马都提出把国家主权扩大到沿海大陆架的要求。1947年秘鲁、智利率先提出200海里“海洋区”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要求。随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也提出类似要求。这是60~70年代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的前奏。

为了争取外交自主权，有的拉美国家采取了抵制美国控制和干涉的措施。1946年2月，庇隆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庇隆政府采取了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在对外关系上提出奉行“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的政策。它宣布阿根廷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各国互相尊重，任何国家不得公开或隐蔽地干涉与阿根廷主权有关的事务。为了与美国抗衡，庇隆上台后迅即与苏联建交。庇隆认为巩固泛美精神的最好办法是结束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掠夺，因此，他在泛美会议中不时提出与美国不同的主张，抵制美国在西半球组织军事联盟的政策。庇隆政府虽然在1955年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但拉美国家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却日益增强。

战后初期，拉美国家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也不断发展。工人罢工频繁发生，50年代中期规模日渐扩大。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1954年为740万，1956年增至970万。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汹涌澎湃，有的国家发生了农民起

胡安·多明戈·庇隆（1895~1974年），出身于畜牧业主家庭，1911年入阿根廷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军职，1941年任上校团长，秘密建立“联合军官团”。1947年，其支持者建立“庇隆主义政党”。1946年、1951年和1973年三次当选总统。

义和暴动。1949年哥伦比亚农民开展了游击战争，1950年组成游击队，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一度控制了居民近70万的地区。1952年委内瑞拉农民也发动了夺取土地的武装暴动。同年4月9日，玻利维亚掀起了以锡矿工人为主力的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工人、学生与农民并肩战斗，同政府军进行了三天的激战，终于推翻了亲美的巴伊维昂军事独裁政权。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人组成的新政府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于1952年10月31日将以美资为主的三大锡矿公司收归国有，并建立国营“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同时，新政府在农民运动推动下，答应了农民实行土改的要求。

危地马拉是中美洲的重要国家，盛产咖啡、香蕉和棉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步取代英国和德国，将危地马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霸占了危地马拉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许多大香蕉种植园。特别是1931年右翼军人乌维科攫取政权后，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形成危地马拉的“国中之国”。1944年危地马拉爆发了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乌维科政权垮台。革命后政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手中。同年12月，阿雷瓦洛博士当选为总统，1944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陆军上尉阿本斯任国防部长。

阿雷瓦洛政府颁布了新宪法，实施了一系列民主改革。1946年通过社会保险法。1947年颁布劳动法。此外，恢复了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允许政党自由活动（共产党除外）。对外与苏联建交，并对联合果品公司的某些违法行为进行斗争。阿雷瓦洛的改革比较温和，没有触及美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根本利益。但是，危地马拉的改革仍然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力反对，它们勾结起来，多次阴谋颠覆阿雷瓦洛政府。

在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1950年11月阿本斯（1913~1971年）当选为总统。阿本斯执政后，实行了比较激进的改革。1952年6月，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法令规定：本国大庄园主和外国公司所有出租土地，凡面积在180公顷以上，或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没有耕种的大庄园，均分配给农业工人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政府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负责土改工作。到1954年年中，将55万多公顷的土地（其中有16万公顷是没收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分配给55,700名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政府还将贷款与耕牛送到贫穷农民手中。为了摆脱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阿本斯政府对联合果品公司进行了斗争。危地马拉国会通过了限制美国垄断资本活动的法令。在经济上采取了修建公路网、港口和国营水电站等措施，以增强民族经济力量，打破美国资本的控制。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了比较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坚决维护危地马拉的民族利益。

阿本斯政府的民主改革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惧怕这个民主进步政权的存在，力图颠覆它。1954年6月18日，在美国策划下，前联合果品公司雇员阿马斯率领一支雇佣军从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与国内右翼军人势力相勾结，推翻了阿本斯政府。危地马拉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虽然夭折，但是拉美人民民族民主运动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仍继续发展，并达到新的高潮。

第六章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影响

第一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

新科技革命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取得了飞跃发展。它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它以牛顿力学为理论，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促使纺织、化工、采掘、冶金、机器制造等部门迅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它以法拉第、麦克斯韦的电磁学为理论先导，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推动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讯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比蒸汽机时代大得多的生产力。

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意义更为深远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的前提是四项重大科学发现。虽然有些项目在战前已被发现，但战争妨碍了它们的发展和应用。只是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科学发现的重大意义才充分显示出来。

第一项重大发现是爱因斯坦在战前提出的相对论。过去，物理学都以牛顿的理论为基础，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两者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似乎宇宙间存在着一个永远走动着的“大钟”，在任何情况下，它的速率永远都是相同的，世界上的一切运动在时间上都以它为度量标准。爱因斯坦通过实验和思索得出结论说，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爱因斯坦指出，在接近光速的情况下，运动着的尺子要缩短，运动着的时钟要变慢。换句话说，牛顿定律在高速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但在常规下因影响甚微，可视其为正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基本理论意义，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对微观和宏观领域以接近光速运动的现象的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一理论在原子能工业部门得到应用。

第二项重大发现是量子力学。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首先提出量子假说。认为物体在发射和吸收辐射（即电磁波）时，能量的变化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这一份份的能量就是量子。随后，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把量子论用于原子结构的研究，证实原子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电子在不同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到内层轨道时就放出相应波长的电磁波。2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和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等创立了物理波理论，指出电子和一切物质粒子都像光一样，既具有连续的波动性质，又具有不连续的粒子性质。对于电子等微观运动，牛顿力学已不适用，必须代之以从量子概念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海森伯、薛定谔创建的完整量子力学成功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它解决了原子结构以及原子中电子运动的问题。它为元素周期律提供了物理解释。它对于了解原子如何结合成分子、阐明分子的性质提供了理论武器。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形成量子化学，能够设计具有特定性能分子。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结合形成原子核物理学，指导制造原子弹、氢弹和建立核电站。量子力学还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项重大发现是分子生物学。它是在物理学和化学影响与渗透下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的生物学科。它的核心是通过对生物体的主要物质，特别是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研究，探讨生命现象的本质。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摩尔根提出染色体学说，说细胞核中的染色体

带有遗传基因。1944 年美国艾弗里等发现脱氧核糖核酸携带着遗传信息。1953 年，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核酸的分子结构》一文，提出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这以后，分子生物学发展很快，在人工合成蛋白质和核酸，测定蛋白质、酶、核酸的化学结构和空间结构，了解这些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有很多成果。

第四项重大发现是系统科学。20 世纪初以来，各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学科愈分愈细，分支学科愈来愈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又互相渗透，相互交叉，使自然科学整体化。系统科学就是对各种客观存在采用从整体上研究它的客观特性的学科。它主要包括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这几种理论几乎同时在 40 年代发展起来。美国数学家维纳研究如何使一个系统按照事先规定的目标进行运动，如何根据信息反馈不断调整控制某一系统的运动。1948 年他出版了《控制论》，标志着控制论的诞生。美国数学家申农研究如何把各种信息存储、传输和转换，1948~1949 年发表两篇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和《噪声中的通信》，为现代信息论奠定了基础。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 1948 年提出了一般系统论，探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这三个理论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在探讨各种不同系统所遵从的一般理论，分析所有系统所应具有的概念、规律等。系统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各种具体的系统工程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在四项重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上，战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航工程、生物工程方面都有惊人的发明和突破。

早在 30 年代，科学家就发现了铀核裂变的现象。一个铀的重原子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裂变为多个较小的原子核，同时放出大量的能量。1 克铀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烧 3 吨煤或 200 公升汽油，其爆炸力相当于 20 吨黄色炸药。1942 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领导建立了第一个核反应堆，实现了持续裂变的条件。从此，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时代。原子能首先用于军事目的。1945 年 7 月，在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下，美国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49 年，苏联宣布制成原子武器。英国在 1951 年 10 月，法国在 1960 年 2 月，中国在 1964 年 10 月，分别试爆了各自的原子装置。在这期间，科学家又发现了核聚变。两个轻原子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聚合成一个重原子核，如两个重氢原子核可以聚变成为一个氦核，同时放出比核裂变更大的能量。根据核聚变原理，美苏先后在 1952 年、1953 年制造了氢弹。英国在 1957 年试制成功。中国和法国则分别在 1967 年和 1968 年试爆成功。原子能也用于和平建设方面。1954 年，苏联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随后美英法等国也跟了上来。到 1992 年，在全球发电总量中，原子能发电量占 17%。全世界共有 424 座核发电站，分布在 30 个国家中。核能发电量在全国耗电总量中，比例最高的是法国，占 72.9%，其次是立陶宛和比利时，分别占 60% 和 59.9%。原子能具有其他能源所不具备的优点，它被用作人造卫星和船舶的能源。它还被用于工农医各方面，用来探伤、查矿、改变遗传特性、杀伤癌细胞、形成高分子的材料等。其应用领域和重要性愈来愈扩大。

电子计算机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技术成果之一。1946 年，美国工程师埃克特和物理学家英奇列等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从那时起，至今不过 40 年，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是极其惊人的。大约每过八年至十年，计算机的运行速度

和可靠性就提高到先前的十倍，体积和成本则缩减到先前的十分之一。按照电子元件的发展，人们把计算机的发展划为五代。第一代是电子管时代（1946~1956年），机器运行速度一般是每秒几千至几万次。第二代是晶体管时代（1956~1962年），由于计算机的造价大为降低，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从军事部门扩大到工农业和商业部门。第三代为集成电路时代（1962~1970年），这一时期的计算机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即计算机小型化。第四代为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1970~）。美、苏、中等国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出每秒1亿次的计算机。目前少数国家正在向第五代计算机努力，它的方向集中在人工智能机（机器人）和运行速度超过每秒10亿次的巨型机。据1982年统计，全世界投入使用的可编制程序的机器人约有3.1万台，其中日本居首位，拥有1.3万台，美国6250台，联邦德国3500台。电子计算机具有存贮数据和记忆的能力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判断等功能，并且运算速度快、计算精度高。它作为一种自动、高速、精确的运算、控制和管理工具，已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国防，甚至家庭日常生活中。电子计算机已代替了人的一部分脑力活动，因此人们把它称为电脑。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使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1993年，美国提出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要以现代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光导纤维缆为骨干，建立起纵横全国各地的双向大容量和高速度电子数据传递系统。这一全国性信息网络的建成，不仅将大大推动科技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准则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宇航工程是战后另一项重大突破。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重83.6公斤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空间轨道，开创了空间科学技术的新纪元。1958年1月，美国也发射成功。这以后，法国（1965年11月）、澳大利亚（1967年11月）、日本（1970年2月）、中国（1970年4月）、英国（1971年10月）也发射了各自的人造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载人卫星上天。加加林在地球空间轨道上运行100分钟，安全返回地面，谱写了人类宇宙航行的新篇章。1962年2月20日，美国人格伦环绕地球飞行成功。这以后，美国加速发展宇航工程，于1969年7月16日发射“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上降落一个登月舱。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最早在月球上行走的两个人。苏联朝另一个方向努力，1971年，发射第一个航天站。1977年9月到1982年7月，苏联礼炮六号航天站在地球轨道上停留四年十个月，并先后与31艘飞船相接。美国则于1981年4月发射可以重复使用的太空运输工具航天飞机。此后，苏、英、日等国也在研制航天飞机。70年代后，各国发射很多军事卫星，利用遥感技术侦察他国的军事情况。各国还把空间技术用来为科研生产服务。1960年美国发射第一颗气象卫星后，苏、法、日等国都发射了这类卫星。截至1983年底，全世界已经发射了154颗气象卫星。1962年，美国发射“水手一号”探测金星。以后，各国发射了大量的天文探测器，飞往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1965年，美国发射联系美国与欧洲的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到1986年，天上的同步通信卫星因轨道所限，大约有二十个。它组成了全球通信网，使人们可以迅速获悉在地球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1972年后，美苏等国发射了多颗地球资源卫星，用来估计农业产量，调查土地和农村资源，研究地质断层，监测火山爆发和地震，寻找地下矿藏，研究海洋和鱼群，监视污染等等。除此之外，人们利用外层空间无重力、无菌、无尘、无对流的条件，加工制造地

球上无法生产的特殊材料。

生物工程是战后科技革命的另一重要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遗传工程。它用人工方法把不同生物的核酸分子取出来，在体外进行切割，彼此搭配，重新缝合，再放回生物体内，从而改变其遗传物质的结构和某些遗传特性，使它产生人类需要的新的生物物种和类型。1973年，科学家把脱氧核糖核酸重新拼接后引入大肠杆菌获得成功，产生了人类需要的激素。这以后，遗传工程蓬勃发展起来。科学家估计，用遗传工程技术的方法育种将会比自然进化快1亿到10亿倍，并且可以准确地定向改变生物遗传特性。生物工程的其他方面如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也取得很大进展，促进了农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医药事业的发展。

激光科学技术是在近代量子物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激光是一种特殊光源。它的特点是亮度高，可以比太阳亮度高200亿倍，其次是方向性强，单色性好。1960年美国学者梅曼用红宝石制造出第一台激光器。激光技术以后有很大发展，并渗透到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开始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如激光光谱学、激光化学、激光生物学等。激光技术广泛应用于工、农、林、医各部门和军事方面。用激光通信，容量大，保密性好。用激光在宝石上打孔可提高工效几十倍。用激光可焊接视网膜，也可烧毁对方的导弹等武器。用激光测时几万年只差一秒，测地球和月亮间的距离，误差只有几厘米。炮弹安上激光寻的器，命中率可提高百倍。

战后，材料学技术蓬勃发展。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三大合成材料虽在战前已经问世，但是真正的广泛使用是在战后。它们的产量成百倍增加，性能和质量有很大改善。为了适应科技和生产发展的要求，新的合成材料不断增多，1976年世界有各种材料25万种，1982年增为33.5万种。新材料包括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及新型功能材料三大类。70年代，发明了各种能传递、记录、贮存信息的信息材料，研究出新型陶瓷、非晶态材料、超导材料等新能源材料。80年代中期以来又产生高性能结构复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新型合金材料等新型功能材料。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为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海洋科学技术在战后有了长足进步。各国都在积极开采海底石油和天然气。1950年，海上油田产量仅占全球产量的5.5%，1980年就猛升为22%，达到6亿吨。此外，随着海洋捕捞技术的现代化，人们已在议论限制捕捞量的问题，并积极探讨海洋生物开发问题。各国科学家还研究深海采矿以及利用海洋的波浪、海流、潮汐、水温和盐度来发电。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

第二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及其深远影响

新科技革命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同历次科技革命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它不是单项出现，逐步扩展，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飞跃发展。过去无论是力学、电磁学的突破，还是蒸汽技术、电气技术革命都基本是单项出现，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而这次是成群地出现。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兴科学技术。20世纪60年代科技的新成果比过去两千多年的成果总和还多。美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估计，19世纪知识在50年内增加一倍，20世纪40~50年代是十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五年增加一倍，80年代则是三年增加一倍。目前物理、化学、工程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90%以上是1950年以后积累的。具体讲，战后科技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1945~1955年的第一个十年是以核能的释放和利用为标志，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期。1955~1965年的第二个十年是以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为标志，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飞向外层空间的进军。1965~1975年的第三个十年是以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实验的成功为标志，开始了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1975~1985年的第四个十年是以微机处理机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章。1985~1995年的第五个十年是以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为标志，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

第二，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出现高度综合的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科分化日益精细，学科分支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使学科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前进。在相互渗透综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边缘科学，如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地球化学、生物电子学等。除了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数学和系统科学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使后者日益具有量的精确性。许多自然学科如环境科学、城市建设、生态平衡等则需要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这种跨专业跨学科界限的大综合使科学日益整体化。

第三，科学、技术和生产密切结合，出现三者一体化的趋势。过去，科学、技术与生产三者的发展往往是分离的，或者是科研成果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运用到生产中去，或者是技术革新后相当长时间才能得到科学理论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进步很快就转化为强大的技术力量，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涌现出众多的新工艺、新产品、新部门。据美国国会分析，科学技术的成果从发现发明到实际应用所经历的平均时间，20世纪初为35年，两次大战之间为18年，二次大战后为9年。具体讲，蒸汽机为80年，电动机为65年，电话为50年，飞机为20年，原子弹为6年，电视为5年，晶体管为3年，激光为1年。战后，科学理论的提出、技术上的突破和生产上的应用愈来愈成为统一的过程和整体，三者互相促进。目前世界强国既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又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地区。

新科技革命的深远影响 这次新技术革命不是在个别或少数领域中的突破，而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和生产部门中的全面跃进。因此，它的影响极其巨大、深远。

首先，新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欧

美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已建立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一般认为，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会降下来。而社会主义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也将难以保持原有的高速度。但是，事实与预计的正相反。二次大战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加快了。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年均增长率(%)		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工业	1913~1938年	6.8	1.7	1.7	0.4	1.6	7.1
	1951~1980年	8.7	4.1	2.4	4.7	5.7	11.1
农业	1913~1938年	1.0	1.1	0.9	—	0.0	1.1
	1951~1980年	3.2	2.0	2.4	2.3	2.0	2.0
国民生产总值	1913~1938年	4.7	2.0	1.1	0.9	1.6	4.7
	1950~1972年	5.4	3.8	2.5	5.2	6.0	9.9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13~1938年	3.8	0.8	0.7	0.8	1.1	2.7
	1950~1972年	3.9	2.3	2.1	4.2	5.0	8.7

* 二次大战后指联邦德国。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国家在各个项目上，战后的年均增长率都比战前高，并且在多数项目上高出一倍以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当代衡量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排除了领土和人口变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偏概全现象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标志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二次大战以前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在 1000 美元左右，到了 80 年代猛升到 10,000 美元左右。不到半个世纪，增长了 5~10 倍。其中，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 1940 年为 1886 美元，1983 年升为 13,887 美元。在同一时期内，日本人均产值从 554 美元增为 8973 美元，苏联则从 510~542 美元升为 2655 美元。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改善了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1951~1979 年期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苏联的年均增长率为 5.8%，美国 3.2%，日本 8.9%，联邦德国 4.5%，法国 4.5%，英国 2.8%。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采用生物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在一些国家中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工业。1945~1975 年期间，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 4.5%。1945 年，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供养 14.6 人，1977 年增为 56 人。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金的增长转为主要靠技术的提高和组织的改善。换句话说，集约因素代替粗放因素，在二次大战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下列表格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

粗放和集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各自所占的比重（%）

	1909 ~ 1911 年	1919 ~ 1929 年	1948 ~ 1953 年	1953 ~ 1957 年	1962 ~ 1971 年
粗放因素的 比重	60.5	54.8	48.9	31.8	24.8
集约因素的 比重	39.5	45.2	51.1	68.2	75.2

第二，新技术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类社会最初第一产业，即农、牧、林、渔业十分发达。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第二产业，即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发展起来，产值超过第一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工农业产品大量增加，可以把更多的人力投入到不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如商业、金融、服务行业等。当前，经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产值都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总和。1982年，美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第二产业占31.7%，第三产业占65.8%。同一年，英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2.8%，法国为61.6%，联邦德国大约为60%，日本为53.8%。苏联的第三产业不够发达，1982年的产值仅占全部产值的23.8%。

新技术革命也影响到工业内部的结构。在经济发达国家，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相对萎缩，而电子、化工、航空、计算机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许多“重、厚、长、大”的产品逐渐为“轻、薄、短、小”的产品所代替。此外，企业的规模也发生变化。规模巨大的企业虽然仍在发展，但是，能够反映时代潮流要求、迅速采取最新科技成果的中小企业增长得更快。企业日益向小型化、多样化、分散化的方向发展。

新技术革命使农业生产日趋工厂化、专业化。在经济发达国家，肉鸡生产完全由养鸡场进行，并且分工很细。种植业中则出现专营耕种、土壤化验、施肥、播种、植保、收割、储运的农业公司。农业不再是一个主要靠体力劳动进行生产的部门，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了工业生产的特点。在美国每个农民平均占有的生产资金从50年代的9400美元猛升为80年代初的17.26万美元。这个数字超过美国工人平均占有生产资金的数目。

第三，新技术革命使居民的结构和生活状况发生剧烈变化。首先，城市人口猛增。1950~198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4%增为80.6%，英国从77.9%升为88.4%，联邦德国从70.9%升为84.5%。法国自30年代以来长期城乡人口各占一半，二次大战后，这一情况被打破，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55.4%升为1980年的78.9%。苏联、日本的城市人口比重在1950年仅占39.5%和35.8%，到1980年猛增为65.4%和64%。在发达国家中，不受城市影响的大片农村不见了。居民成分的另一变化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减少，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增多。在美国，从50年代起白领工人就超过了蓝领工人。1981年，蓝领工人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1.1%。

新技术革命使居民生活水平发生较大变化。各国职工工资大幅度提高。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的周平均工资，1950年为53.13美元，1980年升为235.1美元，30年内增加3.4倍。苏联职工的月工资，从1950年的64.2卢布升为1980年的168.9卢布，增加1.6倍。更值得提出的是，居民得到可

靠的社会保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从无产阶级政权一建立起就实行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西欧各国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在二次大战后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美国则到 60 年代末才实行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险。各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保障，对年老、患病、失业者提供补助。这是社会保障的最基本内容。二是社会救济，对贫困者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三是社会工作，对教育等社会事业提供支持。居民得到这三方面的保障，或如一些人所说，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基本上解除了对温饱问题的担忧。这是社会一大进步，它的取得是同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生产发展、物资丰富分不开的。

第四，新技术革命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加强和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主张自由经济、自由竞争，反对任何外来干预。但是，二次大战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当然，各国的干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西欧各国受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将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部门和宇航等现代科技尖端部门收归国有。到 80 年代，工业中国营企业的比重，最高的是法国，达到 40%；其次是意大利，为 35%；奥地利居第三位，为 28%。此外，联邦德国占 21%，英国占 11%。美国和日本则基本没有实行国有化政策。法、日等国还制定全国性的经济发展计划，虽不是指令性的，但具有指导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最通常手段是对财政和金融的调节。政府通常不以财政平衡为目的，而是追求经济稳定，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为此，政府在财政政策上采取增加或减少税收、扩大或缩减政府开支、发行公债、冻结财政盈余等措施。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央银行采取提高或降低各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调整利息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等措施。由于上述各种手段的作用不同，遇到的阻力大小不一，产生的副作用各异，各国政府通常不单采取某一项措施，而是多种措施搭配，采取时间也前后不一，以刺激或遏制生产和个人的消费，使通货膨胀和失业保持在“安全限度”之内。此外，政府还通过经济立法来调整经济，如外资法、加速折旧法、反托拉斯法等。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减少行政干预，注意发挥经济规律作用。在所有制方面，除维护重要经济命脉的国有化外，鼓励集体经济发展，允许小私有经济存在。在管理方面，放松中央指令性计划，强调商品、市场的作用。在分配方面，努力打破平均主义，实行物质刺激原则。在国际往来方面，发展对外贸易，注意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

第五，新技术革命使经济生活进一步国际化。战后，各国在资金方面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到 1986 年底，美国的海外投资共计 10,700 亿美元，而外国在美投资也多达 10,330 亿美元。发达国家也需要外国资金的流入。此外，各国间的科技、信息交流，专利的买卖已是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因素。世界市场的作用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闭关自守。美国经济学家德鲁克认为，“一国经济成败取决于能否利用世界经济变迁。”随着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战后出现了地区性经济共同体，并不断向一体化发展。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经济组织、经济协定多不胜数。美、加、英、法、德、意、日七国政府首脑和财政部长定期开会，研讨制定政策，

调整相互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话，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对话也不断加强。一切现象表明，新技术革命促进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迈进。

最后，新技术革命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它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像在经济方面那样直接、明显。人们对它的影响范围与深度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总的讲，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旧的殖民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了，这是亚非人民斗争的成果。同时，也是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不适应现代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宗主国攫取利润。因此英法等殖民帝国在不少地区废除了直接殖民统治，允许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其次，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人类面临着遭受大规模破坏和毁灭的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蓬勃开展，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日益高涨。同时，各国对世界战争采取慎重态度。冷战趋于缓和，对峙为谈判、对话所代替。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多年仍未爆发新的世界战争。新技术革命还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更合理地利用天然资源，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科技革命要求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更广泛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合作。

第七章 5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

第一节 美国经济的发展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 五六十年代，是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的速度比受战争破坏严重的日本、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为低，但比英国为高，也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战时最高额的1945年是3552亿美元。战后略有下降，朝鲜战争爆发后重新上升，到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128亿美元。此后连续上升，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上升得更快。从1961年到1969年，经济持续高涨。1965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9.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高达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为2579美元，被称为“繁荣的十年”。作为美国经济三大支柱的钢铁、汽车和建筑业，战后仍然继续发展。整个50年代，汽车销售量年平均接近700万辆，60年代则超过900万辆。1940年和1970年之间，小汽车由2750万辆激增到9000万辆，由平均每五人一辆增至几乎每两人一辆。战后蓬勃兴起的石油、化工、天然气、电子、航空和宇航、原子能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为迅速。化学工业增长的重要原因是用化学方法加工和生产一整批新工业品——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洗涤剂、药物、杀虫药剂等的结果。30年代电子工业主要生产收音机和通信设备，其产值在1939年不过5亿美元。战时和战后技术革命的结果，使1969年电子工业的产值接近150亿美元。电视机的产量1947年是7000部，到1971年美国家庭拥有6300多万部黑白电视机和2700多万部彩色电视机，平均每两个家庭有三部电视机。电视台从1946年的10个增加到1969年的673个。1954年，美国只有200部电子计算机，到1970年估计达10万部。电子计算机和工业数据处理设备的销售额连续20年创造新纪录，1969年高达78亿美元。家庭、办公室和工厂消耗天然气的价值，由1940年的8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108亿美元。煤气公用事业成了庞大的工业，1969年资产达430亿美元以上，比1940年增加了八倍。1970年，美国约有47条定期的国内、国际航空线，雇员30多万人，总收入达85亿美元。1948年，美国航空和宇航工业的销售额首次超过10亿美元大关，到1968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雇员超过100万人，其中半数工程师和科学家。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第一次载人登上月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农业巨大繁荣的时期。农场人均净收入（按1960年美元计算）1940年为1714美元，1946年上升到3677美元，1970年达到4500美元。这个时期农业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从1940年的26.5万个增加到1969年的36.7万个。这类农场在二战开始时只占1/25，此时已占1/7。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50年，每个农民可供养15.5人，1960年增加到25.8人，1970年又增加到47.1人。1947~1970年间，美国农业人口减少了2/3，从总人口比例的1/6降至1/20，而美国农畜产品却居世界首位，1970年生产的玉米占全世界的43%，大豆占74%，动物油脂占57.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输出国。

美国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也迅速扩大。1946~1950年的年平均出口额是118.29亿美元，进口额是66.59亿美元，顺差51.7亿美元；1970年出口额增至432.24亿美元，进口额是399.516亿美元，顺差32.724亿美元。战后初期，美国出口贸易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1/3，但此后美国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1970年降为15.5%。1971年美国第一次出现外贸逆差。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出急剧扩张。资本输出总额从1938年的115亿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1555亿美元(其中私人直接投资占781亿美元)。1960~1970年，美国仅从直接投资一项中就获得623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世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促进了老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及一系列新工艺、新产品的涌现。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生产成本降低和产量增加。30年代工业生产率只增加约20%，1950~1970年则增加了94%。30年代农业每人每小时生产量没有变动，但1940~1970年间增长率为430%。第二，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使国家长期保持高额的军事开支，刺激了经济，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经济部门的增长。第三，政府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相结合，国家调节经济和实行一些社会经济改良，在一定时期中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缓和了经济危机的发展。第四，这一时期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是同垄断资本利润迅速增长、投资的日益扩大分不开的。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1937年为52.8亿美元，1947年为201.9亿美元，1972年为546.2亿美元，是战前的十倍。利润的膨胀引起了投资的扩大。美国私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按1972年价格计算，1951~1960年为597亿美元，1961~1970年为928亿美元。投资增加使再生产不断扩大。此外，美国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扩张，掠夺别国的原料和燃料，倾销过剩商品，转嫁经济危机，也是维持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然而，维持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诸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国民经济军事化和信用膨胀支撑了工业的增长，但又削弱了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基础，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引起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在这20年中先后出现了四次经济危机。1953年3月~1954年4月的危机是50年代的第一次美国经济危机。1957年3月~1958年4月的一次危机和1960年2月~1961年2月的一次危机，前后相距不到两年，是美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周期。60年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曾一度推迟了危机的爆发，出现了战后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经济周期，即1961~1969年持续高涨104个月，但危机终于在印支战争高潮的1969年10月爆发。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每次持续时间为8~1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8.1%~13.5%。经济危机常同财政状况恶化和美元危机交织在一起。早在1960年10月就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市场上美元贬值，黄金价格上涨。世界各地随之掀起一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美国借助英格兰银行的支持，才平息了浪潮，渡过了难关。到1970年7月，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更为严重的美元危机。这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02亿美元，只及流动外债(510亿美元)的1/5。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各国中央银行向美国兑换

黄金。年底，被迫宣布美元贬值 7.89%，即法定兑换率由 1 盎司黄金合 35 美元改为合 38 美元。即使在繁荣的 60 年代，美国失业人口尚在 300 万人上下，70 年代后增加到 400~500 万人。企业开工率经常严重不足。

70 年代的危机滞胀与 80 年代的发展 1973 年 12 月至 1975 年 4 月，美国发生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它从英国开始，后来扩及美国、西欧和日本。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8.1%。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7.8%，全国失业人口达 850 万，失业率为 8.9%。这场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物价持续上涨。危机期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 15.3%。

1975 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

在滞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远比五六十年代慢，而且行程曲折，没有出现全面的经济高涨。国民生产总值在 1976 年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1971~1980 年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3.1%。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本投资缓慢。在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经济复苏基本是靠消费性需求的增加，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高潮。而固定资本投资不振，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

经济滞胀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1978 年，美国有全失业人口 605 万，远高于危机前的数字。另一严重问题是通货膨胀。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各国采用凯恩斯学说，实行膨胀性金融政策，放松银根，鼓励投资与消费，并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一做法对防止危机、促进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到 70 年代，遇到低增长、高失业的形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达到 7% 左右。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也日渐丧失。1977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1 月连续发生八次美元危机。1979 年又一次出现抢购黄金的浪潮。年初每盎司黄金兑换 218 美元，到 1980 年 1 月 21 日一度高达 375 美元。

1980 年 2 月，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了 11.8%，比 1973~1975 年那次危机下降的幅度小。但这次危机不是经历繁荣之后出现的，而是在滞胀基础上产生的，因而还是严重的。失业率上升到 30 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峰，达到 10.8%，失业人数达 1200 万以上。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字。危机持续了三年左右。

70 年代美国经济长期陷于危机和滞胀之中，这是由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素促成的。其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欧、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美国逐渐丧失了战后 20 年独霸世界市场的优势。1948 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 53.9%，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1970 年下降到 40.9%。1947 年，美国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 1/3，1970 年降到 15.5%。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中美国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从 1965 年起，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相继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战后时期技术革命所创造的某些新产品，生产量不断扩大，使市场逐渐达到饱和，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而另一方面有些新成果、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要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尚需要时间，还不能取代处于衰落中的传统工业，对这些“夕阳”工业进行新技术改造还需时日。这种新旧交替变化调整中所表现的“停滞”现象，是和传统的周期性危机有所不同的，它既是一种危险，但又是一种机遇，既有危机，又有转机。第三，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律使美国资本向世界扩张，寻求廉价原料

和廉价劳动力。美国国外资产从 1950 年的 544 亿美元,上升到 1970 年的 1655 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但国内的传统工业如汽车、钢铁等工业,由于工资高、利润低,资本家不愿投资进行更新改造,致使这些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削弱了传统工业的基础和竞争力。第四,第三世界联合开展维护资源的反霸斗争。从 1973 年起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石油战”,连续三次提价。1950 年原油价格每桶 1.71 美元, 1973 年涨至 5.11 美元, 1981 年 10 月达到 34 美元的高峰。“石油战”结束了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廉价石油资源时代,加剧了美国的能源危机。 1970 年美国进口石油 11.57 亿桶, 1977 年上升到 31.03 亿桶,为消费量的 46.4%。石油是工业和农业的动力,石油涨价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第五,是美元霸主地位的丧失。战后,美国凭借其绝对优势地位,创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从中得到许多好处。但到 70 年代美元一再贬值,多次发生危机,这不能不对经济滞胀产生影响。

然而,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水平仍居世界首位。按 1972 年美元价格计算, 1970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10,750 亿美元, 1980 年为 14,807 亿美元,十年期间增长了 37.7%。国民收入按当年美元计算, 1970 年为 7984 亿美元, 1980 年为 21,214 亿美元。

1983 年,美国率先走出危机,经济回升很快,打破滞胀局面。1984 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6.9%,是 1951 年以来美国的最高增长率。此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一直到 1990 年,经济连续八年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有所下降。从道·琼斯股票指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改善。危机前的 1972 年,道·琼斯股票指数为 1052,1982 年降为 776,1983 年升为 1287,超过危机前的指数。1987 年突破 2000,比 1972 年增长将近一倍。到 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48,806 亿美元,比日本和西欧国家高出很多。美国经济的这种迅速发展,使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次得到加强。

美国经济问题依然很多。财政赤字、内外债务和外贸逆差居高不下。里根政府作出巨大努力来削减赤字,虽取得一些成果,但 1987 年仍有 1476 亿美元的赤字。美国的国债则是有增无减,超过 2 万亿美元。对外贸易,在 1975 年还有顺差 91 亿美元,而此后则连年逆差。1980 年为 253 亿美元, 1988 年增为 1374 亿美元。美国经济日益受到西欧和日本的挑战。

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 五六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企业合并运动。战前 20 年代有一次合并高潮, 1920~1929 年大公司合并的企业约 7000 个, 1945~1954 年大公司合并的企业仅为 2929 个,而在 1965~1969 年这五年就达 8213 个。 1947~1972 年,最大的 100 家公司在全部制造业资产总额和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 39.3%和 23%上升到 47.6%和 33%。 1970 年,最大的 50 家银行占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 47.8%、存款总额的 47.4%。过去的合并运动主要是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而这次混合性合并逐渐成为主要的合并形式,即许多不属于同一行业或同一生产程序的企业,甚至是业务上毫不相关的企业之间进行合并。到 1970 年,这种混合性合并占全部合并企业数的 87.8%,形成众多的经营多样化的联合企业。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原来主要经营电信业务和制造电信器材, 60 年代以来合并了 50 多家与电信无关的公司,经营范围扩展到面包食品、人造纤维、住房建筑、旅馆酒吧、保险、投资基金、房地产、计算机、化学制品等。通用电气公司合并了众多企业后,产品达 300 种。从 60 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大

公司加速合并大量国外企业，成为国际化垄断组织即跨国公司。到 1972 年，美国垄断组织已在国外拥有约 8000 家工业企业。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跨国公司，它的 200 多家子公司分布于 60 个国家，1969 年占该公司资产总额的一半，占职工总数的 72%，1970 年占销售总额的 42% 和纯利润的 35%。

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加剧，美国垄断财团，即金融资本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它们以所掌握的一批金融企业为核心，通过放款、互派董事、收购股票等方式，渗入工矿、交通运输、贸易等部门，操纵国家经济命脉，进而控制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洛克菲勒和摩根两个东部老财团，不仅在美国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靠石油起家，现拥有埃克森等七大石油公司，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四分之一。这个财团的金融中心是大通曼哈顿银行，它打进军火、化学、电器、电子、航空、原子能、钢铁、橡胶、公用事业等部门，至少控制了 20 多家资产各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摩根财团的金融中心是摩根信托公司和银行家信托公司，它在美国基础工业及军火工业部门一直占有垄断地位，在钢铁、电器、电子、汽车、化学、有色金属等方面实力更为突出。1970 年，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控制的资产达 3742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其他 16 个大财团资产的总和，超过了英、法、联邦德国和日本四国金融垄断组织所控制的资产总额。在美国十大财团中，次于它们的有美洲银行财团、芝加哥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得克萨斯财团、杜邦财团和克利夫兰财团，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财团如旧金山财团等。

垄断财团同国家政权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对美国政治生活的控制。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要反映大财团，首先是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大财团的利益和要求。50 年代艾森豪威尔上台是摩根和洛克菲勒争夺妥协的结果，他的内阁是有名的“富豪内阁”。1961 年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上台，是洛克菲勒财团实力增强的反映。后来约翰逊和尼克松先后入主白宫，则有南部和西部财团崛起的背景。历届政府的部长及高级官员，大多是与垄断资本有密切关系的人。垄断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人员互换达到很大的规模，1967 年 7 月到 1971 年 12 月，有 1101 名中高级军官转入私人军工企业任职，同时各军工垄断组织领导人有 232 人进入国防部。

美国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在经济上的结合空前紧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高度发展。美国政府推行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保证垄断资本的利润，刺激生产的发展。一是政府增加采购和订货。政府用于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开支从 1946 年的 275 亿美元增加到 1960 年的 1003 亿美元，从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3.1% 增加到占 19.8%，大部分是用于军事采购。美国大财团垄断了大部分军事订货，这就保证了它们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二是扩大投资兴办国有企业和工程。国家从保证再生产的条件出发，对投资大、周转时间长和利润率低的一些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等进行大量拨款。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国家占到投资总额的 60% 左右。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需要巨额资本，投资风险大，从一开始就由政府兴办。1950~1971 年，原子能工业建厂投资由 21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60 年代后期，对宇航工业，国家每年耗费 50 多亿美元。三是国家开支巨额的科研经费，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新技术成果和巨额利润。仅军事研究发展费用就从 1960 年的 66 亿美元增加到 1970 年的 125 亿美元，其中 95% 以上落入资金雄厚、技术

先进的大军火公司手中。研究取得成果，这些公司即可获得新产品的专利权，得到一笔新的军火订货，还可以将新技术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研究失败，费用则由政府报销。四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信贷、金融和劳动等经济政策，调节国民经济，影响再生产过程，应付经济危机，调节劳资关系，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的高额利润。五是由国家与外国签订各种协定，成立各种经济组织以及通过美援，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私人资本和商品输出，占据有利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帮助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加强对外经济扩张。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反垄断倾向和竞争机制也在强化。当代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中小企业并存，需要更能适应产业结构更新、易于满足多样化消费的中小企业。国际竞争的加剧也要求美国保持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因此，美国在战后一直坚持 1890 年和 1914 年制定的反垄断法，禁止有组织的反竞争安排，不允许任何一个企业或财团垄断某部门的全部生产或销售。1950 年，又通过塞勒—凯维弗尔反合并法，禁止相互竞争的企业合并。1970 年通过反托拉斯法修正案，规定因他人违背反托拉斯法而受害的个人和企业可以提出上诉，法院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受理此事。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国内政策

艾森豪威尔的“新共和主义” 1952年美国大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其个人的巨大声望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击败了民主党的史蒂文森，使共和党20年来第一次重掌政权。1956年，艾森豪威尔连选连任，主政白宫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的政治观点是坚持传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实行削减开支、平衡预算、降低国债的紧缩政策，主张权力分散、尊重州权、企业自由。但他同意维持“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了得到广泛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自由保守主义”或“新共和主义”。其实，他的政府是企图在“新政”式的国家干预和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这使希望取消“新政”立法的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大为失望，但政府的这种温和基调却非常迎合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

艾森豪威尔内阁成员几乎全是从大公司的头面人物中遴选出来的，如财部长汉弗莱是巨大的克利夫兰地产公司及汉纳钢铁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他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身份来华盛顿推行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政策。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宣布将国防部订货转向大厂家。农业部长本森是个塔夫脱分子，他认为减少农业补助金是刻不容缓的。邮政部长萨默菲尔德是汽车批发商。商业部长威克斯是波士顿的工业家。新内阁似乎是正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堡垒，但他们在行动上却是精明的实用主义者。

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推行新的财政政策。政府各部门要求尽量节省开支，文官职位减少了10万个。随着朝鲜停战，军事开支也大大削减了。1954年联邦开支削减了近10%，达65亿美元，但仍未达到预算平衡。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提高利率和紧缩信贷，引起投资、就业、生产和利润下降，税收减少，经济指数暴跌。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只好采取灵活的政策，迅速放松信贷，扩大国防和福利的拨款，财政赤字随之增加，1959年的赤字达到13年来的最高额。事实上，坚持平衡预算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没能认真执行。为履行减少税收的竞选诺言，政府提出1954年税收法，降低国内货物税，使个人和公司在1955年少缴14亿美元所得税。但新的所得税法对收入较低的人很少裨益，反对派批评该法是对那些最不需要的人规定了税收减免。

艾森豪威尔政府主张尊重州权、企业自由，认为联邦政府过多地占有自然资源就会侵害州权。在开发动力资源问题上，要与工业家合伙，这样既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又加强了企业自由。认为联邦政府在这些领域里干预过多，就会造成浪费和“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取消了战时价格、工资、房租等方面的控制，把许多国有工厂廉价出售给垄断组织。杜鲁门曾两次否决把潮淹区石油所有权归予各沿海州的议案，最高法院曾判决确认联邦政府对这些近海土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艾森豪威尔却发誓要反对“联邦对州权和州务的侵犯”，1953年签署了《潮淹地法》，宣布海底资源属于沿海各州。公有电力的主张者要求政府在爱达荷州斯内克河上的赫尔峡谷兴建大型水坝和水力发电站。1955年联邦动力委员会否决了由政府兴建峡谷工程的计划，发给爱达荷公司建设许可证。艾森豪威尔极力减少政府对电力工业的干预，他同样反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扩大业务。195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了满足原子能委员会不断增加国防用电的需要，请求拨

款 1 亿美元修建一座新的火力发电厂，遭到国会拒绝，总统则支持原子能委员会从私人企业获得电力的建议。以狄克逊和耶茨为首的几个公用事业公司提出在孟菲斯建立发电厂，向该市和原子能委员会提供用电。经过五个月的争论，1954 年 11 月原子能委员会批准了狄克逊—耶茨合同。民主党人攻击这个合同是政府把一个“毫无风险”的垄断权拱手交给了私营企业，想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台。后来揭发出那个劝说政府接受投标的特别顾问，原来是一个兜售狄克逊—耶茨公司证券的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上台以来就发誓要根绝营私舞弊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下令取消这个合同。结果由孟菲斯兴建市营发电厂供应所需电力。艾森豪威尔还提出美国的原子能开发活动可向私人企业开放，不必由政府保持垄断，私人可以插手原子能发电。国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 1954 年原子能法，规定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保护措施下，私营公司可以利用原子能情报、材料和生产设备；并授权原子能委员会给私人建立核反应堆颁发许可证。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农业政策也是尽量减少控制，降低平价补贴，节省政府开支，尽可能使农业走向自由市场。但是农场主都赞成获得最高补贴，反对对 1949 年农业法规定维持 90% 的平价补贴再作任何削减。国会经过激烈的论战，还是通过了政府提出的 1954 年农业法。该法规定对主要农产品的补助，1955 年将削减到维持平价的 82.5%，1956 年再削减到 75%。农业地区对此不满，是共和党在 1954 年中期选举失败，使民主党重占国会微弱多数的原因之一。1956 年政府实行“工地银行”计划，企图用补偿农场主休耕土地的办法减少农产品生产过剩。尽管农场主每年休耕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但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连年获得创纪录的丰收，农产品过剩依然如故。政府的农业开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 1953~1954 年的不到 30 亿美元增加到 1960 年的 55 亿美元。1958 年艾森豪威尔签署的最后一个农业法，规定主要农产品价格补贴将逐步降低，到 1961~1962 年度将降到平价的 65% 的最低水平。在他的任期之内，农业这个错综复杂的难题显然没有解决。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整个任期内都试图使社会和福利立法稳步扩大，尽管不断受到保守派的妨碍，但他还是比较成功地维持并扩大了罗斯福和杜鲁门那一套社会福利立法。1954 年和 1956 年对社会保险法进行了修订，适用范围扩大到独立从业人员，使几百万从前未享受保险待遇的人也能享受到。增加 7% 的社会保险赔偿金得到国会通过。到 1960 年，得到社会保险法保护的约有 5800 万人。接受退休金的年龄限制降到 62 岁，残疾人为 50 岁。1955 年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 75 美分提高到 1 美元。尽管国会两次拒绝总统关于联邦参与全国健康保险计划的要求，但联邦在公共卫生、医学研究、医院建筑等项目上的开支还是不断增加，1954 年为 2.9 亿美元，1961 年几乎达 10 亿美元。在住房和公路建设方面，1954 年住房法规定为低收入者兴建新住宅 35,000 套。1955 年艾森豪威尔要求建房 14 万套，住房法仅提出再建房 45,000 套。随后五年的住房法都规定要进一步增建住房，还为清除贫民窟拨款，放宽抵押限制等。但这些办法都不足以解决全国性的严重住房问题。1956 年通过的公路法，规定拨款 330 多亿美元修建一个 42,500 英里的全国超级公路网。联邦政府负担经费的 90%，10% 由各州负担。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采取措施资助教育事业上非常吝啬，国会否决对教育

经费给予援助的法案。只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人震惊不已时，国会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于 1958 年 9 月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规定对大专学生提供长期贷款，如贷款学生毕业后同意到中小学任教五年，贷款的一半可免于偿还。还为有志于从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研究生提供 5500 个奖学金名额，并拨款 2.8 亿美元给州立学校，以改进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的教学计划。艾森豪威尔当政八年中，结束了朝鲜战争，抑制了麦卡锡主义，同赫鲁晓夫进行会晤，恢复了战后的和平共处。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过分强调预算平衡，拿不出有效的刺激经济的办法。它在民权、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立法上无所建树，对低收入选民缺少关怀措施，国际上又受到苏联空间技术领先的挑战，共和党政府名声一落千丈，民主党势力抬头。

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在 1960 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对共和党政府日益感到失望。民主党乘机攻击共和党政府造成“导弹差距”，使美国失去“优势地位”。它提出的竞选政纲宣称，要恢复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道德力量”，重新制定援外方针，更加强调经济援助和国际合作，促进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结束共和党的紧缩政策，扩大社会福利和保险，加强民权立法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1917～1963 年）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选总统。

肯尼迪当选时 43 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火炬已传到新一代的美国人手中。”他要开拓“新边疆”，号召建立“全球大联盟”以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他组织起一个最年轻的、办事效率很高的内阁和智囊团，雄心勃勃地要推行他的“新边疆”计划。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议案就有 107 项，内容极其广泛，包括由联邦提供经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提高最低工资、稳定物价、大量拨款改建城市贫民窟、实行医疗计划、援助教育事业、实施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发展空间技术、改善社会保险和民权立法等，其中有 73 项通过，成为法律。但是，肯尼迪旨在使国家摆脱衰退、刺激经济增长，并用经济和社会福利手段帮助贫苦阶层的“新边疆”计划，往往遭到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的联合反对。总统要求通过一项教育法案，在三年内向各州提供补助金 23 亿美元，以改善学校建设和提高教师工资，并在五年内拨款 33 亿美元作为联邦奖学金。1961 年 5 月参议院通过此项法案，但由于天主教要求教区学校与公立学校获得同等补助被总统拒绝，天主教的民主党人便加入保守派，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否决了肯尼迪的法案。经过政府不懈的努力，1961 年还是取得几项立法的胜利：新住房法授权以近 50 亿美元来进行为期四年的地方城市更新计划；工人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在两年内由 1 美元提高到 1.25 美元；地区重新开发，提供近 4 亿美元联邦贷款和拨款援助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的“贫困地区”。

1962 年肯尼迪争取立法最重要的成绩是通过了贸易扩大法，授权总统降低关税 50%，并可以对主要是由美国与共同市场进行贸易的商品实行免税。美国放弃维护薄弱工业的传统保护关税制，政府实行“贸易调整补助”，通过发放补助金的办法来帮助那些受到进口商品威胁的企业和工人，资助这些企业转产或增加新品种并重新培训工人。该法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手段，使美国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下可以谈判有利的贸易协定，密切同欧洲共同市场的关系。肯尼迪渴望实行一次全面的减税来繁荣经济，但 1962 年税收法与他原来建议的已是面目全非。国会授权总统拨款 9 亿美元用于严重失业地区的公共

工程计划，但否决了他的需耗资 20 亿美元的反衰退公共工程计划。国会否决了利用社会保险体制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的医疗保健法案。肯尼迪头两年的立法工作远未能达到实现“新边疆”计划的要求。尽管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胜利，但 1963 年总统面对第八十八届新国会还不是有求必应的。肯尼迪要求 45 亿美元外援被砍去 33%，59 亿美元的太空计划削减了 10% 以上。他提出一个详尽的削减税收的法案，虽获众议院通过，却在参议院搁浅了。这一年的教育立法取得较突出的成就，通过了高等教育设施法，拨款 12 亿美元改善科研教学设施，对私立高校建设也给予贷款；批准了关于加强职业教育的措施，扩大人口密集地区教育经费补贴，延长并扩大国防教育法的权限；通过新建的公共医疗中心对精神病开展防治，兴建医科和牙科学校等。国会因这些令人瞩目的建树，被誉为“1963 年教育国会”。1963 年美国的经济充满生气，肯尼迪政府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5.6%。美苏紧张气氛大为缓和，东南亚出现相对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年代似将来临。肯尼迪满怀信心地要争取连任，以进一步实现他的“新边疆”计划。为此，他于 11 月前往副总统约翰逊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进行活动，力图调和民主党内两派之间的分歧，希望在来年大选中能够团结一致。但 1963 年 11 月 22 日中午，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

约翰逊一上台就宣称要“继续”肯尼迪“开始”的事业。他利用肯尼迪遇刺所引起的人们巨大的感情冲动，加上他长期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熟谙操纵国会的本领，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新边疆”的主要立法。约翰逊说，“对已故总统的最好悼念或颂扬莫过于尽早通过他长期为之奋斗的民权法案了。”当第八十九届国会第一次会期休会时，已通过政府提出的 89 项重要法案，只否决了两项。约翰逊在第一年使国会通过的肯尼迪拟定的立法项目，比肯尼迪当政三年通过的还要多。

1964 年大选结果，约翰逊以空前多数选票当选美国总统，这表明他已经树立起自己的公众信任，不再需要借助于肯尼迪之死来推动国会通过“新边疆”立法了。早在 1964 年 5 月，约翰逊就提出“伟大社会”的目标，作为他的政府的施政纲领。他在 1965 年的国情咨文中，更进一步地提出一系列实现“伟大社会”的方案。他说，“伟大社会”有赖于所有的人都能富足与自由。在约翰逊任内，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1964 年 2 月通过的税收法是肯尼迪留下来的法案中最先通过的一项重要法令。它规定将最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从 20% 降为 14%，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从 90% 降为 70%，从而使居民收入增加，促进经济繁荣。同年 8 月，通过经济机会法，拨款 8 亿美元，建立一支美国志愿队。凡 16~21 岁的男女均可报名，接受文化教育、职业训练，然后派往各地，帮助地方政府兴建各种工程。1965 年通过住房法，政府拨款建房，并补助低收入者住进合乎标准的住房。凡房租超过本人收入四分之一者，超出部分由国家补助。1966 年通过了示范城市和都会发展法（模范城市法）、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这些法令不仅着眼于解决贫民窟问题，而且要解决整个地区的问题。法令决定拨款帮助落后地区修筑铁路，兴建公共工程，发展经济。1964~1967 年间，国会先后通过了水土保持和国家野生环境保护法、水质法、固体废料处理法、空气质量法、控制汽车排气法等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立法。约翰逊还使国会通过了长期争论的有关保健和教育的立法。1965 年通过的医疗保健法规定对 65 岁以上的老人实行义务医疗护理。另一项补充计划规定，每月交 3 美元保险金的

人,其医疗费用在自付 50%以后,剩余的部分 80%由社会保险金提供。1965 年通过的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拨款 13 亿美元帮助中小学教育,同时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还通过了民权立法。总之,约翰逊的立法成果十分巨大,堪与罗斯福新政的立法成果相媲美。

然而,60 年代中期以后,约翰逊政府使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加剧,庞大的政府开支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约翰逊政府已陷入严重困境,声望陡起陡落的约翰逊不得不于 1968 年 3 月正式宣布不参加连任竞选。

60 年代的社会动荡 60 年代,美国经济大发展,但也引出众多社会问题。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大规模的争取黑人民权运动、反对侵越战争的群众斗争和青年造反活动。

美国黑人有 2300 多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由于严重的种族歧视,广大黑人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境地,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得不到平等的选举权。一些州用文化测验、宪法知识测验和交高额的人头税等办法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954 年选举中,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三州共有 150 万黑人适龄选民,但只有 21,000 人获得选举资格。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得不到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黑人在就业方面受到严重歧视,经常处于“解雇在先,受雇在后”的状况。到 1950 年黑人失业人数占黑人人口的 14.2%。城市黑人的失业率比白人高一倍,黑人的工资远远低于白人。1952 年黑人妇女工资只及白人妇女的 41%。在住房和城市公共设施上也实行隔离制,联邦政府的房屋建筑计划中就制订了专供白人或专供黑人居住的严格限制。南部诸州是美国黑人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黑人地带”,农场主把最耗费劳动力的工作让黑人农业工人去做,工资微薄。在这种重压下,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从未间断。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一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掀起了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民权运动。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特别是非洲人民挣脱殖民统治枷锁,纷纷走向独立,使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意识到,当美国凌辱自己的黑人少数民族时,它显然不能赢得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尊重与合作。美国黑人在北方城市中心的日益集中和经济力量的扩大,已成为两党都不得不承认的政治力量,两党都不能丢掉扩大民权立法的旗帜。1954 年 5 月 17 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控告托佩卡地方教育局一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宣布在公共教育方面实行“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违背宪法,取消种族隔离制。这一判决使“每个黑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以站起来做人”,他们将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1955 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为了反对公共汽车的隔离乘车规定,在他们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领导下,开展了长达 331 天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迫使地方法院作出了反对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判决,最高法院于 1956 年确认了这一判决。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揭开了战后美国黑人民权斗争新高潮的帷幕。1957 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当局不顾最高法院关于布朗案的判决,调动州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入学。艾森豪威尔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威,派出联邦军队到小石城强制执行布朗案判决,武装护送黑人学生入学。但一些州仍然顽固地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弗吉尼亚州和阿肯色州下令关闭兼收黑人学生的学校。1959 年州与联邦法院都宣布弗吉尼亚州关闭学校为违宪。到 1960 年,即布朗案判决六年之后,南方 300 万黑人学生中只

有 18 万、占 6% 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一起上公立学校。1960 年 1 月 31 日，北卡罗来纳农业和技术学院四名黑人大学生在一家午餐馆就餐遭到拒绝，但他们没有屈服，每天坚持在餐馆静候要求接待。这一行动立即得到黑人群众的响应，发展成为“静坐”示威的群众斗争。几周之内，南方其他城市就发生了几十起“静坐”示威，并由饮食部门扩展到其他公共场所，向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发动猛烈的冲击。当时整个南方州际运输系统如汽车站、火车站、机场的休息室和餐馆都实行种族隔离。1961 年，种族平等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金牧师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等民权组织发起了“自由乘客”运动，冲击州际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广到全国。许多白人也支持并参加了这一斗争。结果州际商业委员会命令所有公共汽车公司在州际路线上取消种族隔离，越来越多的地方车站取下了“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标记。

1963 年 4 月，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一系列“静坐”和示威行动，抗议伯明翰商店、旅店和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遭到伯明翰当局的镇压，金牧师和其他领导人被逮捕，警察用水龙和警犬冲击游行队伍。警察的暴行使抗议活动迅速扩大，春天和初夏，全国举行抗议示威 750 多次，仅仅 11 个南方州就有近 14,000 人被捕。8 月 28 日，在华盛顿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争取就业、争取平等的“自由进军”。参加的有男女老幼，有黑人和白人，代表 100 多个团体，包括民权、劳工、宗教组织，总数达 25 万人。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著名的《我有一个理想》的演说：“我梦想这个国家会有一天站起来，体会到‘我们认为这些是自明之理，一切人类生而平等’这个信念的真正意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们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们，同坐一起，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儿女会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优劣为准的国家里生活。”华盛顿进军将战后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峰，它使争取公民平等权利的斗争真正成为全国性的伟大群众运动。1964 年，美国黑人斗争由非暴力的和平示威发展到以暴抗暴的斗争。7 月纽约哈莱姆区、8 月洛杉矶瓦茨区首先开始武力抗暴。此后，无论是北部、西部还是南部，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只要有黑人聚居的地方，几乎都有抗暴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 1967 年 7 月纽瓦克和底特律的抗暴事件。黑人一度控制了底特律西城区大部分，汽车工厂全部停工，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约翰逊下令联邦空军部队 5000 人开进底特律“恢复秩序”。这一年黑人抗暴斗争扩展到 128 个城市。1968 年 4 月 4 日，种族主义暴徒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暗杀了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牧师，这更加激起了大规模的抗暴斗争，黑人抗暴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 172 个城市。60 年代中期美国不断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后，黑人的抗暴斗争和人民的反战运动汇合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剧了美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

在日益壮阔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和政府通过和颁布一系列有关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法令。1961 年和 1964 年分别生效的宪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扩大了选举权。1964 年通过的民权法规定，黑人可以同白人一样享用旅馆、餐厅、娱乐休息场所，并授权联邦政府可以提出公诉，要求取消公共设施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1965 年 8 月又通过选举法，决定取消文化测验和其他类似的选举资格审查，并对干预选举权利的行为规定了惩处办法。1968 年的民权法禁止在出租和出售住房时实行种族歧视。

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1954年南部诸州参加选民登记的黑人不到四分之一，到1970年超过三分之二。黑人担任各级政府职务的明显增多。1966年南部诸州约有100名黑人被选为州与地方一级官员，到1972年超过1000人。1965年几乎没有黑人市长，到1970年已有80个市镇长是黑人，联邦政府和国会也有了黑人的席位。1957年，南部诸州和白人一起上公立学校的黑人学生只占黑人学生总数的4%，到1970年达到84.3%。公共服务设施也消除了种族隔离。然而，美国黑人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要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尚须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

60年代随着侵越战争的扩大和失败，全国兴起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5年3月24日，密执安大学3000名师生举行越战讨论会，反对美国入侵越南。这一抗议活动迅速波及各校。同年，开始出现反战游行。1966年，国会召开听证会。富布赖特、罗伯特·肯尼迪、麦戈文等议员公开谴责政府的战争政策。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1967年，反战斗争进入高潮。4月和10月发生数十万人的反战游行，很多人公开焚烧征兵卡，冲击征兵部门。1968~1969年，斗争持续不断，发生近两千起抗议示威。1970年，尼克松出兵入侵柬埔寨，又引起反战高潮，四百多所学校学生罢课抗议，十多万人在白宫前示威游行。反战斗争一直坚持到美国侵越战争结束。

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1964年12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分校大约一千名学生占领学校行政大楼，要求政治活动自由，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学校向警方求援，逮捕了数百名学生，这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抗议。学校被迫让步。这以后，学生运动迅速兴起，并同黑人争取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极大声势。青年人还搞起反主流文化活动。他们不满现实，故意违反社会道德准则，他们打扮奇特、言行粗野、蔑视金钱、吸毒纵欲。后来，一些人走向自我修养，崇拜东方宗教，一些人搞恐怖活动。新建立的黑豹党、气象员派，号召进行城市游击战。70年代，青年造反运动逐渐走向消亡。

第三节 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 1968年，美国举行第三十七任总统选举。副总统汉弗莱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则提出尼克松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民主党虽处于执政的有利地位，但内部几派相互斗争，再加上越南战争问题，力量被削弱。尼克松则提出要结束越战实现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选举结果，尼克松获43.4%的选票，只比汉弗莱的42.7%多0.7%，以极小的优势获胜。

理查德·尼克松于1913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巴林达。大学毕业后任律师。二次大战期间，任海军军需官。1946年当选为众议员，1950年成为参议员。1952~1960年任副总统。1960年竞选总统，败于肯尼迪手下。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遭受失败。但1968年又东山再起。

尼克松上台正值美国在越南陷于困境之时，而解决越南问题又需调整同苏联，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因此，尼克松在第一任内把主要精力用于外交方面。1971年7月他不让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知道，非常秘密地派遣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到北京，直接和周恩来密谈两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27日，中美签订上海公报，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美国宣布，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提出异议”。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3年1月，美国同越南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尼克松政府把50万侵越美军撤回国内，同时，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撤走大批部队。美国驻亚太地区的总兵员由90万人减为24万人。美军的全部现役军人也由354万缩减为216万。尼克松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普遍的支持。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政府偏于保守。它极力扭转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的势头，解除负责此项事务的上层官员，关闭大部分的职业队训练中心。它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目的议案，比较重要的有：提出从1972年起将行使选举权的年龄降为18岁的议案、妇女平等权利案，以及联邦援助公路法案等。

尼克松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1970年8月，国会通过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采取行动稳定物价、房租和工资。尼克松最初反对干预经济，但一年后，他就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用行政的力量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问题。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90天。这项规定对富人有利，因为工资容易冻结，而物价很难控制，资本家经常采用更换商品名称的办法变相提价。从1971年11月起，开始新政策的第二阶段，改冻结为管制。政府规定，物价和工资每年只能提高5.5%，而且提高应是有计划地进行，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才能付诸实施。1973年1月，政府取消强制性控制。但没过多久通货膨胀又加剧起来。政府于1973年6月再次宣布冻结60天。直到1974年，政府才停止对物价和工资的行政干预。新的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克服美元危机的措施。进入7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从战后最高的250亿美元降为105亿美元，而这时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共达500亿，超过美国的全部黄金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西方国家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它违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美、英、法、联邦德国、日、加、意、

比、荷、瑞典“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于9~12月接连举行四次会议，商讨妥协方案。最后，美国决定改变近40年来一直未变的黄金兑换率。美元贬值8.57%，1盎司黄金价值从35美元上涨为38美元。与此同时，西德马克和日元升值13%和17%。尼克松还宣布取消10%的附加税。1973年美元危机再次爆发。2月尼克松政府决定将美元再贬值10%，1盎司黄金升价为42.22美元。

1972年，美国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尼克松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获胜，共获得61.3%的选票。尼克松得到521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人麦戈文只得17张。尼克松十分得意，认为定可主持美国独立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了。但是，他的夙愿未能实现。

1973年六七月间，巴尔的摩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发现副总统阿格纽犯有受贿、勒索、偷税等问题。阿格纽虽极力否认，但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于1973年10月辞职。众议院共和党协商委员会主席福特接任副总统。

对尼克松更大的打击是“水门事件”。早在1971年6月17日，警察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办事处发现门把上安设有电子窃听器。这件事最初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后来，查明是共和党的总统重新当选委员会派人所为。1973年3月，调查取得新的突破，涉及到白宫。尼克松极力掩饰，弄得矛盾百出。尼克松的国内问题高级助手霍尔德里曼和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长克兰内斯特，因与事件有牵连而相继辞职。1974年，法院查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的第六天，曾指示他的助手让中央情报局制造一次国家安全行动，以掩饰水门的问题，并指示不让联邦调查局插手此事。这是妨碍一个国家机构调查罪行的明证。法院要尼克松交出他在白宫的录音带，以验证此事。但是，尼克松拒绝交出，引起公愤。7月24日，首席大法官宣布，最高法院一致裁决，尼克松应交出录音带。与此同时，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向众议院呈送三项弹劾总统的条款：指控总统给司法工作设置障碍，指控他滥用职权，指控他不尊重委员会的传票。尼克松无力反驳，于1974年8月9日正式辞职。福特接任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任副总统。正副总统都不是民选产生的，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杰拉尔德·福特于1913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耶鲁大学毕业后任律师。二次大战期间为海军少校。从1949年起一直是众议院议员。1965年当选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福特是个保守派分子。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他只会萧规曹随，拿不出什么得力的措施来。他讨厌控制物价和工资，主张政府少干预经济。在福特任内，国会只通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法案，如资助学校的法案，决定拨款250亿美元帮助中小学；住宅建筑法，拨款80亿美元资助建房和补贴中下等收入者的房租；1975年，决定实行印第安人自治，他们的事务由首都印第安事务局转到各地部落会议管理。

卡特政府 1976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福特勉强战胜里根，争得共和党对他竞选连任的支持。福特提出的竞选纲领仍是老一套的货色，他谴责民主党乱花钱，瞎管制，主张平衡预算、减轻赋税、支持企业自由。民主党推出卡特做总统候选人。卡特呼吁用“愈合的时代”取代近来的“痛苦的时代”。最后，卡特以51%对48%的选票战胜福特，当选为第三十九任总统。这是自1932年胡佛失利以来第一次在职总统竞选失败。

小詹姆斯·卡特于1924年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里。他是自札卡

里·泰勒（1849～1850 年在职）以来第一位来自美国南部的总统，得到多数黑人的支持。卡特是一名地方领袖人物，1971～1975 年任佐治亚州州长。入主白宫前没有全国性政治工作经验。

卡特上台后，面临经济滞胀所带来的众多问题。首先是能源问题。1977 年，美国消费的石油有一半靠国外进口。而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美国为此付出的款项几年内就增加三四倍。1973 年进口石油花的钱为 84 亿美元，1977 年就猛增到 400 亿美元，成为美国经济一大负担。卡特政府想扩大核、煤等其他能源，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为此，提出国家能源法，对石油消费进行管制，对开采原油增收井口税。国会讨论后，把原法案中的棱角都磨掉了。1978 年 10 月通过的能源法，对改善能源状况意义不大。1979 年 3 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三英里岛核电站发生泄漏放射性物质事故。人们对过多依靠核动力发生怀疑。能源问题成为卡特政府的一个头痛的问题。

失业率高是另一个问题。为减少失业，1977 年政府拨款 60 亿美元用于地方建设，拨款 79 亿美元举办公益服务事业，同时对企业实行减税，以鼓励它们多雇工。政府的措施取得一定效果，1976 年的失业率为 8%，1977 年降为 6.4%，1978 年低于 6%。

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严重。1977 年的膨胀率为 7%，1978 年升为 9.6%。美元不断贬值。1979 年 7 月每盎司黄金的价格竟超过 300 美元。卡特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将贴现率提到 9.5% 的新记录；紧缩信用，减少信贷资金；回笼美元，减少货币流通量。政府的干预使美国避免了一场金融恐慌。1979 年中，国际石油价格再次猛烈上涨，终于在 1980 年春把问题重重的美国经济又拖入危机。

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9 年 10 月，巴拿马运河条约正式生效。美国同意在 2000 年将运河的管理和防务权利交还巴拿马政府。但在同伊朗关系上发生麻烦。1979 年 11 月 4 日，霍梅尼政权扣押美驻伊使馆 52 名人员做人质，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回国受审。美拒绝伊朗的要求，于 1980 年 4 月同伊断交。4 月 24 日，美组织军事人员乘飞机去营救人质，因遇沙暴而被迫返回。此后，美改为与伊朗谈判，但直到 1981 年 1 月 20 日卡特下台时，美国人质才获释。在美伊交恶之时，苏军于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美采取制裁措施，宣布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但效果不大。卡特被指责“对共产主义软弱无能”。

里根政府 1980 年，卡特被民主党推举出来竞选连任总统。但这时的卡特因经济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质问题的长期未得到解决而形象受损，威信下降。共和党提出里根为总统候选人。选举结果，里根获得 489 张选举人票，当选为第四十任总统。卡特只得到 49 张选举人票，这是在职总统少见的惨败。

罗纳德·里根于 1911 年 2 月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皮鞋推销商家里。1932 年取得了尤里卡学院的社会学学士学位。在 26 年的演员生涯中共拍过 53 部电影。1966～1974 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在 1968 和 1976 年两度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先后败于尼克松、福特手下。

里根在 1980 年竞选中的胜利，表明保守派影响的增长。民主党自由派从罗斯福开始，扩大政府干预经济，增加财政开支，扩充福利。约翰逊执政时达到高峰。但 70 年代出现危机和滞胀，自由主义影响下降。

里根上台时，正值美国陷于经济危机。因此，他在 1981 年 1 月的就职典

礼上宣称，他的政府要对内振兴经济，对外重振国威。里根采纳孟德尔的供应学派理论，认为克服危机和滞胀，应从凯恩斯的调节需求转向调节供应，即从扩大消费转为减税、鼓励投资来刺激生产。里根政府在 1983~1985 年的三年中连续减税 23%，使个人和企业少缴所得税 3500 亿美元，从而为美国经济增添了庞大的市场购买力，使久经压抑的私人消费开支出现引人注目的增长。1983 年美国商业零售额的增长率达到 9.3%，1984 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上升为 13.6%。1986 年 10 月，里根又签署税制改革方案，简化税则，把个人所得税从 15 种减为两种，税率原为 11~50%，现为 15%和 28%。另外，削减或取消对某类个人或公司的减免税特惠。里根还采纳货币主义的主张，大力控制货币发行量，紧缩银根。1982 年 7 月到 1983 年 7 月的通货膨胀率仅为 2.2%。

里根政府还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同企业的关系方面，过去政府管制、控制企业，以保护老百姓和中产阶级不受大企业侵犯。但到了 70 年代，过多的管制削弱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另外，随着高技术和服务业的发展，新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是由百人以下的小企业创造的。政府要扶助小企业，而小企业不适应政府的繁多管制。因此，政府决定解除管制，使小企业能更好地对市场作出反应。在劳资关系上，30 年代政府帮助工会组织起来，加强工会同资方谈判的力量。战后，工会力量增大，掌握工会的工会官僚不问生产情况如何，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因此，人们倾向于限制工会。里根政府解散了发动罢工的机场塔台工作人员工会。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去为了帮助穷人和少数民族，制定了一系列立法。但社会保障制度有许多弊病。65 岁以上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医疗补助金等项目的收入，合起来有时比退休前的收入还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在 80 年代达到 2000 亿美元。政府感到负担过重，决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以期减少财政赤字。

里根的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成果。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危机。1984 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6.9%，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冠。

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自从越战失败以来，霸权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挑战，国际影响有所削弱。里根政府决心扭转这一情况，提出“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口号。它依靠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大肆扩军备战。1981 年的军费是 1567 亿美元，1985 年猛增为 2644 亿美元，其增长速度超过苏联。美对苏态度也日趋强硬。1983 年 10 月，美又悍然出兵入侵格林纳达，颠覆当地合法政府。里根被美国报刊称为“强有力的总统”。

1984 年，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在竞选中向里根提出指责说，“生活比以前好，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赤字留给后代好吗？”蒙代尔还打破政界 200 年的传统，挑选众议员费拉罗女士为副总统候选人。但里根仍以 518 张对 20 张选举人票的绝对优势获得胜利。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经济继续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83 年的 14,110 美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19,766 美元。但问题仍然很多。财政赤字在 1983、1984 年曾有所下降，而 1985、1986 年又回升到 2000 亿美元以上，1987 年和 1988 年又降到 1500 亿美元左右。联邦债务则持续增加，1988 年达到 2.4 万亿美元。对外贸易连年入超。在对外关系方面，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向苏联提出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又多次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寻

求两国关系的调整。

1988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乔治·布什以426张对112张选举人票的压倒优势取胜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这样，布什就成了自1836年以来在职副总统竞选总统成功的第一人，而且使共和党自二战以来首次蝉联三届执政。布什作为里根政府的副总统，竞选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形势对共和党有利。里根政府当政八年，美国基本上摆脱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滞胀”困境，到里根第二任期届满时，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六年，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通货膨胀率已经从1980年的13.5%降至1988年底的4.6%。失业率降至5.3%，为14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选民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投票的，而大多数美国人在里根执政期间收入增加了，这就为布什竞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八章 50年代到80年代的西欧各国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兴起

经济的飞速发展 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二次大战以前的水平。这以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联邦德国人称它为“黄金的50年代”。在1958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前，联邦德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52~1958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6%，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美国2.2%的增长率。这一时期的失业率则从6.4%下降为1.7%，因而在劳动市场上几乎找不到劳动力。加入经济共同体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和西欧其他国家的步伐趋于一致，年平均增长率降为5%。这一时期，外籍工人大量涌入联邦德国。1955年外籍工人只有8万人，1970年猛增为200万，占非独立就业人员的十分之一。

此时，联邦德国经济出现两次危机。一次发生在1952年2~5月，一次在1958年2~4月，产值分别下降了2.6%和3.1%。由于危机时间短，产值下降幅度小，对联邦德国经济影响很小，也不为人们所注意。相反，联邦德国经济的成就却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国民收入在1950年只有233亿美元，到1970年就上升为1668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六倍多。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在1955年超过英法，重新跃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工业大国。这个地位保持了将近20年，进入70年代以后，逐渐被日本超过，退居第三位。然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值，联邦德国不仅把法国、日本、英国抛在后面，而且在1970年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成倍增加。1950~1970年期间，钢的产量从1200万吨发展到4500万吨，发电量由445亿度发展到2426亿度，汽车产量由30万辆增为384万辆，合成纤维的产量由1000吨增为49.7万吨。农业也有较大发展。谷物收获量从1950年的1020万吨扩大到1970年的1729万吨。但农业仍是德国经济中的弱点，每年都需进口大宗农产品。

联邦德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外贸的发展。195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46亿美元，1970年猛增到646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中，联邦德国从1952年起年年顺差。50年代平均每年顺差22亿马克，60年代平均每年顺差87亿马克。联邦德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到1970年达到124.4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5.2%，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视机、自动化洗衣机等各种家用电器以及汽车逐渐进入居民家庭。每1000居民中拥有小汽车的数量，1950年为11辆，1970年增为236辆。一名普通工人在1970年仅用20周的工资就可以购买一辆最便宜的大众牌汽车。

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前的德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这为联邦德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以外，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科学，提高生产率。联邦德国政府注意从发展教育着手来建设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两支队伍。1950年，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为10万人，平均1万居民有21名大学生。1970年增加到41万人，平均1万居民有68人。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联邦德国也重视职工的业余教育。中学毕业生不上大学者，三年内有法定的休闲日去接受正规课程教育。每周上课一至二

天，结业时通过考试作为职业资历。由于教育和训练的结果，联邦德国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不断增加，就业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普遍提高。

为了加快科技发展，联邦德国特别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最重要的办法是进口专利和许可证。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进口专利和许可证的支出从2200万马克上升到165,400万马克，增长了74倍以上。

由于注意发展本国科学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联邦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51~1965年，工业生产率年平均增加4.5%，成为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第二，利用外国资本。外国资本输入对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垄断资本在马歇尔计划的名目下输入联邦德国。50年代以来，美国私人资本涌入联邦德国。1957年，美国公司在联邦德国的投资达5.8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87.3亿美元。外国资本的输入固然加剧了联邦德国垄断资本同外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但对于增加联邦德国企业的资金，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加速经济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最直接的形式是建立国有经济。联邦德国在这方面远不及法国、意大利。它主要通过国家投资参股的办法控制了邮电、交通运输和电力等基础经济部门和动力工业部门。此外还直接经营一些投资大、盈利小、风险大的部门，如原子能、宇宙航行以及其他尖端科研项目。

联邦德国政府通过制定法令政策来干预调节国民经济。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减税免税和加速折旧的政策以促进积累。在金融政策上，限制货币发行和信贷以控制通货膨胀。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奖励出口，规定出口商品一律免税。在社会政策上，1952年通过企业法，规定在5人至2000人工厂中建立企业委员会，职工代表参与决定企业的各方面事务。1955年，为服务行业制定了职工代表会议法，内容同企业法相似。两个法令的通过使劳资矛盾有所缓和。60年代联邦德国很少有罢工，每100个就业人员因罢工而损失的劳动日每年仅为23个，这个数字比日本的147个、英国的233个、意大利的1305个要少得多。

1967年6月，联邦德国通过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这一稳定法被称为20世纪中期经济干预的伟大宪章。过去，联邦德国政府基本按照艾哈德提出的“社会经济理论”行事，对经济的干预是有限的。1966年4月发生经济危机，持续了15个月。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7.6%，失业人数达到67万。在危机的影响下，经济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席勒提出稳定法。过去，11个州和25,000个城镇每年都自行制定自己的预算，国家无法制定多年的财政计划和相互协调的政策。新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把财政权集中到中央。联邦政府可以制定统一的五年财政计划和中期公共投资纲领。另外，国家通过联邦银行建立经济平衡准备金，可以根据需要停止支付预算资金、限制贷款，或向银行借债以扩大公共开支等。政府用这些手段稳定经济发展，争取1968年达到四个经济目标：即价格稳定，年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充分就业，失业率不超过0.8%；对外经济平衡，出口顺差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适中的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维持在4%左右。实施稳定法后，成绩显著，四项目标均成事实。联邦德国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长期执政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基督

教民主联盟长期执政。它的领袖康拉德·阿登纳连续四届担任政府总理，直到1963年，被称为“铁腕人物”。

在1949年初次进行议会选举时，全国有16个政党参加竞选。其中六个小党连一个议员席位也没有获得。另外一些党也只获得很少几个席位。人们对这样多的政党感到厌烦。1953年修改选举法，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党才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这样，许多小党在政治舞台上难以立足，逐渐解体或为大党所吞并。议会中逐渐形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通称联盟党）同社会民主党对抗的局面。自由民主党则稳定地保持着少数派地位，起着某种平衡、缓冲作用。共产党于1956年8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68年后，被允许合法活动，但未能取得5%的选票，没有进入议会。极右分子于1964年组织国家民主党，被人们称为新纳粹党，为多数人所唾弃，也未能进入联邦议会。

1957年，联邦德国举行议会选举。这时，阿登纳政权的威信极高。一方面，它引导国家走出战争废墟，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另一方面，争取到西方废除占领法规，使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了完整的主权。联邦德国还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西方结成巩固的联盟。同时，阿登纳于1955年9月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基督教民主联盟对自己执政的成果引为自豪。它在1957年竞选中提出的口号是，“不要搞实验”，认为按原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可以了。社会民主党提出不同的政纲，主张经济国有化，政治中立化，要求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各自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选举结果，联盟党大胜，获得50%以上的选票和席位。社会民主党获得1/3的席位。

社会民主党在历次竞选中接连失利，党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愈来愈大。1959年11月，党在戈德斯贝格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纲规定，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党纲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只说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理论、人道主义，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政党。关于党的任务，党纲不讲阶级斗争，只说用“文明、和平”的手段，建立一个“人人机会相等”、“能够伸张正义”的社会。关于经济政策，党纲不强调国有化，提出要保护私有制、保护自由竞争。在对外政策方面，党纲表示赞同参加西方防务、实行义务兵役制。

1961年9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获242席，丧失多数地位。社会民主党力量大增，获190席。自由民主党获67席。阿登纳继续担任总理，同自由民主党合作，组成联合内阁。但他的威信下降，不少人要求他辞职下台。1963年10月15日，在新一轮选举到来之前，阿登纳被迫宣布辞职。原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接任总理。

艾哈德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中居于少数的新教领导人，作为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得到人们的赞扬。上台后，他把政府变成更合传统的内阁制，而不是阿登纳时期的“总理民主制”。但他缺乏阿登纳那样的坚强意志和政治手腕，无力制止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的严重派系斗争。1966年春，联邦德国发生经济危机。内阁决定大幅度增加税收。自由民主党反对，于1966年10月退出内阁。艾哈德内阁垮台。

自由民主党想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新政府，但是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样一个内阁只能获得勉强超过半数的支持。另一方面，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不顾各自党内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决定组成一个大

联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库特·基辛格担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在基辛格执政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席勒提出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取得成效，社会民主党声誉大增。1969年举行议会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下降，分别为242席和30席。只有社会民主党增加了席位，获得224席。10月，社会民主党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从而结束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20年的历史。

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联盟党的再度执政 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自由民主党人谢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1930年缪勒下台后，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出面组阁。

勃兰特原姓弗拉姆，1913年出生于卢卑克的工人家庭里。1930年参加社会民主党。因从事反纳粹活动，被迫流亡北欧。战后回国，先后担任西柏林的议长和市长。1964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上台后，推行新东方政策，同苏联、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努力改善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勃兰特的这一政策遭到国内不少人的反对。联盟党利用这一情绪，于1972年4月建议议会举行对勃兰特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并推举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泽尔接替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全力反对这一谋划。4月26日，议会投票，联盟党以两票之差未能如愿。

勃兰特见自己在议会中地位不稳，乃于1972年9月举行信任投票。他指使本党议员投弃权票。这样，政府便“失去了议会信任”。勃兰特以此请求总统海涅曼宣布解散议会。1972年11月19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45%的选票，而联盟党获44.9%的选票，两党力量不相上下。社会民主党在自由民主党支持下，据有半数以上票数。

1974~1975年，联邦德国遭受经济危机打击，工业生产下降12.3%，物价上涨11.1%，全失业人口超过100万。危机开始后，政府同工会的关系发生麻烦。1974年初，公用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勃兰特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否则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工会不听，举行三天罢工后，争取到提高工资11%。政府威信受到损害。不久，又发生纪尧姆事件。纪尧姆于1955年从民主德国移居联邦德国。1973年任勃兰特的党务秘书，是勃兰特的亲信。1974年4月，纪尧姆被捕，承认是民主德国间谍。5月，勃兰特以承担政治责任为名，辞职下台。

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施米特接替勃兰特担任总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根舍。施米特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北方(汉堡)人，自信、精明。他领导联邦德国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顺利地走出70年代的危机。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低下，政府威望不断提高。1980年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施米特连任政府总理。

1980年，联邦德国经济陷入危机。1981年工业下降1.3%。年底失业工人达到170万，占全体工人的7.3%。财政拮据，1981年的赤字高达398亿马克。对如何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执政的两党发生分歧。社会民主党主张更多地采用国家干预手段，增加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自由民主党则主张扩大私人企业的投资。为了平衡财政收支，社会民主党主张向高收入者征收附加税，而自由民主党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失业补贴和医疗费用。1982年9月12日，经济部长、自由民主党人拉姆斯多夫提出经济备忘录，建议削减失业救济、减少房租补贴、取消产假工资、领养老金者需如数交纳医疗保

险费、用间接税代替直接税等。施米特拒绝这一要求，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法定准则。自由民主党四名内阁成员遂于9月17日集体辞职。政府陷于危机。施米特想仿照勃兰特的做法，以得不到议会信任为由，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另组内阁。但反对党抢先一步，推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为新总理候选人，并于10月2日在议会对施米特进行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结果，施米特以235票对256票败北，被迫下台。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职总理被免除职务。

1982年10月，科尔就任总理。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科尔于1930年生于路德维希港。195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73年起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的上台使在野13年的联盟党重新执政。

1983年3月，议会举行选举。联盟党获胜，得244席。社会民主党193席，自由民主党34席。此外，绿党获27席。绿党成立于1980年1月，成员主要是教师、医生、中小工商业者、学生等中产阶级，共三万多人。绿党对内主张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反对利用核能，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建立能维护生态平衡的经济制度；对外主张和平主义的中立政策，要求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绿党的出现是联邦德国政治中的新事物，但它尚不能起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科尔上台后，不断扩大国家投资，鼓励私人建厂，以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紧缩政府开支，限制社会福利，以平衡财政收支。科尔政府的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摆脱80年代初的危机，转入恢复发展阶段。1986年的国民总产值达到19,510亿马克，比1985年增加2.5%。1986年的外贸顺差多达1000亿马克。

1984年5月，爆发了联邦德国历史上历时最长、代价最高的一次劳资纠纷。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万多名冶金工人于5月14日举行罢工，要求在不减薪的条件下实行35小时工作周。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响应。到6月初，直接或间接卷入罢工的人数超过40万。资方拒绝工人的要求，并关闭一部分工厂，向罢工者施加压力。但工人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迫使资方让步，答应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38.5小时工作周，并提高工资5.3%。

科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同美国、西欧保持友好关系，说联邦德国的“安全只能由美国加以保护”。同时宣布继续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但实际上有所削弱。

第二节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因无法改变政府频繁更换的局面和无力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于50年代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给戴高乐以全权,请他创建新政体,并同意他将新宪法草案直接提交人民决断,而无须事先提交议会批准。

1958年6月戴高乐接管政权后,立即任命一批专家起草新宪法。9月4日,即第二帝国被推翻的88周年纪念日,戴高乐总理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的大会上,向法国人民提出了一部新宪法。9月28日,举行公民投票。在各政党中,只有共产党人、激进社会党中的孟戴斯-弗朗斯派表示反对。80%的投票赞成新宪法。1958年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新宪法规定,议会由直接选出的国民议会和间接选出的参议院组成。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特点是扩大了总统的权力。总统不是议会成员,不由议会选举产生,而由议会议员以及各行政区、海外领地和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团选出,任期七年。1962年,宪法经过修改后规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总统不仅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而且是三军统帅,拥有通常的行政职能,被授予广泛的任命权。总统可以要求议会重读提交给他签署颁布的法令。在与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后,可以解散议会。宪法第十六条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行使自行决定的独裁措施的权力。但在他行使非常权力的时候,不得解散国民议会。

新宪法所建立的政权机构是一个混合体,一半是总统制,一半是议会制。它还保留着向议会负责的总理职位,规定日常工作由总理负责主持。但新宪法使权力重心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立法机关转移到行政部门,而且在行政部门内部,最后定夺的权力在总统而不在总理。

新宪法通过后,1958年11月举行第五共和国的首次议会选举。仓促组成的戴高乐派新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得票最多,获得206个席位。比内领导的独立党占据第二位。其他政党得到的席位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社会党得47席,共产党得10席。

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提名德勃雷做他的总理。各部部长开始时还有一部分由前届政府中的政治家留任,后来逐渐换成技术人员和文职人员。

法兰西共同体的建立与衰退 在第四共和国结束之前,印度支那、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各种分散的法国领地问题仍是巴黎的难题。

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以代替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兰西联邦。共同体废止过去的中央集权制,给各成员国以内政方面的自治权,并允许它们随时退出共同体。1958年8月,戴高乐对非洲的法国海外领地进行了一次旋风般的访问,对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所有海外领地提出了两种前途,让它们自己抉择:或投票赞成宪法,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或不同意宪法而获得独立。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国将停止一切援助,同时这些领地也将失去它们在法国关税体系中的优惠地位。最后,除几内亚外各海外领地都批准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

法兰西共同体成立后,法国同海外领地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问题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使法国陷入泥

潭。能否妥善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关系到第五共和国的前途命运。

戴高乐上台时，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脱离法国独立，而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后裔则要求同法国一体化，提出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戴高乐没有满足任何一派的要求。他走的是一条摇摇摆摆的曲折道路，忽而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忽而采取含糊的和解姿态。1959年9月，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建议成立一个“依靠法国援助，同法国紧密联系而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治理的阿尔及利亚”。但是，两派都拒绝接受。

1960年1月19日，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尔筑起街垒，拒不服从巴黎的命令。戴高乐采取强硬措施，1月29日，他穿着将军服，戴着洛林十字章，在电视台发表演说，重申政府的自决政策，并要求所有的部队都必须服从命令。全国举行一小时的象征性总罢工，支持戴高乐的决定。叛乱陷于孤立，迅速失败。

这以后，戴高乐将主张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部长排挤出政府。1961年1月，又进一步举行公民投票，征询国民对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意见。结果，56%的登记者投了赞成票。

殖民主义者见前景不妙，便再次作乱。1961年4月22日，夏尔·泽勒、萨朗和儒奥四名将军在阿尔及尔逮捕了法国政府代表莫兰和罗贝尔·比隆，夺取了政权，声明他们的意图是以武力维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叛乱得到大约20,000名法国外籍志愿部队的部队和25,000名伞兵的支持。传说，他们将进军巴黎，夺取全国政权。戴高乐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法国。后备役军人在巴黎被征召起来。治安防卫部队也开进了这个城市。除了一些极右翼团体外，各政党都提出支持政府的保证。4月25日夜，忠于政府的军队开进阿尔及尔，叛乱流产。此后殖民主义者转而进行秘密恐怖活动，多次图谋暗杀戴高乐，都没有得逞。

1961年5月20日，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开始举行会谈。最后于1962年3月18日，在埃维昂签署协议，决定停火，并举行公民投票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4月8日，法国80%以上的公民投票赞成这一协议。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人主张独立。法国接受了这一投票结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侨居在阿尔及利亚的100万欧洲人大多不愿留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内，有八九十万人空手逃回法国。

在法国同阿尔及利亚商讨解决相互关系的时候，法国在非洲的海外领地除法属索马里外都于1960年宣布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并没有同法国完全断绝关系。它们的货币仍然同法郎保持着密切联系。法国通过双边协定和经济援助仍在这些国家中保持着重要地位。但这些国家毕竟独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设想的法兰西共同体已名存实亡。有人说，出现了一个“改造了的”或“第二”共同体。它的最高机构是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委员会。各国领导人在这里聚集一堂，在平等的基础上商讨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

1969年2月，30个讲法语的国家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召开会议。会议初步决定设立一个机构，以促进各成员国间的文化和技术情报交流。1970年3月，在尼亚美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巴黎成立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机构。参加这一机构的有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南越、布隆迪、喀麦隆、乍得、象牙海岸、达荷美、加蓬、上沃尔特、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和突尼斯，共21个

国家和地区。法国希望通过加强文化交流来维持和发展原有的联系。

60年代的经济政治状况 第五共和国建立之时，法国的经济和1953～1957年的繁荣年代相比，已经衰退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资财，使国家陷于国库空虚、通货膨胀、外贸收支逆差的困境。1958年12月，法郎贬值17.55%，由420法郎兑换1美元改为493.7法郎兑换1美元。1960年1月1日，进行币制改革，1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

进入60年代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60～197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5.6%，超过1950～1960年期间的4.8%。在法国第四个（1962～1965年）和第五个（1966～1970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传统的纺织、煤炭工业有所削弱，新兴工业发展迅速。机械工业的产值从1950年的104亿法郎增为1973年的1830亿法郎，提高了16.5倍。汽车工业在60年代创造了生产新纪录。1970年，生产了275万辆汽车，比1960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在飞机制造方面，法国居于世界第三位。达索航空公司制造的“幻影式”歼击机在世界享有盛誉。到1970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超过英国，但位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四位。

随着生产的发展，法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58年有10.5亿美元，1965年增为52.1亿美元。法国经济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1965年2月12日，法国财政部宣布退出金汇兑本位制，恢复法郎的金本位制。

法国人口长期增长缓慢。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50年间，人口只增长了10%。但从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人口就由4100万扩大为5000万，增长了将近20%。在这500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明显下降，从总人口的20%降为14%。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占到劳动人口的40%。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经济的发展。

60年代初，戴高乐由于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声望大增。总统办公的爱丽舍宫成为权力的化身。1962年4月，戴高乐提名他的办公厅主任乔治·蓬皮杜接替德勃雷担任总理。蓬皮杜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原是一家大商业银行的代理人，善于理财，但不大了解议会。政府同议会的关系比较紧张。戴高乐认为，现行制度过于受制于议会。1962年9月，他提出宪法修改案，规定总统通过普选产生，并建议就这一修改案举行公民投票。大多数议员反对举行公民投票，并对蓬皮杜提出弹劾。戴高乐乃解散议会，宣布公民投票和议会选举齐头并进。

1962年10月28日，法国公民不顾老牌政党的意见，以1300万票赞成，800万票反对，通过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修改案。随后举行了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得绝对性的胜利，保卫新共和联盟和民主劳工联盟赢得230席。社会党得67席，人民共和党和独立党等中间党派得53席，共产党得41席。蓬皮杜战胜弹劾案，继续执政。

在对外政策方面，戴高乐推行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坚持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核扩散条约。1960年2月试爆了原子弹，1965年发射了人造卫星。19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军事机构。戴高乐强调欧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积极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力图同联邦德国建立密切关系。1963年1月，法国和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规定两国的首脑和外长定期举行会议，协调彼此的政策。他拒绝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1964年1月，在西方大国中首先与中国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并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60年代中，戴高乐的地位和声望达到空前高度。但社会中也有一股不小的势力反对戴高乐的政策。左翼和右翼都反对独立核力量政策，认为它是既费钱又无用的威望政策。从阿尔及利亚逃回国的人仍留恋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不少群众对总统的独断专行不满，对政府推行的节约政策和反罢工立法不满。1965年首次举行全民选举总统，戴高乐竟然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不得不进行第二轮选举，方才获胜。1967年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只取得勉强多数。两次选举表明，戴高乐派的势力在衰落。

1968年5月，法国发生群众运动风暴。在这之前，巴黎大学的农泰尔分院已出现学生运动，斗争矛头指向教育制度和学校的教授。5月，斗争规模迅速扩大。各地大学生纷纷罢课游行。一些学生占据校舍，构筑街垒，同政府派去的警察发生冲突。5月12日，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每月保证大约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并在首都巴士底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大示威。戴高乐于5月19日发表讲话，说“改革可以，乱来不行”。此后，戴高乐长期不露面。国内局势日益混乱，谣传戴高乐将辞职。5月30日，戴高乐在得到军队的支持后发表一个强有力的声明，戳穿他将辞职的谣言。接着，他宣布解散议会，发布法令，将最低工资提高35%，并许诺进行教育改革。戴高乐的声明成为局势发展的转折点。这以后，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支持总统的政策。罢工工人因工资得到提高纷纷退出运动。学生的斗争因纲领不清和领导不力而陷于瓦解。

1968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左派失利。戴高乐派获得议会487席中的358席。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德姆维尔接替蓬皮杜担任总理。

五月风暴过后，局面逐步恢复正常，但远非一切已平安无事。工人工资的提高，造成国家开支过大，赤字增加。专家建议法郎贬值，遭到拒绝。结果，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罢工迭起。1969年3月，全国有900万工人参加罢工。不久，戴高乐又犯一致命错误。他认为参议院已不再对国民议会起牵制作用，这个作用已转到总统手中，因此建议将参议院同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合并，只起顾问作用。4月，戴高乐将这项建议案提交公民投票决定，并说如果多数不赞成这项改革，他就辞职。1969年4月27日举行投票。结果，47%的票赞成改革，52.4%的票反对。第二天，戴高乐辞职下台。1970年在他的家乡科龙贝逝世。

1969年6月，蓬皮杜当选为总统。他继续执行戴高乐的政策，但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新上台的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于8月8日决定将法郎贬值12%，以改善法国经济状况。在对外政策方面，同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并同意就英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和英国谈判。

德斯坦和密特朗总统 1974年4月，蓬皮杜总统病逝。法国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大家预测，不是戴高乐派胜利，就是社会党上台。但是，出乎预料，取得胜利的是共和党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他是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8%对49.2%的微弱多数战胜社会党的密特朗的。德斯坦上台后，仍需戴高乐派的支持，提名保卫共和联盟的希拉克担任总理。

1974年7月，法国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工业生产下降16.3%，失业人口超过100万。希拉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经济，于1975年中渡过危机的最低点，但没能把法国经济引向繁荣。

1976年8月，巴尔接任总理。他在经济滞胀的情况下，推行紧缩通货和节约开支政策，引起劳工的不满。社会党和共产党力量大增，并于1972年再度结成同盟，对抗政府。1978年春，举行议会选举。德斯坦的共和党改名为法国民主联盟，获122席。保卫共和联盟获155席。社会党和共产党因两党同盟在选举前六个月破裂，没能战胜执政党，分别获得117席和86席。

1981年4月，法国举行总统选举。民主联盟的候选人、现任总统德斯坦提出“自由、安全、和平”的口号。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希拉克强调走“没有冒险的变革”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安全中复兴。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针对法国内部问题成堆的情况，强调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广泛的改革，提出了“就业、和平、自由”的口号。共产党候选人乔治·马歇也提出改革的主张。四位候选人力量不相上下，竞选十分激烈。第一轮投票后，没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第二轮投票中，密特朗以52.24%的多数票战胜德斯坦当选为第四位总统。

密特朗生于1916年。巴黎大学毕业，获法学和文学学位。1938年入伍，作战受伤被俘，被关在德国集中营里18个月，后潜逃成功。1947年，31岁时担任退伍军人部部长，是第一帝国以来最年轻的部长。50年代是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第五共和国建立后，他成了反对戴高乐派的中坚人物。1970年，任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1971年6月，该党同社会党等合并，密特朗任党的第一书记。

密特朗于1981年5月正式就任总统。6月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大胜，获285席。共产党得44席，保卫共和联盟得88席，民主联盟获63席。6月23日，社会党同共产党签订“共同执政协议”。法共作了让步，表示支持密特朗的改革，支持法国为保证欧洲和世界力量平衡的行动，支持法国参与欧洲共同体活动，主张为裁减欧洲军备而进行国际谈判。法共还放弃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支持。协议宣布，主张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希望波兰能自己很好完成其经济、社会和民主复兴工作。协议签订的当天，组成以社会党元老莫鲁瓦为总理的新政府。内阁共44名成员，其中社会党37名，共产党4名。共产党人担任运输国务部长、职业培训部长、卫生部长、总理府负责人事与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这是法共34年来第一次参加政府。

密特朗上台后，宣称要实行法国式社会主义，大力推进改革。在经济方面，他根据社会党的学说进一步加强经济干预。1944~1946年期间，法国曾推行国有化运动。1982年，密特朗再次掀起国有化高潮，把9个工业集团、39家银行和工业金融公司收归国有。原来，国营企业只在煤炭、动力、运输等部门占据重要地位。1982年国有化运动后，国营企业在人造纤维工业、有色金属业和航空工程中占据了优势。在金融领域，国营部分原来就有很大比重，现有新的发展。国家直接或间接占有全部或多数资本的注册银行由30家增为94家，存款额从占总额的59.2%升为87.6%。密特朗的国有化运动使法国的国营企业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据首位。在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密特朗强调民主管理。1982年2月的国有化法令规定，国家只对国营企业进行事后的帐目监督和议会监督，取消原有的事先监督。1982年7月的计划化改革法规定，国家同国营企业签订互相承担义务的计划合同。在国营企业内部设董事会，董事长由国家任命，成员由国家代表、职工代表和经济界代表组成。职工董事同样拥有表决权。社会党政府还扩大社会福利事业，提高最低养老金、家庭补贴和住房补贴。

密特朗也十分关心政治改革，他认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新的权力概念，即民主管理决策机构，由人民治理国家，权力下放和放宽国家控制”，想逐步改变中央集权制。密特朗提出要限制总统的权力，缩短其任期。在地方上，各省长原由中央政府任命，并集地方行政、公安大权于一身。1981年8月，决定将省议会改为省政委员会，省的行政事务由省政委员会主席负责。省长改为共和国专员，只管警察事务和对省的行政、财务进行监督。在司法方面，1981年8月和9月，议会通过法案，取消国家安全法院，废除死刑。

社会党的加强经济干预政策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问题也很多。1984年2月17日，卡车司机为抗议政府对运输业的抽税，将6500多辆卡车堵在一些重要公路线上，同时在巴黎、里昂等城市周围的道路上展开数十或数百辆卡车缓慢行进的“蜗牛行动”。政府要求先恢复交通再进行谈判。工会妥协，决定拆除路障。结果，卡车司机在政府未作重大让步时就结束了持续一周的堵路斗争。不久，又爆发了洛林钢铁工人大罢工。法国钢铁业连年亏损，要国家补贴。1984年3月，内阁决定改组钢铁业、减少产量、建设现代化新厂，计划在三年内裁减人员四分之一。工人对此表示反对，于4月4日举行罢工。4月12日，3万名洛林工人会集巴黎举行示威，这是社会党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6月，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双双失利。政府处境日趋被动。密特朗决定改组政府。1984年7月，38岁的社会党人法比尤斯接任总理。法共因政见分歧，没有参加新的内阁。社会党和共产党共同执政的局面从此结束。

1986年3月，法国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和左翼运动获得215席，共产党获得35席。保卫共和国联盟（戴高乐派）和民主联盟占居多数，获得291席。保卫共和国联盟主席希拉克出任总理，形成左翼总统和右翼政府共处的局面。希拉克上台后采取了鼓励生产投资的政策，企业利润税率从50%降低到45%，对个人投资者给予优惠，促进了工业投资，从而带动了经济、财政收入和就业的好转。198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通货膨胀率则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平（3.1%）。这与社会党执政第一年0.3%的经济增长率和13.3%的通货膨胀率相比，有了很大改善。

在对外关系方面，密特朗继承了戴高乐的传统，执意追求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但他没有像戴高乐那样提出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口号，而是打出正义、平等、人权的旗帜。他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都对法国构成威胁。他强调要依靠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密特朗执政时期，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逐步扩大。

第三节 英国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在 50 年代初，它的经济情况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好。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

1956 年以后，英国工业发展逐渐走下坡路。1956~1970 年，英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8%，大大落后于日本的 15.3%、联邦德国的 6.5%、法国的 7.2%，也低于美国的 4%。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固定资本投资落后。固定资本投资是技术装备更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前提，但英国资产阶级长期把大量资本输出国外。伦敦金融市场利息率高，吸引着大量用作短期投机的“热币”，使这些资金不能用于长期投资。这样，英国固定资本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低于日本、法国和联邦德国。其次，英国国内生产发展和国际收支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英国是个殖民帝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大的依赖性。战后每逢英国国内生产发展较快之际，生产资料的进口就大量增加，而出口增长的幅度往往落后于进口，从而出现大量贸易逆差，1950 年为 9.8 亿美元，1960 年增为 23.7 亿美元。英国政府不得不经常采取措施来抑制本国的经济发展，以改善国际收支情况。第三，英国企业的技术革新进展迟缓，特别是对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比较审慎保守，在工业管理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英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1951~1975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6%，低于日本的 8.8%、联邦德国的 4.4%、法国的 4.3%、美国的 3.2%。由于上述原因，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 1960 年就落在联邦德国之后，而到 1970 年则排在美、日、联邦德国、法国之后，退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五位。

英国经济增长虽比日本、联邦德国等国缓慢，但比战前快得多。1921~1929 年间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7%，而 1951~1970 年间达到 3%。从国民收入看更为明显。1920 年为 56.6 亿英镑，1939 年反而降为 50.4 亿英镑。战后 1950~1970 年的 20 年间，国民收入由 107 亿扩大为 468 亿英镑，增加三倍多。

战后英国工业的结构发生变化。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有了发展，减少了轻工业品的输入。另一方面，这些亚非国家为实现工业化，扩大了英国机器设备的进口。此外，英国对发达国家的输出比重增加，而这部分输出主要是新兴工业部门的产品。因此，战后英国出现了旧工业部门日趋衰落，而新兴工业部门发展较快的局面。硬煤生产逐年下降，1950 年生产了 2.20 亿吨，1970 年降为 1.47 亿吨。纺织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从 1955 年的 7% 下降为 1973 年的 5.6%。造船业由 3.4% 降为 1.6%。而电子工业、高分子化学工业（塑料、树脂、合成橡胶）增长了十几倍和几十倍。

农业生产在英国经济中占次要地位。它的产值在 50 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6%，70 年代又降为 2%~3%。农业中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次之。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提高农产品的自给率，实行了保证价格制度和补助金制度。当农产品的全年平均价格低于保证价格时，其差额由政府补贴。其次，政府对农业中开垦荒地、施肥、排涝、改良牲畜、改良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给予补助。在政府的广泛干预下，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社会化日益发展。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超过

了法国。1975年，英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为10.5公顷，生产粮食27,564公斤，肉类4646公斤。但英国耕地面积少，平均每人只有0.09公顷。农业虽有发展，但仍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自给率大体从二战前的30%提高到70年代的60%。

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和工党的威尔逊内阁 1951年10月，英国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和各联盟党派以321席对工党的295席，赢得了胜利。温斯顿·丘吉尔再次出任首相。1952年2月，英王乔治六世逝世。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二世继承王位。

丘吉尔上台后，基本上保持了国有化企业。只是在1953年取消了钢铁工业和公路货运事业的国有化，但在1956年又恢复了货运的国家经营。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丘吉尔政府除了规定医疗保健要收取一些费用外，大体上维持了工党时期的政策。保守党的发言人巴特勒甚至说：“福利国家不只是社会党人的发明，也同样是我们的创造。”在防务方面，丘吉尔于1952年2月26日宣布英国制成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是1951年10月在澳大利亚附近的蒙蒂贝洛群岛试制成功的。从此，英国继美苏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5年4月5日，丘吉尔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职。10年后，1965年1月24日逝世。

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的是安东尼·艾登（1897~1977年）。他有过人的才智，1935年刚38岁就当上外交大臣。因不同意张伯伦的绥靖外交政策于1938年辞职。他在丘吉尔内阁中先后任陆军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务。1955年上台后不久，于5月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以345席对277席的优势战胜工党，从而安稳地保证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但是，没过一年半，艾登政府出兵苏伊士运河，不仅遭到埃及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受到美国的谴责和本国工党的抨击。英国的苏伊士冒险以失败告终。艾登也于1957年1月辞职下台。

接任首相职务的是保守党人哈罗德·麦克米伦。他在丘吉尔政府中担任过住房大臣，在艾登内阁中担任过外交和财务大臣。他上台时，英国政局动荡不安。国内因苏伊士冒险失败而笼罩着沉闷沮丧的乌云，各派意见分歧加剧，国际上除原英联邦成员国外，英国受到各国谴责，几乎举目无亲。麦克米伦对自己政府的前景也毫无信心。他就任前曾对女王说，他的政府或许只能维持大约六个星期。但实际情况比预计的好。麦克米伦政府存在了六年九个月。他把保守党重新团结起来，使民族自信心迅速恢复。他会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恢复了同美国的联盟关系。美国答应向英国提供导弹，而英国将继续进行核试验。1957年5月，英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麦克米伦使英国渡过了困难时期。

1959年10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提出“你从来没有生活得这样好”的竞选口号，取得绝对胜利。不久，经济情况变坏。麦克米伦政府于1961年实行工资冻结政策，引起人民不满。同年，英国申请加入它早年曾反对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未获成功。1963年6月，国防大臣普罗富莫的有伤风化的丑闻暴露，使保守党的威信再次受到打击。同年10月麦克米伦因病辞职。

麦克米伦内阁中的外交大臣霍姆伯爵继任首相。按照英国传统，首相必须是下院议员。霍姆为了当首相，放弃了他的贵族爵位，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身份补选进下院做议员。他思想保守，当过张伯伦的私人秘书，曾陪同张伯伦参加1938年的慕尼黑绥靖会议。1956年又极力为苏伊士

运河出兵辩护。霍姆执政时间不长，一年后就因议会选举失利而下台。

工党自 1951 年下台后，内部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以比万为首的左翼反对核武器，主张英国单方面核裁军。右翼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1955 年 12 月，休·盖茨克尔取代艾德礼成为工党领袖。他是个温和派，推行“我也如此”的照办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同保守党的主张没有什么区别。在盖茨克尔领导下，工党在 1959 年选举中大败。党内舆论大哗。1963 年 2 月，哈罗德·威尔逊当选为工党领袖。他上台后竭力弥合左右翼之间的裂痕。1964 年 10 月，举行议会选举。工党不局限于国有化问题，它提出一整套计划以解决工业投资、调整私人收入，以及在国家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等问题。选举结果，工党以五个席位的微弱多数获胜。

威尔逊执政后，于 1965 年 5 月重新将 85% ~ 90% 的钢铁企业实行国有化。他扩大了社会服务，拆除贫民窟，大量兴建公共住房。到 1966 年初，威尔逊信心十足地要求提前举行大选。3 月选举结果，工党获 363 席，而保守党只有 253 席。选举的胜利并未使工党的社会改革政策向前推进。相反，1966 年后工党执政的困难日益暴露。工党的社会改革十分费钱，造成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威尔逊在迟疑一年半后，于 1967 年 11 月决定将英镑贬值 14.3%，1 英镑从兑换 2.8 美元降为 2.4 美元。1968 年 1 月，又宣布在 1971 年底以前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以节约开支，平衡预算。1970 年 1 月，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被击败。保守党多赢得 30 个席位，爱德华·希思任首相。

70 年代的内政和撒切尔内阁 爱德华·希思生于 1916 年，牛津大学毕业。他性格孤僻、冷静，喜好音乐。1960 年任劳工大臣，1964 年成为党的领袖。希思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谋求解决加入欧洲共同体的问题。他在保守党年会上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英国要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占有一个位置就必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英国现在必须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制定欧洲的共同政策”。在希思的促进下，英国在英联邦内部特惠问题上作出让步，于 1971 年同欧洲共同体达成参加该组织的协议。希思极力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影响。他改变前任工党政府的计划，没有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走全部军事力量，而是保留了少量部队，但关闭了英国远东驻军司令部。

70 年代初，英国经济发展缓慢。1971 年失业人口从 60 万增加到 75 万。希思政府采取冻结工资和物价的办法来缓和矛盾。1973 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英煤矿工人看到机会，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希思拒不让步。他认为全国会支持他，乃于 1974 年 2 月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工党比保守党多得五个席位。工党领袖威尔逊再次上台执政。

威尔逊上台后，不得不谨慎从事，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 35%，不再扩大国有化进程。威尔逊还极力安抚威尔士党和苏格兰国民党。后者要求民族自治权力，而工党主张全国统一。威尔逊踌躇不决，只得缓慢地寻求妥协。

威尔逊执政时期正值英国陷于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74 ~ 1975 年间，工业生产下降 11.2%，通货膨胀 24% 以上，英镑贬值 1/4。威尔逊采取严厉措施来防止危机的深化。他同工会签订社会协定，把工资增长率限制在每年 10%。这项协定被视为首相的最大成就，但他本人却丧失信心。1976 年 3 月，威尔逊以年迈为由宣告退休，把职位让给比他还年长四岁的卡拉汉。

伦纳德·卡拉汉 1912 年生于朴次茅斯。1974 年当选为工党主席。卡拉汉的绰号是“快活的吉姆”，快乐而讨人喜欢，并且在短时期内交了好运。

北海石油的产量奇迹般地增长。1970年，英国的石油产量只有8万吨，1976年卡伦翰上台的那一年达到1160万吨，第二年升为3750万吨，1978年5290万吨，1979年7770万吨。在国际石油价格成倍涨价的情况下，石油产量的猛增给英国带来巨大好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通货膨胀率在1977年下降了10%。

为了安抚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通过议案，把中央政府的一些权力移交给这两个地区的议会。但威尔士对此并不满足，否决了这个议案。苏格兰议会仅以微弱的多数接受了它。总的讲，卡拉汉的移交权力计划失败。这两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分子仍对工党政府不满。与此同时，工会对政府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拒绝重新签订限制工资的协定。1978年冬天，罢工迭起。政府威信下降。1979年3月，众议院通过一项不信任案，把卡拉汉赶下台。

1979年5月，英国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保守党取得胜利，获339席。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生于1925年，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女子学院毕业。1951年同丹尼斯·撒切尔结婚。1959年当选为议员。在希思内阁中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成为保守党的领袖。撒切尔夫人秉性倔强，自认负有恢复和振兴英国的使命。她的奋斗目标是恢复英国的传统，使“每个人有工作的权利、花他赚来的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使国家成为仆人而不是主人的权利”。1976年初，撒切尔夫人指责苏联扩张。苏报刊回击，说她是“可怕冷战的巫婆”，是“铁女人”。从此，铁女人的绰号流传于世。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不久，英国于1979年7月爆发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14.8%。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经济。它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控制货币发行量；提高银行利率，紧缩信贷；削减政府开支，减小财政赤字。此外还修改税制，将个人所得税率从33%~83%降为30%~60%，将间接税率从8%~12.5%一律升为15%。撒切尔政府决定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电报和无线电公司、钢铁公司、造船有限公司等实行非国有化，鼓励私人企业和个人积极性。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国民经济从1982年起回升，1983年的增长率达到3.5%。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从1980年的最高点21.9%降到1983年底的4.5%。这是十年来最低的膨胀率。国际收支则从1980年起连年顺差。但是，紧缩政策使英国失业人数有增无减。保守党执政头四年，失业人数增加200万。1984年底的失业率高达12.8%，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84年英国发生自1926年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在1984年3月6日宣布要关闭全国174个矿井中的20个矿井和裁减2万名矿工。煤矿工人强烈反对。3月9日，苏格兰和约克郡的7万名矿工率先罢工。各地纷纷响应。到3月底，全国3/4的煤矿全面停产，80%的矿工投入罢工斗争。煤矿工人的斗争还得到全国职工大会的支持及码头和汽车工人的罢工声援。撒切尔政府对罢工早有准备。它大力宣传关闭落后的、亏损的矿井的必要性，争取舆论的同情。它储备了足够的煤炭，保留了发电厂的烧油设备，准备同矿工工会长期周旋。1984年10月10日，高等法院以蔑视法庭罪宣布对全国矿工工会及其主席斯卡吉尔分别判处罚款20万英镑和1000英镑，并限期14天内付清。10月25日，法院又以未按期交罚款为由，下令没收矿工工会的财产。这以后，双方冲突日趋激烈。矿工斗争十分英勇，但无出路，于1985年3月5日，宣布结束罢工。

北爱尔兰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它的 65% 的居民信奉英国新教。他们的政党——统一党居支配地位。35%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愿意同爱尔兰共和国合并。1967 年，北爱尔兰民权协会成立。它主要由天主教徒组成，要求扩大民权。在民权协会和部分群众要求下，北爱尔兰政府作了一些改革。这引起新教极端派不满。他们组织反政府游行，并袭击从事民权活动的天主教徒。在这种情况下，沉寂多年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天主教徒保护者的面目又重新活跃起来。两派斗争不断激化。1969 年，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发生持续数周的暴乱。双方都动用武器进行恐怖活动。英政府派部队进驻，把交战双方隔开。英军宣布它是来维持秩序的，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可是，实际上逮捕的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这引起强烈不满。1972 年 1 月 30 日，一万多人在伦敦德里举行反政府游行，遭到英军开枪镇压，死伤几十人。3 月，英国废除北爱尔兰议会，进行直接统治。1973 年 3 月，英国政府提出北爱尔兰宪法草案，规定按比例代表原则成立一个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议会和政府，确认天主教徒在选举、参政等各方面权利平等。6 月，经过选举，成立了以统一党为首的联合政府。12 月，英国、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三方举行会谈，决定成立爱尔兰事务委员会，由爱尔兰南北双方相等代表组成。同时，爱尔兰表示尊重英国对北爱尔兰六郡的主权，而英国表示在北爱尔兰多数同意下，不反对爱尔兰全岛统一。

联合政府和英爱协议得到多数人支持。但共和军认为，这意味着英国对北爱尔兰事务干预的永久化，表示坚决反对。冲突仍不断发生。1969 ~ 1982 年间，共发生爆炸事件八千多起。到 1984 年底，已使 2400 人丧生，数万人受伤。1980 ~ 1981 年间，被监禁的共和军成员为争取政治犯待遇进行绝食斗争，先后有十人绝食而死，但撒切尔政府拒绝让步。英政府为调解两派冲突，多次提出设立分权政府和分权议会，并进行过多次尝试，均未成功。英国还同爱尔兰共和国接触，商讨解决办法。1985 年 11 月 15 日，英爱签署协议，规定英国对北爱尔兰长期拥有主权，爱尔兰政府则在北爱尔兰事务中有正式发言权。

在对外关系方面，英国同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发生武装冲突。马岛位于南太平洋，面积 1.2 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1800 人。1883 年英国占领马岛至今。阿根廷要求对离它仅 550 公里的马岛拥有主权。英阿多次谈判，没有结果。1982 年 4 月 2 日，阿根廷派军队占领马岛，宣布马岛为其第 24 个省。撒切尔夫人立即成立战时内阁，全权处理马岛事务。为了争取外交主动，英国向联合国提出申诉，使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阿根廷撤军，阿英谈判。与此同时，英国派遣海军的三分之二作战力量前往马岛。在经济上，冻结阿根廷在英的全部财产。英国逐渐摆脱被动处境。4 月 8 日，美国和联合国出面调解。5 月 20 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宣布调解失败。5 月 21 日，英军发起进攻。6 月 20 日，占领整个群岛。

马岛事件后，英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撒切尔夫人地位也随之加强。她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在 1983 年 6 月的选举中大胜，获 397 席。工党的席位比上届减少 59 个，为 209 席。1981 年从工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同自由党结成同盟，得 23 席。

撒切尔首相在第二任期内同中国谈判解决了香港问题。1984 年 12 月 19 日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规定，1997 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

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英国经济改革，曾被看成是医治经济上积重难

返的“英国病”的一帖良方。但是，这一药方虽显效于一时，却并非万能，英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89年6月份达8.3%，1990年底高达11%，是西欧平均数的两倍。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高利率政策，又导致生产和消费下降、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外贸逆差不断扩大，1988年英国国际收支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47亿英镑（约合253亿美元），使英国经济处于衰退的阴影笼罩之下。撒切尔主义前些年取得的某些成就，是以加剧社会对立和矛盾为代价的。她当政11年来，富人得到更多的“实惠”，而穷人则更穷了。她强制推行的人头税，更是遭到普遍的反，有的地方酿成严重的暴力骚乱。英国经济的严峻形势和日益加剧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导致撒切尔夫人下台的根本原因。1990年11月，她在竞选保守党领袖的第一轮投票中差四票未能获胜，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激流勇退，无可奈何地宣布退出竞选，并辞去担任11年之久的首相职务。英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撒切尔时代就此宣告结束。

第四节 意大利的进展

五六十年代的巨大进展 战后意大利经济取得巨大的进展。1951~1965年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8.3%，仅低于日本，超过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从1950年到1970年，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成倍地增长，钢产量从236万吨增长到1728万吨，发电量从247亿度增长到1174亿度，原油从8000吨增长到141万吨，汽车从13万辆增长到185万辆。

意大利政府推行企业国有化政策。到1972年，国有经济在总生产中约占12%，在工业中约占1/3，其发展程度仅次于法国和奥地利。政府还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人民的生老病死均有照顾，16岁以下儿童免费接受教育。在意共党员担任市长的城市中，上下班时间乘公共汽车免费，工厂通常发放廉价或免费午餐。1975年，政府的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6%。

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政府在分配土地给缺地户后，又制定了发展南部的15年计划（1950~1965年），投资几十亿里拉，帮助南部发展农业和其他经济。在政府帮助下，农业总产值在1950~1970年的20年间增加了66%，其中谷物产量由1136万吨增长到1615万吨，肉类产量由70万吨增为250万吨。

意大利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1950年出口额仅为26亿美元，1970年猛增为282亿美元。但意大利的进口量经常超过出口量。贸易赤字主要靠旅游业来弥补。为了吸引乘汽车观光的旅客，政府修整了公路。1964年，当时欧洲最长的超级公路——从米兰到那不勒斯的公路通车。1965年又凿通意法边境的山下隧道，使从日内瓦到都灵的路程，在夏天缩短大约56公里，在冬天当山路隘口被大雪封住的时候可缩短518公里。

意大利政治舞台上，天主教民主党占据着特殊地位。从1945年一直到1981年，政府总理都是天民党人。社会党和共产党拥有较大的势力。它们在1947年被排挤出政府后，联合起来对抗天民党，使后者在议会中得不到多数席位。1953年7月，德·加斯佩里辞职下台。这以后，天主教民主党的左、中、右三派领袖先后出任总理。他们或是争取右翼的自由党人、君主主义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的支持，或是争取左翼的共和党和民主社会党的支持。但是，从未组成一个成功的政府，每届内阁的任期都不超过两年。

1956年波匈事件后，彼得罗·南尼的社会党不满苏联的行动，决定中断同意共的联盟，并转而主张同天民党合作。天民党书记阿明托雷·范范尼也竭力主张向左开放。但是，党内的保守势力否定了这一意见。直到1963年底，才组成天民党、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共和党的联合政府。新内阁中，范范尼被牺牲了，因为他的强硬作风引起多方面的反感。继任总理的是更年轻更随和的天民党人阿尔多·莫罗，副总理是社会党人南尼。

新成立的中左政府推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范范尼政府在1962年实现了电力工业的国有化，扩大了养老金的数额。莫罗政府提出了控制城市发展、大规模补助教育事业、促进南方工业化等建议。但总的讲，中左政府建树不大。一方面，通货膨胀问题限制了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天民党和社会党存在着意见分歧。一个老问题是政教关系问题。社会党支持制定允许离婚的立法，认为它将会使许多家庭关系合法化，使许多私生子合法化。但梵蒂冈反对，天民党也反对。这一问题的争执曾导致政府危机，直到1970年才通过一个有限制的离婚法。另一意见分歧是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天民

党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宁可政府辞职也不在共产党选票支持下继续掌权。社会党内部各派对共产党的态度不一致。左翼反对参加天民党内阁，于1964年1月另组“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继续同意共合作。南尼的社会党人在地方上经常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控制着一些城市。有些人想把这种合作关系带进中央政府，右翼坚决反对。南尼极力调和各派矛盾，并于1966年同社会民主党重新联合起来。可是和解只是表面的。右翼指责马蒂诺派同意共勾搭，于1969年7月退出社会党，另组“统一社会党”，1971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分裂造成政府危机。天民党人鲁莫尔先组成一党政府，继而在离婚法问题上让步，才于1970年3月同社会党等重建联合内阁。但新内阁不如莫罗政府，政绩平庸，无所作为。

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政治情况 意大利在60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成为第一流经济强国，但对石油进口依赖很大。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意大利首当其冲，受害甚大。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为了摆脱危机，稳定政局，极力寻求扩大政治基础，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对手——共产党。

意共是国内第二大党，也是西方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它领导着一些市政府，还平稳而有效地经营着它的合作社。它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主张各国党有权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73年底，贝林格领导的意共提出，与执政的天民党实行“历史性的和解”。1976年议会选举，意共获得34.4%的选票，仅比天民党少4.3%选票。天民党不能忽视意共的存在。新上任的天民党总理安德烈奥蒂说服本党接受共产党的支持。1978年，共产党同政府的合作又前进了一步，从弃权方式的支持进而参加支持政府的议会多数派。天民党政府在共产党支持下，采取限制工资的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降了下来。国民生产总值从1976年的1728亿美元升为1979年的324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合作没能持续下去。1979年意共退出议会多数派。1980年提出“民主取代”政策，主张联合社会党和天民党中的进步势力组阁。

1981年，发生共济会丑闻。三名部长及几百名委员卷入窃取机密、制造事端的非法活动，福拉尼内阁倒台。执政35年的天民党被迫让出总理职务。1981年5月，共和党帕斯多利尼上台组阁。在他的两届内阁执政时期，意大利经济滞胀严重。天民党主张削减财政赤字，控制工资增长，紧缩信贷以对付通货膨胀。而社会党要求放宽信贷，增加投资刺激生产以减少失业。双方争执激烈，最后天民党得势。1982年12月，再组天民党政府。

1983年8月，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组建第四十四届内阁，这是意大利社会党第一次执政。但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只占10%左右，居于天民党和共产党之后，无力单独组阁。社会党不愿同共产党合作，遂联合天民党、社民党、共和党和自由党组成五党政府。其中天民党占据重要地位，担任副总理及外交、内政、国库、司法等关键的部长职位。克拉克西政府上台后，在加快科技革命步伐、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经济活动信心、刺激投资和调整劳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自1984年开始大幅度增加科研经费，以赶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0.9%上升到1987年的1.5%。由于采取了有力的紧缩措施，多年来居于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率于1985年降为8.6%，1986年底再降到4.5%。意大利劳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1986年罢工损失的工时只有1975~1983年平均数的六分之一，达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政府还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在加强新兴部门开发的

同时，调整了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的关系；调整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压缩产品耗能高的部门，加强耗能低的部门。到1986年，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66亿里拉（约合5154.8亿美元），超过英国，跃为西方第五大工业国。198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5%，居工业大国之首，被西方报刊称之为“意大利式奇迹”。克拉克西政府执政近四年，成为意大利战后任期最长的一届政府。

然而，天民党和社会党争夺总理职位的矛盾日益激化，1987年3月爆发了政府危机。科西加总统调解无效，不得已于4月28日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6月15日和16日举行大选，结果在参议院315席和众议院630席中，天民党分别获得125席和234席（原为120席和225席），社会党获得36席和94席（原为34席和73席）。原执政的三个小党共和党、社民党和自由党的选票均有下降。最大的在野党共产党只得了100席和177席（原为107席和198席）。7月13日，科西加总统授命44岁的天民党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戈里亚组阁。他在错综复杂的党派纷争中暂时缓解了社会党和天民党之间的矛盾，争取了共和党、社民党和自由党参加内阁，使五个执政党就新政府的纲领取得一致意见。1987年7月29日，戈里亚宣誓就任意大利战后第四十七届政府总理，从而结束了近五个月的政府危机。

第五节 欧洲共同体的成立与发展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国崛起，欧洲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西欧的一些领导人迫切感到必须加强西欧各国间的合作以防止走下坡路，沦为美国的附庸。此外，西欧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局势下，十分担心苏联的扩张，希望各国联合以保证自身安全，提高西欧的国际地位。美国对西欧的联合持赞同态度，希望建立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经济发展、军事强大、政治稳定的统一欧洲”，来帮助它抗衡苏联。

战后初期，英国对西欧联合十分积极。它想凭借自己和美国的特殊关系，领导这一联合。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发表演讲，说欧洲国家再相互厮杀下去，终会有一天重新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去。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重建欧洲大家庭，或尽我们所能地给它提供一个机构，使欧洲大家庭得以在和平、安全和自由中安居。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1948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要摒弃传统的均势外交，实现西欧的统一。1948年5月7~10日，欧洲统一运动代表在海牙举行会议。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雷诺、皮杜尔、舒曼，意大利的加斯佩里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发起团体组成联合委员会，以推动欧洲的统一。经过筹备，1949年5月5日英、法、比、荷、卢以及意、爱（尔兰）、丹、挪、瑞（典）十国正式签署章程，成立欧洲委员会，研究欧洲联合问题。由于英法对合作的方式意见不一，欧洲委员会没能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进入50年代后，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愈来愈多的人主张建立一个比较密切合作的联盟，这个联盟不那么依赖美国，有某种独立性。这种想法同英国的设计不一致，因此，英国逐步失去它在水欧联合中的重要地位。

在寻求欧洲联合途径中，法国人让·莫内（1838~1979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莫内靠自学努力，成为一名很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他一生为创建欧洲联邦而奔波，被誉为“欧洲之父”。1949年，他提出一份报告，主张通过经济合作，通过对煤炭和钢铁实行联营共管走向联合。莫内的方案得到法国外长舒曼的支持。1950年5月，舒曼正式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一译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即舒曼计划。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积极支持这一倡议。经过协商，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政府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建立一个管理煤钢事务的超国家组织机构。这个机构有权决定六国的煤钢生产、投资、价格和原料分配，以至发展或停闭某些企业。它还掌管煤钢共同体同其他国家、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煤钢共同体的形成促进了法国与联邦德国和解，也促进了六国经济的发展。1951~1954年期间，六国的煤产量增加了23%，钢产量增加了14.5%。

在煤钢共同体取得成绩的情况下，荷、比、卢三国于1955年5月联合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六国实行电力、原子能、运输等部门的一体化，并成立全面关税同盟。同年6月，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纳开会，讨论三国备忘录，确定了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基本设想和目标，并决定由各国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筹备委员会，具体筹划此事。

由于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不同，要求各异，筹备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努力才达成协议。1957年3月25日，六国政府的首脑或外长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马

条约。

罗马条约共有六大部分，248 条，还附有 11 份议定书和三个专约以及若干清单。条约规定了共同体活动的内容、方式和争取的目标。同一般国际条约不同，该条约是无限期的。它没有规定退出条约的程序，却有欢迎其他欧洲国家参加共同体的条文。这说明，六国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础和起点。

罗马条约设立了一系列组织机构，以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主要机构有：一、部长理事会。它是共同体的决策机构，负责协调各成员国的社会经济政策，拥有制定共同政策、颁布法规和指令的权力。理事会在表决中一般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所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二、委员会。它是共同体的执行机构，负责监督条约的实施和共同体各机构所作决定的执行，代表共同体进行对外联系、谈判和签订协议，管理共同体财务。委员会成员只对共同体负责，不对本国政府负责。三、议会。它与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组织的议会是合一的。1962 年 3 月被正式命名为欧洲议会。议会基本上是咨询和评议性机构，无立法权。它有权以三分之二多数的不信任票，迫使共同体委员会辞职。议员由各国议会推派，1979 年起改为直接普选。四、法院。它也是同其他两个共同体组织的法院合一的。法院是仲裁机构，负责解释罗马条约和共同体各机构颁布的法令和决议，裁决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各机构之间、各公司之间的纠纷。条约还规定设立一系列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如预算委员会、货币委员会等。

1967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三个组织的机构完全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又称西欧共同市场。

英国为了对抗欧洲经济共同体，拉拢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于 1960 年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这个七国集团也采取削减税收措施，但是，它不接受欧洲经济共同体想要达到的那种国际化程度。英国这一措施并未奏效。自由贸易联盟远远敌不过经济共同体。1961 年 8 月，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英国当时不愿放弃英美的特殊关系，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法国等共同体其他成员国否决了英国的申请。直到 1973 年，欧洲共同体才接受英国、爱尔兰、丹麦三国加入。1981 年 1 月 1 日起，希腊成为第十个成员国。1986 年 1 月，欧洲共同体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发展为 12 个成员国。

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最初政策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实现了关税同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并着手建立货币同盟。政治联合也日益加强。

关税同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规定，关税同盟应从 1958 年 1 月 1 日起，经过 12 年过渡期，分三个阶段，于 1970 年 1 月 1 日建成。实行关税同盟的具体内容与做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成员国逐步降低直至最后取消相互间的关税。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1958 年 1 月 1 日至 1962 年 1 月 1 日）削减 30%，第二阶段（1962 年 1 月 1 日至 1966 年 1 月 1 日）再削减 30%，第三阶段（1966 年 1 月 1 日至 1970 年 1 月 1 日）完全取消相互间的关税。

第二，逐步拉平成员国对共同体以外国家的关税，统一对外关税率，以 1957 年 1 月 1 日六国对外关税率的平均数作为共同税率。现行税率高于共同关税的国家，超出部分在第一、第二阶段各减 30%，第三阶段减至共同税率

水平。现行税率低于共同税率的国家，则在每一阶段各按同样比例调高到共同税率水平。

第三，逐步放宽并最后取消成员国相互间的进口限额，每年放宽限额 20%，直至全部取消定额限制。

经过六国的努力，关税同盟顺利实现。1962 年，六国间工业品进口限额全部取消。1968 年 7 月 1 日，即提前一年半，全部取消了共同体成员国间的工业品关税，并实现了 10.7% 对外共同关税税率。1972 年 1 月，又将共同税率减为 8.5%。

关税同盟的建立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它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扩大。1958~1972 年期间，共同体六国的出口额从 227 亿美元增长到 1412 亿美元，增加了 5.2 倍，而美国只增加了 1.7 倍。共同体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增长更为迅速。从 1958 年到 1972 年的 15 年间，增长了 9.7 倍。同期共同体内部贸易在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 30% 提高到 51.7%。其次，关税同盟的建立，刺激了六国经济的发展。六国间关税的逐步消除，使各国不能再用关税保护本国市场。为了提高竞争能力，它们必须加速资本积累，增加企业投资，提高装备水平，以降低产品成本，这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1959~1969 年期间，共同体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5%，高于美国的 4.3% 和英国的 3%。

欧洲共同体在实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六国通过逐步取消相互间农产品关税和统一农产品价格来实现六国间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建立农产品进口壁垒，对共同体以外的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建立共同农业基金，用于补贴出口，调节价格和改革农业结构。由于六国各自的农业状况很不相同，对于实行农业一体化存在着比实行关税同盟严重得多的分歧和矛盾。联邦德国农业不发达，农产品价格高。共同体统一农产品价格将对联邦德国不利。另外，联邦德国进口的农产品，70% 来自共同体以外的国家，价格低于法、意的价格。因此，联邦德国对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一直是借故拖延。经过长期的争吵和协商，直到 1963 年，大部分农产品才实行了统一价格，建立了农产品共同市场，即在六国内部农产品免税自由流通，对外部进口的农产品由征收进口关税改征差价税。与此同时，各成员国按比例缴纳款项组成农业基金，用于保证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鼓励农产品出口和促进农业结构改革。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农业发达的法国最为有利。1958~1973 年间，法国农产品对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增加了 17 倍，促进了法国农业的发展。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也从共同体农业政策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好处。在 60 年代，共同体还基本实现了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过后者仍有某些限制。

在实现关税同盟和农业一体化后，协调货币政策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各国币值和汇率的稳定，六国农产品统一价格制度就难以维持，工农业产品的自由流通也要受到影响。另外，60 年代以来的美元危机冲击着欧洲金融市场。不少人要求建立欧洲统一货币以抗衡美元。1971 年 2 月，六国达成协议，开始建立货币同盟，目标是通过统一各成员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到 1980 年底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1972 年 3 月，六国制定第一批措施，决定建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以稳定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兑换率。但是，不久就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原定计划的实施被搁置下来。

1978 年，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从 1979 年起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主要

内容为：第一，建立欧洲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每个参加国都确定本国货币对欧洲货币单位的中心汇率，并据此确定彼此货币之间的汇率。第二，扩大共同体各国货币联合浮动体系，以稳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使各国货币的上下波动幅度一般不超过中心汇率的 2.25%。第三，建立货币基金，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成员国货币的共同浮动。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为统一欧洲货币，建立全面的经济货币同盟迈出了重要一步。

欧洲共同体不仅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还加强了政治合作，朝着政治联盟方面迈出了步伐。1960 年 7 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会谈时提出六国政治合作的主张。法国建议共同体国家在保持各国独立主权的前提下，组建“欧洲邦联”，以对抗美苏。联邦德国不同意这一建议。它不愿法国在邦联中居领导地位。同时，感到还有求于美国，须冲淡反美色彩。因此，主张建立一个在大西洋联盟内的、超国家的“欧洲联邦”，企图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联邦中掌握实权。共同体其他成员国担心受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控制，因而对上述两个方案都不感兴趣。1973 年，英国加入共同体后，政治联盟问题更趋复杂，更难于达成一致协议。但是，共同体国家的政治合作在曲折中还是取得了进展。1974 年底，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决定把成员国首脑会议制度化，每年举行三次会议，成为凌驾于部长理事会之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定名为欧洲理事会。1979 年 6 月，九国公民直接选出了欧洲议会议员，为政治一体化增添了新的因素。

80 年代的新发展 8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出滞胀，进入发展时期。美国的发展势头不断增强，而西欧国家相对减弱。社会上由此再起“欧洲衰落论”。面对这种形势，欧共体国家感到需要加强联合，以扭转不利形势。1985 年 12 月，欧共体在卢森堡举行欧洲理事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12 个国家的首脑，其中包括 1981 年加入欧共体的希腊和即将于 1986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的西班牙、葡萄牙三国首脑。会议就加速经济一体化、改革决策机制等问题达成原则协议，通过《单一欧洲文件》（一译《欧洲一体化文件》），对罗马条约进行 30 年来第一次重要修改。1986 年 2 月 17 日和 28 日，12 国代表分别在卢森堡和海牙正式签署这一文件。

《单一欧洲文件》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规定在 1992 年年底以前实行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二是限制否决权，实行特定多数表决制。共同体委员会的建议如获欧洲议会赞同，理事会只需特定多数就可通过决定。后来规定，理事会共有 76 票，其中法、联邦德国、英、意各拥有 10 票，西班牙 8 票，葡、比、荷、希各 5 票，丹、爱各 3 票，卢森堡 2 票。特定多数为 54 票。换句话说，否定决议需要有 23 票，需要有三个或更多国家的反对。

为了按期建立统一大市场，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于 1987 年向首脑会议提出实施方案——《为单一欧洲文件的成功而奋斗》。在德洛尔的推动下，欧共体先后通过两百多个法规，以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规格，为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基础。

第九章 5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

第一节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从1947年起扭转了持续恶化的局面，出现复苏的迹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侵朝战争的供应基地。从1950年至1953年，日本为美国提供了24.7亿美元的军火和军需品。这些“特需”订货不仅为处于困境的日本工业品提供了销售市场，而且使日本获得大量的外汇收入，从而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这样，在美国的扶植与支持下，到50年代中期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已达到战前水平，日本经济实现了恢复与调整，并完成从战争经济体制向和平经济体制的过渡。与此同时，在解散财阀过程中暂时受到削弱的财阀也以各自系统的大银行为中心迅速地重新结合，三菱、三井、住友等垄断集团都以新的面目复活。

1956年日本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宣称：“今后的增长将由现代化来支撑。”从此，日本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高速发展时期。1955年至196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5%，1960年至1965年为9.8%，1965年至1970年为11.8%，单就工业而言增长得更快。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7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1955年至1964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期，是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更新和扩大固定资本的阶段。在“赶超先进工业国家”口号的带动下，日本大量引进美国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争相扩大投资，扩建新企业，采用最新技术设备，迅速形成电机、电子、汽车、石油化工、合成纤维和合成树脂六大新兴工业部门，并推动机械工业、有色金属、水泥、塑料和石油精炼等部门的发展。1955年至1964年日本工矿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4.6%，1964年的生产规模相当于1954年的3.8倍、战前的6.4倍，从而为日本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打下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1965年至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期，是经济持续高涨、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急剧扩大的阶段。在前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经济从1965年11月开始至1970年7月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长达57个月的经济高涨期。这期间，日本继续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着重研制和发展能够同欧美抗衡的自主技术。工业生产逐步向大型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在这57个月中，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10.5%，工业生产水平增加2.1倍。195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109亿美元，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为123美元，占世界第三十七位。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975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770美元，上升到世界第十五位。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7倍多，人均收入增加13倍多。总之，到70年代初，日本已大体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主要表现在：一、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达到欧美国家的先进水平，工业生产在部门结构、生产流程、企业管理、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32.6%降为19.3%。同一时期，第二产业的比重从29.2%上升

为 34.1%，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 38.2% 上升为 46.5%。三、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日本的出口产品中，轻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已从 1955 年的 52.2% 下降到 1971 年的 20.6%，而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产品的比重则从 30.8% 猛增到 74%。四、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1950 年日本工业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仅为 1.5%，1970 年已上升到 6.5%。1973 年日本的船舶、收音机、电视机、铝、人造纤维等五种产品的产量已占世界第一位，水泥、橡胶、小汽车、卡车、合成纤维、棉纱等六种产品的产量占世界第二位。五、农业实现了机械化。1967 年，日本水稻的机耕面积、机械收割面积和机械脱粒的比重已分别达到 96%、80% 和 98%，其他农业技术，如栽培技术、农田水利、品种改良等也都达到先进水平。六、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1955 年前后一般家庭追求的三大件（又称“三种神器”）是缝纫机、洗衣机和电风扇。到了 1956 年以后则变为电冰箱、电气除尘器和黑白电视机。1965 年以后人们的欲望则转向彩色电视机、室内空调器和小汽车。1974 年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的普及率达到 90%，吸尘器、缝纫机、石油取暖炉普及率达 80%，彩色电视机、照相机的普及率为 70%，小汽车的普及率也由 1966 年的 12.1% 增加到 1973 年的 36.7%，而且农民家庭小汽车的普及率比城市居民还高。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由战后日本有利的国内外条件促成的。国际上的有利条件是：一、战后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为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度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日本紧紧抓住资本主义世界开展的这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引进先进技术，迅速缩小和拉平了与国外技术的差距。二、战后世界市场的原料、燃料价格长期稳定、低廉，而工业品价格偏高。例如，铁矿石每吨价格 1958 年为 14.96 美元，1967 年降为 12.55 美元，日本进口的石油价格 1958 年每千升为 7114 日元，1967 年降至 4392 日元。相反，1955 年至 1972 年日本工业制成品价格却上涨了 20%。这种情况对缺乏资源而工业产品竞争力较强的出口贸易型的日本极为有利。三、美国的大力扶植。首先是通过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日本以保护，减轻了日本军费负担，例如 1970 年日本的军费负担约为美国的 1/47、苏联的 1/25、法国的 1/4，这就使日本政府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扩大投资，发展经济。其次是从资金、原料、新技术设备、“特需”订货等方面给予经济扶植。1945 年至 1951 年，美国以各种名目给日本的援助达 21.8 亿美元。1951 年至 1953 年日本又从“特需”订货中获得 22.2 亿美元。1965 年以后，每年又通过“越南特需”获取五六亿美元的外汇。1961 年至 1970 年日本引进外资约 58.3 亿美元，其中 70% 来自美国。

日本国内的有利条件是：一、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给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二、1955 年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1960 年大规模的反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以后，人民运动逐渐走向低潮，国内政局稳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重视教育，加速培养人才，为经济高速发展准备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战后，教育经费在政府的预算中所占比重已超过 20%，名列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首。1960 年至 1970 年教育经费总额增加 3.7 倍。1951 年至 1973 年仅短期大学毕业生就增加 150 倍，正式大学毕业生增加 15 倍，为日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才条件。

推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其他重要因素还有：第一，以资本高积累

为基础，大规模地进行设备投资，迅速更新、扩大生产设备。自 50 年代中期起，为赶超欧美先进国家，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1960 年至 1970 年的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为 18%~20%，积累率高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投资增长率也最快，1955 年至 1970 年的 15 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 15 倍以上。

固定资本投资的巨额资金来源，一是对人民的盘剥。长期以来，日本工人工资一直低于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57 年日本工人工资为美国的 1/8、英国的 1/3、联邦德国的 1/2。1970 年日本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还不到美国的 1/3，联邦德国的 65%。而大量的临时工和女工的工资比固定工和男工还要低。因此，日本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也一直高于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 1970 年日本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已达 431%，高出美国和联邦德国近一倍。由于榨取了高额垄断利润，日本垄断企业才积累起大量的资本。二是政府的投资和贷款。日本政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往往占其财政支出的一半。在 60 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 1/4 左右，而且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条件十分优惠。三是国家和私人银行的贷款。日本的私人储蓄率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 1962 年日本个人储蓄率占税后收入的 20.7%，而美国为 6.8%，英国为 8.6%，联邦德国为 12.2%。个人储蓄通过国家和私人的金融机构流入私人企业，成为它们扩大企业经营的重要资金来源。总之，充足的资金保证了生产设备的大规模的更新和扩大，推动生产的迅速增长。高积累和高投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第二，有成效地引进技术。50 年代，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国家大约落后二三十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到 70 年代日本共引进技术二万多项。通过引进，日本几乎掌握了全世界半个世纪中发明的全部先进技术，赢得了 30 年的时间。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政府对引进技术大力扶植与保护，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法令，使引进有法可循，避免盲目性；详细占有国外科技情报，广采世界各国技术之长，及时准确地引进自己最需要的技术，并充分培训技术人才，为引进作好准备；根据国内经济的实际消化能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技术，使引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50 年代主要引进机械设备和较低级的技术专利，60 年代主要引进大型技术项目，70 年代则以引进尖端技术为主；采各国之长，充实完善本国技术体系，使引进与消化、改良与创新相结合，迅速实现引进技术的“日本化”。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首先，政府成立了由政府官员、财界要人、经济权威、工会高级干部等组成的智囊团，并以这些智囊团为核心，组成各式各样的审议会，预测、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制定全局性和局部性的经济计划，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 年）等。这些计划往往都提前或超额完成。其次，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通过法规，把各种经济纳入轨道。

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为调解以民间企业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和计划之间的矛盾，日本政府一般采取“行政指导”的方法，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所谓行政指导就是政府以它认为正确的方式，通过行政影响力来指导企业及个人的行动，包括进行建议和说服。这种说服建议往往能使企业在现在或将来得到贷款、拨款、补贴、减免税、政府订货、

进口或外汇许可等好处。尽管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行政指导表示接受或拒绝，但是，由于通过行政指导使企业获得了好处，所以得到企业的信任。如从 1951 年开始，日本通产省对钢铁工业每隔五年制定一次“合理化投资计划”，政府的这种行政指导使日本钢铁工业迅速发展，取得最佳效果。

第四，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日本吸收和参考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结合日本传统的“集团意识”（集团主义精神），创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高效率的日本式管理体制。所谓“日本式经营”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尊重”，重视人的因素，强调职工积极关心企业发展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人力投资”，造就一个“优秀工人、优秀技术人员、优秀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技术集体”。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灵活运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按企业组织工会”等所谓的“三大法宝”，向职工灌输“集团意识”、“家族意识”，用各种奖励制度刺激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等。例如，“终身雇佣制”就是用工会、工资和奖金把职工利益和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工人懂得，企业就是一个“集团”，是一个“大家族”，企业经营得好，工资就高，分红也多，反之，工资低，奖金少，而企业倒闭，工人就要失业。为此，工人就要“爱厂如家”，与企业共命运。而企业领导人也大力兴办福利事业，办医院，修体育馆、俱乐部，向职工提供房租低廉的住宅，甚至还深入车间、班组与工人谈心，进行家访，赠送生日礼品，竭尽讨好职工之能事，从而缓和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使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起为办好企业而努力。总之，这种管理体制使得日本民族传统的“集团意识”以及勤劳、智慧和献身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发挥。这种精神因素与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以及生产者的良好的文化和技术素质结合起来，必然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极大地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人民运动

5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重新复活，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形势。1951年因对待日美安全条约的态度不同而内部发生分裂的日本社会党于1955年10月召开统一大会，重新实现统一，成为日本最大的“革新”政党，并在同一年的大选中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和议席。日本共产党也于1955年7月召开“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即党代表大会），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结束了1951年以来的分裂状态，恢复了团结与统一。这样，在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本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和中立以及自身的利益展开了斗争。社会党和共产党各自的重新统一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为对付日益增强的革新势力，稳定保守政权，在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催促和推动下，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于1955年11月正式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格局，即保守的自民党同革新的社会党及共产党相对抗的政治体制由此而形成。

自民党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的巨额资金来源于垄断资本。但是，由于日本垄断资本内部分成不同的集团，因此，自民党内部也分成许多派，最多时到过12派。各派均与一定的垄断集团保持联系，而且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倾轧，呈现出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自民党内的这种派别体制尽管弊端很多，但是，每个派系都可看作“半个政党”，这就为自民党本身进行一定范围的政策调整提供了灵活性。不满现行政策的人往往可以从自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找到出路，从而使自民党有可能在战后历届大选中保持优势而长期执政。

五六十年代自民党各届政府的政策虽有差异，但其基本政策则是相同的。在经济上，素有“股份公司”之称的历届内阁都倾注全力抓经济建设，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文教等政策无不服务于经济建设，政府广泛而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推动和扶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上，自民党政府采取敌视人民的政策，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压制人民群众的斗争，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1956年10月，自民党政府制定“勤务评定制度”，对教员强制推行考勤，以恢复统制教育，限制学校教职员参加政治斗争。1958年10月，岸信介政府又提出《警察职务执行法修改草案》，扩大警察干涉权，以强制拘留、搜查、审讯等手段对付所谓“紧急事态”，制止公众集会，因此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结果这个法案未获通过。1961年和1962年自民党政府提出的《取缔政治暴力法案》和《关于保持民主秩序的法案》也因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被否决。1964年，为镇压工人运动，自民党政府又以消灭街头暴动为名，提出《暴力行为处罚法案》，最后由国会通过。法案规定，对“使用枪炮及刺刀之类所进行的伤害行为”及“未遂”案件，要和一般伤害行为加以区别，而课以重刑。

自民党政府还妄图开倒车，图谋修改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特别是修改第九条关于日本放弃战争权的条款。自民党政府于1957年成立了“宪法调查会”，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1964年1月，自民党决定全力开展“在国民中造成修改宪法的舆论为目的”的运动。同年7月，“宪法调查会”向自民党政府呈交报告书，提出修改宪法的意见。1965年1月，“宪法调查会”又制定了《宪法改正纲要》。因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反对，自民党

政府企图修改宪法的目的始终未能达到。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后，日本虽在形式上获得独立，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仍受到美国的控制，而日本政府也极力追随美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日本政府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建立了75,000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1952年8月，吉田内阁又成立保安厅，10月，把警察预备队改称为保安队，扩充兵员，人数达11万人，同时将海上警备队改称警备队。1954年日本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同年，日本政府把保安厅改为防卫厅，将保安队改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于是，在自卫队名义下，日本的陆、海、空三军正式建成。1958年至1971年，在美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自民党政府实施了三次扩军计划。到1971年陆上自卫队的兵力达17.9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达14.4万吨，航空自卫队拥有飞机940架。

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并开始发展，日美关系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1954年12月上台的鸠山内阁提出“自主独立外交”方针，主张对美国采取“自立”态度。1956年鸠山内阁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随后日本又加入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重返国际社会”。此后，日本又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改变日本片面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地位。从1958年10月开始，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谈判，日本和美国于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以代替旧的日美安全条约。这个新条约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扩大了两国的合作范围。条约规定：“缔约国每一方都认识到，在日本国管辖下的领土上（不包括北方领土和冲绳），任何一方发动武装进攻都会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并且宣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手续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危险，“为了对日本的安全以及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美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这个新条约还删除了原来旧条约中有关镇压日本国内暴动和骚乱等不平等的条款，并使日本得到使用条约的自主权。日本政府宣称：这个新条约使“日美关系进入新时期”。

1961年6月，池田勇人首相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成立“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每年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在经济、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加强合作。在日美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第一次称日本为美国的“平等伙伴”。这表明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外交的自主性也逐渐增强，日美的矛盾亦日趋加深。1968年4月，日美签署协定。6月，将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双方自动延长新日美安全条约和美国把冲绳岛行政权归还日本达成协议。1972年5月15日，美国把冲绳岛的行政权正式移交日本，但是保留了驻军权。

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一直追随美国，敌视中国。1952年4月，吉田内阁非法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经过日本人民和日本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日中开始了民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更加亲美反华，他公然表示“赞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声言台湾当局“如能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为此，极力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千方百计破坏中日民间贸易，1958年5月纵容暴徒在长崎制造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致使中日间的往来中断。1960年池田上台后虽然恢复了中日往来，但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甚至鼓吹“台

湾归属未定”论。佐藤内阁也积极追随美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并大肆向台湾进行政治渗透和经济扩张。

五六十年代广大的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军占领和设置军事基地，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自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争取民主、和平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干涉和控制的斗争已成为人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5月1日，全国300万民众在各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旧金山和约。东京有40万人参加示威。当游行队伍进入皇宫广场时，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当场打死2人，300多人受重伤，1000多人被逮捕。这就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流血的五一节事件”。

按照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美国在日本国土上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成为“国中之国”，美军官兵在这里横行霸道，引起日本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各地掀起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1952年11月，石川县内滩村农民为反对美军建立打靶场，在野外静坐示威达百日之久。群馬县妙义山地区的农民反对该地区基地化的斗争坚持了两年多，最后迫使美军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基地的企图。1956年东京都砂川町的农民反对征用土地用以扩建美国空军基地。他们同工人、学生联合起来，展开斗争，多次抵制政府官员强行测量土地，甚至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冲绳是美军在日本的最大军事基地。冲绳人民为反对美军侵占土地，展开保卫土地的斗争，1956年6月20日，冲绳全县64个市町村中有56个市町村召开反对征用土地的居民大会。

1958年10月日美两国在东京举行会谈，准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为此，日本人民高举反美爱国旗帜，于1959年和1960年举行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文化界、宗教界人士和中小企业主踊跃参加，他们以集会、罢工、游行示威、签名等形式开展斗争，先后发动23次全国统一行动，参加者达1.1亿多次。1960年1月16日，为阻止首相岸信介赴美签署新的安全条约，90万群众在羽田机场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并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多人被捕。在此之后，出现大规模的向国会请愿活动，仅4月26日一天就有10万人参加，这期间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已达1400万份。岸信介不顾举国抗议，悍然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5月19日夜里，为延长国会会期和批准条约，岸信介政府竟动员6000名武装警察包围国会，让500名警察进入国会会场，强行延长国会并批准条约。岸信介政府的卑劣行径使广大群众怒不可遏，大批游行队伍涌向国会和美国大使馆，30,000名示威者还包围岸信介首相官邸。6月15日全国组织了第十八次统一行动，东京有150万人到国会前游行示威。群众斗争达到最高潮，终于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定6月19日访问日本的计划。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的冲击下，岸信介内阁于6月23日宣布辞职。

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人民继续开展斗争，反对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反对延长日美新安保条约。

日本人民和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始终坚持日中友好，自50年代初起就先后成立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民间组织，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批评自民党政府的反华政策，积极促进两国民间贸易和人员往来，推动日中友好的发展，为恢复日中邦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还展开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和自民党政府提出的反动法案，维护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以及经济权益。

1958年为反对《警察职务执行法修改草案》，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390多个团体组成“反对‘警职法’国民会议”，组织全国统一行动。11月5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组织工人举行24小时大罢工，参加罢工和工厂内集会的人数达100万人，各界参加统一行动者达400万人。结果，岸信介政府被迫放弃这个反动法案。1961年5月，日本的工人、学生、妇女、文化界等各界人士又展开反对《取缔政治暴力法案》的斗争。6月3日，全国有450多万人参加统一行动，当众议院审议这个法案时，10万人的抗议队伍涌向国会，终于使这个法案作废。接着，日本人民又于1962年掀起反对《关于保持民主秩序的法案》的斗争。

日本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保障就业，从1955年起展开全国性的春季斗争（简称“春斗”）。1956年官公厅工会参加斗争，并成为主力，形成了大规模的春季斗争。同一年，工人阶级还展开“秋季提高工资斗争”（简称“秋斗”）。以后每年日本工人阶级都进行“春斗”和“秋斗”，以提高工资，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1962年，“春斗”达到高潮，这一年曾举行七次大规模的全国统一行动，有1600万人次参加。

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工业地区人口过度密集、用地不足、工业用水紧张、交通拥挤、房荒严重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广大城市居民展开反对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居民运动”。据统计，7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居民团体已达6427个。农民和沿海的渔民也展开斗争，反对环境污染。

第三节 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

经济低速稳定的增长 1973 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上的石油危机影响下，日本爆发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从 1973 年 11 月至 1975 年 3 月，工矿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 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 27.2%，股票价格下跌 29.7%。日本政府采取增加财政开支、扩大公共投资和对垄断资本减税、发行赤字公债等“反萧条对策”。到 1975 年经济开始回升，1978 年 1~3 月，超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这期间，即 1975 年至 1978 年的四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一直停留在 5.5% 的水平上。从此日本经济从长期的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的原因是：战后出现的工资水平低、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美国的扶植等促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逐渐消失；因生产设备能力严重过剩，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企业利润低于借贷资本利息率，致使日本政府惯用的以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刺激生产的办法已难于奏效；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强烈竞争以及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的贸易战、货币战的加剧。

因此，进入 70 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尽管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快一些，可是与高速增长时期比，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突出特点是低速、稳定的增长，1970 年至 1978 年期间，国民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5.3% 的水平上。尽管如此，1973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社会以极大的震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出来。这就是：日本是一个“贸易加工国”，国内能源、粮食、资源极其缺乏，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极强；70 年代后，动荡的国际形势和欧美国家抵制日货的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冲击了日本；国内市场随着日本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的显著减慢，趋于停滞和萎缩；危机过后制造工业的设备投资下降，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呈现停滞趋势，政府虽采取种种措施，仍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设备过剩和技术革新的停滞趋势。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日本政府提出了在 80 年代实行“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即从以往的“加工贸易立国”战略逐步转向“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具体地说就是从以往的引进和改造外国先进技术为主转向以自主开发独创技术为主；改变原有的重化学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发展资源和能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智力资源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将技术力量作为“国际交往中相互较量的有力武器”，靠技术力量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其国民经济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率，1987 年为 4.9%，1988 年为 5.9%，1989 年为 4.8%。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在 80 年代进一步得到巩固与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1987 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 2.395 万亿美元，1988 年日本人均收入已增至 1.946 万美元，超过美国，仅次于瑞士，居世界第二位。199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 62.8%，人均产值已高于美国 25%。二、日本已成为世界头号贸易顺差国，1987 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为 2292 亿美元，进口额为 1495 亿美元，贸易顺差额为 797 亿美元。三、外汇储备充足，1987 年外汇储备达 686.2 亿美元，1988 年增至 838 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四、日本的资产净额 1987 年达 2500 亿美元，1990 年增至 4000 亿美元，同一年日本拥有的国际银行资本已占国际银行总额的 36%，日本已成为世界金融大国。五、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到 1987 年度末的累计金额已达 1393.3 亿美元，全世界直接投资的外流资金中，日本所占比重已接近美国（17.3%），达 12.5

%。1989年日本对外援助额已超过美国，达100亿美元，居世界之首。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和对外援助国。

日本经济的稳步增长是与产业结构变化同步进行的。例如，从1970年至1984年，第一产业在总产出额中所占的比重从6.3%降到3.4%，第二产业的比重也从46.3%降为40.5%，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47.4%上升为56.1%。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实现了内需主导型的增长。例如，198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2.6%，其中内需的贡献度为4.1%（1983年为2.1%），外需的贡献度为-1.5%，而到1987年内需贡献度则增长到6%。

经济的增长使日本的消费结构逐步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中心的实物需求型转向需求的多样化与高档化，其标志是：一、恩格尔系数（指伙食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例如，1970年为82%，1980年为28%；二、耐用消费品已极大地普及，例如，到1980年3月，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是：电冰箱99.1%、电动洗衣机98.8%、彩色电视机98.2%、小汽车57.2%、家用空调机39.2%；三、消费者追求商品的多样化、高档化与个性化；四、旅游成为日常生活内容之一，1981年日本到海外旅游人数达400万人，国际旅游总支出达46.2亿美元。

70年代后，在日本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日本的阶级构成也发生变化。1960年职工（工薪劳动者）的人数占全国劳动人口的一半，农民和渔民的比重为30%。到1979年农民所占的比重下降为10%，职工比重则上升到89.6%。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就业稳定，工资相对提高，福利逐渐增多，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有的努力工作、勤俭、高效率、忍耐等传统观念或价值观逐渐失去感召力，而关心个人及物质生活的“自我中心主义”日趋盛行。这样，更多的人，尤其是占就业人口80%以上的职工在政治上往往容忍和接受现存政治体制，即自民党执政的政治体制。

多边自主外交和向政治大国迈进 70年代初，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居世界前列。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促进其国际地位的提高，加上国际力量结构的巨大变化，即美苏中日和西欧的多极世界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外交。1972年7月出任首相的田中角荣改变以往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积极推行“自主多边外交”。所谓“自主”就是指日本要自主地依据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国家利益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所谓“多边”是指除同美国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外，还同中苏等世界上的其他战略力量进行有利于日本自身利益的交往。

1974年12月三木武夫组阁后则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对中苏两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政策。其具体方针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外交，以增加日本外交的回旋余地；在中苏之间搞重苏轻华外交，企图打开日苏的僵局。但是，“等距离外交”不仅未取得成效，反而使日本外交失去灵活性，未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

1976年12月福田上台，适应新情况，提出“全方位外交”，即“多边均衡外交”。其中心思想是，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同任何国家都处于等方位。它表明日本企图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强在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地位。“全方位外交”是田中的“自主多边外交”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是躁动于母腹中的“政治大国”意识的一种反映。

1980年7月铃木任首相，同年在访美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宣布“日本正开

始第三个新的起点，即要从被动的受益者成为积极的创造者”。所谓“第三个新的起点”也有人称其为“第三次开国”或“第三次远航”。第一次指1853年美国培理率舰队强迫幕府“开国”，后经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第二次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经济并通过高速增长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第三次就是从80年代开始，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同一年日本外务省编写的《外交蓝皮书》也对80年代日本外交方针作了类似的阐述，宣称“作为负有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要“展开积极的外交”，“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1983年7月，中曾根首相在他的故乡群馬县发表讲话说，“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是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明确表示了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意向。后来，考虑到国内外舆论，中曾根又把“政治大国”改称为“国际国家”，其含义是日本不单单要实行经济的国际化，而且要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对世界作出积极贡献，使日本成为积极地发挥世界作用的国家。

1987年11月出任首相的竹下登在1988年7月29日的国会演说中强调要进一步树立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形象。1989年8月上台的海部首相在1990年3月的施政演说中又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外交，强调日本要运用经济、技术力量，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

总之，不管是“政治大国”，还是“国际国家”，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其核心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推行大国政治，使日本在全球确立“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

日本推行大国外交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即80年代日本外交的总方针就是所谓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这一方针是由大平内阁提出的。之后，铃木、中曾根、竹下等内阁的外交活动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一、构成对日本安全威胁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如东西对抗、南北矛盾、发达国家间的摩擦、能源供应不稳等。既包括军事政治，也包括经济领域，而且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交错发展。二、对付威胁的力量必须是综合性的，单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的力量，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对日本来说，就是要以日美合作为基轴，建立与美国和欧洲创造性的互相依赖关系；保持日中长期合作；加强与东盟和第三世界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要全力推进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即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里使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密切起来，确保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三、对付威胁的手段也必须是综合性的。必须汇集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以综合力量对世界作出“贡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以来，日本积极推行“文化外交”，也就是将“文化”从经济的附属地位变为对等的自主地位；极力鼓吹日本文化的优越，激发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的服务；鼓吹把日本从文化吸收国转变为文化传播国，宣传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及典范意义，提高日本文化的国际地位；宣扬东洋文明论，建立以日本文化为代表的东洋文化圈。为此而采取的措施有：扩大人员交流，尤其是扩大年轻一代的交流（如扩大招收留学生等）；增设和扩大驻外的文化交流机构（如1988年日本与东盟设立了“文化中心”）；增加对日本研究和日语教学的资助。四、加强防卫力量，建立精锐军备体系，分担更多的防卫责任，缩小“经济大国”与“军事

小国”之间的不平衡。8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措施是：1.完善和密切日美军事合作体制。中曾根内阁时，一再强调日美的军事同盟关系，声称日美是“战略同心圆”。中曾根还大胆地对前两届内阁未敢触动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无核三原则”（不运进，不拥有，不制造）、“专守防卫”等一系列重大原则作了修改，同时加强日美共同作战研究和实施建设一支能打现代化战争的精锐自卫队计划，突破了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2.不断提高防卫费，推行以“质”为重点的加强防卫力量的方针。如前所述，1986年底中曾根内阁正式取消防卫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1982年至1987年的五年间，日本军费的实际增长率为36%。1986年至1990年间的防卫费总额为18.4万亿日元，大体上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6%。日本军队总人数已达24.3万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批评日本只出钱不出人，不承担风险。因此，海部内阁于1990年9月提出了自卫队员应以兼任身份参加和平合作队，并允许携带武器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后因国内外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日本政府仍不顾舆论反对，于1991年4月首次派出由五百余名海上自卫队员和六艘舰艇组成的扫雷队到海湾地区扫雷。9月，日本政府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总之，80年代以来，日本实现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是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展开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都是以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增强日本在世界上的发言权为出发点的。这主要表现在：一、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借以抬高日本的身价。中曾根执政的五年中，出访19次，除南美和非洲，足迹几乎遍及全球。安倍晋太郎外相仅1983年一年中就出访12次，会访各国要人110人次，活动距离22.3万公里，等于绕地球五圈半。竹下登任首相期间，七次出国访问了12个国家。二、积极插手国际事务，尽量表明日本的主张和立场，如在裁军问题上，改变了过去的暧昧骑墙态度，大抓所谓裁军，对世界热点地区也表现出过去少有的“热情”，如在柬埔寨问题上，表示要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两伊战争期间，积极发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难以发挥的作用；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积极提出日本的建议与方案；在海湾战争中向多国部队和伊拉克周边国家提供了1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三、积极谋求提高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争取挤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

第十章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演变与实力的增长

第一节 赫鲁晓夫的上台与国内政局的变化

赫鲁晓夫的上台 1953年3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第二天，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第一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会议还决定赫鲁晓夫辞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从事党中央的工作。3月14日，马林科夫辞去党中央书记的职务。

1953年6月28日，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连续担任内务部长15年之久的贝利亚被逮捕。年底，最高法院指控他为外国间谍，“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法庭判处贝利亚死刑。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农民家庭。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同年参加红军。内战结束后在基层党组织工作。1929年进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毕业后，任莫斯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起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二次大战中，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获中将军衔。1949年后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党中央书记。从1938年起为党的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赫鲁晓夫领导党务工作后，对苏联的国内外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在经济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在政治方面，清除贝利亚后立即改组内务部，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把保安工作置于党的各级组织领导监督之下。同时，宣布要加强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开始对一些案件进行复查，为一些人恢复名誉。1954年成立了以波斯别洛夫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滥用职权的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赫鲁晓夫于1955年5月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恢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年，苏联同美英法一起签订了对奥地利和约，并开始同美国对话。

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对这些变动有不同意见。1955年2月马林科夫以“缺乏行政经验”和“对农业生产状况不佳负有责任”为由，“申请”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在赫鲁晓夫推荐下，布尔加宁接任这一职务。6月，莫洛托夫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1956年2月14~24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在理论部分，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已经过时。由于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强大，现代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宣布，不同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并说和平共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苏联“决不干涉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认为，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途径。当前，“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可能性，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

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二十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 133 名中央委员中只有 79 人是原十九大的中央委员。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党中央的书记。

24 日，大会宣告闭幕。当夜，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种种错误和问题，指责他破坏法制，批准逮捕镇压无辜群众，说他对法西斯德国入侵警惕不够，造成战争初期的苏军失利，揭露他在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等等。赫鲁晓夫把这些错误归结于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要求恢复集体领导。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开了问题的盖子，对人们震动很大。但报告对问题的分析浮浅，方法步骤也欠周详。

二十大后，苏共中央于 1956 年 6 月 30 日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在全国开展了批判斯大林活动，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苏联政府取消了“人民敌人”的罪名，解散了大批集中营。据统计，1956~1957 年间，有 700 万~800 万人被释放，500 万~600 万已死的人得到平反。苏维埃政权还为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德意志等少数民族恢复名誉，允许他们从被流放的东方返回故乡居住，重建他们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在文化方面，政府放松了书报检查。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发表之后，出现了解冻文学和集中营文学，专门揭露苏联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1957 年的斗争 赫鲁晓夫的这一套做法遭到国内一些领导人的强烈反对。1957 年 6 月 18 日，赫鲁晓夫刚从芬兰访问归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会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严厉谴责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认为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米高扬等几个委员起来为赫鲁晓夫辩护，但是，主席团的多数成员要求赫鲁晓夫立即下台。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一决定，说主席团无权解除他的第一书记职务，坚决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决定他的去留问题。在主席团争论之时，国防部长朱可夫动用军用飞机把大多数中央委员从各地接到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 6 月 22 日召开。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莫洛托夫等人反对改革，并说他们要对 30 年代的大清洗承担责任。莫洛托夫在报告中则历数赫鲁晓夫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论，中央全会于 29 日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路线”，反对二十大所赞同的“消除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后果”的方针，走上了“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把他们三人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在这场斗争中坚决支持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等人由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

朱可夫在六月事件中的巨大作用引起一些人的不安。10 月，他被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同时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1958 年 3 月，最高苏维埃以布尔加宁参与反党集团活动为由，免去了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任命赫鲁晓夫接任。这样，苏联的党政大权就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手中了。

第二节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

农业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调整。

长期以来,苏联只注意重工业的增长,忽视农业的发展,甚至掩饰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苏联曾宣布 1952 年的谷物产量达到 13,000 万吨。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农业问题永远彻底解决了。”实际上,这一年只生产了 9000 多万吨粮食,1953 年又降为 8250 万吨。苏联 1953 年的人均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只有 432 公斤和 30 公斤,比革命前 1913 年的 540 公斤和 31.4 公斤还要低。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正是从农业开始的。1953 年 9 月,他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指出农业的基本问题在于违背物质刺激原则。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取消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去,集体农庄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低于成本。1958 年 6 月,政府取消这种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从 1952 年到 1964 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 7.48 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 15.69 倍。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其次,改变计划体制。1955 年以前,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多达 280 项,详尽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产量等等,限制了广大农庄干部和庄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55 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但是,这项决定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国家仍不时干预农庄的生产安排。第三,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国家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46 年后,政府为督促庄员把主要精力用于集体生产,不断增加自留地的农业税额,并规定产量愈高税额愈多。农民不堪重税,纷纷砍掉自家果树,杀掉喂养的牛猪。副业生产日渐缩小。赫鲁晓夫上台后,立即改变收税办法,由按产量改为按自留地面积计算税额。同时,降低自留地的税额,免除私人果树、奶牛的实物税。1954 年 6 月,废除自留地的义务交售制。1958 年 1 月,取消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在政府的鼓励下,副业经济迅速发展。苏联 2000 万农户中原来大约有四分之一农户不养奶牛。到 1959 年,几乎每个农户都养了奶牛。此外,城镇居民还养了 350 万头奶牛。全国牛奶产量明显增加。几年内,羊的头数增长了一倍,猪和家禽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果园又兴旺起来。私人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从 1954 年起开始下降,农贸市场日趋繁荣。

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 年 2 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从 1954 年到 1958 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 67 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 4000 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在初期取得了明显成果。1958 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 5850 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 40% 以上。然而,特大丰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卡车、人力和粮仓,由于道路坎坷不平,未能在冬季到来之前把荒地的庄稼

全部收割完毕，还有大量粮食在运输途中、在储存过程中损失掉。60年代初，由于垦殖方法不当，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赫鲁晓夫时期，没能把垦荒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

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过急。到1959年1月，80%的集体农庄买下了农业机器，全国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撤销了7655个。剩下的20%农庄都是负债累累的贫困集体，根本买不起任何机器。然而，中央委员会指示，这些农庄就是贷款也必须买农业机器，以防止他们滋长“依赖别人的思想”。农庄买下机器后，按法令规定可以在三年至五年内分期偿付买拖拉机站设备的款项。但在一些富裕农庄的带动下，在赫鲁晓夫的赞赏下，几乎所有的农庄都在一年内偿清了欠款。这种匆忙的做法使一项正确的改革产生许多不良后果。首先，集体农庄由于要花费大笔钱财购买机械设备，不得不取消或推迟许多计划内的项目，甚至挪用其他方面的资金，打乱了农庄的正常发展进程。其次，改革后新购买的农业机器大多得不到正常的保管和维修。农庄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于购买机器，无力修建存放农机的库房。国家原来预计建立大约四千个机器修配站来帮助农庄维修农业机器。但是，这些修配站一直没能很好建立起来。1961年，政府决定机械在农庄就地修配。大约有一万个大型农庄建立起自己的修配厂。而其他的三四万个农庄没有修配厂，只能敷衍了事地进行一些维修。第三，农庄没有足够数量的、经过正规训练而能有效使用农业机械的技术员。过去在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技术员不愿从国家工作人员变为农庄庄员，他们当中的驾驶员有一半离开了农业岗位。结果，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赫鲁晓夫强调要扩大对集体农庄的帮助。国家派出2万名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去当农庄主席，并向农村输送了12万名农机师、农艺师和拖拉机手。国家大力发展农机工业，使农村拥有的机械数量成倍增加。1953年，农村共有74万台拖拉机，1964年增长到154万台，谷物收割机从32万台增至51万台，卡车从42万辆增至95万辆。政府还从资金方面帮助农庄，免去农庄历年欠国家的债款，同时不断扩大国家对农庄的长期贷款数额，1953年为5.8亿卢布，1964年增为12.5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改革调整农业过程中，办了不少欠考虑、主观盲动的事。他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就不顾苏联的条件如何，强行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这项规定导致灾难性后果。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庄员消极抗拒。播种玉米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其面积达到930万公顷。赫鲁晓夫下台后，一些有种玉米传统的地区也拒绝种玉米。1965年，全国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20万公顷，低于1953年的水平。赫鲁晓夫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计划彻底破产。

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生产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0~1961年赶上美国。这是一个颇欠考虑的口号。在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苏美相差不多。但在肉类产量方面，苏联

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苏联的肉类产量只有570万吨，而美国是1600万吨；人均肉类产量，苏联是36公斤，美国是97公斤。要达到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就要使苏联的肉类产量在三四年内增加近两倍。这对于缺乏饲料和大型畜牧设备的苏联来说，是很难办到的。1958年的畜牧业发展情况很不理想，它的产量只增加了5%，而不是赫鲁晓夫要求的60%~70%。但是，这并没有使赫鲁晓夫头脑清醒过来。他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在这种情况下，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大胆保证梁赞州在1959年一年内，将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赫鲁晓夫没有分析这一保证是否有现实可能性，就大加赞赏，号召其他各州向梁赞州学习。1959年底，拉季奥诺夫以种种弄虚作假的手段宣告“胜利完成”指标，并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梁赞州试验的破产说明赫鲁晓夫的赶超计划是不现实的。

尽管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有很多失误，但他的改革与调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苏联农业克服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从1950年到1960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1100多万，但农业产量明显增加。1951~1955年期间，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在同一时期，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大大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

农业虽有较大进步，但农业落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农业是粗放经营，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受气候影响，产量波动很大。1962年，谷物产量达到1.402亿吨，但第二年就陡降为1.075亿吨，减少3270万吨。其次，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在初期效果比较明显。1953~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后期出现不少问题，效果明显减弱。1958~1964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工业方面的改革 苏联工业绝大部分由国家集中管理。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赫鲁晓夫上台后，发现中央很难把全国20多万个企业都集中管理好，力图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他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

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国讨论后，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最高苏维埃还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属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部管理的企业一律交给所在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但是，执行的结果，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次改革只不过把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即由“条条”管理体制改为“块块”管理体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故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这次改革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没

有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还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这种情况对专业化大企业打击最大。过去它们只同上级一个主管部门打交道就可以组织好本企业的生产，现在则需要同分属于不同经济委员会的众多企业打交道，而且往往一个委员会就可以打乱整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专业化大工厂不得不生产过去可以很容易从其他州买到的零件。赫鲁晓夫看到这点，逐渐又把权力收回到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1960年由105个调整为100个，1962年又减为47个，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它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重新发挥着以往的部的作用。这些委员会的主任以部级干部的身份参加苏联部长会议。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赫鲁晓夫在实行简政分权的做法失败后，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他建议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来推动企业的生产发展。国家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只限于各种产品的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行制定。利别尔曼还主张把赢利率作为衡量企业好坏和规定奖金多少的标准。利别尔曼的改革方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并开始在乌克兰的一些工厂试行。

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虽然不算成功，但是在他执政时期苏联工业还是有了明显的进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和七年计划（1959~1965年）都取得成绩。从1951年到1965年期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苏联的工业产量成倍增加。1953年到1964年间，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和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而苏联共产党则“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纲领还宣布，苏联在最近十年（1961～1970年）里，“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将超过最强大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结束时，“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关于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是超越苏联现实阶段的。具体宣布建成共产主义日期更是主观盲目，它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和问题。

苏共二十二大后，根据新党章开始按一定比例更换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成员。1961年11月，又根据生产原则把州一级的党委会分成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党组织的这一改建以及先前开始的工业体制改组使干部队伍不断发生变动。原来在首都的部长被下放到省城主持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原来的州委书记被削去一半职权，变成只管工业或农业的书记。更多的干部被调动工作。这引起广大中层干部的不安和不满。

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核武器的威力，忽视常规武装力量。苏联政府在几年内裁减了数百万军队。这引起一部分军队干部的不满。苏军全体元帅曾向赫鲁晓夫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恢复被削减的军队和军事预算，并对国防力量被削弱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

在国际共运方面，苏共于1958年批判南共联盟为“现代修正主义”。1960年谴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不久，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在对外关系方面，1962年苏联把导弹秘密运进古巴，但又在美国威胁下把导弹撤出。这使苏联大失脸面。

所有这些问题使赫鲁晓夫的威信大降，陷于孤立。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米高扬等在黑海海滨度假，勃列日涅夫等人乘机秘密串连，策划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参加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他遭到严厉的谴责，最后被迫表示愿意自动辞职。10月14日，举行中央全会。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着重论述了他在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还指责他滥用职权和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全会未经讨论便通过决议：“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满足赫鲁晓夫本人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月15日，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1965年12月，波德戈尔内接替米高扬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伊·勃列日涅夫（1906～1982年）生于乌克兰卡缅斯克的一个俄罗斯冶金工人家庭。1929年入党。1935年冶金学院毕业后，从事地方党务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战争结束时为少将。1952年10月，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斯大林逝世后，改任

海军部政治部主任,失去了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1954年起先后任哈萨克第二和第一书记,积极推行赫鲁晓夫的开荒计划。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再次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1957年,因反马林科夫集团有功,升为主席团正式成员。但1960年又被免去中央书记职务,担任荣誉性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1963年,因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病重,又重新当上中央书记。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政局平稳,没有发生公开危机。最高领导核心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勃列日涅夫对主席团内部的反对派,既不处死,也不戴反党分子帽子,而是通过选掉或退休办法解决。谢列平于1967年离开党中央书记处,改任全苏工会主席,1975年又退出政治局。对于地方组织,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个月,于1964年11月决定把州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恢复到传统的组织形式,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在理论宣传方面,勃列日涅夫不再提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1967年十月革命50周年的时候,他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

60年代下半期,苏联国内逐渐出现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多是知识分子,对政府的重大政策持不同意见,并公开发表出来。他们人数不多,内部政见也不相同。多数人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一方面,通过立法来限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1966年的刑法规定,对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言论行动追究刑事责任。政府根据这项规定,不断逮捕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头面人物,或判刑,或送进精神病院。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7年间,共有750人被捕判刑。另一方面,政府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一般都留有余地,允许持不同政见运动在某种范围内存在,允许运动中的一些人流亡国外。

在民族问题上,赫鲁晓夫时代曾宣扬民族融合,遭到各少数民族的反对。勃列日涅夫则强调现阶段是“民族繁荣和接近”,只是在生活某些领域存在着“部分融合的政策”,实现完全融合需要“走一段长时间”。但在1967年,勃列日涅夫又说:“我们确信,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成为真正的现实”,说民族概念逐步让位于“苏联人民”的概念。在具体处理民族间关系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政权采取慎重克制态度。1967年,最终为鞑靼民族恢复了名誉。1978年同意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把格鲁吉亚语定为国语。

国营企业的新经济体制 1965年9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柯西金在会上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报告。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赫鲁晓夫实行的按地区原则管理工业的做法,“妨碍了部门性专业化和各经济区企业之间的合理生产联系的发展”,决定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重建中央各工业部。其次,决议提出要“完善计划工作”。过去国家给企业下达几十项指标,“这种做法限制了企业职工自主性和主动性,降低了对改善生产组织的责任感”。因此,决定取消对企业活动的多余规定,减少计划指标的数目。现在,国家只给企业下达八项指标:产品销售额、产品的基本品种、工资基金、利润额和赢利率、预算付款和预算拨款、投资额和固定基金额、采用新技术的主要任务、物资技术供应指标,

其余由企业自行确定。第三，决议提出要加强经济刺激。它指出：“在领导工业中行政方法盛行而排挤了经济方法，这是工业领导上的严重缺点。”应该充分利用价格、利润、工资、信贷等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各企业可用利润提成的办法建立工作人员的物质鼓励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企业搞得愈好，工人就可多得奖金，就愈能改善居住和文化生活条件。要采用物质利益的办法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对改善企业工作的关心。

根据中央全会决议的精神，最高苏维埃于10月4日通过了《关于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定。同日，部长会议公布了《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企业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其财产，可以出卖、出租多余的设备和厂房，可以用废材料自产自销计划外的产品，有权制定生产财务计划，有权招聘和解雇职工，有权确定工资形式和奖励的办法。

党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和苏维埃的两项决定，确定了苏联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从1966年起，新体制开始在704个工业企业中试行。原来计划在三年内基本完成，实际上一直到1975年才完成这项变革。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国营企业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

新经济体制在坚持国家集中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实行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相结合的管理原则。这种改革适应了客观需要，同时是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到全国的。因此，改革在初期取得了明显效果，工业发展速度增快。但是，新经济体制同利别尔曼建议仍有一定差距，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工业的集中管理体制。

发展农业的措施 农业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是苏联经济中的落后部分。1965年3月党中央开会，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认1953年9月中央全会“具有重要意义”，“它制定了农业方面的正确方针”，开垦荒地“对增加谷物生产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又指出，近几年来农业增长速度减慢，农业发展计划没有完成。“这一切给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造成农业落后的基本原因是，“破坏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在提高公有经济方面的物质利益原则以及破坏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为了纠正农业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和政府多次开会讨论，采取各种办法推动农业发展。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固定收购指标，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过去，国家的收购指标每年制订一次，通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下达到农庄，在采购过程中还不断变更计划，追加任务。这种采购制度不仅使农庄难以拟定正确的生产计划，而且影响了庄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担心生产发展会导致交售任务的加重。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收购计划经常完不成。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期间，只有1956年、1958年和1964年三次完成谷物收购计划。有鉴于此，政府决定1965年的谷物收购计划从40亿普特降为34亿普特（约合5569万吨），并且五年不变。1970年，将九五计划（1971~1975年）期间的谷物收购指标调为6000万吨。政府还决定对超计划出售的农产品给予奖励，价格比收购价格高50%。

赫鲁晓夫时期曾大幅度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60年代，农机、化肥等工业品价格也提高很多。为了平衡工农产品的比价，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仅1965年和

1973年两次就提高收购价格75%左右。

第二，扩大农业投资，改进农村技术装备，促进农业向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1953年，国家对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7.7%。赫鲁晓夫执政的七五计划（1961~1965年）期间，农业投资达到380亿卢布，占总投资的15.4%。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农业投资继续增大，八五计划（1966~1970年）期间，为599亿卢布；九五计划（1971~1975年）期间增至776亿卢布，占总投资的20%左右。随着农业投资的扩大，农村中各种机械的拥有量迅速扩大。1964~1978年，拖拉机由154万辆增至252万辆，谷物联合收割机由51万台增为70万台，载重汽车从95万辆增至152万辆。农村用电总量从1964年的184亿度增至1978年的956亿度。灌溉地的面积从1964年的980万公顷增至1978年的1660万公顷。农业向集约化方向迈进了一步。

第三，对庄员实行有保障劳动工资制。过去，农庄在年底按庄员劳动日的多少发放报酬。1956年，实行按月预付报酬制。农庄按年初预算的估计，每月向庄员预付一定的现金报酬。年底，根据当年生产情况进行结算。1966年7月1日起，实行有保障劳动工资制，庄员按该区国营农场相应人员的工资标准每月领取工资，实物在收获后领取。1970年，部长会议批准《关于建立和使用社会保险基金的办法》。庄员丧失劳动能力、生育、安葬、疗养等都得到一定的保险金。

第四，放松对私人副业的限制，鼓励私人经济。国家认为私人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给予多方面支持。据1978年统计，全国共有自留地618万公顷，占全苏耕地总面积的2.73%。私人饲养的奶牛共1330万头，占全国总头数的30.9%。私人生产的土豆占全国总产量的61%，蔬菜占29%，肉类占29%，蛋类占34%。

第五，建立农工综合体。这种组织最初产生于摩尔达维亚，60年代末开始增多，到1978年有八千多个。农工综合体一般是由生产农产品的农庄农场同加工农产品的企业、销售农产品的企业联合而成。相互间或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或是把资金联合在一起，共同管理。这种大型专业化联合体，劳动生产率一般都较普通农庄高，经济效益也较好。

第六，制定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农庄制度。1935年制定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几十年来未作任何重大更改。1969年11月，举行全苏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新的示范章程。它确认农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形式。新章程强调庄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庄员享受有保障的工资报酬，庄员除进行集体劳动外，尚可经营副业，每户可拥有半公顷宅旁园地，可饲养一头奶牛、一口母猪等。在分配方面，章程规定，农庄应从总收入中首先减去税款，然后留够固定和流动资金、文化生活基金、社会保障和物质帮助基金，最后再对个人进行分配。

除上述措施外，苏联政府还在1965年宣布免除农庄欠国家的二十多亿卢布的债务，实行银行直接向农庄发放贷款的制度等。

勃列日涅夫采取的这些措施不是什么突破性改革，但对苏联农业的发展起了某种积极作用。

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经济不断发展。1960年的社会总产值为3040亿卢布，1975年增为8626亿卢布。工业产量增长迅速。1965~1975年间，年发电量从5070亿度增至10,386亿度，石油产量从2.4亿吨增为4.9亿吨，钢产量从9100万吨增为1.4134亿吨，

汽车的年产量从62万辆增为196万辆。农畜产品的产量也逐步提高。1961~1965年间，谷物的年平均产量为1.3亿吨，肉类为930万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的年平均产量，谷物为1.8亿吨，肉类为1400万吨。

工农业的发展使苏联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了。据苏联官方统计，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只及美国的31%，1975年上升到67%，工业生产从30%升为80%以上，农业生产从55%升为85%。而据美国国务院的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升为53%。两者的百分比不一样，但都反映了苏美差距日趋缩小的变化趋势。

勃列日涅夫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调整国民经济，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把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国防建设，加紧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估计，苏联的国防开支1955年是324亿美元，1970年大约增加一倍，达到539亿美元，1979年又增加近二倍，高达1480亿美元。苏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而美国只占6%，联邦德国在4%以下，日本不到1%。苏联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严重阻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扩军备战步伐大大加快。苏联的陆军一直非常强大，它拥有的坦克数量远远超过美国。海军原是一支近海舰队，在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以后，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大力扩建海军，把苏联舰队建成为一支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苏联黑海舰队开进地中海，1968年驶入印度洋。1970年4~5月，苏联出动波罗的海舰队、北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四大舰队的两百多艘舰只在三大洋七大海域举行第一次全球性海军大演习，显示了苏联的强大作战能力。总的讲，苏联的常规武装力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达到同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

早在50年代，苏联就特别重视发展核武器。1953年8月，苏联在美国之后不到一年，爆炸了自己的氢弹。1957年8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勃列日涅夫更重视发展核武器。据美国估计，1964年苏美在洲际导弹上的数量对比是1:4。这以后，两国差距迅速缩小。1968年，苏联已拥有858枚洲际弹道导弹、121枚潜艇发射导弹、155架战略轰炸机和1300个核弹头。到70年代中，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已大体同美国相等。1972年美苏两国首脑宣言承认了这一均势情况，宣布“平等与同等安全”是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勃列日涅夫凭借其军事实力，利用美国收缩海外力量之机，大肆向世界各地扩张。1969年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并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70年代末，在越南金兰湾建军事基地，其太平洋舰队的立足点从海参崴向南推进两千多海里，威胁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通道。1978年，北、南也门发生政变，苏联乘机渗入控制该国。1978年派兵入侵阿富汗，推行南下波斯湾之战略。在非洲，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干涉安哥拉；乘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发生争端之机，把军事力量开进非洲之角；向十多个非洲国家派遣军事人员。苏联成为与美国全面抗衡的超级军事大国。

第四节 领导人的更迭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

勃列日涅夫的老人政权和发展的停滞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实行新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7%。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石油、钢、生铁、煤炭、化肥、水泥、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产品的产量都超过美国，居于世界第一位。

但是，苏联经济实力同美国仍有较大的差距。据苏联统计，苏联1980年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而美国认为只有55.8%。其次，苏联的科技生产水平除少数军工产品外，一般都落后于西方。计算机、合成材料、自动化仪表、石化工业等新兴部门大约落后西方10～15年。第三，生产中浪费惊人。据苏联自己公布的材料表明，金属的浪费和锈蚀每年达2000万～2500万吨，谷物由于收割、运输和保管不善每年浪费3500万～4000万吨，拖拉机每年报废的数量与新提供的数目几乎相差无几。

苏联经济基本是粗放经济，主要靠多投资、多建厂、多投人力、多使用资源来增加产量。进入70年代以后，粗放因素的作用大为削弱。由于苏美军备竞赛激烈，用于扩大生产的投资受到限制。50年代，苏联基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而到1971～1975年下降为8.3%。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在资源方面，由于欧洲部分的易开采资源渐趋枯竭，资源开采基地不断移向东部和北部，条件恶化，开采费用提高。

苏联的经济结构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展，各国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信息交流成为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可是，苏联的第三产业比例很小，1960年占29%，1970年占37%。生活服务落后，人们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家务劳动。据苏联资料统计，每年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1800亿小时，比在业人员的工作时间仅少100亿小时。其次，苏联基本是封闭性经济，对外经济往来、信息交流都很差。这一情况严重阻碍了科技和生产的发展。

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经济中的问题有所察觉。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他就提出发展集约化经济的问题。1973年3月，政府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决定把几个工厂合并成各种联合公司，目的是用联合公司的力量加速改进合并进来的中小企业的工艺水平。1979年7月又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提出改进计划体制，建立包括长期、中期、短期计划的计划体系，扩大经济刺激和加强技术进步等措施。

这两项决议只是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某种修补。它表明，保守而又年迈的勃列日涅夫已拿不出什么有力措施来克服苏联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70年代后苏联官方对任何主张利用市场关系的观点都加以痛斥，认为宣传市场调节就是反对计划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革由此陷于停顿，生产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2%，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陡降为1.0%，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降为0.6%。工业中，只有军工、石油开采等重工业部门有较快的发展，其他部门则徘徊不前。粮食生产歉收年多于丰收年，肉类产量几无增长。整个经济陷于停滞状态。

在外交方面，勃列日涅夫奉行霸权主义。他在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

提出了“有限主权论”。1968年11月，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当出现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当国内外社会主义敌人直接行动威胁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时候，就要以“军事方式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这种威胁的行动”。

在内政方面，勃列日涅夫从70年代起不断树立个人威望，扩大自己的权势。1971年，勃列日涅夫参加部长会议讨论第九个五年计划，并打破先例由他个人签署公布。他还改变过去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共同参加政治活动的做法，独自一人观看苏军的军事演习，作总结讲话。1976年，获苏联元帅称号。1977年，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他还七次获得列宁勋章，三次获得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勃列日涅夫个人专权的倾向十分明显。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出现老人政权的局面，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年过70。1980年，76岁的柯西金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接替他的是75岁的吉洪诺夫。政权如何移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从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接任党中央总书记，1983年6月，又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于1914年生于铁路职员家庭。50年代任驻匈大使，参与处理匈牙利十月事件。1967~1982年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达15年之久。1973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上台时已年老体弱。在执政的15个月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躺在病榻上。但他带病坚持工作。在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内召开了三次党中央全会，发表了六七篇主要讲话和文章。

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建设中的问题看得比前任清楚。他不同意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只处于“发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

安德罗波夫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大力加强劳动纪律，惩治贪污分子，撤换工作不力的干部。在工业方面，1983年7月公布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减少下达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权利。政府决定在重型和运输机械部、电机工业部等部门试行。在农村，推行作业队组和家庭承包制。到1983年10月，全苏实行承包的队组达15万个，承包土地共4000万公顷，约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政府还从1983年1月1日起，提高肉类、奶类、谷物和蔬菜的收购价格。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比上一年增加4%，劳动生产率提高3.5%。农业获得较好收成，农业产值增加3.6%，谷物产量达到19,500万吨。

但是，安德罗波夫的努力被病魔打断，于1984年2月9日病逝。13日，契尔年科接任党中央总书记；4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康·乌·契尔年科于1911年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65年起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先后近二十年。1978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上台时已73岁，他执政的时间比前任还短，只有13个月。契尔年科思想比较保守，任内没有什么特殊建树，于1985年3月10日病逝。这样，从1982年11月起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就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安葬了三位最高领导人。这引起苏联和全世界人民注目。

戈尔巴乔夫上台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年仅54

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农民家庭。1950~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入党。1978年当选为党中央书记，1980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刀阔斧地调换领导班子。在11个月中，共调换1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更换15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9月，任命雷日科夫接替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全会，批评近些年来的经济停滞和社会发展停顿现象，提出经济改革的任务。随后，又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

1986年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会议不再讲“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宣传要完善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是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把粗放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在政治方面，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完善选举的民主原则，扩大苏维埃审议决定问题的范围。在国际事务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当前世界有四组矛盾，即两个制度、两种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内部矛盾，帝国主义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人类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的矛盾。他认为，核战争“能够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掉”，因此两大体系只能和平竞赛、和平竞争。苏共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方向是“反对核危险，反对军备竞赛，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的斗争”。

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重新审查30年代到50年代的重大案件，先后为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平反昭雪。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苏联改革的起源、实质、内容与前景，并提出“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观点。同时，他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加速发展经济战略行不通，转而进行经济改革。初期是些具体的改动，如1986年11月通过《个体劳动法》，允许私人在手工业、居民生活服务和社会文化领域中从事个体生产经营活动，但私人不得雇工，不得经商。进而决定对经营机制进行改革。198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国营企业法》，确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筹资金和自我管理。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从1988年开始，全面推行新经济管理体制，预计1990年完成。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和困难。原有体制被破坏，而新的体制却不能有效建立。经济严重失控，改革处于“空转状态”。

在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未经充分准备就仓促转向抓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政治改革促经济改革。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讨论党和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问题，决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89年春，按地区、民族和社会团体系统各选出三分之一的代表。5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常设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为第一副主席。

政治体制改革使潜伏的民族矛盾表面化尖锐化。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属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但州内居民75%是亚美尼亚人。自治州苏维埃

想借政治改革之机，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该州的归属问题。1988年自治州苏维埃通过决议，上书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要求把该州划归亚美尼亚，但遭阿塞拜疆坚决拒绝。最终导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发生武装冲突，长期无法解决。与此同时，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掀起独立浪潮。1989年8月23日，三国两百多万人拉起六百多公里人链，抗议1939年的苏德条约，要求俄罗斯人退出三国。随后，三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此外，在中亚等其他地区也不断出现民族争执和冲突。新成立的人民代表大会无力平息民族冲突，对其他问题也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内形势日趋恶化，经济滑坡，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各地罢工迭起。1989年7月，西伯利亚一万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商品短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罢工很快波及乌克兰和哈萨克各地，人数达五十万左右。10月，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禁止在今后15个月内举行罢工。但罢工并未因此停止。党内外出现各种反对派组织，并日益发展成为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危机日益加深。

第十一章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成果。但由于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首先探寻自己的建设道路。苏共二十大后，波、匈、捷等国也开始进行改革。各国所经历的过程不同，效果也各异。但总的讲，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取得进步。

第一节 南斯拉夫自治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工人自治的创立 苏南冲突发生后，南共为了表白自己没有错，自己所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按照苏联模式搞工业化和集体化。1948年4月，政府颁布第二个国有化法令，把中小企业、零售商业都收归国有。1949年1月，南共五届二中全会决定大力推进合作化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参加合作社的农民从1948年的6万户猛增至1950年的41.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7%。集体耕地达24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的四分之一。这种过激的做法严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不良后果。1950年，南斯拉夫遭到严重自然灾害。这一年的谷物产量为462.5万吨，只及正常年景收成的一半。全国出现了饥荒。工业情况也很糟糕。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突然断绝了同南斯拉夫的外贸关系和经济来往，许多工厂因原料、技术等问题而被迫停工。

国内的严重局势使南共和铁托认识到，照搬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他们决心根据南斯拉夫的国情，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了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南共专门讨论了农业问题，强调合作化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制推行。从1951年起，南共允许农民自由退社。到1953年底，合作社从原来的六千七百多个减为一千一百多个，而到6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二十多个。1974年，南共联盟十大提出，要按自愿民主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根据这一决议，全国新建了许多综合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基本是供销性质的，农民入社后仍保留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南斯拉夫的改革主要是实行自治制度。南共认为，巴黎公社是理想的、标准的模式。工厂应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自己直接管理，社会事务应分权给地方政府乃至劳动集体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打碎官僚机器，才能使国家逐渐消亡。

根据这一思想，南共领导人民自上而下地进行了自治改革。最初的试验是在1949年进行的。在215个试点企业里，工人参与了工厂的生产、劳务、生活等问题的商讨。在这段试验的基础上，议会于1950年6月通过了《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法令宣布，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工人集体代表社会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管理”。法令规定，各工厂通过选举建立工人委员会。它有权讨论和批准工厂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和规章制度。另外，还建立管理委员会，每年改选一次，连任的委员不得超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经理由上级任命，全面负责企业的经营。1951年，议会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决定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国家不再向企业下达各种生产计划指标，而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和积累的比例。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划要求自订计划，自由经营，自负盈亏。1953年12月，议会又通过一项新法令，宣布废除国家规定积累比例的做法，改行利润分红制。企业所得利润，一般将其中的三分之二上交国家，剩下的留归工厂，由工人委员会讨论决定处理。1964年，政府决定把工人自治制度从工矿企业推广到铁路运输、邮电和公共事业部门。

1964年，议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的基本方向》的决议。从1965年起开始了全面经济改革。新的改革比50年代的改革前进了一步。

原先的改革主要是下放分权，吸引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生产和决定简单再生产的问题，而国家仍掌握着企业的大部分积累，仍拥有决定扩大再生产的权力。60年代的改革则进一步减少国家的干预，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强市场的作用。国家现在只从企业利润中提成 29%，把大部分款项留给企业自己支配。其次，国家对投资只提“基本方针”，而把投资基金的控制权大部分转交给银行。第三，商品价格基本不再由国家规定，改为按市场供求关系确定。第四，允许各企业独立进行外贸活动，国家取消大部分进口货的定量限制。上述改革措施使企业和工人委员会获得管理经济的全面权力，结束了国家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

在新经济体制下，南斯拉夫不仅迅速克服了经济困难，而且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国民收入在 1952 年为 547 亿第纳尔，1970 年达到 1965 亿第纳尔，增长了近三倍。工业生产发展迅速。1950~1960 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0.2%，1960~1970 年期间为 8.3%。1970 年的谷物产量达到 1162 万吨，比 1950 年增加了 1.5 倍。但工人自治体制也带来一定问题。各企业相互竞争，盲目扩大基本投资，出现了经济比例失调、增长速度减慢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社会自治的建立 南斯拉夫原来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联邦制国家。在经济领域实行工人自治后，南共逐渐把它扩大到社会政治的各个领域。在教育、文化和保健部门建立起类似工厂工人委员会的公民委员会，实行自治。

1953 年 1 月，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劳动人民。政府机关、工人委员会以及公民委员会享有自治权利。国民议会设联邦院和生产者院两院。联邦院由公民选举产生。生产者院由生产者工人代表和消费者工人代表组成，代表由间接选举产生。国家设总统一名，由铁托担任。政府机构由部长会议改名为联邦执行委员会，其正副主席分别来自不同的共和国。

1963 年 4 月，通过新宪法，把国名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规定，铁托为终身总统。联邦国民议会改名为联邦议会。它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社会自治机关。生产者院下面分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四个院，各自讨论有关的自治事务。1967 年和 1968 年，两次修改宪法，扩大地方和共和国的权力。

1974 年 2 月，南斯拉夫又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它规定实行代表团制，即公民选出的不是个别代表，而是代表团。其成员共有 25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代表团分别派出不同代表参加议会的各种活动。这些代表把议会中的议题和提案带回代表团，经过听取群众意见和代表团内部讨论之后，再把意见带回议会讨论决定。每位代表的任期为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新宪法规定，议会分为联邦、共和国和区三级。联邦议会由联邦院、共和国或自治省院两院组成。共和国和区议会则由联合劳动院、地方共同体院和社会政治院三院组成。联合劳动院决定有关劳动的各项事务。地方共同体院解决消费和福利方面的问题。社会政治院由南共联盟、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代表组成，讨论有关社会政治问题。

各级政府由相应的议会选出。联邦政府的权力有限，它只设国防、外交、内务、财务、司法和海运六个国务秘书处，管理全国性事务。各共和国和区政府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它只受联邦政府监督，不归它领导。

南斯拉夫社会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共产党地位作用的改变。 1952

年 11 月，南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 1958 年 4 月，南共联盟七大通过新纲领，全面阐述了党的地位作用。南共联盟认为，在发展自治制度的条件下，党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生活、国家社会生活的直接管理者和指挥者，它将实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引导作用。具体讲，南共联盟不向政府、自治机关发号施令，而是用说服引导的办法影响其他机构采用党的方针政策。其次，党政分开，除铁托外，其他党的领导人不兼任行政职务。第三，党不把工会、青年联盟等社会群众组织视为自己的传送带，党要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

南斯拉夫社会政治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但也出现了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问题。

第二节 50年代东欧局势的动荡

波兰事件 斯大林逝世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1953年3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哥特瓦尔德逝世。萨波托斯基接任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接任党的第一书记。6月1日，比尔森城的5000名群众上街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和进行政治改革。当地军警未能制止事态的发展。示威者冲入该城的议会和法院，占领城市两天。最后，政府从布拉格派出军队平息了这一事件。

1953年6月16日，柏林工人上街游行，反对提高10%的工作定额。17日，一些人攻入监狱，释放犯人。驻德苏军出动坦克，平息了这一事件。6月下旬，民主德国政府提出十点改革计划，决定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居民生活。1954年，乌布利希任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

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后，东欧各国受到很大冲击。1956年春，新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奥哈布公开承认党在过去犯了很多错误。4月20日，宣布大赦，释放了一千多名政治犯。6月上旬，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现名策盖尔斯基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奖金税，并派代表团到地方政府和中央的机械工业部请愿，遭到拒绝。6月28日，数万名波兹南工人上街游行，高喊“面包、民主、自由”和“维斯瓦夫”（即哥穆尔卡）的口号，并同警察发生冲突。于是，工人武装起来，包围保卫部大楼，袭击市委大楼、电台和监狱。在一天的巷战中，有5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政府派出军队才平息了这一事件。

波兹南事件后，波党于7月召开七中全会，认为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煽动，但“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全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政治民主化。8月，恢复了哥穆尔卡的党籍。随后，又邀请他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八中全会。

苏联对波兰局势的发展感到不安。10月19日，波党八中全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苏共领导人未经邀请就飞抵华沙，想要参加波党的中央全会。波党中央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派出代表团同苏谈判。赫鲁晓夫态度强硬，指责波党有反苏情绪、波党未将人事变动事先告知莫斯科。会谈中传来消息说，驻波苏军在向华沙前进。哥穆尔卡立即宣称：“假如你们不马上命令军队撤出，我们就离开这里，不再进行谈判。”并威胁说：“我要向人民讲话，要在广播电台讲出我的话。”与此同时，波党组织人民准备抵抗苏军进攻。当时，波兰的国防部长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军队受他控制。波兰政府调动公安部队和组织民兵来守卫华沙。在离首都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把坦克横在公路上作为障碍阻止苏军前进。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作了让步，下令苏军停止前进，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党的领导。波党则表示要坚持波苏友好。谈判到此结束，苏共领导人回国。波党八中全会继续举行，选举哥穆尔卡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加强和进一步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上犯过错误，表示要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加强各兄弟国家间的友谊与合作。11月中，哥穆尔卡率波代表团访苏，双方就两国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关系问题达成协议。波苏关系日趋缓和。

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建立人民政权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取得一定

成绩。但是，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拉科西推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不顾本国缺乏铁矿石和煤炭资源的现实，硬宣布要把匈牙利建成一个“钢铁国家”。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大搞强迫命令，推行强制性的义务交售制。人民生活几无改变甚至有所下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1949年的清洗铁托分子运动中，拉科西武断专行，处死了党的领导人拉伊克，逮捕了卡达尔，解除了纳吉·伊姆雷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这场运动受株连的达2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十分之一。

斯大林逝世后，拉科西仍坚持原有的做法。在赫鲁晓夫的干预下，1953年6月，匈牙利党中央开会，接受拉科西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7月，纳吉接任总理。他上台后，释放了卡达尔，关闭了集中营，并为一些人平反。在经济方面，允许农民退出农庄，宣布农庄经大多数庄员同意可以解散；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存在，答应帮助个体农民；决定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拉科西反对纳吉的做法，但得不到支持。1955年春，苏共领导把纳吉叫到莫斯科，指责纳吉发展轻工业方针是错误的。拉科西乘机于当年4月召开匈党中央全会，批判纳吉的右倾路线，解除他的党内外职务，由赫格居斯接任总理。11月又把纳吉开除出党。

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知识界活跃起来。1956年3月17日成立了俱乐部，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之名命名。俱乐部十分活跃，经常组织各种会议，讨论经济、报刊等各种社会问题，参加者多达数千人。在会上，有人公开抨击党的领导和现行政策，并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等口号。拉科西指责裴多菲俱乐部活动是反党反人民的，并逮捕其中一些成员，查封了一些刊物。这以后，国内局势日趋紧张。7月，苏共领导人米高扬到布达佩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决定让拉科西下台，由他的助手格罗接任第一书记，卡达尔任中央书记。但是，领导人的更换并未使局势稳定下来。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举行国葬。三十多万布达佩斯居民自发涌上大街，护送送葬队伍。这次葬礼实际成为一次政治示威。它不仅是对拉科西罪行的抗议，也是要求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一次力量显示。

格罗无力满足人民的要求。他除了于10月14日恢复纳吉的党籍之外，拿不出任何重大改革措施。人民不满。10月17日，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会议，要求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新的领导机构。10月21日，哥穆尔卡担任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布达佩斯民情激昂。裴多菲俱乐部于第二天开会，经过讨论，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随后，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会议，提出16点要求。内容包括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清算拉科西的罪行，由纳吉出来主持政府工作，撤走苏联驻军，维护民族尊严等。

10月23日，大学生号召举行声援波兰共产党人的游行。几十万布达佩斯居民加入示威行列，要求格罗辞职、纳吉上台。格罗最初严厉谴责这次游行，于当日12点53分通过广播电台宣告禁止游行。但在群众压力下，又于2点23分宣布解除禁令。这一摇摆使局势更加动荡。游行推倒了市内的斯大林铸像，又涌向电台，要求广播学生的16点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同保安部队发生武装冲突。整个城市陷于混乱之中。

纳吉·伊姆雷（1896~1958年），农民家庭出身。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侨居苏联25年。1944年回国，任农业部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24日，纳吉出任总理。接着，宣布戒严，并请苏联出兵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第二天，匈党中央举行会议，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参与下，决定解除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不过，这时拥有90万党员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陷于瓦解，无法发挥核心作用。

纳吉政府成立后，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呼吁停止流血冲突，恢复秩序。同时，宣布解散保安部队。政府还同苏联进行谈判，双方就撤兵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国内局势仍十分混乱。国际帝国主义派遣大批间谍特务进入匈牙利。逃亡在外的匈牙利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回国。10月28日，纳吉发表电视讲话，称匈牙利发生的事情是群众性的人民民主运动，宣布解散军队，并着手组建新的军队。10月30日，一些群众进攻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书记和守卫人员被害。各地发生多起残杀共产党人和保安人员事件。

10月30日，纳吉宣布结束一党执政。全国立刻出现了五十多个政党，局面更加混乱。11月1日，传来苏军开进匈牙利的消息。纳吉带领全体政府成员会见苏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向苏提出抗议。当天，纳吉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要求联合国保护。卡达尔则于当天晚上出走。

11月3日，纳吉政府再次改组。12名政府成员中只有三人是共产党人。11月4日，苏联装甲部队第二次开进布达佩斯。经过八九天的战斗，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大约有4000匈牙利军民遭难，苏军有669名士兵战死、1450名受伤、51名失踪。11月4日，卡达尔宣告新政府成立。纳吉在其政府垮台后，逃往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不久被捕。1958年6月16日，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十月事件给匈牙利造成巨大损失。有几万人伤亡。经济损失高达220亿福林，约占全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指出，1956年十月事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同时也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有四个：首先是拉科西集团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其次是纳吉集团听任人民政权丧失，第三是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煽动破坏，第四是帝国主义的参与。

第三节 波兰哥穆尔卡和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

哥穆尔卡改革的受挫 1956年10月，哥穆尔卡担任波党第一书记，提出十月纲领，积极推行改革。在政治方面，他整顿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改组了19个省党委中的11个。向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和32名原籍苏联的高级军事将领颁发勋章，然后请他们返回祖国。哥穆尔卡还扩大议会的权力，提高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放松对宗教的限制，取消书报检查。1957年1月，举行议会选举。从722名候选人中选出459名代表，其中统一工人党237名，统一农民党119名，民主党39名，其他为无党派人士。选举结果表明，统一工人党和哥穆尔卡的领导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政权是巩固的。

在经济方面，哥穆尔卡于1956年10月20日建议，办得不好的合作社可以解散。结果，在10月到12月的三个月中，80%的合作社瓦解，留下的也成为松散的联合体。政府宣布对国营农场、合作社、个体农户“一视同仁”，并把义务交售额减少三分之一，把收购价格提高一倍。在城市，各工业企业从解放初期就设有工人委员会。1948年后，它的权力不断被削除。现在又重新确认，工人委员会有权同经理一起讨论决定工厂的计划、生产定额、工资等问题。政府还决定减少积累，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积累率从50年代上半期的30%左右下降到1958年的19.5%。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成立了以奥斯卡·兰格为首的经济改革委员会，研究改革方案。

在对外关系方面，强调维护波苏友好关系，同时调整过去两国间不愉快的地方。通过谈判，双方商定，驻波苏军不干预波兰内政，苏军在驻地以外的任何调动都需经波兰同意。此外，苏联同意取消波兰的5亿美元欠款，不再要求波兰以低价向苏提供煤炭。

哥穆尔卡的改革在初期收到良好效果。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形势是人民波兰建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但不久，改革就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一些人要求作更大的改革。另一些人则乘国际上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之机，谴责改革是“铁托主义倾向”。哥穆尔卡不得不在妥协、平衡中行进，后来在巨大压力下不断向后倒退。1959年3月，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哥穆尔卡闭口不谈波兰道路，日益背离十月纲领。

经济上，为了保证五年计划指标的完成，政府逐步提高积累，1968年的积累率达到26.8%，基本恢复到改革前的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强调纪律，不断扩大经理的权限，缩小工人委员会的作用。1959年建立工人自治会议，由本厂各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受厂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工人自治会议是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它限制后者的自主权，使工人委员会逐渐变成生产咨询机构。原来提出的企业三自原则（自主、自治、自负盈亏）化为泡影。

政治思想方面，波党强调“修正主义是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查禁了大学生的《直言》报，恢复了书刊检查。1964年，华沙大学两名教师发表长达90页的《致党的公开信》，谴责党中央官僚化，要求扩大党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11月，这两人被开除出党。以后，又有一些党员发表类似的讲话，均受到党纪制裁。1968年，华沙上演根据密茨凯维兹作品改编的话剧《先人祭》。政府因其有反俄内容，于3月下令禁演。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等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决定。1968年10月，波兰追随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加不满。

最使哥穆尔卡感到头痛的是物价问题。国家为了保证物价稳定，不得不拿出大批款项来补贴农畜产品的销售。这笔开支不断增大，成为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的负担。1959年，政府决定提高肉类价格。1963年，又决定提高煤炭、天然气的价格。人民不断进行抗议，但政府拿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经过几年犹疑后，1970年12月13日，政府再次决定提高肉类等46种食品的价格。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走上街头，抗议提价。政府谴责群众游行，派出武装力量平息事件。但是，第二天，骚动扩大到格丁尼亚和索波特。12月17日，波罗的海沿岸最大的港口什切青发生罢工。罢工委员会接管了城市的权力。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统一工人党于12月20日举行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哥穆尔卡的职务，由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改革以失败而结束。

卡达尔的改革 匈牙利在十月事件后处境十分困难。首都布达佩斯遭到严重破坏，瓦砾成堆，疮痍满目。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政局也很不稳定。十月期间成立的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在许多地方仍掌管着工厂机关的权力。它们不时组织罢工，抵制新政府法令的贯彻。12月中，在在外地的一次示威中发生武装冲突，死伤一百多人。政府为了维持秩序，防止出现新的动乱，逮捕了中央工人委员会领导人和其他反政府分子，并决定实行宵禁，一直到1957年4月才解除。更为困难的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完全瓦解。1956年11月1日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到12月才有3.8万名党员，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大。许多居民对新成立的党和政府持观望态度。

在这种困难时刻，卡达尔成为匈牙利党政最高领导人。这一年，卡达尔只有44岁，但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于1912年出生在一个雇农家庭里，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加入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1946年，卡达尔当选为党的副书记。不久，成为拉科西统治的受害者，被捕入狱。十月事件前夕，重新出任党中央书记，先是同纳吉合作共事，随即二人关系破裂走向对立。不寻常的经历使卡达尔日益成熟起来。

卡达尔上台后，面临着妥善处理十月事件遗留问题以稳定政局和进行改革纠正过去错误的两项艰巨任务。1956年11月4日，卡达尔发表十五条纲领，全面阐述新政权的方针政策。

在政治方面，他宣布保障匈牙利独立主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一切国家和平友好，待秩序安定后，同苏联谈判撤走其军队问题。纲领第三条提出要消除内部斗争，“决不容忍以任何借口对参加最近这些事件的工人进行迫害”。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政府尽量缩小打击面，只逮捕处罚纳吉等少数人，对多数人不予追究，并宣布，在个人档案中不保留任何有关十月事件的材料。1962年，又将95%因反革命活动而被监禁的罪犯予以释放。还宣布，对逃亡国外的20万匈牙利人实行大赦，欢迎他们返回家园。这以后，十月动乱的痕迹日渐从社会中消除。

卡达尔特别强调要改善党同群众的关系，要努力做到群众理解领导，领导理解群众，以求共同前进。过去，拉科西提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结果，一些投机者兴风作浪，从中渔利，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卡达尔严肃批评了这种提法。他认为，每个匈牙利公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社会主义工作，这是最基本的。人们可以对政府的工作保留自己的看法。当他们不确信某项政策是正确的时候，也不必表示赞同，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卡达尔于1961年12月将拉科西的话改为，“谁不反对我

们，谁就是同我们在一起”，受到匈牙利人民的欢迎。

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卡达尔政权大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195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判过去“左”的错误。1962年，匈党通过《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违法事件的决议》，为190名党政干部恢复名誉，并将拉科西、格罗等25人开除出党。政府还改组了旧的公检法，解散了独立于司法机构之外的国家保安队。1957年通过人民监督法。在中央和地方都建立起监督机构，有600名脱产人员和40,000名非脱产人员进行工作，监督政府活动。政府还改革干部制度。1957年决定，除党内职务外的一切职务都允许党外人士担任，停止党组织干预地方政府事务的包办做法。1958年，决定各级党的领导人兼任同级行政领导。这一年，卡达尔辞去政府总理职务，由明尼赫接任。

在经济方面，十五条纲领提出要迅速地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修改五年计划，改变经济管理方法，支持个体农民、小商业主和手工业者。在农村，政府承认在农村改造中使用了强制手段，在征购农产品过程中犯有错误。政府允许农民退社。初期，合作社的耕地急剧减少，1957年只占全国耕地的10%。从1958年起，政府提倡农民自愿入社。经过几年努力，到1961年全国93%的耕地成为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土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政府还从多方面调整农业政策：废除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量缩减国家下达给农村的计划指标，让农民自己决定生产事宜。在城市，国家调整了工业生产计划，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重点扶持轻工业。在文化思想方面，取消书报预审制度，允许公民对各项政策和各级领导进行评论和批评，但不得进行反革命宣传。

实施上述政治经济措施后，匈牙利政局逐渐平稳安定下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58年到1960年间，国民收入增加23%，工人实际工资提高12%，农民实际收入提高19%。党的威信不断提高，党员人数从1956年12月的3.8万发展到1962年的50万。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匈牙利“进入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阶段”。

1964年9月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员有两百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经济学家，三分之二是经济管理干部。主席是瓦尔加·伊斯特万。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制定出改革的总体方案。1966年5月，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一方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于1968年1月1日在全国推广。

匈牙利的新体制改变了苏联的集中计划管理模式，但不同于南斯拉夫的管理模式。它把计划调节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让市场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讲，国家从宏观上管理全国经济，计划只规定经济的基本格局，如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等等，产品的供求则由市场来调节。信贷、税收、价格、工资等经济手段是国家指导生产的主要方法。行政手段变成国家管理经济的辅助方法。价格分为三种，一种是固定价格，由国家规定；另一种是浮动价格，国家只规定最高限价；第三种是自由价格。在新体制下，企业获得较大的自主权，在国家指导下可以自己制定生产计划。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社会政治体制也作了某些改进。1966年和1970年两次修改选举法，规定各级议会代表都由选民直接选出。1968年后，先后修订了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努力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循。

实行新体制后，经济发展速度增快，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收入增长了31%，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国民收入增长了35%，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2%。农业的发展更是惊人。70年代初，匈牙利从一个农产品进口国变成农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从1950年的369万吨增长到1970年的762万吨，197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135万吨，平均每人产量为1070公斤。这个人均数字仅次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丹麦，居于世界第五位。肉类和蛋类的人均产量也很高，在经互会国家中居于首位。匈牙利实行改革后，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第四节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天折

“布拉格之春”的天折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建立后，经济发展迅速。1948~1957年间，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但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也带来了经济比例失调、企业缺乏自主权、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等问题。

苏共二十大后，捷克斯洛伐克于1958~1959年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是放松集中管理。中央管理机关的工作重心由日常事务性工作转到研究制定长期计划，减少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缩小统一调拨的范围。另一方面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可以自行安排生产，独立进行经济核算，可以通过利润提成建立自己的财务基金。

60年代初，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农业虽于1960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实现了合作化，但产量长期徘徊不前，1966年才达到战前1936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出现指标冒进、比例失调、增长速度减慢等问题。党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认为，这些问题的形成源于改革的不当。他废除了改革措施，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重新恢复到改革前的老样子。可是，经济状况并未因此而好转。改革的呼声再度兴起。

1963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改革委员会，由经济学家和国家管理干部组成，负责人是奥塔·希克。1964年1月，报刊发表了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改革方案。经过讨论，1965年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主要指示》，1966年又公布了《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这次改革比50年代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它宣布，计划不再是物资分配的计划，而应适应市场的需要。其次，改革企业组织结构，把384个生产经济单位按专业合并为90个。每个新单位都是完全独立的生产经济组织。第三，改革价格体系，由单一的国家固定价格改为固定价格、限制价格和自由价格三种。先改批发价格，再改零售价格。第四，改革工资制度。工资由企业定。取消对个人收入和单位工资总额的限制。

诺沃提尼原来同意进行改革。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他担心改革会使他重蹈苏共领导人的覆辙，便改变态度，阻挠、限制改革，引起人民的不满。1967年4月，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许多作家在会上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政治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诺沃提尼采取高压手段，把一些有名的作家开除出党，禁止他们发表文章，同时解散了作家协会。诺沃提尼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愤怒。政治斗争日趋激化。

党内的反对派极力想把诺沃提尼撤换下来，他们提出党政职务分开的建议。1967年12月，捷共召开中央全会，多数委员同意免除诺沃提尼的第一书记职务，但由谁接替，各派意见不一。中央全会决定暂时休会。诺沃提尼眼看自己地位不保，便向莫斯科求援。勃列日涅夫亲自飞往布拉格。他看到诺沃提尼已成众矢之的，便向捷共领导表示，“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1968年1月，捷共中央举行全会。经过各派协商，杜布切克当选为第一书记。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于1921年生于斯洛伐克。1939年加入共产党，1963年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并担任斯洛伐克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上台后，竭力把改革派人物扶上领导机构。诺沃提尼不服，企图利用军队中的亲信搞政变，但因得不到军队多数的支持而未能成功。事情败露后，诺沃提尼于1968年3月21日辞去行政职务。斯沃博达接任总统。改革派人物切尔尼

克任政府总理，希克任副总理。党政军内的保守派人物则纷纷辞职。

1968年4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宣布“将进行试验”，“创立一个新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纲领认为，党的领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党的目标“并不是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万能的管理者”。党的“路线不能通过发布命令来贯彻，而只能通过党员的工作和自己的理想所具有的说服力来贯彻”，“今后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纲领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纲领认为，“一个党或几个政党的联合，都不能垄断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人民的一切政治团体必须直接参加国家权力机构”。主张以民族阵线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在经济方面，纲领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工人委员会有权指定经理、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社会福利等重大问题。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权。在民族问题上，纲领主张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在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的“联盟和合作”的同时，发展同一切国家的互利关系。四月行动纲领把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是50年代中期以来捷政府所有改革方案中最激进的纲领。它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各界群众举行各种集会讨论国家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活泼局面。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变化不满，认为它是反苏的，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范围。1968年5月3日，苏联邀请杜布切克到莫斯科会谈，要他改变政策，但被拒绝。5月17日，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捷，提出要在捷举行华沙条约国军事演习，以此对捷施加压力。

苏联的行为引起捷人民的愤慨和不安。6月27日，一批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发表了《二千字宣言》，号召人民按自己的首创精神和自己的决定行事，加速各方面的改革。宣言还提醒人们注意“外国势力干涉的威胁”，呼吁在必要时用武力支持政府。宣言在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捷共中央发表文章，表示拒绝宣言的立场。苏联则称这一宣言为“反革命的号召书”。

7月14~15日，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领导人在华沙开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并联名给捷共中央发去一封信，谴责捷共的纲领，声言：“我们不能同意让敌对势力把你们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已不仅仅是你们的事了。这是我们华沙条约国的共同事业。”1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复信，逐点反驳联名信的观点，指出五国不得干涉捷内政，表示同意和五国个别举行双边会谈。7月29日，捷苏双方在捷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没有取得成果。8月3日，捷共与华约五国党代表团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没有直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捷共认为形势有所缓和，全力准备预计9月9日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苏联等几个华约成员国在积极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晚11点，一架苏联民用客机以机器发生故障为由，要求在布拉格机场紧急降落。但降落后从飞机中下来的是苏军突击队员。他们立即占领了机场。接着，装载坦克、大炮和苏军部队的运输机一架接一架降落下来。苏军占领了布拉格的各重要据点和党政领导机关，绑架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领导人。与此同时，苏、波、匈、保和民主德国的二十多万军队

从四面八方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占领了各战略据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联等华约成员国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怒。捷共中央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谴责入侵，认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无法阻止苏军入侵。它号召人民放弃武装抵抗，只进行政治和道义上的反抗。苏联等国军队在第二天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把其总统斯沃博达请到莫斯科，想抛开杜布切克，另建一个亲苏政府。但是，斯沃博达坚决拒绝在杜布切克不在场的情况下同苏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人民斗争不断高涨。8月22日，全国举行一小时总罢工，抗议苏军占领。同一天，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卡德工厂秘密举行。大会通过决议，重申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并提出释放被捕的领导人、撤出占领军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迫让步，把杜布切克等人从拘押地接到莫斯科举行谈判。8月24日，捷苏谈判正式开始。捷方代表坚持要杜布切克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但在苏军入侵问题上作了让步。26日，双方签署会谈公报，说五国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加紧策划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捷方表示不允许国内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10月16日，捷苏又签署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件的条约》，使苏军占领合法化。这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多次举行集会示威，抗议苏军入侵。但杜布切克政权采取对苏妥协让步政策。最后，杜布切克本人于1969年4月被撤掉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

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政局比较平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顺利地进行了更替。1960年，民主德国总统皮克逝世。人民议院决定设立国务委员会，由乌布利希任主席。1964年，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逝世，由斯多夫接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于1971年改任党的主席，昂纳克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在罗马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于1965年逝世后，由齐奥塞斯库接任。在保加利亚，托·日夫科夫于1954年接替契尔文科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1962年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1971年改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由托多罗夫担任。在阿尔巴尼亚，则一直由霍查和谢胡分别担任党政领导人。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斗争十分激烈。1958年和1960年清除了雅科瓦、斯巴秀、贝利绍娃等人。1973年开除了帕切库米、卢库尼“文化反党集团”。1974年清洗了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1975年又开除了凯莱齐“经济反党集团”。在对外关系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传统路线，同赫鲁晓夫发生矛盾冲突。1961年阿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

在经济方面，各国分别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邻国改革浪潮的影响下，对各自的经济体制作了某些调整。民主德国原来有发达的精密机械、光学工业和轻工业，后来，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8年，追随苏联的做法，取消中央的七个部，改设国民经济委员会。1959年，停止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1960年）的执行，改订七年计划，并提出人均消费水平在1961年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的口号。但这一计划落空，不少人外逃西方。1962年，民主德国政府决定停止七年计划的执行，并着手进行改革。1963年，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原则》的决议，决定在坚持中央计划体制下努力用经济手段管理生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保加利亚的经济原来比较落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批新的厂矿企业。1958~1963年期间，曾仿效苏联取消中央的各部，效果不佳。1963年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经过一段时期的试验，1965年12月，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和领导工作新体制》的基本条例。在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下，减少指令性指标，加强物质鼓励。在农村，从1968年起，开始建立农工综合体，到1972年全国建立了172个。

罗马尼亚在1965年党的九大上提出经济改革的任务。1967年，罗共代表会议通过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决议。经济计划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制定。中央先下达指导性计划，企业再根据上级计划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并逐级上报。国家根据各部汇总的计划，研究制定计划，经大国民议会批准后，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在管理体制上，取消部属专业局，建立综合性经济实体——工业中心。阿尔巴尼亚经济在50年代由于得到苏联的援助，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5%和18.9%。60年代以来，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100多项成套项目的援助，总额达100亿人民币。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援助和本国人民努力下，阿尔巴尼亚逐渐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家。

第五节 80年代的东欧国家

盖莱克的新战略的失败与波兰危机 1970年，爱德华·盖莱克在危机中接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他上台后，提出新的战略发展方针，主张借助外资和西方技术，实行三高政策（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在十年内“重建一个新波兰”。1971年12月，统一工人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盖莱克的新战略。

新战略在初期执行得比较顺利。1970~1976年，国民收入从7492亿兹罗提上升为15,933亿兹罗提，增加了一倍多。在这一时期，工业扩大了81%，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粮食产量由1637万吨增长到2086万吨，肉类产量由218万吨增长到290万吨。在顺利情况下，政府一再追加投资，扩大积累。1973~1978年期间积累率超过30%。结果，造成资金积压，经济效益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断扩大居民收入。人民手中有大量余钱，而市场上商品不足，供应日趋紧张。政府想改变这一情况，于1976年决定调整商品价格，但遭到群众反对，引起工人罢工，政府只得让步妥协。这以后，问题不断积累，终于导致矛盾公开爆发。

1979年，开始出现危机。这一年的国民收入比上一年下降了2.3%。1980年，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波兰向外出口困难，外汇收入减少，外债达到惊人数字。1971年，波兰的外债仅为8亿美元，1980年达到230亿美元。这一年偿还到期的贷款和支付利息共需81亿美元，占当年外汇收入99亿美元的81.8%。国内经济情况也很糟糕。1979年和1980年，农业连续两年歉收，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少300万~400万吨。市场上食品短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政府为了稳定物价，于1980年拿出1700亿兹罗提进行补贴。这个款项占到当年预算支出的40%。这样大的补贴支出以及巨额外债的偿付使波兰财政濒临崩溃，经济陷于危机。盖莱克的高速度发展战略至此全面破产。

波兰政府为了战胜经济困难，于1980年7月1日决定把议价肉类的价格提高60%~90%，这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7月16日，华沙和卢布林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补偿因肉价上涨而受到的损失。政府同意提高工资10%~15%。风波暂告平息。8月，罢工又起。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16,000名工人罢工。第二天，全市5万名工人加入斗争行列，并成立了联合罢工委员会，瓦文萨任主席。罢工迅速蔓延到各地，几乎席卷了整个波兰。罢工得到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农民、知识分子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在斗争中，工人们除抗议肉价上涨，提出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待遇和改善市场供应等经济要求外，还提出成立自由工会、保障罢工权利和安全、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取消书报检查、释放政治犯、允许教会采用更多的宣传手段等政治要求。8月底，政府允许工人在“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作用和国际联盟体系”的条件下，成立自治工会。9月1日，格但斯克自由工会首先成立。接着，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同样的组织。9月22日，来自波兰各地的36个自由工会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会议，宣告成立“独立自主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全国协商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的团结工会章程规定，“工会是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和政治组织的”群众团体。工厂的经理、厂长、大车间的主任以及政治机关负责人“都不能担任工会的领导职务”。9月24日，团结工会向华沙省法院申请登记注册。法院对工会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

删去了有关罢工权利的一节，增写了承认统一工人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文。团结工会反对这一修改，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并以总罢工进行威胁。经过激烈斗争，政府和团结工会双方都作了让步。1980年11月10日，最高法院撤销华沙省法院对团结工会章程的修改意见，团结工会则在章程的附件中写上“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也不破坏业已确立的国际联盟体系”。最高法院同意团结工会登记。团结工会取得政府承认后，发展迅速，自称拥有948万会员。原来的工会陷于瓦解，它的中央理事会宣布，从1980年12月31日起停止活动。

为了稳定政局，波兰党政领导进行了改组。1981年2月，原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接任政府首脑。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于1980年9月被六中全会撤职，卡尼亚接任第一书记职务。

新领导人上台后，推行协商和革新路线，主张同团结工会、农民和学生代表对话以达成社会谅解，实行领导和管理体制改革以重建党的威信，改善国家经济情况。1981年春，波兰局势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但3月19日，发生了团结工会彼得哥什省负责人被警察打伤事件。事件发生后，团结工会立即决定取消同当局的一切谈判，要求政府查明事件真相，惩办肇事者，否则将组织无限期的总罢工。政府为防止事态扩大，派出代表团同团结工会进行了五轮艰苦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一场新的严重冲突。

这以后，团结工会的影响愈来愈大。1981年5月12日，团结农会在华沙法院登记成立。它拥有250万会员，积极配合团结工会活动。此外，天主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也站在团结工会一边。1981年9~10月，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工会活动纲领认为，“目前危机的根源深刻地存在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而当局已“没有能力深刻改变现状”。纲领主张“打碎”现行的“经济组织机构”，“改建国家的机构”，“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建立独立的自治机构”。活动纲领的被采纳表明，团结工会已把改变波兰现行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这是波兰党和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团结工会同党和政府的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内部存在着尖锐分歧。多数人支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协商和革新的路线。以“卡托维兹论坛”为代表的少数人反对协商、革新路线，指责这条路线“具有同右派势力和修正主义势力妥协的性质”，“给党带来了修正主义政变的日益增长的危险”，“给大家庭的团结和安全造成威胁”。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召开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

在筹备九大过程中，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改选。结果，基层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大约更换了50%，市、镇、乡和区一级党委第一书记更换了75%，49个省委第一书记更换了50%。拥护革新路线的人占了上风。

1981年7月14日，统一工人党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产生经济政治危机的原因，清算了前领导人的错误，并把盖莱克等人开除出党。大会确认了社会妥协和革新路线，认为没有这条路线就不能摆脱危机。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在270名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占89%。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等四人重新当选。几个月后，1981年10月18日，卡尼亚因贯彻九大决议“不力”和对团结工会“让步过多”而辞职，雅鲁泽尔斯基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雅鲁泽尔斯基的内政 雅鲁泽尔斯基于1923年生于卢布林省的一个知

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在苏组编的波兰第一师。战后，先后担任军队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1973年晋升为大将。波兰危机发生后，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第一书记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雅鲁泽尔斯基上台后，采取了比上任更为积极、更为强硬的政策。他一方面同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天主教会大主教格莱姆普举行会谈，另一方面派遣军队干部到各要害部门和地方担任领导，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非常措施。当三方会谈陷于僵局，团结工会要求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举行公民投票时，雅鲁泽尔斯基毅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1981年12月13日，他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成立以他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中央和地方政权，实行全国军管。同时，他勒令团结工会停止活动，并逮捕瓦文萨等五千多名工会领导人。

波兰实行军管后，国内秩序趋于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暴乱和全国性总罢工。但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政府面临的困难仍很大。团结工会在其领导人被捕后，又秘密建立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经常组织抗议、罢工等活动。西方要求波兰当局取消军管，宣布对波进行经济制裁。美国里根政府决定停止对波的经济援助，停运粮食给波兰，禁止波兰渔船在美国海域捕鱼，中止波兰民航公司在美的航行权利等。联邦德国、英、比等欧洲国家决定限制同波兰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据波兰估计，西方的制裁使波兰损失两百多亿美元。

波兰党和政府决定进行改革以克服危机发展经济。早在1981年1月就公布了《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草案。11月30日，部长会议通过一系列有关改革的法令。实行军管后，雅鲁泽尔斯基不但没有停止改革，反而加快了步伐，决定从1982年1月1日起，实行全面改革。

在经济方面，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把它限于军需产品、国际协议的产品以及应付自然灾害的国家储备产品。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可以独立制定自己的经营计划，确定本企业职工人数和报酬数额。各企业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职工在企业中享有自治权。政府还利用军管的条件改革价格体系，减少国家对物价的补贴。1982年1月1日，大幅度提高动力、燃料的供应价格。同年2月1日，又提高39种基本食品价格以及电力、煤气、暖水的收费，提高的幅度为2~4倍。在提价的同时，国家给职工以补贴。在农村，政府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并宣布个体农户是“波兰经济持久与平等的因素”，法律保证它的长期存在。波兰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它扭转了自1979年以来连续四年的经济下降趋势。1983年和1984年，国民收入共增长了11.2%。

在政治方面，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波兰是多阶级社会。在80年代的波兰社会中，存在着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分别占总人口的46.6%、24.8%、23.8%和4.7%。因此，波党决定实行联合执政，即由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党、天主教会、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共同掌权。波兰的联合执政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政体，更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政权。它承认统一工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承认其他政党的独立性，允许后者独立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改造速度等问题。

1982年10月8日，通过新工会法，正式取缔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工会重新建立后迅速发展，到1983年夏有会员三百多万人。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天主教会也从非难政府转向对话合作。再加上经济

情况的不断好转，波兰的形势终于稳定下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从 1982 年 12 月 31 日起停止军管。1983 年 7 月 22 日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历时 588 天的非常状态至此结束。

南斯拉夫、匈牙利的调整 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后，取得了巨大进展，成为一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国家。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 1983 年达到 2067 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30%。

但南斯拉夫经济同西方市场联系较密切，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从 70 年代末期起，经济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首先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调，生产发展速度减慢。1976~1980 年期间，全国投资总额很大，达到社会总产值的 41.3%。但投资分配不合理，能源和基础工业的投资不足，以致在 1981 年有三分之一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原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断下降。70 年代为 7.4%，1981~1982 年下降到 4%。其次是出口减少，外债增加。南斯拉夫的进出口贸易逆差，1979 年达到 61 亿美元。外债数字在东欧居于第二位，仅次于波兰。到 1982 年 1 月，国家外汇储备只有 25 亿美元，而偿还到期外债和支付利息需要 33 亿美元，入不敷出。第三是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商品零售价格，60 年代年均上涨 11%，70 年代年均上涨 19%，而 1981 年 6 月比上一年 6 月上涨 49.9%。居民的货币收入虽有增加，但赶不上物价的飞涨。1981 年在职人员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4.7%。

这些困难被南斯拉夫领导人称为“经济上的危机”。为了战胜它，南斯拉夫宣布 1979 年为稳定经济年。1983 年，议会通过“长期稳定经济纲领”，要求加速发展农业和基础工业，压缩其他部门投资，放慢它们的发展速度。在交换方面，决定冻结物价，限制消费，节约能源。同时加强外汇管理，扩大外贸出口。

匈牙利经济经历了 1968~1972 年的黄金时期之后，发展遇到新的困难。由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和石油涨价，匈牙利商品成本提高，出口减少，外贸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减慢。1979 年的国民收入比上一年只增加 1.8%，而 1980 年则下降了 0.5%。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党和政府在 80 年代开始实行新的改革。

在经济方面，政府注意发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撤销酿酒、制糖、烟草、煤炭等 18 个工业托拉斯，把它们分成近百个企业，以便于相互竞争。其次，从 1980 年起，开始实行竞争价格。过去，价格主要是根据产品的成本规定，现在把国际价格当作国内商品定价的基础，使国内价格逐步向国际价格看齐，用国际竞争能力来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到 1984 年，70% 的工业品实行了竞争价格。政府还放宽了对集体和个人企业的限制。1981 年 9 月，颁布了关于建立小合作社、工业和服务行业合作社专业小组以及经济劳动合作小组的三个法令，规定劳动小组由私人筹措资金建立，人数最多不得超过 30 人，还可以雇工 15 人。新法令规定，私人企业职工享受同国营企业职工一样的社会福利和退休保险。从 1982 年起，政府将一些亏损的饭店和小企业出租给私人。到 1986 年，匈牙利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 5%，产值约占总产值的 15%~20%。1986 年 6 月 27 日，政府公布企业破产法，使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进一步落实。

在政治方面，匈牙利从 80 年代起开始实行差额选举。1986 年规定，议员选举时，每个席位起码要有两个候选人。同年还宣布，从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担任同一职务最多不得超过两任。在日常工作中，强调党政分工。在拥有千名职工的企业中，不设专职党委书记，不设脱产的党务工作人员。党的工作是社会工作，由党员在业余时间进行。

匈牙利政局平稳，经济发展不算很快。但市场繁荣，人民生活稳步提高。1950~1955年，职工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只有1%，1967~1978年上升为3.2%。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改革与发展 70年代，保加利亚加快了改革步伐。1978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完善新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和改进经济计划领导提纲》。第二年，开始在农业和食品工业部门试行。经过三年试验，1982年2月，公布了《关于经济机制章程》，全面实行新经济机制。这次改革的“全面的总原则”是“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

新章程规定，中央计划经济仍是基本的，但指令性指标只剩下关系全国经济的部分，即关系到全国经济平衡的产品数量及其实物销售量、毛利润指标、外汇收入指标、重要科技任务指标、大项目改进和现代化指标等。农业方面，国家只确定100种农副产品的实物指标。计划体制的这一变动使企业和合作社在生产和分配上获得更大权利。投资方面，规定有国家拨款、企业自筹、银行贷款三种形式。商品价格分为统一的、浮动的、自由的和奖励四种。分配方面，国家对企业职工的工资不予担保，工资额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成果。此外，各企业建立经济管理委员会，委员通过选举产生。管委会主席一般是厂长兼任，由上级任命。管委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有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重大问题。

1986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日夫科夫在会上提出，要进行“垂直方向的改革”，即改革国家计划管理体制，减少中间环节，撤销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减少干预，让经济组织和企业自治。同时，也要进行“水平方向的改革”，即在利用价值规律、商品货币关系和供求关系方面进行改革。在政治方面，保共提出要对对话，说对话是政治和管理手段，它可以把各集团的不同利益协调起来。

保加利亚1970年的国民收入为105亿列弗，1980年升为183亿列弗。1980~1984年期间，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4%。1980年外贸顺差7亿美元。

罗马尼亚共产党继1967年改革之后，于70年代继续新的探索。1978年3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完善财经领导工作和计划工作的决议》，决定在保持中央集中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财经权限。企业的利润留成由过去的30%增加为40%。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财务自理。1982年10月，罗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国家经济单位劳动人民参与筹集经济发展基金法》（草案）。经全民讨论后，被大国民议会通过。新法令规定，职工可以在本企业入股，自愿认购，不得转让但可以继承。入股者年终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分红，利润一般在年利5%~8%之间。法令还规定，由劳动群众筹集的股金总额不得超过该单位固定资金的30%。在农业方面，1982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罗马尼亚合作单位劳动报酬法》，规定以生产队、组为单位进行定额承包，报酬按其完成实物产量的比例支付。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改革失败后，又重新回到以前的集中体制。70年代中期，因能源和原材料

的价格上涨，经济发展速度减慢。1980年1月30日，政府通过了《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整套措施》。规定把五年计划同年度计划结合在一起，使企业既有长远方向，又有年度机动权。其次，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提高生产单位的利润留成，由过去的22%~28%提为30%~37%。第三，改革工资制度。规定固定工资占80%，其余为奖励部分。第四，完善价格体制。商品分为三级，价格以二级为准，一级加价20%，三级降价15%。1981年10月，又讨论完善农业管理体制问题，决定国家下达的农业指标仅限于商品粮和屠宰牲畜两项，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鼓励发展个人经济。

1986年3月，捷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八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提出要加快科技发展，向电子化、自动化和机器人化发展。

民主德国在60年代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革，效果不理想，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1970年9月，党中央认为国民经济中的问题是新经济体制引起的，又逐步恢复集中管理，建立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托拉斯式企业管理体制。从1971年起恢复的年度计划为调节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强调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把一切重要产品的产量都纳入国家计划。国营企业必须按计划生产，并受国家监督。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面，继1960年农业实现合作化后，1972年将私人和公私合营的企业都改为国营企业。到1981年，社会主义经济占96.5%，而公私合营只占0.6%，私人经济占2.9%。1981年，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80年代经济战略。中心内容是：继续执行集约化方针，提高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推广最新科技成果的利用，提高生产率；进行产品结构的改革，扩大出口增收外汇。

总的讲，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不多。但这两个国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居于东欧国家之首。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收入近3000美元，煤的人均产量为8吨，钢为1吨，发电量为4750度。民主德国198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103美元。据1981年统计，每100户家庭中拥有小汽车40.2辆、电冰箱114.2台、电视机108.8台。1979年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3平方米。

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60年代起，阿接受中国大量援助，经济发展迅速。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65~1970年、1971~1975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4%和11.2%。1976年，阿中关系恶化。1978年，中国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发展速度急剧下降。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增长率仅为6.1%。

1981年12月18日，连续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达27年之久的谢胡突然死亡。当天宣布是“因精神失常”而自杀。一年后，1982年11月10日，霍查在选民会上说，谢胡给美国、南斯拉夫、苏联情报机构办事。接着，对政府进行了大清洗。16名部长中，有10名被撤换。1985年4月，霍查病故。阿利雅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以后，阿尔巴尼亚逐步开展了同意大利、法国的商业往来。1983年，恢复了同中国的贸易。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的兴起。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第三世界的兴起

50年代中期以后至70年代初期，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其主要表现是以亚非拉独立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的形成，并迅速发展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三世界”与“三个世界”的概念产生于战后50年代。最早使用“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是法国的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1952年，他在一篇题为《三个世界，一个星球》的文章中指出，当时除了两个对抗的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第三世界。索维最初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存在的“三个等级”的概念，将第三世界界定为相当于“第三等级”，指的是一种“被忽略、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

50~60年代，第三世界被视为独立于美苏两大力量以外的“第三种力量”或“第三种势力”，其中包含了浓厚的民族主义的色彩。此外，第三世界还含有“不结盟”的意思。在经济上，第三世界被认为是“不发达”国家。60年代，随着许多不发达国家加入联合国后，“不发达”一词因带有贬义而逐渐被摒弃，代以“发展中”一词。国际上开始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术语交替使用。

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诞生。通过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1961年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与亚非拉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第三世界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它们既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世界。它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第三世界。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把“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正式写入会议的《政治宣言》之中。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形象在国际上确立，第三世界的术语也广泛流行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战后初期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概念，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包含有“第三世界”的含义。70年代初，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形势下，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几次谈话中，都探讨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和含义问题。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借用了国际上已流行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术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2月25日，他与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的谈话中也补充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显然，毛泽东所指的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首次向全世界阐释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3页。

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此后，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更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甚至那些反对使用这一概念的人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概念。

第三世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当代世界有 180 多个国家，而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多达 130 多个，约占世界国家总数的 3/4；其土地面积 1 亿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总面积 1.41 亿平方公里的 67%；人口 40.4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76.9%。第三世界资源丰富，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中，第三世界国家约占 80%，仅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就占世界总储量的 56%（1980 年）。在已知的 51 种稀有金属中，约有 30 种全部或大部分出产在第三世界地区。世界许多重要经济作物和农业原料，特别是天然橡胶、黄麻、剑麻、咖啡、可可、香蕉、椰子、棕榈和甘蔗等热带、亚热带作物主要产地在亚非拉国家。这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而且为发展和繁荣世界经济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资条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它们扼海上交通要冲，控制一些海峡和港口。如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沟通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麦哲伦海峡等都位于第三世界地域之内。非洲北端的苏伊士运河和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举世公认。1988 年美国公布要控制的全球 16 个航道咽喉中，据统计有 12 个在亚非拉。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在当代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

作为当代世界舞台上的一支新兴的力量，第三世界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1）从历史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演化而来的。它们都曾遭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有着悠久的反帝反殖的斗争传统。第三世界的形成，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并在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过程中联合起来开展共同斗争的产物。

（2）从经济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是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第三世界经济学家圣地亚哥宣言”指出：“第三世界拥有世界人口的 76% 却仅仅依靠世界收入的 27% 维持生计——甚至连这点微薄收入还要被不合理地分配，使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处于一种赤贫状态。”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一般有若干共同的基本经济特征，概括说来有以下几点：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二、产业结构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三、所有制形式为特有的多样性，四、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五、对外的依附性。它们基本上在经济上欠发达的农业和初级产品出口国。现代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及原始手工业并存，凋敝、闭塞的农村和日益膨胀的城市并存，少数富有者与广大贫困群众并存，是其二元结构的突出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历史根源，主要是由于现实存在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因而，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民族经济，消除贫困落后，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要求。

（3）从政治上看，第三世界各国存在不同性质与类型，既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有一些国家是由封建王公贵族领导的。这些不同阶级领导的国家所奉行的政策各异，它们之间也往往由于种种矛盾（民族、宗教、语言、领土与边界等等的矛盾）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然而，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的威胁、干涉、控制或侵略。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大都奉行独立自主或不结盟政策，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求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要求。

由于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力量，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是当代世界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在第三世界形成与发展过程中，50年代中期亚非会议的召开和60年代初期以来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和标志性事件。

第二节 亚非会议的召开与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亚非会议的召开 1955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勃兴，一系列亚非国家冲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链条。到 50 年代中期，亚非两洲已有约三十个独立国家。

独立后，亚洲新兴国家普遍要求增进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1953 年 12 月，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会谈，双方同意将这五项原则写入《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之中。翌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并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的提出，获得国际上广泛的好评，被称为“亚洲的宪章”，同时它的发表也为亚非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4 年 3 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同年 4 月，南亚五国总理在科伦坡举行会议，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问题。12 月，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专门研究亚非会议问题，决定由与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 25 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定于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万隆举行。

茂物会议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和宗旨是：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茂物会议的建议，受到亚非各国的欢迎与支持。除中非联邦外，其余 24 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中国政府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亚非会议的召开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和西方殖民国家惧怕亚非世界的团结和觉醒，当茂物会议决定召开亚非会议时，美国一家报纸报道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美国开动宣传机器，贬低会议价值，说这个会议将只是“一个午后的茶会”。它还制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等舆论，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并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毒化会议气氛。为了破坏会议的召开，4 月 11 日，又利用台湾特务在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航客机中放置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在从香港飞往印尼的途中爆炸坠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 11 人罹难。这一事件严重毒化了会议的气氛。

1955 年 4 月 18 日，亚非会议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挠，在万隆正式举行。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 共约 3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

南亚五国即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参加亚非会议国家和地区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并说：“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他呼吁，“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东道国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选为会议主席。

开幕式后，大会进入第一阶段，举行公开的全体会议。从 18 日下午到 19 日，先后有 22 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致词。大多数代表的发言都围绕着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合作和谴责殖民主义三个题目进行，但也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偏离大会的宗旨，硬说“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有的代表甚至提出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影射、攻击中国。这些言论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人们担心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毫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受到会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同时由周总理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4 月 19 日，周总理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阐述了亚非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的基础，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还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作了解答，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周总理的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主动迎上去与周总理握手，他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倡的“求同存异”方针，驱散了一度笼罩在会议上空的乌云。由于各国代表普遍接受这一方针，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全体会议后，代表们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举行秘密会议。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讨论阶段。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很顺利地取得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的争论较大，主要是围绕殖民主义问题及和平共处两个问题。中国和许多国家代表团本着亚非团结、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克服了各种阻力，为达成最后协议铺平了道路。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七部分。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亚非会议产生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万隆精神”，对世界和亚非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万隆精神鼓舞下，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亚非国家日益增多，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潮流，为 60 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从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一些新独立的亚洲国家首先提出要独立于大国集团之外，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46 年 9 月，尼赫鲁就宣布印度独立后的政策将是不结盟。南斯拉夫在受到苏联种种不公正待遇之后，也转向不结盟。铁托主张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政策。他在 1950 年说：“我们不是任何集团的一部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启迪下，铁托和亚非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萌发了组织不结盟运动的思想。

1956 年 7 月，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尔俄尼岛就发起不

结盟运动进行了磋商，迈出了不结盟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第一步。在铁托、纳赛尔、尼赫鲁、苏加诺和恩克鲁玛等的共同努力下，1961年6月，在开罗召开了筹备会议。这次会议规定了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五项标准：一、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最少应当采取符合这种政策的态度；二、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三、它不应当是任何会使它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联盟的成员国；四、它不应当是同某个大国缔结的双边联盟的参加国；五、它的国家领土不应当有它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这些规定说明，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1961年9月1日，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共有25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明确宣布，与会各国全力支持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要求撤除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主张用和平共处来代替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冷战的政策。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不结盟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政治运动的兴起，说明第三世界中小国家作为一支集体的联合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正如一些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的：世界事务再不能由少数大国一手包办了，小国、不结盟国家应当参与重要国际问题的解决。

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后，不结盟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到70年代中已有95个成员国，进入80年代增加到101个，占联合国会员国半数以上，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结盟运动在发起时的宗旨主要是在两大阵营、两个军事集团之间保持和平中立，联合新独立的中小国家，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参与国际事务。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锋芒是反对西欧老牌殖民国家，要求“最后结束殖民主义”，同时反对新殖民主义。1964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指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一个基本根源”，“不废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就不能在全世界充分实现和平共处”。

1970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首脑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卢萨卡宣言》，指出“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均势没有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卢萨卡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矛头指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开始。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对霸权”的口号，并宣告：要拒绝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依附、任何干涉和压力，不管它们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此后，历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谴责“霸权关系”、“大国争夺”。

随着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其斗争由政治领域逐步深入到经济领域。1970年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是一个转折，会议通过的《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宣言》，谴责“殖民地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求发展中国家促进相互合作，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议希望“提供机会使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结构变化，以便满足穷国的迫切需要，加强它的独立，使世界经济有更为迅速和更为均衡的发展”。自此以后，经济问题成为每次首脑会议的主要议程。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于1964年提出了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纲领，获得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充分肯定，指出这是一种“新的全球发展战略”。1976年第五次首脑会议上，又提出了“集体自力更生”的战略思想，并大力提倡

“南南合作”，使经济领域中的斗争日益深入。

不结盟运动诞生后，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形式逐步完善。除每三年召开一次的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之外，还成立了部长级协调局和驻联合国代表协调局作为常设机构。它已成为第三世界一个有明确的宗旨和有比较完善的组织系统的重要的国际组织。到 1995 年为止，共举行了 11 次首脑会议，成员国达到 113 个，约为现今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中国作为观察员，出席了 1992 年 9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首脑会议和 1995 年 10 月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举行的第十一次首脑会议。第十一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哥伦比亚宣言》指出：“不结盟运动及其根本原则仍然是有效的”。

“在此之前流传着关于不结盟组织已经死亡和在社会主义集团消失后它已不起作用的各种论调”是错误的。伴随世界形势的新的急剧变化，不结盟运动在坚持运动的主旨、团结广大中小国家的同时，正在寻求调整与改革，探索新的活动方式与途径。它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对大国的控制与干涉，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政治论坛，并将更加注意经济发展问题，以便在冷战后时期发挥新作用。

第三节 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加紧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军队从印支三国撤退。但是,美国立即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加紧对这个地区的渗透。

1954年9月,经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多方奔走,在马尼拉召开了美、英、法、澳、新、菲、泰、巴等八国外长会议,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拼凑了“东南亚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公然把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划入它的“保护”范围。美国统治集团还鼓吹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若失掉印支三国,将会在东南亚和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因此,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干涉印支三国内政,力图将这块战略要地据为己有。

越南停战后,美国在南越扶植吴庭艳担任总理,排挤法国传统势力,建立亲美独裁政权。吴庭艳拒不执行通过普选统一国家的协议,相反,宣布日内瓦协议签字日为“国耻日”。他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并采用“公民投票”手段废黜了保大皇帝的国家元首地位,建立“越南共和国”,自己登上总统兼总理的宝座。吴庭艳上台后,美国不断增派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进入南越,并运进大批军事装备,修建了数十处军事基地和战略公路,将南越变成了美国的新殖民地 and 战略基地。

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庭艳集团发动“控共”、“灭共”战役,向南越爱国者举起了屠刀。1958年12月1日,吴庭艳集团在西贡附近的富利集中营制造了毒死千余名政治犯的大惨案。1959年5月,又颁布了“第十号总统法令”,设立特别军事法庭,有权随时处决爱国人士。在停战后的头五年内,南越有20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100多万人被拷打致残,1万多人惨遭杀害。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国在老挝也扶植亲美势力,破坏协议的实施。日内瓦协议承认老挝的独立和寮国抗战力量的存在。停战后,寮国战斗部队集结于桑怒和丰沙里。1955年3月22日,老挝人民党成立。1956年1月6日,在伊沙拉(意即自由)阵线的基础上组成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主席的“老挝爱国战线党”,老挝人民党为其领导核心。同年5月,爱国战线党与以富马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签订“万象协议”,规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组织民族联合政府,并规定寮国战斗部队一部分复员,一部分改编为王国联合政府的军队。1957年11月,老挝联合政府成立。但是美国于1958年7月策动反动势力,搞垮了联合政府,扶植培·萨纳尼空上台执政。这个政权撕毁了万象协议,镇压爱国战线党。1959年5月,派兵包围并下令解除已编入政府军的寮国战斗部队两个营的武装。同年7月,又非法监禁了苏发努冯等爱国战线

吴庭艳(1910~1963年),生于越南中部广平省(今平治天省),信仰天主教。法国殖民时期任县长、内务大臣等官职。1950年离越赴日,次年去美国。这期间与美国国务院建立了联系。1954年6月,从美国回到南越,出任保大政府内阁总理。

苏发努冯(1909~1995年),老挝王族成员,生于王都琅勃拉邦。先后在河内和巴黎学习,为土木工程师。1945年参加抗日组织,10月任抗战政府国防和外交大臣,1956年1月任爱国战线党主席。在两届老挝联合政府中担任经济大臣、副首相兼经济计划大臣。1975~1991年任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主席和最高人民议会主席。他是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老挝人民党于1955年3月成立,1972年2月改名为老挝人民革命党。

党的领导人。12月，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保卫国家委员会”首领）集团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萨纳尼空政府，组成了松萨尼特—富米政府，进一步推行亲美政策。

1959年，美国迫使法国撤走军事训练小组，取得了老挝王国政府军的训练权。此后，美国军事顾问进入老挝，控制了老挝军队。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支持王宝将军组成一支“秘密军队”，参加老挝内战，使老挝局势日益恶化。

在日内瓦会议前夕，柬埔寨王国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于1953年11月9日宣布独立。日内瓦协议确认了柬埔寨的独立。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执行和平中立的政策，拒绝参加东南亚军事集团，并参加了亚非会议，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7年1月，柬埔寨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进一步确认它为一个中立国家。翌年7月，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柬埔寨奉行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遭到美国的敌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亲美右翼势力，多次发动政变，阴谋颠覆西哈努克政府，使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地位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的发展 为了实现日内瓦协议，和平统一祖国，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1955年后，越南南方人民掀起了群众政治运动。西贡、顺化等城市举行了有成百上千群众参加的集会、游行、罢工和罢市。但是，这些合法的斗争都遭到吴庭艳政权的血腥镇压。和平统一国家的道路被堵塞。南越人民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除了拿起武器奋起斗争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1959年1月，中部义平省蓬山县人民首先揭竿而起。翌年1月，南部槟榔省人民也发动武装斗争，摧毁敌人据点，组织人民武装。从此，南越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宗教教派和各民族的代表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驱逐美帝国主义，推翻吴庭艳独裁政权，建立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越南南方，进而和平统一国家的纲领。会议宣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1961年2月15日，南越各地人民武装合并组成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进入有统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61年，美国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这是由美国出钱出枪，在美国顾问指挥下进行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同年6月，美国政府制订了一个“斯特利—泰勒计划”，企图在18个月内“绥靖”越南南方。1962年2月，美国又在西贡设立“军援司令部”，并派遣了特种部队。到1964年7月，达到29,000人。按照“特种战争”战略，强化南越政权，大力武装南越军队，作为特种战争的工具。同时强制推行“战略村”国策，把农村居民赶进四面围着铁丝网、壕沟和碉堡的“战略村”，妄图切断游击队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这一时期，美国顾问和特种部队指挥几十万吴庭艳军队采用“重点清剿”、“油点扩散”、“分进合击”、“直升飞机空运”等战术，并使用凝固汽油弹、化学毒剂，进行大规模扫荡。

越南南方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敌人。许多“战略村”被人民武装摧毁，一些“战略村”变成人民的战斗村。1963年1月初，

西哈努克（1922~），生于金边，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之子，1941年继承王位。1955年3月主动放弃王位，让位给父亲。同年10月任王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

美萩省丐礼县北村军民以少胜多，三天内歼敌 1500 多名，击落击伤敌机 15 架，粉碎了敌人的“直升飞机空运”战术。同时，在作为特种战争的后方基地的城市中人民斗争高涨。工人、学生、市民和佛教徒走上街头，反对吴庭艳集团的独裁统治。南越政权统治动摇，内讧加深。1963 年 11 月 1 日，美国策划军事政变，吴庭艳被击毙，随后杨文明、阮庆等军人相继上台执政。到 1964 年初，美国“特种战争”战略宣告破产。同年 6 月，威廉·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任美国驻西贡的军援司令部司令。

约翰逊政府上台后采取战争升级步骤。1964 年 8 月初，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舰”为借口，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8 月 10 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扩大侵越战争。1965 年 3 月，美国地面部队在岷港登陆，直接参战。7 月，成立“美国驻越南陆军司令部”。从此，开始了以美军为主，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到 1969 年 4 月，美军人数达 54.55 万。南越军队扩大到近 100 万。韩国、澳、新西兰、泰、菲等国也卷入战争。

在胡志明“决战决胜”的号召下，越南北方军民开展反对空中破坏战争的全民运动，南方军民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几次旱季攻势。1968 年初发动“新春攻势”，向西贡、顺化、岷港等 64 个大中城市、省会及军事基地展开猛烈进攻，给予美国和南越政权沉重打击。同年 3 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5 月越美巴黎谈判开始。11 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至此，“局部战争”失败。

在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战争的同时，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老挝人民也于 1960 年掀起了反美爱国运动。驻扎在查尔平原的寮国战斗部队第二营突破敌人包围，回到根据地，重新开展游击战争。同年 5 月，苏发努冯等爱国战线党领导人越狱成功，回到了解放区。8 月，王国政府军第二伞兵营营长贡勒上尉因不满美国干涉老挝事务和政府滥用权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美的松萨尼特政府，成立了以富马为首相的新政府。美国支持右翼，发动内战。9 月，富米—文翁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于沙湾拿吉成立非法政府。12 月，富米叛军向万象发动进攻。老挝内战全面爆发。

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老挝中立力量联合，同美国支持的富米—文翁右翼集团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到 1961 年底，解放了 60% 的国土和近一半的人口，控制了查尔平原、九号公路地区等战略要地。在老挝爱国力量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美国 and 老挝右翼集团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老挝问题。

1961 年 5 月，在苏、英（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的建议下，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共 14 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关于老挝内战的停火问题和组织联合政府问题。翌年 7 月，会议再次举行，并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议定书，再次确认“尊重老挝王国的主权、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禁止外国军队进入老挝。在会议期间，老挝左中右三派高级代表苏发努冯、富马和文翁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谈，就组织临时民族团结政府达成了协议。1961 年 6 月，建立以富马为首相的第二次民族联合政府。苏发努冯和富米任政府副首相。

但是，美国再次破坏了协议的实施。1962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苗族游击队和南部山地人武装进行骚扰、破坏，并支持右派军队进攻解放区。1964 年 4 月，右派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民族团结政府被颠覆。5 月，美国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发动了对老挝的“特种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抗美战争。寮国战斗部队改组为老挝人民解放军，同美国特种部队和右派军队进行战斗。1965年3月，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号召人民奋起抗战。60年代末，老挝抗美战争不断发展，解放区逐步扩大。

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战争的胜利 1969年，尼克松政府为摆脱陷在印度支那战争泥淖中的困境，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提出战争“非美化”策略。在越南采取“越南化”策略，宣布从南越逐步撤出美国部队，重新采用“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手段。1月，美国被迫事实上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越美双方会谈扩大为包括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西贡阮文绍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谈。在谈判过程中，美国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讹诈等手段，时而停炸诱和，时而以炸迫和。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发动军事政变，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3月23日，西哈努克亲王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与柬埔寨共产党联合，开展反对亲美右派的武装斗争。4月，近十万美军和南越军队侵入柬埔寨。至此，侵略战火扩大到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三国。

为了联合抗美，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在1970年4月24~25日，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号召越、柬、老三国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5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从此，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战争连成一片，互相支援，开创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挫败了美国实行战争“越南化”、“高棉化”、“老挝化”的计划。

1973年1月27日，美越《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协定）签订。同年2月21日，老挝各爱国力量代表和万象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关于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即万象协定）。

巴黎协定签订后，美国军事力量从南越撤出，老挝成立了临时民族联合政府，柬埔寨右派政权十分孤立。印支三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1975年初，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战争进入决定性胜利的阶段。3月初，越南人民发动总进攻，连续开展了西原、顺化—岷港和西贡（胡志明市）三大战役，打垮了阮文绍集团，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越南南方全境解放。与此同时，柬埔寨人民武装也发动凌厉攻势，于4月27日解放金边。19日，柬埔寨全国解放。1976年1月，民主柬埔寨成立。从1975年初开始，老挝人民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在全国普遍建立各级人民委员会。12月1~2日在万象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至此，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第四节 苏伊士运河事件与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高潮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与第二次中东战争 1952年“七月革命”后，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共和国政府执行维护民族独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1954年10月，埃及与英国达成协议，废除了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国自协定签订之日起的20个月内撤出苏伊士运河区。纳赛尔政权还拒绝参加帝国主义在中东策划组织的军事集团，并参加了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支持亚非国家团结合作。这一切使埃及在中东和非洲的地位和影响空前增长。

埃及共和国建立后，与以色列矛盾日趋尖锐，边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1955年2月28日，以军向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带发动一次进攻，埃及遭到较大伤亡。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埃及政府多次向西方大国寻求军事援助。但英、法、美对埃及的外交政策不满，提出种种条件，进行刁难。1955年9月，埃及与苏、捷、波签订贸易协定，规定由苏联等国向埃及提供武器，而埃及以棉花和大米等交换。这引起了埃及与西方大国矛盾的加剧。

当纳赛尔宣布与苏、捷等达成军火交易协定后，美、英企图以“经援”为手段来抵制苏联在埃及影响的增长。早在1952年，埃及政府曾计划在尼罗河中游阿斯旺建造一个高坝。这座水坝如建成，将大大扩大埃及的灌溉面积和增加发电量。纳赛尔将它称为“新的金字塔”工程。但工程费用约需10亿美元。1955年12月，美、英表示愿在第一期工程捐赠埃及7000万美元，世界银行也允诺借款2亿美元。但美、英同时提出了财政监督的条件。埃及拒绝了这些条件。苏联便主动表示愿为高坝建设提供资金，包括给予长期贷款。1956年6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将同苏合作。7月19日，美国宣布撤回对埃及提供“援助”的声明。随之，英国和世界银行也收回它们对埃及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政府便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便利用运河收益来兴建水坝。苏伊士运河原是埃及人民用血汗建成的。这条长约175公里的运河流经埃及领土，位于亚非两洲的地峡上，从1859年动工到1869年凿成通航，整整花了十年，埃及负担了几乎全部建筑费用，12万埃及人民为此献出了生命。然而，运河权利却被英法控制下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占有。英法握有公司股票96%，绝大多数董事职位被英法占有，公司的总办事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都设在巴黎。1882年，英国出兵长期占领运河区，设立军事基地。运河的收入绝大多数也流进英法资本家的腰包，埃及从中所获少得可怜。1955年运河的利润为1亿美元，埃及分得300万，仅占3%。苏伊士运河号称“东方伟大的航道”，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极大的价值，是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赖以生存发展的一条“生命线”。

埃及人民梦寐以求的斗争目标就是要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所有。1956年6月12日，根据1954年英埃协定，最后一批英国占领军从运河区撤走，从而结束了英国殖民者占领埃及领土长达74年的历史。同年7月26日，在亚历山大港解放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纳赛尔庄严宣读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法令，规定“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一切财产、权利和义务将移交国家，现在负责管理这个公司的一切机构和领导委员会将予以解散”。运河航运将由埃及成立的机构管理。埃及政府这一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正义行动获得埃及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成千上万埃及人民涌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欢呼政府的这一决定，决心保卫自己获得的权利。

埃及的这一措施沉重打击了英法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中东的利益，遭到了它们的疯狂反对。英法为夺回运河控制权，冻结了埃及在英法的存款和运河公司的基金，命令英法商船通过运河时，不向埃及缴纳通行费，在经济上制裁埃及。同时，英法联合美国于8月2日发表声明，声称运河为“国际水道”，“始终具有国际性质”，否认埃及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权利，并企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把运河公司重新置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8月和9月，英、法、美等国在伦敦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并派遣由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埃塞俄比亚和瑞典五国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到达开罗，向埃及政府施加压力，要挟埃及接受国际管理运河的方案，但都遭到纳赛尔政府的坚决拒绝。英法便公开叫嚷要实行“强硬政策”，并开始调兵遣将，对埃及进行军事威胁。

运河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 and 英法之间的矛盾。美国一面担心埃及的行动影响它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和动摇它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因此，参加伦敦会议，坚持运河公司国际管理的主张；另一方面，它企图利用英法陷入困境的机会，排挤、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因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再表示不赞成英法使用武力，甚至声称，“美国政府不能反对国有化原则”，并允许美国船只向埃及缴纳运河通行费。

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英法于9月23日将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由于在安理会的讨论中双方分歧很大，联合国秘书长安排了英法与埃及三方的秘密会谈。英法表示原则上承认埃及对运河的主权，埃及则同意照顾使用国的利益。但是在10月13日的安理会上英法又提出了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的方案。英法的图谋在安理会上被否决后，便走上了与以色列秘密勾结、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

1956年10月29日，按照英法以预定的计划，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侵入西奈半岛。次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借口“隔离交战双方”，以“保证运河的通航安全和自由”，要求埃以双方在12小时内停火，并各自从运河后退10英里，让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的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在遭到埃及拒绝后，31日，英法联军对埃及的首都开罗和其他重要城市与港口发动海空袭击。

英法入侵后，纳赛尔果断地下令将埃及部队撤出西奈，集中保卫运河区，同时立即宣布与英法断交，封闭英法在埃及的银行，接管它们的石油企业，并发布总动员令，组织全国军民进行英勇的抗战。11月5日，英法集中八万多兵力从海、陆、空三面猛攻塞得港，当地军民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给入侵之敌以沉重打击。直到停火之时，英法侵略者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这座英雄的城市。

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获得阿拉伯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与英法断绝外交关系，切断英国石油公司的油管，炸毁油库，封锁领空和机场。许多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英法以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英法侵埃，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英法两国人民也掀起了强大的反战运动。11月4日，伦敦5万市民举行抗议集会，1万多示威群众冲向首相府，同警察冲突达数小时。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带头在联合国拆英法的墙脚。11月1日，杜勒斯在联大紧急大会上抛出了一个立即停火的提案。2日，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提案。苏联赫鲁晓夫政府也于11月5日向英法以发出通牒，声称苏联

“决心使用武力”恢复和平。

在埃及人民英勇抵抗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加上英法与美国的矛盾和美苏的压力，英法不得不于11月6日宣布停火。11月24日，联合国通过了亚非国家提出的要求英法以立即撤军的决议。同年12月3日，英法宣布从埃及撤军，22日全部撤走。以色列占领军也于1957年3月8日撤离西奈，退回到1949年的停战线。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正义斗争赢得了胜利。

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高涨与伊拉克革命的胜利 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中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首先表现为英法势力的急剧衰落。1957年初，埃及政府采取了维护民族主权的措施，废除了1954年英埃条约，粉碎了英法重返运河区的企图，并宣布所有外国在埃及的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公司须归埃及公民所有，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在埃及的经济势力。同时，约旦政府在人民反英斗争推动下，于1956年解除英国将军格拉布的阿拉伯军团司令、陆军总参谋长职务之后，于1957年3月，又宣布中止《英约同盟条约》，撤销英军基地。4月，英军被迫从约旦撤走。长期以来在中东称霸的英法殖民者的地位一落千丈。

趁英法在中东节节败退的时机，美国以新殖民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力图取代英法的地位。1957年1月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中东政策特别咨文中提出了对中东的扩张计划，主要内容是：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可借口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在中东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授权总统在两年内额外“自由支配”4亿美元，给予中东国家“经济援助”。这就是以“填补势力真空”为名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埃及、叙利亚、约旦、阿拉伯也门等国政府的拒绝。在一些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政府援助的中东国家，如黎巴嫩，掀起了抗议浪潮，并爆发了反对亲美政府的武装起义。

50年代后半期，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影响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伊拉克民族革命的胜利是突出的事件。1955年2月，费萨尔王朝统治的伊拉克加入了英美拼凑的巴格达条约组织。该组织总部就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1956年，伊拉克发生了示威游行，群众要求政府退出军事侵略集团。翌年4月，伊拉克政府又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并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的阴谋和武装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的活动。费萨尔王朝的反动政策加剧了国内的矛盾，激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导致民族革命的爆发。

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少将为首的自由军官集团在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发动了革命政变，一举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愤怒的群众打死了费萨尔二世、王储和首相赛义德。起义胜利后，以卡塞姆为首的共和国政府颁布了废除君主制、没收王室财产、整肃政府机关、大赦政治犯和进行土地改革等法令，并宣布奉行反帝的、独立的与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新政府停止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援助，并于1959年3月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

伊拉克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统治。由于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美英在中东所策划的军事侵略体系被打开一个缺口。巴格达条约组织失去伊拉克后，于1959年8月被迫改称“中央条约组织”，其中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参加。伊拉克革命后，阿拉伯独立运动进程加速。1961年科威特、1965年民主也门、1971年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相继宣布独立。

美苏在中东争夺的加剧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中东“六五战争”，是阿以矛盾和美苏在中东激烈争夺的产物。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以色列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美国关系更加密切。美国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援助。仅1967年3~5月，美国就给以色列400辆坦克、250架作战飞机，美国现役军人1000名作为志愿人员加入以色列空军。

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以埃及为重点，逐步深入中东。“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后，苏联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这博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1958年12月，苏联与埃及签订协定，同意援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进入60年代，苏联利用美国陷于印支战争的时机，大力向中东渗透。1964年苏向埃及提供经援和军援达5亿英镑，并派遣专家、顾问进入埃及军政部门。苏联还同叙利亚签订协定，向叙提供武器和派遣顾问，并取得了援助修建幼发拉底河水坝工程、扩建铁路和开发石油的权利。伊拉克革命胜利后，苏联与伊拉克签订军援协定，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964年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同年底，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发动了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苏联又通过提供经费、装备，派遣教官帮助训练等方式支持并插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活动。

为对付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发展，美国进一步武装以色列。美苏在中东争夺的加剧，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国际根源。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阿以之间仍处于紧张对峙状态。1966年埃及与叙利亚建立联合军事司令部，接着以色列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双方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同年，约旦加入埃叙联合军事司令部。

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1967年5月15日，纳赛尔总统发出全国动员令，派遣军队进驻西奈半岛。18日，他又命令部队接管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沿岸的阵地。23日埃及宣布封锁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禁止以色列船只和向以色列运送战略物资的外国船只通过。以色列立即宣布这是“对以色列的侵略”，声称要用武力打开亚喀巴湾。美国也抨击埃及的封锁行动是“非法的”。

当时，从阿以双方武装力量和军事装备来看，阿拉伯国家占据优势。但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轻信苏美的诺言，对以色列敢于冒险进攻估计不足。纳赛尔拒绝采纳下属先发制人的建议，公开声称埃及将“不会开第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1956年，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等一批巴勒斯坦人组成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随后筹建武装小分队“暴风”。1964年5月，巴勒斯坦各界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国民大会，制定《巴勒斯坦民族宪章》。6月，巴解正式成立。首任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从1969年起，阿拉法特一直担任巴解执行委员会主席。1974年10月第七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强调巴解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9月，被接纳为阿拉伯联盟正式成员。它已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参加该组织的有“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民阵”）、“闪电”、“人阵（总部）”、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巴解阵”）、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阵线（“阿解阵”）、巴勒斯坦共产党等。

据统计，“六五战争”前，埃、叙、约三国拥有军队32.8万人、坦克2338辆、地对空导弹160枚、作战飞机576架；以色列军队25万人、坦克1000辆、地对空导弹50枚、作战飞机286架。

一枪”。这使处于高度戒备的军队情绪松懈下来。而以色列却紧急动员，秘密集结兵力，策划了一场突然袭击的进攻战役。

1965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倾巢出动，首先对埃及，随后对约旦、叙利亚发动大规模“闪电式”的袭击。埃及等国由于防备松懈，损失惨重，第一天就被击毁飞机374架。许多飞机来不及起飞就被炸毁在停机坪上，机场成了一片废墟。以色列掌握了制空权后，发动了地面攻势。由于没有空军掩护，西奈战线的埃及军队伤亡很大。6月8日，加沙和西奈失守。约旦军队也被迫后撤。以军侵占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战争爆发后，安理会于6月6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双方“立即停火”的决议。7日和8日，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同意接受停火。以色列于9日也表示接受停火，同时集中兵力猛攻叙利亚，直到10日晚占领了戈兰高地的大片土地后才停止进攻。

“六五战争”前后仅打了六天。以色列侵占了六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近五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1967年11月，安理会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这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但以色列拒不执行。以色列的这一侵略扩张行动不仅遭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使它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第五节 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

非洲独立运动高涨 亚非会议的召开，1956年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和北非各国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鼓舞和推动了非洲各国，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广大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5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以加纳和几内亚两国的独立为序幕，迎来了非洲独立运动的高潮，一系列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迅速走向崩溃。

加纳原称黄金海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加纳是英属西非的一个重要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较早。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实施“宪政改革”，于1946年以当时英国驻黄金海岸总督的姓氏命名，颁布《伯恩斯宪法》，增加了立法议会中非官方代表的名额，但大权仍操于英国总督手中。1947年12月，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它要求英国“在最短时间内给予黄金海岸自治”。随着斗争的深入，该党内部因主张不同发生分裂。以克瓦米·恩克鲁玛（1909~1972年）为首的一派主张采用非暴力和合法斗争手段，为立即实行完全自治而斗争。1949年6月，恩克鲁玛组成人民大会党。1950年初，人民大会党通过发动要求自治的“积极行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1951年殖民当局不得不同意举行立法议会选举。人民大会党在选举中获胜，恩克鲁玛负责组织内部自治的责任政府。1954年加纳人民斗争继续发展，6月恩克鲁玛组成全部由非洲人担任部长的自治政府，但国防、外交等最重要权力机构仍控制在英国总督手中。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加纳出席了会议。万隆精神鼓舞了加纳人民要求完全独立的斗争。1955~1956年，加纳工人和人民群众反殖斗争空前发展。在1956年7月的大选中，人民大会党再次赢得议会的大多数席位。9月，英国被迫同意加纳取得自治领地位。1957年3月6日，加纳宣布在英联邦内独立，并将原来的国名黄金海岸改称加纳。

独立后，加纳政府为捍卫政治独立，肃清殖民主义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60年4月，加纳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建立共和国的宪法。同年7月1日，加纳正式取消自治领地位，宣布成为英联邦内的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恩克鲁玛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加纳的独立不仅促进了加纳社会的进步，而且推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

几内亚是法属西非的一个殖民地。它是撒哈拉以南法属殖民地国家中通过群众运动获得独立的最早国家。战后，几内亚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1946年几内亚工会联合会成立，并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同年10月，由几内亚工人领袖塞古·杜尔（1922~1984年）和象牙海岸的民族运动领袖乌弗埃-博瓦尼共同倡议，并联合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力量建立了“非洲民主联盟”。

这个组织提出了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纲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7年5月，几内亚民主党成立，塞古·杜尔任主席。他兼任几内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积极领导了工会运动为核心的群众性反殖斗争。1953年9~11月间，几内亚民主党发动了为期66天的全国总罢工，并在农村中开展保护农民利益和反对“酋长制”的斗争，民主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1957年3月，民主党在领地议会选举中获得全部60个议席中的56席。6月，杜尔出任半自治政府的副总理。

1958年，法国戴高乐政府颁布第五共和国宪法，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以取代“法兰西联邦”，规定凡加入共同体的海外领地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还规定海外领地可通过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独立或参加共同体。几内亚民主党利用有利的形势，决心争取完全独立的地位。在民主党的号召下，绝大多数几内亚人在1958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拒绝参加法兰西共同体。10月2日，几内亚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

在加纳和几内亚独立的鼓舞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法属非洲的独立运动迅猛发展。1960年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而载入史册。

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1960年12月，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的多数票通过了43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要求“迅速地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地统治”。翌年举行的第十六届联大又决定建立殖民地特别委员会，并采取措施，支援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事业。这给予非洲独立运动以巨大的推动。

1961~1968年，非洲又有15个国家相继独立。这样，整个60年代，非洲诞生了32个新独立国家，其面积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占四分之三。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巨变。战后非洲独立运动处于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阶段，其主要的斗争锋芒是指向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斗争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由于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独立运动的群众基础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外，一些国王、皇帝以及部落酋长和头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在反帝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战后非洲各种政治组织和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45年到50年代，非洲建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约有40个左右，到1961年增加到147个。这些政党和组织的建立，加强了非洲独立运动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推动了各国的独立斗争。

战后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手里。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级，虽然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也存在着深刻的民族矛盾，因此具有强烈的争取独立的要求。非洲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范畴，他们不仅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潮的影响。正是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成为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在独立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非洲国家独立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大多数国家是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迫使殖民主义者退却，经过谈判获得独立的，上述加纳和几内亚就是这样独立的。还有一些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才赢得独立的，阿尔及利

1960年独立的非洲国家有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达荷美（今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法属苏丹（今马里）、毛里塔尼亚、加蓬、法属刚果（今刚果人民共和国）、乍得、中非、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今马尔加什）、尼日利亚、比属刚果〔刚果（金），1971年改称扎伊尔〕和意属、英属索马里（今索马里）。

1961~1968年独立的非洲国家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亚（由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组成）、布隆迪、卢旺达、阿尔及利亚、乌干达、肯尼亚、尼亚萨兰（今马拉维）、赞比亚、冈比亚、贝专纳（今博茨瓦纳）、巴苏陀兰、斯威士兰、毛里求斯和赤道几内亚。

亚是以这种斗争方式获得独立的典型。从1954年11月起，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抗击着数十万法国殖民军的“围剿”、“扫荡”。到1957年底，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燃遍了全国。翌年9月，建立了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法国无法阻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戴高乐上台后，为摆脱困境，改变策略，主张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从1960年6月开始，阿法之间经过长达两年的反复谈判，终于在1962年3月签订了《埃维昂协议》，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行使自决权，承认阿尔及利亚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拥有完全、充分的主权。同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公民自决投票，99.33%的人投票赞成独立。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9月25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将近八年的武装斗争，阿尔及利亚终于结束了法国长达132年之久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对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0年代，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等国都爆发武装斗争，并经过长期的全国性的民族解放战争获得了独立。

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非洲独立国家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拥有占总数三分之一的席位，在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中约占一半。它们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泛非运动的新发展和非洲社会主义浪潮 以实现非洲大陆独立和统一为宗旨的泛非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斗争联系和相互支持的加强，并使战后非洲独立运动具有全洲性的规模。

由于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共同使命和共同要求，以及历史上非洲各国在文化上和种族上的密切联系，使非洲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有着团结起来实现全非独立和统一的强烈愿望。早在19世纪后期，反映这种思想要求的泛非主义开始萌生。20世纪初，泛非主义理论逐渐与散居美洲的黑人和非洲人民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并形成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即泛非主义运动（简称泛非运动）。

1900年泛非主义者在伦敦召开第一次泛非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黑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杜波伊斯(1868~1963年)的领导下，1919~1927年先后召开了四届泛非大会，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并引起了非洲人民的注意。二次大战后，泛非运动获得新的发展。1945年10月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了第五届泛非大会。这次大会的代表主要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大会通过了由恩克鲁玛起草的《告殖民地人民书》，并提出了“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口号。此后，泛非运动的重心转向非洲大陆，与非洲独立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全非独立和统一为目标的泛非主义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者斗争的思想武器，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推进，泛非主义思想在非洲大陆广泛传播。

1958年4月，在恩克鲁玛的积极倡导下，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同年12月，在阿克拉又召开了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讨论了非洲统一问题，号召非洲独立国家联合为若干区域性联邦或集团，以便最终建立“泛非联邦”或“非洲合众国”。1960年和1961年，又先后在突尼斯和埃及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这些活动为非洲的团结和建立区域性联合开辟了道路。1963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非洲国家首脑会议。31个非洲国家首脑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

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规定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加强非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保卫和巩固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非统组织设立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常设秘书处、调解与仲裁委员会和解放委员会。会议将非统组织宪章签订日——5月25日规定为“非洲解放日”。通过定期召开首脑会议以及其他活动，非统组织在捍卫非洲国家的独立、发展非洲国家的互助合作、坚持反帝反殖和不结盟，以及支援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到1992年为止，“非统组织”召开了28次首脑会议，成员国达到52个。在独立运动完成后，非洲国家将重点日益集中在促进地区稳定、加强经济合作和努力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方面。

在泛非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非洲社会主义也在非洲日益发展。在二次大战前，一些泛非主义者就认为在非洲建设新生活，一方面要保持和发展非洲的个性，另一方面要摆脱落后状态，必须实行全非洲的社会主义。战后，随着一系列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社会主义兴起和发展起来。50~60年代与独立运动进入高潮的同时，出现了非洲社会主义的浪潮，70~80年代又有一批非洲国家宣称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据统计，在五十余个非洲国家中，有近半数国家曾先后公开宣称奉行社会主义，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有埃及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加纳恩克鲁玛提出的“泛非社会主义”、坦桑尼亚尼雷尔提出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塞内加尔桑戈尔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刚果、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宣布的“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等等。非洲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内容不一，各具特点，没有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们的共同点是普遍强调非洲大陆的传统价值体系，把非洲传统社会理想化，认为社会主义早已深深扎根于非洲历史传统之中，企图恢复殖民入侵前古老非洲的社会结构。有些非洲社会主义者憎恶压迫、剥削的资本主义，但又反对应用马列主义，否认非洲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企图走第三条道路。一些宣称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非洲国家，在实践中仅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方法与手段，比较普遍地采用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措施。这种思潮虽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基本上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宗教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的区别。

非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泛非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在战后非洲独立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进入实践阶段的。它是一部分非洲独立国家进行改造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反映了非洲新兴国家振兴民族经济文化的愿望，具有民族主义的明显特征。同时，它又是非洲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结构以部族为基础、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带有明显的不成熟的印记。

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变国家的落后贫穷的面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但也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在实践中，非洲社会主义在不断调整和变革。80年代以后，非洲社会主义逐渐“降温”，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在以现实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实行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继续探索一条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六节 古巴革命的胜利与拉丁美洲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发展

古巴革命的胜利 位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古巴，从 20 世纪初开始，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1952 年，巴蒂斯塔军人独裁政权建立后，古巴进一步依附美国。以美资为主的外国资本控制了古巴蔗糖生产的 47%。美国还垄断了古巴的大部分工矿业和对外贸易，霸占了古巴 1/4 的耕地和 75% 的肥沃土地。美国垄断资本在 1952 ~ 1957 年期间从古巴攫取了 7.5 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美国不仅继续占领于 1902 年强行租用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并且掌握了古巴军队的训练与指挥权。

巴蒂斯塔对外追随美国，对内实行军事恐怖统治。他解散议会，废除 1940 年制定的较进步的宪法，取缔民主政党和进步组织，禁止罢工、集会。他执政的七年内，杀害了两万多名爱国者。这激起了古巴各阶层的反抗。

领导古巴革命的代表人物是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 ~ ）。他在大学时曾担任学生联合会主席，后加入古巴人民党。1953 年 7 月 26 日，卡斯特罗率领一百多名青年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首次起义。因力量悬殊，这次起义失败。卡斯特罗等被捕。1953 年 10 月 16 日，他在法庭上发表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辩护词。1955 年获释后，卡斯特罗建立“七二六运动”组织，提出恢复 1940 年宪法、建立民主制的纲领，继续斗争。

1956 年 11 月 25 日夜，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罗率领 82 名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的图斯潘港口出发，与海浪搏斗了七天七夜，于 12 月 2 日在奥连特省登陆，但立即遇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堵击。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卡斯特罗及格瓦拉等 15 人突出重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起义军在战斗中逐步壮大。1957 年 5 月取得乌贝罗战役的胜利。此后，起义军明确宣布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在根据地进行了土改。加入起义军的群众愈来愈多，特别是农民。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火种，点燃了古巴全国革命斗争的火焰。1957 年 3 月 13 日，以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的一批爱国者攻打总统府。他们组成“3 月 13 日革命指导委员会”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58 年 2 月，弗雷·乔蒙领导的一支远征军从努埃维达斯登陆，在埃斯坎布拉依山区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新战线。

1958 年年中，古巴革命形势飞速发展。4 月，起义军对巴蒂斯塔政权展开进攻。7 月，起义军代表同其他反巴蒂斯塔力量的代表在委内瑞拉签订《加拉加斯协议》，组成了反巴蒂斯塔的革命阵线。8 月，格瓦拉率领一支起义军纵队挺进拉斯维利亚省，打开了通往哈瓦那的道路。巴蒂斯塔被迫逃亡国外。1959 年 1 月 1 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建立革命临时政府。古巴革命取得胜利。

革命后，反巴蒂斯塔的各派别组成联合政府。卡斯特罗起初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59 年 2 月任政府总理。卡斯特罗政府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了改造，不断削弱敌对势力，并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时，美国承认了古巴临时政府。1959 年 4 月，卡斯特罗还应邀赴美进行私人访问。美国企图拉拢古巴新政府，但随着古巴革命深入，美国与古巴关系日益恶化。它不仅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而且断绝

了外交关系。 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入侵古巴，企图颠覆古巴新政权；但遭到古巴军民英勇反击，雇佣军全军覆没。这就是有名的“吉隆滩战役”。

与美国决裂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说，这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革命”。1961年7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与古巴人民社会党（即古巴共产党）和“3月13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改称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任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古巴政府开展了以土改和国有化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宣布废除大庄园制，取消封建剥削，禁止外国公司在古巴占有土地，将本国私人中小企业、银行全部收归国有，并没收了大批美资企业。同时颁布“城市改革法”，规定租房者以每月房租分期偿付房价，在5~20年内成为房屋所有者。卡斯特的上述政策与措施，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庄园主、资产阶级的势力。

在对外方面，古巴在拉美树起了反美的旗帜。1960年9月和1962年2月，在哈瓦那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哈瓦那宣言》，谴责美国对拉美的扩张，提出“拉丁美洲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拉丁美洲”的口号，号召古巴人民和拉美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同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卡斯特罗政府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接受苏联援助。与反美斗争日益加强同时，古巴同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70年代，古巴加入了“经互会”（1972年），并在1976年2月通过的《古巴共和国宪法》中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组成部分”。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 革命胜利后，古巴领导人为打破美国对古巴的孤立和封锁，加强了与拉美和第三世界的联系，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同时，鼓吹美洲大陆革命和“游击中心主义”，力图在拉美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推行古巴式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8~1967年）是游击中心主义的倡立者和积极推行者。他原籍阿根廷，1955年在墨西哥认识卡斯特罗后，加入古巴游击队，在反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斗争中卓有战功，获起义军最高军衔——少校。革命后他被授予“天生的古巴公民”的称号。他先后担任古巴政府的部长和党的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从1960年开始，格瓦拉总结古巴革命经验，撰写了《游击战》《游击战：一种手段》和《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等著作，提出了大陆主义和游击中心主义。按其设想是通过推行游击中心主义，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古巴，引起拉美大陆革命，这样世界革命就为期不远了。

“游击中心论”是格瓦拉主义的核心。所谓“游击中心”活动，就是在革命初期首先组织少数青年秘密进入丛林或山区，建立游击据点，开展游击战，形成一个“中央核心”。当队伍扩大到120~150人时，再衍生另一个中心。如此反复繁衍，队伍不断扩大，直到推翻反动政权。游击中心论不要革命政党的领导，宣扬游击队“是政治先锋队的核心”；否定发动群众的必要，宣扬一两个英雄人物领导一小批人包打天下；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鼓吹不断游动，声称“根据地就在战士的背包里”。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对拉美许多国家产生强烈影响。60年代在拉美先后出现过上百个游击中心组织，活动遍及20个国家。但由于没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脱离群众，均以失败告终。格瓦拉本人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就离

开古巴，1965年进入非洲扎伊尔，参加当地游击战争，失败后返回拉美。1966年11月又率领一小批人潜入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开展游击战，企图以此为中心，将革命扩大到整个南美。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围剿下遭到失败。1967年10月8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迅即遭杀害。以后，拉美地区农村游击中心运动开始转入低潮。1968年后城市游击中心又曾风靡一时，尤以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最为活跃，恐怖活动层出不穷，但没有持续多久。

60年代拉美的形势。中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在拉美的霸主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它在拉美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美国深感古巴是“榻旁之患”，肯尼迪政府企图扼杀古巴革命。1960年10月，美国宣布对古巴禁运。1961年1月美国与古巴断交。同年4月发生了前述“吉隆滩入侵事件”（美国称“猪湾事件”）。同时，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孤立和制裁的措施。

在美国的威胁步步升级的形势下，古巴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关系日益密切。1960年苏古复交，1962年双方签订《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苏联的武器和军事专家进入古巴。当美国情报机构发现苏联在古巴建有火箭—核武器发射场等军事设施时，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撤走进攻性武器，并派出舰艇封锁古巴和拦截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这场危机最后以苏联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而美国保证不进攻古巴而结束。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妥协。此后美苏之间围绕古巴问题的较量继续进行。

为了遏制苏联向拉美的发展和古巴革命的影响，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提出“争取进步联盟”的计划。同年8月，该联盟于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上宣布成立，并通过《埃斯特角宪章》。成员国除美国外，有19个拉美国家（将被开除出泛美体系的古巴关在门外）。“联盟”鼓吹促进拉美社会经济发展和代议制民主。为缓和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美国提出“十年发展计划”，承诺在此后的十年内提供拉美所需的200亿美元外来资金的大部分，以支持拉美国家在土改、城乡住房、文教卫生、私人企业和实行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计划。1963年11月，在巴西举行的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上，美国代表宣称，两年来美国已向拉美提供23亿美元。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这样，“联盟”便成为美国向拉美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60年代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中美洲国家的反美斗争和加勒比海地区一些殖民地的独立。

1964年，巴拿马人民为收复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斗争高涨。美国根据1903年与巴拿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长期控制运河区。条约规定，运河区16.1公里宽的地带让与美国“永久使用、占领与控制”。利用这个条约，美国在运河区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同时控制和干涉巴拿马共和国的内政与外交。战后，巴拿马人民为收回运河主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迫使美国取消了一些特权，提高了运河的租金。1963年美国被迫同意在运河区悬挂巴、美两国国旗。

但1964年1月9日，运河区的美国学校单独升起美国国旗，公然违背两国已达成的协议。这引起了巴拿马群众的义愤，并触发了一场强烈的反美风

暴。当天有三万多人涌入运河区，要求升起巴拿马国旗，美军开枪镇压，打死打伤三百多人。愤怒的群众袭击美国公司，焚烧美国新闻处。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连日不断。巴拿马政府宣布与美国断交。巴拿马人民的斗争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美国不得不同意与巴政府谈判。1977年，美国终于与巴拿马签订关于运河的新条约和《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营运的条约》，废除了1903年条约，取消了美国永久占领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规定到1999年年终巴拿马共和国完全控制运河区。

60年代，加勒比海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走向高潮。1962年2月，英属“西印度联邦”被迫解散。同年8月，牙买加、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独立。1966年圭亚那和巴巴多斯也相继独立。此后拉美海岛地区国家纷纷独立。到1983年诞生了13个新国家。

70年代以后独立的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有：巴哈马联邦、格林纳达、苏里南、多米尼加联邦、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纳丁斯、伯利兹、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

第十三章 亚太地区的崛起。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第一节 亚太地区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亚太地区的崛起 战后，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伴随着这一地区经济力量的上升，它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从广义上讲，亚太地区包括环太平洋地区，即除西太平洋地区外，还有北美洲、大洋洲和苏联远东地区（苏联解体后属俄罗斯）。狭义则指西太平洋地区。这里集中了目前世界上最富活力的一些国家与地区，诸如日本、中国及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与日俱增，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亚太地区的崛起，首先表现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高的。西太平洋诸国，包括战败的日本，在战后初期都是经济落后与贫困的国家。但从 60 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首先是日本，60 年代创造经济起飞的奇迹。1968 年，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1960～197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二位数（10.4%）。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在 20 年内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

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始于 60 年代，到 70 年代以更高速度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9% 左右，开始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行列。

除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国家联盟内的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从 70 年代初经济加速发展以来，也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亚太崛起的浪潮中，中国自 70 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增长空前迅速。1979～1987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9.3%，1988 年更高达 11.2%，其增长速度在 80 年代居亚太国家之首。拥有十一亿多人口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并使亚太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大为提高。

亚太地区的崛起，还表现为这一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发展，其内部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它在世界经济网络中的作用与地位显著加强。美国经济重心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转移，西欧对外经济联系向亚太地区伸展，中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循环，均促进了亚太地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以国际贸易为例，进入 80 年代，世界贸易的重心发生了变化。1979 年，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美国的贸易重点从西欧转向亚太地区，横跨太平洋的贸易流量第一次超过了大西洋。到 1984 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流量超过对欧贸易三百多亿美元。亚太日益成为美国的最大外贸市场。到 1986 年，亚太在美国外贸中的比重已上升到 36%，居第一位，而西欧则从 1970 年的 31.5% 下降到 25.7%。日本的对外贸易是以亚太为基本立足点的，80 年代末，日本出口的 60% 以上、进口的 55% 以上是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亚太国家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加拿大是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国家之一，近 20 年来，加拿大进出口总额在亚太地区居美日之后，列第三位。

从投资情况来看，流入亚太地区资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美、日是两个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投资国。但日本同亚太新兴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关系比美国更为密切，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分布于环太平洋地区，在亚洲则主要集中于“四小龙”和东盟。

伴随着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国际资本的流动日益频繁，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个地区涌现。以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为代表的西太平洋金融中心拥有雄厚的资金，成为国际银团贷款的重要基地。1970年后，新加坡创设亚洲美元市场，经营外汇兑换业务，它与香港一样作为世界第一流的金融中心崭露头角。东京是亚太地区较早的国际金融中心，1986年东京外汇市场正式开业。马尼拉、台北的金融业也日益发展。国际贸易联系的发展、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表明了亚太地区对外经济关系和内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并预示着亚太地区作为国际金融网络的一个部分正在兴起。

亚太地区科技的飞跃进步，使这一地区经济活力增长，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亚太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太平洋地区。由于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日本和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7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通过对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的尖端技术的开发与研制，把科技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进入8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实施“科技立国”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等亚太国家为发展经济，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重视高科技的开发和科技人才的培养。韩国提出“振兴科技”、“技术立国”的口号，计划将产业技术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并确定把电子、机械、生物工程、信息产业、原子能利用五个部门列为“国策战略产业”。新加坡从6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外国技术，70年代中期，其工业面临技术升级的新课题。1979年，新加坡提出开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口号，加快发展高精尖产业的步伐。新加坡政府将实现生产自动化、社会电脑化作为80~90年代的发展目标，要将新加坡建成亚洲最重要的电脑中心和最高级的软件中心。

当前，美国是世界科技中心，日本已经跻身于新技术革命的前列，韩国、中国、东盟国家正在努力追赶，亚太地区逐步形成不同层次构成的高科技群体。国际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术的竞争。亚太地区各国在科技领域内日益增长的优势，使它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亚太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国际贸易发达、高科技力量雄厚，使地区内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生气勃勃。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6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被称为“70年代的经济奇迹”。这四个国家与地区，均位于亚洲东部，且人少地小，又因韩国和新加坡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它们都属于儒家（龙文化）的文化圈，人们通常称它们为亚洲“四小龙”或亚洲“四小虎”。

亚洲“四小龙”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颇为相似：一是土地狭小，资源贫乏。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亚洲“四小龙”面积狭窄，人口不多，但密度很高。请参见下表：

亚洲“四小龙”的面积与人口统计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韩国	110000	4279.3 (1990年)
台湾	36000	2039 (1990年)
香港	1074	581.23 (1989年)
新加坡	626.4	269 (1989年)

韩国与台湾有一些矿产，新加坡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在十分狭窄的土地上，“四小龙”的人口分布却十分稠密。1960年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香港 2877 人，新加坡 2653 人，台湾 298 人，韩国 254 人。

亚洲“四小龙”的另一特点是，它们均属海岛型或半岛型国家或地区，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较多的港湾。面向海洋的地理条件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在战后初期，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都存在不少困难。经济基础薄弱，属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的国家或地区虽获得美国的大力援助，但经济状况变化不大。5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几十到几百美元。到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3美元。但是，从60年代起，“四小龙”经济迅速改观。1960~1990年的30年间，它们的经济发展异常迅速，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以上。其发展速度不仅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美国与欧洲共同体等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实力增强。1990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达到：韩国 2380 亿美元，台湾 1620 亿美元，香港 700 亿美元，新加坡 350 亿美元。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亚洲“四小龙”逐步改变了传统经济面貌，实现了工业化，国际上称它们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它们经济起飞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被誉为当代新的“经济明星”，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纷纷探讨它们经济成功的原因、经验和问题。

在“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属海岛与半海岛型经济，人口与面积较多，原为农业社会，它们由农业社会成功地迈入工业社会；香港和新加坡属于城市、港口型经济，它们的人口与面积均较少，但由传统的转口贸易实现了向以服务业为主轴的多元化经济过渡，工业建设也取得成功。亚洲“四小龙”成功的原因，除了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利用了面向海洋、拥有较长的海岸线与良好的海港等条件外，它们一直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亚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受过教育的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和一定的技术基础，这是促进其经济迅速提高的重要因素。

此外，很重要的是，它们选择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四小龙”中的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有各自不同形式的发展战略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只有香港例外，它是港英当局管辖下的一个开放的自由港。港英当局在经济上实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既无明显的发展战略，也无多少强烈的政府干预措施，其经济贸易主要靠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但是，对其战后经济发展进程进行考察，亦可发现它具有与新加坡等相似的发展轨迹。

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普遍推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这是早期的战略，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进口替代首先是实现消费品工业的进口替代，而后是资本货物与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为了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这一时期，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均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限制外来产品的

进口，以刺激国内或本地区内工业的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节省了外汇，扩大了就业，为工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60年代，亚洲“四小龙”先后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换。这一战略实施的阶段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的时间较长，约从6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末。正是在这20年间，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起飞，年均增长率达两位数（10%左右）。它们提出了“贸易立国”或“出口第一”的口号，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的措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贸易增长迅速，轻纺工业乃至重化工业也获得迅猛发展。这一时期香港经济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贸易、金融、运输、旅游业等方面均有进展，其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轻纺工业享誉国际市场。

进入80年代后，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重新组合与调整的时期。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速，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趋势增强；另一方面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80年代初，“四小龙”经济一度遭遇困难。深深卷入国际分工旋涡的“四小龙”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及时进行了经济调整与转型。其战略调整主要是：一、实行科技升级和工业结构高级化；二、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三、促进经济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学者认为这一阶段可称为国际化、自由化、科技化战略阶段。在这一阶段，“四小龙”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注意增强经济适应能力，大力发展科技，以促进工业结构的升级，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同时开放内部市场，实行进口市场化，以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采取“迂回拓销”战略，直接向美、欧投资设厂，同美欧厂商、公司签订合作生产协定，这使它们的外向型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冲破各种限制，继续高速增长。

在80年代上半叶，发展中国家经济处境困难时期，亚洲“四小龙”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有新加坡在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1986年后，“四小龙”的经济进一步获得异常迅速的增长。请见下表：

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

	1980 ~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韩国	7.2	11.8	12.0	12.1
新加坡	5.9	1.8	8.6	10.9
台湾	10.3	9.9	9.1	7.1
香港	5.1	8.7	12.1	8.0

资料来源：该国（地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

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四小龙”追随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发展科技，制订了奔向2000年的战略规划，力图早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下面，我们将重点叙述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 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

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 1953年朝鲜停战后，以李承晚为首的官僚政客继续控制韩国的政权。李承晚依靠自由党执政，打击在野党，压制民主。

对外，韩国与美国签订一系列条约与协定，建立了特殊关系。1953年8月，签订《韩美共同防御条约》；12月，签订《韩美经济协定》；接着又先后签订《军事经济援助协定》（1954年11月）、《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56年11月）等。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3~10月全部撤回国内，但美国军队仍然留在韩国。

根据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4月26日，苏、美、英、法、中及有关国家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首先讨论了朝鲜问题，朝鲜南北双方均有代表参加，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6月25日会议结束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朝鲜半岛形势仍然紧张。

1956年，李承晚再次当选总统。在李承晚当权时期，始终不重视发展经济。他执行“先统一，后建设”的方针，不停地叫喊“北伐”。韩国经济发展缓慢，到5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衰退。李承晚政权的独裁专制统治激起了群众的愤懑。1960年3月，李承晚为首的自由党通过操纵选举和打击反对党的手段，在竞选中再次获胜。李承晚和李起鹏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不公正的选举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示威。4月19日，在汉城等地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人民起义。4月26日，统治韩国12年（1948~1960年）的李承晚被迫宣布下野，流亡夏威夷，至1965年客死于该地。

李承晚下台后，国务总理许政组成过渡政府。同年7月，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组成了张勉为总理的政府。张勉吸取了李承晚政府的教训，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口号，并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民主党内部争权夺利，不到一年，三次改组内阁，张勉无力控制韩国政局混乱的局面。1961年3~4月，韩国人民斗争重新高涨。

1961年5月16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策划和支持下，担任韩国第二军副司令的朴正熙（1917~1979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张勉内阁，建立了军人政权。朴正熙统治初期，颁布“紧急戒严令”，解散国会、政党，自任“重建国家最高委员会”主席，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让尹谱善继续当总统。1962年3月，尹谱善辞去总统职务。年底，朴正熙宣称要“还政于民”，并组织“民主共和党”，参加选举。1963年12月，朴正熙当选总统。此后，他通过修改宪法、操纵选举等方式，连任五届总统。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在韩国执政达18年（1961~1979年）之久。

朴正熙上台时，韩国社会动荡，经济困难。196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3美元。朴正熙改变了李承晚的“先统一，后建设”的方针，采取了“先建设，后统一”的政策，为稳定自己的统治，把经济建设提到重要的地位。他起用一些经济专家，制订经济发展规划，与美日加强经济政治联系，建立紧密的“国际经济协力”关系。1965年《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及有关协定签订后，韩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加强。

在美日的大力援助下，从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朴正熙政权实行“外向型”开发战略，大量引进外资与外国技术，并提出“出口第一”的口号，建立出口加工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个以低工资为基础、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成效。70年代中期又转而逐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重

化工业，韩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1962~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9.3%，出口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40%，人均国民收入1979年增加到1614美元。

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种种弊端，韩国经济一度陷入困境，经济上的问题导致政治危机。在野党向政府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在知识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政府采取压制手段，在全国引起不满，反独裁的民主运动高涨起来。1979年10月16日在釜山爆发学生和市民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及马山。政府实施戒严，军队与示威群众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全国形势骤然紧张。同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总理崔圭夏出任代理总统，12月6日当选为总统。但仅仅六天之后，12月12日，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并发布“非常戒严令”，逮捕反对党人士和群众。1980年5月爆发光州人民起义。20万光州人民武装占领城市达九天之久。全斗焕动用军队进行镇压，造成三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就是韩国当代史上的光州事件。随后，全斗焕成立“保卫国家非常对策委员会”。8月，崔圭夏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全斗焕出任总统。1981年2月，全斗焕以民主正义党总裁身份当选为总统，从此韩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

全斗焕上台后，实行一系列经济调整，将经济运营机制由“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向“民间主导型”，并加速技术开发，以求经济的稳定增长。从1983年后，韩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1986~1988年间连续三年增长超过12%。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04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30美元，出口额达623.8亿美元。韩国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新的工业社会，被称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

但是，韩国经济也存在工业和农业发展、出口工业和内需工业发展不平衡，能源和资源不足，外债累累等问题。韩国军人集团执政，压制民主，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修改宪法问题斗争激烈。以新民党为中心的在野势力要求修改宪法，解散“选举人团”，直接选举总统，获得广泛支持。1987年6月，37个城市的80余万群众举行反独裁和要求修宪的示威。7月1日，全斗焕批准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建议。同年12月，按照新宪法，全民投票选出卢泰愚为新总统。1988年2月25日，卢泰愚正式就任。韩国进入第六共和国时期。

卢泰愚上台后，在民主势力的压力下，宣布光州事件为民主化运动，并免除民主人士金大中的“煽动暴乱罪”，为其恢复名誉。同时，开始追查全斗焕执政时期贪赃枉法、侵犯人权的行为，逮捕了全斗焕之弟全敬焕、前汉城市长廉普铉、前安全企划部长张世东等全氏家属与政府官员。全斗焕本人被迫发表认罪声明，并一度隐居山村。

卢泰愚执政时期韩国经济仍保持增长势头。到1992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945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至约6744美元（以当时物价水平为准）。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即第一共和国；1960年4月，李承晚下台，第一共和国终结。1960年7月，尹潽善出任总统，称第二共和国；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1962年3月尹潽善辞去总统职务，第二共和国结束。1963年朴正熙当选总统，成立第三共和国。1972年10月，朴正熙建立“维新体制”，继续担任总统，改称第四共和国，直至1979年全斗焕发动政变，夺取韩国实际统治权。1981年2月，全斗焕出任总统，韩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

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3.8%，1962年仅占14.4%；商品交易额已达1524亿美元，而1962年只有5亿美元。国内储蓄率从1962年的3.3%增至1992年的34.9%。韩国采用外向型发展战略，使出口成为增长动力，在经济上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卢泰愚执政之初，以他为首的执政党民主正义党未能在国会获得多数席位，反对党力量大。当时的反对党主要有金泳三组织的统一民主党、以前总理金钟泌为首的新民主共和党、以金大中为首的和平民主党。执政党的地位不稳。1990年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与统一民主党、新民主共和党等达成协议，联合组成民主自由党，执政党在国会中才形成相对多数。

1993年2月25日，金泳三当选为新的总统，开始了韩国32年来首次真正的文人执政时期。金泳三提出“新韩国论”，实行一系列新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大力开展廉政建设，精简政府和执政党机构；宣布“新经济政策”，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发挥民间企业作用，促进技术开放，以振兴经济。在金泳三执政时期，肃贪倡廉运动取得进展，韩国经济发展迅速。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达到10,076美元，经济规模名列世界第十一位，已接近发达国家。

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 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给朝鲜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西方有人扬言：“朝鲜过100年也重建不起来。”但朝鲜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战争废墟上，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从1954年起，开始实行恢复和发展战后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4~1956年），其基本任务是：使工农业生产赶上或超过战前水平，进一步巩固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改善和提高由于战争破坏而贫困的人民生活。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朝鲜人民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忱和创造精神，开展增产竞赛，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援助下，提前四个月超额完成了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工农业总产值均恢复并超过战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朝鲜进行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达到98%，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0.9%。至此，恢复时期结束。

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1957~1961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五年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朝鲜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的指导方针，来推进朝鲜的革命和建设。同时，要求在思想上树立主体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领域确立主体的工作，为此提出要坚持“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原则。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1958年6月，朝鲜劳动党发出“跨上千里马，向社会主义奔驰前进”的号召。从此，在朝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千里马运动”。这个运动是1959年初由平壤市西南降仙炼钢厂工人组成的“千里马作业班”发起的。后来推广到各个经济部门，形成了有数百万劳动群众参加的竞赛运动，全国涌现了许多荣获“千里马”称号的作业

朝鲜战争结束时（1953年），工业总产值仅为1949年的64%，粮食产量仅为1949年的88%。国民经济损失达4200亿元（朝鲜旧币）。

班和车间。

1960年2月，金日成通过对平安南道江西郡青山里生产合作社的“现场指导”，总结出“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并要求贯彻到各个部门，以改进党和国家及经济部门的工作态度与作风。这一年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1961年，朝鲜提出了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1961~1967年）。它的基本任务是“依靠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和文化革命，划时代地提高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大规模的中央工业和中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并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在七年计划期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在“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称为“大安工作体系”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工厂企业由党委集体领导，农业管理方面设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作为农业领导机构，以进一步加强国家对集体的领导和物质技术帮助。同时确立一元化的计划体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把从中央到地方和工厂企业的计划全部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七年计划经过调整，延长了三年，到1970年完成。同年11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五大宣布，朝鲜已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成为拥有现代工业和发达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70~80年代，朝鲜实施并完成了六年计划和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1984年）。40年来，朝鲜的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与1946年相比，1984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430倍，粮食产量增长4.3倍，国民收入增长64倍。从1975年起实行了普遍的11年义务教育，建立了包括260所大专院校、570多所中专的大学专科教育系统。全国有知识分子146万。1987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七年计划（1987~1993年）。

进入90年代，朝鲜进行了经济调整。1991年12月宣布建立罗津—先锋自由贸易区。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1992年10月颁布《外国投资法》《外国独资企业法》《合作法》。1993年后又相继公布《自由经济贸易区法》《外汇管理法》《外国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收法》《土地租赁法》《外资银行法》和《外国人出入自由经济贸易区规定》。

根据形势的变化，1993年12月，朝鲜劳动党召开六届二十一中中全会，决定调整经济增长速度，缩小经济规模，同时更加完善经济结构，转变对外经济关系。据此，全会决定将自1994年开始的三年期间作为“经济建设缓冲期”，强调在这一时期内要贯彻农业、轻工业和贸易三个第一主义的方针，同时抓好煤炭、电力和铁路运输等部门。

朝鲜虽未能实现“三七计划”所预计的工业生产总规模及电力、钢铁、化学纤维等部分重要指标，但据朝鲜劳动党六届二十一中中全会的公报，“三七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50%，年均增长率为5.6%，其中电力生产增长30%，煤炭生产增长40%，钢铁生产增长30%。伴随南北对话的发展，1988年起，北南双方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开展了贸易往来，1994年双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此外，朝鲜还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俄罗斯、日本、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的基本点是上级机关经常下到现场去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并在一切工作中使政治工作先行。

1994年7月8日，朝鲜劳动党领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因病逝世，其子金正日接班。以金正日为首的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继续领导朝鲜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而斗争。

朝鲜南北对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形成两个政权、两支军队长期对峙的局面。朝鲜战争停止后，50~60年代，朝鲜南北双方仍处于相互隔绝与对立的状态。

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改善和走向正常化，亚洲形势发生变化。1971年韩国新民党顾问金大中提出南北朝鲜实现“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统一”的主张，表达了群众的愿望，获得广泛的欢迎。此时，朴正熙对待南北统一问题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1971年8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提出北南会谈的建议，他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同包括南方的民主共和党（即以朴正熙为总裁的执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和个别人士进行接触”。8月12日，南方红十字会建议同北方就寻找离散家属问题举行会谈。从1971年9月至1972年8月，南北双方红十字会代表举行了预备性会议。1972年8月后转入正式会谈。在红十字会代表会谈过程中，双方开始了高级接触。1972年5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密访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第二副首相朴成哲回访汉城。金日成在接见李厚洛时，提出了统一祖国的三项原则——“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7月4日，共同发表《南北联合声明》。这一声明肯定了上述三项原则，并将它写入声明之中，确定为国家统一的基本纲领。随后，双方组成部长级的南北协商委员会，并架设专用直通电话，具体协商统一问题。

南北对话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与支持。1973年11月，第二十八届联大政治委员会邀请了朝鲜南北代表讨论朝鲜问题。联合国确认朝鲜《南北联合声明》关于和平统一的三项原则，解散了“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1975年11月，第三十届联大又通过决议，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为朝鲜南北对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朝鲜南北对话的进程是坎坷不平的。1972年11月至1973年6月，南北协商委员会虽举行了三次会议，但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73年底到1974年初，南北之间曾进行低一级接触，也未达成协议，后一度中断。

80年代，南北对话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2月，双方代表就接通南北直通专用电话、会晤地点、新闻报道等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0月，金日成提出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新方案，强调双方应互相承认和容纳对方的思想和社会制度，成立双方同等资格参加的民族统一政府，实行南北自治。这是北方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途径。全斗焕也表示要通过南北首脑互访等实现和平统一，并提出由双方代表组成“民族统一协议会”制定统一宪法草案，再以公民投票方式确定统一宪法，然后进行大选，建立统一的国会和政府。对外则主张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并提出“大国交叉承认”，即美、日承认北方，中、苏承认南方。北方认为南方人口是北方的两倍以上，用公民投票方式来统一不合适，并认为在实现南北统一前，应以一个整体出现，以防止分裂的长期化和合法化。

尽管存在上述分歧，1984年南北接触与对话仍有所进展。同年9月，南方暴雨成灾，北方提出向南方提供救灾物资，南方表示接受，这是南北第一次物资交流。从1984年11月起，一年之内，双方多次举行经济交谈，同意

组成南北经济合作共同委员会，并讨论了关于经济合作和商品交流的协议草案。1985年7月和9月，双方又在板门店举行了国会会谈预备性会议，讨论北方提出的有关签订互不侵犯联合宣言的建议和南方提出的有关制订统一宪法的事宜。同年9月20~23日，南北双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各率一支艺术和故乡访问团分别在平壤和汉城进行了访问、演出和亲属会见。这是朝鲜分裂后首次通过三八线的人员互访。

80年代后半期，朝鲜南北对话发生波折。1986年春，北方抗议韩美在三八线附近进行“协作精神—86”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其他原因，南北会谈一度中断。此后，北方曾提出举行北南高级政治军事会谈、共同主办1988年奥运会、双方分阶段裁军和美军撤出南方等建议；南方也提出恢复1986年中断的国会、红十字会和经济三方面的对话以及举行“南北当局最高负责人会谈”等建议。但由于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如裁军和共同主办奥运会的方法等问题上意见不同，南北对话受到影响。

1990年，南北对话有新的突破。9月、10月、12月，南北方总理在汉城和平壤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谈，议题为“消除北南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年10月在汉城举行“北南统一足球赛”，在平壤举行“泛民族统一音乐会”。1991年9月1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2月13日，南北双方总理第五次会谈取得重大成果，在汉城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这是一个带有广泛实质内容的协议，包括“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制度”，“不对对方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略对方”，“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意见分歧和纠纷问题”，把停战状态转变为巩固的和平状态，以及设立办事处和各种分科委员会，全面进行经济与开发、交通、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环保、新闻出版领域的合作交流，实现离散家族的往来与互访，等等。接着，双方于12月31日又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此后，双方成立了政治、军事、交流与合作三个分科委员会。美国和韩国政府宣布在南方的核武器已全部撤走，并暂停一年一度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2年1月30日在核安全保障措施协定上签了字，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1992年9月17日，在平壤举行南北双方第八轮总理会谈，进一步落实了有关相互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与合作的三项已确认的协议。南北对话的上述进展是经过四十多年对峙后向统一迈出的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双方在统一政策上的分歧以及南方对北方发展核武器的怀疑等问题，南北关系仍存在不少困难。

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建立和发展。新加坡经济的起飞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建立 1967年8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在曼谷举行外长会议,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了东盟。东盟六国地处亚洲东南部,北邻亚洲大陆和日本,扼太平洋和印度洋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位于热带的东盟国家,盛产橡胶、大米、木材、锡和石油,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其总面积约305万平方公里,比欧洲共同体面积约大一倍;总人口2.8亿,相当于欧洲共同体人口的总和。东盟成立20年来,由于它在各方面的成就和成员国关系的改善,特别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的贡献,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合作组织。

东盟的成立有一个探索的过程。6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基本上赢得独立,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和1961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举行,促进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1961年8月,东南亚联盟建立,它由马、菲、泰三国组成。1963年8月又有马、菲、印尼组织诞生。这两个组织可以视为东盟的前身。由于马、菲之间存在沙巴问题的领土争端,以及印尼苏加诺政府执行全面对抗马来西亚联邦的政策,它们在组织上陷于分裂、瘫痪,建树不多。

60年代后期,东南亚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各国经历二十余年的独立斗争和国内动乱,开始进入政治相对稳定和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另一方面,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军队,美国在印支战争中的失利,引起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震动。同时,国际上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出现,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就对东南亚国家的鼓舞很大。东南亚国家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加强相互合作,通过集体力量才是谋求东南亚的安全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1965年印尼“九三事件”后,苏哈托取代苏加诺执政,中止了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对抗。1966年菲、马关于沙巴的主权争端在泰国调解下达成一定谅解。东盟成立的条件成熟了。1967年8月8日,东南亚五国发表《曼谷宣言》,即《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东盟正式成立。宣言明确宣布,东盟的宗旨是“通过共同努力,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但东盟成立初期,内部关系还较紧张,联盟忙于调解内部纠纷,健全组织,区域合作尚处于起步状态,在国际上鲜为人知。

进入70年代,亚洲形势发生变化。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1963年9月16日,根据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与英国签订的协定,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联邦由原英联邦国家马来亚、英自治邦新加坡和英直辖殖民地沙撈越、沙巴合并组成。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印尼认为这是对印尼实行包围的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苏加诺宣布采取对抗政策,加强印尼防御和支持沙撈越、沙巴的反马来西亚政府的斗争。

1965年9月30日,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九三运动”,逮捕和处决了一些右翼高级将领,以防止颠覆苏加诺政府的军事政变。10月1日,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九三运动”参加者,同时镇压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1967年苏哈托取代苏加诺担任印尼总统。

位，尼克松总统宣布访华；苏联在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主张的同时，加强了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调整了对外政策。1971年11月在吉隆坡举行东盟外长特别会议，签署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宣言》，决心进行必要的努力，使东南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干涉的和平、自由、中立地区。为此，东盟国家于1972年拒绝了关于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要求，1973年又一致拒绝了苏联关于“亚安体系”的主张。1974~1975年，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改善，马、菲、泰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

70年代中期，东盟面临新的形势。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后，美国从印支撤退，苏联与越南的扩张加剧，加上“石油危机”引起了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为确保自身的安全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必须切实加强联盟国家间的合作。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举行了东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首脑会议，通过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协调一致宣言》。会议正式将政治合作列入联盟合作范围，就经济合作制定具体原则，同时加强了组织上的联系。除坚持定期召开外长会议，必要时举行首脑会议外，还决定增设经济、劳工、社会福利、教育和宣传等五个部长级会议，讨论和批准各自领域的计划。设在印尼雅加达的常设秘书处则负责经常协调联盟国家间和各机构间的关系。巴厘首脑会议是东盟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东盟进入切实加强政治协调和经济合作的新阶段。

1977年8月，东盟在吉隆坡召开第二次首脑会议，进一步强调东盟团结合作和协调联盟的对外关系。菲律宾宣布不对沙巴提出领土要求。会议批准了扩大区域经济合作的计划，加强了东盟同美、日、澳、新和欧洲共同体的对话与合作。此后，东盟内部的区域合作日益加强。在经济方面，东盟国家决定共同投资兴办五项大型工业企业，加强贸易合作，实行一些商品交换的优惠贸易安排，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合作措施。在安全合作方面，成员国之间签订了一些双边协定，开始举行双边与多边的联合军事演习。

1978年12月，越南大举入侵民主柬埔寨，陈兵柬泰边境；1980年6月又对泰国进行武装挑衅，侵犯东盟一个成员国的领土，威胁东盟的安全。此后，东盟国家频繁召开会议，协调彼此立场，采取共同的对策。东盟国家支持民柬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赞同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和基本原则。根据东盟的建议，1981年召开了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行民族自决。东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的国际影响日益提高。

东盟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新加坡经济的起飞 东盟国家独立后走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除了成员国之间相互合作不断加强以外，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是东盟国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东盟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67~1980年接近8%。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名列前茅，而且高出发达国家一倍以上。1980年东盟五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72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新加坡高达4218美元，马来西亚达到1763美元，菲律宾733美元，泰国708美元，最低的印尼也已达460美元。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论，新加坡已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其他国家也都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1984年加入东盟的文莱，人口少，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当年人均收入高达17,282美元。

东盟成立前，这些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用关税政

策限制进口，发展本国产品以取代进口货。同时大力建设劳动密集型工业，主要是可吸收大量劳动力的轻纺、成衣、食品等中小型轻工业。东盟成立后，从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东盟国家进入发展“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阶段。各国程度不同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同时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以出口带动经济”，并普遍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这一战略取得一定成功，工业在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对外贸易增长迅速。1980 年东盟五国进出口贸易额达 1300 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贸总额的 14%。

东盟多数国家原为“单一种植”类型的农业国家。独立后，农业进展较慢，土改收效甚微。但从 70 年代以来，采取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改变“单一种植”的模式。在保持大米、橡胶等传统产品生产优势的同时，发展油棕、玉米等新产品，一些缺粮国家重视粮食生产，粮食自给率提高。

东盟地区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成为发展中国家除石油输出国以外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引起世界的瞩目。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小、资源少的岛国。1959 年在英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1963 年成为马来西亚联邦内的一个州。1965 年 8 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建立了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在独立以前，新加坡利用处在国际航道上的优越地理条件，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商港和东南亚地区贸易的中心。1959 年以前，新加坡经济基本上是以转口贸易为中心，国民收入的 75% 来自转口贸易活动。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时，面临两方面的经济压力：一是邻近国家独立，实行对外直接贸易，新加坡的转口贸易衰落；二是国内工业落后，失业率高达 15%。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新加坡政府从改革单一的转口贸易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入手，鼓励发展工业，逐步走上工业化和建立多元经济结构的道路。

1959~1965 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加坡采取“替代进口”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颁布《新兴工业法》《工业扩充法》等法令，采用豁免一定时期所得税的方式，鼓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部门。这一时期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66~1970 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新加坡采取鼓励出口工业的经济政策。政府颁布《经济扩充奖励法》等法令，建立新加坡开发银行和裕廊出口加工区，大力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建设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

进入 70 年代后，新加坡工业化步伐加快。60 年代新加坡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8.7%，70 年代达到 9.4%。经过短短 20 年的努力，新加坡经济迅速崛起，从不发达国家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传统的经济结构已经改变。到 80 年代初，以石油提炼、电子电器、船舶修造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发展起来，新加坡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航运中心、炼油中心，以及亚洲的金融中心，并且出色地解决了居民住房和就业问题。到 1981 年底，71% 的居民住进

李光耀（1923~），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1946~1950 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中殿律师学院深造，曾参加英国工党。1950 年回国后担任律师。1954 年 11 月参与发起组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一直任该党秘书长。1959 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任总理。1965 年 8 月独立至 1990 年底一直担任内阁总理。1990 年 11 月吴作栋继任总理，李光耀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内阁资政。

了政府修建的设备齐全、价格低廉的公共住宅，人均住房面积为 15 平方米，居亚洲首位。

新加坡经济崛起与重视发展教育和智力投资密切相关。新加坡政府在设立经济发展局的前一年，建立成人教育局（1960 年），后又建立工艺教育局（1968 年）。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工艺技术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并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在普遍提高本国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同时，大力培养各部门的技术人才。在文化上，新加坡注意保持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鼓励向新加坡统一的民族文化演变。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与其他东盟国家一样，也存在一些困难与问题。它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国资本，它们的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经济结构还不合理，进出口贸易额所占比重过大，尤其是新加坡，由于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海外贸易，虽摆脱了单一转口贸易的困境，但仍是一个加工贸易国，必然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西方经济衰退，保护主义抬头，东盟国家对外贸易首先遭到冲击。1983～1984 年东盟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普遍下降。1985 年菲律宾下降了 5%，新加坡经济也下降 1.7%。由于国际收支状态的恶化，东盟国家外债负担加重，1984 年达 735 亿美元。菲律宾最为沉重，1984 年为 253.4 亿美元，一年的还本付息额即达 30 亿美元。经济形势恶化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局。从 1983 年后，菲律宾经济与政治危机交织，终于导致 1986 年 2 月马科斯政权的下台和科拉松·阿基诺新政府的建立。

为了克服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80 年代中期，东盟国家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总战略，实行一系列经济调整与改革。例如，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把竞争机制进一步引入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发挥私人经济的作用；放宽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制定对外国投资的特别优惠政策，并探索一条以出口导向为主结合进口替代的新路子，大力发展对本国资源的再加工，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从 1987 年到 1991 年的五年里，东盟国家经济走向了复苏和新的增长，平均增长率 7.1%。这是继 70 年代之后又一次高增长期。其中，泰国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10.5%，新加坡为 8.9%，马来西亚为 8.2%，印度尼西亚为 6.2%。菲律宾因政局动荡和海湾危机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年均经济增长率较低，约为 4.3%。90 年代大多数东盟国家走上稳定增长的轨道。泰、马、印尼三国被认为在进入 21 世纪时可能成为亚洲的新“小龙”。因而，在日益崛起的亚太地区，东盟仍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地区。

第四节 印度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

印度共和国的成立与尼赫鲁的内外政策 1947年印度宣告独立,但当时它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1948年6月前,英国国王任命的蒙巴顿将军仍担任印度自治领的总督,原殖民政府的各级官员、英国训练的印度文官以及英国将军指挥下的英属印度的军队基本保留下来。

1950年1月26日,印度颁布了宪法,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印度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联邦议院设上下两院,上院称联邦院,下院称人民院。总统为国家元首,由两院选举产生。行政机关是部长会议,总理为政府首脑。印度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总理由人民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印度政党林立,但从独立以来,基本上保持国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从1952年到1984年,印度经过八次大选,大体上维持了议会民主制,这在亚非国家中是罕见的现象。

印度独立初期(1947~1950年),国大党政府是由总理尼赫鲁和副总理巴特尔夫分享大权,形成所谓“双头政治”局面。1950年底巴特尔夫病逝以后,尼赫鲁掌握了一切大权,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从此真正开始了印度当代史上的尼赫鲁时期。

尼赫鲁执政初期,为巩固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派遣武装部队进入海德拉巴,镇压了特伦甘纳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同时宣布举行大选,诱使印度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议会活动,并且采取高价购买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手段,合并了552个土邦,统一了全国。1951~1956年,尼赫鲁政府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在大部分省邦颁布废除“中间人”地主制度和进行租佃改革的法令,实施了初步的土地改革。“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印度工农业有了一定发展,物价开始平稳,工人的工资恢复到1939年的水平。土改的结果,取消了中间人地主,减轻了地租率,佃农享有一定租期的保障。土改虽很不彻底,但有利于印度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50年代中期,尼赫鲁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着手全面推行其发展战略。19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归国后,又提出了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口号。翌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年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声称印度经济建设将以此为目标。尼赫鲁说他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并强调采用“民主”和“计划化”的方法达到社会主义。尼赫鲁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种空想的平等观,留学英国时接受了费边派渐进主义的影响,回印后投身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甘地主义信徒,访问苏联、中国后,又认为苏联通过经济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以及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很有借鉴之处。因而,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英国费边主义、印度甘地主义和苏—中发展模式的混合体,其目的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5年,尼赫鲁政府先后将印度帝国银行和人寿保险业收归国有。1956年后又先后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这使印度的工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并开始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6~1966年,印度的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36(1951年=100)上升到264.2,增长近一倍。除了国营企业外,私人垄断财团的工业企业也获得较迅速的发展。尼赫鲁在农业方面的发展战略是实行乡村发展计划和合作化,广泛建立合作社和村评议会,但是这一战略没有成功。1956~1966年十年间,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每隔两三年就出现一次减产,有

时甚至大幅度倒退。农业生产的落后拖了工业的后腿，造成经济危机，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尼赫鲁宣布奉行不结盟政策。独立初期，政权刚刚建立，印度的对外政策还受到原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不结盟政策未能充分体现。从 50 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明朗化，并在亚非世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尼赫鲁拒绝参加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1954 年 6 月与周恩来总理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 年发起并参加了亚非会议，1961 年又与铁托、纳赛尔等联合召开了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为亚非团结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印度政府于 1950 年 5 月从法国殖民者手中收回本地治里、开利开尔、亚南和马埃四个地区。1961 年 12 月又解放了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的果阿、达曼和第乌。但另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又继承英国的殖民衣钵，怀有地区扩张的野心。1949 年 6 月，印度派兵进驻锡金，1950 年 12 月迫使锡金签订不平等条约，使锡金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印度还干涉周围国家的内政、外交。1949 年 8 月，印度迫使不丹签订条约，规定不丹的对外关系要接受印度的“指导”。

1950 年 4 月印度与中国建交，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但印度政府又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进行干涉，1950 年多次照会中国政府对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惊慌与遗憾”。1959 年西藏地区反动农奴主发动叛乱，印度公开支持，后又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成立所谓“流亡政府”，同时挑起边界领土纠纷。中印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 1962 年 10 月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此后，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成为印度主要的军火供应者。

英·甘地执政时期的印度 1964 年 5 月，尼赫鲁逝世。内政部长夏斯特里继任总理。1966 年 1 月夏斯特里突然病故。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17~1984 年）接任总理。英·甘地宣称她将继续尼赫鲁的政策与方针，同时她提出了“清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等口号。由于农业落后，粮食短缺，1967 年春，在西孟加拉邦北部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农民起义，并迅速蔓延到各地农村，形成全国性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在 1967 年的大选中，国大党虽维持了在人民院的多数并在中央政府继续执政，但在一些邦议会中失去多数而退居反对党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英·甘地政府在用武力镇压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同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为克服粮食危机，实行以“绿色革命”为主的农业新战略，并采取更多地依赖市场经济、吸取外资和认真推广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等措施。从此，印度在经济上进入着重发展农业和较多依赖市场经济的时期。

推广高品种和改进农业技术的“绿色革命”在印度取得一定成效。1966 年印度还是一个仰赖美国小麦过活的粮食进口国，但到 70 年代末，粮食已可基本自给。1978~1979 年度，粮食产量达 1.3 亿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绿色革命”发展的地区，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西部农村成为商品粮基地，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英·甘地政府宣称继续不结盟政策，并继续参加不结盟运动。但在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和 1965 年第二次印巴战争后，印度与中、巴关系紧张，在外交方面更加倾向于苏联。突出的表现是 1971 年 8 月签订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

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这项为期 20 年的条约签订不久，印度便在苏联的支持下，插手东巴基斯坦要求自治和独立的运动。同年 11 月，它派兵占领了东巴的首府达卡。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失败。1971 年 12 月东巴基斯坦独立，建立孟加拉国。1973 年 4 月，印度以锡金发生内乱为由，派兵进驻锡金首都甘托克。1975 年印度议会通过将锡金变为印度一个邦的决议，正式兼并了锡金。

由于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70 年代初在印度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甘地夫人政权站稳了脚跟，同时，在国大党内连续击败了对手，在党的几次分裂中仍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不久国大党陷入四分五裂，甘地夫人的政权面临着新的危机。

1975 年北方邦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决英·甘地在 1971 年大选中动用政府官员和设备，构成舞弊行为，应取消其议员资格。反对派乘机发动倒阁风潮。英·甘地采用高压手段，宣布实行紧急法和新闻检查，逮捕反对派领袖。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实行紧急法令，引起了各阶层群众对英·甘地政府的不满，加上强制推行人工绝育的粗暴做法，使英·甘地失掉民心。1977 年 3 月的大选中，英·甘地的国大党惨败，终于被迫下台。人民党组成政府，德赛出任总理。

但是以德赛为首的人民党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执政后又提不出改善印度状况的新方针。1980 年 1 月的新的大选中，英·甘地东山再起，以占三分之二的多数击败对手，重新上台。

在甘地夫人重新执政时期（1980～1984 年），经济上实行调整和有限开放政策，制订了第六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农业和石油工业，加强对外贸易，放宽对外资和私营企业的限制，并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六五计划”的实施结果，印度经济有新的进展。年平均增长率为 5.2%，超过了过去 30 年 3.5%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特别是比较薄弱的石油开采有所增长。1983～1984 年度石油产量达 2600 万吨，满足了国内大部分的需求。农业形势较好，1983～1984 年度粮食总产量 1.52 亿吨，拥有了一定的储备粮。

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而且生殖率颇高的大国，国内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进入 80 年代，经济上仍面临许多困难。由于国际收支入不敷出，对外援外资的依赖日益加深；经济效益不高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加上人口增加过快等原因，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83～1984 年度，人均国民收入约合 190 美元，居于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1984 年底全印失业人口达 2300 多万，有 37%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和贫困加剧，两极分化日益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

印度是一个社会状况复杂多样的国家。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十分尖锐，高级种姓对贱民的迫害和贱民的反抗愈演愈烈。80 年代初，旁遮普锡克教徒要求成立卡利斯坦国的独立运动高涨。1982 年，锡克教派极端分子在阿姆利则的金庙内设立总部，并组织武装队伍。英·甘地政府于 1984 年宣布旁遮普为危险的骚乱地区，派军队攻占了金庙，打死了锡克教徒激进的精神领袖宾德兰瓦勒等一千多人，逮捕七千多人。这一事件加剧了印度政府与锡克教徒的矛盾。1984 年 10 月 31 日，英·甘地被三名锡克族卫兵行刺身亡就是这一矛盾激化的反映。

拉·甘地执政及其改革 英·甘地逝世后，其子拉吉夫·甘地被推举

为印度政府总理。同年 12 月，印度举行大选，国大党（英）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获人民院中的五分之四议席。拉·甘地作为执政党领袖正式接任总理。

拉·甘地（1944~1991 年），是英·甘地的长子，从小受到印度传统文化及宗教道德观念的教育，又曾在英国长期留学，就读于剑桥大学，并与意大利姑娘索尼娅结婚。1968 年入印航公司任驾驶员，后升机长。1980 年 6 月，其弟桑贾伊·甘地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开始从政。1981 年 6 月当选为人民党议员。12 月任青年国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83 年 2 月任国大党（英）总书记，成为英·甘地的重要助手。这为他接班作了准备。

拉·甘地作为尼赫鲁家族的第三代总理，在上台后原则上继承了其母亲的施政方针，同时，在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起用了主张改革的专家顾问，在经济政策方面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实施了一系列内外政策的改革。

英·甘地被刺死，印度国内发生动乱。拉·甘地上台后，为稳定局势，一再号召维护全国团结、统一，反对分裂与恐怖活动。他说，我们要报暗杀之仇，“只能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消除相互间的分歧中，维护国家统一，我们要这样纪念英迪拉”。他还努力促使议会通过了一个反对各党成员任意跳党的法案，这使印度的政局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定。

为促进现代化建设，拉·甘地在宣布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政策的同时，主张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向传统观念和信条“发起挑战”，甚至对前人制定的政策“实施手术”。他对经济发展方针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制定和实施了农轻重协调的发展战略；放宽对私营部门和外资的限制，向它们开放了炼铝、石油、电力、煤炭、计算机、旅馆等 30 个部门，垄断企业须经政府批准的 27 种工业有 22 种改为一般许可证，并把构成垄断企业的资产限额由 2 亿卢比提高到 10 亿卢比；整顿国营企业，强调提高其经济效益，扩大企业自主权，并对病态企业实行惩罚；采取措施增强市场功能，调整计划管理的地位；实行对外开放，促进科技进步。

拉·甘地在内外政策上也实行了一定的改革，他主张和平解决与旁遮普邦锡克族的矛盾，改善中央政府与地方各邦的关系。他比较重用年轻一代专家，并主张精简政府机构，实行廉政建设。对外，实行较前灵活的外交政策。拉·甘地继续支持和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支持建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改善与邻邦的关系。对苏美实行平衡的政策，并关心印中关系的发展。1988 年 12 月，拉·甘地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双方签订了科技、文化等协定，并专门成立了边界联合工作小组，以谋求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拉·甘地执政五年（1984 年 12 月~1989 年 12 月），印度实施了“七五计划”（1985~1990 年），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达 5%，工业为 8%。农业继续保持好的势头，1988~1989 年度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达 1.716 亿吨。科技有新的进步。印度拥有约 300 万科技人员，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南亚和印度洋上的一个军事强国。

但印度的发展受到内部各种矛盾的干扰，拉·甘地的改革也是很有限的。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内多次发生分裂，1969 年 11 月党内两派分裂为两个党：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国大党（英）和以德赛为首的国大党（组织派）。1978 年国大党（英）再次分裂为以英·甘地为首的一派，仍称国大党（英）和以尼兰·桑吉瓦·雷迪等人为首的另一派，称正统派国大党。

从 1987 年后，国大党内部矛盾突出，民族、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在向市场调节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经济混乱以及债务增长、赤字上升、通货膨胀等困难。拉·甘地政府威信下降，力量削弱。1989 年 11 月，在大选中国大党（英）失利，拉·甘地辞职。此后，全国阵线领袖维·普·辛格于 1990 年 1 月至 11 月组成少数派政府，人民党（社会派）领袖钱德拉·谢卡尔于 1990 年 11 月至 1991 年 3 月在国大党（英）支持下组成新的少数派政府。但都因在议会中控制不了多数，地位脆弱，执政不久，相继下台。以拉·甘地为首的国大党（英）在竞选活动中重获选民信任，准备在大选后组成新的国大党政府。但拉·甘地于 1991 年 5 月 21 日参加泰米尔纳德邦竞选活动时，不幸遇刺身亡。国大党元老纳拉西姆哈·拉奥接任党的主席。

第五节 南亚地区的形势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

南亚地区有八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总面积为 419 万平方公里，占亚洲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人口 8.7 亿（1980 年），占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它位于伊朗高原东侧，喜马拉雅山脉以南，俯视浩瀚的印度洋，地理上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常被称为“南亚次大陆”。

南亚扼亚洲、大洋洲通向非洲、欧洲的海上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二次大战前，英国称霸南亚，并以此为基地，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扩展。战后，英帝国衰落，南亚各国相继独立，但美苏的势力接踵而至。战后初期，英国在这一地区还保持传统势力，美国则通过援助和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等方式渗入南亚。50 年代，美国为建立一个遏制苏联的“防御体系”，推行“北层计划”，与英法一起在西南亚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在东南亚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企图形成对苏的新月形包围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巴基斯坦成为上述两个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印度则处于对苏包围圈之外，宣布实行不结盟政策。美国为拉拢印度，抑制新中国的影响，加强对它的经济援助，企图使它成为所谓亚洲的“民主橱窗”。苏联为对抗美国的战略计划，竭力接近印度。60 年代初，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苏联进一步扩大对印的援助，以此与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影响抗衡。

随着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70 年代初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以东作战略撤退，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失利，力量收缩。1975 年东南亚条约组织宣布分段解体，1977 年 6 月正式解散。1979 年，巴基斯坦退出“中央条约组织”。南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从 70 年代开始，苏联通过与印度签订《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进一步向南亚扩展，以实现其“南下战略”。1979 年，苏联通过援助越南侵略柬埔寨，特别是直接入侵阿富汗，加强了它在南亚次大陆及其东西两侧的地位。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加剧，大批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苏联的军事力量到达巴基斯坦的大门口，出现了把冲突扩大到南亚的危险，在南亚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针对苏联势力的增长，美国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1981 年里根上台后，决定五年内给巴基斯坦 32 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86 年 3 月，美国又宣布在 1987 年后的六年内将向巴基斯坦提供 40.2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把巴基斯坦视为在南亚对抗苏联的重要力量。

南亚各国在历史上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长期的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使南亚各国之间存在多种矛盾、隔阂和冲突。其中最主要的有印巴的对立，这导致印度在战后逐步“一分为三”，形成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印度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力占压倒优势。按 1979 年的统计数字，印度占该地区面积的 72%、人口的 77%、可耕地的 84%、国民生产总值的 79%、外贸的 64%。印度拥有 110 万军队，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无法与之相比。但是，印度与南亚诸邻国存在一些矛盾，如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归属问

题、印孟之间的恒河河水分享问题以及海上划界问题、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小块领土争端等问题。由于南亚各国经济结构、外贸商品构成大体相同，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例如印、斯、孟的茶叶，印、孟的黄麻及麻制品，印、巴的棉花和纺织品在出口贸易方面往往竞相压价出售。此外，各国为防止外国商品，尤其印度商品的倾销，一直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因此，地区内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受到限制，而主要是同地区外国家进行。直到 80 年代初以前，南亚地区合作进展迟缓，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区域合作组织的地区。

80 年代初以来，南亚国家关系不断改善，区域合作势头兴起。各国之间扩大了贸易和人员往来，加强了工业、交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合作。南亚各国取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还很落后，包括印、巴在内的南亚国家都属于贫穷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南亚仅占 2%，在世界粮食总产量中也只占 12%，但要养活世界 20% 的人口。南亚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未达到 500 美元。因而，迅速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改变穷困的面貌成为南亚各国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加强区域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南南合作”的发展，特别是近邻的东南亚地区东盟国家富有成效的合作，对南亚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南亚区域合作的进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 年 12 月，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1936～1981 年）同南亚各国初步协商后正式提出了《孟加拉国关于地区合作的倡议书》。这项倡议书说明了地区合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可以合作的领域，建议成立有关区域合作的组织机构。孟加拉国的倡议得到南亚诸国的重视。1981 年 4 月 21～23 日，印、巴、孟、斯、尼、马尔代夫和不丹七国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科伦坡聚会，研究地区合作问题。至此，南亚区域合作运动迈出了第一步。

1981～1983 年，南亚七国连续召开了五次外交秘书会议，就有关区域合作的原则、范围达成协议，并为外长会议起草文件，作了准备。1983 年 8 月至 1985 年 3 月，七国外长又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议，为召开各国首脑会议作准备。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各参与国反复磋商而又相互妥协的过程，到 1985 年底成立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5 年 12 月 7～8 日，七国首脑在达卡举行首次会议，一致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发表了《达卡宣言》，宣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式成立。宪章规定，联盟的性质是一个非政治性集团组织，主要目标是促进本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的积极协作和互助，并规定区域合作应该在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区域合作不应代替双边和多边合作，而应作为它们的补充；区域合作不应同成员国承担的双边和多边的义务相抵触，联盟各级机构将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作出决定，双边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不包括在讨论之内。宪章还规定，联盟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随时召开；由各国外长组成部长理事会，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由各国外交秘书组成常设委员会，并成立若干技术委员会。

南亚区域合作规模不大，联盟只是一个政经分离的松散组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南亚国家由分裂走向合作的开始。1990 年 11 月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举行的第五届南

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一致通过《马累宣言》，表达了南亚各国要求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宣言指出，南盟的目标是提高本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各成员国逐步实现自力更生，而各国之间只有通过相互理解，团结合作，建立友好的邻邦关系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第六节 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中东局势的发展

十月中东战争和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 1967年六五战争后，阿以矛盾更趋尖锐。同年举行的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作出了“采取共同的政治和外交行动来消除侵略痕迹，确保以色列侵略军撤出它在6月5日以后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的决定，并确定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的统一立场。

这次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高昂。苏联趁机向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前线国家扩展，以加强在中东与美国争夺的地位。美国则对另一些中东国家进行援助，以对抗苏联在中东的扩张和影响。在美苏激烈竞争下，中东局势更加紧张。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又不愿在中东公开对抗。它们在中东制造了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在军事上，阿以之间出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消耗战状态，既不能真打，又不能通过谈判真正解决问题。政治上，美苏之间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计划，大搞政治交易。阿拉伯国家要求收复失地，以色列以“安全边界”为理由不愿撤出六五战争占领的土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求重返家园，而超级大国只谈难民安置问题。这种僵持的局面有利于美苏争夺战略要地、石油资源和推销军火，试验新式武器，阿拉伯国家则深受其害。

“不战不和”的局面给埃及等国造成严重的困难。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萨达特（1918~1981年）继任埃及总统。他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军费开支庞大、苏伊士运河堵塞、西奈半岛油田被占的困境，决心打破这种局面。他提出1971年为埃及解放以色列占领区、恢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的“决定性一年”。为此，他在一年内四次访苏，要求苏联提供进攻性武器。同年5月，又与苏签订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但1972年5月苏美两国首脑会谈后，主张冻结中东现状，苏联拒绝向埃及提供新式武器。萨达特便下令结束苏联军事专家在埃及的使命，要求苏联顾问撤离，并接管了苏在埃及的军事设施与装备。1973年初，埃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了未来战争的共同战略。5月，埃及邀请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访问开罗。8月，萨达特访问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争取阿拉伯各国的支持，并商讨利用石油武器开展斗争的问题。9月，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聚会，确定了对以色列共同战斗的目标。埃及紧张备战，并联合叙、约等国，准备打一场收复失地的“有限战争”，以冲破“不战不和”的僵局。

在六五战争后，以色列在占领的西奈半岛上部署了九个旅的兵力，并用三年时间，花费3亿美元，沿河东岸构筑了一个全长170公里、纵深10公里的防御体系，并以当时的总参谋长的名字命名为“巴列夫防线”。以色列宣称这是一条“坚不可摧”、“不可逾越”的防线。它自恃兵力强大，不相信埃及军队能越过这条设防严密的防线。

埃及等国发动的十月战争是一场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战争。它选择了10月6日即伊斯兰教的斋戒日和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一天作为发动战争日期。按照犹太教的教规，在赎罪日，不得进食、喝水和抽烟，人人要虔诚祈祷，驻扎前沿的以军士兵也不例外。埃、叙司令部于这天下午2时下令全线进攻。200架埃及飞机飞过运河，向西奈纵深袭击，2000门大炮同时轰击河东以军阵地。以色列的情报失灵，还以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演习或局部进攻，没

有料到这是又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埃军一举突破了“巴列夫防线”，向西奈纵深前进。1973年10月13日控制了西奈半岛15~20公里宽的地区。在叙利亚战线，叙利亚军队与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的部队协同作战，向以色列军发动攻势，收复了戈兰高地部分失地。巴勒斯坦游击队则插入以色列后方作战，袭击以军营房和供应基地，伏击以军车队，配合正面战场的战斗。

在战争初期，埃、叙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而且在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以色列的战争，有19个国家与以断交。7个阿拉伯国家派出了数万人的武装部队参加作战，还向埃、叙提供了紧急财政援助。以色列陷于政治和军事严重不利的困境。开战后第四天，以总理果尔达·梅厄（1898~1978年）不得不向美国求援。

埃、叙原计划是打一场“有限战争”，在取得一定进展后，停止进攻，希望联合国或美苏出面调停，以便在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火。但以色列依靠美国源源不断的军火补充，利用埃、叙停止进攻的机会，进行反攻。10月14日，埃以双方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坦克战。16日，以军从美国间谍卫星侦察到埃及一、三军团的结合部有一个防卫薄弱的空隙，便派遣一支装甲部队从此处偷渡运河，进入西岸埃军后方。24日，包围了苏伊士城，切断了埃及第三军团的补给线，对埃及后方构成威胁。以色列又发动对叙利亚的反扑，不但重占了戈兰高地，还侵占了叙利亚的其他一部分土地。

在十月战争中，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根据战前的计划，以石油为武器，采用提价、减产、禁运、国有化、增加本国股份权等措施，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石油斗争，以配合埃、叙前线国家的战斗。10月16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伊拉克、阿联酋以及伊朗等海湾国家决定提高原油市场价格77%。翌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会议又决定：以9月份各成员国的产量为基础，每月递减5%；并依据各石油进口国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态度，将它们分为“友好”、“中立”和“不友好”三类国家，在石油供应上采取区别对待。10月下旬，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实行了全面石油禁运。

石油斗争震撼了世界，特别沉重地打击了一味偏袒以色列的美国。由于石油禁运，美国石油进口锐减，发生能源危机，不少工厂被迫停工，航空公司不得不减少班机航次，加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石油价格猛涨，冲击了美元的地位。美国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美国国会也通过法案，授权总统对所有石油产品实行全面配给。

石油斗争的开展不仅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政治上分化了西欧、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在十月战争中，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允许美国供应以色列军火的飞机飞越它们的领空，利用它们的运输设施。西欧共同体和日本还于11月相继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退，表示了不同于美国的看法。美国和以色列陷入孤立的境地。

10月22日，经过美苏的协商，安理会通过双方“立即就地停火”的388号决议。当天，埃及和以色列接受了决议。随后，24日叙利亚也同意停火。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

这次中东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但埃及和叙利亚主动发起进攻，打破了“不战不和”的局面，粉碎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民族精神。

阿拉伯国家发动的石油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保障民族经济权益的斗争。石油斗争大大加强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实力。1973~1981年，六个海湾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达到8791亿美元。

以色列在战争后期虽扭转了被动局势，但战争暴露了它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弱点。由于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和遭到前所未有的伤亡，战后以色列政府遭到国内舆论的谴责，“赎罪日战争”被称为“一场灾难”。1974年6月执政的梅厄政府被迫下台。1977年大选中，工党失败，利库德集团领袖贝京（1913~）上台组阁。贝京政府执行大以色列主义的扩张政策，中东局势更加动荡。

十月战争后中东局势的演变与埃及媾和 十月战争结束后，萨达特总统认识到继续坚持武力手段，不仅不能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而且难于从事经济建设，并会日益陷入依赖苏联的境地。萨达特认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具有比苏联更大的发言权，因此转而与美国接触，采取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阿以矛盾的方针。

美国在十月战争后充当阿以之间的“调解人”角色。基辛格频繁来往于中东各国之间进行“穿梭外交”。1974年2月，埃美恢复了在六五战争中断绝的外交关系。6月，尼克松访埃，与萨达特签署了《埃美关系和合作协定》。在美国斡旋下，1974~1975年，埃以之间达成两个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以色列撤出西奈部分土地，让出了占领的油田。1975年6月关闭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埃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取消了原定1975年勃列日涅夫对开罗的访问。1976年3月埃及议会通过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的法案。

1977年11月，萨达特采取了大胆的主动行动，访问了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直接对话。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撮合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谈判，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协议包括《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分别规定了解决埃以双边关系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进程”。1979年3月，经过谈判，埃、以、美在华盛顿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1980年2月24日，埃以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到1982年4月，以色列军队全部撤离西奈半岛。不过，以色列拒绝交还亚喀巴湾南端的塔巴地区。埃以双边媾和进程虽比较顺利，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却没有进展。以色列在1979年5月的埃、以、美三方谈判中坚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治只限于居民，不适用于领土，企图使对所占土地的统治永久化。1980年7月，以色列议会又通过吞并圣城耶路撒冷的基本法，规定它为“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

埃以单独媾和引起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强烈不满，以色列的上述违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协议的行动又使埃及萨达特政府陷于困境。围绕对待埃以和谈和戴维营协议问题，阿拉伯国家分裂为两派：叙利亚、利比亚等组成“阿拉伯拒绝阵线”，反对单独媾和，坚持武力解决的方针，认为用武力夺走的东西，只有用武力夺回来，被称为“拒绝派”；沙特阿拉伯等国虽不同意单独媾和，但不反对依靠阿拉伯团结的力量同以色列达

利库德集团即以色列全国自由同盟，1973年9月由加哈尔集团、自由中心、国家党、大以色列党和独立中心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合组成，贝京任主席。

成全面公正的政治解决。1981年8月，沙特提出“八点建议”的方案，主张以色列撤出1967年以来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拆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定居点，建立以耶路撒冷阿拉伯区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承认本地区一切国家和平相处的权利。这一方案反映了被称为“温和派”国家的观点，并获得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1982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斯方案》，就是在沙特方案基础上拟定的。

埃以缔结和约后，埃及遭到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制裁。阿拉伯国家联盟撤销了埃及的会员资格，17个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联盟总部也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开始策划暗杀萨达特的阴谋。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举行庆祝十月战争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萨达特遭枪击身亡。萨达特之死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错综复杂矛盾的反映。

黎巴嫩动乱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从70年代中期，特别是埃以媾和以后，以色列将注意力转向北面。黎巴嫩成为阿以冲突的新的“热点”，并成为中东各种矛盾汇集集中的地区。

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黎巴嫩是唯一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组成的国家。基督教分为天主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亚美尼亚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派系。伊斯兰教分为逊尼、什叶和德鲁兹三派。黎巴嫩的教派往往受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而一些政党又是在教派和家族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政党、教派、家族三结合的情况是当今世界颇为罕见的现象。黎巴嫩的教派、家族和政党有着自己管理的地区，并拥有武装力量。这使人口仅两百六十万、面积只有一万零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却有近百个政党、四十多支武装力量。

早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黎巴嫩已形成以教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原为伊斯兰教逊尼派掌权。法国委任统治时期（1920~1940年），基督教马龙派势力上升。1943年黎独立时，基督教人数占全国人口53%，穆斯林只占47%。在这一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国家权力分配的协议：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总理由逊尼派人士担任，议长由什叶派人士担任，政府各部部长按教派比例分配。军队总司令由马龙派人士担任，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派担任。60年代后，穆斯林人数超过基督教徒，占居民总数60%以上。随之，伊斯兰教派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权力的呼声日益提高。围绕着政治权力分配问题，黎巴嫩两大教派和各个政党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并形成联合阵线。1976年9月，基督教一些主要政党组成“黎巴嫩阵线”，而伊斯兰教派又分别组成“全国运动”（后改称“黎巴嫩民族民主阵线”）和“阿迈勒运动”（即“希望运动”）。黎内部的这三大势力宗教教派不同，政治主张各异，彼此利益的冲突，造成黎巴嫩内部局势动乱。

几次中东战争，尤其是1970年后，巴勒斯坦难民和巴解武装军事人员涌入黎巴嫩。由于各教派和政党对待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态度不同，使黎巴嫩的矛盾加剧。约60万巴勒斯坦难民迁居黎巴嫩，巴解组织在贝鲁特西区和黎南部设置难民营和军事基地，黎巴嫩的穆斯林派表示欢迎。巴解支持黎巴嫩穆斯林“全国运动”提出的改变黎政治体制的要求，并以黎南部为基地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基督教“黎巴嫩阵线”则坚决反对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在黎巴嫩的存在，要求将其驱逐出境，甚至不惜联合以色列，从背后打击巴解武装。这就形成了以基督教马龙派等和以色列为一方，以穆斯林和巴解组织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黎内部矛盾与阿以矛盾纠缠在一起。

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延续19个月。在内战期间，以色列扶植“南黎巴嫩军”，与基督教右翼民兵配合攻打巴解游击队。1976年，叙利亚军队则以“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的名义开进黎巴嫩，介入黎巴嫩内战。后又在黎东北部贝卡谷地建立导弹基地，长期驻扎，并同坚持要叙撤军的黎巴嫩基督教派武装不断发生冲突。这样，黎巴嫩的矛盾更加复杂。

黎巴嫩的动乱也反映了美苏之间的争夺。美国势力早已进入黎巴嫩，它支持当权的基督教马龙派；苏联则支持黎巴嫩的穆斯林左翼及巴解组织。70年代末，黎巴嫩的上述矛盾愈演愈烈。首都贝鲁特的东区与西区分别被基督教民兵和穆斯林及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占据，各自为政，形成武装割据。以色列以打击巴解游击队为由，于1978年后多次入侵黎巴嫩，企图消灭巴解游击队，赶走叙利亚军队，并建立一个亲以的黎巴嫩政权。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巴解组织派人刺伤其驻英大使为借口，大举侵入黎巴嫩，很快就占领黎巴嫩四分之一的领土，攻陷了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大部分基地，并与叙军交战，摧毁了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6月14日起，以军围攻巴解组织总部所在地贝鲁特西区。这场战争又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2年8月18日，黎巴嫩政府通过了里根特使哈比卜提出的“和平解决贝鲁特问题的方案”。巴解组织被迫接受这一方案，于8月21日至9月1日将12,000名巴解战士分15批撤离贝鲁特，分散到约旦、伊拉克等八个阿拉伯国家。叙军也撤离贝鲁特西区。负责监督撤军的多国部队（由美、意、法军队组成）于9月13日陆续撤出黎巴嫩后，以色列没有撤军，并于9月15日占领了贝鲁特西区。9月18日，以军与基督教民兵配合杀害了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2000名无辜平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贝鲁特大屠杀事件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以色列部队不得不于9月19日撤离贝鲁特西区。

以色列侵略黎巴嫩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削弱了巴解武装，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争使以色列伤亡2万多人，耗费军费50亿美元。占领黎巴嫩南部成为以色列经济的巨大负担。侵略战争加剧了国内矛盾，引起空前高涨的和平运动。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势力下降。1984年9月，利库德集团和工党组成联合政府。1985年1月以色列内阁通过分三个阶段从黎撤军计划。6月，大部分以军撤回边境线内，但仍在黎南部保持一个850平方公里的“安全区”。

第七节 伊朗的改革和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

巴列维的统治与“白色革命” 50年代初，伊朗国王巴列维在美国支持下，推翻了主张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政府，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巴列维为强化王权，加强了对国会的控制，直接任命首相和各部大臣，同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建立国家安全情报组织（萨瓦克）和王家情报组织，加强国家机器。对外，他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公开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万隆会议上拒绝中立，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正式宣布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1957年公开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1959年又与美国签订军事协定，双方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但在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后，伊朗国内政局一直不稳，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尖锐，特别是农村阶级对抗日益激化。5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抗租斗争不断发生。从1960年下半年起，农民斗争遍及马赞德兰、阿塞拜疆、吉兰等省。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抑制自下而上的红色革命，巴列维在国内开展了一场称为“白色革命”（也称为“国王和人民革命”）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改革是从1963年初正式开始的，它的中心是以土地改革为主的农业现代化，同时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

1963年1月26日，巴列维将“白色革命”计划提交全民投票表决，随后又陆续扩充内容，最后形成以下主要方面：一、实行土地改革；二、实行森林、牧场、水力资源国有化；三、出售国营企业股票，工人分享工厂利润；四、修改选举法，实行普选，给予妇女选举权；五、进行教育改革，建立农村“知识大军”，扫除文盲，对毕业后愿义务为国家工作一定年限的大中学生实行免费教育；六、实行行政改革，反对机关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七、制订城乡规划，在城乡实行社会保险；八、成立农村医疗队（“保健大军”）、技术推广队（“开发大军”），建立农村法庭（“公正之家”），以改善农村状况，缓和农村的社会矛盾。

土地改革从1962年开始，分阶段进行，主要内容是向地主、寺院赎买多余的土地，将王室的部分土地以现款一次付清或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户。据统计，土改使约4.6万户在外大地主占有的可耕地比例从50%降到20%，王室和国家占有的土地10%分给了农户，原属宗教界管理的私人教产也分给了农户。到1971年，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耕地，若按每户五口人计算，土改使960万农民获益，并使伊朗农业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

在1963~1972年期间，伊朗国王政府实施了第三、第四两个五年发展计划，依靠出口石油得到的大量资金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经济上取得较大进展。十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1.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翻了一番，从1962~1963年度的159美元增加到1971~1972年度的304美元。除石油工业获得空前大发展以外，纺织、食糖、水泥、制鞋、木材等传统工业和冶金、石化、机械等新兴工业也有明显进步。

70年代初，世界爆发能源危机。1973年十月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以石油为武器开展石油斗争。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伊朗政府收回石油资源主权和阿巴丹炼油厂的管理权，实现了国有化。由于石油价格猛涨，伊朗石油收入迅速增加。据统计，1972~1973年度，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为28亿美元，1974~1975年度上升到178亿美元。伊朗获得巨额的石油美元，

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这时，伊朗石油年产量达到约两亿吨，居中东首位，世界第四位，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富裕国家。

然而，巴列维国王被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冲昏了头脑，他一再修订经济发展计划，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强行加速度地推进工业建设，并宣称到本世纪末要把伊朗建成一个与工业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工业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很不彻底，土改虎头蛇尾，许多地主逃避了改革，仍占据供水充足的良田。按好、中、坏、休闲地四类划分地块，采取抽签方式分配虽然公平，但造成耕地更为分散，大部分自耕农所获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得不到贷款，不得不借高利贷，或无力经营，负债破产，流入城市。重工轻农的政策，使农业减产，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这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却发动控制物价和反牟取暴利的运动，把矛头对准城市商人、店主（巴扎）。以国王、王室为首的 2000 家豪富聚敛财富，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与反抗。巴列维依靠军警和秘密特务组织“萨瓦克”加强专制统治。1975 年，宣布取消一切政党，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和排斥反政府势力，这使他的统治日益孤立。

伊朗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什叶派居优势。1978 年什叶派为主的各类神职人员有 8.5 万名，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高层神职人员阿亚图拉，在信徒中享有巨大的权威。巴列维的土改触犯了宗教上层的利益，他采取的削弱教士影响与地位和巩固王权的措施（取消对教士的生活津贴，关闭一些宗教场所，用伊朗年历取代伊斯兰教历，输入西方文化，加速世俗化等等），引起了教士的反抗，并导致 1979 年的反国王的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上台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在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下进行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902~1989 年）是伊朗的著名宗教学者。60 年代为伊朗六位大阿亚图拉之一。1964 年，他因公开抵制“白色革命”，发动反国王政府运动被逐出国，流亡土耳其，后又到伊拉克。在流亡期间一直与国内保持联系，成为反对派中威望最高、势力最大的领袖。他撰写了一本题为《伊斯兰政府》的小册子，提出了伊斯兰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阐释了伊斯兰教与政治不可分离，认为实行政教分离就是埋葬伊斯兰教，而非神授的世俗政权都是不合法的。他分析了建立伊斯兰政权的必要性，并勾画了未来伊斯兰政府机构组织的蓝图。他主张首先加强宣传与动员，以形成一个由信徒大众组成的有组织的伊斯兰运动。霍梅尼关于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论和主张成为什叶派穆斯林起来反对国王压迫、进行伊斯兰革命的精神武器。

1977 年 12 月，霍梅尼向国内学生和信徒发出进行反对国王的“圣战”的号召。1978 年初，伊朗爆发了反国王政权的群众性运动。1 月 7 日至 9 日，数千名神学院学生在宗教圣城库姆举行抗议国王暴政的游行示威，遭到镇压，造成约 70 人死亡、400 人受伤的流血惨剧。库姆屠杀事件点燃了 1978~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火焰。1978 年 2 月，抗议运动席卷全国。9 月，爆发了持续好几周的总罢工，全国陷入严重瘫痪状态。12 月 10~11 日，首都德黑兰发生大规模示威，有成百万群众参加，包括来自农村的支持者。游行的组织者发表 17 点声明，要求结束君主制，接受霍梅尼为最高领导人，建立伊斯兰政府，恢复农业，保护宗教，让流放者回国等。12 月 18 日，为抗议军队

镇压，全国爆发总罢工，政府机构完全陷于瘫痪。国王被迫于12月30日任命“民族阵线”领导人之一巴赫蒂亚尔为首相，并于1979年1月13日组成以巴赫蒂亚尔为首的摄政委员会。巴赫蒂亚尔虽同意组阁，但要求解散议会和萨瓦克，由政府控制军队警察，国王立即出国度假，将来做一名立宪君主。但巴赫蒂亚尔本人却因与国王合作被民族阵线开除。

革命浪潮已不可阻挡。1978年底国王统治的基础走向崩溃，它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发生了动摇，一些士兵倒向革命阵营，王室成员、高级官员及军官纷纷向海外转移财产。巴列维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美国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一贯支持国王的態度。1979年1月，卡特总统派遣特使，一面在伊朗高级军官中活动，以稳住伊朗军队，同时与霍梅尼的代表会谈。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决定抛弃巴列维。

1979年1月16日，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巴列维携眷出走。国王离开的消息传开后，伊朗举国欢腾，人们高呼“国王滚蛋了！”“萨瓦克完蛋了！”2月1日，霍梅尼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德黑兰，并立即宣布“君主制时代已经结束”，下令组建“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并于2月5日指定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巴扎尔甘为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理。

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宣布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实行政教合一，伊斯兰教长大阿亚图拉（意为“真主的象征”）为至高无上的领袖，高居于议会和国家行政机构之上，他的教谕即是法律。霍梅尼作为最高宗教领袖掌握了一切大权。他在执政期间，坚持原教旨主义，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准则，对内全面推行伊斯兰化，要求恢复伊斯兰传统；对外奉行“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原则，执行反美防苏方针，鼓吹输出伊斯兰革命。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对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两伊战争和海湾局势的动荡 1980年9月爆发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是80年代中东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对中东，尤其是对海湾的局势发生巨大影响。

两伊矛盾由来已久，双方在边界、民族、宗教及海湾地区权益等等问题上存在着争端。过去曾因对阿拉伯河主权和边界领土的争执发生多次冲突。两伊的边界线长达1280公里。靠南的一段约105公里的阿拉伯河为两国的界河。河的两岸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集中了两国的重要石油基地和油港。这条河是伊拉克通往海湾的唯一出海口。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与波斯曾签订条约，规定阿拉伯河在伊朗的霍拉姆沙赫尔港附近按河道中心线划界，其余水域均以河东岸靠伊朗一侧的浅水线为界，该河主权属奥斯曼帝国。1921年伊拉克独立后，继承了奥斯曼帝国对该河的主权。两伊就河界问题多次谈判。1937年两伊签订边界条约，规定阿巴丹港附近一段约四英里长的河道也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扩大了伊朗的部分河界。1969年4月，伊朗宣布1937年条约无效。1971年双方发生武装冲突。1975年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的斡旋下，两伊签订了《关于国界和睦邻条约》，规定河界全部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伊朗同意停止支持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活动。两国矛盾有所缓和，但未真正解决。

海湾即波斯湾，阿拉伯人称阿拉伯湾。

在民族问题上，伊拉克国内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伊朗主要是波斯人。但伊朗境内有两百多万阿拉伯少数民族，聚居在与伊拉克交界的胡齐斯坦省。奥斯曼帝国时期，曾把这一地区划入伊拉克行省管辖，称“阿拉伯斯坦”。1925年伊朗在英国支持下占领了这个地区，伊拉克则一直支持该省阿拉伯人的自治运动。

在教派问题上，伊朗95%的居民为什叶派教徒，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虽占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却是一个由逊尼派掌权的国家。1964年，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被伊朗国王驱逐出境，曾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纳杰夫旅居14年，在伊拉克什叶派中颇有影响。1978年伊拉克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

1979年初，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政权被推翻，霍梅尼从巴黎回国执政。霍梅尼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公开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推翻伊拉克逊尼派政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两国关系更加恶化。

海湾地区的利益冲突也是两伊之间的重要争端。两伊都希望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双方还存在着岛屿归属等问题的争执。位于海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大、小通布岛及阿布穆萨岛原被英国占领。1971年英国撤离海湾后，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上述三岛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同年11月，伊朗出兵占领了三岛。阿拉伯国家反对。伊拉克主张收复三岛，提出不允许损害海湾的阿拉伯化。这一问题虽经联合国出面调停，但未解决。

1980年初两伊矛盾激化。伊拉克宣称要废除1975年边界协议，双方边境冲突逐步升级。9月17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正式宣布伊拉克对阿拉伯河拥有全部主权。22日，伊拉克出动10万军队发动进攻，两伊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伊拉克军队进入伊朗境内，占领伊朗约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81年9月以后，伊朗接连反攻，收复了绝大部分失地和霍拉姆沙赫尔市。1982年6月，伊拉克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将军队撤回边界线伊拉克一侧。7月以后，伊朗又多次在两伊边境地区发动攻势，并越过阿拉伯河进入伊拉克领土，逼近伊拉克重要港口城市——巴士拉。战争在两国边境地区反复进行。但由于双方实力不相上下，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为了打破地面战场的僵局，从1984年4月起，战争向海峡水域和城市区扩展，双方都希望破坏对方的经济，切断石油出口运输线，因此出现了“油轮战”和“袭城战”。

两伊战争爆发后，美、苏虽没有直接用军事手段插手战争，但却企图利用这场战争加紧对海湾地区的渗透。它们同时向双方下赌注，并通过各种途径向两伊输送军火，扩大自己的影响。

海湾阿拉伯六国担心伊朗取胜后输出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危及自己的安全，又害怕伊朗袭击油轮，封锁海湾石油通道。它们为“保持海湾的阿拉伯性质”，积极援助伊拉克，但又不愿公开与伊朗对抗，以免遭伊朗报复，因此还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除海湾六国外，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等十多个阿拉伯国家都支持伊拉克。但是，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则支持伊朗。两伊战争引起阿拉伯世界新的分化、改组，并给了以色列可乘之机。两伊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坐山观虎斗，并暗中供应伊朗武器，打击伊拉克，以转移世界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注意。

两伊战争爆发后，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一些国家和组织都呼吁双方停火，开展调解活动。1987年7月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 598 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火，把军队撤至国际边界，立即释放和遣返战俘，并敦促双方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寻求一项全面、公正、体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伊拉克宣布接受，表示要按决议的顺序全面解决。伊朗虽未拒绝决议，但提出停火与谴责侵略者相联系，撤军要与赔款挂钩。这样，两伊战争仍然持续不停。

1988 年，战局发生了不利于伊朗的变化。4 月，伊拉克军队在法奥半岛发动反攻，接着连续发动攻势，几乎收复了 1982 年 7 月以来被伊朗占领的全部领土。1988 年夏，两伊战争出现和平解决的转机。7 月 17 日，霍梅尼宣布伊朗接受安理会决议。18 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表示伊朗接受安理会 598 号决议。伊朗的这一决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8 月 28 日，两伊全线正式停火。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造成一百多万人的伤亡，双方付出了数千亿美元的代价。战争危及海湾国家的经贸活动和国际航运的安全。两伊战争对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世界形势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它引起了阿拉伯国家新的分裂和改组，并加剧了海湾局势的动荡。

两伊停火后，双方曾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下就撤军、遣返战俘、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未获解决。至 1990 年 8 月 15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萨达姆才宣布从伊朗领土上撤军，同时释放伊朗战俘，并表示愿意接受 1975 年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10 月 14 日两伊复交。

第十四章 南部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和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与纳米比亚的独立

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和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成立 南部非洲一般指位于南纬 5~30 度之间，即从马拉维、赞比亚到南非之间的地区。包括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纳米比亚和南非等国。这个地区是殖民主义在非洲统治的顽固堡垒和白人种族主义横行的地方。70 年代以来，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风暴冲击下，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堤坝土崩瓦解，这一地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南部非洲的不少国家处于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之下。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实行残暴的直接统治和野蛮的强迫劳役制。1951 年，葡萄牙将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非洲殖民地改称“海外省”，视为葡萄牙领土的一部分，派遣海外国家警察，加强军事控制；同时，宣布当地人与“文明人”享有平等权利，废除了强迫劳动，作了一些让步。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葡萄牙政府大力鼓励葡萄牙人向非洲殖民地移民，并在白人移民中建立准军事组织。大量白人的移入，加强了对非洲农民土地的掠夺，加剧了民族矛盾。

50 年代，葡属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建立，并提出独立的要求。60 年代初，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人民相继爆发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从 1961 年起，葡萄牙殖民者逐步调集了 16 万军队，共花费了 60 亿~70 亿美元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殖民战争，妄图扑灭非洲人民的反抗烈火。

但是，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火焰越烧越旺。1961 年 2 月，安哥拉首先爆发反抗殖民当局的武装斗争。领导安哥拉人民斗争的有三个组织：1956 年 12 月成立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1957 年 3 月成立的安哥拉人民联盟，1962 年改组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1966 年 3 月成立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70 年代初，这三个组织的武装力量发展到 15,000 人，活动遍及安哥拉北部、东部和首都罗安达以南的广大地区。1963 年 1 月，几内亚（比绍）爱国者也开始了反葡武装斗争。他们是 1956 年 9 月成立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领导的。其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 70 年代初已成长为一支拥有一万多人的队伍，并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和约二分之一的人口。1973 年 9 月，在解放区召开了全国人民议会，宣布成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紧接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之后，1964 年 9 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1962 年成立）发表《武装大起义宣言》，发动了民族解放战争。到 1974 年，莫桑比克爱国武装也发展到一万余人，并活跃在全国九个州的六个州。

70 年代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斗争烈火猛烈冲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制度。1974 年 4 月 25 日，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坚持殖民政策的卡埃塔诺反动政权被推翻。新政府面对非洲殖民统治岌岌可危的严重局势，改变政策，与各殖民地解放组织谈判，并被迫承认它们国家的独立。同年 8 月，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同葡萄牙达成协议，规定葡萄牙于 1974 年 9 月 10 日从法律上承认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独立，并从几内亚比绍撤出军队。同年 9 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与葡萄牙达成协议。翌年 6 月，莫桑比克正式宣布独立，

建立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1975年1月，葡萄牙与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联合签署了承认安哥拉独立的协议。11月10日，安哥拉宣布独立。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罗安达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同日，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在葡萄牙殖民势力撤退的同时，安哥拉三大解放组织之间却因内部分歧由分裂发展为内战。

与上述三国独立的同时，其他葡属非洲殖民地也纷纷独立。1975年5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取得独立。同年7月，佛得角宣告独立。至此，从15世纪开始历时500年之久的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完全崩溃。在葡属殖民地独立浪潮的推动下，1975年7月法属科摩罗群岛、1976年6月英属塞舌尔群岛宣布独立，法属索马里通过公民投票于1977年6月也宣布独立，成立吉布提共和国。

津巴布韦原为英国殖民地，旧名南罗得西亚。1953年英国把它与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合组为“中非联邦”。因当地人民的反对，1963年该联邦解体。1965年11月，以史密斯为首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片面宣布“独立”，并于1970年3月改国名为“罗得西亚共和国”。白人统治集团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压迫津巴布韦广大黑人群众。从60年代初开始，津巴布韦人民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66年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相继开展了武装斗争。1974年后，史密斯政权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一面加紧镇压，一面也表示愿与“民盟”、“人盟”进行会谈。1977年12月，史密斯政权与穆佐雷瓦为首的“统一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为主的温和派达成协议，成立“过渡政府”，谋求所谓“内部解决”。1979年5月，穆佐雷瓦出任“黑人多数”“政府总理”，并宣布将国名改为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共和国。由于国内外舆论，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反对，这一政府未获国际承认。

在“内部解决”计划破产后，英国于1979年9~12月在伦敦主持召开了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会议，12月21日签署协议。1980年2月，根据协议进行了议会选举。以罗伯特·穆加贝（1924~）为首的非洲民族联盟获胜，组成非洲黑人政党执政的新政府。同年4月18日，宣布独立，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津巴布韦人民终于推翻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实现了非洲人多数统治和民族独立的目标。这对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 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当地人称“阿扎尼亚”），扼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通过南非的好望角。南非拥有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除迄今未发现石油和铝土外，其地下几乎蕴藏着其他一切工业用矿物，黄金、白金、锑、铀、锰、铬、萤石等的蕴藏量均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这里原为班图语系各部族和布什曼人、霍屯督人居住的地区。1652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建立开普殖民地。1806年后，英国逐步取代荷兰，并占领整个南非。1910年英国将南非的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奥兰治四州合并为“南非联邦”自治领。1948年，代表荷裔白人利益的南非国民党上台执政，于1961年5月退出英联邦，改称“南非共和国”。

189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罗得斯建立的英国南非公司占据了津巴布韦，1895年将它命名为南罗得西亚。1923年英国政府接管，划为“自治领地”，并派总督统治。

南非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国家。据统计，3390 万多人（1986 年）的南非，非洲人约 2516 万，有色人（包括亚洲人）约 384 万。白种人仅 490 万余人，其中荷兰血统占 57%，英国血统占 39%。然而，掌握政权的白人统治集团奉行“白人至上主义”。战后长期执政的南非国民党以实行“种族隔离”为纲领，提出“白人南非”的口号，对内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对外进行殖民侵略、扩张，干涉邻国内政，使南非成为当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顽固堡垒。

从 1910 年以来，特别是 1948 年以来，南非当局为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种族歧视法令，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压迫南非黑人和其他有色人，建立了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

1948 年以后，南非国民党政权通过的重要法令有：《禁止（种族）通婚法》（1949 年）、《镇压共产主义法》（1950 年）、《种族隔离法》（1951 年）、《通行证法》（1952 年）、《班图人教育法》（1953 年）、《班图自治法》（1959 年）、《反破坏法》（1962 年）。此外，还有《土著工人契约法》《矿业和工厂工业法》等。《种族隔离法》把南非居民分为白种人、有色人、土著人等集团，分区隔离，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赶到分散贫瘠的“保留地”内，而占人口总数不过 17% 的白人却占有 87% 以上的肥沃土地。《通行证法》规定年满 16 岁以上的非白种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迁移证等多达 60 种证件。警察有权随意检查，如证件不全，即被监禁或罚款。

特别重要的是《班图自治法》。该项法令把非洲人按语言和文化的区别划分为八个部族自治单位，分别设立“立法议会”和“自治政府”，称为“班图斯坦”，后称“黑人家园”。南非当局企图将属于白人区的黑人逐渐赶到这些地区，以达到“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的目的。到 1976 年已建立十个“黑人家园”。这些“家园”由顺从的酋长管理，在南非当局监督下先“自治”，而后过渡到“独立”。从 1976 年 10 月至 1981 年 12 月，南非当局拼凑了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共四个“黑人国家”。但这些“独立”国家不过是南非当局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工具。

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统治早就遭到南非人民的反抗。1912 年，南非民族主义组织——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后改名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开始它是酋长、知识分子等上层非洲人为核心的运动，主张团结非洲土著人，反对种族歧视，希望在议会和公共机构中有非洲人的代表，其斗争方式也是温和的。二次大战期间，随着南非工业的发展，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造成黑人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城镇黑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40 年代南非民族运动步入一个新时期。1944 年建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提出了“民族自主”的斗争目标，给南非人民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次大战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纲领和斗争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1949 年它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首次提出反对白人统治和民族自决的要求，并决定采取积极抵制、罢工、不服从、不合作，以及全国罢工一天的方式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政策。50 年代，南非人民的斗争高涨，具有了新的规模。

从 1910 年以来，南非当局先后颁布一系列种族歧视法令，其中 1910~1948 年 49 项，1948~1960 年 53 项，1960 年后 100 多项。

1950年5月1日，非洲工人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6月26日，爆发了全国大罢工，各地举行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游行。这一天被定为“南非自由日”，每年的这一天都组织了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重大活动。1952年6月，非国大和印度人大会联合发动蔑视不公正法令的运动，举行了大规模的“不服从运动”，抵制种族主义的法令。

1955年6月，非国大等五个组织举行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提出“南非属于居住在南非的人民，不分黑人白人，任何政府若不建立在全体人民的意志之上，都不得要求掌权”，要求由人民管理国家，各民族平等，一切南非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反对种族歧视。

60年代，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种族主义斗争发生新的转折，并逐步转向暴力斗争。1960年3月21日，几万非洲人在沙佩维尔举行集会和示威，当场焚烧了通行证，遭到警察镇压，死67人，伤180人，2万余人被捕，造成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28日，南非全境举行“哀悼日”，约50万南非工人举行总罢工。南非当局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为“非法”。1961年5月，全国主要城市90%以上的居民参加罢工、罢课和罢市，抗议所谓“南非共和国”的成立。同年12月，“民族之矛”和“波戈”武装组织开始武装反抗。60年代末，与武装斗争继续开展的同时，由南非大学生组织兴起的黑人觉醒运动把更多的有色人和亚洲人团结在反种族主义和解放黑人的旗帜之下。

70年代，南部非洲一系列国家独立，特别是1980年津巴布韦共和国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南非人民的斗争。1982年8月和10月，南非人民掀起声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行、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的运动。同时人民武装斗争与城镇居民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猛烈地冲击着南非的反动统治。南非当局为稳住统治，于1983年颁布“新宪法”，规定在白人议会外，再分别成立有色人、亚洲人的议会，即所谓“三院制议会”，企图拉拢有色人和亚洲人，孤立非洲人。南非当局的这一阴谋引起了各族人民的抗议浪潮。在反对“新宪法”的斗争中，涌现出几个新的反种族主义组织——“联合民主阵线”、“全国论坛”等，涌现了一批反种族主义的著名领袖，如图图主教（1931~）。南非人民为津巴布韦人民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胜利所鼓舞，明确提出了“打倒南非共和国”，“为一个人民共和国而战斗”的口号。

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不结盟运动、非统组织和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1982年被联合国宣布为“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和争取纳米比亚独立年”。南非当局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但它在少数西方大国纵容和支持下，仍顽固坚持反动的种族主义政策，并继续霸占纳米比亚。

1984年9月，南非颁布“新宪法”，规定总统和议会行使最高立法权，总统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新宪法”并未触动种族隔离的实质，继续剥夺广大黑人的政治权利。南非当局虽声称要进行“改革”，并于1985年4月宣布废除《禁止(种族)通婚法》和《不道德法修正案》第十六条，1986

纳尔逊·曼德拉（1918~），南非大学毕业，1951年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主席，1961年被任命为该组织军事总司令。1962年8月5日被捕，监禁了27年，至1990年2月11日才获释。在狱中，他坚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和建立平等、自由的新南非的主张，深受南非黑人和非洲人民的爱戴。非洲统一组织决定2月11日为“曼德拉日”。

年4月又宣布取消《通行证法》，但博塔为首的南非政府拒绝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继续镇压南非黑人的反抗斗争。

1986年6月，南非总统博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4日，博塔签署治安和公共安全两项修正案，强化紧急状态。1987年6月和1988年又连续两次宣布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一年。

在国内外反对种族主义斗争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南非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国民党内是否和如何废除种族隔离制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坚决反对“改革”的右翼分子和主张更大“改革”的左翼成员退党。1989年初，博塔因病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教育部长弗·威廉·德克勒克（1936~）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在9月上旬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国民党遭到它自1948年执政以来的最惨重的失败，但仍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9月14日，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

德克勒克虽主张维护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利益，坚持种族隔离的基本法律和制度，但表示要加快“改革”进程，并就各种族“分享权力”问题同黑人领袖谈判，以逐步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一个“全新的南非”。1990年，南非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2月2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禁令。2月11日，黑人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获释，3月2日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5月2~4日，南非当局与非国大代表首次进行平等对话，并达成了包括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内的五点协议。8月初，双方又举行第二轮谈判，南非政府同意取消持续四年的紧急状态，分阶段释放非国大政治犯，允许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人员归国，继续审议安全法以保证政治活动自由等。非国大则宣布中止武装斗争。这一协议表明，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取得重大进展。1991年2~6月，南非议会陆续废除了80多项种族主义立法，并删除了140项立法中的种族主义内容，主要有“人口登记法”、“土著土地法”、“集团住区法”和“黑人社会发展法”等。这些法令的取消是废除种族隔离制的重要一步，南非人民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并未结束。

1991年7月非国大成功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主席的新的中央执委会。非国大成员发展到70万人。非国大的目标是废除种族主义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统一的南非社会，主张坚持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德克勒克为首的南非政府虽主张通过谈判，给予黑人一定权利，但坚持保障白人的广泛权利、以种族集团为基础分享权力的原则，双方对实质性问题仍有重大分歧。白人极右势力则反对与黑人进行对话，反对党南非保守党势力仍十分活跃，企图通过选举把德克勒克为首的现政府赶下台。南非警察对于游行示威的黑人群体继续进行武力镇压，南非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已，政治局势仍相当混乱。虽然通向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南非的道路是曲折的、艰难的，然而，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纳米比亚独立 纳米比亚原名西南非洲。1890年沦为德国殖民地，称“德属西南非洲”。一次大战爆发后，英国指令南非出兵占领了它。1920年国际联盟授予南非联邦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将西南非洲交南非托管。但是，南非当局却企图吞并这块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的地区。1949年4月，南非议会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非法吞并了纳米比亚，并设立行政长官，驻扎军队，建立基地，实行殖民统治，同时将南非实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的政策、法令搬到纳米比亚，剥夺当

地非洲人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

南非当局违反联合国关于国际托管的规定、悍然吞并纳米比亚的行径，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布南非这一行动为非法。此后十余年里，联合国多次通过决议，要求南非将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但一直被拒绝。1966年，联大通过决议，宣布取消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1968年又通过决议，根据“西南非洲人民的愿望”，将西南非洲改名为“纳米比亚”。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非洲民族独立浪潮的推动下，1960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建立。从1966年8月开始，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纳米比亚开始了反对南非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受到国际上的注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公认为纳米比亚的唯一合法代表。1973年，联大决定将纳米比亚开始武装斗争的日子——8月26日定为“纳米比亚日”。

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了巨大努力。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决议，谴责南非当局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在纳推行种族歧视。1977年，美、英、法、联邦德国和加拿大五国组成接触小组，谋求谈判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该小组于1978年4月向安理会提交一项方案。8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五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9月29日，安理会批准了秘书长的计划，通过《关于成立过渡时期援助团协助纳米比亚特别代表》的决议，即435号决议。决议要求终止南非统治，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公民投票，成立制宪议会，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但南非当局制造种种借口，拖延执行安理会决议，并扶植亲南非的“特恩哈尔民主联盟”势力，推行所谓“内部解决方案”，企图通过由它控制的选举，建立傀儡政权。

80年代初，美苏加紧了在南部非洲的争夺，纳米比亚问题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问题。1981年初，针对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存在，美国与南非提出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相联系方案，即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双撤军”方案。1983年5月，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并通过532号决议，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同有关各方协商，以确保迅速实施435号决议。8月，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出访南非、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未获任何结果。

1984年5月和7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等有关方面就纳米比亚独立和停火问题两次举行会谈。同年11月，安哥拉又提出自南非实施联合国435号决议时起，古巴军队开始逐步从安哥拉撤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均遭南非拒绝，未能达成协议。南非当局还以追击纳米比亚人民武装为名，对安哥拉等邻国发动武装入侵。1985年6月，南非在纳米比亚成立“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这个过渡政府包括“执行内阁”、“国民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三个机构，但并不握有“完全的行政和立法权力”，南非仍保留对纳米比亚的“外交、国防、安全及谈判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控制权”。“过渡政府”无权宣布纳米比亚独立，南非政府驻纳的行政长官有权拒绝“过渡政府”作出的决策。参加“过渡政府”的有特恩哈尔民主联盟、西南非洲国

是1977年11月，由白人政党“共和党”联合十个部族的政治集团组成的，实权掌握在共和党手中。1980~1983年控制了国民议会和部长委员会，执行追随南非的政策。

民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民主主义者及雷霍伯特自由民主党等，它们组成“多党会议”，主张通过“民族和解”和谈判加速独立进程。但南非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排斥在“过渡政府”之外。1985年6月19日，安理会通过566号决议，要求南非撤销在纳成立的“过渡政府”。

1988年5月，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安哥拉、古巴、南非及美国代表在伦敦举行四方会谈，讨论实施安理会435号决议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经过七个月11轮会谈和多次磋商，同年12月22日，安、古、南非三国终于达成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和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自1989年4月1日起按照安理会435号决议实现纳独立进程。6月，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难民开始迁返。7月，纳米比亚各政党相继展开竞选活动。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进程虽几经波折，但在逐步前进。

1989年7~11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纳米比亚举行制宪议会大选，10个政党参加竞选，有70余万选民登记，60余万人参加选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57.3%的多数票获胜。1989年11月18~24日，按照协议，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最后的1500名军人。12月21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主席萨姆·努乔马（1929~）宣布组成影子内阁。1990年2月16日，努乔马被制宪议会选为纳米比亚的首任总统。同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正式宣布独立。

纳米比亚的独立，是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坚持民族独立斗争的结果，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是武装斗争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产物，联合国在其独立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独立标志着非洲大陆旧殖民统治体系的完全崩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节 非洲独立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

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 随着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任务提到非洲独立国家的面前。

非洲各国独立后，先后走上了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非洲国家独立初期建立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这与它们取得独立的方式与国情各不相同有关。采用武装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方式获得独立的国家，通常是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赢得胜利，这些政党在独立后成为执政党，党的领袖成为国家首脑。他们在当政后一般都宣称要走非洲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些国家往往是在宗主国被迫让步和交权后取得独立的，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与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其政治体制基本继承殖民时期的传统形式，受宗主国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

从政府组织形式上看，非洲国家独立后大多数采取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颁布宪法，组成议会，建立文官政府。有的实行一党制，有的实行多党制。大多数国家建立的是总统制内阁，总统权力很大，有的国家宪法规定总统为终身制，如马拉维、突尼斯。在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摩洛哥、莱索托、斯威士兰以及1974年军事政变前的埃塞俄比亚实行君主立宪制，保留了国王。

非洲国家独立后，拥有了国家主权，普遍实行不结盟政策，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政治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许多国家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这具体表现在：

(1) 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频繁发生。据统计，1952~1985年，在非洲共发生241次军事政变，72次成功；1986~1989年又多次发生。非洲国家军事政变次数多，频率高，波及面广，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发生过军事政变，有11个国家曾发生10次以上，最多的在独立后的30年来发生了21次军事政变。

(2) 局部的武装冲突与内战连绵不断。50~80年代，非洲发生了20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不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其中有边界冲突、内战、外国雇佣军入侵等形式，卷入的国家达30多个。内部冲突往往有外部势力（大国或邻国）插手，持续时间长，严重影响非洲政局的稳定。

苏丹南北对立的战争是国内民族矛盾和宗教信仰不同引发的冲突。苏丹北方阿拉伯人信伊斯兰教，南方黑人信基督教，双方的语言、思想与习俗各不相同。执政的是北方人。1958年执政的阿布德军政府采取压制、歧视南方黑人的政策，激起黑人的反抗，并要求独立。1964年阿布德军人政府被迫下台，但南北武装冲突没有停息。1969年5月尼迈里领导苏丹“自由军官阵线”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他同意南方自治，南北方关系一度缓和。1982年，苏丹遭受特大旱灾，经济困难，尼迈里为加强统治，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法，翌年解散南方自治区，南方黑人反抗又起。南方反抗武装称“苏丹人民解放军”，受外部的支持。南北内战持续。

战略要地“非洲之角”的战乱频仍，成为非洲动荡的一个突出地区。非洲之角濒临红河入口处，扼苏伊士运河南部出入口，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三国。60年代以来，这里的冲突不断发生。一是欧加登战争，即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之间为争夺欧加登归属的战争。欧加登的居民为索马里人，1897年划归埃塞俄比亚，埃、索两国均认为对该地区拥有主权。索马里

称它为西索马里，1963年成立西索马里解放阵线。1964年为此发生边界冲突。1977年7月~1978年3月，爆发战争。埃塞俄比亚在苏联、古巴支持下击败索马里。1981年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八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欧加登为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但索马里政府抗议。索马里受到美国的支持。二是厄立特里亚战争。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曾为英意争夺地区。它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面，西部与苏丹接壤。1890年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1936年意大利把它与埃塞俄比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为意属东非帝国。1941年英军击败意大利，占领厄立特里亚。二战后，联合国将厄交英“托管”。1950年12月，五届联大通过决议，规定将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自治体与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1952年9月，英军撤走，联邦成立。1962年11月，厄立特里亚议会通过决议，与埃塞俄比亚合并，成为埃的一个省。厄立特里亚不愿同埃合并的势力起来反抗。1961年“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成立，开始武装斗争。1970年后，一部分人又组成“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人民解放力量”。埃塞俄比亚政府多次派军镇压，但未能消灭厄立特里亚的军事力量。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坚持厄立特里亚问题是埃的内政问题，但一些阿拉伯国家却支持厄立特里亚要求独立的势力。

原属赤道非洲国家乍得，从1960年8月独立以后，由于宗教、部族、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造成内战连绵，政局动荡。乍得首任总统托姆巴巴耶实行独裁和歧视北方部族的政策。1965年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北部、中部发动武装斗争。次年，乍得民族解放阵线在苏丹成立，并投入反政府武装斗争。1968年乍得“民阵”领导人易卜拉欣·阿巴查战死后，民阵分裂为11个派别，长期混战。1979年8月，在非统组织调解下，11个派别与六个邻国在尼日利亚首都签署《拉加斯协议》。11月组成全国团结过渡政府。古库尼任主席，哈布雷任国防部长。但各派矛盾并未消除。古库尼于1980年与利比亚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后，利比亚军队开进乍得，帮助古库尼，打败哈布雷部队。翌年1月，古库尼与利比亚政府签订利乍合并协议，引起国内多数派别和非洲国家的强烈反对。1982年6月，哈布雷推翻全国团结过渡政府，古库尼逃亡国外。10月，哈布雷任总统，组成新政府。10月，古库尼在利比亚支持下组成“民族救国”临时政府。乍得南北形成两个政权。1983年6月，第十九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承认哈布雷政府为乍得合法代表。法国、扎伊尔、苏丹等国支持哈布雷。利比亚则公开派兵同古库尼部队一起作战。美国总统里根公开发表谈话，支持乍得政府反对“利比亚部队的武装侵略”，并给乍得增加军事援助。苏联则要求美国与法国“停止对乍得事务的干涉”。由于大国与邻国的插手，使乍得内部矛盾更为尖锐复杂，形成内战与外战交织、动乱不已的局面。到1986年，哈布雷势力强大起来，以前反哈的各派包括古库尼在内倒向了哈布雷。同年11月古库尼派军队与政府军达成协议，共同抗击利比亚，乍得内部冲突转化为乍利冲突。

70年代南部非洲国家独立后，也没有解决好部族团结问题，因权力分配问题引发了内部冲突。安哥拉内战非常典型。安哥拉于1975年独立后，国内三大解放组织“人运”、“解阵”、“安盟”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谁为主组阁发生激烈斗争。三派合组的过渡政府成立不久就解体。1975年11月，“人运”单独接管政权，内战全面爆发。“人运”得到苏联支持和古巴军队的援助，美国则通过扎伊尔援助“解阵”。“安盟”得到南非的支持。“人运”在古巴军队支援下，于1976年击败“解阵”，并把“安盟”逐出城

市，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大规模内战虽然结束，但“安盟”和“解阵”的武装仍在边境坚持反抗斗争。直到1988年底安哥拉、古巴与南非签订协议，规定古巴从安撤军、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南部非洲局势走向缓和，安哥拉内战才基本结束。

在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的非洲，其政治体制突出地表现为集权主义的倾向。自50~60年代一系列国家独立后，政治体制几乎都经历了不同情况的变化，许多国家的权力向集中化发展。一党制和军人政权的增多成为70~80年代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到1989年初，非洲51个国家中，实行一党制的27个，超过半数，实行多党制的12个（包括南非），军人或无党派人士掌权的12个。

然而，非洲的局势并未因为国家权力集中化而稳定下来。造成非洲国家激烈动荡的因素较多，除了大国和本地区较强国家的插手干预外，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语言、宗教隔阂、边界争端以及部族之间的矛盾等等。特别要提出的是部族主义的干扰。非洲国家政变往往是由部族首领争权引起的，内战也常常带有部族之间冲突的印记。在非洲国家中，除北非阿拉伯人形成现代民族集团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几乎都是由若干部族集团组成。有些非洲国家的部族多达几十个，甚至二三百个。部族首领往往主张建立以本部族为主的中央政权和军队，或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中占优势，因而引起了各部族的矛盾与冲突。部族主义是阻碍非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问题 非洲国家独立后，走上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由于数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主义统治，非洲国家在独立时生产力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国民收入低下。在世界各大洲中，非洲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寿命是最低的。

非洲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可以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直接与他国建立经贸关系，自主地开发国家的资源。

为捍卫经济自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非洲国家独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削弱和打击殖民主义、前资本主义的势力。北非国家普遍实行了土改，削弱了大地主势力。不少非洲国家没收逃亡的白人殖民者的土地，有的国家没收外国农场主和种植园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建立国营农场或合作农场，或分配给非洲农民耕种。许多非洲国家对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国有化。据统计，1960~1976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共接管外资企业628家，占发展中国家同期接管的外资企业总数的43%。一些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除实行企业国有化运动以外，还利用本国积累的资金和依靠外资、外援新建了一批国营企业。非洲国家独立后，几乎都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国家投资，发展工业、农业、采矿、交通、电力等，以促进本国的工业化。

60年代，一大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它们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60年代，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8%，70年代为5.2%。到1980年，非洲各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50亿美元，而1960年约280亿美元，即20年内增加两倍多。60~70年代，非洲的经济增长与其他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不相上下，比同期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要高。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据统计，1981年非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40美元至1000美元之间的有20个国家，1000美元以上的9个国家。摩洛哥、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喀麦隆达800多美元，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塞舌尔、突尼

斯、毛里求斯、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刚果、博茨瓦纳等达 1000 美元以上。一部分国家的制造业有一定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原来除南非外仅有采矿业,独立以来相继建立了水泥、化肥、钢铁、石油加工、纺织、食品加工、汽车装配等工业部门。随着经济的增长,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比重有所下降,工矿业的比重上升。非洲国家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小生产经济、新建的民族资本与外资合营的混合经济成分。

非洲国家为发展国民经济,都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由于各国情况不同,选择的发展方针不一,在不同时期所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从实际情况看,非洲独立国家的发展战略有某些共同点,并可分为几种类型。大多数非洲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强调工业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实现真正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与宏观控制,特别是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是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实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实行有计划调节的自由经济政策。非洲国家对外资作一定限制,又普遍吸引外资、利用外援,以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

60~70 年代,非洲民族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大体分为下列三类:一、石油输出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加蓬等,它们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推进本国工业化;二、发展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的国家。科特迪瓦、肯尼亚、喀麦隆和突尼斯等,它们优先发展农业,实行产品多样化,采取引进外资、发展面向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工业的方针,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三、坚持发展传统的畜牧业、林业的国家,如博茨瓦纳等,它们继续重点发展畜牧业和林业,积累资金,以带动农业和采矿业。

上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非洲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如几内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扎伊尔、赤道几内亚等国,自独立后到 70 年代末,年均增长率不到 3%,其中半数国家长期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的状态。

从 70 年代后期,非洲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进入 80 年代,很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直到 90 年代初,非洲经济状况仍未摆脱困境。80 年代年均增长率为 2%~3%。《1992 年非洲经济报告》指出,1991 年全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 2.3%,而 1989 年和 1990 年分别为 2.7%和 3.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524 美元,比上年减少 0.5%。12 国经济呈负增长。近二十多年来,非洲人口增长率为 2.7%左右,有的年份达 3%,人口迅速膨胀,而粮食增长率不到 2%。人均粮食产量一年少于一年,粮食自给率下降,加上特大旱灾、虫灾与沙漠化,使以农业为主的非洲发生严重的饥荒。非洲大陆的生存危机旷日持久,至 1991 年饥荒仍笼罩非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指出,1991 年非洲短缺粮食 1000 万吨,有近 3000 万人受饥饿威胁,饿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国际救援工作因非洲国家内乱屡次被迫中断。非洲国家的外债急剧增加,大多数国家无力偿还。非洲国家的外债 1973 年为 171 亿美元,1991 年高达 2800 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 90%和出口收入的 2.5 倍,仅支付利息就达 250 多亿美元。由于经济增长慢,基础设施差,外资尤其是私人投资减少。经济危机使国民收入下降,生活状况恶化。在联合国所确定的 43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非洲有 29 个,占三分之二以上,即一半以上的非洲国家属于最贫困的国家之列。非洲人均国民收入至 80 年代后期已降

至 352 美元以下，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非洲经济困难不是偶然的。殖民主义遗留的后果，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以及持续的自然灾害，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因素。同时，非洲领导人也日益认识到，内部的主观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承认指导方针与发展政策上的失误和政局的不稳定等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上动荡不安，国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上。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不少领导人急于求成，企图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往往不顾国情，超越阶段，片面地将发展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或集体化，形成偏重工业，忽视农业，重视城市，忽视农村，重视国营、集体，限制私营、个体的倾向。

为了摆脱危机，振兴经济，从 80 年代起非洲国家重新估价它们过去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经济调整：一、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价格，减免农业税，促进农业，尤其是粮食和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二、整顿国营经济，修改投资法，放宽投资限制，鼓励私人资本。80 年代中期以来，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有三十多个非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国营企业推行了私有化。90 年代初，在多党化潮流的影响下和西方国家积极推动下，非洲国家经济私有化进程加快。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促进经济一体化。1980 年 4 月，在拉各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在 2000 年实现全非洲经济一体化，并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计划。1990 年 6 月，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51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标志着非洲向经济一体化目标已迈出重要的一步。

非洲国家经济调整的步履艰难，进展不快。但许多非洲国家已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加强集体自力更生和区域合作，实行改革，力求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有的非洲国家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绩。

1980 年独立的津巴布韦原是一个白人统治的国家，经济命脉的 80% 控制在少数白人手中。它的经济是以农业、制造业和矿业为三大支柱。建国后，非洲民族联盟领袖罗伯特·穆加贝执政。他吸取一些非洲国家执行过左政策的教训，坚持民族和解政策，反对部族主义、地方主义，告诫人民不要排斥白人，允许白人参政，团结原反对党非洲人民联盟。1983 年 12 月，“民盟”与“人盟”合并，组成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穆加贝强调黑人、白人都是津巴布韦人，应团结起来共建新的国家。

在经济上，穆加贝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从实际出发，没有采取破坏独立时继承下来的社会基本结构，没有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而是一面保护和调动白人农场主经营的积极性，一面大力支持黑人村社农民发展农业，并鼓励农业、多种经营和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独立以来，津巴布韦经济增长率为 3.8%，最高年度达 11%。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 4.5%，年产粮食 200 万吨，年出口粮食 35 万吨。工业增长率为 3.4%，工业品自给率达 90% 以上。人均国民收入近 700 美元，基本上消灭了饥饿。

津巴布韦政局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为非洲大陆少见的国泰民安的小康国家。其成绩斐然，引起国际上的注目。穆加贝曾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没有照搬别国的经验，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现实而稳妥的发展政策。由于津巴布韦的成就，穆加贝于 1988 年被国际“消灭饥饿环球中心”授予“非洲杰出领导人奖”。1990 年在伦敦出版的《新非洲人》杂志评选“非洲最佳

领导人”中获票居首位，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

津巴布韦的例子说明，动荡的非洲终将走上一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道路。

第三节 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拉美经济的发展与巴西的“经济奇迹”战后，拉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拉美国家进入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加快。

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多依据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主义”或称拉美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也是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提倡的学说，故又称“拉美经委会主义”。劳尔·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探索了拉美经济发展的道路、方针和政策，指出拉美落后的根源是“中心”（资本主义工业大国）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美国等中心国家的霸权和剥削。他主张推行“替代进口”战略，制订发展规划，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执行出口多样化方针，并强调利用外资，合理使用资金，吸收剩余劳动力以及实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这些主张和措施对战后拉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有相当大的影响。

从50年代起，拉美国家从战前的零星地实行进口替代的局部措施发展到普遍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促进工业化，70年代又进入面向出口和出口替代的经济发展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80年代，拉美各国已逐步建立和加强了基础工业，新兴工业也建立起来，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战后拉美经济发展虽也有曲折，但总的讲，发展速度较快。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拉美国家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整个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960年为694亿美元，1979年增加到5993亿美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340美元，1979年增加到1500多美元。拉美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亚非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而且超过了除日本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

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迅速。50年代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60年代末70年代初，重工业也超过轻工业。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已初具规模，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基本上建立了以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化工、电子、纺织、食品等部门为主体的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摆脱了农、矿业单一产品出口国的地位。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的本国资本力量加强，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些国家占据重要地位，城乡劳动者人数增加，许多国家的城乡已广泛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

与此相适应，拉美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力日益削弱。尽管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拉美国家还存在着对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当大的依附性，但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内，一些拉美国家已开始摆脱昔日作为发达国家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的落后状态。

拉美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各国差异较大。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二集中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个经济最有发展的国家，

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5年），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阿根廷政府财政副国务秘书、中央银行总经理等职。1950~1962年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1962年任拉美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所长。1964~1969年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首任秘书长。

加上智利达到四分之三以上。其中，巴西的经济发展最快，80年代初，其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八位。

巴西联邦共和国是南美大陆的一个大国。从6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1968~1974年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0%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誉为“经济奇迹”。1982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2940亿美元，在拉美居首位，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52美元。

战后巴西经济迅速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地处热带高温多雨地区，使巴西获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政局比较稳定，历届政府重视经济建设，制定与执行工业化战略是巴西经济起飞的更为重要的因素。30年代至二次大战期间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瓦加斯政府执政时期（1930~1945年），开始实行“替代进口”工业化方针，为巴西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战后，巴西政府虽然更替频繁，但基本上是和平移交政权，政局相对稳定。历届政府，包括军人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虽有所不同，但均把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

1964年4月，卡斯特洛·布朗库为首的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府后，巴西军人集团长期掌握了政权。实行军事独裁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是六七十年代拉美多数军人政权的共同特点。巴西军人政权建立后也起用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实行“专家治国”，以发展经济。

巴西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采取的主要战略措施，首先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调节作用。从1964年起，巴西政府先后制订了六个经济计划，并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经济的指导和管理。其次，执行替代进口和扩大出口的外向经济发展方针。出口成为巴西建设的主要支柱。60年代初，巴西即提出“出口即出路”的口号，采用多种渠道，鼓励出口贸易。第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除国内积累外，巴西大量引进外资，举借外债，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建立和发展新兴工业部门，这对巴西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四，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注意发展农业。由于认识到农牧业是巴西经济发展的基础，60年代以来，巴西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多种作物，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单一作物制，不仅适应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为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巴西的大豆，1950年的产量仅为35万吨，1977年增加到1251.3万吨，巴西一跃成为与美、中并驾齐驱的“大豆三王国”之一。第五，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重视发展教育是巴西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到1981年，巴西的在校学生人数已达2841万多人，比1970年增加2.38倍。1968年巴西大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0.3%，1978年达到1.1%。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述巴西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是巴西出现“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巴西已由生产农业出口产品的落后农业国变为新兴的工业—农业国家。现代化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出口农产品、轻工业品，而且出口汽车、船舶、飞机。它的耐用消费品进入了欧洲、北美市场。同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成套设备，提供技术援助。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80年已占全国人口的63%。

六七十年代，巴西和拉美多数国家的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外债增加，支付危机威胁不少国家。以1982年8月墨西

哥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其 800 亿美元外债为标志，拉美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持续近十年，到 1991 年拉美国家外债达 4200 多亿美元。此外，地区发展不平衡，农业相对落后，土地问题尖锐，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国民收入不均，贫富差别扩大等也影响了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80 年代被称为拉美经济上“失去的十年”。

拉美经济上的困难从外部原因说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从内部原因上来说，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具体说是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速度已不适应各国的实际；重工轻农，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国家干预过多，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汇兑与关税等政策也有失误。危机促使拉美国家进行了经济调整与改革。各国的调整在进展与成效方面虽参差不齐，但有某些共同性：一是各国大多采取紧缩政策，缓解支付问题，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进而逐步调整经济结构；二是倡导“新自由主义”，大力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发挥市场和私人企业的作用；三是大力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开放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经过调整与改革，进入 90 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开始从严重的经济困境中摆脱出来。

美苏在拉美的争夺与中美洲局势的动荡 进入 70 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拉美的争夺加剧。苏联从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与拉美国家的联系加强，它不仅向古巴，而且向秘鲁等中南美洲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70 年，智利人民团结阵线在大选中获胜，社会党人阿连德（1908～1973 年）组成新政府。阿连德政府实行国有化政策，收回美资铜矿公司等外资企业，并进行土改，征用大庄园土地；对外宣布尊重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参加不结盟运动，并与苏联、东欧国家、古巴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经济贸易关系。阿连德主张通过结构改革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苏联认为智利是拉美国家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典型，对其大力支持。

面对苏联势力的扩张和拉美国家反美离心倾向的加强，1969 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提出对拉美的“新政策”，鼓吹同拉美国家结成“新的伙伴关系”，企图在“泛美体系”内加强对拉美的军事、政治控制，并继续通过提供援助、扩大贸易、投资等方式，密切与拉美的关系。为了压制拉美国家的反美倾向，1973 年 9 月，美国支持智利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建立军人政权。1976 年卡特总统上台后提出对拉美的“新方针”，推行“人权外交”，鼓吹与拉美国家“合作磋商”，并在对拉美的经济关系中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卡特政府加强了向牙买加等加勒比海国家的援助，以抵消苏、古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1979 年尼加拉瓜爆发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促进了中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尼加拉瓜革命胜利为转折，中美洲局势日益紧张，成为国际斗争的热点地区之一。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地峡中部，扼南北美洲陆上交通的要冲，也是开凿两洋新运河的理想地区之一，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美国曾于 1912 年和 1927 年武装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1934 年，在美国指使下，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谋杀了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奥古斯托·桑地诺，1937 年 1 月自任“总统”，开始建立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安·索摩查·加西亚执政 29 年，1956 年 9 月遇刺身亡，其长子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继任总统，奉行他父亲的独裁统治政策。1963 年大选后，古铁雷斯当

选总统，但实权仍在索摩查家族手中。1967年，索摩查·德瓦伊莱之弟安·索摩查·德瓦伊莱又继任总统。索摩查家族在长期的统治期间，利用政治权势，攫取大量财富，成为尼加拉瓜头号金融资本集团，并通过控制政府、议会和国民警卫队武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1972年底，尼首都马那瓜发生大地震，死伤3万多人，25万人无家可归，索摩查家族竟将救灾援助款项大量挪为己有。这激起了尼加拉瓜人民更为强烈的不满。

尼加拉瓜人民的反独裁斗争从未停息。1961年7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并开展了武装斗争。阵线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等在斗争中牺牲或被监禁，内部曾分裂为三派：持久人民战争派，坚持“游击中心主义”路线；无产阶级派，主张重点搞城市斗争，放弃直接军事行动；全国领导派，主张联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独裁力量，通过人民起义，建立人民政权。1977年10月，全国领导派的游击队袭击了马那瓜，引起独裁政权的极度恐慌。

70年代后，以知识界、企业界和宗教界著名人士为主体的“民主解放联盟”和“十二人集团”等反对派组织相继成立。1978年1月，民主解放联盟领导人、《新闻报》主编华金·查莫罗被暗杀，导致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索摩查家族统治的斗争。到同年9月为止，发生了三次全国性大罢工和三次群众起义，起义烽火席卷全国九个省（共18个省）的许多地区。尼加拉瓜政局动荡，经济濒于崩溃，索摩查家族统治空前孤立。

1979年初，尼加拉瓜人民反独裁斗争达到高潮。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各派建立全国领导委员会，武装队伍发展到6000人。5月29日，发动了总攻势。6月16日，以“桑解阵”为主包括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宣布成立民族复兴临时政府，并由代表各种政治力量的五个成员组成执政委员会。尼加拉瓜的反独裁统治斗争得到古巴、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支持。在索摩查政权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美国也中止了对它的援助。7月17日，索摩查被迫下台，逃亡国外。19日，“桑解阵”的武装部队进入马拉瓜。20日，民族复兴政府内阁宣誓就职。索摩查家族对尼加拉瓜长达43年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

为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民族复兴政府下令没收索摩查家族的财产，将其土地分配给农民。在政治体制上，尼加拉瓜实行以“桑解阵”为主的多元政治，除索摩查的国民自由党外，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存在。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多种经济，在农村则实行三种所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公有制及个体和集体所有制。新政权解散了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建立了桑地诺人民军。

尼加拉瓜反独裁斗争的胜利，对中美洲国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美洲包括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七国。中美洲资源丰富，地位险要，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二次大战后，中美洲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大多处于由美国扶植的军人独裁者的家族统治之下，政治上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外国垄断财团的层层盘剥，造成贫富日益悬殊、外债累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状况。7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中美洲国家经济恶化，政局更为动荡。

1959年的古巴革命，尤其是1979年尼加拉瓜的反独裁斗争的胜利，鼓舞了中美洲国家人民反对本国独裁政权的斗争。从1980年开始，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国的游击活动活跃起来，反军政府的左翼组织也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斗争。尼加拉瓜“桑解阵”夺取政权后，支持中美洲其他国家的反独裁斗争。而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则以萨尔瓦多等国为基地，并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这样，以尼加拉瓜为一方，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为另一方，相互对抗，中美洲陷入严重的地区冲突之中。

尼加拉瓜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受到美国的支持，而中美洲各国反政府游击活动的发展，被苏联视为在拉美牵制与削弱美国势力的有利机会。苏联通过古巴等国援助尼加拉瓜，一些武器又通过尼加拉瓜运往其他中美洲国家。美国竭力压制中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将矛头集中指向尼加拉瓜。里根上台后，推行比卡特更加强硬的中美洲政策，加强对中美洲国家政府的军事援助。1983年7月后，美国进一步采取对尼加拉瓜的直接军事挑衅。10月，在美国策动下，中美洲防务委员会恢复活动。10月12日，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发生军事政变，里根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和“应加勒比海国家组织紧急请求”为名，派遣军队入侵格林纳达，扶植亲美政权，并乘机向尼加拉瓜发出威胁性的信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介入与争夺，使中美洲局势更加复杂化。在这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尼加拉瓜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最为尖锐，同时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及洪都拉斯的边界冲突也频繁发生。

中美洲的动荡引起了拉美国家的不安。为避免局势恶化，危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一些拉美国家提出外国不要干涉中美洲事务、中美洲问题由中美洲人民自己解决的主张。这样就开始了中美洲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1983年1月，以调解中美洲危机为宗旨的“孔塔多拉集团”应运而生。参加这个集团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四国外长在巴拿马的孔塔多拉岛开会，讨论了和平解决中美洲冲突问题。此后，四国外长集体出面进行调停。7月，四国总统又共同签署《关于中美洲和平的坎昆宣言》，强调遵循不干涉、自决、国家之间主权平等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提出中美洲各国“有效地控制军备竞赛，撤走外国顾问，建立非军事区”等建议。孔塔多拉集团的斡旋活动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拉美国家的支持。1985年7月，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秘鲁四国组成“利马集团”，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以共同推动中美洲和平进程。

中美洲和平进程在艰难曲折中前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过上述两个集团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1986年5月，中美洲五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首脑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美洲国家自己开始了对话。翌年8月，在第二次五国首脑会议上，终于签署了《在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的文件，就中美洲地区实现停火、政府与反对派对话、开始民主化进程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中美洲和平进程的一个重大进展。此后，中美洲五国首脑又连续多次举行会议，商讨和平解决中美洲的冲突问题。1988年1月，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在第三次五国首脑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在尼全国取消紧急状态，与反政府武装立即进行直接谈判，协商停火。3月，尼加拉瓜内战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临时

中美洲防务委员会于1963年成立，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参加。该组织是在美国策划下共同对付古巴的军事联盟。1979年尼加拉瓜反独裁斗争胜利后，尼加拉瓜宣布退出，该组织陷入瘫痪。

停火协议，战斗基本停止。1989年2月，第四次中美洲五国首脑会议在萨尔瓦多举行，会议达成协议，撤除驻扎在洪都拉斯境内的尼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基地，解除其武装，允许他们重返家园，参加政治活动。根据协议，尼政府将于1990年2月25日提前举行大选，允许各政党参加。这次会议使尼加拉瓜的局势缓和下来。

1990年2月，尼加拉瓜大选如期举行。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等的监督下，全国反对派联盟的总候选人、无党派人士比奥莱塔·查莫罗夫人以55%的选票，击败了执政十年的“桑解阵”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奥尔特加，当选为新总统。此后，查莫罗夫人就国内和平问题同“桑解阵”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协议。4月19日签订了三个重要协议，为结束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奠定了基础。4月25日，离任的奥尔特加总统将总统绶带披挂在查莫罗女士身上。这样，查莫罗夫人成了尼加拉瓜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尼加拉瓜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1991年12月底，萨尔瓦多游击队同政府达成结束已持续11年的武装冲突的协议。危地马拉游击队也与政府加紧谈判。中美洲和平进程加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新形势下，中美洲五国首脑会议把深化经济调整和促进中美洲一体化作为主要议题。

拉美国家对外关系多边化、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美苏争夺加剧的形势下，拉美国家实行对外关系多边化方针，广泛发展与亚非国家及西欧、日本的关系，加强独立自主与团结协作，经济一体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

1970~1976年，墨西哥的埃切维里亚政府执政。它奉行多样化的对外政策，先后与六十多个国家建交。1974~1979年，巴西的盖泽尔政府奉行“负责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既周旋于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又坚持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这一时期，拉美国家与亚非发展中国家广泛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经济贸易关系。1979年，拉美有11个国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80年代，拉美国家与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已从贸易领域发展到金融、技术、劳务和生产等领域。

70年代，美国在拉美经济中的地位虽仍领先，但日本、西欧与拉美的经济贸易日益发展，资本输出速度大幅度增长，它们在拉美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70年代末，日本成为拉美初级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日之后拉美的第三大商品供应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对外关系多边化趋势的发展，使战后以来拉美国家长期依附美国的外交格局发生变化，增强了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提出了反对核垄断、核军备竞赛和建立拉美无核区的要求，更加广泛地开展了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70年代末，22个拉美国家先后宣布200海里领海、承袭海、专属经济区或渔业区，并采取行动保卫200海里海洋区。6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一体化运动迅速发展。早在1960年，阿根廷、巴西等国就创建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2年中美洲共同市场、1969年拉普拉塔河流域协定组织和安第斯条约组织相继建立。70年代拉美经济一体化运动高涨。1975年组成的拉美经济体系拥有25个成员国。它们通过相互减免关税、共同开发资源、成立多国联合企业等方式开展区域性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能力。1981年3月，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正式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进一步加速了地区一体化，并为最终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创造了条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取得明显进展，几乎各个地区的

经济组织都达成了一体化协议，并开始实现跨小地区的多边合作向全地区一体化的过渡，并同北美实行经济合作。

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一些军人执政的拉美国家推行“民主开放”政策，“还政于民”，并通过选举方式，逐步向成立文官宪制内阁过渡。拉丁美洲军人掌权的历史颇长。50年代前期，拉美20个独立国家中有14个军政府。但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冲击下，旧式军人独裁政权相继垮台，到50年代末仅剩下巴拉圭和中美洲少数几个军人政权。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反政府的游击斗争在拉美空前活跃，政局动荡，军人集团指责文人政府软弱，在许多国家里它们通过军事政变再度上台。60年代先后有13个国家建立新的军人政权。不过这些军人政权与旧式军人政权不同，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有的提出“振兴经济”、“重建国家”的口号，比较重视经济建设。

进入70年代，随着拉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增强，中等阶层和中产阶级队伍扩大。它们在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中日益占有优势地位，成为拉美政治舞台的支柱。军队内部也发生深刻变化，具有民主意识的革新派军人集团逐步取代了保守的旧军人集团。因而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确立代议制民主政体成为一股潮流。70年代后半期，受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拉美地区不少军人执政的国家经济困难，债务沉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尖锐，军人政权不得人心，更推动了一些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实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1977年10月秘鲁军政府首先制订实现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计划，1980年5月，组成了宪法政府，结束了12年之久的军人政权。接着一些军人政权纷纷让位于民选政府。统治海地长达29年的杜瓦利埃独裁政权于1986年2月垮台。1990年3月，智利军人政府也被文人政府取代。到1991年底为止，除海地外，拉美军人政府统治的国家已完成向民选政府的过渡，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体。以“外抗强权，内争民主”为特点的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还在不断深入发展。尽管民主化在个别国家仍会遇到挫折，但它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无法阻遏的。

第十五章 从两极世界向多元世界的发展

第一节 冷战的逐步缓和与东西方关系的调整

缓和的开始 50年代中期，美国仍然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优势，继续对苏联进行“遏制”。但是，西欧各国的经济复兴，开始要求相对的独立性，美国同西方盟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美苏都想加强对这股新兴的民族独立力量的控制。此时，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迅速发展。苏军扩大到550万人，而美军为140万人。1953年8月，苏联氢弹爆炸成功。1956年，苏联已有能够毁灭美国各大城市的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器储备。1957年8月，苏联比美国早一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同年10月和11月，苏联接连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这表明美苏军事实力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美国的遏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冷战对苏联的不利影响愈来愈明显。苏联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军备建设，而国内经济建设既缺少资金，又难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苏联要想在经济上赶上美国，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同西方的关系。另外，苏联军事力量的增强，也有可能从实力地位出发同美国进行谈判。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美苏双方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对总是简单地谴责苏联，他“已经感到厌倦”，而“感兴趣的是未来”。他认为苏联和美国政府都是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如果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向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作了题为《和平机会》的演说，要求苏联支持在朝鲜实现“体面的停战”，结束对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安全的威胁，建立一个广泛的欧洲共同体。他还邀请苏联新领导人同美国一起“向贫困恶势力”作战，表示“欢迎为和平而采取的每一个真诚行动”。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次敦促召开四国首脑会议。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政策，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使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停止，同希腊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归还芬兰的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呼吁苏日关系正常化等等。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强调同美国实行“和平竞赛”。苏联极力谋求缓和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

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日内瓦关于印支问题的决议，是东西方缓和的开始，而对奥地利和约的缔结则是一项重要的突破。战争结束以来，苏、美、英、法就奥地利问题进行长期谈判，一直未达成协议。1955年2月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改变了过去坚持对奥和约必须以签订对德和约为前提的立场，建议立即召开四国会议讨论同奥地利缔结国家条约问题，条件是保证奥地利的中立。4月，苏奥谈判取得满意的结果。1955年5月15日，苏、美、英、法同奥地利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规定恢复奥地利为“一个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禁止德奥合并或结盟，彻底消灭一切法西斯组织，四大国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最迟于1955年底撤走其占领军。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结束了四大国对其分割占领的状态，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的并受大国保证的中立国家，消除了

欧洲的一个争执热点，为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1955年7月，四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出席会议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富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是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大国首脑会议。

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美、英、法坚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有权参加北约，就是要把德国纳入西方联盟。苏联认为，“在德国的土地上已经形成两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而且联邦德国已成为北约的成员，人口占全德国的大多数，这就使得讨论“自由选举”毫无意义。苏联主张应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入手去解决德国问题，建议分两个阶段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第一阶段保持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可以分别参加两个集团，参加集团的国家应承担互不使用武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一切争端的义务。第二阶段取消两大集团，代之以集体安全体系，为解决德国问题扫清障碍。苏联的建议遭到西方三国的拒绝。

在裁军问题上，苏联重提5月10日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建议美、苏军队各裁减到100~150万，英、法军队各裁减到65万；关于原子武器，第一阶段禁止使用和减少试验，第二阶段禁止生产。美国提出“开放天空”，交换军事设施蓝图，互相进行空中视察。在会上各唱各的调，毫无结果。在东西方接触问题上，与会国同意逐步消除妨碍各国人民自由交往及和平贸易的障碍，促进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自由交流和接触。

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以及随后举行的外长会议，都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日内瓦会议毕竟恢复了战后冷战以来中断的大国首脑对话，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1955年6月7日，苏联即正式邀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问题进行会谈，希望争取在四国首脑会议之前，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阿登纳认为，苏联“显然是试图在联邦共和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不能因为接受这一邀请而破坏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的信任，决意要把访苏的时间放在四国首脑会议之后。阿登纳抓紧时间先后访问了华盛顿和伦敦，就四国首脑会议和同苏联谈判的问题，进行了磋商，然后于6月30日复照苏联，表示接受访苏的邀请。

9月9~13日，阿登纳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阿登纳要求把德国统一和释放战俘作为建交的先决条件，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来苏联在释放战俘问题上作了让步。13日，苏联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两国关系条约，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第二天阿登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德国东部边界不是最终的边界，联邦德国政府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随后，副外长哈尔斯坦宣布：除苏联外，任何其他国家同民主德国建交，将导致联邦德国同该国断交。这就是“哈尔斯坦主义”。在苏德谈判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对阿登纳说，苏联面临三大任务：首先，必须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次，必须像美国那样扩充军备；第三，中国有6亿人口，而且每年增加1200万，这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他请求阿登纳帮助他从欧洲脱身，腾出手来对付中国。阿登纳同意与苏联建交，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而

且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市场。苏联同联邦德国建交也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9月20日，苏联又同民主德国签订了两国关系条约，把民主德国作为一个德意志主权国家，随后接纳它加入华约组织。这样，两个德国成了既成事实，德国的分裂更趋固定化。关于柏林问题，苏联于1958年11月发表一份备忘录，建议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如果六个月内不能做到这点，苏联将单独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即民主德国将有权全面控制通往西柏林的通道。美国当即拒绝。

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发出信息，要求举行苏美首脑会谈。直到1959年夏，赫鲁晓夫才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信。他说，“我们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与我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重要性”。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发射了登月火箭，以增加谈判的资本。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飞抵华盛顿，受到艾森豪威尔的欢迎。他访问了许多城市，到处宣扬苏美和平友好合作，两国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9月27日和28日两天，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会谈。艾森豪威尔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收回他限在六个月内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他决不参加苏联建议的四大国最高级会谈。眼看会谈将要失败，赫鲁晓夫被迫退让，向美国总统保证取消他将在一定期限内同民主德国缔结和约的建议。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提出从其他国家撤走军队，拆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一建议意味着解散北约和华约组织，美军被撵出西欧。美国当然不肯放弃它在西欧的既得利益。艾森豪威尔针锋相对地提议，美苏两国不再继续进行核试验，并为此建立国际监督。这等于“冻结”两国核武器水平，使美国永远保持核优势。这当然是苏联不能接受的。戴维营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但它使一触即发的柏林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美国同意召开四大国最高级会议，苏联正式邀请艾森豪威尔访苏，美苏关系亦有所改善。

艾森豪威尔原定在出席巴黎四国最高级会议之后，于1960年6月10~19日访问苏联。但5月1日发生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导弹击落事件。艾森豪威尔拒绝赫鲁晓夫提出的公开道歉的要求，最高级会议和预定的访苏计划都流产了。美苏关系又趋向紧张。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4月，美国策划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遭到惨败。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举行维也纳美苏最高级会谈的倡议，以试探新总统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肯尼迪接受挑战，6月3日到维也纳会晤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关于裁军问题，肯尼迪建议可先就禁止核试验达成一项协议。赫鲁晓夫认为禁止核试验“必须同全面和彻底裁军结合起来”。关于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再次要求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如果美国拒绝，苏联将单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那时，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必须得到民主德国政府的同意。肯尼迪断然拒绝。会谈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维也纳会谈后，赫鲁晓夫决心动手割除西柏林这颗“恶性肿瘤”，重申西方必须从西柏林撤军的六个月期限。7月初，赫鲁晓夫宣布暂停军队复员，增加军费三分之一。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亲自指挥华约军队在民主德国举行演习。赫鲁晓夫恐吓说，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基地将被彻底毁灭，肯尼迪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8月3~5日，华约各国党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开会。会议发表声明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愿缔结对德和约，华约国家决定单方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并给予柏林以“自由城

市”的地位。8月13日，民主德国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筑起“柏林墙”，封锁了通道，只在交界处留下九个过境站。人员来往都要进行检查。

肯尼迪立即作出强硬反应。他在7月25日晚的电视讲话中声言：我们不能，也决不允许苏联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为了维护柏林的利益，美国将不惜一战。他宣布追加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增派西欧驻军，加强导弹力量。美国空降部队调往联邦德国参加军事演习，50%的B—52型和B—47型轰炸机处于戒备状态。美苏坦克在柏林墙两侧对峙，双方剑拔弩张，柏林危机达到了顶点。

柏林危机终以赫鲁晓夫的退让而缓和下来。10月10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中说：我们将不坚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缔结和约。他还取消了要美英法三国军队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后来他又表示，解决西柏林问题没有最后的期限，什么时候成熟，就什么时候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被冻结起来，危机宣告结束。

1962年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年8月，赫鲁晓夫以保卫古巴为名，开始秘密地向古巴运送导弹，企图造成核威慑，加强苏联同美国争夺的战略地位。苏联在古巴修建中程导弹发射场被美国U—2飞机侦察发现，拍下了照片。10月22日晚，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要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并下令武装封锁古巴，世界各地美军进入戒备状态。23日，肯尼迪签发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将拦截前往古巴的舰船，听候美国检查。美国在佛罗里达和其邻近各州，集结了庞大的登陆部队，核潜艇进入阵地，满载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准备作战。加勒比海危机深重，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远洋舰队力量薄弱，在加勒比海地区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在肯尼迪咄咄逼人的核讹诈面前，赫鲁晓夫采取了退让政策。10月26日和27日，赫鲁晓夫两次写信给肯尼迪，表示愿意从古巴撤走导弹，并同意联合国派员监督核实，条件是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肯尼迪要求苏联先撤出攻击性武器，然后美国才能提供对古巴的保证，根本不理睬赫鲁晓夫要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的要求。经过美苏私下密谈，赫鲁晓夫于10月28日和11月21日先后同意从古巴撤走中程导弹和伊尔28式轰炸机，保证今后不再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美国决定取消对古巴的军事封锁。美国还承诺不侵犯古巴，同意今后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古巴导弹危机遂告平息。

东西方关系的调整与缓和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双方进行核讹诈、核威胁，大有触发核战争的危险。可是，正是这场危机，也使美苏两个核大国看到核武器对自己的致命威胁，它们遂合谋保持其核垄断的地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导弹危机还未最后平息，赫鲁晓夫在10月27日就向肯尼迪指出，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协议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特别是它将有助于达成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第二天，肯尼迪在复信中强调应当先注意“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问题，并提出就这些问题进行紧急讨论。这样，陷于僵局达五年之久的美英苏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突然出现了转机。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条约规定，禁止大气层和水下核试验，并禁止将放射性尘埃扩散到试验国领土之外的其他

核试验。这个条约不包括地下核试验，其目的是剥夺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权利，特别是企图阻止中国和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对防止大气层污染有一定的作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了这个条约。与核禁试谈判的同时，美苏还达成了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热线”的协议，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可以进行直接联系和磋商，避免因任何误会而引起核战争。1963年9月，美国国会批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肯尼迪还建议美苏共同考察月球，并批准向苏联出售小麦。美苏关系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显著改善。

1968年7月1日，美英苏三国又签订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规定有核国家不得将核武器直接或间接让与其他国家，也不协助、鼓励任何无核国家制造或取得核武器；无核国家不准直接或间接接受核武器，并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核查。条约完全回避了核大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裁减和销毁核武器的义务。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加入这项条约，中国和法国拒绝参加。

60年代末期，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勃列日涅夫更加积极推行缓和政策。1969年3月，他提出了一整套实现欧洲缓和的主张，建议东西方对话，建立包括华约和北约在内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上，他提出以缓和为中心的六点“和平纲领”，宣称要把缓和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政策，发展东西方经济、贸易关系，争取西方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苏联全面赶超美国，同时用以麻痹西方，分化西欧、日本同美国的关系，最后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西柏林协定、美苏首脑会谈、欧安会和中欧裁军谈判等，都是70年代东西方关系所谓“缓和时期”的突出表现。

苏联主动邀请美英法三国谈判西柏林问题。1971年9月3日，签订了《四大国协定》，或称《西柏林协定》。在协定中，苏联不再坚持改变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的地位，同意“四国政府将互相尊重各自的和共同的权利与责任”。苏联声明，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协定规定，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但在附件中又规定：联邦德国“可以对西柏林常住居民实行领事服务”，“缔结的国际协定和协议，根据规定的手续可扩大应用于柏林西区”。联邦德国“可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代表柏林西区的利益”。1972年11月8日，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在波恩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彼此承认是主权国家，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发展睦邻关系，互派常驻代表，发展经济、科技、交通、邮电等方面的合作。1973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同年5月，勃列日涅夫访问了联邦德国。苏联同联邦德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和工业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和航空协定的补充议定书。这样，战后以来对德国问题的争端终于得到某种解决，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美苏首脑会谈，被认为是实现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的重要途径。70年代上半期，美苏进行了四次首脑会谈，先后签订了几十个涉及工业、技术合作、贸易、文化交流，以至医学卫生、环境保护、住房建筑等内容广泛的协议，而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则是历次首脑会谈的重心。因为此时美苏核军备竞赛已经接近均衡，出现了所谓“恐怖均势”。双方感到核军备竞赛造成可怕的军费负担，有必要通过谈判来限制对方，保持或取得自己的优势地位。1972年5月，尼克松作为战后访问苏联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同勃列日涅

夫进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等文件，保证尽一切努力避免军事冲突，防止核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美苏还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

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期间，与勃列日涅夫达成协议，同意“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分别平行召开，结束了自1964年苏联倡议“欧安会”以来的争吵。1972年11月在赫尔辛基举行35个国家大使级“欧安会”筹备会。经过两个阶段数千次会议，才拟定出“欧安会”的“最后文件”。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举行第三阶段35国的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福特、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等。会议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其中包括《指导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宣言》《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安全与裁军的某些文件》《人道主义与其他方面的合作》《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等。文件提出“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满足了苏联急切希望固定欧洲边界现状的要求。但在西方国家的坚持下，又写上“边界可以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手段和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关于建立信任措施方面，规定与会国在离边界250公里以内地区举行15,000人以上的军事演习时，应在21天前通知与会国，并邀请它们派观察员观看演习。关于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只是希望与会国注意彼此给予最惠国待遇。西方最感兴趣的是人员交流问题，希望以此促进苏联和东欧的“自由化”。文件规定要“促进各国人员、机构和组织之间更自由地往来和接触”，有关家庭团聚、不同国籍的公民结婚、青年会晤等，应予方便等。“欧安会”的召开，是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一个高潮。

中欧裁军会议于1973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开始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约和华约的19个国家。截至1984年底，共谈判34轮，举行了385次会议。双方坚持各自提出的裁军原则：北约主张“均衡裁军”，多的多裁，少的少裁，最后地面部队最高限额相等，各为70万；华约主张“对等裁军”，即按同等数量或同样比例裁减。多年谈判中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虽有不同，但坚持各自的裁军原则却没有变化。双方还在中欧兵力的实际人数问题上不断争吵。1983年，华约再次宣布它在中欧军队总数为97.9万人，与北约在中欧的军队大致相等。北约则认为，华约陆军要比北约多15万人。由于双方都想通过谈判限制和削弱对方，夺取军事优势，因而中欧裁军谈判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第二节 军备控制谈判与东西方关系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世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人民痛恨战争，迫切要求和平，要求削减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此外，核武器的发展使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威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承受不起核竞赛无限制扩大的负担和核战争的后果。因此，维护和平不仅为全世界人民所最关注，而且也是东西方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军备控制谈判具有愈来愈重要的意义。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断断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9 年 11 月 17 日开始到 1972 年 5 月 27 日。主要就限制防御性战略核武器和进攻性武器问题举行了七轮会谈。1972 年 5 月，尼克松访苏，与勃列日涅夫最后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临时协定规定，双方进攻性战略导弹冻结在 1972 年中的水平上，即陆基洲际导弹苏联为 1618 枚，美国为 1054 枚；潜艇发射导弹苏联为 740 枚，美国为 656 枚。这个协定对导弹的质量和核弹头的数量未作限制。

第二阶段从 1972 年 11 月 21 日开始到 1979 年 6 月 18 日。中心是拟订一项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来取代临时协定，举行了 15 轮会谈和五次首脑会晤。1973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会谈，双方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等文件。这些文件宣称，双方将制定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长期协定，遵循承认双方相互对等安全和不允许直接或间接谋求单方面优势的原则，美苏之间或一方与其他国家之间出现核冲突的危险时，两国立即进行磋商。文件还规定，双方进攻性核武器可以“现代化和更新”。1974 年尼克松再次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会晤，签订了《部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议定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等文件。双方商定不进行当量在 15 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关于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由 1972 年协议规定的两个部署区减为一个。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由于美苏各自坚持限制对方，加强自己，没有达成协议。1974 年 11 月，福特总统在海参崴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工作会晤，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订一项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到 1988 年为止，美苏双方的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运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的限额不得超过 2400 件，其中多弹头导弹的运载工具为 1320 件。1979 年 6 月 18 日，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到 1985 年，确定双方战略武器总限额为 2250 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限额为 1320 件。同时规定了改进战略武器质量的限度和核查的办法。但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苏关系恶化。卡特政府宣布对苏采取制裁措施，并无限期地推迟将该条约提交美国国会批准生效。1985 年 12 月，苏美两国政府又都表示在新条约缔结之前，将继续“遵守这一条约的条款”。

第三阶段从 1982 年 6 月 29 日到 1983 年 12 月 8 日。主要进行“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美苏各自提出方案，都着眼于从哪方面裁减才对自己有利，占取优势。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中断谈判。1985 年谈判恢复，从 3 月 12 日开始了第四阶段关于空间武器、战略武器和中程核武器一揽子的谈

判。在这一新的阶段谈判过程中，美苏两国首脑亲自出马。1985~1988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作过五次会晤。1989年布什上台后举行过马耳他、华盛顿、赫尔辛基和巴黎四次会晤。每次都要谈核裁军问题，但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89年9月苏联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将战略武器谈判与“星球大战”计划“脱钩”，才开始出现转机。1990年6月两国首脑华盛顿会晤，宣布美苏已就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条款达成了“框架协议”。1991年7月，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美苏将在七年内分别削减战略核武器的11%和36%，即双方各自拥有的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核弹头各自削减到6000枚，苏联将因此减少50%，美国减少30%。条约使美苏双方的战略武器从过去的相互限制变为共同削减，这是一大进步。美苏之所以最终达成削减核武器的妥协，原因是双方核武器均已处于“饱和”状态，都有降低军事对峙程度和减缓军备竞赛的意愿，都把控制军备视为增强两国间战略稳定的途径，视为建立相互信任、减少战争危险的有效措施。这方面的进展，不仅有利于减轻军费负担、增强综合国力，而且更有利于增进两国和整个东西方之间关系的缓和。苏联迫于国内经济恶化和政局动荡，更希望尽早与美国达成核裁军协议，以便腾出手来改变长期形成的畸型军事经济结构，并以外交上的重大成就来稳定国内政局。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比布什多。同时，美国也要支持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地位和他的改革政策，保持东西方缓和的势头，亦愿意促成条约的签订。

“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 80年代，美苏在太空中的军备竞赛日益激烈，双方都在建立太空战略系统。这是因为美苏都已拥有上千枚战略核导弹，足以将世界毁灭数次，而美苏同处于对方战略核武器进攻的威慑之下，出现了“恐怖平衡”。尽管双方仍在继续研制新一代的战略核武器，但单凭进攻性核武器已难以打破目前的均衡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僵持状态，求得自己的战略优势，美苏都加强了反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企图在太空中建立新的战略防御系统来打破平衡。因此，事实上早已开始的“第四战场”（太空）优势的争夺，是美苏双方军备竞赛的延续与发展。在这方面，苏联比美国起步要早，在反卫星武器上已着先鞭，积极推行建立航天站的计划。美国深感威胁，力图赶上苏联。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一项被西方称为“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御计划，主要是要在200~1000公里的高空中建立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以保卫美国国土不受苏联核导弹的攻击。苏联发射的洲际导弹29分钟可以打到美国，经历四个不同的飞行阶段：助推起飞阶段、后助推阶段、中间飞行阶段和再入大气层阶段。“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要在导弹飞行的每个阶段中建立分层防御网，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多次拦截。要求每层防御网拦截的成功率都要达到90%。这样，经过四层拦截后能达到美国国土的核弹头就所剩无几了。80年代以后，里根政府调整了自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代之以“相互确保安全”的战略。“星球大战”计划就是依据这一新的核战略理论提出来的。

里根政府积极推行这一新战略，其一是要以反弹道导弹防御为“盾”，以核进攻武器为“剑”，使美国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优势地位。其二是要利用苏联的“重大经济困难”和技术落后，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西方估计，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用于军费，以此重大牺牲才建立了得

以同美国相抗衡的军备。而当今的“星球大战”却是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对苏联一项新的巨大挑战。美国认为，使苏联感到经济上难以支持和技术上处于劣势，就有可能使它在政治上对美国作出让步。此外，美国还希望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的推行，推动新技术革命，刺激美国整个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因为在新技术革命中占主要地位的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等，无一不是首先为军事目的而研制和发展，然后再转到民用生产领域的。美国一学者断言，发展定向核武器可以刺激生产，“这是一次可以和电的发现相媲美的革命”。美国政府官员诺曼·贝利甚至说，克服世界经济衰退，只有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才能做到。

“星球大战”计划的推行，将会对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将加剧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使美苏军事上的相对均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美国认为凭恃其技术、经济优势可以在军备竞赛中全面压倒苏联，使之就范。但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于1985年5月初就明白宣告，如果美国坚持其计划，苏联也要发展新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事实上，苏联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断研制太空武器，设在莫斯科周围的反导弹系统有64个“橡皮套鞋”式发射设备已经现代化。西方报道说，苏联地面和太空激光武器的研制工作起自1970年，在哈萨克的萨雷恰加纳克有一个战略防御激光器原型，用于摧毁卫星的激光武器经过改进即可摧毁弹道导弹。苏联正在建造一种防御短程、中程和洲际导弹的机动导弹防御系统，已在西伯利亚试验成功。美国一再指责苏联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一座新的巨大雷达站是属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苏联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环地球航天站置放导弹，一分钟内即可打到地面目标，“这个计划可能被看成是对空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采取的一项有效的反措施”，使美国的星战系统难以奏效。总之，美苏任何一方如果建立起自己的空间防御“盾牌”，都意味着在对方头上悬挂一把达摩克里斯剑。当某一方的防御系统已可使对方相当部分的进攻性导弹失去作用时，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就会处于变化莫测的“不确定”状态，从而大大增加了在两国关系上发生危机时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

在太空军备竞赛越演越烈的情况下，美苏各有难处，谁都不能拒绝谈判以求得某种暂时的妥协。1984年6月，苏联主动提出愿同美国就防止“外空军事化”问题举行谈判。美国立即表示同意。苏联提出，谈判一开始就立即暂停试验和部署太空武器。美国则要求把太空武器谈判同被苏联中断的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谈判结合起来。1985年1月，苏美两国外长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商定恢复核武器控制谈判。3月12日，恢复后的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苏联对这次以太空武器为中心的谈判更为急切，它企图利用自己的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的优势以及美国国内和西欧盟国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疑虑，迫使里根政府在太空武器问题上作出让步，达到限制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的目的。里根政府则认为苏联愿意重开谈判，正是美国坚持“星球大战”的实力政策的结果。一再宣称，美国决不能放弃这张“王牌”。但是，里根政府也面临不少困难。它在“星球大战”和中程导弹问题上，尚需进一步协调与盟国的立场。国内要求缓和美苏关系、反对“星战计划”和军备竞赛升级的呼声很高。巨大的财政赤字也使实施耗资上万亿美元的“计划”难以负担。因此，里根政府出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不得不同意谈判，目的还是要乘苏联之难，提高要价。1985年11月19~21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会晤。一年后，1986年10月又在冰岛雷克

雅未克举行会谈。里根对落实“星球大战”计划寸步不让，苏联坚决要求该“计划”只能限于实验室进行，谈判破裂。戈尔巴乔夫指责美国力图通过“战略防御倡议”来取得军事优势，甚至葬送已经达成的协议。

里根政府推行“星球大战”计划遇到众多困难和反对，越来越倾向于分阶段部署太空武器，而不是等到整个系统研制成功时一起全面部署。随着形势的变化，布什总统上台后于1991年决定调整战略防御计划，将其重点转到建立“对付有限打击的全球防护系统”上，称之为“小型战略防御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一、在太空低轨道部署1000枚代号为“智能卵石”的小型智能化截击导弹，构成覆盖全球的拦截网。二、在美国本土部署六个至七个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系统由750枚陆基反弹道导弹以及与之相配套的50颗监视跟踪卫星和地面雷达等组成。这一系统加上“智能卵石”系统，预计能保护美国本土在受到200枚导弹袭击的情况下不受损害。三、发展战区反战术导弹系统。主要任务是对付类似“飞毛腿”导弹这样的战术弹道导弹，以保护驻扎在美国本土以外冲突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军。布什政府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美苏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性已大大减少，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已无必要。但苏联仍拥有大量战略核武器，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又增加了它对美国进行由“意外事故造成的或非官方批准的核导弹袭击”的可能性。另外，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的导弹越来越多甚为不安，担心它会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

战略防御计划是一项耗资巨大的计划，而小型战略防御计划既省钱又实用。据专家估计，“智能卵石”方案全部费用不过250亿美元，仅及“星球大战”计划第一阶段计划的690亿美元费用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欧洲中程导弹谈判 1977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在中程核力量上占了上风，严重威胁到西欧的安全。为了应付苏联这一挑战，北约组织于1979年12月作出“双重决定”：美国尽早同苏联就限制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如果在1983年底以前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则在西欧部署572枚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1980年10月，美苏举行了预备性会谈。1981年11月，正式开始限制欧洲中程导弹谈判。里根于1981年11月18日提出“零点方案”，主张苏联全部拆除针对西欧的SS—20、SS—4和SS—5导弹，美国则不在西欧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使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都为零。苏联11月30日提出“冻结方案”相对抗，主张把美苏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冻结在原有水平上。其后勃列日涅夫提出“分阶段裁减方案”，双方实行对等裁减。第一阶段到1985年各裁减三分之一，第二阶段到1990年裁减三分之一。谈判的第二个回合是从1982年12月安德罗波夫提出“同等裁减”建议开始。苏联表示如果美国不在西欧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它愿意将其欧洲中导削减到与英法同等水平。美国反对把英法独立核力量纳入美苏谈判的范围。第三个回合是1983年3~5月。里根提出美苏在相等基础上就裁减陆基中程导弹达成“临时协议”，主张导弹限额以弹头为计算单位，美国大幅度减少原计划在西欧部署的新式导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把陆基中程导弹减少到与美国同等的水平，从欧洲减下来的导弹不得东移亚洲。苏联拒绝。安德罗波夫表示“准备就既包括运载工具又包括弹头的欧洲核潜力均势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应把英法核武器考虑在内。第四个回合是从1983年9月6日至11月23日。安德罗波夫提出如美国放弃在西欧部署导弹的计划，苏联可以把从欧洲裁减下来的导弹销毁而不东移。里根则建议苏联在全

球范围内对中程导弹实行限制和削减，美国不要求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与苏联在全球部署的中程导弹数量相等，只保留在其他地方部署的权利，同时可以考虑把中程轰炸机列入谈判之内。经过四个回合的谈判，分歧依然很大，美苏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1983年11月，美国开始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先后在英、意和联邦德国三个国家部署了102枚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苏联反应强烈，中断同西方各种裁军谈判。苏联的SS—20导弹则从谈判开始时的250枚增加到387枚，并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了数十枚短程导弹。

1985年初，美苏恢复了包括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在内的日内瓦军备控制谈判。但是，此时西欧中导部署已成事实，且里根已开始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围绕太空武器的斗争相对突出，取代了中导之争而成为军控谈判的中心。在新的谈判中，苏联坚持以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为双方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先决条件，美国则坚决不肯放弃这一计划，立场相背千里，是以双方着重在欧洲中导问题上试探寻求妥协。1987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示，中导可以与“星球大战”计划“脱钩”而单独达成协议，为中导谈判的进展“敞开了大门”。苏美都乐于就欧洲中导达成协议。

西欧原则上是欢迎美苏裁军的。它一贯主张在欧洲维持低水平的军备平衡，希望中导协议将推动整个军控谈判的进程，有助于促进东西方缓和，以利于西欧的安全与发展。然而，西欧又担心美苏达成有损其利益和安全的协议，竭力要对美苏谈判施加影响。西欧国家的主要顾虑是：第一，撤走美国全部中导，欧洲将出现军事力量对比新的不平衡，西欧仍处于苏联短程导弹和常规力量优势的威胁之下。第二，美国部署的中导，是加强美欧防务的纽带，是美国对西欧核保护的重要标志，西欧担心一旦撤除，会同西欧“防务脱钩”。第三，一旦实现了欧洲中导的“零点方案”，英法独立核力量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进一步谈判战略核武器时，难免不把英法核力量牵扯进去。这是英法所不愿意的。因此，西欧国家对美苏中导谈判发展最为关切。英、法、联邦德国频繁磋商，协调以“一个声音”对美苏施加影响，主张中导协议不得导致别的领域产生不平衡。西欧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出发，要求中程导弹裁减必须与短程导弹裁减相联系，核武器裁减必须与常规军备裁减相结合，欧洲不能非核化，核恐怖平衡是战后欧洲和平的保障，应维持低水平的平衡。同时，西欧也要求加强防务合作，强调在 NATO 整体防务中“欧洲支柱”的重要性。在美苏欧洲中导谈判中，里根政府是注意同盟国磋商的，一定程度上要照顾到盟国的某些愿望和保留。针对欧洲防务会与美国战略威慑力量“脱钩”的顾虑，美国声言“零点方案”并不改变美国对西欧承担的义务，美国将继续在西欧部署相当大数目的核武器，大批美国战斗部队将继续驻扎在西欧，同时美国还要有一个庞大的洲际战略武器库。西欧也注意维护美欧团结，基本上支持美国在日内瓦军控谈判的立场。

1987年12月8日，美苏两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在生效后三年内，双方将其全部2611枚中程导弹全数销毁，装载的核弹头也将同时拆除。虽然，中导条约所涉及的导弹类型在核导弹家族中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只占4%左右，但这毕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要从它们的核武库中消除全部中导。它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1990年11月，北约16国和华约6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削减常规武器条约，这些事件对美苏和东西方

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 西欧、日本同美苏关系的变化

西欧联合的加强及其同美苏关系的变化 战后的欧洲一分为二，形成美苏对峙的局面。西欧国家同美国结成了联盟，从经济、政治和防务上普遍依赖美国，处于从属的地位。由于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美国极力笼络西欧盟国，使西欧成为它对抗苏联、东欧的屏障和进攻基地。然而，西欧国家并非甘当美国的附庸，只因自己是夹在两强之间的弱者，不得不从依赖中求生存、求发展。它期望依靠美国的援助以恢复经济，借助美国的力量以抗衡苏联，稳定欧洲局势。西欧国家希望促进西欧本身各国之间的联合，永远消除欧洲国家再度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共谋西欧的振兴，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

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规定“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抵抗任何侵略时，彼此提供援助”；还规定缔约国之间加强联系，以消除它们经济政策上的冲突，协调生产及发展商品交换来组织和协调它们的经济活动。1949年5月，西欧十国签署了欧洲委员会正式章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建立，是实现西欧联合的最初尝试。1952年5月，西欧六国又签订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建立“欧洲军”，试图实现军事一体化。但这一条约因被法国国民议会否决而夭折。1954年10月，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英、法、意、联邦德国等13个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其中规定把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称为西欧联盟，吸收联邦德国、意大利参加。西欧联盟在军事上纳入北约防务体系，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实际上替代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在冷战时期，美苏激烈对抗，出现了三次柏林危机。美国和西欧领导人都强调“俄国的严重威胁”。西欧国家基于安全的考虑，是把西欧联合置于美欧联合之下的，主要是联美抗苏，并非要同美国闹独立性。因此，50年代西欧统一运动，是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美国力图在一个联合的西欧中实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减少法国的抗拒，增加西欧抗衡苏联的力量。

1958年1月，法、联邦德国、意、荷、比、卢六国根据罗马条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欧美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共同体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同美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贸易战、投资战、货币战愈演愈烈。西欧国家联合自强和同美国争平等、闹独立的倾向有所增强。1958年戴高乐再度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积极推行以“法国—联邦德国轴心”为基础的西欧联合，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主地位，由法国取代美国充当西欧盟主，企图建立起足以与美国相抗衡的“第三种力量”。戴高乐一上台就要求彻底改组北约组织，建立一个美英法三大国组成的常设小组，分享北约重要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他坚持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1960年法国成为核大国。1963年，戴高乐断然拒绝肯尼迪提出的要求法国放弃独立核力量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宣布法国对禁止核武器试验不感兴趣。1966年3月，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0月，北约理事会被赶出法国。翌年3月，驻法美军被迫撤走。1963年，法国还同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组成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戴高乐把它看成是与美抗衡的“首要因素”。他公开宣称，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合作“构成了欧洲结构的条件和基础，现在是我们大陆安全的首要因素，将来，它也许是从东方到西方各国间的和平均衡的首要因素”。然而，戴高乐企图建立一个“欧

洲人的欧洲”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其他五国的全力支持。他大力推行法德和解与合作政策的结果，也未能使联邦德国支持他倡议的由法德共同实现的“欧洲的雄心”。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在通过法德合作条约时，特别坚持要增加一个序言，阐明条约不影响联邦德国签订的多边条约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促进欧洲同美国特别密切的合作，包括北约组织防务一体化，实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联合。联邦德国还拒绝了戴高乐用法国核保护伞来取代美国核保护伞的劝告，不愿意因法德合作而背弃大西洋联盟政策。

1973年1月，英国、丹麦、爱尔兰正式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新成员国，共同体从六国扩大到九国。英国最终放弃了“英美特殊关系”和“英联邦特惠制”，加入共同体，这标志着以共同体为主体的西欧国家联合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欧洲共同体扩大，内部磋商和“用一个声音说话”增强，经济实力增长和与东方关系打开局面，西欧国家就要力争同美国做平等的伙伴了。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美国越来越感到联合的西欧的挑战。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西欧联合停滞不前，大大削弱了它对美国挑战的锋芒。1974年6月，北约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签署了《北大西洋关系宣言》，强调加强共同防务，密切磋商和合作，以对付西欧面临的苏联的威胁。共同体国家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欧美仍然矛盾重重，一些长期积累的分歧难以克服。但是，“欧美利益的交融仍然是极其密切，欧洲的均势仍然十分有赖于美国的存在”。西欧和美国毕竟是同一体制下的不同部分。在它们的关系中，有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的因素，同时也有相互需要、相互吸引的因素。西欧一方面对美国高利率进行抨击，另一方面又同意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双方都认为，欧美联盟是需要加强的，然而欧美关系也必须调整。核心是美国必须平等地对待西欧盟国。

西欧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变化也是很大的。1960年3月，戴高乐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会谈时提出著名的“缓和、谅解、合作”三部曲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构想。1966年6月，戴高乐访问苏联，同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以及空间探索和技术合作协定，决定在巴黎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直接通话的“热线”。

联邦德国也努力调整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朝野人士深感继续维持“哈尔斯坦主义”、推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越来越使自己陷入困境。既然美苏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主德国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两个德国的局面已经巩固，联邦德国要解决德国问题，就只能“承认战后现实”，以换取苏联的谅解。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希望打开东欧市场。因此，此时已是“经济巨人”的联邦德国，急切要求重新制定自己的“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

1969年9月，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出任总理，正式宣布实行“新东方政策”，加强“与西方合作”并“与东方谅解”；承认战后欧洲现状，改善与苏联、东欧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两个德国加强联系。勃兰特政府随即向苏联建议，就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进行谈判，苏联立即响应。1970年8月，勃兰特亲赴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无条件地尊重所有欧洲国家的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扩大两国的合作。同年12月，联邦德国又与波兰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协定》，确认两国现有边界“不可侵犯”。这两个

条约被称为“东方条约”。

西欧两个大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冲破了 50 年代的樊篱，对苏联、东欧推行缓和与对话的政策，使欧苏关系改善。西欧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缓和政策是符合西欧的根本利益的，一则对经济发展有利，一则可以带来欧洲的安宁。它们认为，既然现在还看不到欧洲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两个欧洲的局面尚不知将延续到何时，双方只好接受雅尔塔格局这个现实；既然“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两边的欧洲人都有开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需要和愿望，那末，实现政治上的缓和对欧洲各国都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西欧并没有忘记苏联尚有重兵压境，其南下战略又从侧翼包抄西欧，西欧仍然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因此，西欧重视发展防务，一向把加强防务作为支持其缓和政策的后盾。“防务加缓和”实际上概括了西欧的“东方政策”。1977 年苏联在东欧开始部署 SS—20 导弹，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1 年支持波兰军管，这些行动引起西欧国家严重不满，但这期间西欧同苏联的贸易仍有所发展。1980 年，苏联同西欧贸易额为 245 亿卢布，1983 年增加到 317 亿卢布。1985 年共同体国家对经互会欧洲七国的贸易额为 439 亿美元，虽只占共同体世界贸易总额的 3.4%，但却占整个经济发展合作组织与经互会之间贸易总额的 60.5%。西欧同苏联的工业、科技合作也有发展。1983 年，苏法签订了十年科技合作协定，1984 年又签订了 1985~1990 年经济、工业、科技协定。欧洲天然气管道则是苏联与西欧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1984 年 1 月 1 日，苏联开始向西欧输送天然气。西欧感到苏联的威胁，十分重视加强同美国合作，但它也要凭借其资金、技术的优势，加强与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获取经济实惠，保持欧洲和平。

日本同美苏关系的变化 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50 年代中期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6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1965 年，日本对外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到 1973 年，它的出口贸易额仅次于美国和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黄金储备 1978 年达 33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从 70 年代起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与年俱增。1976 年是 53.5 亿美元，1980 年是 99.1 亿美元。日本的海外投资额 1975 年达 580 亿美元。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日本已是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已跻身于西方大国的行列。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形成了日本与美国、西欧三分天下的局面，尼克松称其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70 年代以来，日本一再强调要发挥其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作用。1981 年 7 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其政治大国的分量”。70 年代初，田中内阁修改了战后历届政府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日本同美国的关系由依赖、从属逐渐向“平等的伙伴关系”转变，实行“多边自主外交”，即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借重中国，同苏联抗衡”。日本面临苏联的威胁，需要“继续保持同美国的安全条约”，“继续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虽然日美经济矛盾不断增加，贸易摩擦连续不断，货币金融之战十分激烈，但由于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矛盾总是通过谈判求得缓和。日美贸易摩擦总是以日本的让步而暂且收场。田中以后的历届日本政府仍然强调“日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1981 年铃木首相访美，以声明的形式再次肯定了日美的“同盟”关系。1983 年中曾根首相访美，又进一步明确了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日美同盟关系，强调日美两国是“命运共同体”。日美经济矛盾虽在发展，

但日美合作关系仍是主要的。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继续增强，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日本外交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日美双方都更加重视它们之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56年10月，日本与苏联签署了《日苏联合宣言》，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1961年8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日，提出加强日苏“睦邻关系”的和平、友好、合作三原则。日苏经济、政治关系有所改善。1973年田中首相访苏，同勃列日涅夫签署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战后日苏间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应通过和约谈判予以处理，并承认“北方四岛”属于尚未解决的诸问题之一。但是，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否认苏日之间有什么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并在四岛范围内修建大型军事基地，加强军事力量。由于北方四岛问题，日苏和约未能签订。1977年苏联宣布实行200海里经济区，单方面废除日苏渔业条约，此后日苏渔业斗争趋于激烈。苏联取得金兰湾、岬港和磅逊港作为海空军基地后，日本愈发感到本土及其海上交通的安全受到威胁。日本与苏联的矛盾是全局性的，难以解决。因此，日本要以日美同盟为轴心，加强日美中三角关系，扩大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以抗衡苏联势力。

尽管如此，在经济上日苏双方互有所求。苏联市场，特别是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对日本垄断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联开发西伯利亚也急需日本的资金、技术和机械设备。从1968年7月到1976年3月，日苏就开发西伯利亚资源问题签署了七个合作项目，日本提供15.6亿美元的贷款。1975年7月到1977年，日本又向苏联提供一般项目贷款共18亿美元。1981年3月，日苏签署了第三次远东森林开发计划，日本提供贷款9亿美元。6月签订了合作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协议，规定从1988年起，每年向日本提供300万吨液化天然气和150万吨原油，日本则提供贷款32亿美元。日苏贸易额也增长较快，1968年为6亿美元，1977年为33亿美元，1980年上升到46亿美元。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客机事件，使日本对苏态度冷淡，日苏贸易额逐年递减。1982年为56亿美元，1984年降到39亿美元。70年代日本在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居第一、二位，1984年降到第六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亲自向中曾根提出要全面发展双边关系，争取在各个领域内同日本签订条约或协定，并在“关系亚洲各国人民命运的问题上积极合作”。1986年1月，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日，双方签署了租税条约和1986~1990年贸易与支付协定，确定两国外长定期协商。苏联力图绕过领土问题，促成苏日缔结睦邻合作条约，牵制日美、日中关系的发展，特别希望在日美之间打进楔子，以增强其在亚洲同美国争霸的地位。因此开展对日“微笑外交”，通过“政经分离”手法以密切日苏经济关系，带动政治关系的改善。日本则想利用苏联调整内外政策之机，促使它在归还北方领土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谋求缓解苏联在远东对日本周围的强大军事压力，在经济贸易上取得新的资源和市场。由于各自目的不同，影响日苏关系的北方领土、渔业纠纷和安全威胁三大问题没有改变，日苏关系虽较前有所松动，经济合作有所发展，但“全面发展双边关系”尚无可能。日苏关系的改善仍是有限度的。

第十六章 苏东剧变与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短短的两三年内，共产党相继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和平地让出了政权。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顷刻解体。苏联东欧原来的九个社会主义国家除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外，其他八国分裂成为 27 个国家。这一剧变震动全世界。它使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终结，冷战结束，全球的力量对比态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 东欧政局的剧变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在7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彻底改造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把粗放经济真正转到集约化道路上来。70年代末,波兰经济滑坡,出现危机。南斯拉夫在1982~1985年期间,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不到1%。匈牙利的1985年国民收入比上一年减少1.4%,1986年只增长0.6%。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在80年代经常完不成主要计划指标。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与此同时,东欧各国的外债迅猛增加。波兰外债于1986年达到382亿美元,居东欧各国之首。1988年,南斯拉夫大约有200亿美元外债,匈牙利有180亿美元外债。只有罗马尼亚的外债在减少,从1981年的140亿美元降为1985年的60亿美元。但它是靠大量出口农产品达到的,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上述情况使东欧国家同邻近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曾是世界15个工业强国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奥地利。但是到了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5000美元,居世界第三十三位;而奥地利是17,820美元,居世界第十二位。匈牙利战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芬兰高。到80年代中,国民生产总值只及芬兰的五分之一。保加利亚的经济情况在战前同希腊差不多。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55年还略高于希腊,但到1988年就只有希腊的五分之三左右。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顾本国国情,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设经验生搬硬套在本国实践中去,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并且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感情。东欧各国多次试图进行调整改革,但步子太小太慢,且反复多变,贻误了时机。各国的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暴露出来。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积极鼓励东欧国家变革,并表示不干预东欧事务,任凭事态随意发展。西方国家则利用东欧国家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施加影响。所有这些,为东欧的剧变提供了外部条件。

波捷匈保的政局变迁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的局势一直不稳定。50~60年代的哥穆尔卡改革,70年代的盖莱克改革,80年代的雅鲁泽尔斯基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调整好国家经济。1988年,波兰经济状况再度恶化,罢工浪潮再起。统一工人党于1988年12月~1989年1月举行十届十中全会讨论对策。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2月6日~4月5日,波兰各党派团体,包括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一起举行圆桌会议,就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问题达成协议。会后,被取缔的团结工会、团结农会重新取得合法地位。4月7日,议会根据圆桌会议的协议精神,修改了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增设参议院。议会还通过了新的选举法,重新分配了议会的议席。执政同盟的议席由原来占全部席位的83.9%降为65%,其中统一工人党的议席由53.3%降为37.6%,不再是议会多数党。其余的35%的议席由无党派人士竞选。参议院设100个席位,由各党派自由竞选。

1989年6月,波兰举行大选。统一工人党在参议院未得一席。团结工会获99席,另一席为无党派人士。议会中,执政同盟按规定拥有65%的席位,即299席,其中统一工人党173席、统一农民党76席、民主党27席、宗教组织23席。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反对派获得35%席位中的绝对多数,即161席中的160席。7月,第十届国民大会召开。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

斯基仅以一票的多数当选为波兰总统。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基什查克出面组阁。原来同统一工人党结盟的农民党和民主党议员转而同团结工会代表一起组成国会联盟，否定了基什查克政府。8月24日，议会任命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9月12日通过内阁名单，其中团结工会12人、统一农民党4人、民主党3人。统一工人党仅保留了国防、内务、运输和外贸四个部长职务。马佐维耶茨基政府是东欧国家中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任总理的政府。1989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有关统一工人党领导地位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并将国名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1990年1月，统一工人党举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29日，大会通过决议，宣称意识到统一工人党无法争得社会的信任，因而决定停止党的活动。大会代表决定组建社会民主党，确定奋斗目标是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并选举克瓦希涅夫斯基为最高委员会主席。由于总统和四位政府部长均未参加新成立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成为在野党。它在议会中的席位降为22个，成为议会中最小的政党。

1990年春，马佐维耶茨基总理委任团结工会人士为内务部和国防部副部长，逐步接管了原统一工人党党员执掌的军警大权。5月，通过政党法，禁止各党派在工厂、军队和国家机关中从事党派活动。5月底，通过地方选举，团结工会掌握了地方权力。12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当选为总统。这样，波兰的政权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都被改建。

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事件后，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僵化和停滞状态，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受到严重损伤。捷共内外一直存在着要求肯定“布拉格之春”的呼声。但捷共总书记胡萨克坚持认为它是一场“反革命”事件。1987年12月继任总书记的雅克什也持同一看法。1977年，社会上要求为1968年事件平反的各种力量，以维护人权为旗号，发起“七七宪章”运动，形成与捷共对抗的政治反对派。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捷内部斗争日趋激烈。1989年1月、8月和10月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抗议游行。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大学生集会纪念纳粹杀害学生50周年。这次集会发展成为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有三四万人参加。捷政府出动警察干预，十多名学生受伤，一百多人被拘留。这引起人民的不满，示威扩展到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参加。“七七宪章”等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公民论坛”，要求支持苏联1968年出兵的捷共领导人下台。1989年11月24日和26日，捷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雅克什为首的领导班子辞职。与1968年事件没有牵连的乌尔班内克当选为总书记。11月30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宣称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是错误的。12月4日，苏保匈波和民主德国五国领导人宣布，1968年他们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捷内政的干预，应当受到谴责”。

随着1968年事件的彻底平反，捷政局发生急剧变动。1989年12月3日，阿达麦茨总理宣布改组政府，吸收五名非共产党人参加内阁。公民论坛对此不满，于次日组织20万人游行。7日，阿达麦茨辞职。10日，胡萨克也辞去总统职务。新建政府由21人组成，其中捷共10名。不久，恰尔法总理和两名副总理宣布退出捷共，使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地位大大削弱。12月20~21日，捷共举行非常代表大会，宣布同斯大林模式的党和社会彻底决裂，通过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宣布停止胡萨克等人的党籍，后来又将他们开除出党。捷共的这一决定并没有阻止其地位的进一步下降。12月28日，“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

会主席。次日“七七宪章”组织的发起人、剧作家哈维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90年6月8~9日，举行议会选举。公民论坛获170席，共产党获47席。哈尔法继续受命组阁。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8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法令，决定撤销捷共党员干部在机关、企业和合作社中所任的领导职务。11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地方选举。在捷克，公民论坛得票最多，获35.6%选票，共产党仅获17.2%。在斯洛伐克，基督教民主运动获27.4%的选票，共产党获13.7%。各地方政权也纷纷落入非共产党人手中。

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下逐步取消国家指令性计划，发展市场贸易和私人经济，建立合资企业，生产稳步前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70年代中期，世界发生石油危机，油价猛涨。这给依赖石油进口的匈牙利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困难。匈牙利领导错误地认为石油危机很快就会过去，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反而用大量国家补贴来维持危机行业，造成外债猛增，经济秩序混乱，社会矛盾深化，党内意见分歧。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8年5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不久，党内分歧公开化。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一派占上风。1989年2月，匈党中央宣布，国家实行多党制。5月，卡达尔因病被解除党中央主席职务，一个多月后病逝。6月，政府为在1956年事件中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的纳吉·伊姆雷彻底平反，并举行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1989年10月，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它在东欧各国共产党中第一个把党改建为社会党，并将民主社会主义定为新党的奋斗目标。原党中央总书记格罗斯等人不同意这一决定，重建社会主义工人党。

1990年3月和4月，匈牙利分两轮举行实行多党制后的首次大选。民主论坛获胜，在386个国会议席中获164个席位，占42.7%。社会党获33席，社会主义工人党未能进入国会。5月，新国会授权民主论坛主席安托尔·约瑟夫组阁。他联合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被排斥在外，成为在野党。这样，匈牙利在没有大规模群众运动，没有内部民族冲突，没有剧烈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发生权力转移。

保加利亚从70年代起广泛建立农工综合体，忙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度兴旺的农业在80年代徘徊不前，甜菜、水果、牛羊肉等重要农畜产品的产量还有所下降。在政治方面，党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滥用职权，谋取私利。1984年下令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土耳其居民改用保加利亚名字，引起土族强烈不满和抵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武装骚动。1989年5月保加利亚开放边界，到8月关闭时竟有30万穆斯林移居土耳其。这给保加利亚经济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局势日趋动荡。1989年10月，欧洲环保会议在索非亚召开。一个不足200人的“生态公开性”组织，借机发起签名请愿运动，进而举行集会，指责政府“缺乏民主”、“没有人权保障”、“无新闻公开性”等。11月3日，“生态公开性”组织鼓动4000人游行示威，并向议会递交有1万人签名的关于环保问题的请愿书。与此同时，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日夫科夫被迫于11月10日辞去总书记职务。公众对此并不满足。11月18日，索非亚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审判日夫科夫。12月，日夫科夫父子被开除党籍，并被拘留审查。1990年1月30日~2月2日，保共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宣称党的目标是建设民主与人道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和公检法非政治化。经济上实行所有制多元化和市场经济。4月3日，保

共最高委员会主席宣布将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

1990年1月~3月，保共同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并达成协议。4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法、政党法和选举法。保共领导人姆拉德诺夫当选为第一任总统。6月举行议会选举。在400个议席中，社会党获211席。1989年12月成立的民主力量联盟获144席。社会党领袖卢卡诺夫任政府总理。1990年7月，姆拉德诺夫总统在反对派压力下被迫辞职。大国民议会经过六轮投票才选出民主力量联盟主席热列夫担任总统，社会党人谢麦尔吉耶夫任副总统。10月25日，大国民议会审议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民主力量联盟议员激烈谴责这一纲领，并集体退出会场，使议会无法继续进行。在这关键时刻，社会党领导层发生分裂。卢卡诺夫等人公开要求社会党主席下台。另外有23名社会党议员倒向民主力量联盟。社会党议员由211名减为188名，失去了超过全体议员半数的优势。11月，卢卡诺夫辞职。1990年12月，无党派人士波波夫组成联合政府。在18名政府成员中，社会党和无党派人士各6名，民主力量联盟4名，农民联盟2名。三党各出一名副总理。

1991年7月12日，大国民议会以记名形式通过新宪法，规定保加利亚是议会制共和国，实行政治多元化原则。10月3日，举行新议会选举。民主力量联盟以微弱优势获胜，得到110席，社会党获106席。第三大党是以土耳其族人为主体的权利自由运动，它得到24席。11月，民主力量联盟领导人菲·季米特洛夫出任总理。社会党未能入阁，失去执政党地位。

罗南阿国内局势的剧变 如果说波捷匈保几国的政局变化是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末罗马尼亚则是另一种情况。自1965年以来，罗马尼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齐奥塞斯库，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受到国际称赞，但经济工作中有重大失误。他坚持集中计划体制，使经济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同时，又不顾国家实力，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兴建纪念碑式大工程——多瑙河—黑海运河。据后来公布的资料，1989年罗马尼亚的粮食产量并不是政府说的6000万吨，而只有1823万吨。人民最基本的日用消费品如食品、煤气等供应都得不到保障。冬天的布加勒斯特室温只能勉强维持在零上，入夜街上很少电灯，全城一片漆黑。另外，齐奥塞斯库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排斥异己，培植亲信。他的妻子、几个弟弟和儿子都担任要职，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人民对这一切十分不满。

1989年底，匈牙利族的新教神父拉斯洛·托克什因发表批评政府的谈话，被当局解除神父职务，并被勒令退出供神职人员居住的住宅。12月16日晚，蒂米什瓦拉城的几百名市民、学生和工人在拉斯洛所在的教堂拉起人链，反对强制搬迁。次日，数千人上街游行，遭到警察镇压，一些人被捕，不少人受伤。居民对此感到愤怒，于19日举行数万人抗议游行。全国形势也日趋不稳。20日，齐奥塞斯库慌忙中断对伊朗的访问，回国亲自部署平息动乱。21日，政府在首都中心举行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发表讲话，多次被群众嘘声打断。会后，部分与会群众举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有数万人参加。政府出动军队坦克驱赶群众，造成人员伤亡。22日，抗议游行进一步扩大，并蔓延外地。齐奥塞斯库决定加强镇压。国防部长米列亚因拒绝执行向游行队伍开枪的命令而自杀（一说被处决）。11时，齐奥塞斯库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军队领导拒绝执行命令。中午，派去镇压群众的士兵倒戈，同示威群众一起冲向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飞机逃离，当晚在外地被捕。

1989年12月22日晚11时，前罗共中央书记伊利埃斯库宣布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接管国家政权。同时颁布十点施政纲领：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实行三权分立，取消终身制；取消中央集权经济；改革农业；改革文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保证居民生活需要，停止农产品和石油产品出口；履行华沙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和自由。忠于齐奥塞斯库的特种部队拒绝投降，继续同支持示威群众的部队在各地激烈交火，造成数千人死亡。12月25日，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以后，战斗逐渐平息。1990年5月20日，全国举行大选。伊利埃斯库以85%选票当选总统。在众参两院的524席中，救国阵线获355席，占67.7%。救国阵线的罗曼出任总理。23名内阁成员中，有5名救阵成员，其余均为无党派人士。

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最大的民族是塞尔维亚族，有814万，占全国人口的36%。克罗地亚族442万，占19.8%。穆斯林约占9%，斯洛文尼亚人占8%。此外还有马其顿、黑山、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在宗教、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彼此间在历史上有过不少矛盾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但行政区域同民族划分并不完全一致。在克罗地亚共和国中有60万塞尔维亚人，占共和国人口的12%。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中，穆斯林占到总人口四成以上，塞尔维亚人占三成以上，克罗地亚人约占两成。1974年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拥有处理地方事务的最大主权。各共和国日益形成独立的经济单位，为地方民族主义滋长提供温床。另一方面，各共和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同不发达地区间，存在着隔阂与矛盾。70年代末起，整个联邦经济每况愈下，外债猛增，物价飞涨。政府多次调整，没有根本改进。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各共和国间的关系更趋紧张。

1980年，铁托逝世。联邦一级党政领导职务轮流担任，其目的是防止某一共和国领导人过分强大，但也使中央政权日趋软弱，无力推行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1990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举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各地代表意见分歧，最终导致分裂成为六个共和国共盟组织。5月26日，南共联盟宣布解散。各共和国共盟相继改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民主改革党。

1990年4~5月间，各共和国举行选举。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原共盟失去执政地位。6月25日，这两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南人民军进行干预，发生流血冲突。经谈判，人民军同意退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允诺推迟宣布独立。7月26日，再次爆发激烈战斗。人民军同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武装力量联合作战，在武科瓦尔市和奥西耶克镇附近重创克罗地亚武装力量。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一方面将武装力量扩大到15万人，另一方面下令封锁克罗地亚境内的人民军阵地，极力扩大事态，以求国际干预。9月14日，人民军以解围为由，出动陆海空军分三路进攻克罗地亚，取得重大进展。欧共体出面，主持国际和平会议，冲突双方十多次达成协议，但均不能付诸实施。塞尔维亚继续进攻，直逼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1991年10月8日，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正式宣布独立。同年12月23日，德国率先承认克、斯独立。后来陆续有五十多国也承认其独立。1992年2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派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境内的战火逐渐平息。但波黑共和国内的冲突又起。1992年3月，当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

领导人宣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境内塞族坚决反对，自行成立“塞尔维亚波黑共和国”。矛盾不断加剧，4月演变为流血对抗。战火自此不断扩大。

南斯拉夫内战使国家解体。1991年11月，马其顿共和国宣布独立。1992年4月27日，联邦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联合组成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至此，1945年成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彻底瓦解，分裂成为五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从70年代下半期起，全面闭关锁国。宪法明文规定，阿不接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援助，不允许外国在阿投资。同时在全国各地修建四十多万个碉堡，宣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1985年4月，霍查病故。阿利雅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开始对霍查的政策作一些修正。

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1990年底阿尔巴尼亚出现学生运动。政府政策遭到抨击。阿利雅决定对学生让步，同意实行多党制。反对党随即成立，最有影响的是民主党。1991年3月31日，举行议会选举，劳动党赢得三分之二的席位。阿利雅当选为总统。他辞去了党的一切职务，同时大力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恢复了同美英的外交关系，并成为欧安会第三十五个成员国。6月10日，劳动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劳动党的历史作用已完成，决定将党改名为社会党。11月25日，社会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强调它同其前身劳动党在社会基础、奋斗目标和理论指导三个方面已完全不同。

1991年，阿尔巴尼亚开始实行私有化和向市场转轨。经济出现严重混乱。一半的工矿企业陷于瘫痪，失业率达30%。外债扶摇直上，达到8亿美元。在农村，合作社被解散，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生产未见起色，产值下降一半，粮食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人民不满，不断出现罢工、绝食、骚乱事件，数万人乘船逃往意大利。

社会动荡导致政治危机。1991年上半年，劳动党查尔查尼政府、纳诺的临时政府、只存在22天的专家政府相继倒台。6月12日，社会党人布菲组织多党政府，名曰“稳定国家政府”，但也只维持了半年，11月，因民主党和共和党退出内阁而倒台。12月7日，无党派人士阿赫迈迪组织看守政府。1992年3月22日，举行议会选举。民主党这时已拥有13万党员，超过社会党成为阿尔巴尼亚第一大党。大选结果，民主党获140席中的92席，社会党获38席。阿利雅被迫辞去总统职务。4月9日，贝里沙出任阿尔巴尼亚总统，10日，民主党领导人梅克西受命组织政府。从此，阿尔巴尼亚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第二节 德国的统一

民主德国政局的突变和德国的统一 战后东西方，特别是美苏之间长期而全面的对抗，致使德国统一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1949年两德先后建国，1955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加入北约和华约，1973年又同时加入联合国，1975年一起参加“欧安会”首脑会议最后文件的签字，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并存进一步得到确认。直到1989年秋东欧形势出现急剧变化之前，两德和美苏英法四大国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德国统一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民主德国的经济有较快发展，是东欧国家中最好的，但它的人均国民产值仅及联邦德国的一半。民主德国百姓被联邦德国的高生活水平所吸引，不少人逃往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政府筑柏林墙阻止居民外流，后来又宣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力图削弱联邦德国的影响。这些做法取得一些效果，但多是表面的。1989年9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之中就有一万多民主德国居民利用去匈牙利度假之机，取道奥地利去联邦德国。10月初，又有近万名民主德国公民涌进联邦德国驻捷使馆。民主德国被迫同意这些人前往联邦德国。10月7日，民主德国庆祝建国40周年。柏林、莱比锡等城市爆发示威游行，要求扩大民主，实行改革，放宽出国旅行。警察用高压水龙冲散游行队伍，拘捕数百人。全国形势动荡不安。执政18年之久的昂纳克被迫于10月18日辞职。克伦茨接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11月13日，莫德罗接替斯多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各级党政领导也大量易人。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将昂纳克、斯多夫等12名领导人开除出党，同时宣布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负责筹备党的非常代表大会。12月8~9日和16~17日，统一社会党举行非常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宣称民主德国应建立一个实现民主、建立法制、人道主义、社会平等、重视环境保护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大会选举居西为党的主席，莫德罗等三人为副主席。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允许居民自由过境。两天中，有75万民主德国人涌进联邦德国。这股洪流把象征分裂的柏林墙“推倒”，使统一问题成为全德人民共同关心的焦点。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抓住时机，于11月28日提出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要求民主德国建立一个“民主合法的政府”，尽快实现统一，并建议两德就建立邦联问题举行会谈。民主德国政府反对科尔提出的计划，认为科尔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明确这种邦联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邦联，认为两德统一问题尚未提上日程。不久，莫德罗政府改变态度，于1990年2月1日建议通过两德缔结睦邻条约、建立邦联、主权移交邦联、民主选举等四个阶段实现德国统一。

在两个德国迅猛兴起的统一浪潮推动下，美苏英法四大国不断调整其对德政策。1990年2月13日，两德同四大国在渥太华共同制定了先由两德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内部”问题，再由两德同四大国一起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即所谓“2+4”方案。联邦德国更加抓紧对民主德国的工作，以“内部”的进展力促“外部”问题的迅速解决。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人民议院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三党组成德国联盟。它提出尽快实现统一的竞选纲领，赢得了相当多选民的好感。联邦德国联盟党公开出面支持德国联盟。科

尔六次亲赴民主德国参加竞选集会，明确表示只有德国联盟上台，联邦德国才能大规模帮助民主德国。结果德国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得 48% 选票，社会民主党得近 22% 选票，民主社会主义党得 16% 选票，自由民主联盟得 5% 选票。4 月 12 日，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被任命为总理。新政府由 24 名成员组成，其中基民盟 11 名，社民党 7 名，自由民主联盟 3 名。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从长期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德梅齐埃政府加快与联邦德国谈判统一问题。1990 年 5 月 18 日，两德财政部长签署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规定从 7 月 1 日起，两德都使用联邦德国马克，民主德国马克停止流通。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养老金、退休金等全部按 1 : 1 支付联邦德国马克。现金和银行存款按年龄分为三个档次，按 1 : 1 分别兑换 2000、4000 和 6000 联邦德国马克，其余按 2 : 1 兑换。条约还规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联邦德国的劳动法规。7 月 12 日起，东西柏林的边界卡全部撤销，拆除柏林墙。

货币联盟实施后不久，两德于 7 月 6 日开始关于政治统一问题的谈判。1990 年 8 月 31 日，在东柏林签署了两德实现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规定东西柏林合并，民主德国恢复 1952 年 7 月行政区划改革前的五个州的建制，按联邦德国《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9 月 19 日和 20 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分别批准了这一条约。

德国统一是涉及欧洲各国利益和安全的重大问题，各国都十分关注德国的统一进程。而德国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一直受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的某种监控。因此，科尔政府在大力推进同民主德国内部统一的同时，利用“2 + 4”外长会议，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四大国对德国统一的同意和支持。科尔政府“保证忠于北约和欧共体”，统一后“不走德国特殊道路”，努力消除西方国家对统一后德国发展前景的担忧。接着，又明确表示承认波兰西部边界。1990 年 7 月 17 日又在第三次“2 + 4”巴黎外长会议上就德波边界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从而排除了阻碍德国统一实现的一个问题。苏联坚决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但两德越来越形成一体，“2 + 4”会议日益成为两德和西方三国为一方与苏联为另一方的会谈。苏联处境孤立。科尔为争取苏联交出德国统一的“最后一把钥匙”，决心从德苏之间的双边交易突破。7 月 15 日，他访问苏联时，表示永远承认战后边界，包括不向苏联提出曾属于德国的哥尼斯堡（后称加里宁格勒）的领土要求；答应把德国统一后的武装力量裁减到 37 万，保证不染指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允诺向苏联提供 120 亿马克的无偿援助和近 100 亿马克的低息贷款，从而换取了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后可“自由决定其联盟归属”，同意苏军在三四年内从德国东部撤军。正是这些突破性进展，有力地推动了“2 + 4”会谈的进程。1990 年 9 月 12 日，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2 + 4”会议，各国外长签署了《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

莫斯科条约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被认为是实质上的对德和约。它宣布，四大战胜国结束作为占领国对德国和柏林的权利和责任，统一的德国对内对外拥有完全的主权并可自由结盟。条约确定德国现有领土和边界的最终性，规定苏军 1994 年底前撤离原民主德国的地区，苏军完全撤走前，只驻扎不属北约的本土防御部队，苏军撤走后，德国可在东部地区部署隶属北约的其他德国军队。德国声明奉行和平政策，放弃制造、拥有和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保证在四年内将军队裁减 45%。10 月 1 日，四大国外长

在纽约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从10月3日两德统一之日起中止四大国对德国和柏林的权利和责任。至此,有关德国统一的一切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都已圆满解决。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联邦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升起了联邦德国国旗。分裂了四十多年的德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德国统一后,根据8月3日两德签署的选举条约,决定在1990年12月2日举行全德大选。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共获43.8%的选票,在联邦议会总共662个议席中占有319席。自民党获11%选票,占79席。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为33.5%,占239席。民主社会主义党仅获2.4%选票。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传统执政联盟,于1991年1月17日联合组成统一后的首届联邦政府,科尔继任总理。

经互会的活动及其终结 1949年1月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时,只有苏、保、罗、匈、波、捷六国。后来,阿尔巴尼亚(1949年2月)、民主德国(1950年9月)、蒙古(1962年6月)、古巴(1972年7月)、越南(1978年6月)陆续加入。但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退出。此后,经互会共有十个正式成员国。南斯拉夫从1964年起,根据专门协议参加经互会的一些活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老挝、莫桑比克、尼加拉瓜、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作为观察员参加经互会的活动。

经互会十国的面积达2539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总面积的18%。人口有4.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它的经济实力雄厚,在世界总值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国民收入占25%,工业产值占33%,农业产值占20%。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经互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落后于西方。1980年经互会十国的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欧洲共同体九国的二分之一。

经互会的活动,在初期主要是扩大各国间的贸易往来,50年代扩大到生产领域,相互间组织科技合作和经验交流,并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1962年6月,经互会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为制定经济合作远景计划奠定了基础。1969年,经互会成员国首脑会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并着手拟定进一步合作的措施。1971年,通过《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综合纲要》,规定在15~20年分阶段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金融的一体化。

根据上述决议,经互会各国间经济往来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在经互会成员国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它的国民收入占经互会总收入的三分之二,所以经互会内部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同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苏联向各成员国出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并且用卢布结算。这对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由此产生各国在能源上对苏联的依赖。经互会国家除匈牙利外都欠苏联债务。

在一体化方面,从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东欧同苏联的合作项目共有一百五十多项。它们共同铺设了一条从乌拉尔奥伦堡油田到东欧的天然气管道,修建了75万伏高压输电网,在乌克兰赫麦利尼茨基建设了核电站等。1985年12月,经互会国家签订了到2000年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着重解决国民经济电子化、全盘自动化、原子能动力工业、新材料和生物工程五个方面的问题。

1989年,东欧剧变。各国先后转向市场经济,而经互会不以国际市场价格进行贸易,不用可兑换货币结算,已不适应新要求。另外,东欧各

国急欲扩大同西欧的联系，认为经互会是一种束缚。因此，经互会第一百三十四次执委会于 1991 年 1 月提议解散本组织。1991 年 6 月，经互会举行第四十六次大会，正式宣告解散。

第三节 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

八一九事件 1990年，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苏共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我们正在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官僚主义体制决裂”，争取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国际主义和全人类价值”。纲领草案还宣称，苏共将“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愿意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和合作”。3月12~15日，苏联召开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中有关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绝对领导地位的条款。大会决定实行总统制，以使党和国家分开，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卢基扬诺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后，戈尔巴乔夫建立了总统委员会，任务是制定有关苏联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国家安全措施。这样，总统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政治局成为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

1990年5月，雷日科夫政府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遭到反对。7月，沙塔林在叶利钦支持下提出激进的500天计划。戈尔巴乔夫出面折衷，于9月提出阿甘别吉扬方案。10月，最高苏维埃通过戈尔巴乔夫方案，规定有控制地放开价格，逐步实行对工业企业及其他领域的大中企业的非国家化，迅速实行对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及其他部门小型企业的私有化，建立以公有制（国家、集体）为主、私有制为辅的混合经济。但方案未规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日程和细则。叶利钦公开反对这一方案。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实行沙塔林的500天方案。

1990年7月2~13日，苏共召开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正式确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党的理想。根据这一思想，在政治体制方面，放弃一党制，宣称“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搞“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允许国家、集体和公民所有制经济在平等基础上竞争。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党中央委员会选出24名政治局委员，除戈尔巴乔夫外都不担任政府职务。政治局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党内的激进派分子如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等人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退出苏共。党组织日趋涣散。

1991年，苏联的经济政治局势全面恶化。1月，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出任政府总理。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扭转经济负增长，政府连续采取几项经济改革措施，大幅度提高消费品价格。这引起群众不满。3月，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二次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有30万工人参加，使三分之一矿井停产。国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苏联内部的民族分立之风愈刮愈烈。早在1990年春，波罗的海三国首先宣布独立并脱离苏联。接着，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也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声称本共和国的法律至高无上。在联盟完整性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坚决抛弃斯大林的就其实质来说是单一制的国家模式，完全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原则”。1990年11月，公布新联盟条约草案，规定除国防、外交和牵涉全国经济命脉的经济部门仍由联盟中央掌握外，其余均归各共和国所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表示不会在这项条约上签字。其他加盟共和国则要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80%的公

民参加了投票，其中 76.4% 的选民赞成保留联盟。这以后，戈尔巴乔夫同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反复协商，于 8 月 14 日公布新联盟条约。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本国领土内的全部权力，将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确定于 8 月 20 日开始分批签署此条约。

1991 年 8 月 19 日清晨，也就是预定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前一天，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当时正在克里木半岛福罗斯度假的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随后，又宣布在莫斯科等地区实行六个月的紧急状态，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紧急状态委员会由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组成。委员会还发布第一、二号决定，规定对报纸进行严格监督并禁止游行示威和集会，只允许《真理报》等九种报纸出版。当天上午，装甲车、坦克和军队开进莫斯科。

非常消息播出后，两个月前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立即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中召集要员商讨对策，决定全面反抗。会后，立即前往莫斯科市内的俄罗斯政府大厦“白宫”，发表《告俄罗斯公民书》并签署四项命令，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反宪法的组织，实行紧急状态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该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号召举行无限期总罢工。苏联跨共和国矿工独立工会宣布，从 20 日起顿巴斯等地矿工开始总罢工。

8 月 20 日晨，塔斯社公布，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由第一副总理代行职权。这一消息引起许多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利的流言和猜测。形势出现转折。西方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叶利钦，不承认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中止对苏联的援助。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谈话，要求“严格遵循宪法原则”来摆脱困境，建议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政治形势。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先后声明不实行紧急状态。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并对履行命令者追究刑事责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委员会派遣坦克和军队包围了“白宫”。但 10 万莫斯科群众自动前往白宫守卫，使那里的坦克无法动弹。紧急状态委员会又命令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于 21 日凌晨去攻打“白宫”逮捕叶利钦，但遭到拒绝。其他接到命令的空降兵和内务部的部队也按兵不动。攻占白宫计划流产。驻守在莫斯科周围的多数部队以不能向人民开枪为由拒绝出动。紧急状态委员会处处陷于被动。

8 月 21 日上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向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紧急状态委员会，释放戈尔巴乔夫。下午，国防部宣布，决定将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随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定，认为停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责“是非法的”。同日下午，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飞往克里木半岛去会见被软禁在那里的戈尔巴乔夫。但后者拒绝会见他们。随后，俄罗斯联邦的副总统和总理也到达克里木半岛，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8 月 22 日凌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重掌政权。历时三天的事变以失败而结束。

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 戈尔巴乔夫重掌权力后，立即撤销由国

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的一切决定，解除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不久，又下令逮捕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逮捕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内务部等重要部门进行全面改组。成立由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为首的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8月24日，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八一九事件”中“未能站在谴责和抵制的坚决立场上”为由，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和地方党组织则自行决定其前途。戈尔巴乔夫还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武装力量、内务部、克格勃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变后国内形势的决定》，决定暂时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由内务部负责党的财产和档案，责成检察院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各共和国的共产党或被禁止活动，或自行宣布停止活动或脱离苏共、更改党的名称。执政多年的苏联共产党顷刻瓦解。

“八一九事件”后，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联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9月6日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其他共和国如乌克兰（8月24日）、白俄罗斯（8月25日）、摩尔多瓦（8月27日）、阿塞拜疆（8月30日）、乌兹别克（8月31日）、吉尔吉斯（8月31日）等也相继宣布独立。但它们并不反对加入新的联盟，只是联盟条约的内容须作重大修改。戈尔巴乔夫极力想保持联盟的存在。他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十个共和国领导人共同达成“10+1”声明。9月2~5日，苏联召开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基本赞同“10+1”声明，认为各共和国应自愿协商起草和签订一个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每个主权国家都可以自主地选定参加联盟的形式；呼吁所有共和国立即缔结经济联盟，以便在统一的自由经济区域范围内相互协作。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政权机构和管理机构法》，决定成立由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参加的跨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内外政策问题。

10月1日，1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会晤。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领导人未参加。会议发表12国联合声明，确认必须立即缔结主权共和国经济共同体条约。拉脱维亚没有在声明上签字，但保留作为联系国参加条约的权利。10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八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主权共和国经济合作条约，以形成统一市场，并采取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11月6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签署了这一条约。

10月21日，苏联新组成的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但出席会议的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代表。会议商讨了联盟的未来政治结构问题。11月1日，参加经济合作条约的各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议，决定从11月15日起取消联盟的约八十个部和其他机关。在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的结构中只保留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文化部、交通部、核动力部和海关管理局等。11月14日，跨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修改并原则同意了新的联盟条约草案，确认未来的主权国家联盟是“一个邦联式的民主国家”。会议预定11月25日草签这一条约。但是，在25日的会议上，各共和国代表对未来的联盟叫邦联国家还是叫联邦发生分歧。最后，国务委员会决定将条约草案公布，交各共和国议会讨论，以便在年底以前签署。

在新的联盟迟迟不能建立的时候，乌克兰于1991年12月1日就其独立

问题举行全民公决。83%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0%以上的人赞成乌克兰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现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在5日宣誓就职时，明确宣布乌克兰不会签署新的联盟条约。这使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受到致命打击。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先是发表声明，说“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后来，感到无力扭转这一发展趋势，改口说将同意各国的选择。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中亚五国以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等11国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会晤，签署了六个文件。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以均等原则建立，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平等。决定建立独联体最高机构——国家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以协调各国在共同利益范围内的活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决定由俄罗斯总统同参加核武器协定成员国元首协商作出。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支持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12月24日，格鲁吉亚宣布申请加入独联体。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他还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把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通过宣言从法律上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第四节 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二战后出现的雅尔塔体系，由于苏东剧变而不复存在。

雅尔塔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两极对立格局，即德国分裂，欧洲一分为二，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争霸。雅尔塔体系在战后四十多年来经受多次猛烈冲击，但仍然得以维持，主要是因为这种格局符合美苏全球的战略平衡和欧洲地区的力量均衡，也符合苏美与东西欧盟国之间的实际力量对比，在东西方激烈对抗、两大集团紧张对峙条件下，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对立体制压倒一切，东西欧国家向各自盟主靠拢。美苏尽管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却默认对方的势力范围，不敢贸然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因而冷战、对抗、紧张和不断出现危机成为这种格局的特征。在这种两极格局下，美苏争夺造成世界局势的动荡和紧张，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

美苏为称霸全球、争夺核优势，双方都以超出自己国力的财力、物力去发展核军备，其结果使双方的核武库恶性膨胀，都拥有毁灭对方多次的能力。核军备竞赛极大地损伤了美苏自身的经济。美国在西方经济大国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高赤字、高债务、高逆差等困难困扰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苏联付出的代价比美国更大。据估计从60年代中到80年代中的20年里，苏联军备竞赛费用每年平均占国民收入的16%左右，美国占6%~7%。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恶果导致苏联经济滑坡，引起社会危机。因此，双方都需要缓解核竞赛的势头，缓和彼此的紧张关系，从而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转折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接连发生几件牵动全局的重大事件。1987年底美苏签订销毁在欧洲的全部中程导弹的条约，裁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1989年2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安哥拉内战停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也出现转机，地区热点明显降温，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前景较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

在这种转折性变化中，美苏双方的战略态势是不同的。苏联作出了全面退却的选择，无论在核谈判中或地区间问题上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以改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困难问题。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沿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方向进行了调整，允许东欧各国自己决定本国的内部事务，鼓励和推动东欧各国变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的影响和西方的推动下，1989年下半年东欧局势出现了剧烈变化。各国党政领导人大换班，大幅度地调整内外政策。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变化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认为东欧的做法是贯彻其“政治新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服从于同西方增进联系，特别是在经济上同西方一体化的需要。在东欧剧变后，苏联愿意并致力于和东欧各国建立和发展一种和战后完全不同的新型关系——纯粹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通常关系。

由于东欧发生剧变，美苏首脑于1989年12月举行马耳他会晤，两国在东欧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谅解，标志着东西方冷战时代的结束，美苏开始建立一种伙伴式关系。美国并同意了苏联的建议把原定于1992年举行的欧安会续会提前到1990年举行。1990年11月，举行欧安会巴黎首脑会议。北约和华约成员国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不再互为敌手，相互间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友好相处”。欧安会34国签署了《新欧洲巴黎宪章》，强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各国今后的关系将“建立在彼此合作和尊重的基础上”。《宪章》决定使欧

安会制度化和机构化，增强其在欧洲裁军、政治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职能。可以看出，欧安会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这是近年来欧洲各方面力量消长和欧洲形势急剧变化的结果。

东欧变化使华沙条约组织失去存在的基础。1990年2月，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协议，确定在1991年底以前撤走全部驻捷苏军。3月同匈牙利达成协议，在1991年6月30日前撤走全部驻匈苏军。9月，又允诺在1994年底前分批撤回驻德的36万苏军。苏军的撤离使华约日益失去军事同盟性质。1990年6月，华约政治协商会议提出要“重新研究华约的性质、职能和活动”。会后，匈牙利表示要退出华约。其他国也表示有同样打算。1990年9月24日，民主德国正式退出华约。这样，华约未经改造已走向解体。1991年2月25日，华约国家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会晤，决定解散华沙条约组织。4月1日，华约的军事机构解散。7月1日，布拉格议定书宣布华约的政治机构解散。这以后，东欧和苏联又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条约。苏联想在条约中写入“缔约双方不得加入对方认为是‘敌对的’任何军事联盟”的内容，但大多数东欧国家都抵制了这一要求。他们只希望能在保持同苏联友好关系的同时，自由地选择其他盟友，而不再充当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区。

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使得以美苏全球范围的战略平衡和欧洲地区的力量均衡为基础的东西方力量平衡向西倾斜，突破了以两大集团对峙、美苏分治欧洲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结构。1991年12月，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超级大国彻底瓦解，使旧有的东西方关系到此终结。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不再受制于昔日东西方关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冲突、军事对抗部署和联盟结构等因素。欧洲总的趋势是：西欧要合，苏联要分，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则在西靠。从大的战略关系上来看，原来的中美苏“大三角”已经消失，美中关系、美欧关系、美日关系、英法德关系等，都在变化和调整。过去在两极对立体制下，形势是紧张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是稳定的，是一种“紧张的稳定”。现在美苏军事对抗这一旧的紧张因素消失，使世界总的形势趋于缓和。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裁军在进展，一些地区热点纷纷降温或走向政治解决。但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原来许多被两极对峙所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一些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增长，这又使形势发展呈现出动荡不安和复杂多变的特征。因此总的形势虽然缓和了却也更加动荡了。

总之，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这是一个大的转折，标志着战后以美苏两极对立体制为核心的旧格局已经终结，世界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向多极化过渡的时期。

第十七章 90年代的美国、欧洲和日本

第一节 90年代的美国

布什政府 共和党人布什于198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两德统一，伊拉克战败，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所有这些使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似乎达到了胜利的顶峰。但是，外交上的成功并不能缓解国内矛盾的加剧。

美国经济从1982年以来，一直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83年的32,757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3,922亿美元。但赤字和国债问题十分严重。里根执政期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已失去控制，八年间每年平均超过1600亿美元，有些年份竟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累计财政赤字高达12,916亿美元。贸易赤字每年有1500亿美元左右。国债则超过2万亿美元。布什政府采取灵活冻结开支的办法以平衡预算。这一措施在初期曾起了一定的作用。1989年的财政赤字比上一年略有减少，但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因为占联邦支出80%以上的军费、对低收入居民的补助、社会保险和国债利息几大项开支，削减的回旋余地都极小。虽然美苏关系日趋缓和，客观上已为削减军费开支创造了条件，但是，美国要确保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军费开支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且涉及各大财团的私利。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同意1991年度削减军费90亿美元。这只占赤字的4.5%，对于巨额赤字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布什政府原指望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在企业利润增加的基础上，政府的收入也会增长。但这一希望也落了空。布什总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竞选诺言，于1990年6月宣布增加税收以减少联邦预算赤字。然而，增税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利影响。它增加企业费用，抑制投资，减少消费者需求，导致经济增长放慢。1990年7月起，更陷入衰退之中。1991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下降了0.7%。据美国《时代》周刊1991年11月公布的民意测验，公众对布什的支持率从海湾危机期间的90%的最高峰，下降到46%。

社会危机特别是种族矛盾是布什政府面对的另一重大问题。1992年，3100万美国黑人中，有3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失业率高达14.2%。黑人对自己的处境十分不满。1991年3月3日，黑人青年罗德尼·金因超速驾车遭到四名白人警察狂暴殴打。1992年4月29日，洛杉矶地方法院宣判这四名警察无罪，引起黑人群众的强烈愤怒。当天下午，数千名黑人涌上街头抗议，很快发展成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到5月2日才平息下去。有五十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一万多人被捕，五千二百多座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达七亿美元。为了平息这场暴力冲突，布什政府调集了数万名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队员，出动大批装甲车，与当地军警一起在市内执行戒严和宵禁。除洛杉矶外，美国其他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等也相继发生群众示威和暴力冲突。这是自60年代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运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

洛杉矶事件和经济的衰退引起社会的不满。群众要求政府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国内事务上来。同时，人民对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能否扭转经济衰退之势也日益失去信心。这一状况使荣耀一时的布什在竞选连任总统时败于民主党手下。

克林顿政府 1992 年，美国举行新一轮的总统选举。民主党内持中间路线的克林顿一直遥遥领先，很早就把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哈金和克里逐出预选进程，而稳获党内提名。共和党内，极右翼的布坎南向布什提出激烈的挑战，但最终遭到失败。11 月 3 日举行全国大选。克林顿以 370 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击败布什和独立候选人佩罗，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民主党人在野 12 年后，重又入主白宫。

46 岁的克林顿是一位二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上台后，雄心勃勃，宣称要“实行变革以振兴美国经济”，使美国“更强大、更先进、更安全”。他摒弃了共和党政府推行 12 年之久的里根经济学，基本继承了民主党重视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用行动主义代替放任自流。为此，他在白宫内成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统筹和协调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克林顿也没有完全回到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上去。他否定民主党的“大政府”和“大赤字”政策。他说他的政策“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保守主义的，它两者兼而有之，而又有所不同”。他自称为“新自由主义”。

克林顿上台前的 1992 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 2902 亿美元。它使国债高筑、美元疲软，投资者望而却步，经济回升乏力。政府决定首先向它开刀。克林顿宣布裁减白宫工作人员 25%，降低留用人员薪金 6%~9%，预计四年内削减政府开支 2470 亿美元。同时计划在四年内增税 2460 亿美元。规定向占全美人口 1.2% 的富人大幅度增税，他们的纳税额将占增税计划总额的 60%。克林顿的这一决策取得成效。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下降，1993 年度较上一年度下降 12%，1994 年度又下降 20%。

社会保障制度是困扰美国的另一大问题。它不仅费用扶摇直上，而且弊病丛生。早在 1975 年社会保障财务赤字就已达 15 亿美元，以后逐年增加。其中医疗保健费用更是惊人，1992 年高达 8385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国家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又造成一些人的依赖心理，他们找到工作后仍宁肯失业。全国约有七八百万人靠接受福利救济度日。他们中不少人还享受医疗保险，而许多工作的人反而享受不到。全美大约有 37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克林顿认为，美国福利制度“不起作用，它否定我们的价值观”，必须“彻底改革”。他上台后几天就任命夫人希拉里负责主持制定一项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计划。两周后又签署了曾遭布什总统否决的“家人就医准假法案”。9 月，正式向国会提出改革医疗保健制度的计划，主张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医疗费用。他提出要在四年内将政府用于医疗补助的费用减少 384 亿美元。1994 年 1 月，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又把改革医疗保健制度列为美国政府当年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他强调要把医疗保险扩展到全体居民。克林顿想以改革医疗保健制度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他主张降低人们对福利救济的依赖程度，要求减少对有劳动力的穷人发放救济的时间。主张提高被救济人的自立水平，对无职业技能或文化水平低下者提供免费培训，政府投资开办服务业，为上述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克林顿的改革计划引起激烈争论，至其第一任期结束前仍未被国会通过。

克林顿政府为了对付全球性经济竞争，强调面向未来的投资，宣称“把联邦开支重点从消费转向投资是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标志。我们不仅致力于控制政府的开支，而且把它导向更有生产性的用途上”。克林顿提出，在四

年内向基础设施、环境净化工程、教育和研究机构投资 2200 亿美元。1993 年，国会两次讨论总统的长线投资计划，将其金额砍去了一半。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克林顿重视发展对外贸易，把它视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因素”。1993 年底，促进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1994 年初，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协议，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美洲首脑会议，密切了同美洲和亚太地区的经济来往，定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克林顿宣称要坚持“公平合理”和“对等原则”。实际上是，在他认为搞自由贸易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搞自由贸易，在认为不利的地方就指责对方不公正，搞保护主义直至采取制裁行动。

克林顿认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滑坡。他提出要大力提高教学水平，统一全国教学标准，对学生进行统考，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他要求拨款帮助穷困者进入大学深造，要求各大公司拿出利润的 5% 用于在职培训。

克林顿采取这些措施后，经济由缓慢复苏转向加速增长。1993 年增长了 3.0%，1994 年又达 4.0%。失业率则由 7% 降为六年以来最低水平的 5.8%。

尽管克林顿政府取得一些政绩，但在 1994 年底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却遭惨败。在参议院中，民主党由选举前的 56 席跌为 47 席，而共和党则由 44 席增为 53 席。在众议院中，民主党由 256 席降为 204 席，而共和党则由 178 席增为 230 席。民主党自 1955 年以来第一次在众议院成为少数党，而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在 36 个州的州长改选中，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走 11 个，从而获得了全国 50 个州中 31 个州的州长职位。民主党的失败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1994 年美国的经济形势虽然不错，但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却几无增长，因此并没有多大热情去投民主党的票。另一方面，社会治安问题日益成为头号关注的问题。共和党历来主张严厉打击犯罪，受到群众的支持。民主党失败还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多是少数民族、劳工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参政意识不强，投票率低。群众中历来存在着反对当政者的情绪。再加上一些民主党老牌政治明星退休，新推出的民主党候选人声望不够，更使民主党丢失许多席位。

新国会成立后，共和党利用它的优势地位，不断向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放弃“大政府”政策，在预算方案中，提出要在七年内减少开支 4650 亿美元。共和党对平衡预算的原则并无不同意见，但提出减少开支 8120 亿美元，急于要克林顿在其任期内大量削减福利开支，打击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中下层群众。克林顿不肯让步。双方争执不下，国会通不过预算方案，拨款难以到位，导致 1995 年 11 月和 12 月政府部门两次关门停止工作。

第二节 90 年代的西欧国家

苏东剧变震动了西欧，使西欧局势进入新的变化时期。当然，这种变化同东欧不同，不带有根本性。但同前一时期的平稳发展相比，也有很大不同。

苏东剧变首先使西欧各国左翼受到冲击，意大利共产党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先后更换党的名称，修改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各国社会党的影响力也普遍下降。不少左翼和中左翼党派向右转。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极右翼发展。但没过几年，又出现一股向左的逆向回流。不过，左翼并没有完全回归到冷战时期的立场。左右两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明显削弱。人们也较少地注意政治理想，而是从实际利益出发来决定投哪个政党的票。结果，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区别日渐模糊。原来最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大党（如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势力受到削弱。中小党派力量上升，更多的党派进入了议会和政府。政治权力趋于分散。一两个大党独立执政或在内阁和议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状况发生变化。各国进一步向多元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严重冲击了西欧的传统执政党，使许多国家内阁更迭，政局不稳。

德国统一大大改变了西欧原来的力量均势格局。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的联盟与合作。另一方面，又使欧洲一体化进程更为复杂曲折。

西欧各国的经济在 80 年代持续发展之后，于 90 年代发生转折。英国于 1990 年最早出现经济衰退现象。实力较强的德国经济也于 1992 年转为恶化。各国经济普遍不振，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1993 年，英国经济初露回升苗头，德法等国却仍无起色。但北美经济复苏和世界市场的活跃，扩大了西欧国家的出口，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复苏。1994 年，各国经济普遍好转，除冰岛和希腊外都恢复了 1% 以上的增长率。各国没有像以前那样，用放松银根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保持稳定增长。但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展不快，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严重。1994 年，西欧平均失业率由上一年的 9.3% 提高为 9.8%。1995 年初，德国马克贬值，导致欧洲货币体系发生危机。但就整体而言，这一年西欧经济继续平稳增长。

德国 德国统一后，国内最大的问题是尽快完成东部经济和政治的转轨工作。从原先的国家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50% 以上的劳动力要作较大的变动。另外，东德马克对西德马克的兑换率定得过高。当西德马克引进东部地区后，原来以东德马克计价的商品价格明显偏高，缺乏市场竞争力。东部居民急于同西部拉平收入，导致产品的劳动成本增长过快，使东部企业的产品更加卖不出去。企业不得不减产裁员，以至倒闭。两德统一后，德国东部经济持续下降，1991 年下滑 30.3%。失业人数直线上升，到 1991 年底，东部丧失了 243.5 万个就业机会。到 1992 年，东部的经济产值由统一前占全德产值的八分之一减为十二分之一。为了支持东部经济转轨和复兴，保障社会安定，联邦政府通过“德国统一基金”、“振兴东部计划”、各种税收和投资优惠政策及社会福利等渠道，每年向东部大量“输血”。1991~1994 年，西部向东部净投入总计达五千多亿马克，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公共投资，三分之二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险和各种消费。

为了进行东部地区的企业私有化工作，1990 年 6 月政府成立了托管局。原来估计东部资产为 6000 亿马克，通过私有化，托管局可以获取 2500 亿马克的收入。但是，东部企业技术落后，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市场行

情又不好。1994年底托管局结束工作时，仍有25家4000人以上的大企业没有找到买主。同时托管局还留下2500亿马克的债务。

东部地区的经济转轨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几年的调整改造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1994年基本实现了私有化。原来的八千多家国营企业，三分之二被西部或外国企业购买，三分之一由东部原企业负责人或职工购买。它们改变成为1.5万家私人企业。同时在东部地区又新建了4.5万家中小型私人企业。经济从1992年起开始回升，很快由复苏转入快速增长时期。住房和公共设施的建筑发展最快。1994年建筑业比上年增长22.5%。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新建和改建的公路有七千多公里，相当于统一前拥有的公路总数的一半以上。东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欧洲之首，1993年为5.8%，1994年为9.2%。通货膨胀率由1991年的12.8%降为1994年的3%。东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在统一前只及西部的30%，1994年达到70%以上。工人工资每年增加20%以上。商店从过去的2万家增加到15万家。商品不仅种类齐全，而且质量也是过去无法相比的，人民生活较前有了很大改善。

统一后，东部地区也存在众多问题。首先是失业问题，1993年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为120万，失业率达15%，1994年为17%。如果加上临时工及其他变相失业者，实际失业率还要高得多。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根源。另一个问题是，东西部居民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感情隔阂。统一后，东部按西部法制改组行政管理机构，新建五个州中的重要部长职位都由西部人担任。两万多名法官、检察官和司法人员也是从西部聘请的。东部人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说柏林墙拆了，但德国“现在仍处于分裂状态”。德国要真正实现东西部的完全统一，尚须时日。

东部地区的经济调整，给德国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再加上西方经济在90年代初普遍陷于衰退之中，因此，德国的经济状况在统一后开始变坏。1991年底经济开始趋向停滞。1983年以来的长期持续增长被打断。1992年第二季度转为下降，1993年最为严重，失业人数多达330万。但东部地区的经济这时已快速发展，促进了全德经济的回升。1994年全德经济增长了2.8%。

德国统一后，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等于英法两国产值的总和。德国马克已成为西欧的主导货币。德国在科尔领导下，正日益成为政治强国。它不仅在欧洲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且积极向中东欧和独联体各国扩展影响。它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和贷款占到这些国家所得援助和贷款的一半以上。德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增长，引起美国的重视，克林顿政府置美英特殊关系于不顾，一再敦促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与美国分担“领导责任”。

1994年10月德国举行大选，科尔从1982年10月起已执政12年。人民对他已有所厌倦，特别是1993年的经济衰退更使他名声下降。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增长。1991年出任社民党主席的恩格霍尔姆成为科尔的有力竞争对手。但不想1993年5月，报界揭露出他曾作过伪证，恩格霍尔姆只得辞职。沙尔平接任党的主席。社民党的声望受到损害，在大选中受挫。

科尔以微弱多数险胜。联盟党获41.5%选票，金克尔的自由民主党获票6.9%，两党加起来比在野的社会民主党（36.4%）、绿党（7.3%）和民主社会主义党（4.4%）的票数仅多0.3%。在联邦议院中，执政联盟获得341个席位，仅比在野党多10个议席。1994年11月科尔出任第四任总理。他一方面继续调整国内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促进经济稳定

增长。另一方面，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借助美国力量提高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中的地位。

法国 1988 年法国大选，密特朗以其个人威望获得 54% 的选票，蝉联总统。随后在议会选举中，社会党险胜右翼政党，从而使右翼总理希拉克下台，社会党再次独掌政权。密特朗表示要实施其团结各派政治力量、推行开放政策的竞选口号，为此任命自己的对手、社会党非主流派代表人物罗卡尔担任总理。罗卡尔政府对前届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同时又抵制了来自党内“左”的影响，抛弃了以消费刺激增长的激进主张，实行紧缩政策，控制公共和社会福利开支，提倡“企业精神”，减少国家控制和干预，扩大市场经济成分，中止了国有化进程。这些做法对推动法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同社会党纲领大相径庭，招致党内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此同时，劳资之间“分配经济增长成果”的矛盾日益尖锐，工潮迭起。党内一些负责人公开支持罢工者，向政府施加压力，迫其政策向“左”转。劳资关系由此日趋紧张，社会党和政府间的矛盾也在发展。

1991 年 5 月，密特朗改组内阁，任命在社会党内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克勒松夫人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期望她“刷新政府形象”，以迎接 1993 年法国议会选举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挑战。克勒松夫人入主马提翁宫以来，政绩平平，无所建树，未能扭转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法国经济增长率从 1990 年的 2.8% 下跌到 1991 年的 1.2%。1992 年 2 月底失业总人数接近 200 万，失业率为 9.9%，大大高于欧共体的平均数（8.9%）。经济的不景气导致社会问题的增加，各业纷纷罢工，上街游行，表示对社会党政府的不满。在 1992 年 3 月 29 日省议会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社会党遭到空前的惨败。在大陆的 94 个省中，只有 20 个省保持多数。加之，克勒松夫人说话常常“不得体”，招致国内外众多的不满。结果，克勒松夫人执政 323 天就被迫下台，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任期最短的总理。

1992 年 4 月 2 日，贝雷戈瓦被任命为政府新总理。他是密特朗 1981 年和 1988 年两度总统竞选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亲密的盟友之一，曾任总统府第一任秘书长和罗卡尔、克勒松内阁的重要部长。在社会党地方选举受挫、密特朗威望下降的情况下，贝雷戈瓦出任总理，给社会党带来一些新的希望。

贝雷戈瓦政府在苏东剧变后，难以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它眼看德国地位影响迅速提高，却拿不出有效对策。1992 年秋，法国经济陷入萧条，更使社会党威望下降。1993 年 3 月，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惨败，由原来的 273 席降为 53 席。而右翼联盟（保卫共和联盟和民主联盟）获得国民议会 577 席中的 484 席。社会党政府被迫辞职，保卫共和联盟的爱德华·巴拉迪尔出任总理。这是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左翼总统和右翼总理共处。但这次不同于 1986 年的共处。当时，右翼联盟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仅比半数多两个，社会党仍是议会中第一大党。左右两翼力量几乎势均力敌。社会党因此得以在两年之后重新独掌政权。而这次右翼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多达 84%，占据了明显优势。密特朗虽努力固守阵地，但已是“跛脚总统”，受制于右翼。

巴拉迪尔曾在蓬皮杜任内担任政府要职，德斯坦出任总统后一度离开政界。1980 年重返政坛，协助希拉克竞选总统。巴拉迪尔为人稳重，恪守中庸，办事果断；但性格内向，冷漠，不苟言笑。舆论认为他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

巴拉迪尔上台后，面对法国经济衰退、法郎地位不稳、失业严重等诸多

问题，采取果断措施保持住法郎的坚挺地位，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法国经济从 1993 年下半年起开始回升。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政府坚持维护法国农民的利益，拒绝向美国作过大的让步，取得成功。巴拉迪尔的声誉由此日益提高。

1995 年法国举行总统选举，巴拉迪尔向希拉克挑战，竞选总统。社会党原想推举原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做总统候选人。但德洛尔没有接受。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竞选总统，获得意外的成绩，在 4 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票最多。但在 5 月第二轮同希拉克竞争中败北。

1995 年 5 月 17 日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统。他任命自己的助手，保卫共和联盟代主席阿兰·朱佩担任政府总理。希拉克继承戴高乐的传统，推行独立外交政策，努力提高法国的大国地位。他不顾国际的反对，上台后不到一个月就于 6 月 13 日宣布恢复核试验。12 月 5 日，又一反过去 30 年不参加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立场，宣布恢复法国在北约军事委员会的席位，以便乘当今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之机，在北约中建立一个与美国支柱平行的欧洲支柱。

在国内政策方面，由于问题成堆，且积重难返，改革已势在必行。希拉克和朱佩最初采取慎重态度，准备同各政党、各工会组织和雇主协会进行磋商，探寻解决途径。6 月底，政府提出一项解决失业问题的紧急计划。为此，政府要多开支 100 多亿法郎，少收入 200 亿法郎。这对刚刚摆脱衰退的法国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而效果却不明显。经济财政部长马德兰认为小改不行，主张动大手术，于 8 月 24 日发表讲话，批评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引起舆论指责。朱佩只得解除马德兰的职务。但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决定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8 月，决定将商品增值税上调两个百分点。9 月又宣布，1996 年将冻结 800 万公务人员的工资。这引起群众不满。10 月 10 日爆发了近十年来最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有 500 万职工参加。政府平息这一事件后，着手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因为当年法国的预算赤字已达 2750 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7%，不设法缩小赤字就难以振兴经济，也无法取得加入欧洲统一货币的资格。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应在国内生产总值 3% 以内。迫于这种形势，政府决定首先向社会保障体制开刀。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自 1945 年 10 月制定以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失业增加，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日益暴露出严重问题。1992 年法国社会保障的赤字仅为 150 亿法郎，到 1995 年就猛增为 640 多亿法郎，成为巨大负担。1995 年 11 月 15 日，朱佩政府提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措施，以争取在 1996 年将赤字降为 170 亿法郎，1997 年消灭赤字。政府提出社会福利偿还税，决定除 300 万最贫困的人之外，将向全民征收占收入 0.5% 的新税。还决定公务人员要想领到 100% 的退休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要交满 37.5 年的退休保险金就可以，而是同私营部门人员一样要交满 40 年才行。这些措施引起群众不满。11 月 21 日，数万名大学生上街游行。24 日，铁路工人罢工。几天后，巴黎公共汽车、地铁等部门工人也参加抗议行列。法国的经济改革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英国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后，47 岁的约翰·梅杰于 1990 年 11 月 27 日当选为保守党的新领袖，并接替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梅杰上台后极力弥合党内裂缝。在外交方面继承了英国现实主义外交传统，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使英国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的地位有所上升。梅杰将

恢复“英美特殊关系”视为外交重点，他出任首相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在海湾危机中，英国坚定地配合美国行动，向美国显示，目前英国的作用是德国无法代替的。英国还附和英国反对西欧搞独立的防务共同体。英国也注意调整欧洲政策，扩大英国在欧共体中的作用。1991年3月，梅杰在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发表演讲宣称：英国将呆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同其欧共体伙伴共建欧洲的未来。英德长达15年的“冷淡”双边关系由此开始“变暖”。海湾危机在客观上为英国扩大同中东各国的联系提供了机会。梅杰力图改变英国在中东事务中长期不甚活跃的状况，和赫德外相几下中东，遍访阿拉伯国家，并改善了同叙利亚的关系。在海湾战争后有关建立中东地区安全结构和库尔德难民问题上，英国积极行动，恢复了英国在中东的作用和影响。

在内政方面，梅杰大胆地取消了不得人心的人头税，以地方议会税取而代之。1991年4月和5月，梅杰先后推出修改后的改革国家公共医疗事业和教育体制的方案，目的是提高医疗事业的服务质量和加强英国的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在经济方面，梅杰奉行紧缩经济政策以对付衰退。他利用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待通货膨胀控制住以后，再逐渐调低利率，刺激投资。1991年6月份工业生产增长3%，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出现2300万英镑顺差，这是自1987年2月以来第一次出现外贸盈余。

梅杰执政一年多以来，虽未能把英国拖出经济衰退的困境，但已作出了一些成绩。在英国民众心目中，保守党治理经济的能力比工党略胜一筹。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过程中，英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因此，保守党仍被大多数人视为更佳的选择。1992年4月9日，在英国战后第十四次立法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下议院总数651席中的336席，比其他所有党派的席位总和多21席。工党获得271席，自由民主党20席，还有24席分属于其他党派。英国保守党实现了“四连冠”。

新一届梅杰政府上台后，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经济长期处于衰退之中，1991年经济下降了2.2%，第二年又下降了0.6%，货币体系也出现危机。这一年9月，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下跌不止，只得退出欧共体的汇率机制。在重重打击下，梅杰政府无法履行竞选时提出的“决不增税”的保证。1992年决定增加消费税，对燃料和动力征收附加税，共增加税收62亿英镑。1993年又决定再增税26亿英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从1993年第二季度起，英国较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地开始经济复苏。这一年的增长率达到1.9%，1994年进一步达到4%。失业率从1993年底的10%降到1994年底的8.6%，失业人数为240万。出口增加，贸易赤字减少，英镑比值回升。经济形势持续好转。

进入90年代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步伐明显加快。1991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欧洲联盟。1993年1月，欧洲统一大市场又正式启动。而对这些新的进展，保守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些人对欧洲联盟的建立持保留态度，担心它会把英国拖入联邦的欧洲，使英国失去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特性。以就业大臣波蒂洛为主要代表的欧洲怀疑派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且有一定号召力。当1993年7月议会讨论批准“马约”时，他们甚至扬言要同工党站在一起否决这一条约。梅杰提出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才勉强渡过这场危机。

保守党的内部争吵以及18个高级官员因私生活问题引咎辞职，使保守党的声誉不断下降。1994年5月，英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保守党惨败，在

改选的 5071 个议席中，只获得 888 个，远远落在了工党（2769 个议席）之后。就全国而言，保守党只拥有 4982 个地方议席，控制着 20 个地方议会。而工党的议席多达 10,867 个，掌握着 207 个地方议会。地方选举的结果说明工党已在迅速崛起。工党自 1979 年成为在野党后，一直处境不佳。在 1983 年、1987 年和 1992 年的大选中连连败北。1992 年史密斯接替金诺克出任工党领袖后，大力振兴工党，颇得党员和选民的好感，但不幸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1994 年 7 月，41 岁的律师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台后，调整了同工会的关系，使工党进一步摆脱工会的束缚。为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支持，他毅然决定废弃党章第四条关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标。1995 年 4 月 29 日，工党特别大会通过了布莱尔的这一动议。第四条改为争取建立一个权力、财富和机会不属于少数人而属于多数人的社会；建立一个活力充沛的经济，其中包括繁荣的私营经济和充满竞争的市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布莱尔还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要求经济效益与社会道德同步发展。工党在布莱尔领导下，日益成为保守党的有力竞争对手。另外，自由民主党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1994 年的地方选举后，自民党拥有 5035 个地方议席，掌握 50 个地方议会，其力量超过了保守党。面对工党和自民党的挑战，梅杰采取果断措施，整顿保守党和政府。1994 年 11 月，当会议讨论增加英国对欧洲联盟预算摊款数额问题时，保守党内的欧洲怀疑派再次出面反对。梅杰立即向他们提出警告。但仍有八名保守党议员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为此梅杰取消了他们参加议会党团活动的权利。1995 年 5 月，60 名保守党议员在下院围攻梅杰，要他保证英国永不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系。梅杰意识到这是向他的领导地位进行挑战。他立即反击，决定进行保守党领袖选举。要反对他的人“或者站出来竞选，或者给我闭嘴”。7 月 4 日，下院保守党议员进行投票选举，梅杰以 218 票对 89 票战胜了约翰·雷德伍德。第二天，梅杰改组内阁，将反对他的人排除在外，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新政府以中间派为主体，联合左翼，兼顾右翼。它借助英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形势，决定进一步控制通货膨胀，允诺在适当时候削减所得税和遗产税。同时采取措施打击犯罪，严肃处理各种丑闻问题。

梅杰政府一直致力于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他同爱尔兰政府一起，推动北爱尔兰两派于 1991 年 4 月开始举行圆桌会谈。因立场迥异，谈判未能获得成果。1993 年 12 月，英国和爱尔兰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在北爱尔兰是继续留在英国还是并入爱尔兰问题上，双方都尊重北爱尔兰六郡人民的意愿。同时双方也一致认为，只有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永久停止使用暴力，其政治代表新芬党才能参加谈判。这以后，在美国的斡旋下，爱尔兰共和军于 1994 年 8 月底宣布完全停止恐怖活动。10 月，新教准军事组织也宣布放弃暴力行为。1995 年 2 月，英国、爱尔兰在同北爱尔兰各派谈判后，签署一份框架文件。爱尔兰承诺将修改宪法，取消对六郡拥有主权的条款，英国也表示将用法律形式确认北爱尔兰人民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梅杰政府在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梅杰政府极力想使英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虽然难以维持传统的英美特殊关系，但还要倚重美国，扩展自己的影响。同时，调整同欧洲联盟的关系，在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尽量保持英国的利益，提高英国的声誉。

意大利 进入 90 年代后，意大利经济增长减慢，财政赤字居高不下，1991 年底的公共债务为 1.23 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意大利人负债 2 万美元。1993 年出现自 1975 年以来的首次生产下降。但 1994 年经济开始回升，不过速度不快，失业人员超过 200 万。

1992 年，意大利发生空前的政治地震。2 月，米兰的检察官迪彼得罗下令逮捕米兰一家养老院院长，指控他向前米兰市长行贿。进而又揭露了意大利第二大国家企业集团埃尼集团向各政党行贿的丑闻。根据 1947 年政党资金法的规定，各党派可根据其在竞选中所获选票的比例从国家获得一定的经费，未经批准不得从公共机构和企业获取资金。但是意大利党派林立，党派政治盛行。各党派为了发展自己，经常不顾法令规定秘密向企业索取资金，而各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定期向政党提供里拉。当埃尼集团行贿被揭发后，全国舆论哗然。3 月 13 日，米兰两万多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反对政府赦免涉嫌卷入贿赂案的政界人物，高呼“迪彼得罗不要后退”的口号。在群众的坚决要求下，意大利开展了全国性的反贪污贿赂的清廉运动。

1992 年 4 月 5 日和 6 日，意大利举行新一届大选。原来联合执政的天民党、社会党、社民党、自由党总的得票率由上届的 53.7% 下降到 48.8%，丧失了议会多数。社会党人阿马托不得不又联合一些小党组建新政府。科西加总统对这种党派政治十分不满，于 4 月 28 日辞职。从 5 月 13 日起开始进行总统选举。新议会经过 16 轮投票，才于 5 月 25 日选出天民党人斯卡尔法罗为第九任总统。

1992 年下半年到 1993 年初，对米兰贿赂案的调查取得新的进展。发现天民党、社会党和一些小党掌权时，利用一些大的公共工程承包项目向企业索取“回扣”，天民党拿 50%，社会党得 30%，剩下的 20% 归其他小党。法院先后审查了一千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党派领导人，逮捕了六百六十多人。前社会党总理克拉克西因违反政党资金法而受审查，被迫于 1993 年 2 月辞去已担任 16 年之久的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前天民党总理戈里亚也被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北方米兰贿赂案巨震尚未平息，南方西西里的巴勒莫市又刮起政府要员与黑手党有牵连的风暴。黑手党是意大利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他们在作案后，总要在现场留下一用蜡纸印出来的黑手，因此而得名。黑手党势力在二战后迅速发展，参与国际贩毒、暗杀等各种犯罪活动。1984 年，政府对黑手党徒进行大规模围捕。1986 年 2 月到 1938 年 4 月，对黑手党徒进行了“世纪大审判”，先后判处 20 名黑手党头目终身监禁，371 名党徒共计三千多年的徒刑。但是，黑手党并未因此而衰落消亡。1992 年 5 月 23 日，主持审讯黑手党的法官法尔科内驾驶防弹装甲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被炸身亡。7 月 19 日，巴勒莫市的检察官，反黑手党的另一位前线人物博尔塞利诺也遭暗杀。群情激愤。阿马托政府派出七千多名军人到西西里岛，以打击黑手党的猖獗活动。同时，加强对黑手党的侦破工作。1993 年 1 月，逮捕了黑手党头号人物萨尔瓦托雷·里纳。3 月 27 日，巴勒莫市检察院又正式指控前总理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有牵连。5 月 13 日，参议院批准撤销他的议员豁免权，允许巴勒莫市检察院调查他的问题。安德烈奥蒂是天主教民主党的元老，1946 年曾参与起草新宪法工作。1948 年到 1992 年当选历届众议院的议员，1992 年成为终身参议员。他曾担任过七届政府总理，前后参加过 34 届政府。他被指控与黑手党头目进行过三次高级会晤，彼此进行利益交换。

安德烈奥蒂事件被披露后，人们对意大利的政党政治不满，强烈要求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意大利原来实行比例代表选举制，选民不是直接选举某个人当议员，而是选举某个党派代表进入议会。各党派根据得票比例分配各自的议席，议员由党派领袖指定。这种制度使议员不必直接对选民负责。要想当议员，只要取得党的领袖支持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比例选举制度使众多小党进入议会，政治力量分散，政府不断更迭。到 1993 年，意大利在战后 47 年中更换了 51 届政府。1993 年 4 月 18 日和 19 日，意大利就修改选举法问题举行全民公决。82.8% 的选民作了肯定的表示。根据修改的选举法，参议员的 75% 用多数选举制产生，25% 仍由比例选举制产生。4 月 23 日，阿马托政府辞职。意大利中央银行总裁钱皮于 27 日出任新总理。他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他的内阁成员，半数以上是无党派人士。这在战后意大利历史上是第一次。1994 年以肃贪反黑（手党）为主要内容的“廉洁运动”取得新进展。有六千多名各界重要人物受到审查或传讯，其中四百多人是议会议员和政界头面人物。人们对传统政党完全失去了信任，人心思变。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于 1994 年 3 月 27 日和 28 日，首次按新选举法举行议会选举。传统政党一败涂地。由意大利力量党、北方联盟和全国联盟（新法西斯党）组成的自由联盟获胜。这个右翼集团在众议院 630 席中获得 366 席，在参议院 315 席中获得 155 席。由左翼民主党（原共产党）、重建共产党等组成进步联盟成为第二大政治力量。长期居于意大利政坛核心位置的天主教民主党已瓦解消亡。在其基础上组建的人民党沦为议会中的小角色。社会党的命运更糟，它因得票太少而未能进入议会。大选后，社会党分裂。1994 年 11 月组建了社会主义者党和改良社会党。

5 月 10 日，力量党领导人贝卢斯科尼出任第五十三任总理。他组建了战后首届右翼政府，其中有五名新法西斯分子进入内阁。贝卢斯科尼曾自诩为“改革先锋”，许诺要支持肃贪反黑运动，要彻底改革旧政体。但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却与他的承诺背道而驰。当检察院审查菲宁韦斯特集团行贿问题时，曾担任这个集团总裁的贝卢斯科尼公开出面为集团辩解。贝卢斯科尼还处处阻挠对贪污贿赂的审查活动，引起司法界的不满。1994 年 12 月 6 日，享有廉洁运动旗帜之誉的米兰检察官迪彼得罗宣布辞职，并称将永远离开司法界。这引起强烈反响。米兰、罗马、都灵等城市居民一连数天举行示威游行，声援迪彼得罗。斯卡尔法罗总统也明确希望迪彼得罗收回辞呈。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贝卢斯科尼政府。12 天后即 12 月 19 日，执政党中的北方联盟联合在野的左翼民主党、人民党共同向议会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上台仅七个月的贝卢斯科尼于 22 日宣布辞职。

斯卡尔法罗总统指派原中央银行总经理迪尼组阁。迪尼力图超越政治派别，选用无党派人士组建技术专家政府。他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缩减财政赤字。他还同三大工会协商，制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方案，决定提高退休年龄、增加职工缴纳养老金基金的份额、严格领取养老金和各种补贴的手续。这些措施使国家每年可节约 67 亿美元的福利开支。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640 万亿里拉（约合 10,275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3.2%，增长速度为欧盟各国之冠。

一体化的发展与欧洲联盟的建立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对峙局面结束。美国和日本成为西欧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欧任何一国都难以独自对付，只有深化联合才能在未来

的鼎立中处于有利地位。另外，欧共体即将建立统一大市场，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扩大政治方面的合作，来巩固发展一体化进程。在这种形势下，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于1990年4月共同倡议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同年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认可了这一倡议，并确定了政治联盟的基本内容。这以后，展开了双边和多边的磋商。1991年12月9~10日，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经过激烈争论，各方都作了一些妥协让步，最后签署了经济货币联盟条约、政治联盟条约等条约，总称欧洲联盟条约。

经济货币联盟条约宣布至迟从1999年起实行统一货币。这项任务的准备工作始于1990年7月1日，任务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货币政策，争取所有成员国的货币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取消外汇管制。从1994年起，开始过渡阶段。建立独立的欧洲货币局，监管各国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为将来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做准备。从1997年到1999年1月1日，将逐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建立独立于各国政府之外的欧洲中央银行。由于美国坚决反对实行单一货币，条约允许美国推迟参加货币联盟。

欧洲联盟条约确定了政治联盟的基本目标。12国决定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大政方针由欧洲理事会一致决定，具体行动由部长理事会多数决定。关于防务政策问题，法国强调欧共体应有自己独立的安全防务政策，主张将西欧联盟纳入欧共体政治联盟范围之内。英意强调北约是维护欧洲安全的唯一有效的联盟，主张把西欧联盟作为北约的欧洲支柱。德国的立场介于法英之间，但更多倾向于法国。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西欧联盟隶属欧洲政治联盟，是欧洲政治联盟的防务机构，负责制定欧洲防务政策。同时，西欧联盟也是欧共体和北约之间的联络机构，北约仍是负责欧洲防务的重要组织。

条约规定进一步扩大共同体的职权范围，增加环境保护、科研、工业、运输、文化等领域的职能。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在内部市场计划、科研和开发计划、环保、消费者保护等方面，议会将与部长理事会共同作出决定。这使欧洲议会由原来的咨询和监督机构变为部分权力机构。

关于欧洲联合的最终形式，法德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联邦”，而英国反对交出主权，主张最终成为“主权国家邦联”。由于“联邦”或“邦联”的提法在当前尚无现实意义，故在条约中只写上了建立“更紧密的联盟”的内容。

欧洲联盟条约标志着欧共体从一个经贸组织开始向政治、外交、防务实体方向转变。它是继1986年签署关于建立统一大市场协定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决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2月7日正式签署。原来预计在得到各成员国批准后，从1993年1月1日起与统一大市场同步实施。但不料1992年6月2日丹麦公民投票，以50.7%对49.3%否决了马约。法国9月的公民投票仅以1%的微弱多数险渡难关。英国则于11月表示要待丹麦第二次投票后再讨论批准马约。这样，就引出了马约危机。欧洲联盟预定的建立计划成了泡影。

不过，欧洲统一大市场还是在1993年1月1日正式形成，开始实行四大自由流通。在商品流通方面，过去共同体内部已取消关税和进口限额，原则上商品已可以自由流通。但各国为保护本国市场设置了形形色色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利用各国内部税制的不同，商品的技术、安全、卫生标准乃至包装、

标记规定的差异阻挠商品的真正自由流通。现在，这些差异绝大部分为统一规定所代替。商品自由流通的技术和税制壁垒被打破。边境检查是另一种障碍。如丹麦的产品运往意大利要经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六道海关的检验，每次检查都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现在实行免验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不再计入各国的外贸，甚至说法也变了，把原来的“出口”和“进口”改称为“发货”和“收货”。在资本流动方面，1990年7月1日，欧共体已有八国开始在彼此之间实行资本自由流动。1993年1月1日起，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允许私人资本在欧共体成员国间自由汇来汇去。在人员往来和劳务方面，欧共体成员国的公民自1993年起可以在欧共体12国内自由迁徙，随意在任何地方居住，而无须申请居留许可；他们还可以在12国内求职就业，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和歧视。

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推动了欧洲一体化事业。丹麦在单一货币和共同防务政策方面获得例外权后，于1993年5月18日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通过了马约。英国则于8月批准了该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经过一番曲折，最后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共同体最终发展成为欧洲联盟。

欧盟成立前后，欧洲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各国想降低利率，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复苏。但德国马克坚挺，银行实行高利率。其他国家的货币受到巨大压力，难以同马克一起浮动。英镑和意大利里拉于1992年9月率先退出欧共体货币体系。法郎也受到冲击，自身难保。欧共体为维护自身的汇兑机制，于1993年8月，决定将各国货币对中心汇率的上下波动幅度由2.25%扩大为15%，即扩大了五倍多。这几乎使欧洲货币体系陷于瓦解。

不久，欧盟各国经济出现复苏。1994年1月1日，经济货币同盟仍按预定日期进入第二阶段，成立了欧洲货币局，并确定德国的法兰克福为欧洲货币局的所在地。

欧共体积极发展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关系。1992年5月2日，双方签订欧洲经济区条约，决定将欧共体统一大市场的四大自由流通在五年过渡时期内扩展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各国。但是，年底瑞士公民投票否定了这一条约。欧共体再次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协议，于1993年3月17日签署了补充规定。经过各国批准后，欧洲经济区于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它包括欧共体12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奥地利、芬兰、挪威、瑞典、冰岛。

1995年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接纳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为自己的成员国，挪威虽也同欧盟达成入盟协议，但未能获得全民公决的认可而继续留在欧盟之外。新加入欧盟的三国是富国，它们的加入使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值大体相当的程度。三国长期执行中立政策，同东欧国家有较密切的联系。扩大后的15国欧洲联盟，其影响和地位明显增强。

欧洲联盟利用东欧剧变的机遇，积极推进东扩战略。早在1989年7月就制定了“波兰、匈牙利经济重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英文缩写音译为“法尔”，故又名法尔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扩展到东欧11个国家。到1994年底，欧盟总共预算拨款四十多亿埃居（合五十多亿美元），帮助东欧国家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另外欧盟还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六国签订了联系协议。1994年12月，欧盟在埃森举行首脑会议，邀请这六个联系国的政府首脑与会。会议决定由欧盟委员会就六国入盟问题提出方案。另外，欧盟还在1994年6月，同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欧共体一体化的巨大进展同德洛尔的推动分不开。但到 1994 年底他已两届期满，担任委员会主席长达十年之久。对他的继任人选，德国同英国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最后双方妥协，推出新的人选。1995 年 1 月，卢森堡首相雅克·桑特尔接替德洛尔出任欧盟主席。桑特尔的出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95 年 3 月，德、法、西、葡、荷、比、卢以及意、希、奥十国在申根达成协定，决定取消彼此间的陆路边境检查。但申根协定未能彻底实行。意、希、奥三国最终没有参加进来。

1995 年 6 月 25 日，欧洲联盟 15 国首脑在法国戛纳举行会议，讨论了接纳东欧和南欧国家加入欧盟的问题，决定在 1999 年前实行单一货币。欧洲联盟在困难与曲折中不断前进。

第三节 90 年代的中欧东欧国家

俄罗斯 俄罗斯早在 1990 年 6 月 12 日就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后来 6 月 12 日被定为俄罗斯独立日。1991 年 6 月 12 日，经全民投票，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他原来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由哈斯布拉托夫接任。初期，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相互配合。后来，叶利钦启用年轻的激进派盖达尔（1956 年生）担任副总理和代总理，领导经济改革。1992 年开始实施休克疗法，1 月 2 日全面放开物价，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发放私有化证券，这引起物价飞涨，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2200%，市场上商品虽有所增加，但价格惊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普遍不满。1992 年 12 月，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哈斯布拉托夫等人严厉批评盖达尔政府，指责它不考虑本国国情、照搬西方模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叶利钦向议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仍没能保住盖达尔的位置。人代会选举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总理。人代会后，叶利钦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尽管双方都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化，但议会反对休克疗法，主张渐进改革，更反对叶利钦扩大总统权限的企图，主张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93 年 4 月 25 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58.7% 的选票支持叶利钦总统，对其经济改革政策表示信任。但是，多数选民担心国家局势会更加动荡，没有投票支持提前举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这样，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仍继续存在。

全民公决后，叶利钦利用他取得的相对优势，撇开议会另开制宪会议。1993 年 7 月，制定了新宪法草案。9 月 21 日，叶利钦宣布解散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哈斯布拉托夫立即召开议会，宣布总统令非法，并任命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代总统。双方对抗愈演愈烈，政府派军警包围了议会大厦，议会则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守卫。10 月 3 日下午，劳动俄罗斯等政党组织数万人向议会大厦进军，驱散封锁大厦的军警，进而又攻占市政府和电视中心。政府立即调动军队和坦克，于 10 月 4 日清晨 7 时发起进攻，造成流血冲突，有 142 人死亡，600 余人受伤。当天下午，议会大厦失陷，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等人被捕。

1993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对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确定实行总统制。总统不仅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而且是最高决策者，有权确定内外政策和基本方针、任命总理、解散议会、决定举行全民公决、签署并颁布法律。总统还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不复存在，苏联时期的国家政权形式彻底结束。新议会称联邦会议，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叫联邦委员会，由直辖市、共和国、边疆区和区等 88 个联邦主体各选出两名代表组成。下院叫国家杜马，由 450 名议员组成，其中一半由全俄划分 225 个选区各选出一名代表，另一半由参加竞选的党派和社会团体产生。1993 年 12 月 12 日举行联邦新议会的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基本由三大力量组成。一是“民主”力量联盟，其核心是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二是建设性反对派联盟，包括久加诺夫的俄罗斯共产党，以及农业党、民主党等。三是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其主席是日里诺夫斯基。但三派力量在多党议会政治、市场经济和维护强国地位等国内外大政方针上并无原则分歧。

新议会成立后，叶利钦为适应各派力量对比的变化，改组了政府，解除了几名激进改革派人物的职务。1994 年 2 月 23 日，国家杜马作出政治大赦

的决定，释放了哈斯布拉托夫等人。4月28日，在叶利钦倡议下，将近150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签署了《社会和睦条约》，表示尊重宪法，以合法方式开展政治斗争。这以后，俄罗斯各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很激烈。各派不仅对俄罗斯向何处去、经济改革应如何进行等重大问题看法不一，并且彼此间有不少个人恩怨、派别小集团利益之争。但是各派基本是在有序和符合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街头政治减少，议会成为主要角斗的场所。俄罗斯政局出现相对稳定。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俄罗斯的另一难题。苏联解体后，作为俄罗斯组成部分的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心倾向。俄罗斯政府一方面遏制分立的势力，全力维护联邦的完整和统一，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在联邦全境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扩大地方自主和自治权。将16个自治共和国和四个自治州升格为共和国，允许它们拥有总统、总理、议会、宪法等主权国家的某些特征。俄罗斯政府的这一政策取得积极成果，1994年2月15日，叶利钦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署了权力分享条约，结束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但是，俄罗斯政府同车臣共和国的关系却未能协调好。车臣位于北高加索，地势险要，山峦起伏，历史上车臣同俄罗斯有许多恩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退役空军少将杜达耶夫带领车臣人闹独立，10月27日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11月2日宣布车臣独立。叶利钦坚决反对，采用各种手段，均未能取得效果，乃于1994年12月1日派三路大军进攻车臣。但俄军遇到激烈反抗，处处受阻，直到1995年1月19日才攻下首府格罗兹尼。到年中，俄军控制了车臣四分之三的地区，激战逐渐平息。可是，6月14日，车臣武装人员袭击布琼诺夫斯克，绑架平民，枪杀人质，局势再度紧张起来。经过谈判，双方就停战、释放俘虏、解除非法武装、俄罗斯撤出正规军、车臣方面停止恐怖活动达成协议。但是，协议未能认真执行，车臣危机使俄罗斯政府陷于困境。

俄罗斯特别重视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1991年12月，独联体成立时，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没有参加。到1992年5月，独联体国家首脑在塔什干开会时，只有七国与会，独联体陷于瓦解危机之中。但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领土、民族等关系极为错综复杂。苏联的各种经济联系有40%以上是跨共和国的，各共和国的边界有70%未明确划分，七千多万人居住在非本民族地区，各国的相互依存性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有增无减。同时，俄罗斯审慎地调整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独联体国家的联合。1993年1月独联体各国领导人签署《独联体章程》，9月签署了经济联盟条约。10月格鲁吉亚宣布加入独联体。12月，12国元首会议通过阿什哈巴德宣言，表示了“扩大和加强独联体各国之间传统的、历史形成的友好合作理解关系的坚定决心”。会议还决定设立独联体协调—协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此，独联体趋于稳定。1995年9月14日，叶利钦批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规定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和防御联盟。自此，俄罗斯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政策以来，生产一直大幅度下降。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下降19.2%，1993年下降12%，1994年又下降15%。1995年，经济出现转机，生产下降幅度明显减小，只有4%左右。结构性回升的

趋向日渐明显。冶金、石化、汽车、木材加工等部门的生产增长了大约 10%。通货膨胀率也由 1993 年的 940% 降到 1995 年 100% 左右。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趋于稳定。私有化取得进展。最初实行无偿私有化，国家无偿向每个公民发放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公民可用它购买国有企业的股票，也可以转让和出售。到 1994 年 6 月底，全国 3.9 万家大中企业中，有 1.9 万家被改造为股份公司。1994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现金私有化阶段，要求投资者以现金购买国有资产。1994 年度，非国有经济成分已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 62%。对外贸易迅速增加，卢布汇率相对稳定，1995 年头九个月对外贸易总额增加 20%，顺差 163 亿美元。总之，俄罗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开放价格和明晰产权这两项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改革。与此同时，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 1991 年的 59%。虽已开始复苏，但仍存在众多问题和不确定性，形势仍很严峻。

中东欧各国的转轨 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剧变后，分别建立了多党议会制度。各国议会少则几个党，多则为几十个党组成。执行立法职务的议会，与行政、司法相互制约，各司其职。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逐步建成了总统制国家。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自 1990 年 12 月起出任总统。1993 年 9 月议会选举，民主左派联盟和农民党获胜，瓦文萨不得不请农民党领袖帕夫拉克出面组阁。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在 1992 年选举中获胜，连任总统。他所领导的民主救国阵线于 1993 年 7 月改组为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由无党派人士沃克罗尤担任。保加利亚总统由民主力量联盟主席热列夫担任。另一名民主力量联盟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于 1991 年 12 月出任政府总理。一年后，被无党派人士贝罗夫取代。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主席贝里沙于 1992 年 4 月当选为总统。梅克西组成以民主党为主的政府。

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职权不大，形成了总理制国家。匈牙利总统由自由民主联盟的创始人根茨担任。总理是民主论坛的安托尔。他联合小农党和基督教人民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捷克斯洛伐克长期被民族问题困扰。1991 年 4 月，国家为尊重斯洛伐克民族的权利，改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但未解决问题。1992 年 6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在捷克，主张维持联邦制、实行激进经济改革的公民民主党得票最多。在斯洛伐克，反对激进变革、主张斯洛伐克独立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获胜，并在联邦议会中占据第二大党的位置。两党意见对立，导致国家分裂。11 月 25 日，捷克和斯洛伐克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解散共和国法。1993 年 1 月 1 日，独立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分别成立。哈维尔任捷克总统。公民民主党的克劳斯出任总理。在斯洛伐克，梅恰尔任总理。

总的看，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已告完成，多党议会制已确立起来，各政党均已习惯于把与敌对政党之间的斗争纳入议会斗争的轨道，局限于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自 1993 年 9 月，波兰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各国的社会党力量迅速上升。1994 年 5 月，匈牙利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胜，获得 209 个席位，而执政的民主论坛只获得 37 个席位。7 月，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洛出任总理。1995 年 11 月，波兰举行选举，社会民主党领袖克瓦希涅夫斯基战胜瓦文萨当选为总统。1996 年社会民主党人齐莫谢维奇出任总理。

此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的社会党力量迅速增长。1995 年 10 月保加利亚举行地方选举，社会党获 42% 的选票，反对党民主力

量获 23%。 1995 年 1 月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受命组阁。

中东欧各国的经济相继走出谷底，形势趋于稳定，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的情况较好。波兰从 1990 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开放价格，增加税收，实行企业股份化和私有化，允许企业破产。这一激进变革措施被称为休克疗法。实施初期，物价飞涨，生产下降，失业激增。一年后，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抑制，每月的膨胀率仅为 2%~3%，市场活跃，商品丰富，只是价格昂贵。失业问题依然严重，1992 年有 270 万人没有工作。 1992 年底波兰率先经济复苏。国内生产总值 1993 年增加 3.8%，1994 年增加 5%。工业生产增长更快， 1993 年为 7%，1994 年为 11.9%。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 55%走上私有化道路。国营商业以租赁、承包、拍卖等方式，几乎全部私有化。到 1994 年，私营业已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 54%。私营职工已占全国职工总数的 61%。

捷克十分重视宏观调控，力求平稳过渡。 1991 年初，恰尔法政府宣布开放价格，上半年通货膨胀率约为 40%，下半年转趋稳定。这以后除少数几个月外，月平均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 1%以下，失业率也很低。经济所有制发生彻底变化。 1990 年 10 月，开始小私有计划，将 7 万家国营小商店、饭馆及小型作坊通过拍卖、租赁等方式转给私人经营。 1991 年议会通过两项法令，将过去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归还原主或进行赔偿。1992 年起，用公开拍卖、投资券平分等方式改变大中型国营企业、银行的所有制形式。到 1995 年，大约 80%的国有资产转为私营，私有经济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80%左右。 1994 年，经济全面回升，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2.6%。国家预算连续三年有盈余，外汇储备达到一百多亿美元。

斯洛文尼亚在 1991 年脱离南斯拉夫取得独立后，面临着从地区向独立国家过渡的艰巨任务。经济从 1987 年起连年滑坡，社会所有制企业严重亏损。1992 年大选后，德尔诺夫舍克继任总理，组成大联合政府，努力加强宏观控制，同时积极开拓西方市场。从 1993 年第三季度起，经济开始回升， 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5.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7048 美元。 1995 年继续保持 5%以上的增长速度。斯洛文尼亚异军突起，被誉为“中东欧的新加坡”。

匈牙利安托尔政府在进行经济转轨工作时，采取了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的渐进的温和疗法。在改变企业所有制时，实行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从经营较好、商品在国际市场有销路的企业开始。对经营较差的企业先进行调整改造，然后再出售。对长期亏损、扭亏为盈无望的企业则实行破产处理。其次，对国家财产只出售，不无偿分配或赠送。出售时，必须公开招标，经过多个投标者竞争后再出售，并且自始至终要在私有化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匈牙利经过五年时间完成小私有计划。大中企业私有化也取得进展，到 1995 年全国私有企业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市场经济机制已启动运转。物价开放后， 1991 年的通货膨胀率曾达到 35%，以后逐年下降。1994 年起，经济开始回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工业生产总值增长 8%，通货膨胀率降到 20%以下。匈工业增长势头良好，引进外资占整个东欧地区的 60%，但财政赤字连年增加， 1994 年达 3500 亿福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国际收支连年出现逆差， 1995 年外债达 320 亿美元。

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以及斯洛伐克的情况不如上述四国。从 1994 年起经济开始正常增长，通货膨胀率连年下降，但离全面好转尚存在一定差距。

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三国的经济在 1994 年开始回升，但总体形势仍然严峻。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推行休克疗法，代价沉重。保加利亚从 1991 年到 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40%，工业生产下降了近 50%，农业生产下降了 64%。阿尔巴尼亚到 1994 年底，失业者仍占工人劳动力的 50%。人均年收入仅为 312 美元，居于欧洲末位。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虽已打破，但大企业的私有化进程缓慢，迄今仍有 70%~80% 的固定资产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金融、税收、外贸等领域的改革进展不大，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

前南斯拉夫地区的马其顿、克罗地亚以及受国际严厉制裁的南斯拉夫联盟的经济从 1994 年起也明显改善，只是波黑共和国一直被战火笼罩。

波黑战争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于 1992 年 3 月 1 日举行公民投票。占全国人口 43.7% 的穆斯林和占 17.3% 的克罗地亚族赞成脱离南斯拉夫而独立。但占全国人口 31.4% 的塞尔维亚族坚决反对，自行成立塞尔维亚波黑共和国。克罗地亚族也组建一共和国，三方矛盾尖锐，导致内战爆发。

1992 年 3 月 2 日，波黑战火燃起。欧共体出面调停，提出将波黑按民族分成三大区域，依照瑞士模式组成邦联式国家。3 月底，三方在布鲁塞尔开会，就这一和平方案达成原则协议。但穆族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后来改变初衷，协议成为一纸空文。不久，西方各国先后宣布承认波黑独立，打乱了谈判进程，波黑战火迅速扩大。塞尔维亚族依靠军事实力和南斯拉夫联盟的支持，在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占领了众多土地。国际社会对塞尔维亚族施加压力，1992 年 5 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南联盟实施制裁。7 月，美国的第六舰队驶向亚得里亚海。

1992 年 9 月在日内瓦成立国际调解委员会。委员会两主席是代表联合国的美国人万斯和代表欧共体的英国人欧文。委员会提出了包括宪制、停火和版图划分等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和平计划（万斯—欧文计划）。穆克两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案，塞族认为方案使塞族让出的土地太多，不肯接受。但在强大压力下，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于 1993 年 5 月 2 日在万斯—欧文计划上签了字。

三天后，塞族议会予以拒绝。5 月 15 日，又通过全民公决彻底否定了万斯—欧文计划。美国对此不满，加强了对塞族的压力。5 月联合国宣布建立萨拉热窝等六个保护穆斯林居民的安全区。6 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允许北约使用空中力量支援联合国维和部队。与此同时，穆克塞三方展开争夺地盘的大混战。1994 年春，克族同穆族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几个月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下，双方停火。但穆族同塞族的战火又燃起，各方还进行了极为野蛮残酷的种族清洗活动。

1993 年中，瑞典人斯托尔滕贝格接替退休的万斯，同欧文一起召集波黑三方领导人开会，讨论修改波黑版图问题。8 月，提出一项新的折衷性和平计划，提出由三个制宪国组成联盟国家。塞、穆、克三方分辖 52%、31% 和 17% 的领土。塞、克两族表示接受，而穆族要求得到更多领土和出海口。三方意见不一，第三个方案宣告破产。

1994 年，波黑战争再度激化。2 月 5 日，萨拉热窝露天市场遭炮击，68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北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各方把重武器撤到首都 20 公里以外地区交联合国维和部队监管，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同塞族有密切联系的俄国极力反对，使北约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付诸实施。2 月 28 日，

北约飞机将闯入禁飞区的塞族四架飞机击落，后来又对萨拉热窝附近的塞族阵地进行袭击。5月，波黑穆克两族组成联邦，共同与塞族作战。1994年7月，美英法德俄五国联络组提出新的和平方案，规定穆克联邦拥有51%的领土，塞族占有49%。这时，塞族已占领波黑70%的领土，拒绝了这一方案。

1995年，北约对塞族阵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空袭。同时，穆族军队从多处发起进攻。6月上半月，攻占了近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穆克联邦与塞族控制的领土接近于51对49的比例。与此同时，美国派出要员霍尔布鲁克穿梭于波黑各方以及南联盟、克罗地亚共和国之间，邀请各方代表在美国的空军基地——代顿举行秘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

1995年12月14日，波黑、南联盟（代表波黑塞族）和克罗地亚三国总统在巴黎正式签署波黑和平协议，美英法德俄领导人作为见证人也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波黑内战宣告结束。

波黑内战是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一次战争，它持续了三年多，造成20多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三方协议为实现波黑的真正和平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90 年代的日本

日本经济的衰退 从 1986 年 11 月开始，日本经济持续景气。可是，进入 90 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重大转折，从景气走向衰退。促成这一转折的，一是日元大幅升值，二是泡沫经济的破灭。1991 年末，1 美元兑换 133 日元，之后，日元大幅升值，1995 年上半年突破了 80 日元大关。与 1991 年末相比，四年中，日元升值 40%。日元升值冲击了日本国内流通业和内向企业，削弱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速了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给日本经济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80 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的同时，股价、地价高腾幅度之大远远超过利息、投资收益、企业赢利、生产增长率等的增长，形成了虚拟的泡沫经济。由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社会资金大量转向股票、不动产、土地投机等，妨碍了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行，同时导致社会货币流通量增长过快。泡沫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给日本经济发展留下隐患。1991 年随着里库路特证券事件等经济大丑闻的曝光，日本政府被迫采取应急措施，提高利率，限制对股票、土地、不动产投资的贷款，设立证券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公正性的调查。在经济紧缩政策、公正交易规范作用力度加强的情况下，股价狂泻不止，地价一落千丈，由此造成的股票资产损失（1991 年 2 月至 1992 年 7 月）达 340 万亿日元，土地价格损失（1991 年至 1992 年）达 108 万亿日元。至此，泡沫经济宣告破产。

随着日元大幅升值的猛烈冲击和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市场需求不振，消费信贷增长失去势头，个人消费持续萎缩，商业零售额难以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下降，政府经济负担加重，库存调整不见起色，就业形势恶化等。日本经济企划厅于 1993 年 1 月首次将日本经济减速称为“萧条”。这样，自 1991 年 5 月开始的“平成萧条”至 1993 年 10 月跌至谷底。

日本政府为刺激民间设备投资的回升和个人消费的增长以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采取了降低官定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1993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新措施，如保持并降低贴现率；放宽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继续增加公共投资；从 1995 年起分两个阶段减少所得税和居民税 54,600 亿日元等。

1994 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但复苏势头很弱。这一年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0.6%，1995 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尽管提高至 1%，但是，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乏力，经济增长难有起色。这是因为日本经济深受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不良债权的困扰。1995 年 6 月，大藏省正式承认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总额高达 40 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银行业发放贷款总额的 6%。不良债权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机构的效益和信贷能力的大大降低，使企业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从而严重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此外，出口贸易受到抑制也影响着经济复苏。1995 年上半年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丧失，1995 年 3 月至 5 月的两个月中，出口贸易就下降了 25.6%，出口

日本里库路特公司于 1984 年将其未公开上市的公司股票以每股 1290 日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曾根、宫泽喜一等 76 名政界要人。1986 年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到 1987 年 4 月，每股猛涨为 7250 日元。这种名为转让股票而实为贿赂的行径于 1988 年 9 月被揭露。经调查，起诉 17 人。自民党副首相宫泽喜一、首相竹下登先后被迫下台。

贸易的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

总之，日本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反映出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深重，也暴露出日本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弊端。因此，非进行彻底调整不可。

“1955年体制”的终结 自90年代起，日本政局进入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1989年里库路特事件等受贿丑闻相继披露，日本政治改革势在必行。政治改革不仅包括选举制度改革，也包括根绝金权政治，防止腐化，以获取民意，产生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1991年11月，宫泽内阁成立。宫泽首相尽管多次表示，决心推行“政治改革”，但是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导致的结构性腐败，使国民对自民党政权失望，甚至极为愤慨。由此产生了自民党本身的分裂和在野党采取联合的战略行动。

1992年5月，细川护熙脱离自民党另创日本新党。1993年6月15日，日本国会围绕改革选举制度的政治改革法案的争论激化。6月18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联合提出的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在国会通过，宫泽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一个月后举行全国大选。6月21日，以武村正义为首的十名自民党议员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另立先驱新党（亦称新党魁党）。6月23日，小泽一郎、羽田孜等人也退出自民党创立新生党。

1993年7月4日，日本开始第四十届众议院选举。19日揭晓，自民党仅获223席，在众议院的511个议席中未能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而无法单独组阁。7月22日，宫泽内阁宣布辞职。8月6日，由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等七党一派联合推荐的细川护熙当选为首相，从而正式终止了自民党长达38年的单独执政历史。“1955年体制”宣告结束。

细川内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于1993年9月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等有关政治改革的四项法案提交众议院审议，11月18日获得通过，但却于1994年1月21日被参议院否决，日本政局再度出现危机。1月29日众参两院最终通过这四项法案，但删去了实施日期。4月8日细川内阁下台。同月28日，羽田孜内阁成立，但只维持了两个月，于1994年6月30日被村山富市内阁取代。

村山内阁是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联合内阁。村山任首相后，社会党表示按照村山的要求修改和调整党的政策。这就是，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放弃中立和不结盟路线，肯定日美安全条约，承认“日之丸”是国旗、“君之代”是国歌。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政界长期对立、相互攻讦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尽弃前嫌，携手合作，实现了战后首次“保革”联合。

村山内阁继续推进政治改革，1994年11月，政治改革方案经参议院审查通过而最终成立，并决定12月25日实施。它包括修改公职选举法中的众议院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用制的选区划分法、防止腐败法以及政党法人资格授予法等三项。这些法案对众议院议员选举制度的改革、政党的法人资格、政治资金的来源以及对违法违纪者的处罚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取消现行的中选举区制，采用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用制，即在众议院的500人定额中，通过全国划分的300个小选区选出议员300人，同时将全国划分为11个比例代表制选区，按政党得票的比例分配这些选区议员的数额，共计200人。这样，日本自1989年开始提出的以改革现行选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历经五年磨难，终于告一段落。

一个选区一人当选的小选举区制明显地不利于小党。于是，日本政界出现了政党数由增多向减少方向发展即中小政党联合组建大党的趋势。1994年12月10日，成立了由新生党、日本新党、民社党、公明党等九个在野党组成的日本新进党。该党囊括了所有在野党，拥有众议院180个议席，是日本政坛上最大的在野党。其目标是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的大选中从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联盟手中夺取政权。新进党的成立表明日本政坛已从多党竞雄走向两党抗衡，即自民党与新进党两大保守政党对立的局面。它意味着取代“1955年体制”的新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的雏形已经出现。

1995年1月，神户大地震，人财损失惨重，村山内阁既没有及时拿出紧急救援对策，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完善的复兴计划。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使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引起社会骚动。9月，又发生驻冲绳美军强奸女学生案，引发了日本抗议美军暴行、要求修改日美军事协定的怒潮。这样，对村山内阁的支持率屡屡下降，到1995年底不支持率已超过50%。1996年1月5日，村山富市辞去首相职务。1月11日，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出任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内阁的首相。桥本内阁的诞生揭开了日本政坛分化、改组新的一页。

90年代的日本外交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体制结束，日本外交进入新阶段，其特点之一，是以日美关系为根基，以亚太地区为重点，以联合国为中心，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1990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和目标。他表示在“建立和平的今天，日本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1991年4月，海部又提出，日本今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时要注意受援国以下几点：一、军事支出动向；二、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导弹开发、制造等动向；三、武器进出口动向；四、促进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的努力和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状况。这表明日本开始将经济援助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外交手段。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组阁后，即提出要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强调苏美两极结构消失后应形成“多国协调格局”。

1993年8月细川内阁成立。细川避开“政治大国”一词，主张日本应作为“国际国家”，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在资金、技术方面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与国力相称的贡献。1994年6月村山内阁成立后，一再表示日本要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日本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国际上谋求发挥大国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大力推进“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上。而所谓“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就是积极参加联合国救援活动与维和行动以及最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90年9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第四十五届联大会议上提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1991年4月，日本政府向海湾派出六艘扫雷舰和400名自卫队员协助各国部队清扫水雷。1992年6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并据此于同年9月向柬埔寨派出第一批以工程兵为主的维和部队。

1992年1月，宫泽首相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提出，调整安理会成员国职能和构成以反映“新时代的现实”。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则声称“日本承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并声称日本要“争取五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日本还就改组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四项原则：一、不侵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既得利益；二、不损害安理会的信誉与工作效率；三、基于地区平衡增加新常任理事国；四、新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

1993年9月27日，细川首相在联大演说中表示，对于改革安理会一事，“日本将基于建设性的立场参加讨论”。

1994年8月，执政的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一致同意向卢旺达及其周围国家派遣自卫队，以医疗和卫生为中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年9月9日，执政三党的外务调整会议决定，以“基于宪法的理念明确规定不参加军事行动，取得国民的一致同意”为前提，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第四十九届联大的演讲中，呼吁联合国加速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和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敌国条款”，并表示日本决心在发展、环境、人权、难民、人口、艾滋病和吸毒等全球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作出比过去更大的贡献”。

日本在推进“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争取实现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同时，还极力争取实现“军事上的自立”，越来越强调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1991年《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军事力量的机能靠其他手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

日本的防卫费逐年增加，1991年度343.9亿美元，1992年度365亿美元，1993年度377亿美元，1994年度430亿多美元，1995年8月确定的1996年度预算达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西方世界第二位。同时，自90年代初以来日本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高技术化发展迅速。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和亚洲最大规模的驱逐舰队，其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反潜艇能力仅次于美、俄。陆、海、空军全部实现了指挥控制自动化、信息化。日本堪称东亚地区军事强国。

尽管日本的“军事自立”的扩军战略在国内仍受到和平宪法、自卫队法和无核三原则的限制，在国际上受到日美安保体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舆论的制约，而且日本政府一再声称“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但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日趋膨胀，很难消除亚洲各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心和疑虑。

第十八章 90年代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进入90年代,除了中东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但时间短暂的海湾战争以外,亚非拉地区性冲突的热点普遍降温,政局趋向稳定。各国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国经济发展,经济稳步增长,改革日益取得成效。

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逐渐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90年代上半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东北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南亚经济虽受政治不稳定的影响,但仍保持着中等发展速度。中东地区,阿以之间的和平进程虽坎坷不平,但在艰难曲折中有所进展,加上国际市场油价上涨,地区局势相对平稳,中东国家经济亦在上升。非洲、拉丁美洲开始摆脱经济困境,走上了经济振兴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等),以强烈的改革意识和较高速度的增长率,显示了勃勃生机。

冷战结束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和控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局面已成过去,但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90年代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趋势日益发展,各地区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和活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

在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与不同国家都存在着差别,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东亚国家生产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污染加重等因素,将牵制其发展速度,需及时作新的调整。拉美外债负担依然沉重。非洲仍徘徊在自然经济为主、以初级市场经济为辅的发展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依附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的被剥削的地位。一些国家尚未真正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有的国家与地区政局尚不稳定,武装冲突与内战尚未平息。在经济普遍增长的同时,贫困加剧和分配不公,以及执政者贪污腐败问题,日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体上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迈向21世纪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有着许多机遇。引起发展中国家积极变化的各种有利条件将继续发挥作用,随着各国政治形势的进一步稳定和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上的自主权和集体自力更生能力也将日益加强。

第一节 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印度的经济改革

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亚欧会议的召开 进入 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加快，1989~1991 年其平均增长率为 3.4%，1992~1994 年超过 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4 年和 1995 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6.2%和 5.9%，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8.5%和 8.4%。五年来的经济增长势头，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经济增长期可能到来。

在这个增长的高潮中，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遥居世界之首位。1991~1993 年东亚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8.3%。在西方经济萧条，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枝独秀，引人注目。

亚洲，主要是东亚，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95 年《世界竞争力报告》选择了十个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七个在亚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90 年代前五年，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 11.8%，五年进出口额已超过 1 万亿美元。1995 年已提前五年实现原定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低增长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工业国家衰退给东亚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进口贸易大幅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均从中国的进口贸易中获益。此外，中国成为吸引东亚工业化国家投资的重要市场，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国家经济与贸易的发展。韩国与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其中新加坡居首位。中国经济的起飞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发展的贡献是显著的，以致有的学者与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领导亚洲经济增长，为东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在 90 年代经济继续增长。在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亚洲“四小龙”大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侧重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1995 年增长率达 7.5%左右。例如韩国，1995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超过 1994 年的 8.1%，达到 9%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10,076 美元，在经济规模上名列世界第十一位。

除新加坡外的其他东盟国家抓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扩大对外投资和工业转移的机会，提高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大量吸收外资，其经济增长率 1995 年达 8%以上。其中马来西亚 1995 年达 9.6%，仅次于中国，居东亚第二位。印尼和泰国的增长率为 7%~8%。马、泰、印尼成为东亚新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入东盟的越南，由于经济革新与对外开放，经济迅速上升。1991~1995 年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 8.2%，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多项主要指标。它已成为亚洲吸引外资的新热点。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经济回升，已出现了增长的好势头。随着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地区经济合作的趋势增强，东盟作为一支重要的地区力量迅速崛起。冷战的结束，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东盟的发展与扩大创造了条件。

跨入 90 年代，印度支那地区的冲突降温，越南与东盟国家关系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获得新的发展。1990 年 8 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10 月，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1991 年 9 月，中国与文莱建交。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也走向正常化。为适应新的形势，东盟加快了地区合作的步伐。1991 年 10 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讨论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翌年 1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1992 年新加坡宣言》和《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六国经济部长还签订了为实现 15 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铺路的《有效普惠关税协定》，决定从 1993 年 1 月起，东盟国家的资本货物、制成品和加工农产品三大类商品在区内逐步降低关税，在 15 年内，即在 2008 年之前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这两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东盟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

为扩大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范围，《新加坡宣言》还提出，在柬埔寨问题解决以后，将在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上，与印度支那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欢迎所有东南亚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组织上，新加坡会议还决定加强首脑会议和秘书处的职能，决定东盟首脑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必要时可举行非正式会议，并将“东盟秘书处秘书长”的名称改称“东盟秘书长”，其地位升为部长级，权限扩大，以便在组织上加强协调，并实施东盟的计划。

1994 年 5 月，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决策人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东南亚共同体设想的声明》，提出东南亚十国联合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设想。1995 年 7 月，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年会正式接纳越南为第七个成员国。这是东盟成立 28 年来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标志着东盟为在 21 世纪建立东南亚共同体已迈出重要的一步。同时，东盟加速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决定在 2003 年提前实现贸易自由化。1995 年 12 月，在曼谷召开的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举行了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三国在内的东南亚十国领导人会议，决定在 2000 年以前接纳柬、老、缅为正式成员，最终形成东南亚十国共同体。首脑会议还决定在 2000 年以前把区域内的贸易关税降为零，并优先帮助新成员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使之尽快融入东盟体系。

在国际事务中，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领域的“东亚经济论坛”和安全领域的“东盟地区论坛”，均是由它倡议和召集主持的国际会议，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的重要场所。东盟地区论坛包括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和中国等 18 个国家的代表，定期聚会以讨论安全问题。通过这些活动，东盟逐步确立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的其他经济合作组织也在开展活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区、东北亚图们江自由贸易区以及一些增长三角区，形式灵活多样，它们的活动促进了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新形势下，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也日益发展。1989 年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召开了亚太经合会议（简称 APEC），这是一个政府间的协商机构。开始参加会议的有东盟六国、美、日、加、澳、新（新西兰）五个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共 12 国，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随后不断扩大，1991 年，中国及其台湾、香港两地区也加入该

组织。这个组织的成立，推动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199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经济展望声明》，就亚太地区走向21世纪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广泛交换了意见。1994年和1995年该组织又先后在印尼和日本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茂物宣言》和《大阪宣言》。《茂物宣言》宣布：“不迟于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大阪会议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出席。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宣布采取一系列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措施。会议获得成功，通过了《行动议程》，使这个组织走上具体务实道路。亚太经合组织的18个成员国拥有20亿人口，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1%，贸易额占世界的40%，是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组织，其发展将对21世纪的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

1994年底，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倡议，东盟积极推动、并获中国大力支持的“欧亚最高层对话”获得有关国家的响应。1996年3月1~2日，在曼谷举行了首届亚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日、韩和东盟七国、欧盟15国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会议的主题是“为促进发展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主要议程为三项：一、加强政治对话，二、促进经济合作，三、在多边问题上探讨合作的途径。

亚欧会议是在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世界形成东亚、西欧、北美三大经济中心的形势下召开的。25个亚欧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共谋开创亚欧两大洲间的联系渠道，从构筑21世纪世界新格局来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取得圆满的成果，发表了《主席声明》，并决定今后每两年分别在亚欧两洲召开会议，建立了两大洲之间直接对话的稳定形式。会议的《主席声明》指出：“亚欧会议进程必须是开放和逐步发展的。”这意味着会议为两大洲的多个领域的合作打开了大门。这次会议反映了欧洲国家第一次认真地把亚洲当作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来对待，双方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关系，也是亚洲国家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标志。

90年代的印度与拉奥政府的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政局动荡，1989~1990年两年内更换了三届政府。在经济上，英·甘地的调整没有突破尼赫鲁制订的发展战略框架，拉·甘地的改革也未结合本国国情，造成经济结构失衡，致使贫困化问题加深，经济陷于极度困难之中。拉·甘地之后的维·普·辛格政府放慢了改革步伐，而谢卡尔政府则走上了回头路。1991年1月，印度爆发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失业人数达3000多万，外债高达700亿美元，成为亚洲最大的债务国。财政赤字增加，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国库告急，外汇储备仅有12亿多美元（1991年5月），只够维持两个星期的进口费用。

1991年6月，以纳拉西姆哈·拉奥为首的国大党（英）在大选后组成印度新政府。拉奥上台后，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于7月初制定了摆脱危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把印度经济从过去半封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转变为全面开放、实行市场机制的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尼赫鲁的经济发展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拉奥政府的一整套以市场化改革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被财政部长曼·辛格称为“印度的第二次革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实行财政金融改革，降低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拉奥政府采取

削减国家财政补贴，紧缩信贷，压缩国防开支，提高部分粮食（大米、小麦）收购价格，并着手货币金融改革等办法。

（2）调整外贸政策，实行卢比贬值，改革汇兑制度，逐步做到卢比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废除出口补贴，简化进出口申报手续，降低关税，大力促进出口贸易。

（3）大幅度调整工业政策，基本取消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加强对国营企业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减少政府干预，促进公、私营部门的竞争，为印度工业注入活力。

（4）大力吸收外资，制定以鼓励为主的更加开放的外资政策。1993年签署《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公约》，并与英、美、德等国分别签订双边投资条约。采取了简化投资审批手续，实行股权、税收优惠，放宽外汇管理，扩建出口加工区，向投资者开放股票市场等措施，以吸引外商投资。

（5）将农业放在首位，优先发展农业。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削减农用机械和家禽原种进口税，增加对农业的贷款。

（6）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实施农村扶贫计划。

这套新政策的总目标是实施市场自由化，建立外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此，拉奥政府制定了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八五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转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强调计划的灵活性，并给予邦政府执行计划的自主权。印度联邦政府的中央计委由一个宏观设计机构和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超级部”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人员编制也大大缩减。

印度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国民经济获得恢复和增长。经济增长率在改革的头一年（1991~1992年）仅为0.8%，1992~1993年回升到5.1%，以后两年（1993~1994年，1994~1995年）分别为5.1%和6.3%。1995~1996年度估计亦可达6%以上。“八五计划”前四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7%。第二，国际收支状况改善。由于外资大量流入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对外收支逆差缩小。1995年3月底外汇储备达208亿美元。第三，工业生产活力增强。国营企业扩大了经营自主权，调整了生产计划和产品结构，生产注入了活力。私营企业更加活跃，私营企业家投资积极性增加。1991~1994年申请的投资额为34,500亿卢比。学者预测，90年代后半期印度将进入私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时期。第四，农业持续增长。连续八年的农业丰收使粮食储备达3500万吨，并有大量粮食出口。1995~1996年度大米出口300多万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不过，印度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仍受到土地问题的制约。

此外，拉奥政府实施“新技术政策”，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强国家的投入。1995年设技术开发基金，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据统计，印度设有综合性大学183所，各类学院7513所，迄今培养的科技人员总数已达340万人，居世界第三位。

对外方面，适应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新形势，拉奥政府改变了印度长期倚重苏联、同苏保持“特殊关系”的政策，奉行务实的多方位外交政策。1993年1月叶利钦访印，双方签订了《印俄友好合作条约》，条款中取消1971年《印苏和平友好条约》中一方受攻击、另一方给予援助的内容，印俄之间的战略关系不复存在。印度为维护其在南亚政治中的优势，并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采取了改善与加强印美关系、努

力修复一度冷落的印俄关系、调整和改善印中关系及与周边邻国关系、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的方针。它加强与东盟的联系，成为东盟的对话国之一。它希望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并积极参加推进组织“印度洋经济圈”。

拉奥声称印度要以“中间道路”作为指导思想，强调其改革的渐进性和对有关各个方面的平衡和兼顾。但印度改革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拉奥改革中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突出的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内债负担。1994~1995年度印度财政赤字为国内总产值的5.9%，内债总额在1995~1996年度已达30,789.8亿卢比，相当于这一年度国内总产值的62%，上年度支付的内债利息达6000亿卢比，约占中央财政经常收入的53%。拉奥改革虽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但国营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中央一级大企业仍有一半为亏损企业。

特别是，印度经济虽有增长，但人民生活水平低，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多少改善。全国失业人数高达3674万（1995年1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居民人数的40%。因而拉奥改革并没有获得广大下层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印度社会的民族、教派和种族问题在拉奥政府执政时期没有缓和。拉奥上台后，印占克什米尔穆斯林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教派冲突日益尖锐。1992年12月爆发了巴布里清真寺教派流血冲突，造成1600人丧生，经济损失达1000亿卢比。1993年1月又在孟买连续发生13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300人死亡。11月，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又发生教派冲突危机。教派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对印度经济改革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严重牵制了改革的进程。

印度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也是经济改革发展的阻力。80年代末的“博福斯军火受贿案”尚未了结，1992年4月又发生孟买股票丑闻。政府和金融部门许多官员被卷进去，商业部长因与此案有染被迫辞职，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设计师”的财长曼·辛格因负有领导责任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一丑闻不但直接影响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而且，由于辛格财长的辞职，使拉奥失去了得力助手。

在这种形势下，反对党在议会内外利用一切机会抨击执政党，拉奥政府威信下降，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996年春印度举行第十一届人民院选举。选举结果，形成了印度人民党、国大党（英）和联合阵线[人民党、印共（马）]等三足鼎立的局面。拉奥领导的国大党（英）仅获136席，失去了独立组阁的资格。6月，以德韦·高达为总理的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从此，印度的多党联合执政体制取代了国大党一党长期执掌中央（联邦）政权的局面。

一些印度官员在政府与瑞典博福斯公司的一笔价值13亿美元的军火贸易中，收受4260万美元的巨额佣金。1987年被报界披露后，拉·甘地政府遭到抨击。

印度国营银行官员将354亿卢比（13.7亿美元）的银行资金投入股票和证券市场，非法获利。1992年4月被曝光后，商业部长和财政部长相继辞职，一名计划委员会委员涉嫌受审。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古巴的改革

越南的经济革新和对外开放 在亚洲诸国中，越南一向被列为经济滞后的贫困国家，但从 80 年代末，尤其是 90 年代初以来，越南开展了经济革新和对外开放，一跃成为经济迅速增长、市场繁荣活跃的地区，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越南建国时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国后又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1955~1965 年，越南北方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迅速。这一时期完成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但抗美援朝使经济建设进程被打断，“一五计划”（1961~1965 年）未能如期完成。1975 年抗美援朝和国内统一战争结束后，越南加入经互会，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并制订了恢复发展经济的“二五计划”（1976~1980 年），但自 1978 年底发动入侵柬埔寨的战争后，经济急剧滑坡。“二五计划”的指标未能完成，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和危机之中。

为摆脱困境和振兴经济，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越南执行“新经济政策”，放慢农业集体化步伐，实行农业承包制，开放自由市场，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经济调整政策使越南经济有所回升。但 1985 年 6 月越南实行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由于操之过急，引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达三位数，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人均国民收入不足 100 美元。这时，越南的周边国家，东亚诸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在国际改革潮流的带动下，越南于 1986 年 12 月召开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了经济革新和对外开放的道路。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越南适应经济建设和国内外新的形势，改变了过去对苏“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和封闭的对外经贸政策，实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并加速了经济革新的步伐。

1991 年 6 月，越共在河内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阮文灵在大会上作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总报告。大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方向、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五项基本原则，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以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同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的方针，以废除长期实行的官僚的、集中的统包制体制。

越共七大制定了 1991~2000 年的经济社会战略，提出了十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规划和五五计划（1991~1995 年）。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8%，国民收入平均增长 6.2%~8.2%，到 1995 年人均国民收入比 1990 年增长 40%，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两位数以下。

越南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改革最初是下面自发搞起来的。70 年代海防、永富等地自发分田到户。越共领导曾批判、处分地方干部，但难以压制，后不得不认可。1980 年在海防市郊进行生产承包试点，取得成绩后在全国推广。这一阶段（1980~1987 年）主要是实行“三五承包制”，将生产过程的部分环节承包给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没有承包下去。1988 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10 号决议”，正式实行农户承包责任制，规定农民家庭为农业基本经济单位，拥有经营自主权，可自耕自牧，在交纳农

业税后，产品可自由支配，包括出售。政府调整了生产结构与投资结构，增加了农业投入，把粮食、副食品生产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1989年3月，越南放宽了粮食政策，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农民在完成公粮、合同订购粮后，可自由销售粮食和农产品，取消了城乡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粮食流通的各种限制，取消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定量配给，国家对职工的粮食补贴由原来供应平价粮改为计入工资，即由“暗贴”改为“明补”。国营粮食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粮价随行就市浮动。粮食市场全面放开较早，是越南改革的一个特点。

1993年6月，越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集中讨论了深化农业和农村改革的问题，提出了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等重要问题，并决定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同年7月，越南国会通过新的土地法，规定农户使用土地的期限由15年延长到20~50年，在使用期间享有转让、交换、出租、继承和抵押的权利。

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越南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农业投资，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造盐碱地，鼓励开垦荒地，引进优良高产种子，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农业，实行农产品多样化等等。

农业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9年是全面推行承包制后的第一年，粮食由不足变为自给有余，首次出口大米140万吨。自此以后，越南每年出口大米200万吨左右，成为居泰国、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大米出口国。1995年虽发生严重水灾，仍取得多年来最好的收成，出口粮食达220万吨。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产品成为越南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改革国营企业，发展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重要任务。越南的体制改革是逐步深入的。在1989年前，越南主要实行对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其经营自主权，限制上级行政机构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1989年至1992年重点是鼓励和促进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将商业、服务业和加工业中的小型国营企业私有化。1992年后，对企业体制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同时颁布了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允许私人企业进入除军工生产以外的任何领域，可自由选择合伙人和职工，并给予某些私人企业外贸经营权。1994年又颁布《企业破产法》，在企业经营中推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除关系国计民生的国营企业外，政府不再给企业补贴，把企业推向市场，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实行转产、合并或宣布破产。经过几年的改组合并或民营化，据统计，改革前越南有一万两千余家国有企业，到1995年只保留六千余家，一半左右被关、停、并、转或破产，但它们大多是地方中小企业。

越南为集中力量提高产品质量，参加国际竞争，按行业组建了一批各种类型的集团公司，如煤炭、钢铁、电子、机械等集团公司；同时实行股份化的试点，以吸收职工、居民、民间企业或外资入股，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对国有企业股份化问题有不同认识，并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尚处于初步试验阶段。

经济体制的改革，废除了官僚的、集中的统包制，将过去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转向了国家管理下的市场体制，使越南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起来。除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外，城乡各地的多种经济单位大量涌现，个体与私有企业为主的非国营经济已达到相当规模，它们创造的

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了颇大的比重，在扩大社会总供给、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市场、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实行商业、财税体制改革，以平抑物价，遏制恶性的通货膨胀，是越南改革的最紧迫任务。在改革前，越南在流通领域的“同步改革”曾经失败，198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74.7%以上，达到危险的三位数。因而，越南改革十分重视流通领域的改革，将之作为突破口，把放开物价、稳定货币、治理通货膨胀作为改革的关键性环节。过去，越南的一切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后来实行价格双轨制，即官价和自由议价。从1989年起，开始价格并轨，实行单一市场价格，并逐步放开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供应价格，并使一些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接轨。到1993年，除电力、邮电、运输、汽油、化肥、水泥、自来水、公房租金等仍由国家统一定价以外，其余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律放开，而且一步到位，基本完成价格改革。

越南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采取了措施大力治理通货膨胀，如大幅度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严格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实行外汇汇率并轨，以及对进口放宽控制、简化手续等等。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加上上述措施的贯彻，恶性的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到1992年通货膨胀率降至17.5%，1993年进一步降为5.2%。不过1994年又回升到两位数。越南采取了平抑物价的紧急调控措施。1995年全年通胀率控制在12.7%。价格改革的基本完成和通货膨胀的初步控制，是越南经济革新的显著成果之一。

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也是越南在革新时期的重大任务，并取得显著成效。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越南调整倒向苏联、东欧的外交路线，从柬埔寨撤军，并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了努力，使越南摆脱了外交上的被动孤立状态。1991年10月，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平协定在巴黎签署。11月，越中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南与东盟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1992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观察员。随后越南与欧美国家关系改善。1994年2月，美国取消了对越禁运。1995年，越南外交取得巨大胜利。这年7月，越南正式加入东盟，随后与美国正式建交。对外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有利于越南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大。

1987年12月，越南国会通过新的外国投资法，后又作了多次修改。这个法规允许外国企业及个人以合作经营、联营和建立外商独资企业三种形式在越南投资，并在对外资企业的征税、利润、价格管理、资源利用和法律仲裁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并陆续颁布了七十多个涉外法规，增强了投资环境的透明度。越南的外资法被称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条件最为优惠的投资法。在吸引外资方面，越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95年底为止，已有52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家公司在越投资，总项目为1515个，协议金额达190亿美元，外资的到位率约为三分之一。在对越南的投资中，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居第一和第二位，日本第三。外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旅游业，此外有建筑、交通运输、邮电及农牧等行业。投资地域以胡志明市为重点，但已从越南南方向北方扩展。

与此同时，越南的外贸发展迅速。到1995年为止，越南已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1995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13亿美元。越南虽然没有扭转贸易逆差状况，但出口增长速度快，有一些产品不但在东南亚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进入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市场。石油、煤炭、

水产、服装、鞋类、咖啡和大米是它的重要创汇产品。

越南还借鉴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在胡志明市、岷港、海防、河内和芹苴等城市和港口先后建立了出口加工区。1994年底又颁布《工业园区规定》，以吸引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越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已呈蓬勃发展之势。

十年经济革新，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1991~1995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8.2%（计划为5.5%~6.5%），工业生产平均增长13.3%，农业生产增长4.5%，出口金额增长20%。经济结构有所变化，工业和建筑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22.6%上升到1995年的29.1%，第三产业从38.6%上升到41.9%。全社会基本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5.8%上升到1995年的27.5%，其中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7%。

1996年6月28日至7月1日，越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召开。越共总书记杜梅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十年来革新事业已取得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巨大成就。七大提出的1991年至1995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已经摆脱经济社会危机，但在某些方面还不太稳固。”他说：“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提出的为工业化准备前提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允许转入一个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时期。”

越共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工业国的远景规划和新的五年发展计划，指出：“从现在到2000年这个阶段，是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发展时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计划规定，到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比1990年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10%；农、林、渔业生产增长约4.5%~5%，工业增长14%~15%，服务业增长12%~13%，出口增长约28%，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为30%。到2000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约占19%~20%，工业和建筑业占34%~35%，服务业占45%~46%。计划完成将使越南的面貌大为改观。

越南的经济革新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又一个比较成功的试验，它的成就已引起世界的瞩目。

古巴的经济调整和改革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90年代，在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美国敌视古巴的活动变本加厉，古巴面临严峻的考验，它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古巴革命胜利后，1961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76年颁布社会主义宪法，规定古巴是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对外，发展了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合作，将古苏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1972年加入经互会，参加了苏联的“国际分工”，实行以糖、镍、热带水果和烟草等为主要生产和出口物资的专业化。同时，仿效苏联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70~80年代，古巴虽然受到美国的包围和封锁，但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经济发展迅速。1971~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曾高达10.1%。1975~1985年，古巴经济继续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7.2%。但古巴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严重依赖与苏联、东欧的贸易和外援的基础上的。同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苏联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金额约占古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建国三十多年来，古巴向苏联东欧国家借债约两亿美元，这使古巴

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由于美国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制裁，古巴对外经济关系处于“一边倒”状态，它不能参加世界和拉美地区性的经济组织，既不是美洲开发银行的成员，也得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和资助。这给古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巨变，古苏“特殊关系”和经互会合作体系的瓦解，使古巴经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全球战略改变，开始逐年大幅度削减对古巴的援助。1991年9月，在未事先同古巴协商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宣布从古巴撤军。在经济方面，废除了以往与古巴的易货贸易和优惠的价格政策，采取以“可兑换货币”结算方式，导致古苏贸易额锐减。由于向苏出口的食糖价格从原来的每吨800美元降到500美元，使古巴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苏联削减向古巴供应的石油数量，导致依赖从苏联进口石油的古巴发生空前严重的“能源危机”，大部分工厂倒闭或半开工，交通一度陷入瘫痪，生产下降。1990~1993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5%，经济形势恶化，人民生活困难。

与此同时，美国乘机加强了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企图颠覆古巴社会主义政权。1992年美国实施《托里塞利法案》，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封锁、禁运。法案规定，禁止美国公司、美国海外子公司及任何外国同古巴贸易，凡到过古巴的外国船只在六个月内禁止进入美国港口。美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与古巴进行贸易和向古巴投资。设在迈阿密的马蒂电台和电视台加紧了反古巴的宣传，流亡美国的古巴反政府分子设立“流亡政府”与国内反对势力互相呼应，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也加紧了阴谋颠覆活动。

为了摆脱困境，古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国情，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并实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保证社会主义古巴的生存和发展。

1991年9月，古巴共产党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特殊时期”的内外政策。对外，古巴采取务实的多元化外交政策，以打破美国孤立古巴的企图。为重返“泛美体系”，改善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表示支持拉美一体化；同时重视加强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越南和朝鲜的关系，赞扬和关注中、越两国的改革事业。对内，古巴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复阐明古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反对走苏联、东欧式的改革道路。卡斯特罗多次表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须使社会主义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破坏它。另一方面，古巴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具体内容有：精简机构，改组领导班子，采取直接投票选举制；调整经济结构，强调发展农牧业，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权，大力发展旅游业，实行新的经贸方针和对外贸易的多元化。古巴对国民经济体制实行调整，建立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国有民营”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为辅的经济体制，并颁布了外国投资法，允许建立合资企业和其他联合企业。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也作了较大的调整。1993年9月决定把国营农场分成享有生产、经营和核算自主权的较小的生产合作基础组织。国营农场仍保留建制，它是代表国家对生产基础组织进行领导和管理的机构。生产基础组织则与国营农场签订生产承包合同，实行块地生产责任制。1994年下半年，古巴恢复了一度禁止的农贸自由市场，还开办了工贸自由市场。此

外，古巴还实施了财政和税制改革。

经济调整与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古巴出现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局面。首先是，经济恢复并开始增长。1994年古巴经济增长0.7%，1995年增长2.5%，取得了自“特殊时期”以来的首次增长。1995年旅游业创汇10亿美元，成为重要创汇部门。二是吸引外资政策取得明显效果，外国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到1995年底达21亿美元，合资企业由1991年的十多家发展到1995年的二百一十多家，几乎遍及各个经济部门。投资的外商主要来自西班牙、加拿大、法国和墨西哥等国。三是初步实现了外贸的多元化，逐步形成了新的对外经济关系网络。古巴同世界近一百个国家的三千多家公司保持经济和商业联系。在能源供应方面，除继续换取俄罗斯的石油以外，还从墨西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国购买石油。同时大力加强了与拉美国家、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1994年古巴的对外贸易额达32.7亿美元，比1993年增加3.1%。四是经过调整，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多种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国有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扩大，经济上活力增强。农业生产合作基础组织和农—工自由市场的建立，突破了部分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旧网络，开始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产、供、销新渠道。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五是财政税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促进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1993~1995年财政赤字逐年下降，为经济复苏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到1996年，古巴已渡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国家的政局也基本稳定。但是仍面临很多的困难。美国的敌视和制裁仍然是对古巴的严重威胁。1996年5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开始实施强化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国内的改革还有待深入发展，经济上还存在严重的困难。蔗糖生产连年下降，工厂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现象严重，生活必需品短缺，社会不安定因素与反对派的势力威胁着政局的稳定。

面对着依然严峻的形势，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共产党多次强调古巴将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方向，走适合古巴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赫尔姆斯—伯顿法》是1996年3月由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该法规定，禁止其他国家在美国销售从古巴购进的产品。若外国公司在古巴1959年革命后收购、占用或转让被古巴政府没收的财产，或利用这些财产谋取利益，这些财产的原所有者可以通过美国法院对它们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法案带有明显的治外法权的性质，损害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遭到欧盟国家和加拿大等国的反对。

第三节 海湾战争和 90 年代的中东局势

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 两伊战争的战火刚熄灭不久,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向邻邦科威特发动全面入侵,并直接威胁沙特阿拉伯与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紧急出动,开赴海湾,进驻沙特阿拉伯,与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形成军事对峙。这一地区战云密布,最终引发了震动世界的海湾危机。

科威特是海湾地区一个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91万(1988年)。在两伊战争中,它曾全力支援伊拉克。但是,它在历史上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又与伊拉克存在矛盾与争端。伊拉克出兵占领科威特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扩张领土,二是掠取经济利益。

伊拉克一直宣称科威特为其领土的一部分。科威特在7世纪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871年,科威特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英国殖民者向海湾扩张后,1899年,英国成为科威特的宗主国。1939年科威特又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科威特于1961年6月19日摆脱英国统治,宣布独立。但伊拉克的历届政府却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尽管在1963年承认了科威特的独立自主,但没有放弃兼并其领土的企图。两国曾多次就边界划界问题举行谈判,但均无结果。1973年,曾发生边界冲突。伊拉克提出要科威特割让或“租借”位于阿拉伯河以西的布比延岛和沃尔拜岛,以保证伊拉克有一个通向海湾的出海港口,但遭到科威特的拒绝。

伊拉克入侵的另一动因,是企图获得科的石油资源与美元储备,增强其经济实力。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损失2000亿美元,外债高达800亿美元,其中欠科威特200亿美元。伊拉克认为它为保卫阿拉伯世界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称所欠之债为一笔“血债”,要求勾销,科威特没有同意。在武装入侵前夕,伊拉克还指控科威特从1980年起“偷采”了属于伊南部鲁迈拉油田价值24亿美元的原油。此外,伊拉克还指责科威特不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分配的采油限额,与阿联酋一起,超产和滥售石油,致使它蒙受14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损失,要求科威特赔偿。科威特是一个拥有世界石油储量20%的石油王国,并拥有大量石油外汇储备,伊拉克企图通过兼并它,占据其油田,成为主宰中东事务、影响世界的地区大国。

边界领土争端与石油、债务纠纷,使科伊之间矛盾日趋尖锐。1990年7月31日,伊拉克与科威特高级谈判代表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会晤。伊拉克在边境集结兵力达10万人。8月1日,吉达谈判破裂。双方当时商定,后续会谈将在两国首都举行。但是,伊拉克恃军事力量强大,不顾国际法准则,发动了对科威特的武装进攻。

8月2日凌晨2时,10万伊拉克大军从巴士拉、鲁迈拉、布赛亚等方向越过边界,向科威特进攻。伊拉克拥有经过八年两伊战争实战锻炼的百万大军,而科威特只有约两万人的军队,又无实战经验,双方军事力量与装备对比悬殊。战争爆发几小时,伊军已逼近科威特首都。在首都,科威特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达斯曼王宫的保卫战最为激烈。科威特埃米尔的胞弟法赫德亲王亲自指挥,并与他的两个儿子战死在宫内。埃米尔贾比尔被迫乘直升机飞往巴林,随后又飞往沙特,并在沙特建立了临时政府,号召抵抗伊拉克的侵占。

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8月4日,宣布成立“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

由一名叫阿里的上校任政府首脑。接着又宣布“科威特共和国成立”。8月7日，伊拉克宣布伊科“两国永久合并”，“科威特国家永远消失”。紧接着，又宣布完全勾销它在两伊战争中欠下科的债务。28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布总统令，宣布科为伊的第十九个省。9月23日，伊拉克宣布停止科的货币流通，而以伊拉克货币取代。这样，伊拉克便逐步吞并了科威特。

伊拉克悍然兼并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它企图称霸海湾地区，危及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引起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不满。入侵的当天，8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随后，联合国安理会自8月6日至11月29日相继通过11个决议，宣布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无效，对伊拉克实行全面制裁，谴责伊拉克军队侵犯外国驻科使馆的行为，要求伊拉克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外交人员，对伊拉克实行空中封锁，特别是678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必须在1991年1月15日前撤出科威特，否则就使用一切手段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理会作出这么多的紧急决议，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美国与西方国家迅速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8月7日，美国实施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计划。布什总统下令美军向海湾和沙特阿拉伯集结。到11月初，进驻海湾地区的美军已达24.5万人，其中地面部队17万余人；空军3万人，拥有作战飞机444架，加上海军航空兵的533架，共达977架；海军4万人，各型舰船（包括航空母舰）共85艘。美国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如F117隐形战斗机、“爱国者”式防空导弹等运到了海湾，以对付伊拉克。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集结。

8月13日后，英、比、澳、加、法、荷、意及苏联等国也相继派兵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日本也企图乘机派遣自卫队到海湾，但由于国会否决未能实现。

伊拉克侵吞科威特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谴责，也有同情。多数阿拉伯国家既反对伊拉克吞并一个弱小的邻国，又不愿看到超级大国美国乘机在海湾立足。在8月10日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有12国赞同派军保护沙特，免遭伊拉克入侵，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的军队还参加了多国部队。

几十万人组成的多国部队进入海湾，使伊拉克面临沉重的压力，联合国的制裁使伊拉克的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但是伊拉克的态度仍十分强硬，它将数千名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侨民、旅游者集中起来，作为人质，并把其中一些人质转移到重要的军事设施和炼油厂、饮水净化厂等经济目标内，以“人质盾牌”来对抗美国的“沙漠盾牌”，企图迫使美国放弃进攻或撤军。它也先后释法、德、日等国的一些人质，以分化、瓦解多国部队。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扩军备战的同时，于8月12日提出谈判和撤军的三项条件，声称，只有以色列撤出被占的阿拉伯领土、叙利亚撤出黎巴嫩、美国撤出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才会撤出科威特。美国和以色列拒绝了伊拉克的条件。海湾地区危机日趋严峻，战争已不可避免。

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通过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拒不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可“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实际上这是给伊拉克的最后通牒。

为阻止战争发生，国际社会曾为争取和平解决危机作了种种努力。美、伊双方于 1991 年 1 月 9 日在日内瓦会谈，但伊拉克坚持科威特为其第十九个省，而美国要求伊拉克必须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会谈终于破裂。1 月 13 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飞抵巴格达，进行最后的和平努力，但仍告失败。战争迫在眉睫。

1991 年 1 月 17 日，当地时间凌晨 2 时 40 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起代号“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向伊拉克部队全面攻击。多国部队利用高技术优势，出动飞机三万多架次，首先大规模轰炸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的伊军指挥中心、防空系统、通信枢纽、共和国卫队师、运输补给线和前沿阵地，使伊拉克的通信系统和交通设施等遭到严重破坏，并基本上取得了制空权。伊军虽不断向沙特首都和以色列境内发射“飞毛腿”式导弹，但效果不大，大多数的“飞毛腿”导弹都被美军的“爱国者”导弹摧毁。以色列在美国抑制下，采取不予还击的方针，使萨达姆企图把以色列拖入战争、从而拆散美国的反伊联盟的计划没有实现。为保存实力，伊拉克的飞机大批飞入伊朗境内，被伊朗扣留。

战争爆发后，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继续进行和平努力，提出停火建议。2 月 15 日，伊拉克宣布愿意接受安理会 660 号决议，有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伊外长阿齐兹随即飞往莫斯科，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谈。2 月 19 日，苏联提出四点和平建议，呼吁美国推迟地面进攻。22 日，苏联进一步提出伊拉克撤军方案，即停火一天后伊拉克开始从科威特撤军，在 21 天内撤完。但美国认为这个方案对伊太宽容。布什总统拒绝了苏联的调停，提出伊拉克撤军的最后期限——格林威治时间 2 月 23 日 17 时。伊拉克表示，美国的“最后通牒”是可耻的，加以拒绝。

2 月 24 日当地时间 4 时，在美国的最后期限过去八小时后，多国部队分四路向伊拉克发起全面进攻。在各国部队的凌厉攻势打击下，伊拉克军队的防线迅即被突破。多国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把大批部队悄悄调到西部沙伊边境，从西线突袭伊拉克南部，包抄伊军后路，并同从南面向科威特推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使数以万计的伊军陷于被围歼的境地。伊拉克被迫于 2 月 26 日通知安理会，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至 27 日凌晨，伊军全部从科威特撤出。被伊军占领七个月的科威特获得解放。28 日，美国宣布停火，多国部队中止战斗。海湾战争基本结束。

海湾战争的结束虽比人们预计的要快，但持续半年之久的海湾危机却对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影响。美国在海湾战争的胜利和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东的存在，反映了美国势力的增长。伊拉克的入侵和兼并科威特的行为，反映了地区霸权主义的抬头。伊拉克的失败，使中东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新的分化与改组。战争的结局对战后中东地区的秩序安排，包括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阿以关系发生重大影响。海湾战争加剧了亲西方和反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伊拉克战败和巴解支持伊拉克陷入困境，客观上有利于以色列。战争给科、伊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两国在战后的重建都是十分艰巨的。海湾战争是苏联东欧剧变、全球格局失衡下的产物，其结果对世界新的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产生深远的影响。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苏联的势力一落千丈。在推动阿以和谈和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的影响与作用空前增长。

阿以对话与中东和平进程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而巴勒

斯坦问题的争端主要是阿犹之间，即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实行阿犹分治的决议未能实现，由此，发生了阿以之间的武装冲突，爆发了多次战争。在大国的干预下，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经过几次战争，以色列占有了整个巴勒斯坦，并且占领了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但战争并未带来和平与稳定，阿以双方均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和损失。显然，用武力无法消灭对方，也解决不了双方的争端。

从70年代初开始，阿拉伯与以色列双方在认识上开始发生变化。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开始对话，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揭开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序幕。

进入8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在曲折中有所前进，突出表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伯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思想认识的转变。阿拉法特日益认识到，用武装斗争不可能把以色列人“赶下地中海”去，也不能解放被占领土。一些阿拉伯国家开始调整对以色列的战略。1982年在非斯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改变了对以色列不接触、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政策”。1988年11月，巴解组织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并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与此同时，以色列虽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十年的阿以冲突的严酷事实使以色列人认识到安全不能光靠武装力量。1987年以来被占领土上持续不断的巴勒斯坦人的起义在以色列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色列当局的镇压并不能使巴勒斯坦人屈服。

进入90年代，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出现了巨大的新的变化。经济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上升，用军事手段解决矛盾冲突日益让位于政治解决。中东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对世界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促进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为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力促阿以和谈。在新的形势下，阿以双方终于开始新的中东和平对话的进程。

但中东和平进程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1991年10月30日，由美苏倡议的阿以双方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中东和谈，由于阿以冲突的一个重要角色——巴解组织被排除在会谈之外，遇到了严重困难。这次历时22个月的十轮中东和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1992年7月，主张同阿拉伯人媾和的以色列工党取代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拉宾任总理，佩雷斯任外长。在国内外和平势力支持下，拉宾表示要“不受摆布，独立自主”地推进阿以和谈，以实现“以土地换和平”。他一面主动采取措施缓和阿以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挪威的热心协助，与巴解组织开展秘密会谈。秘密会谈从1992年12月开始，到次年9月9日，终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达成了相互承认的协议，并缔结了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的方案。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带实质性的突破。

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政府安排的原则宣言》，达成了双方相互承认和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协议。双方一致认为，“现在应该结束几十年来的对抗和冲突，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努力实现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和安全的生活环境，并通过双方商定的政治进程，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解决

的历史性的和解”。巴以协议的签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揭开了中东从战争走向和平的新篇章，标志着中东和平历程上的一个新起点。这个协议受到国际上的广泛欢迎，并推动了阿以多边对话的发展。

以巴以协议为契机，阿拉伯国家纷纷走上与以色列和解的道路。在巴以协议签字的翌日，拉宾总理访问了摩洛哥，同摩国王哈桑二世举行了会谈。随后又访问了埃及，同穆巴拉克总统会谈。在巴以协议签字的第二天，约旦和以色列在华盛顿也签署了关于双方和平谈判的框架协议。此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地区实行自治的方案逐步落实。

1994年5月4日，巴以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了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开罗协议正式确认了加沙和杰里科两地的自治地位。5月18日，巴勒斯坦警察完成了在自治区的进驻与部署，取代了以色列占领军。7月，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返回加沙，巴勒斯坦自治领导机构开始运作。巴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同年7月25日，约旦与以色列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国之间的长期冲突已经结束，两国的目标是“在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实现公正、持久与全面的和平，并在两国之间签订和平条约”。10月，约旦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平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95年中东和平进程继续有所发展。巴以双方在埃及的塔巴通过艰苦的会谈，达成了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规定到1997年7月以色列军队完成重新部署时，巴勒斯坦将控制约旦河西岸90%的领土。在第一阶段，以军将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盖勒吉利耶、拉姆安拉、伯利恒六个城市和希伯伦的部分地区，以及450个乡镇，但以军将继续控制西岸定居者途经的公路，并保卫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这一阶段约需六个月。其他重要问题如耶路撒冷地位、犹太定居点和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将在1996年5月前举行的谈判中决定。最终协议定于两年后商定。9月28日，巴以双方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塔巴协议。

1993年奥斯陆宣言和1995年塔巴协议签署后，“以土地换和平”的主张日益变成现实。但这两个协议的实施触犯了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居民点移民的利益，与犹太极端分子的主张更是格格不入，引起了以色列内部矛盾的激化。犹太极端分子力图阻止和平进程，并将他们的仇恨集中在全力推进这一进程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身上。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特拉维夫国王广场的和平集会上被一名犹太极端分子枪杀身亡。凶手伊加尔·阿米尔当场被擒。为表达对这位为中东和平进程而献身的斗士的敬意与哀悼，一百多万以色列人参加了葬礼，八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其中有阿拉伯国家的首脑来到耶路撒冷赫茨山公墓向他告别。

拉宾总理被刺身亡，给以色列局势和中东和平进程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外长受命组阁。他宣称将继承拉宾的未竟事业，继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在他的主持下，塔巴协议实施进展比较顺利。以色列军队相继撤出杰宁、希伯伦及西岸最大城市纳布卢斯。叙利亚在美国力促下也表示将恢复与以色列的谈判。以色列与约旦的关系平稳发展，双方经济合作逐渐展开。

1996年1月，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举行大选，阿拉法特和主张和谈的温和派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伊斯兰激进教派政治组织哈马斯和一些其他激进派

哈马斯，即伊斯兰抵抗运动，1987年7月在加沙地带成立。它既是一个宗教、社会和慈善救济组织，又

别抵制这次选举。但未成功。

但是，中东和平进程是很艰难的。预定于 1996 年 5 月开始的巴以之间的新一轮谈判，难度很大。关于巴勒斯坦自治区最终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犹太定居点以及耶路撒冷归属等问题双方分歧很大。叙以谈判是中东实现和平的关键，一旦叙以和谈取得成效，黎巴嫩将迅速跟进。但戈兰高地这一争端的焦点问题很难解决。有关水资源控制与用水分配也是巴以双方激烈争执的问题。以色列用水的三分之一、饮用水的将近一半来源于约旦河西岸的地下水，巴勒斯坦人每年只得到从地下水抽出水总量的约四分之一。巴方主张由自治当局控制本地水资源，但遭到以方拒绝。巴以和平谈判获得国际社会和中东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领导人的欢迎与支持，然而叙利亚、伊朗、利比亚表示不满或反对，海湾阿拉伯国家表态谨慎。以色列领导人关于不会撤退到 1967 年前的边界和以色列拥有对耶路撒冷主权的讲话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批评。

巴以和平进程的发展遇到了来自双方内部极端势力的强烈反对，阻力日益增加。奥斯陆协议和塔巴协议的达成，使犹太极端主义势力的“大以色列”梦想破灭，以色列内部主和派和右翼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突出。利库德集团等反对党一再对工党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力图推翻工党政府。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分子组织哈马斯抵制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并多次制造爆炸恐怖事件，这使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为右翼利库德集团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

为反击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向以色列境内发动导弹袭击，以色列军队于 1996 年 4 月对黎巴嫩进行持续 16 天的攻击，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其中多数是平民。这不仅引起阿拉伯人的不满，并使工党在 5 月的大选中失去了阿拉伯血统的以色列选民的选票。结果在 5 月 29 日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失利。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当代伊斯兰教有巨大的发展，伊斯兰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也发生深刻的变化。60 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活跃。70 年代末，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胜利为标志，这一运动发展到高潮，广泛影响到亚非广大地区，尤其是中东，日益形成对国际局势和中东局势的巨大冲击。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每当伊斯兰国家处在社会矛盾激化或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政治与经济出现危机，传统社会失衡，社会成员难以承受和理解时，往往就有一种要求回到《古兰经》去的宗教净化运动诞生。这个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以原教旨主义为旗帜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要求遵循穆罕默德的遗训，恢复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全面实施伊斯兰法则，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同时要求清除一切异端邪说及外来的影响。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一场单纯的伊斯兰复古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运动始于 18 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半岛。近代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勒·瓦哈卜主张信奉一神论，

是个政治组织。它与巴解组织抗衡，主张对以色列进行圣战，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极端主义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是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后成立的反以色列军事组织，拥有数千基干战士，受到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

反对脱离《古兰经》和《圣训》的宗教仪式与行为，要求返回伊斯兰社会，保持伊斯兰早期的朴素本色。在政治上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和英国的侵略，争取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独立。这个运动被称为“瓦哈比运动”，其教派称为“瓦哈比教派”。运动几经曲折，在瓦哈卜逝世后，由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继续，并最终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此后，在19世纪末，苏丹曾兴起马赫迪运动。运动以纯洁伊斯兰教为号召，举行反对奥斯曼王朝和英国殖民者的起义，并于1885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马赫迪国。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体现了高涨的阿拉伯民族精神，在政治上是一场摆脱异族统治的解放运动。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近代一样，也是复兴原教旨的运动，但具有不同的规模和特点。一是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使运动具有广泛的国际规模，甚至在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要求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呼声也日益高昂；二是运动内容不仅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且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伊斯兰化深入到诸多方面。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将伊朗建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治理国家，宣布“一切民法、私法，行政、金融、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所有法规都必须建立在伊斯兰标准之上”。霍梅尼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伊斯兰意识形态”，强调伊斯兰既是精神上的指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的理论。伊朗成为了原教旨主义者所企望建立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的现实模式”。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伊朗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宗教和社会政治纲领上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其派别和组织很多，各自的政治目标与活动方式颇不相同。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激进派主张用武力打击或推翻现政权，用暴力改造社会，为达此目的不惜采取恐怖手段。温和派则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实现改革，要求改变政策，使之符合伊斯兰教义。他们广泛开展宣传，并深入到农村、街区和边远地区，一面唤起民众的伊斯兰信仰热情，一面推行伊斯兰改造运动。还有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织政党，参加政治活动，企图通过合法手段，控制议会，建立伊斯兰政府。

8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日益扩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一支巨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对中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

1989年，苏丹建立了由原教旨主义组织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掌权的国家，成了伊朗以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另一重要活动基地。在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复兴活动发展，苏军撤出和纳吉布拉政权垮台后，阿富汗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地区，1992年建立了由伊斯兰圣战者掌握的政权。原教旨主义者在北非的进展迅猛。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提出“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只要《古兰经》”的口号，在这个穆斯林国家吸引了许多群众。在1991年12月的首次多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获得231个议席中的188席，一举击败执政30年的民族解放阵线，几乎夺取了政权，后被军方镇压并取缔。但它转入地下，从事恐怖暴力活动，使阿尔及利亚政局动荡不安。在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政权一直处于对抗状态。还在纳赛尔执政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就提出“埃及伊斯兰化”的口号。萨达特总统在1981

年 10 月阅兵时就是被原教旨主义者刺杀的。穆巴拉克总统多次遭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行刺。90 年代以来,埃及原教旨主义者制造了多起暴力事件,“圣战组织”、“新圣战先锋队”等原教旨主义组织渗透到军队中吸收成员,以达到推翻现政权、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的目的。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深受霍梅尼理论的影响,要求消除一切外来影响,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哈马斯主张进行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用武力消灭以色列,建立一个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因此,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和平谈判,并指责与以色列谈判和签订协议是叛变。他们开展恐怖暴力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与活动遍及亚非广大地区。中东的黎巴嫩的真主党,土耳其的伊斯兰行动组织和伊斯兰福利党,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协会或最高委员会;非洲尼日利亚的非洲伊斯兰组织,毛里塔尼亚的民族党,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摩洛哥的正义与慈善协会;中亚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南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东南亚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真谛党等等,都在积极开展活动。原教旨主义不仅在以伊朗为主体的什叶派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占穆斯林多数的逊尼派中影响日增。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国际社会提出了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标准,以所谓人权和民主问题为借口,对一些国家施加压力,这引起许多亚非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提出的反帝反霸、与西方对抗的主张在这些国家颇有市场。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治上独裁、专制,统治上层生活腐化、糜烂,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无能,政策失误,也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土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倡导的“反独裁,争自由,均贫富”的口号,对广大穆斯林群众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此外,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世俗政府推行西化政策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相矛盾,“回到《古兰经》”,净化伊斯兰社会的主张也吸引了许多穆斯林。因而,亚非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迅速,活动日趋活跃,形成了一种对现存世俗政权的严重挑战。90 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发展为影响中东和世界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有继续扩展之势。但目前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仍是世俗政权和温和派。

第四节 90年代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冷战后非洲的发展与新南非的诞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同时，非洲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多党制浪潮席卷了非洲大陆。一党制是冷战时期非洲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虽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个人独裁和官僚腐败等弊端。随着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这种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一些宣称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纷纷放弃其社会主义政策。美国和西方国家乘机以停止援助和贷款为条件，迫使非洲国家实行西方模式的“多党民主制”。从1989年年中开始，非洲政局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发展形势。首先是刚果、贝宁等原来激进的非洲国家宣布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进而开放党禁，向多党制过渡。长期实行一党制的肯尼亚也于1991年宣布改行多党制。在坦桑尼亚，尽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一党制，但坦桑尼亚领导人在内外压力下仍决定实行多党制。到1992年初，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达到41个，多党制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政治体制。

另一变动是非洲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选择非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化、公有化，国家处于主导地位。这对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起过一定的作用。独立初期，非洲经济增长比较迅速。但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消极作用日益暴露。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非洲经济日趋困难。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一些非洲国家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与监督，进行经济调整与改革，实行市场化、自由化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进入90年代，这种经济变革仍在进行。

多党民主制的浪潮没有给非洲国家带来稳定，相反使非洲内部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导致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加深，战乱不息，政变频繁。十多个国家政权更迭，数百万非洲难民流离失所。西方记者惊呼非洲的动乱后果不堪设想，不少国家“独立时第一代领导人取得的微弱成就已荡然无存”。

在多党民主化浪潮初起时，一些非洲有识之士对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有异议。痛苦的经历使许多非洲领导人认识到，政治民主化进程是非洲发展的需要，而盲目照抄西方民主模式只能加重非洲的困难。1991年召开的第二十六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宣言说：非洲各国“有权在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基础上，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自己的民主制度”。

给非洲带来动乱的多党民主化浪潮到90年代中期基本过去，经过多年政治和社会动乱，特别是进行内战的国家，渴望和平和要求稳定的呼声越来越高。稳定发展成为非洲国家和人民迫切的愿望。被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的南非原是南部非洲地区动乱的根源，由于非国大掌握政权的新南非的诞生，成为了非洲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

进入90年代，南非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90年2月，南非国民党政府解除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泛非主义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禁令，黑人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获释。3月2日，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

从1990年5月初开始，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与南非当局开始对话。在第

一轮谈判中达成了包括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内的五点协议。8月举行第二轮谈判。南非政府同意取消紧急状态，分阶段释放非国大政治犯，允许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人员回国，继续审议安全法以保证政治活动自由等。非国大则宣布中止武装斗争。1991年2月6日，在南非黑人解放运动推动下，南非议会开始陆续废除种族主义立法，并删除了立法中的种族主义内容。这些法令的取消是废除种族隔离制的重要步骤。

1991年7月，非国大成功地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曼德拉当选为新的中央执委会主席。非国大成员发展到70万人。非国大的目标是废除种族主义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统一的南非社会，主张坚持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德克勒克为首的南非政府虽主张通过谈判给黑人以一定的权利，但坚持保障白人的广泛权利、以种族集团为基础分享权力的原则，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白人极右势力仍反对与黑人进行平等对话，反对党南非保守党仍十分活跃。南非警察对于游行示威的黑人群体继续镇压，暴力冲突事件有增无减。

但南非民主化进程不可逆转。1991年6月，南非议会通过投票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土著土地法》、《集团居住法》和《人口登记法》。这样，从2月至6月，总共有八十多项种族主义立法被废除，近一百四十项法令中的种族主义内容被删除。至此，从法律上讲，种族隔离制宣告终结。

1991年6月22日，在南非教会和实业界人士倡议下，南非各政党举行全国和平会议。9月14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布特莱齐和20个其他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签署了结束黑人城镇暴力冲突的《和平协议》，为进入制宪谈判阶段铺平了道路。同年12月20~21日，德克勒克政府与以非国大为首的19个政党、组织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民主南非大会。会议就制宪的原则、机制以及过渡时期的行政权力问题交换了意见，签署了意向声明，宣布新南非将在普选基础上实行多党民主制。

随着民主改革进入实质性制宪谈判阶段，来自白人极右翼势力的反对和阻力增加。1992年9月，发生了治安部队袭击黑人示威群众的“西斯凯惨案”，造成2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993年4月10日，南非黑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哈尼被白人极右势力暗杀。极右势力的恐怖活动未能阻止南非制宪谈判进程，反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1993年6月南非多党谈判委员会会议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首次全民大选日期。1993年9月，通过了成立过渡时期行政委员会。12月22日，南非议会通过了过渡时期临时宪法。临时宪法的制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旧南非的结束和新南非的开始。

1994年4月26~29日，南非举行了多种族的大选，两千两百多万不同肤色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非国大党获票62.7%。根据南非临时宪法和大选结果，南非产生了非种族的议会两院：国民议会和联邦议会。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第一任黑人总统。11日，以曼德拉为首的南非新政府成立。民主、统一和种族平等的新南非的诞生，是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事业的历史性的里程碑，标志着世界上最后一个最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结束，同时也标志着非洲大陆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巨大胜利。新南非政府成立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取消了对南非的一切制裁，非洲统一组织接纳了南非，南非完全回到国际社会，并成为非洲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一个种族平等的新南非的出现，对因种族、部族和宗教矛盾而陷于混乱的其他非洲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非洲国家仿效南非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1993年莫桑比克政府和抵抗运动实现了停火，并于1994年举行多党制大选。安哥拉政府与安盟之间的内战也基本结束。刚果、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的政局趋于平稳。1993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九届首脑会议成立专门机构，处理非洲国家的战乱问题。1994年利比亚和乍得关于奥祖地带的争端和平解决，利比亚承认乍得对这一地带的主权，并于5月底从奥祖撤出军队。乍得还在周围国家配合下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以实现民族和解。从1995年底至1996年初，非洲有科特迪瓦、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埃及、佛得角、赤道几内亚、贝宁、津巴布韦、苏丹等九个国家相继顺利地举行了全国大选，选举总统或议会。尽管非洲还有极少数国家如塞拉利昂、尼日尔和布隆迪在1996年上半年先后发生了军事政变，但追求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已成为非洲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政治稳定为非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9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经济复苏，国际市场上农矿产品价格回升，加上非洲许多地区风调雨顺，农业取得好收成，以及一些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初见成效，非洲国家的经济开始走出低谷，逐步增长。1990~1993年非洲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3%，而人口增长率为3%。1994年非洲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4%，1995年约达3.3%，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达到或超过6%。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毛里塔尼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均较突出。南非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其经济状况的改善对非洲大陆经济振兴有重要作用。据统计，1994年南非经济增长为2.5%，1995年上升为3.5%，1996年估计可望达到3.5%~4%。而整个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亦可能超过4%。这意味着非洲经济增长率将超过其人口增长率3%，这将是一个二十多年来所未有的突破，表明了非洲经济开始进入增长的新时期。

进入90年代，非洲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加强，也有力地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60~80年代非洲先后成立两百多个地区合作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组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中途瓦解。进入90年代，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各地区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和竞争日趋增强，非洲国家认识到，非洲只有联合自强，实现经济一体化，发挥集体自力更生的作用，才能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获得生存与发展。

从1991年开始，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经济合作组织作用明显加强。1991年6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二十七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签署了《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已获三分之二成员国批准，1994年5月开始实施，计划于21世纪30年代前建成非洲共同市场。这是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非洲国家实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决心和意志。在这一行动的推动下，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有进展。新南非的诞生给南部非洲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1992年8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立。1994年南非加入，成为该组织第十一个成员国。南部非洲共同体活动频繁，计划取消关税壁垒，相互增加贸易、投资，实行物资、人员自由流动，向全面一体化前进。东南非洲优惠贸易区拥有22个成员国，也决定在2000年以前建立东南非洲共同体。这两个组织目标大体相同，部分成

员国相重叠，其活动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此外，北部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也准备建立马格里布共同市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决定加速货币合作，在 2000 年实现货币一体化。1994 年 12 月，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举行首脑会议，就成立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交换了意见。在这种新形势下，一度解体的东非共同体的三个成员国，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也签署协议，成立东非合作组织，这标志着 1977 年解体的东非共同体走向恢复。

非洲经济一体化是迈向 21 世纪的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它成为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头等重要的议程。

非洲大陆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但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如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畸形、单一的产品结构，经济基础薄弱，工业生产能力低，部分地区政局尚不稳定，人口增长过快，外债沉重和外援趋缓等。目前，非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大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拥有 53 个独立国家、近 7 亿人口的非洲，是当前一个尚待开发的极富潜力的大市场。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非洲政局总体上已日趋稳定，经济开始振兴。面向 21 世纪，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将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整个大陆将迈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90 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 进入 90 年代，拉美各国政局大多呈稳定态势，民主政体经受了严峻考验，进一步巩固，但各国政局发展并不平衡。经济上，拉美国家渡过了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多数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稳定经济的目标，经过宏观经济的调整与发展模式的转换，拉美经济在恢复中保持平稳的增长。90 年代被认为是“有希望的十年”。

拉美各国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国家有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这些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经济调整成效明显，民主政体比较巩固。第二类国家有委内瑞拉、巴西、危地马拉和秘鲁。这几个国家经历了政府危机，民主政体经受了考验，但政局仍不很稳定。第三类国家有尼加拉瓜和海地。这类国家民主化进程阻力较大，有的甚至倒退。

到 90 年代中期，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局继续保持稳定态势，没有发生引起政局动荡的突发事件，军人干政与军事政变的威胁大为减少。

1993 年六个拉美国家举行了大选。6 月，巴拉圭大选，军人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平交权，延续 40 年之久的军人执政时代结束，首位文人当选为总统。智利军人总统皮诺切特于 1990 年 3 月交权后，虽仍担任陆军总司令，掌握了军权，但文人总统艾尔文执政后，提出了全国和解、民主化、社会平等、经济增长和重返国际社会的五大执政目标，稳妥地处理了文官政府与军人的关系，对军政权时期的镇压与侵犯人权的罪行，采取“原谅与忘却”的原则，经过调查后，只公布主要罪行，只对个别罪大恶极者进行惩办，对没有血债者给予赦免。对受害者家属给予经济赔偿，包括子女免费受教育。还为已故总统阿连德举行葬礼。经过艾尔文政府的努力，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改善，实现了军政权向文人政权的平稳过渡。艾尔文在修改宪法时又拒绝了修改阻止他连任的条文，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在大选中，智利执政党联盟以压倒多数获胜。

秘鲁总统藤森于 1990 年执政后，实行经济改革，打击恐怖和贩毒活动，与当权的利益集团发生矛盾，其政策与措施屡遭议会和司法部门的阻挠和破

坏。为此，他于1992年4月发动“自我政变”，解散议会，撤销司法部门贪官的职务，重新任命了最高法院法官、最高审计长和最高选举庭庭长。他的“自我政变”虽引起舆论的批评，但在军队的支持下获得成功。1993年10月，他通过全民投票制定了允许总统连任的新宪法，并在1995年大选中再次当选，连任总统。

长期统治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于1986年被推翻后，经过几年动荡，1990年底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监督下，海地举行了大选。全国争取改革和民主阵线候选人阿里斯蒂德当选，成为海地第一位民选总统，1991年2月就职。但海地军人不支持。同年9月29日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德拉斯发动军事政变，阿里斯蒂德总统被迫流亡美国。这引发了一场危机。

海地的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先后实行对海地的政治和经济制裁。美国乘机带头对海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攻势。迫于国内外压力，1993年7月军政府与阿里斯蒂德在纽约签署了恢复海地民主宪制的协议。根据协议，阿里斯蒂德将于10月30日回国重掌政权。但海地军方不愿拱手让出大权，仍千方百计地阻止阿里斯蒂德归国掌权。1994年5月6日，应美国和阿里斯蒂德的要求，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对海地实行全面贸易禁运。但海地军方却不予理睬，反而于7月宣布在海地的联合国观察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对此，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强烈反应，于7月31日通过940号决议，授权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促使军方领导人离开海地。9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出“最后通牒”，以前总统卡特为首的美国高级代表团赴海地与塞德拉斯谈判，18日达成协议，海地军方同意美军进驻海地并和平移交权力。10月13日塞德拉斯赴巴拿马避难。美军在未遇任何抵抗下和平占领海地。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海地危机的和平解决，反映了拉美多数国家的意愿。

拉美国家于80年代先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拉美国家经济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调整以前的封闭式的经济政策，增加本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改变过去长期实施的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拉美国家的这次调整改革是在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威胁以及旧的发展模式发生危机的形势下进行的。其改革首先稳定经济形势，实行宏观经济改革。通过实行紧缩政策、压缩投资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和平衡国际开支等措施，到90年代初，拉美国家经济进入恢复阶段。

为了实行宏观经济改革，拉美国家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学者认为90年代拉美国家采取的是“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即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改革开放以自由贸易和私有化为龙头，开放市场，实行国家经济职能的改革，缩小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取得了初步成效，已开始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稳步增长道路。1990~1994年，拉美经济增长率达3.6%，对外贸易逐渐扩大，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从四位数降到两位数。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率曾高达2244%，后来巴西成功地实施了稳定经济、抑制通胀的计划。1994年8月至1995年8月，整个拉美地区的通胀率由1120%降至25%。这是25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国家的通胀率只有一位数，巴西的下降幅度最大，从93%降至26%。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出现了顺差。1995年出口总额达2200亿美元，比1994年增

长 20%，进口增长 8%，外贸结算自 1991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顺差。拉美各国吸取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和过去大量举借外债的教训，调整了外资结构，在所吸收的外资中，直接投资和官方贷款的比重增加，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大为减少。外资净流入量较前减少，不过外债总额继续增加，1995 年达 5450 亿美元，比 1994 年增加 4%。但由于出口收入增加幅度大，债务负担趋于减轻。

1994 年底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增长率受到影响，1995 年整个拉美的增长率只有 2%。但这次危机并不像预计的那样严重，除墨西哥与阿根廷等国外，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保持了 3%~5% 的经济增长率。巴西以 5% 的速度持续增长，智利、秘鲁增长率达 7% 以上。学者们预计 1996 年的拉美经济形势将继续趋于好转。

进入 90 年代，拉美区域一体化继续发展。1991 年 12 月，里约集团首脑会议提出，拉美国家的最终目标是争取 2000 年建成美洲共同市场。1995 年 9 月，里约集团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创建拉美国家共同体的意向书，规定应建立一种可协调各种一体化进程和行动的机构框架，为逐步建立一个共同体和实现拉美一体化奠定基础。拉美国家共同体将从 2000 年开始运转。拉美国家与北美的经济合作增强。在 1994 年 12 月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美国、加拿大和拉美国家达成协议，将于 2005 年以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1995 年 6 月美洲 34 国贸易部长又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开展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创建工作，计划在 1996 年 3 月前确定一体化的基础并制定一个时间表，以便正式开始谈判。

在次区域合作方面，拉美国家领导人通过频繁接触、磋商，相互合作不断有新的进展。1991 年 3 月 26 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到 1994 年底基本消除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形成自由贸易区。1995 年四国首脑又多次举行会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克服了阿根廷同巴西之间的汽车贸易之争以及成员国之间在关税方面的矛盾，达成共识，在 12 月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批准了 2000 年前的行动纲领，规定在今后五年中取消和协调非关税限制。由于南方共同市场运行顺利，预计 1996 年各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可达 150 亿美元，为建立共同市场前四国间贸易额的四倍。

在南方共同市场的推动下，拉美其他小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于 1995 年元旦开始生效。安第斯集团五国于同年 2 月 1 日开始实行共同对外关税，9 月改称为安第斯一体化体系。预计 1996 年底，这个集团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可达 46.5 亿美元，比 1995 年增长 40% 以上。此外，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在 1995 年 6 月接纳哥斯达黎加为正式成员国，并决定创建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加勒比共同体扩大。1994 年古巴加入，组成加勒比国家联合体。计划推动加勒比国家在经贸、科技、旅游等领域的合作。1995 年 8 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分析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可能性，通过了原则声明和行动计划，主张开展自

里约集团是 1986 年 12 月由原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的参加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巴西、阿根廷、秘鲁和乌拉圭八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的。始称八国集团，1991 年 3 月改为里约集团。

安第斯集团是 1969 年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1976 年退出）和委内瑞拉（1973 年加入）等位于安第斯山麓的拉美国家组成。

由贸易、联合开发旅游资源、提高运输效率等等。

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拉美国家推行务实外交，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关系。除了与北美的经贸关系以外，拉美国家与欧洲和亚洲的经贸关系日渐扩大。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向南扩展的趋势，目前正在向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发展。拉美与欧盟的关系已有很大进展。中美洲一体化、里约集团和墨西哥均与欧盟一起发表声明，决定扩大相互间的政治与经贸关系。欧盟还不顾美国的压力，与古巴加强了经济合作。特别是 1995 年 12 月，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正式签署了合作开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要求在 2005 年前建立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意义。

拉美国家重视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了同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以扩展它们的出口市场，并借助多边的发展，扩大与国际经济的联系。90 年代，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1995 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额首次超过 50 亿美元。

进入 90 年代，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对外开放的力度，强化市场机制，增强了国民经济的活力，摆脱了 80 年代“失去的十年”的阴影，成效已明显可见。但是，拉美的发展中仍存在多种弊端与问题。首先是社会矛盾突出。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贫困问题。拉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已上升到 46%，与此同时却有四十多名拉美豪富列入世界巨富行列。城市失业和农村贫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暴动与政治骚乱时有发生。1994 年 1 月，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农民暴动就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与城市改革相比，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农村改革迟滞，更加深了农村的矛盾。第二，腐败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高级官员的贪污腐化引起了社会波动。1992 年巴西前总统科洛尔因贪污案被新闻界曝光后，1993 年又发现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挪用公款和涉嫌贪污事件。1993 年 8 月，拉美国家在哥伦比亚召开的反腐败问题国际研讨会估计，拉美国家政府官员侵吞的款额达 210 亿美元。腐败是拉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绊脚石。反腐败斗争成为拉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已引起拉美国家的重视。

1994 年 1 月，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两千多农民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名义攻占该州四个城市，宣称为土著人争取民主和解放。被政府军镇压后退入丛林活动。

第十九章 世界新格局的酝酿建立

第一节 向多极世界发展

大国间关系的调整 冷战对峙局面结束后，世界加速走向多极化。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曾认为，取代两极的将是单极世界或是事实上的单极世界，美国可以独霸世界。但是，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长年的冷战对峙和军备竞赛给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危害。90年代美国支配别国和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德国的统一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巨大进展，使欧洲成为重要的世界一极。日本正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俄罗斯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军事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

美国于1994年确定了“参与和扩展战略”，计划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扩展自己在非传统盟友国家的影响来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进而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保证美国在下个世纪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特别注意调整同欧、日、俄、中的关系，争取在世界新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西欧同美国原来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因而结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纽带的美欧联盟。苏联解体后，美欧失去共同的战略目标，同盟关系的凝聚力迅速下降。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将欧洲共同体改建为欧洲联盟，实力增强，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欧盟积极谋求与美国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而美国则仍想维持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欧美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加剧。在解决波黑冲突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法国等国对美国的独自行动表示了强烈不满。更大的分歧是如何建立未来的欧洲安全防务体系问题。波黑战火打破了二战后欧洲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大规模危机和预防某些潜在的冲突因素演变成类似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悲剧，美欧都十分重视欧洲安全问题。欧洲存在四大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范围最广泛的组织，包括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共53个国家。1994年12月5~6日欧安会在布达佩斯举行第四次首脑会议，发表了文件《新时代真正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并决定从1995年1月1日起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但是，会议对新形势下涌出的新问题一个也没有取得妥协与共识。它表明，这一松散组织在维护欧洲安全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个重要组织是欧洲联盟，它的活动对欧洲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它缺乏维护安全的军事手段，因而作用受限。第三个是西欧联盟，现有英法德意等十个成员国。波、匈、捷、斯（斯洛伐克）、保、罗等12国是它的联系国。该组织在1954年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没发挥什么作用，80年代中起，重新活跃起来，参加了海湾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工作和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活动。法德等国还组织了欧洲军团。但西欧联盟尚不可能摆脱北约发挥独立作用。第四个组织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现在有16个成员国，是最有军事实力的组织，是能对欧洲事务施加影响的有效机构。但北约原是针对苏联的军事集团，冷战后它需要改组。1993年10月，美国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与中欧东欧国家“为了和平而建立伙伴关系”的计划。1994年，北约国家首脑布达佩斯会议提出东扩战略，遭到俄国的强烈反对。欧美尽管在东扩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美国希望借北约东

扩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欧洲东部地区，并进一步维护自己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1994年，克林顿提出建立“覆盖现代欧洲”的新安全体系的设想，其中把北约放在突出重要地位，强调新体系必须由美国充当领导。西欧支持东扩，想借此加重北约的欧洲色彩，加强西欧联盟的建设，使其最终成为在北约内部能与美国支柱并立的欧洲支柱，从而掌握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北约东扩适应了德国“东进战略”的要求，而引起英法的担心。美国积极支持东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对欧洲国家态度的变化，说明它更加重视同德国的关系，它要与德国建立“领导伙伴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得不改变过去30年不参加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立场。1995年12月5日法国宣布重返北约军事委员会，参加北约的国防部长会议。法国力图在北约改造过程中占据突出地位。

美欧矛盾在冷战后虽不断增加，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仍难以摆脱对方。美欧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经济来往极为密切。西欧盟国积极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承担了80%的北约防务，但波黑战争暴露出西欧的脆弱性，西欧仍需在北约范围内拉住美国，共保欧洲安全。美国也需要依靠北约，以备在俄国一旦出现敌视西方的政权时遏制莫斯科。但美国想减轻自己在欧洲的负担，冷战结束后已减去三分之二的驻欧军队，只保留十多万人。美国希望在保持自己主导地位的同时，西欧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因此，美欧在彼此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加快相互协调。1995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尔在马德里共同签署了《跨大西洋新纲要》和《美欧共同行动计划》。这两项协议规定，美欧协力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民主和发展，对全球性挑战作出回应，为扩大世界贸易和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作出贡献，促进双方在科技、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为落实这些目标，还拟定了包括一百三十多个合作项目在内的共同行动计划。双方合作的方式从应付危机的磋商转入以防范危机为主的更直接更充分的合作。《跨大西洋新纲要》超越了1990年的《欧共体与美国关系宣言》。它表明美欧关系经历了一次较深层次的调整。双方开始从冷战时期以安全和防务为主的传统关系向全方位合作过渡。

冷战结束后，美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美国通过日美安全条约等确立美国对日本的主从关系，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反苏堡垒。日本则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到70年代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美出口激增，日本资本也大量流入美国，美日在工业、农业、贸易、金融和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发生矛盾与摩擦。但当时面对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安全的考虑冲淡了经济竞争。双方都竭力控制不使争吵公开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是日本让步，美国也适可而止。苏联解体后，美日的矛盾公开化，首先表现在经贸方面，1993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1157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源于对日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长布朗明确表示，日美贸易不平衡，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问题。美日两国的经济矛盾发展到政府间的公开争吵。1994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细川在华盛顿举行会谈，未能就开放日本市场问题达成协议。会后，继续进行艰苦会谈，于10月只达成了部分协议，日本原则同意在玻璃业、保险业等领域向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在相互关系方面美日如何建立真正平等伙伴关系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问题。美日在东亚地区的竞争随着冷战的结束也在加剧。日本盛行“脱美入亚”的议论，提出要回归亚洲，实际要建立以日

本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圈。而美国也日益重视亚太地区，它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已超过了 600 亿美元。1993 年克林顿在西雅图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美日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活动已在开展。但是，美日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有共同需要。日本不得不依靠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安全结构。美国在 1995 年决定不再收缩它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继续保留 10 万驻军以巩固它在东亚的地位。美日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也在加深，因而，双方间的关系一直以妥协合作为主。1995 年 1 月，日本首相村山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双方确认，要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日美协调关系”。克林顿强调在多变的世界中，美国把日本看作是“最坚定的朋友”。村山重申美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维护日美安全体制，将是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内容”。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仍十分重视同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关系。美国认为掌握庞大核武库和常规军事力量的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中唯一能对美国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因而把俄罗斯列为美国首先关注的国家。新成立的俄罗斯迫切需要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推行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1992 年，俄国在国际舞台上极力配合美国行动，两国关系空前密切融洽。1993 年 1 月 31 日，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莫斯科签署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规定双方在 2003 年以前各自将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弹头总数削减三分之二。具体讲，美国由 10,876 枚削减为 3500 枚，俄国，包括部署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核弹头总数由 10,271 枚减为 2968 枚。但美俄“蜜月期”十分短暂，1993 年初，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拉开同美国的距离。俄国原来想通过向西方靠拢得到它所期望的巨额经济援助，并同西方建立“平等伙伴”和“战略盟友”关系，但希望落空，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引起社会不满和反对派的指责。1993 年 4 月，叶利钦批准了《对外政策构想》文件，开始了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大调整。俄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公开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以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形象和地位。1993 年在安理会“关于塞浦路斯维和费用”问题上，俄罗斯第一次使用了否决权。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俄国为维护其传统的地缘政治利益、民族、宗教和文化利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采取独立行动。俄罗斯逐渐停止对外收缩政策，开展全方位的大国外交。1994 年，俄国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2 月，阻止了北约对波黑塞族的空袭，进而反对美国解除波黑穆族的武器禁运。12 月又在安理会上否决西方制裁南联盟的新议案。1995 年围绕俄国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和常规武器问题，特别是北约东扩问题，美俄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斗争持续不止。与此同时，俄国积极发展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拓展同中国、印度等亚太国家的外交关系，加强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以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美俄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将会不断深化。但是，双方在政治上、安全上和经济上互有需求，在解决地区冲突、防止核扩散、防止恐怖主义、阻止环境生态恶化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因此，美俄仍将维持伙伴关系，采取务实政策，注意控制分歧，缓解矛盾或取得妥协，同时不断发展彼此间的合作。克林顿 1993 年上台后的三年期间，同叶利钦会晤了九次，其次数之多超过了他同其他任何国家领导人的会晤。美俄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也定期举行会晤。1995 年 5 月俄国同北约签订了《双边军事合作计划》和《定期公开磋商制定框架文件》。美俄在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展了交流与合作。但是，美俄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共同的危险敌人，这在一定

程度上有碍于在安全领域形成相互吻合的利益，使美俄两国不能建立像美欧那样的密切关系。

总之，冷战结束后，大国相互间不再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但是，动荡和不安因素还未消除，大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定位，一超多强的局面尚在形成确定中。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市场也完全消除了平行对立而日益融于一体。跨国公司的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政府和地区经济组织的宏观调整经济活动，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形成。在新形势下，经济因素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作用愈来愈大。因此，各国都积极调整同他国的经济关系，争取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经济秩序。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它成为各国和世界经济繁荣的象征。调整国际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这方面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自成立以来，为稳定国际贸易秩序、促进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和贡献。从 1947 年起到 70 年代，先后进行了七次有关削减关税的谈判，取得了明显成果。世界平均海关税率稳定下降。发达国家已从 40 年代的 50% 多下降到 5%，发展中国家也已下降到 14% 左右。1964 年，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非互惠的关税和贸易优惠原则，推动了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进入 80 年代后，国际贸易发生根本性变化，服务业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1992 年，银行、保险和娱乐等服务业贸易大约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 30%。1986 年到 1990 年的四年期间，世界直接投资额的增长速度是世界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三倍。与此同时，各国在农产品、服务行业、纺织品、知识产权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等领域的纠纷日渐增多。关贸总协定决定开展内容更为广泛的贸易谈判。

1986 年 9 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开始了第八轮多边谈判。这次谈判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改善市场准入条件问题，二是制定新的国际贸易竞争原则。长期以来，美欧日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争吵不休。美国反对日本实施非关税壁垒，阻碍大米市场的开放，美国与欧共体互相指责对方用农产品价格补贴办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 1993 年 12 月 6 日，美欧在布鲁塞尔才对农产品贸易达成协议。接着，关贸总协定干事长萨瑟兰把各方代表召集到日内瓦作最后冲刺，终于在 12 月 15 日定下最后文件，结束长达七年的“最全面、最复杂的多边谈判”。1994 年 4 月 15 日，关贸总协定 117 个成员国代表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正式签署了长达 550 页的乌拉圭回合协议。最后文件规定：关税平均减三分之一，全球平均关税从签约时的 5% 降到十年后的 3%，首次将所有农产品贸易置于全球贸易规则管理之下，并规定减低农产品的贸易补贴；将总协定的规则延伸到服务业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新领域，加强专利保护，制定新的反倾销和反不公平低价的规则。文件所涉及的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业的国际贸易额多达 4.5 万亿美元。据估计，协议生效后十年里，将使世界贸易额增长 12%，将使世界经济每年增加产值 2000 亿美元以上。

乌拉圭协议最初规定成立多边贸易组织，以便更有力地监督协议的执行。美国代表对这一名称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美国国会不会通过多边的国际协议，建议改称世界贸易组织。1994 年 4 月 15 日摩洛哥会议上，萨瑟兰决定接受美国意见。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正式成立。

联合国的活动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努力调整自己的机构和活动，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每年举行一届的大会上，各国代表更加积极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对各项重大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大会的讨论和决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也形成强大的道义力量，对国际秩序产生积极影响。在维护和平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经常开会，讨论研究制止世界各地的冲突，力促冲突各方坐在一起商讨解决矛盾的办法。联合国50年来促成了172个和平协定。联合国还派出维持和平部队，以公正、客观的第三者身份帮助实现并维持停火，在冲突各方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自1948年5月在耶路撒冷设立观察团以来，先后在四大洲组织了近40次维持和平行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在刚果（今扎伊尔，1960~1964年）、塞浦路斯（1964年至今）、埃及（1973~1979年）、黎巴嫩（1978年至今）的活动。90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柬埔寨、索马里、纳米比亚（1989~1990年）进行了更为困难的维和行动。到1995年，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服役过的官兵有72万余人，其中1.2万人在服役期间死亡。为了和平解决地区冲突，联合国自80年代以来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向独立主权国家提供选举援助。联合国先后向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安哥拉、柬埔寨、南非、海地等国家派出了观察团、核查团或特派团，帮助组织和实行选举，监督、观察和核查选举，提供各类技术协助如咨询、必要设备和协助培训人员等。除安哥拉大选因安盟方面不承认选举的结果而失败外，其他选举均获得成功。1991年联合国第四十六届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选举事务协调员，使联合国在选举援助领域的工作获得新的突破。

在裁军方面，联合国于1946年1月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是有关这方面的决议，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和消灭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此后，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和常规军备委员会，1947年，两个委员会合并，成为联合国第一个单独处理裁军问题的机构。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商定对各种危险武器实行控制，先后提出和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1995年又决定无限期有效）、禁止在海底安置核武器条约（1971年）、禁止生物武器条约（1972年）、禁止化学武器条约（1992年）等。1978年、1982年和1988年联合国先后三次召开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讨论裁军的各种问题。在非殖民化方面，联合国作出了巨大成绩。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推动了非殖民化进程。殖民地人口在1945年多达7.5亿，到1990年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后减少到100多万人。联合国会员国也从最初的51个发展到1994年底的185个。1994年，联合国最后一个托管地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群岛获得独立，联合国托管制度胜利结束。联合国于1969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专家委员会每年开会监测该公约的执行情况。1973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禁止并严惩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推动下，新南非终于在1994年诞生。

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联合国于1949年提出了技术援助扩大方案，帮助较贫困国家发展经济。1961年联合国大会承认世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根本性意义，宣布60年代为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决定持续不断地援助发展中国家。1965年联合国成立了开发计划署。它积极筹集资金，协调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活动，向亚非拉国家提供各种无偿援助项目。自90年代起，开发计划署每年预算均在13亿美元以上。世界银行从1946年到1995年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3330亿美

元。1974年、1975年和1980年，联合国先后三次召开关于经济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5年）。联合国重视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工作，1948年一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后来又通过《发展权利宣言》。联合国还召开各种专门会议，讨论人口、家庭、妇女、儿童、老年人、难民等问题。

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联合国在1950年就邀请专家举行保护和利用资源的会议。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会议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1973年正式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它负责监测世界海洋、陆地和大气层的污染情况，进行环境管理。环境规划署还经常举办同环境有关的各种专业会议，如对抗沙漠化、保护臭氧层的会议。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又称“地球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蓝图。

联合国成立50年，在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问题也很多。早在成立之时，不少中小国家就对大国的否决权感到不满，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一直淹没在冷战之中。某些大国还操纵联合国牟取私利，甚至侵犯他国主权。9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在转折时期发挥了作用，1990年对海湾危机作出迅速反应，维和行动广泛开展。人们对联合国寄予厚望。但联合国改革也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完善集体安全机制、加强安理会和大会的协调、精简机构，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由于各方利益不同，改革步履艰难，联合国任重道远。

第二节 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处于南半球，发达国家大多数位于北半球，因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会谈，一般称为“南北对话”，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南北对话的发展 南北问题,即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问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战后,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改善;但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发达工业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品和农产品生产;通过投资、贷款影响其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它们转嫁经济危机,使南北矛盾日益尖锐。因此,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联合行动,要求同西方发达国家对话(“南北对话”),为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斗争。

1963年第十八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问题,75个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一个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五国集团”。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制定了处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给予关税优惠,发达国家拨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会上,75国集团增加为77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组成了“七十七国集团”(到1986年为止,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此后,在每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之前,七十七国集团都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采取统一行动,为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斗争。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成立了许多原料生产国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铝土协会、铜出口联合委员会、国际茶叶委员会、国际咖啡组织、油料生产国组织等,加强同国际垄断资本的斗争,逐步掌握了原料的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主动权。经过艰难的谈判,1971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同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了协定,第一次提高了原油价格和石油开采税率,并开始对西方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1973年,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石油为武器,采取提价、减产、禁运和国有化等措施,根据西方石油进口国对阿以战争的不同态度分别对待,孤立和打击了以色列和美国。西欧国家停止了向以色列供应武器,不顾美国的反对,同阿拉伯产油国单独对话,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日本为了取得石油进口,也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利。石油武器的运用使阿拉伯产油国夺回了长期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生产和油价决定权,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仅提价一项,就使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197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收入仅144亿美元,到1980年高达2750亿美元。石油斗争给原料生产国树立了榜样,促进了它们运用手中的原料和战略物资作为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1974年4月,应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召开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规定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一切国家都有平等地参加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权利,一切

国家都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和国内一切经济活动行使永久主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建立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联合组织；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和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商品交换上的不合理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1974年12月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5年2月发展中国家原料会议通过了《达喀尔宣言》，肯定了上述原则。

1975年12月，由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19个发展中国家同七个发达国家及欧洲共同体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1977年5月再次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这两个会议分歧都很大，都没有取得结果。1977年11月，根据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成立了“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为“南北委员会”。委员会就促进南北对话多次举行会议。为了打破南北对话的僵局，1979年七十七国集团倡议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判，第三十四届联大就此通过了专门决议。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981年第十一届特别联大和第三十五届联大均未能就全球谈判问题达成协议。在墨西哥总统和奥地利总理的倡议下，1981年10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有南北政府首脑参加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会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强调应尽快举行全球谈判。西欧和日本也感到南北关系紧张对自己不利，表示赞成南北对话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只有美国态度强硬，反对全球谈判。但各国领导人在会内外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协调立场，为推动全球谈判、改善南北关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坎昆会议后，南北关系继续紧张，举行全球性南北对话仍然困难重重。但是，南北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中国家控制了世界主要矿产原料和部分农产品出口总额约60%，西欧、日本主要矿产原料绝大部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到1982年底达1500亿美元，占其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1981年发展中国家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量的37%、欧洲共同体（不包括内部贸易）的40%、日本的44%。1984年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总额为1750亿美元，等于它同西欧、日本贸易额的总和。联邦德国有130万就业者从事向第三世界出口货物和劳务的工作。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经济形势恶化。1979年底至1982年危机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初级产品价格跌至50年代的最低水平。发达国家实行高利率政策，利率每提高1%，发展中国家就要多付出50亿~60亿美元的利息，债务负担越背越重。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南北贫富差距在战后以来的几十年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然而，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是与第三世界紧密连在一起的。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每下降3%，“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速度就要下降1%。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已为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改变。进入90年代，第三世界各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都在不断地从多方面为加强南北经济合作、促进全球性南北对话而努力。

南北对话最有成效的是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第三世界历来是西欧的原料产地、商品和投资的重要市场，且是西欧抗衡美苏可以

1948年4月为实施马歇尔计划，18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公约，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1年9月该组织正式成立，简称“经合组织”。

借重的一支力量。欧洲共同体成立后，十分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与有关国家建立了联系国制度。1963年共同体同18个非洲国家和七个海外领地签订了《雅温德协定》，1967年又同三个非洲英联邦国家签订了《阿鲁沙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逐步取消关税，共同体享有投资、利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特权，并给予联系国经济援助。1973年石油斗争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不平等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达到高潮。共同体同包括联系国在内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举行贸易和经济谈判，1975年2月28日签订了《洛美协定》，主要内容是：共同体在不要求“互惠”的情况下，允许46国的全部工业品和94.2%的农产品免税和不限数量进入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商品进入46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不免税；共同体提供一笔基金，对46国输出到共同体的主要产品因跌价或受灾减产所受损失给予补偿；共同体五年内向46国提供35亿欧洲货币单位（约合46.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79年、1984年、1989年又续订了三个《洛美协定》。截至1994年12月，第四个《洛美协定》的签字国共82个国家，欧洲共同体12国，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增为70国。《洛美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不平等经济关系的色彩，是符合双方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需要。它的续订和实施体现了共同体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南北对话、改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持续努力和进展。此外，共同体还积极同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对话。共同体同东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同22个拉美国家成立了协调委员会，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加强贸易、财政联系和技术合作。

80年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重重的十年。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供给和商品需要因而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等措施，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资金条件严重恶化，南方经济发展陷入更大的困境。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2.9%，远远低于以往的水平，出现了拉美的“发展危机”和非洲的“生存危机”。南北贫富差距显著扩大。在南北之间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南方发展民族经济、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斗争也陷入低潮。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减轻债务负担、争取增加援助等方面更多地求助于北方。北方国家乘机图利，无视南方国家的合理要求，或以有限的让步为条件，迫使南方国家按照其利益调整经济政策。南北对话和谈判长期陷于僵持状态，南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趋于不对称和不平等。

南南合作的加强 以70年代中期石油斗争为契机而开始的南北对话，到80年代陷入僵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加强南南合作，才能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展中国家逐渐加强它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1979年七十七国集团通过《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指导性纲领，标志着南南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南南合作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

首先，原有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和完善，新的经济合作组织陆续出现。到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共建立近三十个区域性和半区域性组织、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三十多个、货币金融组织二十多个。这些组织的参加国约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3%。亚非拉各地区基本上都组成了区域性

经济合作组织。在拉丁美洲，1981年3月拉美11国改组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成立拉美一体化协会，并准备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在停止活动八年后于1983年召开成员国首脑会议，并吸收巴哈马联邦为第十三个成员国。拉美国家协调立场，力争制定一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方案。在非洲，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于1980年通过《拉各斯行动纲领》，规定了成立非洲共同体80年代的具体步骤和措施。除已有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外，新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1984年达成准备成立共同市场协议）。在中东，六个产油国1981年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西印度洋三个岛国于1983年成立印度洋委员会。在南亚次大陆，印、巴等七国经过长期磋商，终于在1983年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宣言》《区域合作联合行动纲领》。在东南亚，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84年已扩大为六个成员国，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亚非拉各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均向跨区域性合作或全球性合作方向发展。全球贸易优惠谈判工作初步就绪。1984年七十七国集团专家会议通过了《南方银行纲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南方银行”的态度是积极的。它的建立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南南经济合作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发展中国家积极探寻落实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1981年七十七国集团通过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就贸易、金融、技术合作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和措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年第八次首脑会议重申建立关税同盟，实施工业品贸易自由化统一方案和建立统一货币区。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1984年宣布优惠贸易区条约生效。海湾合作委员会统一经济协议从1983年3月1日起开始生效。1982年被称为“新德里磋商”的南南合作会议，就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利用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协调了对发达国家的共同立场。1983年北京南南合作会议，讨论了经济发展战略、南北对话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同年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提出一系列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强调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南南贸易的发展和合作领域的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0~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30%，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70年的不到20%增长到1981年的近32%。1973~1981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财政援助达710亿美元，私人资金转让估计为官方援助的四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资源、能源、农业、劳务、技术和合营企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合作也取得很大的进展。发展中国家已改变了只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投资的历史。自70年代以来，主要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当然，南南合作在它的前进道路上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南南合作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维护国家主权，提高它们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南南合作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必将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巩固、提高和取得更大的进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在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水平也表现出明显分化的趋势。例如，拉美经济平均增长率略高于1%，低于2.3%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由债务危机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具有“发展危机”的性质。非洲经济平均

增长率为 1.4%，也远低于 3% 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更为严重。特别是它的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必需，其经济倒退更为严重，成为“生存危机”问题。唯有东亚地区“风景这边好”。80 年代“四小龙”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9%，东盟国家马、泰、印尼、菲律宾四国为 6%，南亚也在 4% 以上，从而使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和要求。拉美侧重于债务安排，非洲最迫切的问题是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援助，亚洲则强调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过程中的凝聚力有所减弱，全球性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阻力增大，区域性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趋势却在增强。战后国际经济的区域化主要是由南方国家倡导的，目的是通过南南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并用一个声音与发达国家谈判。而经济区域化的浪潮却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90 年代欧洲加快实施统一大市场计划的同时，积极扩大同非洲、地中海、加勒比海地区、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往来，力图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92 年 8 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接着又向拉美地区发出旨在加强经济合作的“美洲倡议”。美、日都积极同亚太地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希望在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可见，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时，转而采取区域性安排，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作用，对于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南北关系区域化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存在着可供选择的机会，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制定对策，推动南北关系向有利于南方国家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瓦解，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转换时期。世界总的发展趋势趋向缓和，但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一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长，局势仍然复杂多变。冷战结束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各国人民广泛关注的问题，各类型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方案。广大亚非拉国家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它们在经济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进入 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较好。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拉美和非洲开始走出 80 年代经济困境。区域性合作扩大，东盟向包括东南亚十国的大东盟发展，非洲和拉美向一体化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一些地区经济仍停滞不前，社会不安定和贫困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以“人权”、“环境”、“劳工条件”等问题为借口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甚至以此为条件，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这使南北矛盾激化，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增设了障碍。

在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论战中，世界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映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愿望的观点。1988 年邓小平明确

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观点是：

（1）国际新秩序完全不同于以极少数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旧秩序，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关系；

（2）国际新秩序应是由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两个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方面构成的一个整体；

（3）核心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

（4）基本内容是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或推行强权政治；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5）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重大作用，使之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有效的控制机制。

中国的上述观点与主张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和支持。

第三节 中国对外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结束了自 1840 年以来任人欺凌、宰割的屈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具体的对外政策。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获得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初期，中国首先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 年 10 月 3 日，苏联同新中国建交。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阿尔巴尼亚先后与我国建交。民主德国建立后也迅速同我国建交。1950 年 1 月，我国宣布与正在进行抗法战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同年 2 月，中苏共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与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执行“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主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政策，因而将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这一时期，中国积极争取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特别是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建国之初，中国先后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正式建交。同时，中国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和挪威等西欧、北欧发达国家相继建交，并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到 1956 年底，新中国已同 28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建立了经济和文化关系。

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中国实行经济上封锁和禁运、军事上包围和威胁、外交上遏制和孤立的政策。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武装侵略朝鲜，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中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派遣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顶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同时坚持实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50 年代，中国的外交成就突出表现为：一、参加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二、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三、出席 1954 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对印度支那停战与和平恢复作出了贡献；四、参加 1955 年万隆会议，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五、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确定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有助于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由于上述成就，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显著。

60~7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世界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对外关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经过调整，获得新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同时，继续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包括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抗击美国雇佣军的斗争。中国积极声援和支持 1961 年亚非国家发起的不结盟运动。中国与亚非新独立的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了 14 个亚非国家,并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与此同时,中国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先后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解决了若干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发展。1964 年中法建交。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它与中国建交,表明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此外,中日通过民间外交方式,增进了经贸与文化的交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从此中美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迅速发展。1973 年 2 月,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两国正式建交。与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中日两国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首相于 1972 年 9 月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 年 8 月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和影响下,70 年代,中国与西欧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外,中国还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建交。中国同南斯拉夫在此期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是,1971 年 10 月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到 1980 年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 75 个。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 80 年代,国际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中国国内局势随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束也发生巨大变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适应新的形势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中国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外交路线上作了重大的调整、充实和完善。1982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新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在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的基础上,新时期外交政策赋予独立自主原则新的内容,即体现在不结盟上。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反对另一家,中国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不称霸。同时,中国根据中国 and 世界的实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思,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以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香港、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港、澳回归祖国的问题。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她。两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问题,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并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商谈。1983 年 7 月,中英两国代表就香港问题开始会谈。1984 年 9 月 18 日,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同年 12 月,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联合王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宪法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及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中国的上述基本政策在 50 年内不变。

中国政府本着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目的，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为解决澳门问题创造了条件。1986 年 7 月中葡两国代表团开始会谈，翌年 4 月，正式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对澳门实行 12 项基本政策，并在 50 年内不改变。

在解决港、澳回归祖国的问题中，中国从实际出发，考虑了历史与现状，照顾了各方面的正当利益，通过和平协商，圆满解决了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这是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体现。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使中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为当今世界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成功的范例。

80~90 年代，中国坚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结合起来，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空前发展。

首先，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最稳定的局面，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显著发展。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友谊继续保持和发展。同韩国发展了经贸联系，并于 1992 年正式建交。中国支持朝鲜北南双方通过和平协商实现统一。中国同日本自 1978 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国领导人共同制定“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依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为中日友好睦邻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方在政治上不断加强信任，经济上加强合作，着眼于 21 世纪，世代友好下去。但是，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日本一些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倾向时有冒头。中日两国贸易大幅度增加，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我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亦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首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之后，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0 年 8 月，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邦交；10 月，同新加坡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91 年 9 月同文莱建交。11 月，中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同老挝通过谈判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同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有明显的改善。中印两国领导人互访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1988 年 12 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是中印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双方签订了科技、文化、民用航空等协定，并同意成立联合工作小组，以谋求解决边界问题。1991 年 12 月中国总理李鹏应邀赴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993 年 9 月印度总理拉奥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两

国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两国政府于 1993 年 9 月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标志着中印关系的重大进展。

80 年代，中国不仅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亚洲邻国的关系，而且通过同第三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加强经济技术与文化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关系。1982 年底至 1983 年 1 月，中国总理访问非洲 11 国时提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四项原则。1983 年北京南南合作会议上，中国又宣布这四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80 年代，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成果显著，经贸关系扩大。1988 年，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达 150 亿美元。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支持南北对话，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在联合国和国际会议上，提出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持。1992 年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中国同七十七国集团的友好合作获得进展，并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的对话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增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80 年代，中国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在逐步改善和调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中国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于 1979 年通知苏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 1980 年期满后不再延长，建议两国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谈判尚未正式开始，即因苏联侵略阿富汗而中断。1982 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0 月在北京开始了中苏副外长级第一轮磋商。到 1986 年 10 月，副外长级磋商已进行到第九轮。我方提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减少在中苏边境的驻军、不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从阿富汗撤军。在经济技术合作等其他方面有较大的改善。1984 年 12 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我国，就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达成了协议。1985 年 7 月，姚依林副总理访苏，签订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 1986~1990 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关于苏联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1985 年两国贸易总额为 46 亿瑞士法郎，比 1984 年的 26.52 亿瑞士法郎增长 73%，1986~1990 年贸易总额将达到 350 亿瑞士法郎；双方将在设计、提供技术资料、供应设备和派遣专家、技术人员方面进行合作。此外，中苏还就恢复边境贸易达成协议，两国边境贸易的规模逐步扩大。但是，中苏政治关系还未得到根本改善。1986 年 7 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提出“以主航道为边界线”的边界谈判新方案。时隔九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也于 1987 年 2 月在莫斯科恢复。1988 年 10 月，双方就中苏边界东段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了一致意见。1988 年 4 月，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在日内瓦签署，苏联承诺从阿富汗全部撤军。12 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苏，这是 1957 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苏联领导人表示，希望早一些解决柬埔寨问题，愿意在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新型关系。其后，苏联在联大宣布将大大减少其在亚洲本土部分的军队，并从蒙古撤回大部分苏军。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上解决。1989 年 5 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我国，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9~1991 年，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动，其中民主德国与

联邦德国合并，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国对原有各国和新成立的国家根据既定的外交方针，继续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诸国的领导人通过互访，站在21世纪的高度，把双边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先后签订了国界协定，以法律的形式将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固定下来。1994年中俄联合声明，不把各自的核弹头瞄准对方和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是五国形成“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新的国家关系的生动体现，标志着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

80年代以来，中国同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关系虽因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有过曲折，但总的说来仍获得进一步发展。中美建交后，双方在经贸、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迅猛发展，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经常保持高层接触和对话。1979年初，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技术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等协议。1982年8月，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府承诺：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供应水平，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中美建交十年，双方经贸关系达到新水平。双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1亿美元（美国统计数字为137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到1988年6月，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额为31.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合同金额的14.2%，而中国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为20.3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1.5%。1990年以前，美国对华投资居各国首位，投资项目达六百多个。中美双方在科技文化的26个领域达成了对口合作协议书，民间科技文化交流也日益广泛开展。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访问的中国学者日益增多。这表明中美双方有互相合作的广阔前景。

但是，中美关系发展仍存在障碍，特别是台湾问题，妨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根据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只同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但1979年3月美国国会就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甚至仍视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严重地违背了中美建交协议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干涉了中国内政。经过谈判，1982年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时，美国宣称它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并承诺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后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联合公报的发表为消除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使两国关系在80年代获得平稳顺利的发展。但80年代末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又无理地以“人权”为名，在北京政治风波问题、西藏问题，甚至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伙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从而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使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建交十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但美国企图排斥、孤立中国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1990年9月，钱其琛外长应邀访美，两国关系开始改善。90年代，中美关系在曲折中继续发展，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内。

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自 80 年代以来获得全面发展,中国同西欧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文化科技合作的协定,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欧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受到影响,但迅速恢复和重新发展起来。1990 年 10 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正常交往。进入 90 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迅猛发展。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无根本利害冲突,存在着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前景,特别是面向 21 世纪,中国大规模地开展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双方在经济技术方面合作的前景将更为广阔。

总之,从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获得空前迅速的发展。到 1994 年为止,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 150 多个,与中国发生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达到 228 个。在“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 年),中国基本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 1 万亿美元,五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1600 亿美元。中国的国际交往日益广泛,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成为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进入 21 世纪,中国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将以更加雄伟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1945 ~ 1995 年苏、美、英、法、联邦德国、日等国领导人一览表

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922.4 ~ 1953.3.5	斯大林 (中央书记)
1953.9 ~ 1964.10.14	赫鲁晓夫 (第一书记)
1964.10 ~ 1982.11.10	勃列日涅夫 (第一书记, 1966年4月8日起为总书记)
1982.11 ~ 1984.2.9	安德罗波夫 (总书记)
1984.2 ~ 1985.3.10	契尔年科 (总书记)
1985.3 ~ 1991.8.24	戈尔巴乔夫 (总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41.5 ~ 1953.3	斯大林
1953.3 ~ 1955.2	马林科夫
1955.2 ~ 1958.3	布尔加宁
1958.3 ~ 1964.10	赫鲁晓夫
1964.10 ~ 1980.10	柯西金
1980.10 ~ 1985.9	吉洪诺夫
1985.9 ~ 1991.1	雷日科夫
1991.1 ~ 1991.8	帕夫洛夫

美国总统

1945.4.12 ~ 1953.1.20	杜鲁门 (民主党)
1953.1.20 ~ 1961.1.20	艾森豪威尔 (共和党)
1961.1.20 ~ 1963.11.22	肯尼迪 (民主党)
1963.11.22 ~ 1969.1.20	约翰逊 (民主党)
1969.1.20 ~ 1974.8.9	尼克松 (共和党)
1974.8.9 ~ 1977.1.20	福特 (共和党)
1977.1.20 ~ 1981.1.20	卡特 (民主党)
1981.1.20 ~ 1989.1.20	里根 (共和党)
1989.1.20 ~ 1993.1.20	布什 (共和党)
1993.1.20 ~	克林顿 (民主党)

英国首相

1945.7 ~ 1951.10	艾德礼 (工党)
1951.10 ~ 1955.4	丘吉尔 (保守党)
1955.4 ~ 1957.1	艾登 (保守党)
1957.1 ~ 1963.10	麦克米伦 (保守党)

1963.10 ~ 1964.10	道格拉斯-霍姆 (保守党)
1964.10 ~ 1970.6	威尔逊 (工党)
1970.6 ~ 1974.3	希思 (保守党)
1974.3 ~ 1976.3	威尔逊 (工党)
1976.3 ~ 1979.5	卡拉汉 (工党)
1979.5 ~ 1990.11	撒切尔 (保守党)
1990.11 ~	梅杰 (保守党)

法国临时政府主席

1945.11 ~ 1946.1	戴高乐
1946.1 ~ 1946.6	古安 (社会党)
1946.6 ~ 1946.11	皮杜尔 (人民共和党)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总理

1946.12.16 ~ 1947.1.16	勃鲁姆 (社会党)
1947.1.22 ~ 1947.11.19	拉马迪埃 (社会党)
1947.11.24 ~ 1948.7.19	舒曼 (人民共和党)
1948.7.26 ~ 1948.8.28	马里 (激进党)
1948.9.5 ~ 1948.9.7	舒曼 (人民共和党)
1948.9.11 ~ 1949.10.6	克耶 (激进党)
1949.10.28 ~ 1950.6.24	皮杜尔 (人民共和党)
1950.7.2 ~ 1950.7.4	克耶 (激进党)
1950.7.12 ~ 1951.2.28	普利文 (民主及社会抵抗联盟)
1951.3.10 ~ 1951.7.10	克耶 (激进党)
1951.8.10 ~ 1952.1.7	普利文 (民主及社会抵抗联盟)
1952.1.20 ~ 1952.2.29	富尔 (激进党)
1952.3.8 ~ 1952.12.23	比内 (独立党)
1953.1.8 ~ 1953.5.21	梅耶 (激进社会党)
1953.6.27 ~ 1954.6.12	拉尼埃 (人民共和党)
1954.6.19 ~ 1955.2.5	孟戴斯-弗朗斯 (激进党)
1955.2.23 ~ 1956.1.24	富尔 (激进党)
1956.2.1 ~ 1957.5.21	摩勒 (社会党)
1957.6.21 ~ 1957.9.30	布尔热-莫努里 (激进党)
1957.11.5 ~ 1958.4.15	加亚尔 (人民共和党)
1958.5.14 ~ 1958.5.28	弗林姆兰 (人民共和党)
1958.6.1 ~ 1959.1.8	戴高乐 (保卫新共和联盟)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1959.1 ~ 1969.4	戴高乐 (保卫新共和联盟)
-----------------	---------------

1969.6 ~ 1973.4	蓬皮杜（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
1973.5 ~ 1981.5	吉斯卡尔-德斯坦（共和党）
1981.5 ~ 1995.5	密特朗（社会党）
1995.5 ~	希拉克（保卫共和联盟）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府总理

1959.1.8 ~ 1962.4.14	德勃雷（保卫新共和联盟）
1962.4.14 ~ 1968.7.11	蓬皮杜（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
1968.7.11 ~ 1969.6.20	德姆维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
1969.6.20 ~ 1972.7.5	沙邦-戴尔马（社会共和党）
1972.7.5 ~ 1974.5.27	梅斯梅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
1974.5.27 ~ 1976.8.25	希拉克（保卫共和联盟）
1976.8.25 ~ 1981.5.21	巴尔（法国民主联盟）
1981.5.21 ~ 1984.7.17	莫鲁瓦（社会党）
1984.7.17 ~ 1986.3.20	法比尤斯（社会党）
1986.3.20 ~ 1988.5.10	希拉克（保卫共和联盟）
1988.5.10 ~ 1991.5.15	罗卡尔（社会党）
1991.5.15 ~ 1992.4.2	克勒松夫人（社会党）
1992.4.2 ~ 1993.3.31	贝雷戈瓦（社会党）
1993.3.31 ~ 1995.5.17	巴拉迪尔（保卫共和联盟）
1995.5.17 ~	朱佩（保卫共和联盟）

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1949.9 ~ 1963.10	阿登纳（基督教民主联盟）
1963.10 ~ 1966.11	艾哈德（基督教民主联盟）
1966.12 ~ 1969.10	基辛格（基督教民主联盟）
1969.10 ~ 1974.5	勃兰特（社会民主党）
1974.5 ~ 1982.9	施密特（社会民主党）
1982.10 ~	科尔（基督教民主联盟）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名单

1948.3 ~ 1948.10	芦田均（民主党）
1948.10 ~ 1954.12	吉田茂（自由党）
1954.12 ~ 1956.12	鸠山一郎（民主党）
1956.12 ~ 1957.2	石桥湛山（自由民主党）
1957.2 ~ 1960.7	岸信介（自由民主党）
1960.7 ~ 1964.11	池田勇人（自由民主党）
1964.11 ~ 1972.7	佐藤荣作（自由民主党）
1972.7 ~ 1974.12	田中角荣（自由民主党）

1974.12 ~ 1976.12	三木武夫（自由民主党）
1976.12 ~ 1978.12	福田赳夫（自由民主党）
1978.12 ~ 1980.8	大平正芳（自由民主党）
1980.8 ~ 1982.11	铃木善幸（自由民主党）
1982.11 ~ 1987.11	中曾根康弘（自由民主党）
1987.11 ~ 1989.6	竹下登（自由民主党）
1989.6 ~ 1989.8	宇野宗佑（自由民主党）
1989.8 ~ 1991.10	海部俊树（自由民主党）
1991.11 ~ 1993.7	宫泽喜一（自由民主党）
1993.8 ~ 1994.4	细川护熙（日本新党等八党联合政府）
1994.4 ~ 1994.6	羽田孜（新生党等八党联合政府）
1994.6 ~ 1996.1	村山富市（社会党等三党联合政府）

历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会议日期	届次	地点	参加国和地区数
1961年9月1~6日	第一次	贝尔格莱德	25
1964年10月5~10日	第二次	开罗	47
1970年9月8~10日	第三次	卢萨卡	54
1973年9月5~9日	第四次	阿尔及尔	75
1976年8月16~19日	第五次	科伦坡	86
1979年9月3~9日	第六次	哈瓦那	95
1983年3月7~12日	第七次	新德里	100
1986年9月1~7日	第八次	哈拉雷	101
1989年9月4~8日	第九次	贝尔格莱德	101
1992年9月1~6日	第十次	雅加达	108
1995年10月14~20日	第十一次	卡塔赫纳	113

大事年表

年代	事件
1945年4月12日	杜鲁门接替逝世的罗斯福任美国总统
4月25日~6月26日	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
7月28日	英国工党艾德礼组阁
8月17日	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爆发
8月19日	越南人民举行八月革命，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9月11日~10月2日	美、苏、英、法、中五国伦敦外长会议
10月	第五届泛非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
1946年2月18日	印度孟买水兵起义
3月5日	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反苏演说
3月22日	约旦独立
4月17日	叙利亚独立
6月18日	意大利共和国成立
7月4日	菲律宾独立，菲律宾共和国成立
10月13日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
12月2日	美英两国的德国占领区签署经济合并协定。
	1947年元旦，成立双占区。

续表

年代	事件
12月19日	法国在河内发动总进攻，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开始
1947年1月	日本国宪法生效
2月10日	对意、芬、保、罗、匈的和约在巴黎签字
3月12日	杜鲁门提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即杜鲁门主义
6月3日	英国公布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
6月5日	美国马歇尔国务卿提出援助欧洲计划（马歇尔计划）
8月14～15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分别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
9月27日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
10月27日	印巴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
11月29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即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
1948年1月4日	缅甸独立，缅甸联邦建立
1月30日	印度甘地被刺
2月4日	锡兰（今斯里兰卡）独立
3月	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
3月17日	英、法、荷、比、卢签订布鲁塞尔条约
4月30日	21个美洲国家签署关于建立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
5月14日	以色列国宣布成立
5月15日～1949年9月	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战争）

续表

年代	事件
6月3日	南非国民党首领马兰组阁，加紧推行种族隔离政策
6月24日 ~ 1949年5月12日	第一次柏林危机
7月	英国广泛的医疗福利计划生效
7月21日	荷兰向印尼发动第一次殖民战争
8月15日	大韩民国成立
9月9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9月18日	印尼茉莉芬事件
11月12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战犯死刑
12月19日	荷兰向印尼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
1949年1月25日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
4月4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5月23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9月15日	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
9月23日	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7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50年1月26日	印度共和国成立
2月14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11月	危地马拉阿本斯当选为总统
1951年3月15日	伊朗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

续表

年代	事件
4月18日	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
8月30日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9月1日	美、澳、新在旧金山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
9月4~8日	旧金山会议，签订片面对日和约，苏联中国拒绝承认
9月8日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字
10月~1955年3月	丘吉尔任英国首相
12月24日	利比亚独立，利比亚联合王国成立
1952年2月6日	英王乔治六世逝世，伊丽莎白二世宣誓为女王
7月23日	埃及七月革命爆发，法鲁克王朝被推翻
7月26日	古巴卡斯特罗发动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首次起义
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逝世
6月18日	埃及共和国成立
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8月19日	伊朗政变，摩萨台政府被推翻
9月	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1月9日	柬埔寨宣布独立
1954年3月8日	日美共同安全协定签订
3月13日~5月7日	越南奠边府战役
4月26日~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
6月	苏联建成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

续表

年代	事件
6月28日	周恩来与尼赫鲁会谈，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
9月8日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在马尼拉成立
10月20～23日	北约外长会议签署巴黎协定，决定接纳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11月1日	阿尔及利亚反法民族解放战争开始
12月28日	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召开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24日	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举行，提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5月5日	巴黎协定生效，西欧联盟成立
5月14日	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5月15日	美、苏、英、法、奥签订《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
7月18～23日	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8月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9月13日	苏联同联邦德国建交
9月20日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签订，对德管制条例停止生效
11月21～22日	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
12月	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为劳联—产联
1956年	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独立
2月14～24日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续表

年代	事件
3月23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4月17日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
4月21日	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圆桌会议协定》
6月23日	埃及全民投票通过新宪法，纳赛尔当选总统
6月28 ~ 30日	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
7月28日	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10月19日	苏日结束战争状态，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0月19 ~ 25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八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总书记
10月29日 ~ 11月6日	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
1957年1月1日	萨尔成为联邦德国的第十个州
3月6日	加纳独立
3月25日	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8月31日	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10月4日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8年1月31日	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7月14日	伊拉克革命，伊拉克共和国成立
10月2日	几内亚独立
10月5日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当选总统（1959 ~ 1969年）
12月8 ~ 13日	第一届非洲人民会议在阿克拉召开
1959年1月1日	古巴革命胜利，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被推翻
8月19日	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

续表

年代	事件
12月1日 1960年	南极条约签订 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刚果(利)(1971年改名扎伊尔)、索马里、达荷美(1975年改名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1984年改名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1986年改名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塞浦路斯、加蓬、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独立
1月19日	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签订
5月3日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立
9月14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
12月20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
1961年	科威特、坦噶尼喀独立
1月17日	刚果(利)总理卢蒙巴遇害
4月12日	苏联发射第一颗载人宇宙飞船,加加林进入地球空间轨道
5月31日	南非宣布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
8月13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封锁东西柏林分界线,继而筑起柏林墙
9月1~6日 1962年	不结盟国家第一次首脑会议召开 西萨摩亚、卢旺达、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独立
2月20日	美国发射载人宇宙飞船
7月3日	阿尔及利亚独立。9月25日宣布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续表

年代	事件
7月23日	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约签订
10月10日~11月22日	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10月22~28日	加勒比海危机(古巴导弹事件)
1963年1月26日	巴列维国王将“白色革命”计划交公民投票,以土改为核心的伊朗“白色革命”开始
5月	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月25日定为“非洲解放日”
8月5日	美、苏、英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9月16日	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11月22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
12月10日	桑给巴尔独立
1964年	马耳他、赞比亚独立
1月9日	巴拿马爆发反美爱国斗争
1月27日	法中建立外交关系
3月23日~6月15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会上成立“七十七国集团”
4月26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
6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8月2~4日	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10月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
10月15日	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续表

年代	事件
1965 年	冈比亚、马尔代夫独立
3 月	美国扩大对越战争，局部战争开始
6 月 22 日	日韩基本条约签订
8 月 9 日	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建立共和国
9 月 30 日	印尼发生“九三”事变
1966 年	圭亚那、博茨瓦纳、莱索托、巴巴多斯独立
1 月 19 日	英迪拉·甘地出任印度总理
3 月 9 日	法国宣布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机构
4 月	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开始
8 月 26 日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武装斗争开始
1967 年 1 月 27 日	美苏等国签订关于各国在探索和使用外层空间中的活动的原则条约
6 月	联邦德国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
6 月 5 ~ 9 日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五战争）
8 月 6 ~ 8 日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
11 月 30 日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
1968 年	瑙鲁、毛里求斯、斯威士兰、赤道几内亚独立
4 月 4 日	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
5 月	法国发生“五月风暴”
7 月 1 日	苏、美、英等国签订“禁止核扩散条约”
8 月 20 日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续表

年代	事件
1969年5月	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1976年退出）、委内瑞拉（1973年加入）组成安第斯集团
6月6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
7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新亚洲政策（尼克松主义）
7月20日	美发射宇宙飞船把人送上月球
9月1日	卡扎菲发动政变，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10月21日	勃兰特任联邦德国总理
11月17日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
1970年	汤加、斐济独立
3月18日	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政权被颠覆
3月23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建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5月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
8月12日	勃兰特访问莫斯科，签订联邦德国—苏联条约
9月4日	智利阿连德政府成立
1971年	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独立
3月26日	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成立孟加拉国
4月19日	苏联发射航天站
8月9日	苏印（度）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9月3日	苏、美、英、法签订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议

续表	
年代	事件
10月25日	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年2月	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
4月10日	关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签字
5月26日	美苏签订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
7月4日	朝鲜南北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南北对话开始
9月30日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
11月8日	两德签订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
1973年	巴哈马、几内亚比绍独立
1月1日	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共同市场
1月27日	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订
2月21日	老挝万象政府与爱国力量签订万象协定
3月29日	美军撤出越南南方
9月	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
10月6~24日	第四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动石油斗争
11月~1975年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1974年	格林纳达独立
4月	联合国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6月26日	欧共体八国（爱尔兰除外）和北约成员国签署《北大西洋关系宣言》

续表

年代	事件
1975 年	莫桑比克、佛得角、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哥拉、苏里南独立
2 月	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签订《洛美协定》
4 月	黎巴嫩爆发大规模内战
4 月 17 日	柬埔寨人民武装解放金边
5 月 1 日	西贡战役结束，越南南方全境解放
7 月 30 日 ~ 8 月 1 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
10 月 17 日	拉美 23 国政府代表签署《巴拿马协议》，宣告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成立
12 月 2 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
1976 年	塞舌尔独立
1 月 5 日	民主柬埔寨成立
2 月	东盟在巴厘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
6 月 24 日 ~ 7 月 3 日	越南国会宣布南北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7 年	吉布提独立
6 月 30 日	东南亚条约组织解散
9 月 7 日	巴拿马与美国签订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
1978 年	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多米尼加独立
4 月 27 日	阿富汗达乌德亲王政府被推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
7 月 12 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续表

年代	事件
11月3日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
12月25日	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
1979年	圣卢西亚、基里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独立
1月1日	中美正式建交
1月7日	越军占领金边
2月	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4月30日	中央条约组织宣布解散
5月	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
6月18日	美苏签订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项条约未获美国会批准
7月17日	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政权
12月27日	苏军入侵阿富汗
1980年	津巴布韦、瓦努阿图独立
9月22日	两伊战争爆发
1981年	伯利兹独立
1月1日	希腊加入共同市场
1月20日	里根任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3月18日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成立
4月12日	美国发射航天飞机成功
5月	密特朗就任法国总统
8月	沙特阿拉伯提出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八点建议”

续表

年代	事件
10月6日	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逝世
10月22 ~ 23日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
12月13日	波兰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直至1983年7月22日
1982年2月22 ~ 24日	发展中国家在新德里召开南南会议
4月2日 ~ 6月14日	英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
6月6日	以色列侵入黎巴嫩
7月9日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
8月	墨西哥宣布无力偿债，引发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1983年1月	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组成“孔塔多拉集团”
3月23日	美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
8月4日	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克拉克西任总理
8月21日	菲律宾反对党领袖贝尼格·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遇刺身亡
10月25日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11月2日	美总统签署规定每年1月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
1984年1月1日	文莱苏丹国独立，1月7日加入东盟
3月9日 ~ 1985年3月5日	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
3月24日	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成立
3月26日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逝世

续表

年代	事件
10月31日	英·甘地遇刺逝世，拉吉夫·甘地继任印度总理
12月19日	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规定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
1985年3月11日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7月17~18日	西欧17个国家第一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法国提出的“尤里卡”计划
11月19~20日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美苏两国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
12月7~8日	南亚七国首脑会议在达卡举行，宣布成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1986年1月1日	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
1月28日	美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
2月7日	在人民斗争浪潮冲击下，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逃亡国外
2月16日	社会党领袖苏亚雷斯当选为葡萄牙总统
2月17日和28日	欧共体12国分别在卢森堡和海牙签订《单一欧洲文件》
2月25日	科拉松·阿基诺就任菲律宾总统
4月26日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
9月	第九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正式成立“南方委员会”，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任主席
11月	美国发生“伊朗门”事件
12月15~18日	越共“六大”召开，越南经济革新开始

续表

年代	事件
12月16 ~ 17日	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八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组成八国集团，1990年3月正式改称里约集团
1987年4月14日	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国于1999年收回澳门
5月19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展“世界50亿人口日”活动，宣传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7月20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两伊停火的598号决议
8月7日	中美洲五国和平条约签署
10月19日	纽约股价暴跌，随即扩及整个西方股市
12月8日	美苏首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会晤，签署了关于消除中程核导弹条约
1988年2月25日	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
4月14日	美、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
5月8日	密特朗蝉联法国总统
6月25日	欧共同体与经互会签署声明，相互建立正式关系
8月17日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因专机爆炸遇难
8月20日	两伊战争停止
9月	缅甸成立苏貌为首的军政府
11月12 ~ 15日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
12月2日	人民党领袖贝·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总理

续表

年代	事件
1989 年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召开，组成政府间协商机构——“亚太经合组织”
1 月 7 日	日本裕仁天皇病逝，同日明仁天皇即位，年号“平成”
2 月 6 日 ~ 4 月 5 日	波兰举行各党派团体的圆桌会议
2 月 15 日	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
5 月 16 日	埃塞俄比亚发生推翻门格斯图总统的军事政变
5 月 25 日	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8 月 24 日	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被任命为波兰总理。美“旅行者 2 号”太空探测器飞行 12 年，到达距海王星约四千八百多公里的最近点
9 月	德克勒克任南非总统。越南宣布自柬埔寨撤军
10 月 10 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东欧共产党中第一个把党改建为社会党
11 月 9 日	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
12 月	马来亚共产党同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停止反政府的武装斗争。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
12 月 4 日	苏、保、匈、波、民主德国五国领导人宣布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捷内政的干涉”
12 月 15 日	欧洲共同体 12 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 68 国签署南北合作第四个《洛美协定》

续表

年代	事件
12月16日	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城发生群众游行，进而蔓延全国，25日齐奥塞斯库被处死
12月29日	捷克七七宪章组织发起人哈维尔当选总统
1990年2月3日	民主柬埔寨改国名为柬埔寨
2月10~12日	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在达卡举行
2月11日	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获释
2月25日	尼加拉瓜大选，反对派联盟领袖查莫罗夫人当选总统
3月15日	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
3月21日	纳米比亚宣告独立
4月12日	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德梅齐埃出任民主德国总理
4月22日	全世界134个国家举行“1990年地球日”活动，宣传环境保护
5月2日	南非“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首次举行平等对话
5月18日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订关于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5月20日	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的伊利埃斯库当选总统。南北也门宣布合并，成立统一的也门共和国
5月23日	匈牙利民主论坛的安道尔组阁
5月31日~6月3日	美苏首脑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会晤
6月8~9日	捷克斯洛伐克大选，公民论坛获胜，恰尔法组阁

续表

年代	事件
6月25日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不久，南斯拉夫爆发内战
8月2日	伊拉克出兵占领科威特
8月31日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订关于实现政治统一的国家条约
9月12日	美、苏、英、法与两德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
10月3日	德国实现统一
10月22日	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订卢森堡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区
1991年1月17日	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军队发起全面进攻，海湾战争爆发，27日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28日海湾战争结束
3月26日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宣布成立南方共同市场
3月31日	阿尔巴尼亚举行多党选举，劳动党获胜，阿利雅当选总统
4月1日	华约军事机构解散
5月21日	印度前总理拉·甘地在竞选时遇刺身亡
6月	印度国大党领袖拉奥出任印度总理。第27届非统首脑会议签署《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规定于1994年5月开始实施。经互会宣布解散
6月12日	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7月1日	华约政治机构解散

续表

年代	事件
7月29日~8月1日	美苏首脑在莫斯科会晤，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8月19~21日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政权
8月29日	苏联议会通过中止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活动的决定
9月6日	苏联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独立
9月17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
9月29日	海地发生军事政变，阿里斯蒂德总统逃亡美国
10月	古巴共产党“四大”召开，制定特殊时期的内外政策
10月30日	美苏倡议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
11月5~10日	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中越关系正常化
12月11日	欧共体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首脑会议，签订欧洲联盟条约
12月13日	朝鲜北南双方签署《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
12月20日	南非政府与非国大等19个政党代表举行“民主南非大会”首次会议，发表意向声明
12月21日	成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宣告成立
1992年1月1日	拉美安第斯集团宣布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区
3月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波黑战火兴起

续表

年代	事件
3月22日	阿尔巴尼亚举行议会选举，民主党获胜，4月9日贝里沙任总统
4月27日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4月29日~5月2日	美国洛杉矶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事件
5月25日	意大利天民党斯卡尔法罗当选为总统
6月17日	美俄达成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
6月23日	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拉宾受命组阁
7月9~10日	欧安会第三次首脑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
8月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立
12月	印度巴布里清真寺流血冲突
1993年1月1日	欧共体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1月3日	布什和叶利钦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1月20日	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
1月	独联体各国领导人签署《独联体章程》
3月31日	巴拉迪尔出任法国总理
4月10日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哈尼被白人极右分子暗杀
7月	东盟外长会议决定建立东亚经济论坛
8月6日	日本新党领导人细川护熙出任首相，自民党一党执政的“1955年体制”结束

续表

年代	事件
9月13日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相互承认，并在华盛顿签署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
9月21日	叶利钦解散俄国议会和人代会
9月24日	柬埔寨新宪法生效，实行以西哈努克为国王的君主制
10月4日	俄罗斯发生“十月事件”，军队攻占议会大楼，逮捕议长和副总统
11月1日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
11月20日	亚太经合组织在西雅图召开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并首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2月12日	俄罗斯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
12月15日	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
1994年1月1日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欧洲经济区条约生效
1月	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农民武装暴动
4月15日	117个国家签署世界贸易协定
4月26～29日	南非举行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非国大获胜
4月28日	贝卢斯科尼出任意大利总理
5月11日	以曼德拉总统为首的南非新政府成立
7月25日	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华盛顿宣言》，宣告两国交战状态结束。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在曼谷举行
7月31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40号决议，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海地
10月26日	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

续表

年代	事件
11月8日	美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获胜
11月15日	科尔第五次当选为德国总理
12月5~6日	欧安会第四次首脑会议在布达佩斯举行
12月9~11日	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决定在2005年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12月11日	俄罗斯军队进驻车臣
1995年1月1日	瑞典、芬兰、奥地利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增至15个
3月	德、法、西、葡、荷、比、卢等国签订申根协定，取消彼此间陆路边境检查
5月17日	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统，朱佩任总理
7月	越南加入东盟，成为第七个成员国
9月28日	巴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协议
10月14~20日	第十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举行
11月4日	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杀，佩雷斯继任
12月3日	美国同欧洲联盟共同签署《跨大西洋新纲要》和《美欧共同行动计划》
12月14日	波黑、南联盟和克罗地亚三国总统在巴黎正式签署波黑和平协议
12月17日	俄国议会大选，俄共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2月	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签署合作开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